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
中国苏维埃运动
(1927—1931)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 编

9

中央文献出版社

ISBN 7-5073-1168-6/K·561
定价：280.00元（共6卷）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九卷

联共（布）、共产国际
与中国苏维埃运动
(1927—1931)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 译

中央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9/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5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

ISBN 7-5073-1168-6

I. 联… II. 中… III. ①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一关系—共产主义运动—中国—史料—1927~1931②共产国际—关系—共产主义运动—中国—史料—1927~1931 IV. ①K260.6②D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30272 号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

译 者/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
责任编辑/田松年

出版发行/中央文献出版社
地 址/北京西四北大街前毛家湾 1 号
邮 编/100017
销售热线/63097018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中华儿女印刷厂
装 订/北京海旭装订厂

850×1168mm 32 开 20 印张 502 千字
2002 年 5 月第 1 版 200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 册

ISBN 7-5073-1168-6/K·561 定价:280.00 元(第 7—12 卷)

本社图书如存在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丛书编者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
主 编 黄修荣
副主编 马贵凡 刘益涛

学术指导

李 新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
研究员)

廖盖隆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
研究员)

向 青 (北京大学 教授)

杨云若 (中国人民大学 教授)

刘桂生 (北京大学 教授)

张注洪 (北京大学 教授)

宋洪训 (中共中央马列著作编译局 研究员)

A · M · 格里戈里耶夫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
教授)

K · B · 舍维廖夫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 高级
研究员)

ВКП (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

ДОКУМЕНТЫ

Т. II.

ВКП (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СОВЕТСКОЕ
ДВИЖЕНИЕ В КИТАЕ 1927—1931
В двух частях

РЕДАКЦИОННАЯ КОЛЛЕГИЯ:

М. Л. ТИТАРЕНКО, М. ЛЕЙТНЕР (РУКОВОДИТЕЛ РАБОТЫ)
К. М. АНДЕРСОН, В. И. ГЛУНИН. А. М. ГРИГОРЬЕВ,
И. КРЮГЕР, Р. ФЕЛЬБЕР, К. В. ШЕВЕЛЕВ

МОСКВА, 1999

丛书前言

联共(布)^①、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问题,是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外关系史等学科的重要研究课题。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国广大史学工作者解放思想、冲破禁区、开动脑筋、积极探索,在苏联、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问题的研究领域中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从而推动了中共党史等有关学科的研究,促进了这些学科的发展。但由于所能看到的档案资料还比较匮乏等原因,这些研究只是初步的,还有待进一步深入。因此,积极开发利用各种文献档案,是我们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

90年代初,由于俄国政治体制的变革,俄罗斯国家档案管理机构和管理办法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并从1993年开始实行《关于俄罗斯联邦档案馆馆藏及档案馆库管理的基本法》。随着这一法规的颁布,大量罕见的档案资料首次开放并陆续出版。其中最使我国学术界感兴趣的,是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和俄罗斯现代历史文献保管

^① 苏联共产党的名称有一个变化的过程:1898年3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正式成立;1918年3月,布尔什维克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决定把党的名称改为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俄共(布);1925年12月,党的十四大决定将俄共(布)改称为全联盟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联共(布);1952年10月,党的十九大又决定将联共(布)改为苏联共产党,简称苏共。

与研究中心同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会联合编辑的有关联共(布)、共产国际对华政策的大型系列档案文件集《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1920—1949)》。

为了把这批从未公布过的重要档案资料介绍给我国史学界和广大读者,我们根据与俄方签订的协议,组织有经验的学者独家翻译这套档案文件集,并聘请中外专家进行译审、校阅。与此同时,我们还将历年来在我国各种报刊、杂志、图书上发表的其他重要中文文献资料编成多卷本《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49)》。这套文献资料选辑将与前述档案文件集组成《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陆续在我国出版。

勿庸置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是一套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档案资料。它的问世,不仅可以使我们更全面地把握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对华政策的重点、目标及其形成和变化的历史脉络,而且还可以更深入地了解联共(布)和共产国际领导人在不同历史时期对中国各军事、政治集团和重要人物的态度和策略,更具体地弄清共产国际驻华代表、苏联驻华使节及顾问在华活动情况以及他们之间的共识和分歧,从而进一步深化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中国近现代史、中苏关系史、国共关系史、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问题以及一些重要历史人物的研究。

这套档案资料丛书在编译、出版过程中得到多方帮助。值此丛书问世之际,谨向关怀、支持过这项工作的有

关领导和部门，向为编译、出版这套丛书辛勤工作的专家学者及中央文献出版社的有关同志，致以深切的谢意。

黄修荣

1996年10月

于京郊自得园

译 者 前 言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上下册）是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和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会合作编辑的大型系列文件集《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第三卷（两册）的中译本，根据莫斯科1999年俄文版译出。本卷文件集共收录文件413份，主要有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及其东方书记处、政治书记处关于中国问题的会议记录和电报以及斯大林、布哈林等领导人的讲话。从内容上看，涉及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在制定和实行苏维埃运动方针初期的对华政策的各个方面。还有很大一组文件，其中包括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和共产国际领导机构同驻华工作人员的来往书信，揭示了联共（布）和共产国际领导人，特别是斯大林和布哈林在制定和实行中共向武装斗争转变的方针时所起的作用。本卷文件集全面公布了有关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上海远东局和国际联络处1927年至1931年间在上海活动情况的文件，其中一些文件特别详细地记录了远东局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几个问题上发生的激烈争论。本卷文件集还发表了米夫1930年10月至1931年4月在华期间关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活动情况和中共状况的书信和报告。与前两卷相比较，这一卷的

最大特点是，收录了较多的中共中央及其领导人向忠发、瞿秋白、周恩来、李立三等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及其有关机构的报告和函电。这些文件都很珍贵，具有很高的文献和学术研究参考价值。为了及时译介给我国史学界，我们于1998年向原书编者购买了中文版翻译出版权，并于1999年底组织力量进行翻译。本书(4册)列为我们编译的大型文献档案丛书《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的第7、8、9、10卷。

本书俄文版由前言、文件正文、图书目录、人名索引四部分组成，中译本文译出前两部分和第四部分(放在第10卷末)，第三部分从略。为反映文件原貌，本卷译本仍保持了原文件体例，未做任何删节。在俄文版中注释是文尾注和脚注，为便于读者阅读，中译本一律改为脚注。有些注释对中国读者来说实无必要，翻译时作了删节。译者新加的注释在注后标有“译者”字样。

在翻译过程中遇到的很大难题，是准确还原中国人的本名，文件中有些中国人使用的是化名或方言拼音姓名，由于年代较久，又缺乏可参考的中文资料，有些人的名字难以查实，只好音译或估译，这种情况在行文中或脚注中作了说明。

文件中有些俄国人的名和父名缩写字母，因不知全称，无法译出相应汉字，为统一起见，在中译本中一律删去不译，只译姓，但对于中国读者不熟悉的人物，第一次出现时尽量用脚注注明其姓名全称。

在本书翻译过程中得到许多知名学者的关心和帮

助。著名汉学家、原书俄方编者、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 A. M. 格里戈里耶夫教授和 K. B. 舍维廖夫博士热情地帮助解决语言理解等方面的某些疑难问题；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大学张注洪教授、刘桂生教授在百忙中抽出时间审读译稿，帮助订正译文中的不准确之处。我们特此向他们表示谢意。

本书翻译工作由马贵凡同志组织。参加翻译的有：(以姓氏笔划为序) 马贵凡(中央党史研究室译审)、王昌滨(中央党校译审)、宋洪训(中央编译局研究员)、何宏江(中央编译局译审)、董友忱(中央党校译审)。

全书译稿最后由宋洪训、马贵凡同志校订。

由于时间仓促，水平所限，译文中难免有错漏和不妥之处，敬希读者批评指正。

前　　言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系列文件集第三卷和第四卷^①所收集的文件阐述了从1927年7月，即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统一战线破裂至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在中国历史上国共两党新的第二次民族统一战线形成时期莫斯科的对华政策，主要是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对华政策。这些文件也略为说明了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的相互关系。

在这个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政策确立的目标是推翻国民党的制度，代之以在开展土地革命和建立中国共产党自己的武装力量即中国红军的过程中和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苏维埃政权。

由于在中国，主要在中国农村实行这一政策而展开的过程，在共产国际的文件和文献中被称为“苏维埃运动”或“苏维埃革命”。1933至1934年间，国际形势和苏联地位发生巨大变化，即法西斯分子在德国上台，日本扩大侵略和中国苏维埃运动失败，促使共产国际开始重新审查以前对东西方工人运动和解放运动的政策，尽管为时很晚。这次审查是根据1935年夏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反对法西斯和战争威胁的斗争策略进行的。在这种背景下，在中国开始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转变。共产国际七大后对华政策新方针的探索和在实践中向这种方针的过渡，由于

^① 系列文件集的前两卷是：《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文件集）第1卷（1920—1925），莫斯科1994年版；第2卷（1926—1927），分一、二册，莫斯科1996年版。

一系列原因持续了比较长的时期。中国共产党最终并正式取消建立苏维埃的口号是在1937年4月，而同国民党的统一战线则只是在中日战争爆发后的头几个月里才实际形成。考虑到这些情况，系列文件集的编者们把第三卷和第四卷冠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的总称，同时他们也完全明白，共产国际七大后在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对华政策中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些变化最终导致取消苏维埃口号和终止国共之间的内战。

在1927至1937年的十年间，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对华政策可以划分为三个主要时期。第一个时期或初期（从1927年7月至1931年底），从组织中国共产党反对国民党各派的头几次武装发动和提出建立苏维埃的口号到建立较大的和较稳定的苏维埃根据地并在华中和华南统一红军。在这个时期里，制定了中共争取建立苏维埃的斗争纲领和苏维埃本身的政策的基本组成部分，这在中央苏区党组织第一次代表大会（1931年11月）的决议中有所反映。

第二个时期，从1931年底到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1935年7至8月），代表大会快结束时明确指出苏维埃运动的计划已告失败（华中和华南主要苏维埃根据地丧失，红军主力被迫向西北转移，损失惨重），进一步明确了中共、苏维埃和红军活动的基本方针，未作原则性修改，初步确定根据策略决议开始局部审查对一些地区军政集团的政策，目的是克服中共及其武装力量在由于日本侵略的加强而在国内爱国情绪日益高涨的形势下与可能有的同盟军的“隔绝状态”。

第三个时期，从共产国际七大后到1937年8月，其主要特点是探索从“苏维埃化”的政策向抗日统一战线策略的转变。

考虑到这样的分期法以及现已发现和挑选出来的文件的数量和意义，我们决定将属于制定和执行苏维埃政策的第一个时期的文献资料列入第三卷，而将属于第二和第三个时期的文献资料列

人第四卷。

总的说来，中国“苏维埃化”的方针乃至从共产国际七大开始的莫斯科对华政策的转变，在许多方面仍是共产国际执委会在前一时期特别是1926年底以来执行的政策的继续（尽管在形式上有所变化），在前一时期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政策对革命的民族任务和社会任务的相互关系以及对社会政治力量对比就作出了错误的估计。

它的合乎逻辑的结果（从这一政策制定者的角度来看）是在1927年夏，即莫斯科和中共同武汉国民党关系破裂时期，提出通过“平民途径”，即工人、农民和城市贫民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结成的联盟发起革命的进攻来“继续为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斗争的方针，这一方针反映了对结成这一联盟的可能性、对工农运动的水平和性质的过高估计。

建立苏维埃的方针的提出是由以下理论依据决定的：在共产国际的政治理论武库中，没有关于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建立革命后政权体制的其他概念。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了当时形势的影响：提出建立苏维埃的口号是同斯大林的名字直接联系着的，他在同托洛茨基就这个问题进行激烈争论后于1927年秋亲自批准了这一方针，而托洛茨基早在这年春天就要求在中国组织苏维埃。

在1927年至1937年整整十年间的时期里，尽管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对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就其环境、内容和形式来说有时有着十分重大的差别，但对一些决议的性质及其实施的机制起决定性影响的是苏联和联共（布）的内部发展进程，即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斯大林个人独裁的确立和他的个人崇拜的形成。

众所周知，在20年代末，伴随着这些发展进程，先是在1927年下半年发生了对由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领导的“左倾”反对派代表人物的“清洗”和解除他们的联共（布）和共产国际领导职务，后是在1928至1929年间发生了在反对“右倾分子”和

“右倾调和分子”的口号下对布哈林及其拥护者的“清洗”和解除他们的领导职务。随着布哈林的被排挤，共产国际和加入共产国际各党的主要政治和干部问题的解决就集中在斯大林及其亲信莫洛托夫的手中了。

在联共（布）领导层中和在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中决定中国问题的人员范围急剧缩小的趋向从1928年初就显露出来了。这从莫斯科通过共产国际、外交人民委员部和情报机关渠道收到的有关中国的情报发送给联共（布）领导人的名单的缩小中可以看出来。现在没有发现关于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在1928年3月以后继续活动的材料。从1928年初起，审议共产国际对华政策和中共活动的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次数的减少也反映了这一趋向。如果说1927年下半年几乎每次政治局会议都审议这些问题，那么在整个1928年中只有8次，1929年只有2次，1930年只有1次，而1931年则没有。1930年以后，在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的会议上不再审议中国问题了，代表团的工作失去了经常的性质。

关于共产国际对华政策问题的决议和指示的制定工作表面上转到了共产国际领导机构、东方书记处及其各专门委员会的职权范围。而实际的决策机制则是：共产国际执委会及其东方书记处领导人要把寄给中共的最重要的政治和干部问题的决定和指示送交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批准，或者征得他们的口头同意，而事先又要征得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领导人的同意。从20年代末起，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中（除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外）最有影响但不是独立的人物是皮亚特尼茨基、曼努伊尔斯基和洛佐夫斯基。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在共产国际对华政策问题上不再作出记录在案的决议的这种“自我放弃”的现象，也反映了联共（布）领导的一种意向：经过1927年对华政策的一系列失败以后，它不愿保留自己行为的文献证据，以防遭到新的

挫折。下述情况也证明了这一点：1927年以后，斯大林再没有发表过专门论述中国问题的文章或公开讲话，只是在党的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上、共产国际执委会专门委员会的秘密会议上或者在会见中共代表时对国内形势发表一些简短的评述。

随着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发展，在共产国际活动中教条主义也加强了。布哈林及其拥护者被解除共产国际的工作后，在共产国际执委会及其所属的科研教学机构内，在东方学界，在论述中国和中国革命当前迫切问题（关于中国的社会经济制度、关于孙文主义的阶级本质、关于陈独秀主义的本质）的中国学杂志^①上，即使过去也仅限于发表官方的评价，而在30年代初则代之以严厉的批判运动，随之而来的是贴标签、政治谴责和迫害。

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的第一次镇压浪潮，主要触及到联共（布）和共产国际机关内以及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和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教师和学生中的托洛茨基反对派的积极拥护者，以及在工农红军学院里任教的军事专家中的一些东方学者和中国学者。30年代中期，基洛夫遇刺后，在共产国际机构内开始进行逮捕。被逮捕的有东方书记处的负责人萨发罗夫、曼达良，还有在东方书记处领导下进行活动的中国研究所的一些工作人员。这次逮捕是1937至1938年大镇压浪潮的序幕，在1937至1938年的大镇压浪潮中，被逮捕和处决的有在共产国际机构、中国研究所、共产国际执委会院校、外交人民委员部和军事机关、苏联科学院和高等院校中工作的大部分中国问题专家。

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环境，被指控为“左”倾或“右”倾的威胁，以及由此带来的一切后果，对“暗藏的托洛茨基分子”和其他“人民公敌”的清查，这一切都为对中国发展进程的分析和执

^① 见B.H.尼基福罗夫：《苏联历史学家论中国问题》，莫斯科1970年版第170—176、180—188、209—218页。

行莫斯科对华方针的后果打上了烙印，表现为试图挑选一些事实并加以诠释，以此来证明“领袖”所批准的政策是“正确”的，并用各种“主观原因”，即在当地实行这一政策时所犯的错误或在共产国际机构及其驻中国和中共的工作人员中的“倾向分子”和“敌对分子”所搞的“阴谋”来解释它的失败。

然而，对所执行的政策的总的基本原则表示怀疑是危险的，实际上也是不可能的，这并没有排除共产国际执委会及其东方书记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联共（布）和共产国际驻华代表们根据“中等水平”结论来综合有关中共及其所成立的苏维埃和红军部队的活动情况的大量通报材料的积极工作。中共实际活动的需要，中共党内和它的一些组织随着形势的变化在讨论中提出的问题都要求这样做。在此基础上，共产国际执委会及其专门委员会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中国研究所一起制定了共产党政策的基本方针，即农村土地政策、工会政策和军事政策，以及城乡群众性组织工作和宣传鼓动工作的基本方针。

就像上一个时期一样，在这项工作进行的同时，也试图将一些较发达国家的经验和工作方式，首先是俄国革命的经验运用到中国的形势和中共的工作中来。与此同时，在总结和审查 20 年代末以来中共政策中的许多具体问题和方针时，也表现出一种更加深刻地理解中国现状和中共活动条件的一些方面的倾向。在这方面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开展对中国的研究，培养一大批在以往年代里有国内工作经验的专家。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活动中的这种倾向反映在对涉及农村土地政策、军事政策和军事建设途径的方针的修改上和对武装力量作用本身的理解上。在这方面最重大的修改是对 20 年代末 30 年代初的政策作出的修改，特别是在共产国际七大后作出的修改。

随着 30 年代中期形势的变化：由于西方和远东战争威胁出现而造成的苏联国际处境的复杂化，以及主观因素，即在国会纵火

案中赢得崇高声望的季米特洛夫进入共产国际领导机构，并能于1934年6、7月间向斯大林提出必须重新审定已明显遭到失败的方针的问题^①——这一切促使斯大林同意（并非没有摇摆）在共产国际七大上通过新的策略。然而众所周知，以前的方针并没有被共产国际否弃，而斯大林也从未公开表示过支持七大的决议。这给人造成一种印象，例如在对华政策方面，似乎建立苏维埃的口号总的说来是正确的，只是暂时推迟到将来，即到反击日本的时候去实现，这有碍于清醒地总结争取苏维埃斗争的经验和教训。

和以往的年代一样，在苏联的对外政策^②和共产国际执行的路线，包括在中国执行的路线之间存在着紧密的相互联系。有一种流行的看法认为，在提出“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构想和对这一构想持批评态度的“左倾”反对派的首领们被解除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领导职务后，共产国际的政策越来越受制于苏联的民族和国家利益，然而事实和文献表明，这种看法未被证实特别适用于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时期。实际上，在国家关系方面转向与南京政府对抗的政策有其最初的动机，并由直到30年代中期“共产国际政策”方面的冲突发展，即提出和支持中国共产党推翻国民党的方针所决定的。例如，苏联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在20年代末在给斯大林和联共（布）其他领导人的信中所提出的，正是在共产国际方面的政策和苏联东西方对外政策之间的这种相互作用的性质及其给苏联国际处境造成的不良后果。契切林是由于一系列原因而使自己能够作出坦诚评价的少数人之一，他认为，“在

① 关于季米特洛夫在重新审定30年代中期共产国际的方针及其对华政策中的作用，见K. K. 什里尼雅：《共产国际在反对法西斯和战争斗争中的战略和策略》，莫斯科1979年版第36—45页；A. M. 格里戈里耶夫、A. B. 列兹尼科夫：《季米特洛夫和反帝统一战线问题》，载《季米特洛夫——杰出的共产主义运动活动家》，莫斯科1972年版第274—293页。

② 见《苏联外交文件》莫斯科1965—1974年版第5—10卷。

共产国际内无谓地谈论同子虚乌有的反苏战争准备的危险作斗争只能损害和破坏苏联的国际地位”^①。他认为，从苏联利益角度看，（“继 1923 至 1926 年实行的绝妙政策以后”）自 1927 年在中国采取的行动方针是“极大的错误”^②。契切林在 1929 年 10 月写给当时的人民委员会主席李可夫的信中也阐述了同样的思想，他写道：“在我看来，共产国际目前的方针是极其有害的……在中国，我们正穷于应付 1927 年致命方针带来的后果……我们把 1927 年对华政策的方针搬到了西方，这是可怕的，它正在全力破坏同德国的关系”^③。

“共产国际方面”这种意识形态化的政策的主导地位在 30 年代初，在 1929 至 1933 年间发生世界经济危机的情况下仍保持下来并有所加强。这表现在提出关于新的革命高潮，关于在世界范围内“新一轮战争和革命”即将到来的论点上。在西方国家的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中，斗争矛头指向了社会民主党，通过了“阶级反对阶级”的策略。在东方，这表现在共产国际的一些决议对中国形势的“左”的估计的升级上——“新的革命高潮”（1930 年）、“革命危机”（1931 年）、“革命形势”（1932 年）和夸大苏维埃运动的规模和实际作用上（“苏维埃革命在相当多的地方取得胜利”、“苏维埃革命已成为世界革命的重大因素”^④）（1932 年）。这一方针也决定了莫斯科和南京之间国家关系的对抗性质，1929 年至 1932 年两国外交关系中断。

① 1929 年 6 月 20 日契切林给斯大林的信。见 B. B. 索科洛夫：《鲜为人知的契切林》。摘自俄罗斯联邦外交部解密档案，载《近现代史》杂志 1994 年第 2 期第 14—15 页。

② 同上，第 14 页。

③ 1929 年 10 月 18 日契切林给李可夫的信。同上，第 15 页。

④ 《共产国际在民族殖民地革命中的战略和策略（以中国为例）》（文件集），莫斯科 1934 年版第 317、323 页。（下称《共产国际的战略和策略》）

在论述苏联外交史的著作中,由于缺乏直接的证据,迄今为止还没有对 20 年代末 30 年代初莫斯科在国际舞台上执行不符合它的民族和国家利益并造成苏联国际处境恶化的左倾政策的原因作出足够令人信服的解释。一些作者这样来说明这一现象,认为正是在 20 年代末 30 年代初在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史无前例的经济危机,充满了“世界革命迅速到来的期望”^①。联共(布)和共产国际领导人、思想家和宣传员们的理论构想和评价为这种解释提供了一定的根据。其中许多人,也还有共产国际许多党的领导人和思想家“善良地陷入了迷途”,把希望当作了现实。但是在分析这种极左倾向的原因时,应当估计到,这种倾向早在 1927 年就已经出现了,也就是说在世界经济危机以前,在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内进行反“右倾”斗争时早就发展起来了。正是在反对“右倾分子”的斗争浪潮中,在 20 年代末,许多共产党首先是一些大党(西方是德国共产党,东方是中国共产党)内形成了新的领导。在 20 年代末 30 年代初的政策中,在中国建立苏维埃的方针是一个极其主要的方针,斯大林亲自参与了这一方针的提出和论证,并被认为是同联共(布)和苏联的内部进程密切联系着的。宣传战争危险即将到来的思想和结合关于苏联作为即将到来的世界革命堡垒的作用的论点在国内加剧“被围困的要塞”的形势,这些都被用来确立斯大林的专制,用来论证加速工业化和集体化的政策。

30 年代初对中国形势上述评价的暂时冻结以及对“苏维埃革命”的规模和作用的夸大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同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加强联系着的。这些评价被用来证明斯大林批准的政策的“正确性”,尽管文献表明,莫斯科有足够的材料可用来对中共及其军队的力量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同时,共产国际执委会的许多工作人员也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在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报刊上对

^① H. B. 扎格拉金:《苏联外交成败史》,莫斯科 1990 年版第 88 页。

苏维埃力量的评价“远远超出了被允许的宣传夸大的极限”。

从30年代中期开始，对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政策包括它们的对华政策产生决定性影响的是开始考虑苏联的民族和国家利益及其国际地位。

上面已经提到，共产国际在中国建立苏维埃的政策是1927年至1931年间在联共（布）和共产国际代表们直接参加下所通过的联共（布）、共产国际、工会国际和中共领导机关的一系列决议中制定的。这些决议的大部分已收入为专家们所熟悉的文件集中^①。这一政策的内容在许多方面是由斯大林在1927年的文章和讲话中提出的论点所确定的，特别是在“中国革命三阶段理论”以及布哈林在1927—1928年的著作和讲话中提出的论点所确定的。对于理解共产国际这几年里制定政策的过程具有重要意义的还有联共（布）、共产国际和工会国际其他领导人，如库西宁、洛佐夫斯基、曼努伊尔斯基、米夫、曼达良等的讲话，也还有联共（布）和共产国际报刊上的文章以及中国研究所发表的文献^②。对形成苏维埃政策的许多方面具有重大影响的还有托洛茨基1927年及以后（根据“一个反对者的”原则）的立场^③。

中国共产党的立场、它对共产国际决议和方针的反应、中共领导人及其各派在制定和执行苏维埃运动方针时的作用，这一切

^① 见П. Е. 斯卡契科夫：《中国图书目录》，莫斯科1932年版和1960年版；Л. А. 库夫辛尼科夫：《中国土地问题和农民运动（1917—1949）》，见《1917—1927年用俄文、中文和西欧国家文字出版的文献资料目录索引》莫斯科1976年版；Л. А. 库夫辛尼科夫：《中国工人运动（1917—1949）》，见《1917—1949年用俄文、中文和西欧国家文字出版的文献资料目录索引》，莫斯科1982年版。

^② 同上。

^③ 托洛茨基：《列宁逝世后的共产国际》，莫斯科1993年版；托洛茨基：《中国革命问题》，纽约1932年英文版；托洛茨基：《书信集》，第2卷《论中国》，汉堡1990年德文版。

在其领导机构的文件中，在同共产国际和地方组织的来往信件中，在领导人的著作中和在中共的报刊上都有反映^①。联共（布）、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那些年的许多文件已在西方一些国家^②、在台湾^③、在日本^④和在香港^⑤公开发表。

共产国际文件中涉及到这个时期苏维埃运动的内容和目标的一般性论点通常在中共的文件中毫不修改地加以重述。同其他各党一样，从 20 年代末起，中国共产党也总是就共产国际某些决议和指示作出一些专门的决议。与此同时，和以往一样，党的领导层及其地方组织内的各个派别不仅对一些具体问题作出自己的决定，而且对国内形势和党的工作状况提出自己的评价，在某些时期里还提出自己的主张和行动计划。总的说来，在 20 年代末 30 年代初中共党内流行的评价和指导方针中，占主导地位的是极“左”倾向，有时要比在共产国际文件中更甚。这是同中共新的领导人中尚未根除的“左”的观点和情绪一脉相承的，这些领导人是在从似乎有可能实现激进方针但失去了机会的角度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进行批判的浪潮中进入党的领导层的。20 年代末在共产国际内强调同“右倾分子”的斗争以及在评价中国形势时

① 见《中共党史文件（1920—1949）》，莫斯科 1981 年版，第 2 卷：1927—1937 年（五卷本）（下称：《中共党史文件》）《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北京 1989—1991 年版。

② 《中国共产主义历史文献》，勃兰特等编，剑桥（马斯）1952 年版；《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托尼·塞奇编，阿尔蒙特 1996 年版；肖作梁：《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权力消长史料（1930—1934）》，西雅图 1961、1967 年版；肖作梁：《中国的土地革命（1930—1934）》，西雅图 1969 年版。

③ 《共匪祸国史料汇编》，台北 1964 年版；吴天威：《陈诚资料选集》，剑桥 1972 年版；杜诺万：《台湾调查局档案中的中共资料》，安那波 1976 年版。

④ 波多野乾一：《中国共产党史资料集成》，东京 1951 年版第 1 卷—第 5—7 卷；竹内实：《毛泽东集》，东京 1983 年版第 3—5 卷。

⑤ 《中国共产党文件（1927—1930）》、《〈中央幕讯〉资料选编》，香港 1971 年版。

“左倾”的滋长为中共党内这种情绪的存在和加强提供了土壤。

中共党内这种倾向发展的极端表现是1930年形成并试图实现的李立三的极左主张和行动计划，李立三从1929年底至1930年9月的时期里实际上领导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众所周知，这个计划所指望的是，通过中国一些大城市的暴动和罢工，借助于红军力量的冲击，引起世界大战的“爆发”，世界革命的“爆发”，从而保证中国革命的胜利。^①共产国际阻止了这一方针的实施，因为这一方针引起了中共领导层中的尖锐危机并给它的力量带来了重大损失，特别是在大城市里。但是在评价中国形势方面的左倾情绪的增长为中共活动中的左倾复发提供了土壤。在共产国际七大以后，正当开始转向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时候，共产国际执委会像在1928年初那样又不得不克服中共活动中表现出来的以前共产国际执委会自己批准的方针的惯性作用。

在共产国际制定和实施20年代末30年代初苏维埃运动的行动纲领方面，可以分为若干阶段。第三卷收集的几个主要部分的文件反映了这一过程的轨迹。

这方面的最初步骤是联共（布）、共产国际和中共在1927年下半年作出一系列决议，这些决议规定中国共产党转向在建立苏维埃的口号下组织武装暴动，从而形成了1927年秋至1928年春的城乡暴动时期。这些暴动给中国共产党带来了重大损失：党员人数急剧减少，大部分组织遭到破坏，同工会和其他群众性组织失去了联系。残存的一些组织和某些共产主义团体以及他们领导的为数不多的军队被驱赶到了偏僻的乡村地区。在中国共产党的

^① 关于李立三的纲领和共产国际在克服这一纲领中的作用，见A. M. 格里戈里耶夫：《共产国际和在苏维埃口号下的中国革命运动（1928—1930）》，载《共产国际与东方：为争取民族解放运动中的列宁主义战略策略而斗争》，莫斯科1969年版第328—345页。

生活和活动中开始了一个新的时期，即主要在农村进行发展并同残存的和在农村建立起来的武装部队取得紧密联系的时期。在进行暴动的过程中，党取得了建立小块苏维埃根据地、实行土地政策、组织武装部队和在乡村地区开展游击活动的初步经验，进行了总结农村斗争的可能性及其作用的最初尝试。1927年底，时任党的主要领导人的瞿秋白阐述了这样的思想：中国的特殊条件，即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分散、军阀战争、中央和地方政权的软弱，“自然创造出一种特殊的斗争策略，便是游击战争”，开始时它可能波及几个县并成为“初期暴动”，与发达国家包括俄国在内不同，“革命不能有夺取‘首都’一冲而决的形势”发展^①。在中国共产党的文件和报刊上出现了“割据”这个术语，反映了建立小块游击根据地的计划，这些地区被认为是通向“最初在一两个省内”夺取政权的道路^②。同时，建立小块苏维埃地区和游击根据地的可能性是同当时国内似乎存在着革命形势联系着的，当时认为，在不久的将来，农村的暴动会与城市的暴动结合起来。

关于党遭到惨重失败和巨大损失的消息促使莫斯科修改了对中国形势的估计和在中国的行动策略，这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全会（1928年2月）的决议中和以更全面的形式在1928年7月在共产国际直接指导下在苏联召开的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确定了下来。暴动的结局被认定为工农革命运动“第一个浪潮”的衰退和惨重失败。与此相联系，建议党采取暂时退却和在“争取群众”口号下恢复和积聚力量的政策^③。

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文件中所阐述的主要纲领性理论观点总

^① 瞿秋白：《武装暴动的问题》，载《布尔塞维克》杂志1927年第10期第294—296页。

^② 《布尔塞维克》杂志1928年第13期第410页。

^③ 见《东方各国共产党的纲领性文献》，莫斯科1934年版第22、25页。

的说来反映了早在 1927 年确定的共产国际政策的向“左”转，这首先表现为否认中国资产阶级各阶层以及统治阵营中各政治军事集团的反帝爱国主义潜力，否认它们有解决国家统一和发展经济任务的能力。与此相联系，认为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未完成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同时认定“只有无产阶级和农民”才是革命的动力，“中国的反帝革命、土地革命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有反对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才能进行到底”^①。

尽管统一国家也属于革命的基本任务，但在评价形势时却指出，日本在东北和华北的侵略意味着“中国实际上分裂的开始”，作为中共斗争的主要目标，提出了推翻国民党制度的任务。与斯大林的理论相适应，认定中国革命已进入“第三阶段，即苏维埃阶段”，其目标是在国内建立苏维埃政权作为工农民主专政的一种形式^②。在共产国际和中共的文件中和宣传中试图把苏维埃运动同时看作是反帝斗争（矛头指向帝国主义走狗和亲帝国主义势力）。这种尝试在 20 年代末 30 年代初没有带来明显的结果，因为具有爱国主义情绪的中国各阶层居民对这种运动的支持是极其有限的。日本于 1931 年占领中国东北后，中共根据共产国际的倡议把反对国民党的“革命战争”的口号改变为反对“卖国的南京政府和日本侵略者”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口号，但情况也没有发生变化。尽管形式有所改变，苏维埃政策的内容和目标依然如故。

在 20 年代末的共产国际执委会文件中，对南京政权的评价的演变也是与上述对统治阶级的作用和潜力的评价相联系着的，从认定南京政权是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权演变到认为它是地主资产阶

^① 见《东方各国共产党的纲领性文献》，莫斯科 1934 年版第 16 页。

^② 同上，第 16、18 页。

级性质的政权^①。无论在这个时期还是稍后一个时期，共产国际都未能对南京政权的潜力作出恰当的评价。在评价 20 年代末 30 年代初南京政权活动的性质和前景中反映了意识形态的缘由：否认中国有按照“凯末尔道路”发展的可能性以及在 20 年代末的共产国际的文件和斯大林的讲话中所作出的有关结论的惯性作用。联共（布）和共产国际领导人和思想家们从世界经济危机中看到了有助于作出这种评价的补充论据。在中国和世界报刊上广泛流传的关于中国极端严峻的经济形势、城市里广泛的失业现象和许多乡村地区闹饥荒的材料也对作出这种评价有影响。南京政府成立后相继进行的一次又一次的流血战争使人们得出“上层”深刻危机的结论。甚至在 30 年代中期，随着中苏关系趋向调整和寻求实行国共两党抗日统一战线策略时，尽管事实上承认南京政权是能够对抗日本侵略的主要力量，但在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文件中没有清醒地分析国民党在发展经济和统一中国方面的政策的内容和结果。在这方面，共产国际只是“半承认”季米特洛夫在 1936 年 7 月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秘密会议上的讲话：“总之，蒋介石能够组织起四分之三的民族，但他不是争取统一中国、反对各派军阀、反对分裂中国和中国人民的斗士”^②。这番话无论在当时还是以后的长时期内都没有公开发表过。

南京政府把孙逸仙的学说作为官方的理论，这决定了共产国际和中共对这一学说的各个方面以及一些国民党派别和左翼国民党人团体要维护和利用孙逸仙学说中最激进部分的企图采取否定的态度。

与“左”的倾向相联系的还有排斥同国民党内的反对派

^① 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及其机构内在讨论过程中出现的对南京政府评价的演变，见 B. H. 尼基福罗夫：《苏联史学家论中国问题》，第 177—179 页。

^② 见《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集）》，莫斯科 1986 年版第 265 页。

（“改组派”）以及谭平山和邓演达一类的“第三条道路”党进行任何交往的方针^①，这一方针也反映了某些担心，唯恐这些势力会吞噬处于极端困难境地的共产党。此后，由于斯大林把“列宁主义的基本战略原则”解释为激化同“中间”势力的斗争，这一方针又成为共产党同一切可能的同盟者的宗派主义自我隔绝的根源。

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新的策略方针规定了对党在城乡的活动采取各种不同的处理方式。

对于城市来说建议采取退却和积聚力量的策略：恢复党和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组织，恢复党在工会中的阵地，通过组织罢工以及口头和报刊的鼓动宣传工作将城市基层群众首先是工人吸引到共产党方面来^②。

在农村，尽管在代表大会召开期间建立小块苏维埃根据地的最初尝试几乎各地都遭到挫折，而共产党人领导的小股部队经受了最困难的时期，但还是采取了“扩大苏区，巩固可能成为开展更大规模运动的根据地的地区”的方针。扩大游击队被认为是通向建立中国红军之路^③。布哈林在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和斯大林在接见代表时的讲话都谈到了这一前景。在这方面，代表大会特别注意到党在农村的工作、建立苏维埃根据地和建立中共武装力量的工作^④。

有关城市工作的方针，即指导党在“工人阶级基本群众中站稳脚跟”的基础上恢复和发展工人组织，争取在工会中发挥决定

① 见《东方各国共产党的纲领性文献》第31—32页。

② 中共六大关于组织工作、关于共产青年运动、关于职工运动、关于宣传工作的决议和决定，见《中共党史文献》第2卷第2册节40—59、72—77、78—86、112—123页。

③ 见《东方各国共产党的纲领性文献》第30页。

④ 见《中共党史文献》第2卷第2册第5—39、92—99、107—110页。

性作用和最终争取整个工人阶级大多数的方针，没有考虑到中共从事活动的现实条件。在这里，以及往后在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工人运动和工会运动的指示和中共的文件^① 中都保留了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原先固有的关于中国工人阶级发展程度和斗争水平、关于工人阶级由于受本国和外国资本最深重剥削而具有“特殊革命性”的过高估计。

随着南京政府工会政策及其工厂法^② 效果的显露，对中共在城市里的地位开始产生影响的，是对残酷的警察监控措施与在劳资关系问题上实行的改良主义政策的结合以及民族主义宣传对于主要工人阶层和城市基层群众的影响的估计不足。在共产国际和中共内流行着这样一些观念，既然中国没有产生“工人贵族”的土壤，那就有利于将工人阶级大多数争取到共产党方面来。这些观念没有估计到这样一个情况，即国民党的工厂法和工会法给大城市的熟练工人阶层所提供的最低限度工作保障，使他们同城市其他劳动群众，更不用说同失业工人分离开来了。

对工会、青年组织和其他组织所积极响应的抗击日本侵略的民族爱国主义要求和口号对于工人影响的估计不足，这不可避免地要对 30 年代初中共的活动产生影响。

从 1931 年底起，共产国际试图实施“来自下面的统一战线”策略，根据这一策略共产党组织应当独立领导爱国主义团体和爱

① 见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关于中国共产党在工会中工作的决议（1929 年 8 月），《共产国际的战略和策略》第 248—251 页；第五次全国职工代表大会决议（1929 年 11 月）—《中国职工运动文选》，北京 1958 年版第 2 卷第 309—312、339—340、343—344 页；又见《中国历次全国劳动大会文献》，北京 1957 年版第 238—358 页。

② 关于国民党的工人政策和工会政策见：B. И. 霍里科夫：《南京国民党与工人问题（1927—1932）》，莫斯科 1977 年版第 80—94、112—142 页；又见 T. H. 阿卡托娃：《国统区的工人运动（1927—1937）》，莫斯科 1983 年版第 68—86 页。

国主义行动，同时把推翻国民党政权和支持苏维埃的口号提到首位，这些尝试导致了爱国主义团体的分裂，使共产党人处于孤立状态，并成为警察容易获取的猎物。

共产国际执委会及其驻华代表于1932年初在“上海保卫战”期间批准的策略，即上海各阶层居民和保卫上海的部队进行广泛的爱国主义发动以武装抗击日本军阀占领上海的图谋的策略使中共的组织遭到了进一步的削弱和党在城市积极性的衰退^①。这一情况以及中共在城市里的工作屡遭失败、工作人员屡遭逮捕，促使中共作出决定，于1933年初将中共领导机关从上海搬到苏区，这实际上是默认固守城市的尝试失败。

中共六大关于农村工作的决议具有另一种不同的意义。在这里，在表述一系列重要理论原理，首先在确定农民的基本要求（“农民……希望拥有土地”）上^②，表现出了联共(布)和共产国际领导人原先固有的想法，要把从俄国几次革命的经验中得出的观念搬到中国来，深信在中国自发的土地革命也业已成熟^③。同时，在考虑到中共以往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制定的代表大会的文件指出了中国农村形势的许多特征和特点、农村各阶层和各种组织包括传统性组织在内的行为和作用，以及中共在农村建立“苏维埃根据地”和武装力量的可能性和途径。在代表大会有关这些问题的决议中，对中共以后在军事工作中所要碰到的许多问题作出了答复^④。总

① 关于中共组织在“上海保卫战”时期的立场及其后果，见T.H.阿卡托娃：《国统区的工人运动(1927—1937)》，莫斯科1983年版第179—188页。

② 六大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见《中共党史文献》第2卷第2册第5页。

③ 见《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1卷(1920—1925年)第13页。

④ 《中共六大关于农民运动的决议》和《中共六大关于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决议》中有关于农民组织、游击战和建立红军的专门章节，见《中共党史文献》第2卷第2册第34—39、92—98页。

的说来,在中共六大以及随后 20 年代末 30 年代初共产国际的文献中制定的关于农民土地问题、军事问题的决议,使得中国共产党有可能不断加以利用,转入各种形式的反政府武装斗争和各种类型的中国农村反抗运动以及分化瓦解军阀队伍的轨道。实施这一方针使中共有可能利用 20 年代末 30 年代初国家的四分五裂状态,利用当时统治阵营内部各派力量的混战,以便在远离中心城市的乡村地区,在国民党各主要政治军事集团管辖范围的间隙地带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①。

这些结果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同联共(布)和共产国际不断关心中共这方面的活动分不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在研究中共农村活动的经验方面进行了紧张的工作,拟定了一些指示,明确指出和规定了在农民土地政策、军事建设和红军作战策略方面的方针。这项工作的最重要的方面是在苏联的军事院校中培养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军事技术专家、参谋工作和侦察工作的组织者。其中许多人在 20 年代末 30 年代初领导了中国红军的集团军、红军的司令部和苏区的军事院校。具有在俄国和中国内战年代工作经验的苏联军事专家为军事院校的中国学生编纂了有关军事组织、游击战争策略方面的教材,这些教材在中国红军院校里也曾广泛加以利用。

在中共六大召开期间,曾设想“在总的革命高涨形势下,一省或几省的胜利是可能的”。同时认为,“这些省的政权也将会在几个中心城市里夺得”^②。以后的事态发展——苏区的扩大和红军在农村的发展、党在城市的阵地明显薄弱——促使共产国际执委会对自己的方针作了较大的修改。在《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1930

^① 见 A. M. 格里戈里耶夫:《中国革命运动的战略和策略问题(1927—1931)》,莫斯科 1980 年版第 125—129 页。

^② 中共六大政治决议,见《东方各国共产党的纲领性文献》第 24 页。

年7月)》中,关于“新的革命高潮”已经到来的论点主要是同苏区和中共武装力量在农村的建立和发展联系着的^①,而将“建立有充分战斗力和政治上经得起考验的红军”^②作为头等重要任务提了出来。

在1931年7月,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的决议中作出结论,在城市处于政府当局和外国列强严厉管制的情况下,“工农红军自然将成为积聚和组织工农革命力量的中心,成为整个革命运动高潮的极重要的杠杆……和推翻国民党的斗争的主要形式”^③。由此可见,在1927年秋至1937年夏的时期里,莫斯科的对华政策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从计划夺取政权和首先在一些地区包括一些大城市(类似广州革命根据地那样)建立苏维埃到得出结论,在“牢牢控制并进一步扩大根据地的基础上建设和加强红军”作为压倒其他一切工作的主要任务^④。在当时的条件下,这意味着把中共全部活动的重心转移到农村中来。正是从那时起,在共产国际的文件和报刊中为了界定中国的革命过程开始使用“苏维埃革命”这个术语。

事态发展表明,与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理论家们的设想和预测相反,“苏维埃阶段”在中共的活动中不是战略性的,而是策略性的。向在苏维埃口号下进行武装斗争的转变使中共有可能作为一个政党保存下来,尤其是由于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建立了根据地,而主要是有了自己的武装力量,才有可能发展成为一个军事政治组织,成为反对南京的各个地方派别有实际兴趣与之结盟的一支力量。尽管苏维埃运动遭到失败,但是政治、军事和社

① 《共产国际的战略和策略》第273、280页。

② 《共产国际的战略和策略》第273页。

③ 同上,第296页。

④ 同上,第296页。

会经济活动的经验以及经受过组织和动员苏区居民的各种方式的尝试和失败的考验，使得中共到 30 年代中期成了东方各国共产党中唯一拥有实际上执政党经验的党，拥有绝无仅有的农村工作经验以及军政骨干的党。这（加上其他条件）也成为抗日战争年代里党员人数和武装力量较快增长和发展的基础。

收入本系列文件集第三卷的以前没有发表过的档案文件还阐述了制定和实施苏维埃运动方针初期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对华政策的各种不同的方面。

大量文件，其中包括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共产国际执委会领导机关的文件及其同共产国际驻华工作人员的来往书信，揭示了联共（布）和共产国际领导、斯大林和布哈林本人以及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在制定和实施决定中共于 1927 年下半年转向苏维埃口号下进行武装斗争的方针中的作用，以及这一口号内容的演变过程和莫斯科在准备南昌暴动和广州暴动中的作用。

本卷还收入了共产国际执委会和共产国际一些专门委员会会议的速记记录，这些记录反映了共产国际执委会在这一时期在通过一些重大决议和向中国发出指示以前进行讨论的内容，例如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全会的决议、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共中央的信（1929 年 2 月）等等。

很大一组文件反映了共产国际执委会及其东方书记处在实施六大后恢复中共组织的计划方面，在组织在苏联为中共培养干部方面，在分析党的领导层、中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以及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和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状况方面所做的工作。

破天荒第一次如此完整地发表了关于共产国际远东局和国际联络处工作人员 1929 至 1931 年间在上海的活动情况的文献资料。其中有：关于远东局的工作报告、远东局同莫斯科和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来往书信、远东局和中共中央政治局联席会议的记录。

第一次发表了1930年10月至1931年4月在中国的米夫关于远东局活动和中共状况的书信和报告。第一次发表的关于中国问题的诸多决议草案，以及过去鲜为人知的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红军建设和农民土地政策问题的指示信，补充说明了共产国际执委会在制定苏维埃运动方针中的作用。

本卷还收入了编者们发现的关于莫斯科给中共及其工会经费援助的文献资料。尽管不够完整，但是这些文件对于了解经费援助的规模，而主要是对于了解从共产国际和工会国际系统为在城市里处于地下状态的中共领导机构的活动提供财政补助的意义提供了一定的概念。由于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工会国际系统在中国的工作大大加强，第三卷收入了大量资料，揭示了工会国际及其驻华代表机构的工作内容、主要方针和工作成果。

总的说来，本卷的文献资料和以前出版的文献资料一样，包含许多新的材料，既可以大大充实，而在许多情况下还可以纠正现有文献中对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制定和实施对华政策中的作用的评价。这里发表的文件为研究本文件集的中心议题，即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对华政策所提供的新的内容，在每个部分的引言中都作了简短的说明。当然，在这些简短的引言中不可能详尽地探讨在文件中所涉及的议题和内容，这需要吸收其他材料进行专门的研究。可以想象中国政治史专家，包括中共党史研究者，都会对本卷发表的材料为对这一领域内迄今很少研究或者颇多争论的问题作出新的回答所提供的可能性作出应有的评价。

在这些不仅为中国史和苏中关系史的专家而且为广大读者所感兴趣的问题中，作为例子，我们列举了莫斯科对一些中共领导人的态度问题，联共（布）和共产国际领导在当时和以后将他们推举到党的领导地位上的作用问题。很自然，这里说的首先是对毛泽东的态度问题。第三卷和第四卷发表的文件，包括在共产国

际刊物上发表的已为人知的材料表明，从 20 年代末起，莫斯科及其驻华代表都积极促使毛泽东进入中共及其武装力量的主要领导人的行列，竭力维护和加强他的地位。早在 20 年代末，由于联共（布）和共产国际领导特别重视农村武装斗争的作用，在苏联和共产国际报刊上公开发表的文章以及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内部讨论和文件中经常不断地特别提到“朱毛军队”（朱德和毛泽东的部队）的作用。从 1929 年底起，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文件中已经讲“毛泽东的军队”，它的内部结构、政治工作的组织在 1930 年就被认为是其他部队的范例（第 221、260 号文件）。1930 年夏，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同意关于任命毛泽东为第一军政治委员的决定，尔后又建议任命他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加入中央苏区中央（政治）局。在项英和周恩来到达那里以前，毛泽东被委任为中央政治局的领导。在远东局领导下举行的中共四中全会上，建议重新审查在三中全会上进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的选举结果，毛泽东被留任为政治局候补委员。莫斯科同意在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脑，这给毛泽东带来了广泛的知名度，使他进入中共主要领导人的行列。莫斯科及其驻华代表在 1932 至 1933 年间给予毛泽东以重要支持，当时由于在反击国民党军队进攻的策略问题上发生了激烈争论，中央苏区的很大一部分军事政治领导人倾向于开展批判毛泽东的运动，解除他的军队领导职务，甚至以“赴苏治病”为由让他离开苏区。在共产国际执委会驻上海代表与莫斯科协商后发出的电报中不止一次地建议采取一切措施搞好同毛泽东的关系，利用他的威望和军事经验。关于让毛赴苏的建议也被拒绝了，认为这对他的生命来说是冒险，是危险的。由于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的坚持，在 1934 年 1 月召开的中共五中全会上，毛泽东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改任政治局委员，并保留他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张闻天取代他担任中华苏维

埃共和国主席的职务是没有征得共产国际执委会领导同意的。很说明问题的是，莫斯科收到中国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材料时，已作出决定将毛泽东的报告以单行本形式用俄文和其他多种文字出版。

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中共领导人当中只有毛泽东的名字被列入共产主义运动杰出活动家的名单，在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起草并由共产国际执委会批准的以中国苏区名义向代表大会所发的贺词中也同样如此。王明在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称毛泽东为“党的领袖和英明的国务活动家”。鉴于上述情况，莫斯科对1935年秋所收到的关于在遵义会议后毛泽东进入中共主要领导集体的消息作出积极反应也是可以理解的^①。

文件表明，在共产国际执委会内，至少从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时起高度评价了作为领导人的周恩来，并支持推荐他担任政治局的一些最重要职务（负责组织工作、军事工作和特种工作）。早在1920年至1930年初，远东局认为他与李立三不同是最有才能和最负责的党的领导人（第206号文件）。周恩来1930年4至8月在莫斯科逗留期间，联共（布）和共产国际执委会领导人亲自确认了对他的这种看法。在此期间，斯大林曾接见过他，莫洛托夫也几次接见过他，他受委托在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发表讲话。

1930年底至1931年初，远东局实际上随时掌握了党的领导权，周恩来进入了政治局常委会，负责中共中央军委和苏区的工作。根据远东局的建议，他担任了苏区中央局书记职务，同时兼任红军总政治委员。

^① 应当指出，对阐述莫斯科对毛泽东的态度问题的这种意见，近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出版物上也得到了承认。见青石：《共产国际压制毛泽东了吗？》，载《百年潮》杂志北京1997年第4期第21—23页。

现在发表的文件为以下一个众所周知的结论提供了补充论据，即莫斯科曾极力主张将为中共培养干部的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和苏联其他院校的毕业生提拔到中共及其军队的各级领导层中去，总之，也正是为了这个目的才建立了为中共培养干部的体制。

本卷中发表的陈绍禹（王明）、沈泽民、秦邦宪（博古）和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许多学生绕过中共同共产国际的通常联络渠道同米夫和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其他领导人交往的书信表明，东方书记处领导特别器重这批人，把他们看作是“可靠的”和忠于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工作人员，指望得到他们提供的关于党内状况的情报，而往后逐渐地把他们提拔到中共和共青团领导机构的各种岗位上。毫无疑问，陈绍禹由于跟米夫在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以往的联系受到了特殊的信任。1930年7至8月间李立三主义“盛行”时，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多数成员同共产国际执委会发生了冲突，随后在党内对批评自己方针的人进行迫害，在这种形势下，共产国际执委会和远东局决定加速选拔“莫斯科派”的进程，以便保证中共领导对共产国际的持久忠诚。众所周知，结果在1931年1月举行的中共四中全会上，陈绍禹、沈泽民和其他许多“年轻的共产国际派”被选进中共中央，陈绍禹还被选进中央政治局。青年共产国际执委会向中国共青团中央局推荐选拔秦邦宪为中央局书记（见第409号文件）。

然而，陈绍禹的这一提升并不意味着他和其他“莫斯科派”在党内领导中占居主导地位。共产国际执委会和远东局完全清楚他的实际工作经验不足，在党内缺乏根基。把大部分“老的”政治局委员，如周恩来、项英、张国焘、蔡和森等人仍留在党的领导成员内就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周恩来和张国焘还担任各大苏区中央局领导这一责任最重大的工作。

1931年底陈绍禹去莫斯科后，被任命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

表团领导人的高级职务，还得到了担任共产国际领导机构中重要职务的任命。他本人开始为联共（布）和共产国际最高领导所熟悉，并被选进共产国际领导机构，取得了国际性的知名度，在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会和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发表了讲话。他被认为是中共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但是正如文献所表明的，莫斯科没有把他看作是“党的领袖”，是党的总书记的候选人。

本卷和以前的几卷一样，不可能收入值得人们注意的所有材料。出于篇幅的考虑，编者们不可能将东方书记处会议的许多反映共产国际执委会在解决这样或那样一些问题时的争论和探索的速记记录以及有关中国问题的许多决议草案都一一收入。莫斯科一些档案馆的某些尚未为研究人员开放的材料也未能收入本卷。

* * *

本文件集是根据《苏联历史文献出版规定》（莫斯科 1990 年）编辑出版的。有一些文件不是全文发表，删去了与本文件集题目无关的部分。在发表一些用糟糕的俄文书写的文件（如雷利斯基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陈绍禹给米夫的信）时，编者们只对某些明显的语法错误作了修正，总的说来保留了文件的语言特点。文件中使用了现代拼写法和标点符号。中文专有名称用现代拼音，未被确证为同一名称者除外。文件集中保留了广州、香港等城市的传统名称，以及当时在文件和通信中惯用的缩写，如人民政府、国民政府、苏维埃政府、苏区、国民革命军。保留了当时在起草文件时和词典中常用的缩写（如党支部、党的工作、革命委员会、政治部、共产主义小组等）。

参加本文件集编辑工作的有：俄方的历史学博士 K. M. 安德逊，历史学博士、教授 B. I. 格卢宁，历史学博士、教授 A. M. 格里戈里耶夫，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教授 M. Л. 季塔连科，历史学副博士 K. B. 舍维廖夫、B. H. 谢契林娜；德方的教授 M. 莱特奈

尔, 教授 И. 克吕格尔, 教授 Р. 费尔伯和博士 Т. 特拉姆彼达赫。

编者衷心感谢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的工作人员
Л. А. 罗戈娃、Е. Е. 基里洛娃和 Ю. Т. 图托契金, 以及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历史学博士 А. И. 卡尔图诺娃帮助发掘文件, 卡尔图诺娃还在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发掘了一些文件。

本卷前言和各部分的引言由 А. М. 格里戈里耶夫、В. И. 格卢宁、М. Л. 季塔连科、К. В. 舍维廖夫、М. 莱特奈尔、И. 克吕格尔、Р. 费尔帕特和 Т. 特拉姆彼达赫撰写。书目索引由 К. В. 舍维廖夫编写, 并有 И. 克吕格尔参加。人名索引由 В. В. 拉林和 И. Н. 索特尼科娃编写, 并有 К. В. 舍维廖夫、В. Н. 谢契林娜和 М. Н. 斯莫林娜参加。在编写人名索引时利用了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工作人员 К. К. 米罗诺娃提供的材料。

远东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 Н. И. 梅利尼科娃对文件作了古文献学方面的加工。

Е. К. 斯塔罗韦罗娃进行了电脑排版。

参加手稿技术编辑工作的有 Н. И. 梅利尼科娃和 И. Н. 索特尼科娃。

本卷俄文版责任编辑 А. М. 格里戈里耶夫, 责任秘书 Н. И. 梅利尼科娃。

目 录

前言

第三部分：1930年莫斯科的对华政策和“李立三路线”

198. 中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给共产国际执行
委员会的信（1930年1月10日） (19)
199. 刘少奇给黄平的信
(1930年1月11日) (24)
200. 中共满洲省委给联共（布）远东边疆区委员会的信
(1930年1月11日) (27)
201.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
第35号记录（摘录）
(1930年1月13日) (30)
202. 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飞行表决结果
作的第24号记录
(1930年1月18日) (31)
203.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
第37号记录（摘录）
(1930年1月23日) (33)
204.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15号记录（摘录）
(1930年1月25日) (34)
205.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东方书记处的信
(1930年1月30日) (35)

206. 雷利斯基给米夫的信
(1930年2月1日) (53)
207. 米夫给瞿秋白的信
(1930年2月9日) (55)
208.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17号记录(摘录)
(1930年2月15日) (59)
209.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的报告
(1930年2月) (60)
210.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的信
(1930年3月3日) (72)
211. 瞿秋白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的信
(1930年3月19日) (75)
212. 雷利斯基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的信
(1930年3月20日) (77)
213.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
第47号记录(摘录)
(1930年3月23日) (83)
214.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
(1930年3月27日) (84)
215. 陆定一、刘明佛和瞿秋白给希塔罗夫和共产国际执
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的信
(1930年4月2日) (87)
216. 皮亚特尼茨基给佩列佩奇科的信
(1930年4月4日) (89)
217.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22号记录(摘录)
(1930年4月5日) (91)

218.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 122 号（特字第 120 号）
 记录（摘录）
 (1930 年 4 月 5 日) (92)
219. 马马耶夫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处务
 委员会会议提交的报告提纲
 (1930 年 4 月 14 日) (93)
220.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处务委员会扩大
 会议第 14 号记录（摘录）
 (1930 年 4 月 15 日) (98)
221. 马马耶夫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处务
 委员会扩大会议上的报告
 (1930 年 4 月 15 日) (99)
222. 张国焘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和国际监察
 委员会的信
 (1930 年 4 月 17 日) (121)
223. 李立三给周恩来和瞿秋白的信
 (1930 年 4 月 17 日) (126)
224.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处务委员会会议
 第 15 号记录（摘录）
 (1930 年 4 月 25 日) (132)
225.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
 (1930 年 5 月 1 日) (135)
226. 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信
 (1930 年 5 月 14 日) (142)
227.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 126 号（特字第 124 号）
 记录（摘录）
 (1930 年 5 月 15 日) (143)
228. 瞿秋白和周恩来给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

- 政治委员会的信
(1930年5月15日) (146)
229.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东方书记处的信
(1930年5月18日) (147)
230. 中共中央给斯大林的信
(1930年5月18日) (157)
231. 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信
(1930年5月18日) (159)
232.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
第64号记录(摘录)
(1930年6月6日) (162)
233. 王稼祥给米夫的信
(1930年6月8日) (163)
234. 皮亚特尼茨基给莫洛托夫的信(摘录)
(1930年6月10日) (165)
235. 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
第65号记录(摘录)
(1930年6月12日) (167)
236. 秦邦宪和何子述给米夫的信
(1930年6月14日) (169)
237. 王稼祥给米夫的信
(1930年6月14日) (170)
238.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28号(特字第126号)
记录(摘录)
(1930年6月15日) (171)
239.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给中共中央的电
报稿(1930年6月16日) (173)

240.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给中共中央的电报
(1930年6月19日) (175)
241.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
(1930年6月20日) (177)
242. 中共中央政治局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的信
(1930年6月21日) (183)
243.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
(1930年6月22日) (186)
244. 埃斯勒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的信
(1930年6月23—25日) (188)
245. 向忠发给周恩来的信
(1930年6月25日) (197)
246. 陈绍禹给米夫的信
(1930年6月26日) (209)
247.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
第69号记录(摘录)
(1930年6月28日) (212)
248.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关于
中共代表团在处理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派
别斗争时的活动问题的决议
(1930年6月28日) (213)
249.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
第69号记录(摘录)
(1930年6月28日) (215)
250.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共中央的电报
(早于1930年7月10日) (216)
251. 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核心小组
会议第X号记录(摘录)

- (1930年7月18日) (218)
252. 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电报
..... (1930年7月18日) (219)
253. 埃斯勒给项英的信
..... (1930年7月18日) (220)
254. 陈绍禹和王稼祥给米夫的信
..... (1930年7月22日) (223)
255.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共中央的电报
..... (1930年7月23日) (225)
256. 陈绍禹给米夫的信
..... (1930年7月24日) (226)
257.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
 第73号记录(摘录)
..... (1930年7月29日) (229)
258.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关于
 中共中央政治局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
 之间分歧问题的决议
..... (1930年7月29日) (233)
259.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关于
 远东局与中共〔中央〕政治局之间在1930年2月17
 日至8月期间接连发生的分歧”的决议
..... (1930年7月29日) (235)
260.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就红军建设和游击运动问题
 给中共中央的指示信
..... (1930年7月29日) (237)
261.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中共中央的信
..... (1930年8月1日) (248)
262. 陈绍禹给米夫的信

-
- (1930年8月1日) (252)
263.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的电报
(1930年8月3日) (254)
264.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的电报
(1930年8月4—7日) (255)
265. 斯托利亚尔给洛佐夫斯基的信(摘录)
(1930年8月5日) (257)
266.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中共中央的信
(1930年8月6日) (263)
267. 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联席
会议记录
(1930年8月6日) (264)
268. 陈绍禹给米夫的信
(1930年8月6日) (269)
269. 中共中央政治局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的信
(1930年8月7日) (271)
270.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东方书记处的信
(1930年8月7日) (273)
271.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电报
(1930年8月8日) (278)
272. 向忠发给斯大林的信
(1930年8月8日) (281)
273. 中共中央政治局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电报
(摘录)
(1930年8月8—9日) (285)

274.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电报
(1930年8月8—9日) (287)
275.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中共中央的电报
(1930年8月9日) (288)
276.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的电报
(1930年8月9日) (289)
277. 别尔津和图梅利陶关于中国军事政治形势的书面报告
(不晚于1930年8月10日) (290)
278.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电报
(1930年8月12日) (299)
279. 斯大林给莫洛托夫的电报(摘录)
(1930年8月13日) (300)
280.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
(1930年8月13日) (301)
281.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
(1930年8月中旬) (304)
282. 瓦西里耶夫就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的电报
给莫洛托夫的信
(1930年8月16日) (307)
283. 中共中央政治局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电报
(1930年8月16日) (308)
284. 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的信
(1930年8月16日) (311)
285.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

- 的电报
- (早于 1930 年 8 月 17 日) (314)
286. 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电报
(1930 年 8 月 17 日) (315)
287. 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电报
(1930 年 8 月 17 日) (316)
288.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
(1930 年 8 月 17 日) (317)
289.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成员与中华全国总工会
代表谈话记录
(1930 年 8 月 18 日) (321)
290. 米夫给琼森的信
(1930 年 8 月 22 日) (328)
291. 联共 (布) 中央政治局会议第 5 号 (特字第 X 号)
记录 (摘录)
(1930 年 8 月 25 日) (330)
292. 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信
(1930 年 8 月 25 日) (333)
293. 中共中央政治局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电报
(1930 年 8 月 27—28 日) (335)
294.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
(1930 年 8 月 29 日) (336)
295. 马马耶夫给马季亚尔的信
(1930 年 8 月 31 日) (339)
296. 陈绍禹给米夫的信
(1930 年 8 月 31 日) (342)
297.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
(1930 年 9 月 2 日) (344)

298. 中共中央政治局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电报
(不早于 1930 年 9 月 4 日) (346)
299. 雷利斯基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电报
(1930 年 9 月 12 日) (347)
300.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周恩来和瞿秋白的信
(1930 年 9 月 16 日) (348)
301. 埃斯勒给中共三中全会的信
(1930 年 9 月 28 日) (351)
302. 中共三中全会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的
电报
(1930 年 9 月 28 日) (355)
303. 中共中央政治局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
的电报
(1930 年 10 月 3 日) (357)
304. 中共中央政治局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电报
(1930 年 10 月 5 日) (358)
305. 瓦西里耶夫给莫洛托夫的信
(1930 年 10 月 8 日) (360)
306.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关于中共内部状况
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的通报
(1930 年 10 月 9 日) (361)
307. 中共中央政治局给斯大林、莫洛托夫和皮亚特尼茨
基的信
(1930 年 10 月 12 日) (369)
308.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
第 89 号记录 (摘录)
(1930 年 10 月 13 日) (374)
309.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

310. 陈绍禹给米夫和马耶尔的信	(1930年10月15日)	(376)
311. 斯托利亚尔给中华全国总工会共产党党团的信	(1930年10月17日)	(378)
312.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	(1930年10月17日)	(382)
313.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小委员会的信	(1930年10月20日)	(388)
314.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皮亚特尼茨基的信	(1930年10月20日)	(397)
315. 埃斯勒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	(1930年10月20日)	(408)
316. 盖利斯给别尔津的信	(1930年10月20日)	(410)
317. 斯托利亚尔给洛佐夫斯基的信	(1930年10月20日)	(421)
318. 阿尔布列赫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信	(1930年10月21日)	(429)
319. 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局的信	(1930年10月23日)	(433)
320. 陈绍禹给米夫的信	(1930年10月23日)	(438)
321.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给中共中央的电报	(1930年10月24日)	(440)

322. 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的信
(1930年10月25日) (441)
323.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
(1930年10月30日) (443)
324.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
(1930年10月30日) (446)
325. 周恩来给莫洛托夫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
书记处的电报
(1930年11月4日) (448)
326.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处务委员会会议
第33号记录(摘录)
(1930年11月10日) (449)
327.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
(1930年11月10日) (451)
328.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处务委员会会议
第34号(记录)
(1930年11月15日) (454)
329.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
(1930年11月18日) (455)
330. 陈原道给米夫的信
(1930年11月21日) (464)
331.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决议
(1930年11月23日) (466)
332. 临时小组的决定
(1930年11月27日) (468)
333. 斯托利亚尔给洛佐夫斯基的信(摘录)
(1930年11月28日) (471)
334. 盖利斯给别尔津的信

- (1930 年 11 月 28 日) (479)
335. 瞿秋白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的信
(1930 年 11 月 29 日) (482)
336. 盖利斯给别尔津的信
(1930 年 11 月 30 日) (487)
337. 盖利斯给别尔津的书面报告
(1930 年 11 月 30 日) (490)
338. 雷利斯基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
(1930 年 12 月 1 日) (494)
339. 米夫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 (摘录)
(1930 年 12 月 2 日) (498)
340.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第
104 号记录 (摘录)
(1930 年 12 月 3 日) (511)
341. 盖利斯给别尔津的信
(1930 年 12 月 3 日) (513)
342. 张国焘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提出的
声明 (1930 年 12 月 4 日) (521)
343.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
(1930 年 12 月 10 日) (525)
344.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扩大会议第 29 号记录
(摘录)
(1930 年 12 月 12 日) (530)
345.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扩大会议第 30 号记录
(摘录)
(1930 年 12 月 15 日) (531)
346.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中共中央的信
(1930 年 12 月 15 日) (533)

347. 陈绍禹给萨发罗夫、米夫、马季亚尔、马耶尔的信
(1930年12月17日) (540)
348.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共产
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的电报草稿
(不早于1930年12月18日) (543)
349.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中共江苏省委的信
(1930年12月20日) (545)
350. 马季亚尔给皮亚特尼茨基的信
(1930年12月21日) (549)
351. 库丘莫夫关于瞿秋白和周恩来错误的记录
(不晚于1930年12月22日) (550)
352. 斯卡洛夫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组织部和东方
书记处的书面报告
(不晚于1930年12月28日) (555)
353.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成员与何孟雄和温裕成
的谈话记录
(1930年12月29日) (565)
354. 埃斯勒同徐锡根谈话记录
(1930年12月30日) (569)
355. 李立三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提出的
声明 (1931年1月1日) (574)
356.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对共产国际执行
委员会主席团电报稿的解释信
(1931年1月2日) (577)
357.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
第109号记录(摘录)
(1931年1月3日) (583)
358. 埃斯勒与徐锡根、陈郁和王克全的谈话记录

目 录 15

- (1931 年 1 月 3 日) (585)
359. 瞿秋白给米夫的信
(1931 年 1 月 4 日) (589)

第三部分

1930年莫斯科的对华政策
和“李立三路线”

收入本卷这一部分的文件阐述了 1930 年初至 1931 年初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对华政策。

在中国政治史上，这一时期国民党南京集团——蒋介石集团——和打着“改组派”旗号联合起来反对南京、与之争夺权力的华北（冯玉祥、阎锡山）、华南和西南（李济深、陈济棠）军政集团之间于 1930 年春天至秋天爆发了规模最大、投入兵力最多、伤亡最惨重的战争。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1930 年是称为“李立三路线”的极左纲领形成和试图付之实践的时期，这条路线导致中共在城市中的阵地进一步削弱，引起党内严重危机和 1930 年底至 1931 年初党的领导层发生重大变动。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利用统治阵营各集团之间的内战来在华中和华南一些地区建立和扩大党的比较大的武装力量和苏区。1930 年，中共的武装力量第一次显示出是一支足以威胁中心城市和交通线的强大力量。1930 年 12 月底至 1931 年 1 月初，江西红军击退数量上占优势的国民党军队第一次所谓的大“围剿”，是中共武装力量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是对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对华政策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

1930 年莫斯科的对华政策出现了重大的变化。共产国际执委会一系列重要文件和指示在确定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时首先提出的任务是在华中一些苏区建立和巩固红军和苏维埃根据地。

1930 年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相互关系中，占首位的问题是消除尖锐的分歧：1930 年上半年，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和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之间继续存在和不断加剧的冲突，到 7、8 月间发展成中共中央政治局对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对抗。中共领导人拒绝服从共产国际的纪律，全面暴动的严重后果促使莫斯科采取一系列政治和组织措施：召开中共中央三中全会（1930 年 9 月）和四中全会（1931 年 1 月），坚决要求中共领导机构进行大改组。

业已发表的文件^① 和出版物^② 充分阐明了这一时期中国政治史和军事史上的主要事件。其中十分充分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基本进程和事件以及这一时期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相互关系史上的最重要事件。特别应该指出，80、90 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的文献集和书籍在阐明这些问题方面有了重大的进展。

这里发表的文件大大丰富了我们对这一时期莫斯科对华政策各个方面认识。一批以前鲜为人知或只是摘要发表的档案材料无疑会引起研究者的注意。首先应该提到的是第一次全面发表的反映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在中国活动的文件。在远东局的 50 多份文件中有远东局的工作报告、关于中国局势和中共现状的报告。远东局的批示、与共产国际执委会和中国共产党及中华全国总工会领导人的来往信件，等等。收入这一部分的与远东局活动有关的这些材料及其他材料，使我们第一次有可能确定负责中国问题的远东局工作人员的变动情况，解开他们的化名。

第一次发表的还有有关以工农红军参谋部情报局工作人员盖利斯（曾参加远东局工作）为首的一批苏联军事顾问 1930 年 10 月至 1931 年 4 月在上海的活动情况，他们在改组中国共产党军事工作方面的作用的文件。

① 《中国现代史资料选编》，哈尔滨 1981 年版第 3 卷；《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北京 1990 年版第 6、7 册；《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集）》，莫斯科 1986 年版；《毛泽东走向权力之路：革命文件（1912—1949）》，S. 施拉姆主编，阿蒙克—纽约 1996 年版第 3 卷；《中国共产党是如何上台的。文件和分析》，托尼·塞奇编，阿蒙克—伦敦 1996 年版；肖作梁：《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权力消长史料（1930—1934 年）》，西雅图 1961、1967 年版 2 卷集。

② A. M. 格里戈里耶夫：《1927—1931 年的中国革命运动（战略和策略问题）》，莫斯科 1980 年版；《任弼时年谱》，北京 1994 年版；《刘少奇年谱》，北京 1996 年版上卷；《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版），北京 1990 年版；《周恩来传》，北京 1998 年版上卷；黄修荣：《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下册；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中国革命的策略在国际背景下的演变》，北京 1992 年版。

第一次发表的还有1930年莫斯科、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之间的来往电报，包括共产国际执委会这一时期的全部指示的全文。在以前鲜为人知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指示中，应该特别提到1930年7月底所作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就红军建设和游击运动问题给中共中央的指示信》（第260号文件）。

相当数量的一组新文件提供的资料，使我们得以了解共产国际、红色工会国际在这一时期对中国共产党的财政支持、国际联络部领导人组织这一支持的特点以及远东局工作人员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对这一支持的评价（第206、212、230、231、307、313、314、316、318、325、333、334号文件）。在以往不为研究者所知的另一些文件中，还应该提到前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生陈绍禹（王明）、沈泽民、何子述、陈原道和秦邦宪（博古）绕开中共和莫斯科通常的联络渠道，通过普通邮局（使用约定的暗语）寄给米夫及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其他工作人员的信（第233、236、246、254、256、262、268、296、310、330、347号文件）。此外，在这一部分中读者还可以看到一些有关苏联改组为中共培养干部的体制的新文件和有关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活动的材料（第214—217、222、227、248号文件）。

以上提到的几组文件中包含了关于这些年代共产国际执委会及中国共产党许多方面活动的大量新材料。这些材料和已知的资料合在一起为阐明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对华政策中的一些研究甚少或尚有争议的问题、共产国际执委会及其驻中国的代表与中共领导人相互关系中的许多重大事实、莫斯科制定和作出有关中国的主要政治决定和干部决定的动机和过程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在这个简短的引言中只能对这一广泛话题的某些“情节”和问题作出新的解释。

首先，这里发表的文件能更深刻更全面地揭示共产国际执委

会及其远东局^①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1930年上半年的相互关系。这一论题的主要问题之一（由于缺乏必要的资料，至今甚至在权威性的著作中对这个问题的阐述还存在一些重大的讹误）是关于莫斯科为什么在6月下半月以前，即193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这一阐述“左”倾纲领主要论点的著名决议^②之前，没有对中共领导人在1930年2月至6月间所提出的“左”倾纲领作出强硬而明确的反应的问题。

众所周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及一些地方党组织中这一时期形成的极左纲领，表现为越来越高估计工农运动发展的规模和水平及中共武装力量的军事游击行动。在1930年2月26日中共中央第七十号通告中就已经有这样的过高估计，这一通告直接否定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运动发展不平衡的论点^③。3月和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指示各地，要红军部队开始进攻武汉、南昌和广州，而这些城市中的党和工会组织准备发动“配合的”暴动^④。4月，李立三在《红旗》上发表一组文章（后来，在5月一起发表在《布尔什维克》杂志上），阐述了为1930年6月11日决议所采纳的他的纲领的基本论点^⑤。4月，这一纲领的许多论点得到湖北

① 1930年上半年参加远东局的有：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И. А. 雷利斯基（领导人）（他在2月至8月间呆在莫斯科）和Г. 埃斯勒（仍是远东局领导人）、红色工会国际代表J. 哈迪（他于6月去莫斯科，1930年6月由С. А. 斯托利亚尔取代）、青年共产国际代表Г. М. 别斯帕洛夫。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第115—135页。关于决议内容见A. M. 格里戈里耶夫：《1927至1931年的中国革命运动（战略和策略问题）》，第198—199页。

③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第25—35页。

④ 见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中国革命的策略在国际背景下的演变》，第207—208页。

⑤ 见A. M. 格里戈里耶夫：《1927至1931年的中国革命运动（战略和策略问题）》，第181—185、191页。

省党组织代表会议的赞同，5月，李立三在苏区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又加以阐述。5月底6月初，在上海举行的红军主要部队代表会议上，中共领导人下令开始实施进攻武汉及江西和湖南省大中心城市的计划^①。

在苏联出版物中没有这一时期共产国际执委会及远东局对这些方针和李立三等领导人文章的反应，其原因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没有把行动计划和对地方组织的相应指示报告给远东局和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没有中文翻译，不了解中共刊物上文章的内容^②。这里发表的文件总的来说证实了这样的原因，同时还详细加以说明并弄清了远东局和共产国际执委会对中共领导人的观点作出反应稍为迟缓的其他原因。在2月至6月下旬这一时期里，远东局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或信件以及远东局给中共领导人的信件，确实都没有提及红军进攻城市的计划、暴动计划，等等。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档案和中共的档案中都没有发现中共领导人有关这些问题的文件——他们的决议、给地方组织的指令、同地方组织的来往信函。正是在4月李立三积极制订纲领和计划时，远东局和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关系开始再度激化（见第245号文件）。李立三在4月17日给周恩来和瞿秋白的信（通过中共的渠道寄出并于6月中旬在莫斯科收到）中声称，远东局宣扬右倾观点，因为它不仅认为中国的革命运动发展不平衡，而且怀疑存在革命高潮，他建议要争取改组远东局（第223号文件）。

1930年5月1日，远东局就湖北党组织代表会议决议草案的内容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写信，对决议草案中否定运动发展不平衡的论点表示不同意并批评了李立三的一个主要论点，即最近的“伟

^① 见A.M.格里戈里耶夫：《1927至1931年的中国革命运动〈战略和策略问题〉》，第191—193页。

^② 同上，第186页。

大事件”足以使中共及其工会变成强大的群众组织，远东局还建议“不要熟衷于‘预言’世界革命将在中国爆发”（第 225 号文件）。

总的来说，远东局的文件表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于 1930 年 6 月 11 日作出决议后，远东局和中共中央政治局之间冲突再度加剧之前，远东局并不知道中共领导人在做计划时已经走得很远，不知道李立三的理论观点实际包含什么，认为这些观点只不过是李立三特有的“抽象议论”，是他喜欢“侈谈将为我们作出种种伟大事件”的表现（第 229 号文件）。

后来发现，远东局本身同时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不加批判地转述了来自中国共产党的严重夸大了的关于中共和红色工会人数及其发展变化情况的材料，特别强调红军、游击运动和农村苏区的成功发展（第 209、229 号文件）。这表明远东局依赖中共领导人的情报，看来也表明远东局担心被指责对局势估计犯“右倾”错误，而当时莫斯科对于远东局和中共中央政治局之间的分歧迟迟不作决定。5 月 18 日远东局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信谈到农民战争的胜利和红军的迅速发展，不止一次地强调中国形势蕴含着“巨大的革命可能性”并得出结论说：“必须依靠你们的威望全力推动党前进”（第 229 号文件）。

正如这里发表的文件和其他材料所表明的，直到 6 月底莫斯科对远东局的报告中以及周恩来带到莫斯科来的材料和他在 1930 年 4 月和 5 月在共产国际执委会和红色工会国际^① 的讲话中所提出的夸大的数据和估计都没有产生怀疑。共产国际的期刊^②、向

①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全宗 495，目录 154，卷宗 416，第 6—185 页；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644，第 1—25 页。

② 如见：《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的报告摘要（摘自苏〔周恩来〕同志关于党的现状的报告）》，载《共产国际》杂志莫斯科 1930 年第 13—14 期第 89—98 页；《关于中国农民运动、游击斗争和苏区（摘自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的报告）》——同上，第 15 期第 43—48 页。

党员积极分子通报情况的联共（布）中央机要局通报^①都发表了周恩来报告提供的情况。除了由于缺乏其他的情报来源，尤其是不了解中国农村地区的状况以外，共产国际执委会内总的氛围也是不加批判地接受这些情报的重要原因。从1930年初起，在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下，由于与斯大林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共产国际的政策发生了转折（加强反“右倾”斗争等）^②，在共产国际执委会内，认为在许多大资本主义国家中、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中开始出现了新的革命高潮的看法重又占了上风。1930年2月本着这样一种方针的精神举行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扩大会议，会议的提纲谈到中国“革命农民暴动（游击队和农民军）”出现了新的浪潮^③。关于中国工农运动飞速发展、规模巨大的材料，是符合想把中国“纳入”出现革命高潮国家之列的愿望的。当1930年春天中国各军政集团爆发大规模战争时，这一倾向更趋加剧。莫斯科的一些中国学专家依据这些材料，在1930年4月就倾向于得出这样的结论，认为可以把中国的形势，尤其是农村斗争的发展，看作是革命形势的到来（第221号文件）。

以这一倾向的精神来解释来自中国的情报，在很大程度上也决定了著名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④对中国形势的估计。共产国际执委会讨论这一决议的前几稿是在1930年5、6月，正是李立三纲领形成的时候。

从决议涉及问题范围之广来看，这个决议是作为总的政治文

^① 《关于共产国际各支部》莫斯科1930年5月20日第30期。见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全宗17，目录86，卷宗66，第7—8页。

^② O. B. 库西宁的文章《共产国际（在斯大林同志领导下）政策的新时期和新转折》阐述了这些评价。载《共产国际》杂志莫斯科1930年第2期，第1—19页。

^③ 《共产国际文件汇编（1919—1932）》，库恩·贝拉主编莫斯科1933年版，第923页。

^④ 《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集）》，第203—214页。

件来起草的，其目的是要更加明确共产国际执委会以前的决议和中共六大的决议，对中国革命运动的现状作出新的估计，确定中国革命运动的任务和前途。同时还起草了关于红军和游击运动（第 220 号文件）、苏区农民土地政策和经济政策的指示性文件。总的来说，这些文件被看作是详尽的行动纲领，或许也被看作是中共例行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的基础，远东局的代表（第 212 号文件）和中共代表（第 223 号文件）已经提出有必要召开这次代表大会。众所周知，正是共产国际执委会的这个文件第一次把建立“真正的红军”说成是“头等重要的”任务^①。由于当时的形势，这个决议同时也成了莫斯科对中共领导人的纲领和计划作出的第一个反应。有关制订和通过这一决议的过程的新材料，使我们了解到莫斯科的对华政策转折点之一是如何出现的，使我们能更确切地知道这个文件发表的日期，以及共产国际执委会对中共领导人“左”倾方针和计划、对中共 1930 年 6 月 11 日决议迟迟不作出反应的原因。

联共（布）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 5 月 25 日会议上讨论了共产国际执委会总政治决议的初稿^②。当时，决议初稿断言，“中国革命运动的新高潮已是无可争议的事实”，“在中国再度出现客观的革命形势”^③。当时决定在根据提出的意见对初稿进行修改后向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提交新的草案^④。

这些估计包含在 7 月 29 日经共产国际执委会正式批准的决议最后稿中（第 257 号文件）。其中还提出了中共的基本任务、农民土地政策和经济政策的内容以及关于中国革命前途的部分。但是决议最后稿对中共活动重点的确定作了很大变动。初稿中放在

① 《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集）》，第 205 页。

②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全宗 508，目录 1，卷宗 97，第 1 页。

③ 《关于中国问题的总政治决议草稿》，同上，第 4、6 页。

④ 同上，第 1 页。

第一位的是发展罢工运动的任务，发展“农民游击运动”的任务列入党的任务的第四位，而对红军则根本没有提及。最后稿中则把建立“真正的红军”的任务放在第一位。决议说：“中国共产党应该懂得，建立有充分战斗力的、政治上坚定的红军在中国目前特殊的条件下是头等重要的任务，这一任务的完成定能保证革命的迅猛发展。”^①

1930年6月和7月，通过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共中央的电报指示，这是在进一步修改决议过程中作出这些变动的重要阶段。由于筹备和举行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推迟了审议这一决议（第234号文件）。6月16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领导人建议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立即向中共中央发出简短的电报指示。电报稿谈到，东方书记处认为，目前中国的工业中心和行政中心还无一建立苏维埃政权，因此建立中央（临时）革命政府为时尚早。接着又扼要地阐述了有关苏维埃政策问题的建议，提出要集中红军的部队，保证中共对部队的政治领导（第239号文件）。过了三天，经莫洛托夫亲笔修改的电报稿又退回共产国际执委会。在6月19日发往中国的电报最后稿中则说，东方书记处认为，视军事政治局势的发展，当苏维埃政权扩展到中国的一个中心城市后，可以成立中央（临时）革命政府，建议采取“一切措施来尽可能加强红军”（第240号文件）。

6月底，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一次收到一份短电，获悉在中共领导作出6月11日决议后远东局和中共领导之间发生了新的分歧（第249号文件）。共产国际执委会在给中国的复电中否定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对远东局的指控^②，并于7月初给中共中央发去电报，

① 《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集）》，第205页。

② 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中国革命的策略在国际背景下的演变》，第214—215页。

重申以前关于建立中央苏维埃政府的指示，只在文字上稍作了改动。电报把建立这样的政府同“在最有保证的地区”建立“完全服从共产党的领导并能成为工农苏维埃政府支柱的真正的红军”联系起来（第 250 号文件）。

1930 年 7 月 18 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收到中共中央的来电，电报说中共中央决定在南京和武昌组织暴动并在上海发动总罢工（第 252 号文件）。当天，联共（布）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核心领导小组会议在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参加下审议了关于中国问题的总政治决议草案。核心领导小组建议米夫在三天内参照讨论的意见，以上述给中共中央的短电为基础修改这个文件。

几天之后，即 7 月 21 日，斯大林在与正在莫斯科的周恩来谈话时着重强调了加强红军并以红军的兵力夺取苏维埃根据地的任务^①。不能排除，决议最后稿中对建立红军的任务及红军在革命发展中的作用的坚定提法（“中国共产党应该懂得……”等等）是斯大林在联共（布）代表团核心领导小组会议上提出的。看来，正因为如此，在共产国际执委会工作人员的一系列文件中才谈到，“早在今年（1930 年——编者注）7 月，斯大林同志就十分肯定地强调了‘关于为了进一步发展中国革命组建红军的极端重要意义问题’”（第 352 号文件）。如上所述，这一决议（以及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其他一系列指示和决定）是 1930 年 7 月 29 日正式批准的。但看来，由于必须立即答复中共中央 7 月 18 日（关于暴动计划）的电报，7 月 23 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的几名成员经过飞行表决通过了这个决议（第 257 号文件）（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最近出版的一些书籍中才出现这一日期）。在同一天，共产

^① 《克里姆林宫斯大林办公室来访的客人（1924—1953 年第一任总书记接待客人的登记簿）》，载《历史档案》杂志，莫斯科 1994 年第 6 期第 22 页；《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第 183 页。

国际执委会致电中共中央，坚决反对在南京、武昌举行暴动和在上海举行总罢工，建议根据最新的电报指示开展工作（第255号文件）。第二天，即7月24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收到中共中央1930年6月11日决议的英文文本^①。对这个篇幅很大的文件进行分析并在业已批准的决议中提出对它的意见，将会更推迟决议的正式通过。看来，共产国际也没有觉得有必要这样做，它认为以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名义通过政治决议就会结束对这一问题的争论^②。

本部分发表的文件使我们还能够深入详尽地阐明共产国际执委会和远东局在中共领导所持李立三方针的“最高潮”时期及其在彭德怀部队7月27日攻下长沙之后，自1930年7月底至8月底与共产国际执委会的直接对抗时期的立场。共产国际执委会、中共中央政治局与远东局之间的来往电报的发表，其中包括中共领导人给共产国际和联共（布）领导机构、斯大林本人的一切电报全文和莫斯科的答复全文（第263、264、271、273—276、278、282—284、291、293号文件），对于揭示莫斯科与中共当时领导人之间相互关系极其重要的这一时期有着特别的意义。

正如这些文件所表明的，莫斯科在这一时期里明确坚持6月和7月给中共中央指示中所阐述的立场，坚决反对在大城市里举行暴动和罢工的计划，在8月8日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电报（第

①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全宗514，目录1，卷宗609，第116页。

② 确定共产国际执委会收到中共中央1930年6月11日决议的时间，确切弄清通过《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的日期，使我们能排除包括最新出版的一些书刊中由于使用这一文件过去所标的日期（1930年6月）而在阐述共产国际执委会立场上的许多错误（如见《毛泽东走向权力之路。革命文件。1912—1949》第3卷引言）。由于没有这些资料，许多著作的作者认为，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决议对6月11日的决议批评“很温和，没有提李立三的名字”，因此得出结论说，当时共产国际执委会并未看出它的方针和李立三的观点之间有重大差别（如黄修荣：《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下册，第76—77页）。

271号文件）中和8月9日给远东局的电报（第276号文件）中重申了这一立场。共产国际执委会8月8日的电报对有关李立三在8月1日和3日政治局会议上阐述的在中国主要中心城市发动总暴动的计划的十分支离破碎的、不完整的（部分由于技术原因）消息（第263、264号文件）作出答复，主张在赣南、闽南和粤北建立苏维埃根据地和红军，并在湘鄂川边区建立后备根据地（第271号文件），即远离大城市的根据地。与此同时，莫斯科直到8月下旬都没有改变方针，看来它指望红军部队能攻下一两个中心城市，关于对列强、外国租界和企业的政策的指示（第275号文件）说明了这一点。在得知红军放弃长沙以及上海（第278号文件）和武汉（第282号文件）的局势后，莫斯科才承认这一方针在那种形势下是不可能实现的。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30年8月25日作出的给中共中央的电报指示，再次建议中共领导放弃在大城市举行武装暴动的计划，把这个计划说成是“十分有害的冒险主义”。电报说，在目前形势下，还没有真正的苏维埃政府、真正的红军，还没有工业中心城市无产阶级的群众性发动和千百万农村群众的强烈骚动，“也还没有攻占大城市的重大机会”（第291号文件）。指示扼要地批评了李立三纲领的主要论点和他本人。要求李立三“立即启程来此”。还扼要地把中共的中心任务概括如下：“依靠现有的红军，哪怕在一个有生活保障的地区建立和巩固中国苏维埃政府”（同上文件）。总的来说这一指示的论点意味着进一步修改莫斯科的对华政策：现在不再把建立苏维埃根据地同攻占中心城市联系起来了。

关于远东局这一时期活动的资料总的说来证明现有书籍对它的立场的评价是正确的^①。远东局在1930年8月6日与中共中央

^① 如A.M.格里戈里耶夫：《1927—1931年的中国革命运动（战略和策略问题）》，第221—222页；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中国革命的策略在国际背景下的演变》，第220—222页。

政治局的联席会议上（第 267 号文件）以及在给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函电中，十分强硬地反对李立三提出的并得到中共中央政治局支持的总暴动计划和“爆发”世界大战、世界革命的想法。远东局及时向莫斯科报告了危急形势（第 263—265、270、273 号文件），采取了一切力所能及的措施来制止这种计划的实施。远东局的这些行动有助于莫斯科采取坚决措施来制止李立三方针最危险的表现。与此同时，远东局的一系列文件，如 1930 年 8 月 1 日给中共中央的信表明，在占领长沙后远东局对群众运动和红军的水平及潜力明显估计过高，尽管有所保留但仍支持在南京的军事行动计划（第 261 号文件），提出了“在所有城市和农村，尤其是在上海、武汉和南京地区”组织工农兵支持红军占领长沙的大规模游行活动（第 266 号文件），直到 9 月初，还赞同中共领导人再次攻占长沙的打算（第 280、297 号文件）。总的来说，莫斯科完全有根据赞同远东局这一时期的活动（第 291 号文件）。

本部分的文件还包含有关共产国际执委会，尤其是它的远东局在批判及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克服中共李立三方针方面的活动的许多新材料，这些活动是从 8 月开始的，1930 年 9 月中旬莫斯科收到中共中央政治局 8 月 1 日和 3 日会议记录、远东局工作人员详尽阐述中共、中华全国总工会和中国共青团领导人的立场和行动以及党、团、工会状况的来信（第 265、270、289 号文件）^① 后又受到推动。许多概论性著作和专著^② 已经研究了这一论题的基本问题。这里发表的文件在很大程度上使我们能从新的角度阐明这一活动的许多细节，首先是关于中共中央三中全会时期远东局

^① 这些文件由信使送来并作为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材料于 1930 年 9 月 16 日进行了登记。见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609，第 7、31 页。

^② 见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中国革命的策略在国际背景下的演变》，第 224—231 页；黄修荣：《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下册，第 84—94 页。

的立场（第 300、301、305、331、338、340、343、348、374、375、380 号文件）以及远东局尤其是米夫在筹备中共中央四中全会和起草其主要决议时所起的作用。这些问题过去很少谈及。众所周知，以往的著作普遍认为，中共中央要求重新审议中共中央三中全会的政治决议和组织决议^①并召开四中全会的活动是米夫主使的，米夫专程前往中国的任务，是要把莫斯科提拔的陈绍禹及其他许多加入由他控制的集团的前莫斯科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生提拔到党的领导岗位上来。这种说法的各个版本都断言，米夫于 1930 年 11 月底或 12 月来到中国，与陈绍禹建立了联系，组织了批判当时党的领导人和要求召开四中全会的活动，等等^②。

这里发表的文件表明，米夫早在 1930 年 7 月底就被任命为远东局新的领导人（第 257 号文件）^③，于 10 月抵达上海（第 318 号文件），当时他并不知道中共中央于 11 月 16 日收到了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李立三路线的新的来信^④，而这封信揭开了批判李立三极左纲领的新阶段。在 12 月下旬以前，他与陈绍禹没有直接接触

① 关于中共中央三中全会及其决议见 A. M. 格里戈里耶夫：《1927—1931 年的中国革命运动（战略和策略问题）》，第 208—214 页。

② 黄修荣：《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下册，第 100—106 页；周国全、郭德宏、李明三：《王明评传》，合肥 1989 年第 12—124 页；R. C. 桑顿：《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1928—1931》，第 203—208、213—217 页。

③ 1930 年 7 月 29 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批准的远东局新成员（第 257 号文件）有：代表共产国际执委会的 П. А. 米夫（领导人），1930 年 10 月至 1931 年 4 月他在中国，Г. 埃斯勒（1931 年 1 月返回莫斯科），И. А. 雷利斯基（1930 年 8 月回中国，至 1931 年 8 月前都在上海）；代表红色工会国际的 С. А. 斯托利亚尔（1931 年 6 月前在上海），代表青年共产国际的 Г. М. 别斯帕洛夫（1931 年春天前在上海）。1930 年 7 月还批准军事工作人员小组领导人 А. Ю. 盖利斯为远东局成员（他在 1930 年 10 月至 1931 年 4 月在上海）。

④ 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李立三路线给中共中央的信，见《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集）》，第 224—233 页。关于此信的内容见 A. M. 格里戈里耶夫：《1927—1931 年的中国革命运动（战略和策略问题）》，第 216—218 页。

过（第347号文件）。

米夫和远东局全体成员起先支持中共党内那些批评党的领导人和中央三中全会决议的不同派别提出的召开党的非常代表会议的想法（第343号文件）。莫斯科在1930年12月12日和15日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上听取了李立三的报告之后，下达了关于召开中央全会以取代党代表会议的指示（第348号文件）。远东局支持并执行了这一指示，与中共党内各派提出撤换以前全部领导人的要求发生了冲突（第353、354、358号文件），因为这样做可能会破坏业已形成的党的核心、特科工作网和军事工作网，失去有经验的领导人，等等。

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米夫和远东局的一个任务无疑是把在莫斯科培养的并表明绝对忠于莫斯科的“年轻的共产国际派”提拔到党的最高领导岗位上来。远东局工作人员的报告（第374、375号文件）表明，他们同时很清楚“新班子”的弱点，他们的目的是想把党的领导层中的“老的”力量和“新的”力量的代表结合起来。早在1930年12月初，米夫就请求共产国际执委会尽快把“老的”政治局委员张国焘、蔡和森派到中国来（第339号文件），而在中共中央四中全会上他得以把向忠发、周恩来、项英等人留在党的最高领导机构中。经过他的努力，陈绍禹、王稼祥、何子述和陈原道被增补为中央委员，而陈绍禹被增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但是进入“头一辆三驾马车”即1931年1月10日成立的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都是“老人”——向忠发、周恩来和张国焘。

这里首次发表的关于由远东局成员盖利斯领导的苏联军事工作人员小组活动的材料（第316、323、336号文件）表明，这个小组就是在中共领导人在实践中转而加强苏区党和军队的建设的这个时候起了重要作用。在远东局及其军事小组的积极参与下，1930年最后几个月里采取措施加强了对主要军事力量和苏区的

政治领导和军事领导，确定了苏区中央局的组成人员，努力设法建立了苏区和党在上海的政治中心之间的稳固联系渠道。

尽管 1930 年底 1931 年初党的领导层发生的尖锐危机，使党在城市中的实际活动在很大程度上陷于瘫痪；但是在远东局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指示（第 357 号文件）暂时承担起对党的实际领导的情况下，由远东局而首先是由盖利斯指导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工作在周恩来的领导下还是在很大程度上协助解决了中共武装力量中人数大增的主要部队所遇到的种种复杂问题。

198

中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给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

1930 年 1 月 10 日于莫斯科

绝密

关于莫斯科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 大学党支部清党的几点考虑

1. 首先应该注意到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内存在着托洛茨基集团。根据我们的材料，已由文件证实的托洛茨基分子有……^①人（名单另附^②）。在清党期间对这些人应十分严肃地对待。应在会议上揭露他们，因为他们采取十分狡猾的策略。应该请国家政治保安局向中大党支部清党委员会提供参考材料。经审查后必须把这些托洛茨基分子开除出党，并向全体大会通报此事，以便使群众有明确的认识。根据许多材料证明无疑属于托洛茨基集团的人和虽然暂未找到证明材料但确系托洛茨基集团领导的人，一律应予逮捕并流放到苏联境内适当地方加以监视。对其余有托派嫌疑但所起作用不大的人，也应提出将他们开除出党的问题，并在适当时候把他们遣送回中国，事先应把他们的姓名和简历通知〔中共〕中央，以使他们不能重新秘密混入我党队伍。

2. 在清党时必须特别注意社会出身与我们格格不入的分子（如地主、资本家和官吏的儿子）、他们同家庭的联系、他们入党

① 原文如此。数字未写明。

② 文件没有发表（见全宗 530，目录 4，卷宗 43，第 14—16 页）。

的真实动机以及入党后在党内所做的工作（有不少人入党是为了进中大）。尤其要注意 1926 至 1927 年抱着向上爬的目的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同志，因为当时不少这样的共产党员在军队里担任政治部主任、国民党部门成员、省市政府成员，等等。因此，对于这些人应格外注意，认真加以审查。

3. 其次应注意党员与群众的联系和关系。有些人在国内根本未参加过任何群众性的实际斗争。其中一些人到这里来以后仍保持贵族派头，对群众非常傲慢（如博古列洛夫和伊思美洛夫^①（不过后者已非本支部成员^②），伊思美洛夫在 1924 年甚至在中国参加了最反动的“新中国党”^③）。他们虽然在这里也支持支部委员会的正确路线，但从不领导群众，不会接近群众，反而脱离他们，从而使支部委员会更加脱离群众。

4. 据巴布什金^④同志称，从法国来的阿尼西莫夫、亚布洛奇金、基留琴科^⑤等同志从事某种“法国派”的派别活动。甚至发现他们中有人欺骗党组织，多报自己的党龄。在清党时对这类派别活动、宗派主义倾向或活动应格外注意，仔细审查分析现有的事实。

5. 中大内的斗争已有相当长时间了。因此清党委员会应根据 1928 年 1 月 7 日^⑥联共中央的决议和中央关于中大问题调查委员会不久前的总结^⑦ 注意对上述决议的理解是否正确，仔细审查现在是否有宗派主义倾向，因为完全可能存在这类现象。

① 分别指秦邦宪和张闻天。

② 当时张闻天在红色教授学院学习。

③ 可能指 1923 年创建的“少年中国党”。

④ 柳浦清。

⑤ 分别为：汪盛狄、徐孝祥、夏霆。

⑥ 原文如此，应为 1929 年 1 月 7 日，见第 143 号文件。

⑦ 见第 190 号文件。

6. 对于掌握充分理论知识的翻译和学生应特别审查他们是如何理解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关于中国问题的方针的，要（1）审查他们的政治立场（如克雷连科和格里申^①犯了严重的右倾错误，如坚持此类错误，应予以开除）；（2）审查他们是如何帮助工人同志掌握共产国际的方针，尤其是关于中国问题的方针的，或者他们只不过“垄断着”俄语，在无法了解方针的人，尤其是工人面前显示自己“对方针的精通”。

注：中大的情况是：（1）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共中央的二月来信^②作了报告，但支部并未好好进行讨论。（2）对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共中央关于农民问题的五月来信^③也没有认真讨论，甚至长时间没有翻印成中文，同志们直到 11 月，才在杂志^④上读到这封信。（3）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中国工会的决议^⑤所遇到的情况也是如此。这一回我本人把它译成了中文。过了两个月我问：“这个决议讨论了吗？”得到的回答是，还没有翻印出来。（4）中文出版物^⑥——共产国际执委会最近关于中共中央内“改组派”的十月来信^⑦，斯特拉霍夫同志^⑧不得不接连四五天去中大，为了使这封信及时出版^⑨，他从教务处到出版部，从出版部到珂罗版印刷车间。因此同志们才能在作报告之前读到这封信。这就是

① 分别指傅胜兰、谢建民。

② 见《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集）》，第 162—179 页。这封信的写作日期是 1929 年 2 月 8 日。

③ 同上，第 179—189 页。信的写作日期是 1929 年 6 月 7 日。

④ 见《共产》杂志，莫斯科 1929 年第 1 期，第 94—105 页。

⑤ 见《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集）》，第 192—195 页。

⑥ 原文如此。

⑦ 指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 1929 年 10 月 26 日给中共中央的信（见《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集）》，第 195—203 页）。

⑧ 瞿秋白。

⑨ 见《共产》杂志，莫斯科 1930 年第 2 期，第 101—110 页。

多么“理想”的支部和中大机关。支部局在反右倾斗争时甚至对哪怕只从技术上保证同志们能够学习共产国际对中国问题的方针一事都漠不关心。后来在小组讨论“改组派”问题时，某些这类的同志不去解释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信，而是开始为库丘莫夫同志的文章^①作辩护，库丘莫夫说中国存在“三个阵营”。库丘莫夫有一些不确切的提法，照曼努伊尔斯基同志的说法，这些提法可能导致对“改组派”作出机会主义的评价，把他们说成是中国资产阶级的阵营，而与之相对立的是封建大资产阶级反革命阵营，同样无产阶级和农民也与反革命对立。这样一来，给人的印象是，他们维护的是库丘莫夫本人也许已经放弃的“方针”，而不是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方针。

因此在清党时必须弄清这些人对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中国问题方针的立场。

7. 在清理翻译时应了解他们对苏联群众生活状况的认识，因为翻译中有不少人只会机械地读书。

8. 至于工人，在清党时应注意到他们低下的政治认识程度，不应向他们提出理论问题，使他们感到难堪，而应多问他们实际斗争的经验，他们对党的总路线的认识。如发现他们有错误的提法，应再一次向他们提出问题，使他们能正确表达自己的观点，因为工人不善于流利地说话，往往不善于表述自己的想法，即使用中文也是如此，更不用说在这里通过翻译了，而翻译有时会“修订”说话者的原意。

9. 对于发言的译文，清党委员会应予以特别的重视，因为翻译有时不老实（如卡纳洛夫^②同志在某次会议上担任翻译时故意

^① 指 B. H. 库丘莫夫的文章《国民党的危机和新的革命高潮》，载《共产国际》杂志，莫斯科 1929 年第 41—42 期，第 31—37 页。

^② 孙际明。

从区委来的一位同志^①的发言中删去了他本人（卡纳洛夫同志）不同意的一些话）。

10. 出于保密的考虑，许多事情不能在全体大会上讲。要请同志们注意这一点，如若有人想谈保密的事情，就应向有关的委员会提交书面申请（秘密信函），必要时由委员会召集双方弄清事情的实质。

最后，还有两点要请你们注意：

(1) 中共迫切需要工作人员，曾给共产国际写过五、六封信，要求派党的工作人员前往中国。我们已拟定不久将来准备派遣回国的同志的名单（名单另附^②）。因此请在头几次会议上对他们进行清理：(1) 不要把他们的行期推后两三个月，(2) 审查他们是否确实是好党员。当然这样做要很谨慎，不要让他们本人和其他学生了解到准备派遣回国之事。关于这件事，我们请求立即给予答复，如果做不到，我们要求给予书面答复，以便转交我们的中央，因为一年内发来五、六封信之后，我们不能再回答党中央说：“请再等三、四个月。”

(2) 清党的结果（开除的原因，全体党员的鉴定（举出实际事例）应给我们中国代表团一式两份，以便我们译出并将这些鉴定送给中共中央，否则你们的工作都是白做了。只要中共中央尚未收到这些材料，我们就不会把任何一个被开除出党者送回中国。

代表中共代表团 邓中夏^③

全宗 530，目录 4，卷宗 43，第 6a—11 页。

打字稿，副本。

① 何人不详。

② 文件没有发表（见全宗 530，目录 4，卷宗 43，第 12—13 页）。

③ 文件上注明：由斯特拉霍夫同志起草。

199

刘少奇给黄平的信^①

1930年1月11日于哈尔滨

第三号信

沃罗夫斯基^②同志：

我目前在满洲工作，有以下一些问题需要跟你商量：

1. 您做过工作^③的归国战俘^④在军队中有很大影响，因此士兵的工作将会有所发展。在战俘工作中，除了鼓动工作以外，必须建立党组织，还必须指定适当的同志做这项工作。归国俘虏应与满洲党组织建立密切而牢固的联系。我们必须派一位专人去您处就这些问题取得联系，但实际上又做不到。因此当战俘回国时，应派几名强的同志与他们一起回国，随身务必带上牢固的联系（线索、联络网）^⑤。您同满洲党组织的联系应通过军事组织（情报处）的联络员进行。

① 此信的俄译文由 И. Н. 佩列佩奇科于 1930 年 2 月 24 日交 И. А. 皮亚特尼茨基。案卷中有瞿秋白 1930 年 3 月 25 日给皮亚特尼茨基的便函，上面说：“我很了解刘少奇同志。我以为最好通过联共（布）哈尔滨组织与他建立联系。斯特拉霍夫 [瞿秋白]”（见全宗 495，目录 19，卷宗 132，第 12 页）。

② 黄平。

③ 黄平于 1929 年底 1930 年初受共产国际执委会派遣在伯力中国战俘中做宣传鼓动工作，包括通过《拥护苏联报》做工作。

④ 指在 1929 年 11 月由于中东铁路冲突在作战时被苏军抓获的中国战俘。

⑤ 原文如此。

2. 我们准备派工作人员前往满洲的绥芬河—通江（松花江和黑龙江汇合处）和富锦做农民的工作，还努力设法建立游击队。为此必须与您取得联系。我们需要与你们在那里的组织建立联系。

3. 我们现在在满洲，暂时与联共（布）没有联系。现在中东铁路的中国工人有可能因待遇不好而〔组织〕总罢工，要求恢复过去的待遇。目前党对群众的领导很弱。现在必须通过俄国共产党员派几名强的同志去中东路做生产工作，因此我请你跟联共谈一谈，让满洲党组织能与他们取得联系。

4. 满洲现在还没有机关刊物。上海的出版物不能大量供应我们，〔而〕这里对革命书刊的需求量很大。请你设法通过海参崴把中央和莫斯科的书刊给我们送到哈尔滨来。满洲的材料应在伯力或海参崴刊印，并通过中东铁路把印好的材料运来，这一点我已与中央商量过。办法是：（1）请指定海参崴的一位负责同志；（2）印刷费用由您或在海参崴的中国同志支付；（3）一位同志应在哈尔滨通过您的联络机关收取书刊或由我们组建一个干这件事的专门组织；（4）满洲或中央的未加工的材料应通过您转交——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任务，请你务必完成。

5. 关于战争的一切情报和材料，请你加以收集后寄来，因为苏联目前对中国内战的政策在满洲群众中的政治影响特别大，他们得知苏联是什么样的国家，对它很同情。满洲的群众运动已经起来了，哈尔滨有几千人^① 已经举行大规模的反对日本、拥护苏联的示威游行^②。请您派一些强的同志来做工作，尤其是士兵工作。

关于目前满洲的政治经济状况，如你们感兴趣，想了解的话，

① 原文如此。

② 示威游行于1929年11月6日举行。

等下一次再谈。

对上述问题请予答复。

此致

敬礼

刘少奇

全宗 495，目录 19，卷宗 132，第 15—16 页。

打字稿，经过核对的副本。

200

中共满洲省委给联共（布）远东 边疆区委员会的信

1930年1月11日于哈尔滨

第四号信

联共（布）伯力委员会^①：

我已经几次就北满党组织与你们的联系问题写信给你们。现在有以下几个问题：

1. 在中东路事件暂时调停之后，中国当局立即在铁路工人群众^②当中发动有组织有计划的反苏运动。他们利用俄国工人的返回，挑起中国工人对苏联的仇恨，利用白卫分子组建的反动社团和工人阶级的叛徒作工具。还有一些自称共青团的苏联青年不了解这一严重局势，在群众中进行反对中国工人的鼓动工作。在主要的铁路机修厂里局势十分紧张。中国共产党在群众中进行积极而活跃的工作，准备让群众投入斗争，要求红色分子^③在时的待遇：“反对裁员，反对当局，拥护苏联，支持政治罢工，反对裁减中国工人，反对降低中国工人的待遇，拥护开除一切白色分子^④支

^① 原文如此。应为联共（布）远东边疆区委员会。此信的俄译文由 И. Н. 佩列佩奇科于 1930 年 2 月 24 日交 И. А. 皮亚特尼茨基。皮亚特尼茨基在信上批注：米夫同志：在这个问题上已经做了什么？还可以做什么？

^② 原文如此。

^③ 指中东铁路上工作的苏联员工。

^④ 指白卫分子。

持恢复失业者的工作^①，支持恢复两周休假制或付给加班费，支持从10月1日起付给扣发的工资，6个月后应转为固定工，不要大洋^②要黄金”，等等。希望联共采取措施，使俄国工人和中国工人在这些口号下联合行动。这个正在开展的斗争，领导中国工人反对中国统治阶级、拥护苏联的斗争较轻松^③。我们除设法向联共（布）哈尔滨市委员会通报这个情况外，还请你们就上述问题采取措施。

2. 作战时期^④在苏联对中国士兵做了工作，希望你们能给我们同进行这一工作的中国同志建立联系（线索，联络网）^⑤。

3. 北满的鼓动工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这里只能收到来自上海的一份党刊。虽然我们现在可以出版两种刊物，但还不够，而且这些刊物不会是长期公开出版，办铅印机关刊物也很困难。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请你们：（1）在伯力务必翻印中共中央的一切出版物（《红旗》、《布尔塞维克》等），并寄到哈尔滨和满洲各地，还应在刊物上发表对远东中国工人的报道。（2）哈尔滨的材料务必由你们承担排印。（3）伯力的出版物——《工人之路》^⑥和莫斯科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出版物应大批运来供同志们阅读参考和在广大群众中散发。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中共满洲省委

① 原文如此。

② 指墨西哥元。

③ 原文如此。

④ 指1929年11月苏中的武装冲突。

⑤ 原文如此。

⑥ 指1923至1937年间先在海参崴后在伯力出版的《工人之路》报。

注：由于字迹不清，显示^①很困难，如有不明了的地方，请在背面核对。

核对无误：

全宗 495，目录 19，卷宗 132，第 16—17 页。

打字稿，经过核对的副本。

① 原文如此。应为：翻译。

201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
政治委员会会议第 35 号记录
(摘录)

1930 年 1 月 13 日于莫斯科

绝密

听取：15. (270). ——远东局关于第十次全会的决议和中共政治局的电报^①。（报告人：皮亚特尼茨基同志）。

决定：15. ——将此问题交东方地区书记处审议，然后提交政治书记处今年 1 月 16 日会议。

听取：16. (271). ——关于陈独秀。（报告人：皮亚特尼茨基同志）。

决定：16. ——皮亚特尼茨基同志提出的草案基本通过，责成由皮亚特尼茨基、库西宁和斯特拉霍夫^② 同志组成的委员会提出对库西宁同志的修改意见的表述法。（草案附后）^③

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 皮亚特尼茨基

全宗 495，目录 4，卷宗 10，第 1、3、4 页。

打字稿，原件，亲笔签字。

① 见第 179、196 号文件。

② 麦秋白。

③ 案卷中无附件。见第 202 号文件。

202

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 飞行表决结果作的第 24 号记录^①

1930年1月18日于莫斯科

听取：1. (68). ——给陈独秀的电报。飞行表决：斯大林、莫洛托夫、洛佐夫斯基、曼努伊尔斯基、皮亚特尼茨基、古谢夫、库西宁、希塔罗夫、格克尔特、斯特拉霍夫^②、张彪^③、费拉、加尔兰季、科拉罗夫、穆索、片山潜。

决定：1. ——批准。(见附件)^④。

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 皮亚特尼茨基

〔附件〕

中共中央转陈独秀

共产国际执委会决定给您机会参加主席团审议是否批准中共

① 原件标题。

② 署秋白。

③ 张国焘。

④ 电报中译文和陈独秀1930年2月17日的复信载《无产者》杂志（上海1930年第2期第101—108页）。

中央关于将您开除出党的决定问题的会议^①。主席团讨论这一问题的会议应不晚于两个月举行。

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在通知您关于主席团这一决定的同时，建议您尽快通过中共中央给予答复，您是否打算参加审议关于开除您出党问题的会议。

如您拒绝参加或两个月内未收到您的答复，这一问题将列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议程。

书记处

全宗 495、目录 2、卷宗 132、第 32—33 页。

记录为德文打字稿，原件，亲笔签字；附件为打字稿，副本。

^① 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5 册第 549—555 页；郭华伦：《中国共产党史论》，台北 1968 年第 2 卷第 103—108 页。

203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
政治委员会会议第37号记录
(摘录)

1930年1月23日于莫斯科

绝密

特别文件

听取：21. (319). —— [共产国际执委会] 远东局关于 [共产国际执委会] 第十次全会^① 的决议问题和中共 [中央] 政治局电报^② 问题（见政治委员会 [会议] 第35号记录，决定：15）。

库西宁和斯特拉霍夫^③ 同志建议邀请李立三同志于3月中旬来莫斯科。

决定：21. —— 通过。鉴于红色工会国际已召远东局的一名英国委员^④ 来莫斯科，认为远东局的另一名委员来此讨论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抗议是不合适的。

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 皮亚特尼茨基

全宗495，目录4，卷宗11，第9页。

德文打字稿，原件，亲笔签字。

① 见第180号文件。

② 见第197、201号文件。

③ 瞿秋白。

④ J. 哈迪。

204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
第 115 号记录
(摘录)

1930 年 1 月 25 日于莫斯科

10——关于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西方少数民族共产主义大学和孙逸仙大学^①。（报告人：加拉罕同志）

(1) 认为有必要使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西方少数民族共产主义大学和孙逸仙大学不再由中央执行委员会管辖，在一周内实施。

(2) 将孙逸仙大学改组为由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支援的私立大学。

(3) 责成中央书记处讨论关于少数民族学校今后是否存在和如何组织的问题。

中央书记 斯大林

全宗 17，目录 3，卷宗 774，第 1—2、9 页。

打印稿，签字为真迹复制。

① 指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

205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的信

1930 年 1 月 30 日于上海

第 9 号。致东方书记处

亲爱的同志们：

从此次寄上的材料中你们可以充分了解 12 月底给你们发去的中国同志的电报和我们的电报^① 的意义，这些电报说明我们之间在我局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次全会的决议问题上^② 存在着分歧。应该指出，同志们的电报和我们的电报是在 12 月下半月我们之间发生激烈争论之后发出的。尽管今天局势看来与当时大不相同，但我们仍然认为有必要向你们简单叙述一下这一争论的经过，争论似乎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部分：

1. 中国政治局 12 月 6 日的记录^③，奥斯藤^④ 在联席会议上的讲话^⑤ 和李立三 12 月 13 日的答复^⑥。2. 同志们 12 月 14 日给我

① 文件没有找到。

② 见第 180 号文件。

③ 见第 186 号文件。

④ И. А. 雷利斯基。

⑤ 见第 188 号文件。

⑥ 见第 188 号文件。

们的信^① 和罗伯特^② 12月17日结束争论的讲话以及奥斯藤和向忠发简短的结束语^③。3. 中国同志关于你们10月26日来信的决议^④。引起这次争论的主要问题和几乎唯一的问题是批评与自我批评问题。我们代表团在关于第十次全会的决议中具体指出了中共的缺点，谈到除陈独秀的取消派观点和反革命托洛茨基主义以外，中国共产党甚至中国政治局内存在着在农民问题、工会问题和对待改组派及左派将领问题上的右的倾向。从政治局12月6日的记录中可以看出，同志们起先完全否定对政治局内错误倾向的任何意见。同志们在交谈和争论后承认在农民问题和工会问题上有错误，但想把这些错误说成是已经完全克服了的。而关于对待改组派和左派将领的错误，则想推给基层组织。但是我们认为，这样承认错误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我们向同志们证明说，在农民问题和工会问题上党内仍存在着错误，政治局把对待改组派和左派将领的错误推到基层组织身上，只充当了错误的记录员，而不是对这些错误负有责任的领导者，何况在这一具体形势下基层组织的错误是由政治局和省委的通告和指令中所阐述的错误理论引发的。我们在12月6日以后起草的党的文件中举出了具体事实，证明我们关于党内存在错误倾向的看法是正确的。所有这些文件我们现在转寄给你们，所以在这里就不再重述这些文件的内容，也不谈在工会工作中的错误，因为乔治^⑤ 已向红色工会国际详细谈

① 见第189号文件。

② I· 埃斯勒。

③ 见第191号文件。

④ 指《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给中共中央的信》（见《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集）》第195—203页）和中共中央政治局1930年1月11日通过的《接受国际1929年10月26日指示信的决议（关于论国民党改组派和中国共产党的任务）》（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第1—14页）。

⑤ J. 哈迪。

了这一切，现将他的信件副本转寄给你们^①。同志们面对这些事实无法坚持原来的立场，在关于你们10月来信的决议中已承认了我们在我们的决议中所指出的全部错误。同志们并未放弃12月6日的记录、李立三的讲话和政治局12月14日的信。我们并不一定要坚持这一点，我们认为首先应使同志们切实理解问题的实质，而要放弃在同我们争论中坚持的错误方针。鉴于此问题已提交你们处理，应由你们来解决。

在这场争论中，当然也出现一些可笑的东西。同志们为了加强自己反对我们的立场，对我们提出了一些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指责（见政治局12月6日记录）。但这些指责多半都不值一提，因为这些指责是在头脑发热时提出来的。（你们一定要告诉同志们，对待共产国际的代表应该很尊重，很有分寸，这是另一个问题）不过我们认为有必要说明以下情况：

在奉天方面向苏联政府提出召开中东铁路会议的请求^②后，我们代表团建议同志们在中国劳动群众中开展广泛的运动，说明在帝国主义通过中国军阀向苏联发动进攻的这一阶段，苏联取得了胜利，但这并不意味着，帝国主义者和军阀们再也不想挑起反苏战争了。美英帝国主义者提出照会，要在奉天和苏联的对话中进行调停^③，这说明他们还想挑起中国的反苏战争。同志们与我们关于苏联取得胜利的观点相对立^④，说代表团有调和主义倾向，以为苏联取得了某种胜利，但帝国主义者和军阀还呆在中国。对在中国劳动群众中宣传苏联取得胜利的必要性如此不理解，这决非偶然，这是因为他们对帝国主义者和军阀内部的冲突采取了错误

① 文件没有发表。

② 看来是指张学良的代表1929年7月22日提出的建议（见《苏联外交文件》第12卷，第426—427页）。

③ 详见Г. 维经斯基：《中东铁路和帝国主义在华的政策》，莫斯科1930年。

④ 原文如此。应为：同志们反对我们关于苏联取得胜利的观点。

的态度，不善于在今天（正是在中国人民遭受帝国主义者和军阀压迫的今天）宣传苏联及其对中国人民的和平友好政策。尽管同志们在同我们的争论中后来不再提出这一意见，但我们还是认为〔有必要〕提一下这个意见，因为我们坚信这个意见与上述对问题的不理解有关。正是由于对问题的这种不理解，同志们才会对苏联在中东铁路取胜问题上以及帝国主义者和军阀结成反苏同盟问题（尽管他们之间存在着许多矛盾）上与我们对立。中央 12 月 8 日的第 60 号通告^①十分清楚地表明了对问题的这种不理解。只是由于我们坚持不懈地不顾情面地批评同志们的立场（不顾他们的委屈），才得以制止这种在保卫苏联问题上涣散人心的倾向并给同志们指出了正确的道路，要宣传苏联，动员群众奋起保卫苏联，同样要认识第 60 号通告在反苏战争问题上和在其他几个错误地认为由战争可以引发革命、帝国主义者之间尽管存在矛盾可能结成反苏联盟等问题上的错误。

在陈独秀问题上对我方的指责有两点。（1）阻挠与右派的斗争；（2）对陈独秀会改正错误抱有幻想。这一点是指我们在去年 2 月把蔡〔和森〕同志开除出政治局^②问题上的立场。我们当时批评同志们这一做法，认为这是错误的，我们说，今后凡是要把某个同志开除出党或党的机关，必须先向全党充分说明这个同志的错误，在党采取一切措施帮助这位同志改变错误立场之后才能这样做。这一点对右派和对托洛茨基分子都适用。第二点涉及以下情况：陈独秀就中东路问题给中央写了几封信^③，他在信中堕落到

^① 指中共中央 1929 年 12 月 8 日通告第六十号《执行武装保卫苏联的实际策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5 册第 561—575 页）。

^② 1928 年 11 月 20 日蔡和森被清除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务委员会。

^③ 见《中共中央和陈独秀同志关于对占领中东路事件的态度的通信》，载《共产国际》杂志莫斯科 1929 年第 48 期第 43—45 页；第 49—50 期第 62—74 页；《反对陈独秀和机会主义》，莫斯科 1930 年版，第 63—110 页。

国民党的立场上去了，在中央给他答复和我们跟他谈话后可以看出，他不会从那条路上回来了^①。于是才提出把他开除出党的问题。我们建议作最后一次努力。在报刊上和在组织中开展对陈独秀反党反共产国际立场的无情斗争，要求他作出声明，承认错误，改正错误，承认中央路线是正确的并加以贯彻执行，我们说否则就把他开除出党。情况果然如此。陈独秀没有这样做，就被开除出党了。在这个问题上，除了不理解与右派和托洛茨基分子的斗争以外，还存在着投机心理，指望代表团^②不会得到共产国际的赞同在中国正确进行反右派斗争，因为代表团中有同志对共产国际其他支部的右派持宽容态度。在附件中已对这些问题作了较详细的论证。

正如我们所指出的，也正如你们从12月6日政治局记录中看到的，同志们对我们的指责相当尖锐，预示着我们今后的工作将面临困难的局面。但是我们要把争论引向实际工作方面并直截了当地向同志们提出问题：“同志们掩饰自己的错误将到什么地步？”我们是否有这种情况：同志们在书面上和在口头上承认共产国际2月、6月和9月^③的来信是正确的，而实际上却不同意，继续坚持自己原来的立场？这样提出问题迫使同志们认真考虑自己否认错误的理论，并最终从政治上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在争论最激烈时，我们收到了你们10月的来信。这封信完全正确地评估了中国的形势并证明我们对中国同志的具体方针是正确的。这封信大大帮助我们把同志们从政治局12月6日记录的错误道路上拉回来。我们在讨论这封信时作了简短的说明，并将此信同正在进行的争论、同志们的错误、对改组派斗争的不力以及

① 原文如此。从意思看应为：他不会改变自己的立场了。

② 指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当时也称共产国际执委会驻中国代表团。

③ 见《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集）》，第162—189、192—195页。

党的任务联系起来。此后同志们提出了决议草案，从中可以看出他们已完全明白了来信的实质，愿意加以贯彻执行。我们经过长时间的争论才得以使同志们承认对反苏联盟的方针是错误的，必须在党的领导机构中进行自我批评并把这一点写进决议。我们提出了决议的第一稿^① 和决议的最后稿。在从中国目前政治形势出发制定党的实际任务时，除了你们指出的任务和同志们拟定的并已部分执行的任务以外，我们向同志们提出了召开中国各苏区代表大会的问题。近来我们的苏维埃根据地扩大了，并在组织上得到了加强。党的影响以及它在城乡的组织基础也加强了。在每个苏维埃根据地按照当地条件贯彻执行革命路线，吸引农民参加苏区的管理，通过召开地区苏维埃代表大会，各苏区的代表大会将加强各苏区之间的思想联系，将在各根据地确定我们的工作方针，并从组织上统一各个苏区，最后，中国各中心城市应通过自己的革命组织派代表出席这次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经过精心筹备、认真举行，将有助于消除现有的缺点，对群众运动的发展产生影响，并加强苏区在党内和劳动群众中的作用。由于根据地彼此相隔甚远，代表们要穿过军阀控制的地区，召开这样的代表大会要经过努力才能克服种种困难。中国各苏维埃根据地的这次代表大会应在一个最强大的苏区举行，万不得已才可以在非苏区举行。

近来实际进行的活动有以下几项：12月中国同志进行了纪念广州暴动两周年的活动。由于军阀战争日趋扩大，我们在劳动群众中的反战鼓动工作做得还可以，中国同志根据我们的建议把这一活动（纪念广州暴动）同反对军阀的运动结合起来了，举行了反军阀周。我们认为这一活动是整个反军阀和反帝国主义工作中的又一个环节，是我们革命活动的拓展。这个反军阀周是中国劳动群众纯政治性的发动，他们通过在城市中的发动、在农村中的暴动

^① 文件没有找到。

和游击战争以及在军阀军队中的骚动已十分接近于这样的政治性发动。这一运动的主要任务是向群众尽可能清楚明白地展示南京政府的失败、它的反动面目和同帝国主义者的勾结，另一方面，向群众说明汪精卫、张发奎及其他改组派将领以至整个改组派同样是反动的，同样是为帝国主义者效劳的。蒋介石及其集团想在群众面前掩饰自己的破产，在最近两个月内疯狂地进行蛊惑宣传。接二连三地发表宣言、照会，甚至发表从1月1日起废除治外法权和一切不平等条约的文告^①。汪精卫及其集团以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作掩护大肆进行活动，甚至在各军阀反对蒋介石的战线上取得了一定的胜利。党面临的一大任务是与中国这两个反动派别相对抗。从我们方面来说，我们尽一切力量从思想方面和实际方面帮助同志们开展这一运动，因为这两个方面都做得不太好。不能说同志们有意偏离共产国际的方针和指示。不能这么说。这封信的前半部分以及我们关于我们和他们之间争论的几次讲话、我们的批评以及你们的10月来信都已经谈了他们的缺点。从同志们的通报和收到的文件译文中可以看出，这方面的宣传工作同志们做得还是令人满意的。表明这一点的主要是：这一运动中产生了我们的半公开的报纸网。除了过去已有的报纸外，现在还有：上海两份，哈尔滨两份，香港1份和天津1份^②。《布尔塞维克》和《红旗》^③及时作出了指示，散发了大量传单和口号。我们在11月就指出的反改组派工作的缺点，到了12月已大为减少。同志们通过群众集会、罢工、示威游行等作出了很大的努力来切实开展这一运动。运动应是全国性的，重点放在满洲。还没有来自各省的

① 指南京政府1929年12月31日关于从1930年1月1日起废除外国人在中国的治外法权的宣言。

② 报纸名称没有查到。

③ 指《红旗》周刊，后来是三日刊，1928年至1930年在上海出版。

消息。根据同志们的通报，在上海我们通过党支部和半公开组织召开了各种代表会议，举行了各区工人和大学生的群众集会。12月11日，上海各区举行了示威游行和群众大会。参加的人数不多，但都是无产者，工人约占70%。12月15日在三处举行了全上海的示威游行。整天持续不断地下雨本来会影响示威游行的规模，但示威游行是有战斗性的，是无产者的。我们考虑到群众的积极性和改进我们对这些群众的领导工作，建议在警察驱散游行队伍时组织反抗。当然，我们说明应该怎样做，说明这还不是手执武器的反抗，还不是街垒战。同志们报告说，我们的工人认为这样还不够，提到了要武器，但实际上这样的反抗是有组织的，示威游行变成了同警察的搏斗，使用得最多的斗争武器是自己的鞋子^①。同志们向自己的代表写了详细的报告，我们不准备过多地谈论这个问题。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我们和同志们都认为这一运动不能令人满意，今后再举行这样的运动要考虑到所有的错误和缺点，因为迫切需要强化反对帝国主义者、军阀、国民党和改组派的斗争。形势的发展与你们10月来信的估计相吻合。应该认为帝国主义者、国民党，特别是改组派〔破坏〕奉天和苏联的谈判^②这一挑衅性政策是目前时局的新特点。这一切促使我们党向劳动群众揭露这一骗局。中国及其他殖民地，特别是远东唯一一个独立国家——日本的劳动群众的积极性应提到更高的革命行动的高度。我们党在这里应组织政治罢工和示威游行，加强自己政治上和组织上的领导和影响。虽然党和群众的联系得到了改善，但党仍然很弱。整个党，特别是工厂支部机动性很差，灵活性很差，因此党对群众运动、罢工和示威游行的领导往往出现很大的失误。

① 原文如此。

② 指1929年12月在尼科尔斯克—乌苏里斯克和伯力举行的调解中东路冲突的谈判。

最近上海的无产者又经历了一场悲剧。1月13日“安迪生”电气厂的工人举行全体大会，要求释放1月11日被捕的3名工人。应美国资本家的请求前来驱散集会者的中国警察遇到了工人的反抗，工人们痛打了指挥警察的最无耻的国民党分子。国民党分子在新调来的警察支持下开了枪。5名工人受了伤，其中有3个女孩，1个只有14岁。这一行径引起了上海工人和大学生的义愤。当天晚上一些工厂和区举行了飞行集会。我们的组织提出了举行总罢工的口号，抗议杀害工人，要求红色工会结社、罢工和出版自由，释放因从事革命活动而被捕的所有犯人。提出了成立声援伤员及其家属委员会的口号。中央派出巡视员赴各省组织对上海工人的支援。运动发展缓慢。我们的工厂支部还弱小，缺乏经验，国民党分子和帝国主义者竭尽全力要制止这一骚动。他们想通过威胁和各种微小让步来阻止无产阶级的大规模行动。1月19日^①，星期六举行了以下罢工：“安迪生”灯泡厂900名工人罢工，日本“东新”丝厂900名工人罢工，沪西中国各纱厂900名工人罢工，吴淞铁路有80名季节工罢工。星期日，1月19日，飞龙路发电分厂500名工人罢工。星期二，“商务印书馆”工人罢工。关于其他罢工报纸上未作报道，同志们也没有报告。工人们在这些罢工中都提出了自己局部的要求。我们把这些罢工和上海工人的这一运动同反对在朝鲜抓人、支持印度工人斗争的运动联系起来。我们拟定于星期日，1月19日，在上海举行示威游行。同志们要我们相信能够发动几千名工人和大学生参加这次示威游行。专门做了同时组织朝鲜人和印度人参加游行的准备。从同志们的通报中可以看出，示威游行进行得很糟糕。它更多的是党员的示威，而不是群众的示威，集合起来的示威者不到1000人，多数是大学生。我们在专门的会议上与同志们一起专门研究了这次失败的原因。

① 从下文可以看出应为1月18日。

星期三，1月22日，同志们报告说，“安迪生”灯泡厂的工人已复工，12名被捕代表^①已获释。但同时在星期三发电厂工人举行了罢工。在宣布罢工前举行了群众大会和示威游行。罢工完全由我们领导。选举了罢工委员会。但这一回美国人又以威胁利诱的办法破坏了罢工。其他企业的工人也复工了。所有这些罢工，特别是“安迪生”灯泡厂的罢工和发电厂的罢工不能说是失败的。工人们多少争取到了一点东西。但党却失败了。不仅是总的政治罢工，而且是局部的政治罢工规模都不大。“安迪生”灯泡厂工人在遭到国民党枪杀和英勇地挺身捍卫自己的代表时，面临逮捕却得不到上海无产阶级的支持。我们说“党失败了”，因为所有这些活动都是由我们党倡导并在我党领导下进行的。这些事件鲜明地告诉党，而主要是它的领导，它所面临的任务首先要求要有正确的政治方针和革命策略，同时还要有领导运动的组织才能。工厂支部网不扩大，这些支部得不到系统教育，不用有经验的同志去加强区委，不吸收工人参加领导，不同时减少文牍主义作风，不转而实行比较生动切实的领导，党就不能有效而正确地执行它面临的任务。

诚然，最近一年来党的组织生活有所进展。除了以前举行的几次代表会议外，最近又举行了江苏省党代表会议和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全国代表会议。关于江苏省代表会议我们在上一封信中已经向你们暗示过^②。现在再来详细谈谈。参加这一代表会议的有60名同志，其中有表决权的38名。除了代表人数最多的上海外，还有从该省其他地方来的代表。在38名有表决权的代表中有17名工人。有两名是上海的纺织女工。代表会议开了9天。政治问

① 原文为此。

② 原文如此。从意思看应为：提到过（见第185号文件）。指中共江苏省第二次党组织代表会议，1929年11月18至26日在上海举行。

题讨论了4天。农民问题、工会问题和组织问题各讨论了1天，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依我们看来是第一项议程的报告人李立三的责任，他讲了12个小时。代表会议没有讨论妇女问题和共青团问题，而是把这些问题提交给了工作委员会。通过了表态性的决议（致苏联工人的信，致红军的信，关于武装保卫苏联的宣言）。在新选出的省委中，17名同志中有11名是工人。在这些工人（1名妇女）中有4名是直接在工厂或企业里工作的（铁路工人、电力工人、电车工人和邮电工人）。其他的工人是失业者。在9名候补委员中有5名工人，其中3名是现在在做工的。同志们还选出了由3人组成的监察委员会。省委书记处由4名书记和两名候补书记组成，其中有3名工人。代表会议的书面决议尚未收到。向你们提供的信息来自省委书记罗达^①。他说，争论最激烈的是反动派是否存在危机的问题，我们的示威游行、罢工、游击战的组织问题以及党内的生活。在没有收到书面材料前我们且不作评价，但现在我们可以指出代表会议的工作方针是错误的，对理论问题花的时间太多，而对实际工作花的时间很少，上海军械厂代表没有出席代表会议是一大不足。

12月底举行了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全国代表会议。出席的有40人。江苏、广东、浙江、河南、湖北、山东、直隶、满洲和内满州^②都有代表出席。在40名出席者中26人有表决权，其中党员15人，团员2人，无党派人士9人。这26人的社会成分如下：工人7人，农民1人，教师6人，大学生7人，同志们还提到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的工作人员4人和党的区委工作人员1人，他们未按社会出身来划分。代表会议在完全保密状态下开了三四天。选出的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中央委员会由15人组成，其中无党派

^① 李维汉。

^② 原文如此。大概是指内蒙古。

人士 10 人，党员 5 人。书记处由 5 名书记和两名候补书记组成，其中 4 人是党员。参加检查委员会的有 6 人，都是党员。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的一名工作人员^① 给该会执行委员会的来信谈了这个问题，还谈了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的整个工作，他的来信副本现附上^②。我们认为这些材料值得你们注意，请认真读一读。这些材料一方面告诉你们党的一部分生活情况，另一方面是说明中国恐怖情况的好材料。

这一段时间，无论举行的几次代表会议还是实行的中央常设巡视员制度，对健全党内生活都起了作用。中央借助这两种工作方法才开始了解组织的情况。在中共党内，尽管口头上与机会主义或托洛茨基主义如此势不两立，却出现了种种骇人听闻的事情，表明党的领导脱离了地方组织。据巡视员的报告称，江西、福建和直隶等省党的领导机构中有拥护汪精卫和第三党的人。有些省委不是没有收到中央关于如何对待富农的决议，就是对这些决议很不理解。这一切从附件^③ 中都可以看出。这一切表明必须坚决要求同志们改进领导，改进中央的指导和监督。最后，党的最薄弱之处之一是它的社会成分。据同志们提供的资料称，党内无产者阶层只占 7%。除了党在每次举行群众性运动时要扩大组织基础外，我们还提出要组织专门吸收新党员的运动。专门成立的联合工作委员会应详细研究这一问题，预见一个合法政党所必须采取的各种措施。我们认为还可以在中国开展在其他支部中取得很好成效的社会主义竞赛。

关于领导层的内部状况说几句。实际领导是由 6 位同志组成的政治局负责。中央委员分散在各个省，中央全会开得很少。政

① J. 多尔森。

② 文件没有找到。

③ 文件没有找到。

治局主要的政治领导人是李立三。我们已经几次写信跟你们谈了他的情况，他是一位很活跃、很热情、有首创精神的同志，但他同时有许多书呆子习气，多少有点搞烦琐哲学，没有搞群众工作和我们策略的实践。另一个与他处在同一水平上的是周恩来，但他完全埋头于实际工作，往返于各级党委的会议之间。看来，他没有时间研究理论问题，起草政治决议，等等。其他的政治局委员，除少先队员^①外，给人的印象是缺乏独立性，介于李立三和周恩来之间。而李立三和周恩来之间进行着悄悄的斗争。这一斗争还没有完全成形，还不明朗，他们也不把这一斗争从政治局带到我们和全党面前。但我们在讨论你们关于农民问题的来信时发现了这一点，当时李立三要把富农分成资本主义富农和封建富农，周与他相对抗，在讨论你们的 10 月来信时也发现了这一点，周恩来与李立三相对抗，表示同意以下意见：对基层组织的错误中央也有责任，帝国主义者之间尽管矛盾重重，结成反苏联盟是十分现实的。从这两个例子中你们可以明白政治局中的政治摩擦和人事摩擦。我们是否在这个问题上得出某种结论呢？没有。我们认为，从现有人才来看，从现有的积极分子来看，政治局这一构成是最符合党的需要的。我们接触到的同志数量相当有限。除了两三人以外，我们没有见到过地方上的积极分子，因此很可能对积极分子的负面评价多少有点过头。我们认为问题很严重。要不是整个政治局全都被捕，那我们简直找不出新成员来。这个政治局尽管政治上很弱，实际工作经验不够，但还是很好地开展了一些群众运动，略微整顿了党内生活，政治局委员们在工作上已能相互配合。

现对 12 月 24 日收到的米夫 11 月 4 日来信^② 答复如下：

① 关向应。

② 见第 182 号文件。

1. “我们”对你们关于农民问题和工会问题的来信“保持沉默”，是因为无法给你们寄去决议。没有其他原因。

2. 我们没有收到你们关于1月15日前派出中共中央代表的电报^①。12月中，有一次阿尔诺^②告诉我们说，你们要求派这样的同志去。但那时为时已晚，他来不及于1月15日前赶去。现在政治局决定派周恩来去，你们从电报^③中已知道此事。他尚未作好启程的准备，请考虑到他要绕道而行，因此最快他将于4月前到达。我们认为，应该由李立三去，因为周恩来这位唯一的实际工作领导人不在的话，将对工作产生不利影响。

3. 我们已不止一次向你们报告了托派在中国的影响和活动情况。我们再一次要求同志们提供详细的通报。同志们谈了以下情况：中国托派中大多数是从莫斯科回国的学生。他们的活动目前集中在上海、香港和北京。他们开过两次会。一次在6月或7月，另一次在11月。他们出版《我们的话》报^④。他们在上海闸北区开设“新世界”书店。通过这家书店出版了拉狄克的一些小册子。他们在香港一度混入海员支部，此外他们的活动只限于大学生中。中央了解所有最重要的托派分子，正有效地同他们开展斗争。他们对党和共产国际的攻击还是老调重弹。“中国正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中央和共产国际都是机会主义的”。他们在反党活动中提不出任何新论据。

较为有分量和危险的反动派是已被开除出党的陈独秀集团，其领导人之一是在你们那里的利明采夫^⑤。陈独秀与党员群众和工人群众的联系较多。目前他同上海的印刷工会和法租界棉纺厂

① 文件没有找到。

② A. E. 阿尔布列赫特。

③ 文件没有找到。

④ 指《我们的话》杂志，1929至1931年在上海出版。

⑤ 何人不详。

党支部有联系。陈独秀写了告全体党员的公开信^①，矛头指向中央。据中央所知，陈独秀与云南省和四川省建立了组织联系。同志们还说，陈独秀在他最近发表赞同托洛茨基意见的声明（这一声明我们未收到）后，竭力要在组织上建立与托派分子的联盟。目前这些努力还没有成功，但受陈独秀影响很大的老托派分子和陈独秀本人都未放弃这一努力。现在正试图出版由著名党员签名致党中央的信，要求中央恢复托洛茨基党籍和共产国际成员的身份^②。同志们手头没有这方面的书面文件。但这一切都是可能的。陈独秀考虑到他的取消主义立场已经破产，竭力争取充当托派的领袖，因此正寻求与托派的组织联系。过去有过这样的情况：“左”的取消派和右的取消派联合在一起（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中国也不排除此类情况的出现。但中国同志从中得出了错误的结论。他们近来在与我们交谈时和在党的文件中想采取这样的方针：“陈独秀向托派投降了”，根据这样的想法，同志们反对我们关于明确划清陈独秀集团中托派和取消派界限的意见。这些先生们活动的结果当然只能是一个，即结成反党反共产国际的联盟。但在斗争中，尤其是在思想斗争中，抹杀两者之间的区别〔包含着〕危险，中央和全党可能会看不到目前最危险的取消派倾向，这是首先应该与之进行斗争的倾向。我们决定坚决说服同志们，让他们认识到必须集中主要火力反对取消派和右的倾向，同时与托派作斗争。随后同志们报告说，全党投入了反倾向的斗争。主要斗争集中在上海这个左的和右的反对派分子的中心。已经有一定数量支持陈独秀的工人脱离了他。全中国只开除 40 人出党。其中

^① 见陈独秀同志致全体共产党员的信，载《反对派（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通报》，巴黎 1930 年第 15—16 期，第 19—23 页；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二篇，第 104—114 页。

^② 可能是指中国托派 1929 年 12 月 15 日的纲领性声明《我们的政治观点》。

上海有 18 人。依我们看来，今后的斗争方针应该是：同陈独秀取消派和党内右倾作斗争，同托洛茨基主义作斗争。你们在这场斗争中能对我们和中国同志提供〔什么〕帮助呢？首先是提供小册子、发表文章。由拉狄克专门为他的中国崇拜者写点东西是会有好处的。而最现实的具体帮助是尽快制止在莫斯科生产中国托派分子。如果仍继续生产，则请不要输出到中国来，而尽量让他们留在你们的市场上。莫斯科开除出党后返回中国的 20 个中国托派分子是对党的一大干扰。还请注意，这些回国的托派分子，除了带来思想混乱外，还带回了另一些反革命信息。而把他们留在莫斯科工厂和机关里并没有很大困难。

4. 我们努力与台湾和纳入我们地区范围的一切国家建立联系。但是我们几乎没有可能有步骤地这样做。什么原因呢？没有同志可以派到各处去。这一工作不可能靠中国同志去做。他们很乐意提供同志，同志们也乐意去，但结果是：他们不是尚未到达目的地就被当局遣送回国，就是一到目的地就立即被捕，如在日本就是这样。这方面必须要有精通几种语言的欧洲同志。对台湾我们在尝试新的办法。

5. 印度尼西亚的一位同志^①来过我们这里，又到别处去了。我们从他那里得到 1 月 14 日的消息。他暂时还没有找到任何人。他在尝试通过当地的联系渠道。2 月他将到我们这里来作通报，通报材料我们将立即转寄给你们。

6. 爪哇和苏门答腊工会运动的代表^②9 月来过上海。我们曾写信告诉过你们，还谈到为什么我们不能派他们中的任何一人去你们那里。首先，在技术上没有任何可能性；其次，他们中没有一个人适合谈我们的工作。

① ② 何人不详。

7. 你们通知我们红色工会国际即将举行代表大会^①，这很好。太平洋工会书记处已知道代表人数。这些代表能否成行取决于两点。第一，经费；第二，路程。经费情况很糟。我们和太平洋工会书记处都是这种情况。阿尔诺早已不给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拨款了，尽管你们多次来电，而给党的经费他也只给一点点，连你们拨给的经费也没有全给。太平洋工会书记处已一连几个月没有向中国和菲律宾提供财政援助了。它的积蓄早在10月就用光了。它和我们多次发信和发电报。去你们那里的同志答应向你们和红色工会国际报告这一情况。但迄今的结果是，乔治获悉钱已于11月底寄出^② 而今天，谢天谢地是1月底，但钱还没有到。请你们注意，没有经费不是这里的责任，这会妨碍工作的开展。中国的形势和其他各国的形势都非常火热。这里和其他各地应开展罢工运动，而你们和红色工会国际却不给我们经费。代表们的路程问题在不久的将来会弄清楚。请告知你们是否能在4月底或5月接待代表。必须这样安排，因为多数人将秘密前往，需要把这些人分在两个月内动身。如果代表大会6月召开，那我们应在4月开始出发。

告诉你们，布林斯基^③ 痊愈了，已经工作。戈卢别夫^④ 目前尚无危险，应估计到这种病不是致命的。在这封长信的末尾，我们对你们不答复我们的电报感到不满。你们对事务性的和政治性的电报都不作答复，该如何理解？要知道，尽管我们感到不满，但我们在给你们的电报中提到的问题尚需你们作出答复，我们无法解决这一问题。为了工作方便，务请答复我们的电报，请转告有

① 指红色工会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1930年8月15至30日在莫斯科举行。

② 文件没有找到。

③ 任弼时。

④ 陈绍禹。生病是指被捕。

关人员电文要拟好些，因为阿尔诺的机关多数电报看不了，尤其是长电报。最近一封分几次发出的来电，我们根本没有看懂，不知它谈的什么事情。

一切政治材料请用英文寄来，尤其是给菲律宾的，因为菲律宾那边只懂英文。

致同志式的敬礼！

代表代表团 保罗^①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566，第 3—8 页。

打字稿，原件。

① И. А. 雷利斯基。

206

雷利斯基给米夫的信

1930年2月1日于上海

致米夫同志

亲爱的同志：

我要跟您谈谈下面一件事：我们给东方书记处的第9号信^①中有些地方我们认为不能让斯特拉霍夫同志^②知道，因为据我们所知，所有事情他都会告诉这里的同志们。最主要的一点是我们作出了关于李立三与乔恩^③之间有分歧的推测。

请尽力设法保证中国同志能正常收到经费。这件事从来没有办好过。当党收到预算款项时，就没有太平洋工会书记处的钱了，当太平洋工会书记处拿到经费时，就没有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的钱了。而现在哪一方面工作都没有钱。这必然会影响到工作的进度。请想象一下这里的情况，竟没有100美元，用来派遣一位同志去各省传达中央关于支援遭国民党和帝国主义者杀害的上海工人的指示。这简直像是故事，但可惜这是事实。当然，我们并不想说中国同志本身在分配预算款项上或者在从地方筹款上没有过错。这个毛病应该医治，但同时也应正常提供经费。

① 见第204号文件

② 瞿秋白。

③ 周恩来。

戈卢别夫^① 被捕后没有什么危险，只是坐几个月的牢。布林斯基^② 在中央鼓动宣传部工作。他不太满意，但认为这最安全，我们也同意这种看法。他较走运，但不应总这样干。一次两次成了，第三次就可能不成。

从您住处发来的电报多数都有“已执行”的手续。但机关破译不出来。他们说，用的德文太蹩脚，乱七八糟。给陈独秀的电报^③ 不清楚，但阿尔诺^④ 怎么收到的，怎么破译的，就怎么照转了。我们认为发这封电报是个好的步骤，但中国同志可能会坚决反对。要知道，我们因为对陈独秀采取类似措施而被称为调和派。他们不会这样称您，但可能会说，这封电报落入陈独秀手中会成为他反对中央的论据，因为陈独秀将把中央同共产国际对立起来。

致同志式的敬礼！

奥斯卡^⑤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566，第 9 页。

打字稿，副本。

① 陈绍禹。

② 任弼时。

③ 见第 202 号文件。

④ A. E. 阿尔布列赫特。

⑤ И. А. 雷利斯基。

207

米夫给瞿秋白的信

1930年2月9日于莫斯科

敬爱的斯特拉霍夫^①同志：

请原谅我打扰您的休息，去信又让您思考工作上的问题。因为您还不会很快回来，而我们原来（显然是由于我生病）就特别拖延了对中共二中全会决议的讨论和评价，所以我才敢“惊动”您，同您商量一些问题。

问题是二中全会决议的一些提法含混不清，甚至有错误。这两种情况都需要我们作出解释和提出同志式的批评。二中全会的所有决议反映出来的路线基本上不能认为是正确的，因此尤其需要这样做。但是在不了解您的意见的时候，我不想采取什么具体措施。加之我不清楚您是否已就此问题给国内写了信。我对译文是否符合原意也没有把握。

由于这些原因，我必须给您写信，我想在这封信中就我所觉察到的一些提法的实质问题谈谈我的一些看法。为了不谈得太多，我请您注意三个问题。但我先谈谈几个令人不解的提法。例如，在主要的政治决议中说，帝国主义者“不久前指挥阿富汗军队袭击苏联的地区”^②。不明白这是指什么事。当然这并不十分重要。其

① 瞿秋白。

② 米夫在这里和下面引用了中共中央二中全会文件的俄译文（见《中国研究所通报》，莫斯科1930年第3（64）期，第10—11、14—16、23—24页）。

次，该决议的第一条中有这样的提法：“世界革命定会在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三时期爆发”。而且还引用了六大和六次代表大会^①的决议。还是不明白，什么叫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三时期，为什么世界革命定会爆发，而且好像它已经不是第一天发生。显然，中国同志们在错误地谈论世界革命的第三时期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的混乱应该由我们解释清楚。下面一个句子分析了国际帝国主义越来越尖锐的矛盾，这句话更坚定了我的这一看法。这里完全闭口不谈国内矛盾，而战争的威胁只是在谈到帝国主义列强之间日益激化的矛盾时才提出。好像不存在对苏联的武装干涉危险。

属于这类（需要作解释的）提法的还有第四条中的下列论断：“封建主义在日益临近灭亡”。还是不明白，这里说的是临近搞土地革命呢，还是相反，认定资本主义通过演进排挤掉封建主义？

暂且把这类不明确的提法放在一边，我来谈三个主要问题。

第一个问题，关于对中国资产阶级的估价。由于我没有把握，您手头是否有相关的材料，我要援引几处说明中国资产阶级立场的文字。

在第四条中说：“中国弱小的资产阶级本身也承受着封建地主的压力，特别是在它试图掌握中国政权的时候。”

在第五条中说：“因此，主张积累民族资本的中国资产阶级和力求使中国殖民地化的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必然发生。”由此在同一条中得出结论说，“中国资产阶级不能不捍卫二五减租和减轻田赋的要求”，“中国豪绅买办和资产阶级彼此在争夺反革命联盟的领导权。”

在第六条中断定，“中国资产阶级对出卖国家的独立当然不会罢休。”

在第七条中说：“如果我们预计中国资产阶级会逐渐通过和平

^① 指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

的手段实现其改良纲领，那么我们就会犯严重的错误。”（这是否意味着它会通过非和平的手段实现其纲领？如果从总的行文来看，自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

我认为，关于这个问题的引证已经够了。同志们反对“彻头彻尾反动的群众”的观念是对的，但同时又陷入了另一个极端。他们断定中国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地主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得出资产阶级在为实现其完全背离地主利益的土地纲领而斗争。资产阶级为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提出减租减赋的要求。由于这些原因，而不是群众运动的兴起，资产阶级提出了这种要求，它试图以此来瓦解农民的斗争，只要群众运动一走向低潮，不再对剥削分子的利益构成直接威胁，与地主串通一气的资产阶级就会乐意彻底放弃这种要求。接着得出结论说，国内军阀战争是地主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武装斗争。这里忽略了中国的封建割据、国内市场的相互隔绝和帝国主义列强的势力范围等因素。简言之，这个提纲反映出了我们在十次全会^①上已经谈过的那个错误，那个错误是与对宁桂战争的错误解释有关系。我想，您是会同意必须对这个问题作出详细的解释的，我们国外的同志也需要这样的解释。

第二个问题——关于我们在农村的策略。我还要援引该决议第十条中的两段话。第一段：“推动土地革命的因素是农村贫民和少地农民，中农是我们的同盟者，而革命的敌人是剥削贫农的富裕农民……^②，他们自然会投入反革命阵营。”

第二段话：“在无情地镇压农村富豪的同时，游击队应努力使中农保持中立并争取少地农民和农村贫民的支持。”

从上述引文中可以得出，地主已经不再是中国农村的主要剥

① 指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次全会，1929年7月3至19日在莫斯科举行。

② 删节号是原有的。

削者。农村富豪——富裕农民持这一立场（不错，在关于农民的决议中说，“中国军阀的剥削是农民最难以忍受的。”）。另一方面，有一处说中农是我们的同盟者，在另一处又说应该使中农保持中立。这样的提法必然使我们得出某些结论，或者是同志们没有把话说完，或者是不理解这个问题。我们作出解释同样又是十分必要的。

为了结束我这封本来就写得够长的信，我要不加任何评论地引用总政治决议中的一句话：“革命工会运动的策略应该是争取红色工会合法化和反对国民党企图剥夺群众的自由。”这个提法怪得出奇。

就此搁笔。等候您的回音。

紧握您的手！

祝养精蓄锐，早日康复！

您的 米夫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599，第 1—4 页。

打字稿，原件，亲笔签字。

208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

第 117 号记录

（摘录）

1930 年 2 月 15 日于莫斯科

46. ——关于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报告人：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

（1）作为对政治局今年 1 月 25 日决定（第 115 号记录，决定：10）^① 的补充，认为撤销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同时在国际列宁学校成立由中国真正共产主义分子组成的中国部是合适的。

责成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讨论改组国际列宁学校的问题。

责成莫洛托夫同志实行这些措施。

（2）明天即公布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和西方少数民族共产主义大学的决定^②。

中央书记 斯大林

全宗 17，目录 3，卷宗 776，第 1、9、16 页。

铅印稿，签字为真迹复制。

① 见第 204 号文件。

② 见《消息报》1930 年 2 月 16 日。

209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

1930年2月于上海^①

秘密

关于中国共产党党内状况

中国的现状无疑证明共产国际执委会^②第六次代表大会和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关于中国局势的评价是正确的。

目前，中国共产党生存和工作的时代是反动阵营内部分崩离析、全国出现经济总危机从而促使大规模工人运动兴起的时代。业已兴起的大规模工人运动与前一时期运动的区别是，1927至1928年罢工运动波及到小手工业企业工人和商店店员，而1929年至1930年站在罢工者前列的是大工业企业。这已不是持续几小时的小规模经济罢工，而是长期的大罢工，有时是总罢工，如上海的铁路员工和公用事业职工的总罢工。除了提出经济要求外，常常提出矛头指向黄色工会领导人、政府官员和帝国主义的政治要求。今年，罢工席卷纺织业、采矿业和交通运输业。青岛和华北有2万多纺织工人举行反对日本暴虐的罢工；唐山矿工在1929年举行了一系列局部罢工。在天津电车职工罢工结束后不久，北京近10万苦力举行了抗议政府和电车公司的大规模示威游行。天津的纺织工人和烟草工人举行罢工。铁路员工的斗争得到许多铁路线的响

① 日期和作者是根据内容确定的。报告引用的文件没有找到。

② 原文如此。应为：共产国际。

应。京汉路、京绥路、京沈路、高济路^① 和津浦路的铁路员工都罢了工。罢工运动也得到武汉的响应。福建棉纺厂 2000 名罢工工人包围了公安局，要求停止政治迫害，并取得了完全胜利。“俄国女皇号”轮船的 4000 名^② 船员宣布罢工，不久其他轮船也奋起响应。仅在上海一地，1929 年 5 月份就举行了 24 次罢工，6 月份举行了 28 次罢工，而 7 月份上海每天有近 2 万人罢工。罢工基本上是纺织厂、烟草厂、造船厂、印刷厂的工人和邮电职工，等等。1929 年 5 月 1 日上海 5 万工人罢工。江西的瓷厂工人庆祝八一，接着就举行罢工，有 10 万多人参加。罢工时和罢工前成立了罢工委员会、纠察队，与工贼进行了激烈的斗争。

应该指出，工人运动的这一蓬勃发展部分地没有受到中共领导人的领导。上海的四次罢工——邮电职工罢工、煤店工人罢工、烟草工人罢工和苦力罢工都是由黄色工会领导的，自然都失败了。在青岛，1929 年 10 月前罢工开始时“只有 20 名同志，他们没有做任何工作”，而领导罢工的是黄色工会。人力车夫的罢工由于改良派的挑唆变成了反对电车工人的斗争，而不是反对老板的斗争。红色工会、共产党支部毫无作为：“罢工已开始两天，而我们都没有向工人散发一张传单。我们对挑拨离间的策略未能采取对策，因为我们以前根本没有做过电车工人的工作。”（摘自北方委员会^③ 的报告）

改良派虽然得不到工人的信任，但毕竟混进了工人之中，夺取了工人运动的领导权，领导了罢工，出卖了工人阶级的利益。

但是党的工作无论质量上还是数量上都很差。基层组织中有

① 原文如此。似应为：胶（青岛）济路。

② 原文如此。

③ 指中共北方局。

这样的现象：“党员互不信任……^① ‘裕南’^② 纺织厂（上海吴淞区）支部的同志不愿参加会议……铁路支部的党员对党的会议漠不关心”，等等。

有这样的事例：区委书记亲自沿着铁路线去散发传单，指望路过的工人会拾起来看一看。区委的秘书感到为难，因为他手头存放的传单太多，“多得烧掉可惜，不烧又危险”。

工会和党的基层组织不善于处理日常领导工人运动的工作，有时还采取机会主义的态度，这样的例子可以举出很多。

凡是党抓工作，派出可靠的人，努力深入群众的地方，就立见成效。1929年11月7至14日召开的第五次全国劳动大会后工会巡视员视察了基层工会的工作，红色工会的活动立即就活跃起来，会员人数增加了，在黄色工会中也组织了新的基层组织和党团。

目前，全国参加红色工会的有4万人，其中绝大多数是景德镇瓷厂工人和景德镇及开滦的矿工，其次是上海，有3000人（红色工会以及在黄色工会中的党团），香港1000人，武汉1000人，唐山4000人，还有奉天兵工厂有一些不大的组织（引自中华全国总工会理事会^③ 1930年1月的报告）。

近来工作的活跃不仅表现为红色工会会员增多，而且表现为在他们中进行的教育工作。中国共产党从指靠帮派越来越走向掌握群众、为群众利益服务。

上海组织已着手研究中国工人斗争的某些经验。党正在开展出版工厂小报，发展工人通讯员的活动，在各区建立起宣传员小组，从事研究工人阶级斗争的国际经验和红色工会影响工人的方

^① 此处和以下的删节号是原有的。

^② 原文如此。

^③ 指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

法。罢工委员会、工厂委员会、斗争委员会暂时还处于萌芽状态，但是据说这一群众组织的形式在中国也有生命力，是可行的。

除了城市中的工人运动外，农民运动当然也在全面高涨。

最近华南和华北游击队取得了辉煌的战绩。

红军成长为一支人数不下3万人的大部队。闽西、赣西、粤北和粤东、湘南、鄂西成了游击队的活动地区。游击队的影响也波及到四川和河南。在游击队的活动区和巩固区都没收土地，建立苏维埃政权。现在中国已有10多个苏区（据中央委员会给全会^①的报告说有19个苏区）。

华中和华东的江苏、浙江、安徽、赣东北、湖北和河南的部分地方的形势特点是：自发暴动爆发猛烈，盗匪遍地、“大刀会”和“小刀会”之类的秘密帮会特别普及。

在华北，除了甘肃的回民起义和山东的秘密帮会发展迅猛外，早在冯玉祥与南京战争^②期间直隶就发生了几千农民反对拉壮丁的骚乱。这种后来演变为暴动的骚乱在其他省份也有发生，口号是反对交纳战时苛捐杂税、租金等等。

在农村，特别在华南，党已深入农民群众，这是指游击区。在白色恐怖严重而难以进行工作的地区则完全看不到党的存在。

在华北，许多农民的自发行动都没有党的领导，有时是由富农或与军阀妥协的人领导的。党就没有参加过华北几百万饥民的运动。

农村中群众组织人数不多。鄂东、西江^③、江西等继续进行武装暴动的地区的农会没有脱离党的领导。东江^④流域和鄂西的农

① 指中国共产党六届二中全会。

② 指1929年10至12月蒋介石与冯玉祥之间的战争，这场战争以冯玉祥的失败告终。

③ 指广东、广西两省的西江流域。

④ 广东省东江。

会相当强大；闽西的农会组织上很牢固。据1929年初的资料，江苏、安徽以及江西和湖北部分地区各留下5至10个农会，会员人数从五六百人至几千人。其中多数人或近多数人是共产党员。尽管红色农会中共产党员人数不少，但共产党的影响还不大。来自这些地区的书面消息纷纷抱怨说：“同志们不做工作”，“极少开会”，“工作人员不知道怎么工作”，等等。

尽管对农民工作有明确指示，但党组织至今还不很明白怎样组织和领导农会，有时还犯机会主义的错误。华北很久以来就有一种看法，农会应以国民党的名义来组织。另一个看法是，我们可以号召农民群众参加自治选举，等等（华北委员会的报告）。其他方面也有同样严重的错误。党组织缺乏弹性，不能适应变化了的局势，根据工作条件制定出自己的策略。有时除了这种“静止不动”外，还干脆出现“取消主义”。在来自苏州的一封信中同志们报告说：“在南方和北方地区反动派夺取了农村政权。我们的同志因此也去县衙门里登记。看来他们想方设法去当官。”

在南方各省对农民运动的领导要好得多。但同志们自己谈到“对宣传和组织广大农民群众的问题注意很少”，“游击队脱离群众”，等等。犯了一系列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例如，南方苏区一个决议说：“对富农和大商人收取的税款应不多于反动政府时期”，又如，朱德报告说：“我们在江州^①从未没收过任何财产，只收税，而且没有像反动报纸说的那么多。大商人只交2万元，地主交3万元。”

诚然，中央委员会和各省委及时纠正了这些错误，但根绝这些错误当然为时尚早。

关于城市贫民和学生的运动说几句。这是中共工作中最薄弱的方面，尽管客观条件很好。城市贫民由于苛捐杂税十分沉重、经

^① 原文如此。可能指汀州。

济危机加剧而生活状况恶化了，他们的革命情绪增强了，尤其在华北。根据几个小例子可以断定这个运动十分广泛：直隶省切安^①县近5万人举行大规模请愿活动反对所谓的“四项政策”(1. 审核证件，2. 服兵役，3. 纳税，4. 强卖国债)，而且痛打了衙门主官，打碎了衙门的门窗。另一个运动：90个县选出184名“人民代表”，向政府提出种种要求。直隶省的第三个例子：几千人包围自治政府大楼，要求取消捐税。在芜湖、湖南、广东各地都有这样的运动。但是这一运动无论是自发的还是有组织的，至今都没有受党的领导，没有接受党的影响，党也没有尝试参与其中加以领导或利用。大学生中的情况也如此。已经出现的左翼提出了共产主义的口号，参加了反帝运动。这一运动并非完全属于我们的，也没有受共产党的领导，因此往往离开共产党而与改组派勾结，与第三党勾结。例如，四川一封来信报告说：“四川反帝运动完全掌握在一小撮知识分子手中，运动本身是和平的妥协主义的”。1929年8月1日的运动出现了中国反帝运动走向激进的转变，当时党提出了明确而具体的口号，组织中国工农群众围绕这些口号举行广泛的示威游行。

在工农群众运动日益发展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当然也在成长壮大。关于中共人数和社会成分的最新统计如下（据1930年2月17日的报告）：党员共69391人（数字或许有些夸大，因为江苏省委按一个苏区县1万人计）。据1930年1月党作的统计，除了几个小省外，共有党员65528人。其中江苏7000人，广东7000人（1929年12月），湖北12500人（连同苏区在内），江西15000人（连同苏区在内），浙江4700人。

除南洋（新加坡）外，工人为5120人（占7.8%），与中央六

^① 原文如此，音译——译者。

月全会^①前的数字相比，工人人数增加了 1500 人，其中 1389 人为产业工人。

工人党员各省分布情况

省	工人人数	其中产业工人
1. 江苏	1300	800
		（大部分在上海）
2. 广东	700	200
3. 江西	650	30
4. 湖北	500	100
5. 浙江	400	5
6. 直隶	300	200
7. 满洲	43	30
8. 山东	40	11
9. 云南	不详	59
10. 河南	100	30
11. 福建	不详	50
12. 湖南	不详	31
13. 安徽	不详	3

党支部生活逐渐开始有所好转，尽管仍不能称为有条不紊。六月全会时党内有 100 个生产支部，目前（1930 年 1 月）已经有 183 个。

生产支部按省分为：

1. 江苏 94
2. 广东 30
3. 湖北 5
4. 直隶 9
5. 满洲 9

① 指中共六届二中全会。

(其他支部所在地未标明)

据现有资料，生产支部中共有34个铁路支部，9个矿山支部，其中直隶2个，安徽2个，江西1个，云南2个，四川1个和湖南1个，其余的是纺织厂和瓷厂支部。与兵工厂有联系，但没有有组织的支部。

积极分子队伍大致如下：省委书记处成员53人，其中工人17人，农民1人，其余均为知识分子。华北的领导人员一无例外都是知识分子。上海领导人员中一半多是工人。在已统计的^①20名区委委员和书记中11人是工人。广东90%的积极分子是工人。党开展的谓“广州号召”征集活动（1929年11至12月）中光上海一地就吸收了300名工人（预计有700人）。其他中心城市吸收党员的材料还没有。所有这些材料都不完备，因为迄今为止尚未收到关于党中央委员会最新调查的完备统计数字。

农村党组织在苏区日益壮大，在游击运动席卷的地区同样如此。白色恐怖笼罩的地区组织发展十分缓慢。

在敌人占领的海陆丰，仍有强大的组织。总的来说，各省农村党员人数要比城市党员人数多好几倍。甚至在云南、四川、山西这些运动尚未具有激烈形式的地方，农民也参加共产党。士兵中党员人数在增加。女党员尤其是女工党员人数保持原来水平。党在加强支部活动的问题上取得的成效不大。上海有60多个在活动的产业支部。但是这些支部不太稳定，只要遭到重大挫折就会垮台。厦门、香港、天津、奉天的支部生活正常进行。农村的支部往往与群众组织合在一起，在群众斗争中支部失去了领导运动的作用。在敌军中牢固的党支部不多。朱德、毛泽东和彭德怀、黄公略部队中的支部活动最出色。闽西和东江流域的“流动部队”中的党支部多少也经常开展活动。但是迄今为止无论是军队中的共

① 原文如此。指有相关资料的。

产党党团还是中央都没有提出红军的雇农成分和无产阶级领导问题。“领导作用仍然属于知识分子，基本核心是原国民革命军的士兵，基本群众是失去阶级基础的农民。”

党中央由于路线正确，在尝试采取支部工作新方法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对基层党组织有步骤地进行调查和指导，出版《党的教育杂志》^① 来帮助做群众宣传工作的人，尝试选出“模范支部”（北方组织），对群众运动进行明确的有计划的领导。武汉、广州、汕头、长（沙）岳（州）铁路、×^②、×^②、郑州、太原、大连、开封等地的城市组织恢复了活动。湖南省委和湖北省委也已恢复。

中央对广东、广西、江西、湖北、河南、直隶、满州、山东、浙江和安徽工作的调查情况如下：缺乏能进行党的基层工作的中层党员，老党员太少，缺乏做党的工作的人；缺乏能对新参加工作的新干部做工作的人，“初级学校的教师很靠不住，他们大多是改组派的代理人”（吴淞的报告），吸收工人工作较差。即使工作条件很好，党常常无能为力。云南省委给中央写信，请求寄经费去“开办鸦片烟馆以接近士兵。”

党内缺乏老的骨干和坚强的工人核心，助长了偏离党和共产国际总路线的“左”右摇摆倾向。党不能及时领导运动，使运动接受它的影响，党处理问题不坚决，不能及时把经济斗争转为政治斗争，往往张皇失措，半途而废，党的这些错误无疑是由党内取消主义情绪造成的。党内一批取消派否认群众斗争会再度活跃，认为应把斗争限制在细小的经济要求上。

有些同志对待反对改组派和第三党的斗争的必要性不太认真，认为在斗争的条件下改良派不是什么大的危险。虽然地方组

^① 可能指《党的生活》杂志。该杂志于1929至1930年在上海出版。

^② 此处地名辨认不清。

织的领导人常常明确提出问题并积极同公开的取消主义观点作斗争，但他们本人有时也犯右倾错误，例如，在赣西，省委指示中说：“加强每天的斗争是争取群众的唯一方法”，“只应开展和领导能取得胜利的斗争”，“雇农和贫农应是党的工作的中心”。机会主义者和反对派在党内的活动得到了组织上的加强，陈独秀和彭述之等人继续从事反共产国际的宣传，因为他们过去也反对过中共六大的决议和中共中央的决议。他们现在已同托派公开结盟。陈独秀在他致中共党员的信中明目张胆地声称，共产国际领导中国革命的策略过去和现在都是错误的，只有托洛茨基才是正确的^①。他们提出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口号，认为建立工农兵代表苏维埃政权、驱逐帝国主义者、没收帝国主义在中国的银行和企业等口号都是错误的。他们认为目前的中央持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路线，认为 8 月 1 日和 11 月 7 日的示威游行是“玩弄中国人民感情的盲动主义游戏”。他们要求在党内实行极端的民主，容许在党的最高机关作出决议后讨论党的政治路线和策略，认为中共六大的路线和方针是错误的。他们认为停止对党的最高机关已经作出的决议进行争论是发号施令，等等。陈独秀的拥护者们公开宣传陈独秀的取消主义主张，在党支部中散发陈独秀的信，在党支部中反对党的领导，反对领导干部参加支部工作，散布对中央委员的种种流言蜚语，以便在中央制造分裂。由于这一破坏活动，在印刷工人支部和一个知识分子支部中，人们开始发生动摇。他们对党和工人运动进行彻头彻尾的叛卖活动，鼓励意志薄弱、思想落后的同志在罢工时与企业主进行勾结。他们的积极活动不仅在上海一些支部中而且在其他省份都有表现，他们鼓动来上海的同志反对党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开除陈独秀及其追随者出党的决定。被开除者勾结托派，认为开除他们是错误的，并直接

^① 见第 49 页注①。

向党员发出呼吁（陈独秀给中共党员的信）^①，他们进行筹建第二党的工作，同时借助还留在党内的机会主义者和调和主义者继续从事削弱党的力量的活动。反对派的领袖们被清除出党，但各级党委和党组织中无疑还有他们的追随者在从事秘密的派别活动。广东、福建、直隶、山东等地都揭露出这样的人，其中多数人是从莫斯科回国的学生。不错，目前只有少量的人敢于公开反对共产国际。党内右的危险无疑是存在的，并且不是微不足道的。例如，在个别党委中往往有同志过高估计资产阶级的力量，忽视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不承认革命运动会重新兴起，认为现在工人的斗争不应是进攻性的，不承认党的主观力量在壮大，无视像建立工会这样的任务，反对与富农作坚决的斗争，表现出合法主义的倾向，宣传通过和平手段开展斗争，认为革命运动已经停滞，不需要培养工人骨干，等等。机会主义者、取消派利用没有经受过锻炼的新同志的动摇，有时是不自觉的动摇，加深他们的动摇，以此来削弱党的力量。

党在与倾向分子、机会主义反对派进行斗争时遇到了调和主义情绪，特别在知识分子党员中传播更广。一些过去犯过机会主义错误的同志尤其容易搞调和主义。

同志们的理论水平不高，无产阶级基础不够广泛，这是在实际组织工作中和在同志们思想路上滋生调和主义倾向的培养基。加强反对右倾分子的斗争同时也就加强了对调和主义派别的斗争。

不能说党内没有“左”的危险。盲动主义情绪无论在城市还是在乡村都存在。这表现为力图在城乡组织没有群众参加的暴动。在许多地区的游击运动中往往滥杀无辜，乱烧民宅；党内实行所谓的恐怖主义纪律（体罚、处决等），对群众发号施令。在中央给

^① 见第49页注①。

福建省委的信中谈到省委所犯的盲动主义错误：“示威游行时一小批同志去捣毁《真事时报》^① 馆和海关大楼。在福州，汽车司机骚动时，共产党员提议处死省长陈文利^②。许多文件都谈到了这类错误。

这些现象当然并不普遍，这是个别错误，党正在与其作斗争和在卓有成效地加以克服。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487，第 50—62 页。

打字稿，副本。

① 估译，准确报名不详——译者。

② 原文如此。1928 至 1932 年福建省主席为杨树庄。

210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①

1930年3月3日于上海

绝密

敬爱的同志们：

奥[斯滕]^②将向你们作详尽的报告，因此我们在这封信里只谈几点意见。

1. 关于新的军阀战争^③爆发后党的任务，你们可以在关于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的第七十号和第六十八号通告^④中看到。也还存在一些缺点，如对改组派的作用强调不够，没有揭露国民党的全会^⑤。但这些缺点将会得到改正。

2. 广东代表会议。本信寄出时正在举行广东省代表会议。本来这次会议应在香港举行，但由于目前改组派和南京特务充斥香港，其中许多人认识我们的领导同志，为保密起见，决定会议改

① 在俄译文的副本（全宗514，目录1，卷宗566，第42页）上有批注：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成员自上海寄给斯大林同志的信。德文原件上没有收信人和寄信人姓名。

② И. А. 雷利斯基。

③ 可能指1929年12月唐生智将军反对蒋介石的行动。

④ 指中共中央1930年2月4日第六十八号通告《关于召集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和1930年2月26日第七十号通告《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中心策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第15—20页和第25—35页）。

⑤ 可能指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三届二中全会。全会于1929年6月10至17日在南京举行。

在上海举行。对于与会者来说，这一决定带来某些不便。原拟出席会议的有 34 名代表，现在参加上海会议的只有 22 人。有些代表不得不留在省内坚持工作，而最不好的是，边远乡村的农民代表由于交通困难而无法来上海。参加代表会议的有 6 名工人、16 名知识分子、3 名香港代表、2 名海南代表、2 名广州代表、1 名国民党军队的士兵、1 名粤东的红军同志、3 名省委委员，其余的来自各农村。代表们是由各地党委选出的。

代表会议情绪高涨。代表们对形势的估计很乐观，激烈反对左右倾取消派分子，充满着自我批评精神。对于原则性问题毫无分歧，但在讨论过程中仍十分清晰地表现出党内现有的缺点和模糊的看法。例如，所有的同志都认识到必须开展游击战争，认识到红军的作用，认识到必须将这一斗争与城市紧密结合起来。有两位同志提出红军的供应问题。当然，由于军事形势瞬息万变，供应和装备问题往往十分困难。但总的来说，凡是我们的同志作为红军领导人能实行毫不妥协的正确的农民政策的地方，凡是他们真正密切联系广大群众的地方，农民都非常积极地支持他们。这两位同志说的是粤东一支 2000 人的红军队伍所遇到的困难，这支队伍由于政策错误而脱离农民群众，困难很大。另两位同志说，在中东路冲突后开展的运动中不应提苏联的胜利问题。有些同志不理解红色产业工会的必要性。一位同志认为把土地平均分配给农民的口号是错误的，他要求立即实行集体化。在关于敌军中工作的问题上看法模糊，存在着过早组织暴动和对敌军中组织工作估计不足的倾向。在代表会议上暴露出对去年青年工作是否取得积极成果持很大的怀疑态度。

3. 陈独秀。你们可以从附上的陈独秀的声明^① 中看出，他不

^① 指陈独秀 1930 年 2 月 17 日对由中共中央转交给他的共产国际执委会 1930 年 1 月 18 日电报的答复，共产国际在电报中建议他去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审议将他开除出中共问题的会议（见第 202 号文件）。

想去莫斯科。我们认为共产国际应尽快发表批判他的正式声明。

4. 4月中旬在新加坡将举行马来亚共产党组织的代表会议。有一位中国同志^① 将带着我们的指示前去参加。至于对菲律宾采取的措施，请看附上的乔治^② 的信。关于印度支那，报告如下：同12月底去香港的约克^③（法国人）已谈妥，等那里建立联系后并根据抵达那里后的情况，他将于2月底返回这里，同我们讨论下一步的工作问题。但是，1月底收到来自香港的报告，约克谈到他将前往印度支那，此外我们没有收到他的来信。几天前安南阮爱国^④ 同志抵达这里。附上他的来信^⑤，他在信中谈了他在与我们谈话时口头向我们报告的一切。我们决定利用他同我们联系，委托他做一些组织工作，并在当地继续进行活动。我们同时把他的地址寄给有关机关，请督促通过邮局寄出我们的法文出版物（《国际新闻通讯》、《人道报》、关于苏联的小册子等等），当然应考虑秘密工作的环境。

2月份我们的朋友只收到9000墨西哥元；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一点钱也没有收到。我们十分困难，我们朋友们的工作严重受阻。

致最崇高的敬礼！

全宗514，目录1，卷宗566，第12—13页。

德文打字稿，副本，无签字。

① 傅大庆（音）。

② J. 哈迪。文件没有找到。

③ X. 杜克鲁。

④ 胡志明。

⑤ 文件没有发表。

211

瞿秋白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东方书记处的信

1930年3月19日于莫斯科

秘密

在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支部清党过程中，根据瓦日诺夫^①同志的交代和与之相联系，许多同志对我们提出了十分严厉的指责。(3月18日)当我们在清党会议上讲话时，这些同志纷纷插话，继续提出这些指责，而且这些指责已在支部局的机关刊物——墙报上登出。昨天这些指责再次被准确表述如下：

1. 代表团^②成员(斯特拉霍夫^③、邓中夏、余飞、陆定一、张彪^④——所有人的名字都被提到了)有自己的行动纲领，即不同于共产国际的路线和反对这一路线的路线。
2. 代表团成员在学生当中成立右派组织(阿拉金^⑤、韦利霍夫^⑥、瓦日诺夫等)。
3. 这个组织同托派组织举行过会议，同后者进行了谈判，这一右派组织过去和现在都在进行反对共产国际和联共(布)的斗争。

① 郭妙根。

② 指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

③ 瞿秋白。

④ 张国焘。

⑤ 李剑如。

⑥ 余笃三。

有鉴于此，谨请你们查明这些指责。

（斯特拉霍夫）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599，第 5 页。

打字稿，副本。

212**雷利斯基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东方书记处的信**

1930年3月20日于莫斯科

秘密

致东方书记处

由于中共中央代表^①的到来，除对党的整个工作作出评价外，还需要解决以下问题：(1) 派莫斯科的中国同志回国工作；(2) 经费问题；(3) 与共产国际的联系；(4) 出席红色工会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和(5) 中共代表大会或代表会议。

理由：

(1) 在〔中共〕六大后，警察恐怖使党失去许多工作人员。各级工会委员会成员一再被捕。被捕者中恢复工作的人数极少。因此造成中央和各省党的积极分子根本不足以完成党所面临的任务。中央本身只剩下9名同志，其中7人参加政治局。整个中国政治形势以及党的组织和联系的日益扩大，要求党加强其领导。据中国同志讲，从在中国的现有同志中挑不出担任省委书记和中央各部^②部长的负责同志。最明显的不足是没有通晓农民问题的实际工作人员和组织工作人员。特别应该谈一下军事问题，因为党在军阀军队中的工作和在现有红军中的工作(红军有3万战士、

① 指周恩来，他于1930年3月初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定从上海途经德国前往莫斯科。

② 指中共中央各个部。

1.5万支枪和相当大一片由我们控制的地区）要求加强党对这一工作的领导并把它提到更高的高度。唯一能选拔这些同志的来源是莫斯科，那里有数百名中国学生和不少侨民。现在，在周恩来同志抵达前，就应派出几名适合担任省委书记的同志。

（2）我已收到皮亚特尼茨基同志对经费问题作出的解释。尽管我们代表团已经离开，现在又指示我不应干预经费问题，但我仍认为有义务提及这一问题。现在在当地那里只付给中国同志3.3万元。过去付这3.3万元时美元比价为2.2元，而现在付这笔款项时美元比价已为2.8元（2月），换句话说，党的预算由于货币贬值削减了近30%。虽然在当地与负责经费的同志^①谈过话（因为他有特别的权力），但毫无结果。我们得到的回答是：“这不关你们的事。”这笔钱是分批给的（每隔3天给5000）^②。这使党无法合理地把钱分给各省和各部（各省的预算分批发给）。因此造成了不必要的旅差费开支。如果说党的预算削减了而且分批付给，而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的预算不能按时得到。负责经费的同志每隔两三个月就宣布改变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的预算。例如：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在1929年1月、2月和3月只收到440元支付给一位外国同志^③。我们来到后（1929年4月），经过长时间交涉，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开始收到6000或9000元（我记得不太清楚）。7月或8月收到皮亚特尼茨基同志的来信^④，之后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应收到1.8万元。但这一直拖到11月。11月又借口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有3万元储备，只给了它6000元，12月给了3000元，1930年1月给了3000元。2月这位同志^⑤说没有给国际革命战士

① A. E. 阿尔布列赫特。

② 原文如此。

③ J. 多尔森。

④ 文件没有找到。

⑤ A. E. 阿尔布列赫特。

救济会的钱，虽然有拨给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 7000 美元的电报^①。党和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经费时断时续，影响到党的工作，关于这一点代表团已多次给你们写过信。我认为除了安排好这个问题外，有必要讨论一下中国整个预算问题。党的各方面工作都在扩大，党正在利用合法和半合法的可能性（反帝大同盟^②、自由大同盟^③、上海的两家半合法报纸^④、香港的一家报纸^⑤、天津的一家报纸^⑥、哈尔滨的两家报纸^⑦、好像武汉还有一家^⑧），开办党校，巡视员经费外出——这一切都要求增加党的预算，如果这一点做不到，那就仿照西方（波兰）党的例子，[应] 同时拨给党用于不同用途的专项补助。由于我从主管经费的那位同志处没有得到关于经费问题的直接通报，我只是从中国同志的通报中了解到这些情况，所以我提到的钱数和日期或许不准确。

（3）中国同志和代表团^⑨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务必加以改善。我谈几个事实：唯一能从中了解共产国际决议材料的是《国际新闻通讯》，但《国际新闻通讯》来得不按时。往往间隔很长时间，看来是出于保密的考虑，隔了一段时间，给我们寄《国际新闻通讯》的同志认为应该按顺序（第 1、2、3 等等）寄出。积压了不少，比方说积压了 10 期，而每一次邮件只能寄出一期，最快要隔 3 天，因此《国际新闻通讯》收到得很晚。在中东路交通突破^⑩时《国际新闻通讯》出版后要过两个月才能收到，因此只能通通消息，

① 文件没有找到。

② 指 1928 年 8 月中共建立的上海反帝大同盟。

③ 指在中共指导下于 1930 年 2 月 13 日在上海成立的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不久该组织由于国民党镇压而停止活动。

④ 《白话日报》和《上海报》。

⑤ ⑥ ⑦ ⑧ 报纸名称不详。

⑨ 指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

⑩ 原文如此。应为：中断。

而不能作为指导。关于国际范围内的各种运动（8月1日、3月6日），我们是从资产阶级报纸上了解到的。共产国际鼓动宣传部以及各部的材料通常到收时都已过时，不能发挥作用。连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信件（工会问题的、农民问题的和总的问题的来信^①）也都是迟迟才能收到。而最迅速有效的发布指示的工具——电报——则情况很不妙。首先，中国同志和代表团都无法控制，不知道什么时候发来电报，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收到你们的电报。我们发给你们的电报最快要从交给当地国际联络处电文后算起再过5天。我们收到你们的来电也需要这样长的时间。只有在极少的情况下收到的电文是清楚的，大多数电文是难以置信的走了样的文字。当地的国际联络处只收到一部分文字，那里把这些文字拼凑成电文。国际联络处认为原因有两个：这里德文掌握得不好，密码乱了套。国际联络处往往不送出电报，也不把这一情况告诉代表团和中国同志。有时我们根本收不到你们的答复。例如，上海有一位女记者（《法兰克福报》）史沫特莱女士。通过她传来的通讯很好。她曾表示愿意从我们的消息来源处获取关于帝国主义暴行的消息。我们认为，应该向她提供这类消息，因为无论是帝国主义报纸还是国民党报纸都不提供中国的真实情况。当中国同志派出的同志与她见面时，她说她的记者证只是一个合法的掩护，实际上她是反帝大同盟^②的代表，她能为从事这一工作的共产党员提供经费。中国同志要求我们作指示。我们自己拿不定主意。1月初我们曾发电报给你们（是否有这回事）^③，但到2月19日前尚未收到你们的答复。不知道你们是否发来过电报，作了回答没有，因为我们无法控制。我们认为，当地的国际联络处和代表团之间的

① 见《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集）》，第179—189、192—203页。

② 指世界反帝、反殖民压迫和争取民族解放大同盟。

③ 电报没有找到。

关系应和你们那里一样。国际联络处作为“独立的”一个机关，常常借口“情况特殊”，以权威自居，可以决定发什么，什么时候转交，转交什么，常此以往将妨碍工作。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一切重要文件应该由专门信使送达。

(4) 所有代表团，除菲律宾代表团外，都应秘密地前去参加红色工会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现在就应开始着手做实际工作。主要一点是，应确定国际联络处能否穿越中苏边界。如果现在就可以确定代表大会召开的确切日期，那么一部分负责人和领导同志可以绕道前往（[路程]约两个月），因为国际联络处未经试探的路线对他们有危险。然后应向当地同志提供派遣代表的经费，还应往上海派出一位同志，他应精通英语，最好还能通法语，他可以前往日本、印度支那、菲律宾运送当地的代表。上海现有的同志中无人能办这件事。打算让日本或印度支那的代表来上海，然后接受下一段行程的指示，这种设想应该放弃，因为上海目前的情况对他们和对我们都有危险。

(5) 今年务必召开中共代表大会或代表会议。自六大（1928年夏）以来，党的生活和政治形势都有进展。对六大决议应作补充和修正。有些问题，如农民问题，工会问题，民族问题，失业，饥荒，苏区，北满国内移民、群众性合法工作，同党内反对派的斗争，同陈独秀和被清除出党的托派的斗争，中共与菲律宾、印度支那华侨的关系以及中共在这些国家的活动等，都应重新提出。

这五个问题应在周恩来同志到来之前准备好。他在这里逗留的时间应尽可能短一些。中国日益加剧的经济危机、军阀内部混战的升级、帝国主义者内部的斗争和帝国主义者的反苏活动，正在开展的工农斗争以及即将到来的5月和6月——有许多帝国主义者和军阀迫害中国民众的纪念日，党在此期间将能举行群众性活动（1929年）——这一切都要求他这位最有经验的领导人呆在

中国国内。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雷利斯基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566，第 17—22 页。

打字稿，原件，亲笔签字。

213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
政治委员会会议第 47 号记录
(摘录)

1930 年 3 月 23 日于莫斯科

听取：11. (475) ——东方书记处请求批准关于将陈独秀开除出共产国际的决定并在报刊上予以公布。

决定：11. ——在不削弱对陈独秀的思想斗争的同时，必须遵守给陈独秀的考验期限^①。

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 皮亚特尼茨基

全宗 425，目录 4，卷宗 19，第 1—2、4 页。

德文打字稿，原件，亲笔签名。

① 见第 202 号文件。

214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 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

1930年3月27日于上海

致中共政治局

亲爱的同志们：

我们在获悉今年应选拔50名学生进入莫斯科国际〔列宁〕学校学习以及组织局^①针对这一要求作出的决定之后，不得不提请你们注意以下几点：

（1）远东局不能同意你们不派同志到莫斯科国际〔列宁〕学校而在中国创办学校的决定。（2）组织局为论证该决定所提出的理由不能成立，这些理由是：①客观形势和领导干部不足使你们无法满足共产国际执委会的这一计划；②许多归国人员由于过去受拉狄克同志的影响而成了取消派和托派；③因此，如果同志们在中国学校里学习，他们将经常接触中国党的工作，从而不会直接受到国外错误政治倾向的影响，而党最后将得到比过去更多的有才干的工作人员。

关于第一个理由，我们不得不坚决反对，目前在苏联境外不可能有比在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中心的学校效果更好的学校。正是在莫斯科以文献及其他形式集中了国际工人阶级积累的全部经验，工人阶级运动各方面的专家可以根据世界各国大量的历史资

^① 指中共中央组织局。文件没有找到。

料从这些经验中得出一定的政治结论。我们正是将这些结论作为教育领导骨干的基础。正如你们清楚知道的，国际〔列宁〕学校对学生进行理论培训，而且他们在苏维埃国家的帮助下可以在实践中了解工人阶级各方面的生活，而这在其他任何国家都是无法做到的。

关于第二个理由：中国的客观形势当然将在客观上变得更为革命，因为我们党能保证提供越来越多的骨干来扩大和深化对群众的领导。但是中国非常缺乏的是什么呢？难道我们没有经常谈到中国缺乏有经验的领导者吗？但是最最缺的是，中国工人阶级传统上缺少可以引以为据的实际组织斗争的经验，尽管应该承认最近几年中国工人阶级积累了丰富的政治经验。由于没有可以遵循的当地的传统，因此我们在中国，如果说还不是完全也是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国际工人阶级积累的经验，正如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可以学习中国工农在革命斗争中取得的经验一样。因此，我们对革命教育应持广泛的客观的观点：我们觉得，那种认为由于缺少领导干部我们就得不让同志们去提高修养或者用一种效果较差的教育方式去取而代之的说法，只会损害中国革命将来的发展。因此这不是克服困难，而只会增加困难。

为了克服暂时的困难（如果存在这样的困难的话），你们可以像你们建议的那样在福建开办学校^①，那样的话，选拔 50 名学生不会成为大问题。你们在这个学校里可以对工农进行初级培训，以取代你们派往国际〔列宁〕学校的为数不多的干部。实际上这是提高你们的领导人和扩大中国党干部的现实途径。选拔优秀能干的同志并加以教育，这是一条很好的建议和党的任务之一。

关于归国学生成了取消派和托派的问题。这样多的人表现出这些倾向，当然很糟糕。但这并非全是受苏联托派的影响。这个

^① 可能指 1930 年初在红四军进入闽西后在那里开办的军事训练班。

问题同中国工人阶级缺乏经验和传统是分不开的，也同归国学生的社会出身分不开。虽然我们为了以防万一宁愿略为夸大这一因素的作用，但不应忘记，托洛茨基主义是一种处心积虑构筑的政治理论，它背离了正确的革命路线，不仅使中国学生，而且使一些建党更早的政党的领导人发生了动摇。如果那些学生不是在苏联学习，那也无法保证你们现在会去指责陈独秀之类的某个人，而不去指责某个卡尔·拉狄克。因此我们请组织局不必强调这一点，即使拉狄克可能是对某些归国学生产生过影响的人之一，你们还应该记住，中国的主观因素对不够坚定的人有着很大影响，这一点或许在某些逃兵身上甚至陈独秀身上也表现出来了。

远东局最后坚决要求政治局撤销组织局的决定，并着手挑选同志去国际〔列宁〕学校学习。学生应当逐步派送，因此第一批学员的派送不应拖延。经满洲的旅程仍非常艰难，因此必须分成一小批一小批地派送。因此你们更应及早开始派送学生，以便使他们能在暑假后开学前到达，暑假好像是8月底结束。但预计的人数和派送的最低数额决不应削减。

致同志式的敬礼！

远东局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579，第 1—2 页。

英文打字稿，副本。

215

陆定一、刘明佛和瞿秋白给希塔罗夫 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 政治委员会的信

1930年4月2日于莫斯科

致希塔罗夫同志
共产国际政治委员会

获悉共产国际政治委员会已作出决定，在派往国际共青团学校学习的8名中国学生当中，只有两名同志来自中国，另6人将从中国大学^①学生中挑选，我们认为，如有可能，这一决定^②应予重新审议。

我们建议，所有派往国际共青团学校学习的学生都从中国挑选（出于经费及其他考虑，学生人数可以减少或更改），理由如下：

1. 大学里的情况表明，只有很少数的共青团员是优秀的。在中国共青团干部问题很尖锐的时候，必须尽快派这很少数人回国。大学里表现不好，有派性的人不应派往国际共青团学校。

2. 当大学学生长期呆在莫斯科学习时，中国有为数众多的新干部需要学习；这些新干部都是工人，长期在白色恐怖猖獗的条件下进行斗争，作为中国共青团未来的干部更适合和更需要接受理论上的培训。

① 指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

② 文件没有找到。

3. 考虑到共青团有年龄限制，大学的共青团员在这里呆了至少已有一年，很快就要成为党员并退出共青团。要是他们再在国际共青团学校呆一年，情况更是如此。因此，我们挑选新的还能在共青团中工作很久的年轻人来这里学习不是更好吗？

从共青团干部流动的角度看，这样做是很有好处的。

共青团代表 陆定一、刘明佛
中共代表 斯特拉霍夫^①

全宗 495，目录 4，卷宗 22，第 36 页。

英文打字稿，原件，斯特拉霍夫为亲笔签字。

① 瞿秋白。

216

皮亚特尼茨基给佩列佩奇科的信

1930年4月4日于莫斯科

绝密

佩列佩奇科同志：

1930年2月24日第20/cc号来信^①收到。迟迟未复，深以为歉，但我得在此调查关于施文^②同志（第1号信）^③、中国共产党哈尔滨区委（第2号信）^④、刘少奇同志（第3号信）^⑤和中共满洲省委来信（第4号信）^⑥等情况。

中共代表们很了解刘少奇同志。他们认为可与他建立联系。东方书记处有关于满洲党组织的报告。在审议苏联驻满洲机关的工作问题时我也提出了联共（布）和中共组织联系的问题。这一问题已转交委员会^⑦，但委员会尚未研究。

我本人认为，联共（布）和中共组织之间应建立联系。但这一联系不应变为党委会的联席会议。因此，联共（布）各级党委应各派一名办事谨慎、党性较强的同志去做这件事。这些同志不应与中共各级党委联系，而应与专门指派的（每一组织一名）同

① 文件没有发表（见全宗495，目录19，卷宗132，第13页）。

② 音译，何人不详——译者。

③ 文件没有发表（见全宗495，目录19，卷宗132，第14页）。

④ 同上。

⑤ 见第199号文件。

⑥ 见第200号文件。

⑦ 看来指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中国委员会。

志联系。具体来说，最好先与这里都熟悉的刘少奇取得联系。

至于满洲省委来信关于书刊问题的第三点，这个问题要由东方书记处和〔国际〕联络部去解决。如有可能，将妥为办理。

阿罗洛维奇同志亲自跟我谈了中国报纸编辑问题，中央也就此事来过电话。中国同志和东方书记处选定的人选是普罗列塔里耶夫^①同志，该同志正随中央组织工作组在海参崴。我们把我们的意见向中央作了报告，但显然中央还没有批准这一人选，因为没有将这一情况通知您，这从我收到的阿罗洛维奇同志的来电^②中也可以看出。

皮亚特尼茨基

全宗 495，目录 19，卷宗 273，第 14 页。

打字稿，副本。

① 卜士奇。

② 文件没有找到。

217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 122 号记录 (摘录)

1930 年 4 月 5 日于莫斯科

47. ——关于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报告人：雅罗斯拉夫斯基、皮亚特尼茨基、别尔津、基萨诺娃、斯捷茨基同志）

(1) 同意皮亚特尼茨基同志关于撤销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并成立由基萨诺娃、别尔津、巴兰斯基、戈普涅尔和斯捷茨基同志组成的撤校工作委员会的建议。

(2) 决定——作为特别文件。

中央书记 斯大林

全宗 17，目录 3，卷宗 781，第 1、10、14 页。

铅印稿，签字为真迹复制。

218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
第 122 号（特字第 120 号）记录
(摘录)

1930 年 4 月 5 日于莫斯科

47. ——关于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报告人：雅罗斯拉夫斯基、皮亚特尼茨基、别尔津、基萨诺娃、斯捷茨基同志）。

(2) 责成伏罗希洛夫、皮亚特尼茨基和斯捷茨基同志研究关于接受中国工人入军事学校学习的办法问题。

抄送：伏罗希洛夫、皮亚特尼茨基、斯捷茨基同志——(2)。

中央书记 斯大林

全宗 17，目录 162，卷宗 8，第 129、131 页。

打字稿，原件，签字为真迹复制。

219

马马耶夫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处务委员会会议提交的报告提纲

1930年4月14日于莫斯科^①

秘密

中国的农民运动^②

提 纲

一、[19] 29年中国经济各行各业（外贸除外）全面不景气，到这年年底发展成极为严重的危机。从1929年12月23日交易所混乱开始，危机迅速席卷了工业部门。

二、中国的危机与农民群众骇人听闻的贫困化有关。

1929年中国各种主要粮食作物的收成没有达到（不同地区的）20—30—75%。

三、中国的危机使工人阶级面对着物价飞涨而大规模失业的事实。

四、危机极其充分地显示了封建资产阶级统治集团垮台的事实，说明他们不仅不能解决，也不能缓和中国革命面临的种种问题，首先是土地问题。

五、在危机的情况下，中国国内政治形势的特点是各封建军阀集团之间斗争加剧。中国即将爆发北方集团、阎锡山和南京集团之间的武装斗争。

① 日期是根据收文登记戳确定的。

② 文件上有批注：1930年4月15日全会会议的材料。报告的速记记录见第221号文件。

六、危机、内战、歉收、沉重的捐税负担——这一切使中国广大农民群众不是饿死，就是起来造反，要求废除赋税、徭役，消灭一切封建农奴制关系，平分土地。

七、1929年秋开始的农民暴动浪潮在持续不断地发展，席卷广东、广西、福建、江西、湖南、湖北、四川、河南、甘肃以及安徽、江苏、浙江、山东等省的部分地区。

上述省份的面积和人口为：

	面积（平方英里）	人口（万）	密度（每平方英里）
1. 广东	100000	3700	368
2. 广西	77220	1200	159
3. 河南	68000	3500	522
4. 福建	46332	2400	309
5. 江西	69500	2750	395
6. 湖南	83398	4050	468
7. 湖北	71428	2850	400
8. 四川	218533	5200	238
9. 甘肃	125483	700	59

也就是说，占中国18个省153万平方英里、46000万人口中的868894平方英里、25300万人口。

八、（1）游击运动的历史、组织和策略。

朱德、毛泽东、周文^①、彭德怀、方志敏、贺龙、邝继勋等队伍。

（2）中国红军正规部队的活动区

对这些地区的军事地理评价。

^① 在周文的名字下有注：土匪。

(3) 武装部队的人数和组织：

1. 红军正规部队。
 2. 起义部队。
 3. 赤卫队。
- 排、连、营、团、军的组织。

(4) 正规部队的构成：

1. 士兵的作用，
2. 农民的作用，
3. 盗匪的作用；
4. 工人的作用。

编制体系：

1. 战士，
2. 指挥员。

(5) 后方的问题：

1. 基地，
2. 粮食，
3. 服装（厂），
4. 经费，
5. 交通，
6. 武器（军械厂），
7. 卫生。

(6) 策略：

1. 集中兵力粉碎敌人和分散兵力以争取群众的问题。
2. 进攻策略和防御策略的问题。

3. 战斗：

- 进攻，
防御，
警戒（侦察），

行军，

追击。

(7) 党的组织

(8) 党的政治教育工作：

1. 组织，
2. 士兵委员会及其作用，
3. 政治工作的方法。

(9) 与农民的关系问题

(10) 苏维埃建设

(11) 华北的农民运动。

九、由于农民运动规模巨大，正规部队人多势众，有理由要求这些正规部队除了支持农民暴动外，还应夺取和保持大片土地以提高这些正规部队的战斗力，为进一步扩大而建立政治经济根据地。

这些任务应成为主要任务，我们和中共都应密切关注。

十、尽管工人运动高涨（1929年秋的罢工），仍应指出其发展速度落后于农民暴动的速度。

十一、农民运动向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以下任务：

- (1) 提出并解决建立根据地的问题。
- (2) 明确现阶段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纲领。
- (3) 在农民运动地区尽量扩大党的力量。
- (4) 明确苏维埃政权建设的形式。
- (5) 确立建设武装力量的原则，尤其应解决：
 1. 军队中政工机关的结构，
 2. 政治委员制度，
 3. 士兵委员会制度，
 4. 编制问题，
 5. 大规模武装农民的问题。

(6) 瓦解政府军并使个别部队投诚的工作问题。

(7) 工人运动与农民暴动结合的问题。

十二、我们在支持中共解决这些问题的同时应：

1. 向游击队活动地区派出五六名教官。

2. 保障中央领导与游击队以及游击队之间的无线电联络。

3. 加强对中共的经费支援。

4. 派一两名同志任中共中央军事部成员。

5. 派 15 至 20 名中国人去列宁格勒通讯学校上为期三四个
月的培训班。

6. 加快结束中国学员在步兵学校和军事学院的学业。

7. 结束托尔马乔夫学校^① 的培训班并把所有人派往中国。

8. 向步兵学校补充不少于 100 名学员，其中 60% 来自华南，
40% 来自华北。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573，第 14a—14r 页。

打字稿，副本。

^① 指托尔马乔夫军政学院。

220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处务 委员会扩大会议第 14 号记录 (摘录)

1930 年 4 月 15 日于莫斯科

秘密

东方书记处处务委员会会议 第 14 号记录

听取：1. —— 马马耶夫同志关于中国军阀战争和游击运动的报告。

决定：1. —— 在近期听取关于中国的总报告后再对马马耶夫的报告进行讨论。

2. —— 选举马马耶夫（负责人）、斯特拉霍夫^①、萨发罗夫、沃罗夫斯基^②、克雷莫夫^③同志组成委员会，制定党对游击运动、红军工作和苏区工作的指示。

委员会应在 5 日内提出其决议草案。

主席 米夫

全宗 495，目录 154，卷宗 415，第 108 页。

打字稿，原件，亲笔签字。

① 署秋白。

② 黄平。

③ 郭绍棠。

221

马马耶夫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处务委员会扩大会议上的报告

1930年4月15日于莫斯科

秘密

马马耶夫同志的报告《中国的游击运动》^①

我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让你们特别注意现在中国农民武装运动向我们提出的政治问题和组织问题。但我首先想谈一下对形势的总的估计，因为在这种形势下的农民运动是使我们更清楚更突出地认识这些组织问题和政治问题的一个最重要方面。

目前决定中国整个形势的是什么呢？我以为危机决定了这种形势。1929年全年出现的中国经济的全面不景气于1929年12月23日发展成猛烈的交易所危机。据许多资产阶级经济机构的评述，这一危机近似于全面混乱状态。例如，《密勒氏评论报》^②1930年1月11日一号就作了这样的评述：“随着银价降至本世纪近25年来前所未有的低水平并还将进一步下跌，中国经济机制已陷于混乱状态。”^③

危机始于交易所的混乱，随后发展为工业危机。从我所列举的两三个资料中可以判断这场危机的规模。

① 文件上有批注：1930年5月6日修定，马马耶夫。

② 1917至1941、1945至1953年在上海用不同刊名出版。

③ 见《密勒氏评论报》1930年1月11日第50卷第6期第200页。

危机从白银暴跌开始。现在白银在 18.5 至 19.5 便士 1 盎斯上下，与 1929 年 1 月相比银价下跌 30—35%。大家都记得，1913 年 1 盎斯价格为 $57\frac{1}{16}$ ，1920 年为 $61\frac{8}{16}$ ，1921 年为 $36\frac{14}{16}$ ，如此等等，按下降线你们可以看到，从世界大战前时期起到现在，白银下跌了 60%。

1929 年 12 月 23 日中国的银行危机、交易所危机造成的损失数字简直惊人。一天之内转手的股票近 3200 万两。从 12 月 23 日起几天之内转手的股票超过 1 亿两。

银价下跌的原因是什么呢？总的原因我们都十分清楚。白银是开采铜和锡的（副产品），因此其价值大为降低。近几年来中国积累的白银数量难以计算，加之除波斯、阿富汗和阿拉伯外，所有国家都改用金本位。最近两个月——11 月和 12 月——正好是印度支那改用金本位。

这一切都决定了银价下跌。但银价下跌和银行危机其实只是导致这场危机的更深刻的中国经济进程的外在表现。遗憾的是，我们在评估中国经济进程时没有掌握研究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同志们所拥有的统计材料。这并不是说，在中国问题上根本没有数字资料。数字资料是有的，但没有整理，没有加工。我们还没有建立起能加工中国所有分散的数字资料，并为我们提供经过科学加工的行情明细表的经济单位。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科研所的通报^① 不能满足这一要求。因此在评估中国经济形势时暂时只能根据一些未经综合的实际材料。例如，据缫丝业报告，长江下游有近 104 个工厂关闭。广东倒闭的工厂达 30—40%。火柴业简直岌岌可危，说火柴业由于我下面提到的一系列原因已彻底垮台并非危言耸听。磨粉业开工率为 40—50%。制革业的情况也一样。采

^① 中国问题研究所通报于 1928 至 1932 年间出版。

煤业中，山东、山西、河南等省属于中国资本的矿山几乎全部关闭，只有属于外国资本的抚顺煤矿和开滦煤矿欣欣向荣。我不想用一些引证和数字让你们厌倦，只简略地谈一下中国目前的经济形势。由于这场危机，商品流转额也下降了。这主要十分明显地表现在进口方面。1月份，上海按1928年旧的关税率计算少收海关规费19%。天津外贸额少收20%，等等。国内贸易完全瘫痪。大动脉津浦铁路在最近四五个月中停运。阎锡山、石友三等人数众多的部队加上蒋介石的部队使这条铁路停止了一切货运。对危机后中国经济形势的总的评估大致如此。我再说一遍，这种形势近似于混乱状态。但是我们关心的不仅是危机这一事实本身，而且依我看来是一切为危机所加剧的问题和我在这里简单提到的这些问题，因为这场危机所显示的中国经济的这些特点将有助于我们弄清对中国形势的总的政治评估。首先，这是殖民地剪刀差问题。危机更加突出了这个问题。我手头有独裁者^①蒙特哥讲话的摘要。“印度、澳大利亚和中国渣打银行”^②提供的殖民地原料价格下跌的数字如下：茶叶下跌20%，黄麻下跌20%，锡下跌19%，棉花下跌24%，羊毛下跌32%，等等。众所周知，殖民地剪刀差的实质是殖民地原料价格与进口工业品价格相比相差悬殊。

其次，危机显示出（这一点尤应加以强调）中国工业非本国化的过程。如果说迄今为止可以断言中国经济的命脉（金融、交通、采煤、冶金等行业）由帝国主义控制，而民族资本掌握轻工业的话，那么现在危机显示出中国连轻工制造业也非本国化的特征。例如，烟草工业在竞争的压力下，在以“南洋兄弟股份公

① 原文如此，应为董事。K. T. 蒙特哥爵士居银行董事会10名董事名单之首。

② 印度、澳大利亚和中国渣打银行1853年成立于伦敦。它在中国广州、汉口、香港、上海和天津设有分行。

司”^① 等美国大公司为代表的美国资本的压力下落入了外国资本之手。火柴工业不仅非本国化，而且干脆倒闭，因为瑞典火柴辛迪加的竞争给予了致命打击，以致华南——广州和汕头——的工厂都全部倒闭。对中国工业这一非本国化过程应该特别加以强调，因为这一过程使我们有可能对南京政府吵吵嚷嚷、大肆宣扬的那些改革以及对中国的那种“统一”作出评价。

在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发生危机的同时，殖民地经济成分——农业——也发生了危机。

1929年，除河北省外并未发生任何大的天灾——旱灾或水灾。但收成情况很糟糕，当然这是因为农民受到社会经济关系的压迫，并且这种关系缓慢而必然使他走向灭亡。南京政府工商部机关刊物《中国经济公报》^② 提供了收成的数字。我按地区分列了这些数字。满洲地区情况较好^③，在西北省份陕西小麦少收45%，大麦少收55%，在华中的河南省小麦收了37%，大麦收了28%。产稻省份稻米少收30%。因此，中国今年各主要粮食作物与正常年景相比（不同地区）少收30—70%。“正常”年景这个概念本身在中国是很不明确的。

对中国总的经济形势的这一评估使我们可以断言，中国正处于近似全面混乱的极其严重的危机之中。这一危机说明了中国阶级力量的配置，它告诉我们，中国形成的统治集团实质上是彻底的破产者，它解决中国革命的任何问题都无能为力，首先它解决不了农业问题。一方面无力解决这些问题，另一方面统治集团本身存在我将提到的种种矛盾。这就使我们得出如下结论：中国的

①（英国）南洋兄弟烟草公司。

②《中国经济公报》，周刊，1921至1935年在上海出版。

③见《中国经济公报》1930年1月25日第16卷第4期，第47—48页。在1929年下半年和1930年第一季度的刊物中没有提供其他省份收成的数字。

统治阶级、统治集团正处于危机之中。统治集团的危机，这就是实质之所在。这一危机表现在什么地方呢？首先表现为参加统治集团的是哪些人？我以为，从1927年12月广州暴动失败后起，连以前动摇的城市小资产阶级也投入到反动派的怀抱里，因此参加这个集团的有城市小资产阶级、封建地主、富农、军阀、资产阶级，这个集团是由帝国主义者领导的。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了什么变化呢？集团内部的矛盾又是通过什么途径发展的呢？这些途径如下。统治集团内部基本矛盾表现为各封建军阀集团之间的斗争。为了简单地作出评估，我在这里列举一些事实。1929年初，在国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①期间，南京集团和广西集团之间爆发斗争。9月，张发奎与广西派和湖南某些将领结成联盟反对南京集团。10月，冯玉祥集团和南京之间斗争激烈爆发。他们之间斗争的结局是任何一方都未取得胜利也未遭到失败。这场斗争要推后一段时间才能结束。

其次，11月发生了好几起造反事件，先是石友三占领浦口，后又向徐州退却，后来又是唐生智等人起事。最后，是现在由阎锡山领导的华北封建军阀集团发难。这个华北集团是反对南京的。我不想说，华北集团是团结一致、坚强无比的。阎锡山在反对南京集团的斗争中将不得不解决这一集团内部的种种矛盾，首先是冯和阎锡山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参加这一集团的有57位将领，这当然无助于集团的牢固。阎锡山还得解决政治问题。华北集团与南京之间武装斗争进展缓慢的原因就在于此。阎锡山不得不解决政治问题，因为20世纪的任何一位将领要想起一点作用，都必须有自己的政治纲领。他需要有政治口号。这是些什么口号呢？这些口号可以是极左的，也可以是极右的。但是不管这些将领打的是些什么口号，这些口号决不会改变他们的政治和社会的阶级本

^① 国民党三大1929年3月15至18日在南京举行。

质。改组派以及同英国、日本等国的谈判也在寻找这一政治纲领的过程中起了作用。很难说寻找这一政治纲领的问题将如何解决。我以为有两种可能：或者是沿着津浦铁路大动脉作为主要作战方向爆发战争，任务是夺取南京；或者是斗争以某种妥协告终（我认为有这种可能），这种妥协将导致在华北建立由日本庇护并由英国积极支持、但遭到美国反对的独立政府。

阎锡山接下来要解决的问题是张学良的问题。这个问题很复杂，何况张学良本人现在是一个政治上不积极的人物。他不是被行刺，被枪杀，被下毒，就是重病缠身，大致就是如此^①。张学良由于种种原因现在在满洲不起指挥作用。奉系集团总的来说不想卷入全国性冲突。张学良集团形式上签订了支持华北集团的协定，但它同样也与南京形式上签订了支持南京政府的协定。张学良及其从中东路调来的全部装备精良的15万大军和驻扎在山海关地区的军队在解决当前冲突中举足轻重。

这就是现在阎锡山面临的主要问题，这些问题也搞得我们不十分清楚这一冲突的具体表现形式，虽然这一冲突的实质没有引起我们的任何疑问。

华南的斗争相当激烈。广西派和张发奎都向北海挺进。广东派的兵力也调往那里，那里的事态在扩大。这个地区紧邻东京湾。

其实这些就是统治集团内部基本矛盾即各个派系之间矛盾的具体表现。我认为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不只是这些，尽管各个封建派系之间的这些矛盾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当然，资产阶级各个派系之间也有斗争。

例如，改组派。我认为，改组派成了反对南京政府的民族改良阵线，他们在这个阵线中联合了中等工商资产阶级和部分城市

^① 马马耶夫依据的是未经证实的传闻，这些传闻谈到张学良在政治上暂时表现消极的原因，在一次即将爆发的军事政治冲突中，张选择盟友时举棋不定。

小资产阶级。这并不妨碍这个民族改良阵线，就像共产国际^① 和中共政治局^② 对它所作的正确评价那样是变节的，实质上是反对革命的阵线。还应指出资产阶级和封建军阀之间的斗争。但资产阶级内部以及资产阶级和封建军阀之间的矛盾是不起决定作用的，非主导性的。主导性的斗争仍然是各封建军阀集团之间的斗争，中国资产阶级是受这些封建军阀集团支配的。这就是我们看到的总的政治形势。

但是，中国银行危机和工业危机突出表明的基本矛盾是以统治集团为代表的反革命阵营与工农阵营之间的矛盾。

工农阵营又是怎样呢？很遗憾，我在这里无法详细地来谈工人问题。工人问题应作为一个专门报告来谈。危机使成千上万失业工人流落街头，危机提高了生活费用，危机使工人阶级由于失业和工资低廉而面临饿死的危险。白银行市一年之中下跌了30—40%，这意味着最低生活费用大幅度提高。这一切迫使工人阶级进行顽强的斗争。1929年，不仅在上海，而且在中国所有的工业中心城市罢工斗争都加强了。

经济斗争迅速发展成政治斗争，但仍应指出，与农民运动相比，工人运动的发展速度还是缓慢的。

危机格外猛烈地打击了农民。粮食作物少收30—70%，这实际上是由压迫中国农民的一切封建残余的压迫造成的，使农民不是慢慢地死去，就是为土地而奋起斗争。争取废除一系列徭役、不堪负担的赋税和封建农奴制关系的斗争最终使农民走上了夺取土地的斗争。对中国这方面的形势应该这样说：今天农民已拿起武器，奋起为解决土地问题而斗争。农民要求平分土地。我担心我

① 指《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给中共中央的信》（见《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集）》，第197—198页）。

② 见第36页注④。

不能更详尽地加以论证，更突出地加以强调、证明和说明这一点，因为我们掌握的材料并不很多，但是在我看来，认为农民已自己动手来解决土地问题的看法是不容置疑的，是非常清楚的，我对此毫不怀疑。农民起来解决土地问题，这就是问题的实质。

既然情况如此，我们应该认真地来评估农民武装运动并指出这一农民运动向我们着重强调了哪些问题。我先谈一般问题，谈工人运动与农民运动相结合的问题。独立的农民运动，没有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没有无产阶级这一领导者的领导，永远也解决不了土地问题。这样的运动注定要走向灭亡。因此，首先应该提出关于工人运动与农民运动相结合的问题。这将是我们在里，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内应予解决的第一个具有深刻原则意义的问题。这个问题应予解决。由第一个问题引出的第二个问题，是由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从组织上掌握武装游击运动。如果中国共产党不能掌握这一运动，不能在政治上引导它前进，这一运动不可避免地要遭到失败。我本人持这样的信念（我的下一个报告将来论证这一点）：中国共产党已认真地着手领导游击运动。中国共产党总的来说执行着正确的无产阶级路线，把农民运动置于自己的领导之下。当然我在这里也要谈及缺点和不足。这一切都是不可避免的，但主要的是：党已认真地着手领导游击运动。

但这样的游击运动还向我们提出了另外一些大问题。

现在就这一运动的组织形式谈几句。武装游击运动现在有两种主要的形式。首先是工农红军的形式，即正规军的形式，其次是地方游击队形式，大多以村为单位，较少的情况下以乡或县为单位，在中共中央的工作报告中这样的游击队称作“暴动队”。

暴动队是有组织的武装农民队伍，其任务是在某一个村子里进行革命，当这个村子出现苏维埃政权时，这支队伍就成了苏维埃政权的武装支柱。赤卫队是什么呢？它与“暴动队”有什么区

别呢？这很难说，因为材料没有提供这样的答复。我们只得到报告说，赤卫队看来与暴动队具有相同性质，即完成地方上同反革命斗争的任务，完成保卫该地区苏维埃政权的任务，等等。据说，赤卫队与暴动队的区别是，它装备的是五发步枪，而暴动队目前则只有长矛、梭镖和锄头，等等。赤卫队就其技术装备来说要好一些。但是看来暴动队和赤卫队仍然都具有局部性质。由共产党组建的红军与它们不同，已不再具有狭隘的局部性质。红军的组织、历史及由中共中央军事部制定的策略和政治方针都说明了这一点。红军及其历史又是怎样的呢？我主要来谈谈朱德和毛泽东的第四军。

1927年9月3至4日南昌暴动部队在汕头附近失败^①后，第25师的残部在朱德领导下到达韶关地区，在这里加入了范石生的第16军，即现在的第5师。范石生接受了他们，把他们改编为由朱德指挥的一个团，补充了这个团的兵员的装备。朱德感到自己的地位相当稳固，就离开了范石生进入山区，自称红军部队。这是第4军的第一个组成部分。

这个军的第二部分是由张发奎的警卫团组成的，这个警卫团在1927年8月1日南昌暴动时由武汉赶赴九江。这个团的骨干中有很多共产党员，在开赴九江途中获悉张发奎并未参加暴动，因此转赴湘赣边界的山中，在宁冈地区与朱德的团会师。这个团是由毛泽东同志领导的。这两个团就构成了第4军的基本核心，第4军大约在1928年3、4月间仍留在井冈山地区。稍后所谓的湘南军也参加进来。湘南军是如何组建的，我不太清楚。显然它是1927年5月占领长沙城的那几支农民士兵部队，他们后来在1927年5月20日政变^②时在长沙部分被击溃，之后进入山区。

① 见第9号文件。

② 指武汉政府部队的一个指挥官许克祥在长沙发动的反共政变。

因此，湘南军、前张发奎警卫团和朱德团一起组成了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有第28、29、30、31、32、33团，总共6个团。

1928年8月以前时期，政府军和第4军互有胜负。朱培德、陈诚、王均、许克祥、范石生等部队有时多少协调行动，先后试图歼灭井冈山地区的武装力量。应该指出，在这期间第4军经历了许多曲折，打了许多仗，有时打胜仗，也打了许多败仗。不管怎么说，第4军在这些战斗中经受了锻炼。应该说，这一时期一些战斗有时打得十分英勇。我记得这样一件事：政府军约11个团逼近永新城，那里只留下朱德的一个团，因为其他的部队都去湘南了。朱德团不得不保卫通往永新和永新通往井冈山根据地的山路。

当地的同志们谈到，他们竟用这个团把敌人包围在山谷里。周围村子的农民立刻全都被动员起来，他们围住了敌人，开始吹号、敲鼓、放火炮，闹哄哄地向敌人进攻，总之，他们使敌人吓坏了，敌人被包围了好些天。不敢走出山谷，向包围他们的人数众多的队伍进攻。这支队伍从数量上说确实众多，但战斗力却不堪一提。敌人通过多次侦察之后确认包围他们的队伍根本微不足道，这才疯狂地冲出包围圈。下面是对了解中国游击队战斗环境很有意义的战斗生活一页。省政府的部队1929年初把朱德赶出井冈山并尾随其后，把他挤往赣东南。游击队在这里，经过几次惨败后，在大柏地附近决定进行战斗。地方上的同志们是这样描述的：“部队从下午3点坚持到第二天中午，终于击溃了李时初^①的队伍。俘虏了两个团长，缴获了800多支步枪，抓了同样数量的俘虏。这场战斗是红军在多次失败后的最后一搏，战斗中我们的部队打垮了强大的敌人。指战员们得不到支援和供应，用石头、树枝和没有子弹的步枪同敌人肉搏，最后终于取得了胜利。”^②

^① 应为刘士颜，此处是音译——译者。

^② 文件没有找到。

这场战斗被看作第4军战斗生活中光辉的一页。在1929年间第4军多次在江西、福建两省来回运动。很难确定行军的先后顺序，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现在该军的影响已遍及赣南、湘东、赣西南和粤东。

简单地说，第4军的历史就是这样。

除这支部队外，还应加上在海陆丰地区活动的第2军和第3军。这两个军的军长姓名及军的历史我们不清楚。看来这是1927年底1928年初海陆丰共和国^①存在时期组建的部队。也可能是广州公社失败后从广州突围出来的教导团残部。

值得一提的还有彭德怀的第5军，它与第4军组建于同一时期，即1928年初。它在株萍铁路^②以北的平江地区活动，控制了赣鄂、湘赣边区。

还有贺龙的第6军。南昌暴动部队在汕头附近失败后贺龙带了一些人突围。他作战的地区是北至长江边上的巴东、东南至洞庭湖畔的常德的鄂西南和湘西北。

还应提到周文^③。周文是个土匪。我们从北伐时期就认识这个多少还体面的土匪。我们的同志参加的一个军在北伐时受命与他取得联系并向他提供支援。我以为，这个周文现在受共产党的影响，至少他指望依靠朱德和毛泽东。大家在地图^④上看到的这些红色小块不是控制区，而是在这些地区活动的部队，因为我所知道的控制区是：在中原100到150万平方英里中，在18个省中，暴动席卷了10个省，面积为86万平方公里，人口约为2.5亿（全国人口4.6亿）。我担心这个数字太大，因此很难现实地感受

① 指海丰县和陆丰县（广东省）1927年11月7日成立的以彭湃为首的苏维埃政府。

② 深赣铁路的一段。

③ 音译——译者。

④ 可能指会上作报告时展示的挂图。

中原和华南运动的宏伟规模。这里还要加上一个甘肃省。甘肃现在出现了特殊的大规模民族迁徙浪潮。由于冯玉祥镇压了回民和汉民的起义^①，成千上万失去家园的人前往新疆省。新疆现在的形势是：新疆的军队都调往巴里坤地区以阻挡这一汹涌的人流。目前新疆出现了粮食危机和交通危机。

农民运动及其规模说明了中国正在进行土地革命，农民奋起夺取土地，牢牢咬住土地不放。

从军事地理的角度来看，红军活动的地区都是多山的边区，装备精良的大部队难以达到那里。我以为即使由德国军官鲍尔为蒋介石组建的模范师也很难击溃红军。

那里山高难行，大炮都得用手拉。大家可以设想一下，在宽不到半公尺的山间小路上能拉什么炮呢？我本人走遍了这些地区，从未见过这种小路。在这种条件下使用技术装备，使用现代化军队的技术装备十分困难，而蒋介石的军队装备非常精良。这一地区四周紧挨着长沙、武汉、南昌、九江、汕头这样的工商业中心，长江中游的港口，等等。可见农民暴动已扩展到边缘地区，临近工商业城市，紧靠近这些城市。

应该特别强调指出这一地理因素，因为根据这一因素可以提出工人运动方面的任务以及中国共产党的策略。我以为，这一点非常重要。除了我在这里提到的这几个省以外，还应该提到江苏省。江苏省的武装暴动尽管规模不大，但数以百计。还应提及河南和山东，那里的“红枪会”暴动遭到镇压，但人心浮动，随时可能发生暴动。

这些队伍是怎样组织的？朱德和毛泽东的那个军是怎样组织的？维什尼亞科娃同志最近在《中国问题》杂志第2期上发表的

^① 见马子扬（音）：《甘肃的回民起义》，载《中国问题》杂志，莫斯科1929年第1期，第380—402页。

文章^①说，组建了一些小的部队、大的部队、中的部队等等。这样的部队体系过去就有过。现在毛泽东和朱德放弃了这种组织形式，他们做得很对。他们把部队改编为正规军，基本上采取了过去国民革命军的编制。这些编制是适合战区的条件的。现在1个连有3个排，排又有3个班，团有3个营，1个军有6到8个团。毛泽东的部队有6到9个团。1个团大约有1000到1200人。团除了有步兵外，还有机枪掷弹筒分队，即与北伐时国民革命军一样。因此，朱德的那个军就其组织和技术装备来说接近于过去国民革命军的一个军。没有炮兵，但当年的国民革命军也没有很多炮兵，一个军只有2到4门大炮。这里应该强调指出的是，第4军就其技术装备来说比现在分散驻扎在华南各省的地方部队差不了多少。当然应该考虑到，这些省的部队有基地，有正常的供应，而红军却没有。

现在我来谈谈武装游击运动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兵员补充体制问题。我们说，中国正在进行土地革命，农民牢牢抓住土地不放。农民运动的实力取决于由哪些人参加这些队伍。这个问题对于中共和我们来说都十分复杂。首先谈谈朱德和毛泽东那个队伍的情况。尽管第四军那两个团早已不存在了，但现在绝大部分骨干仍由士兵组成。这一点很重要。第二点：据地方上报告，这个军的第29团完全是由农民补充编成的。这个团很不稳定，在一次战斗中被击溃后逃散了。在这个军中自觉去解决土地问题的农民占多大的比重呢？这方面的数字互相矛盾。一方面，同志们说，他们动员青年，鼓动他们自愿参军，通过农民组织吸收农民参军。毫无疑问，吸收农民参军的事是有的。我昨天刚看到一份材料说，据一位传教士说，一支听说由留学莫斯科的中国学

^① 见B.维什尼娅科娃：《1929年中国的农民运动》，载《中国问题》杂志，莫斯科1930年第2期，第157—180页。

生^①指挥的在百色活动的军队，其正规部队中有不少是以前被俘的士兵，抵达百色后又动员了农民。我不知道他是否把这些农民留住了，因为他的部队被击溃了。我想，根据地方同志写来的指责农民部队和赤卫队的某些材料，可以断定农民成分并不像工农军队中应有的那么大。农民只限于解决村范围的狭小局部性质的问题。这就是过去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农民固守在一定的地区，解决自己的问题，到此为止，不懂得只有不断扩大地域，吸收越来越多的农民参加，才能保证取得成功。这一点现在也很突出。我不敢断言，但我觉得，红军中农民成份比较小。这个问题应该抓紧解决，因为无论我们怎样鼓动（我们在国民革命军中很会鼓动），士兵仍然是不稳定的、失去阶级性的分子。部队中也有土匪分子。例如，周文就是。贺龙的部队与毛泽东的部队不同，有大量农民，但他们主要是受士绅影响的各种秘密帮会的成员。至于这支部队中的工人，很遗憾，我没有这方面的材料，而要解决许多问题，这方面的材料是很宝贵的。我们知道，1926年农会中的工人和手工业者人数很多，达14%。现在手工业者参加革命部队的情况如何，我们不清楚。我们过去有这方面的经验，我们曾借助于党的影响竭力吸收香港的罢工工人参加部队。但当时我们没有完成这个任务。

诚然，当时我们组建了纠察队，武装了参加纠察队的工人，也就是说工人阶级为了解决与它切身利益有关的问题拿起了步枪，但是工人们不知是凭其阶级嗅觉，还是出于中国“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种种成见而不参加正规部队。我认为，应该向工人阶级提出他们最明白易懂的任务，他们才会参军。他们接受了我们的影响，就参加了纠察队。这个问题可以解决，但这个问题现在还没有通过中国的游击运动得以解决。

^① 何人不详。

关于这些部队的成分就讲这些。我不清楚，我在多大程度上鲜明地提出了这些问题，但我觉得，在这方面做农民工作的问题至今还解决得不够。部队主要通过瓦解敌人来取得补充。瓦解敌军的工作开展得很广泛。不久前，即大约一个半月前，海陆丰地区政府军有两个团^①投向游击队。这部分骨干也就充实了游击队。

在物质待遇方面，指挥员与士兵是一样的。他们每天的伙食费是15个铜板。如果有钱，就发3到5元饷，如果没有钱，就不发。

指挥员基本上是从政府军的中下级军官中选拔。也曾尝试在井冈山开办军校来培养自己的干部。

大家很清楚指挥员问题的重要性。党应该贯彻从工人中培养指挥员的明确方针。因此还应该采取一些措施，把在我们这里学习的军事骨干派往那里去。

后方问题，根据地问题是如何解决的呢？井冈山根据地是最强大的根据地之一，他们在这里收集和贮藏食物和金钱。根据我参加过的历次战争的经验，根据地问题那里解决起来相对要容易些。这不是一支现代化的欧洲军队，欧洲军队在行军时要带着长长的笨重的后续部队。这不是一支现代化军队，对于现代化军队来说整个国家都是后方，后方工作不正常，这支军队就无能为力。那里的情况则不同。

北伐时期我们作战时有一套程序：我们前进到哪里，哪里就是我们的后方，哪里就是我们的根据地。在华中各省这个问题容易解决。我们开到产稻区，就收购稻米。夺取敌人的仓库，夺取他们的基地，就有了枪弹和炮弹。跟着我们前进的兵站其实毫无用处，它对我们提供不了任何帮助。他们通过向士绅和商人征税来解决经费问题，而且在一个地方规定了税额——1万收1百。我

^① 关于这两个团的材料没有找到。

认为，这个标准很“公道”。也许这是例外，而不是总的方针。中国共产党总的方针是正确的：既然触动了士绅，那就把全部负担加到他们身上去。毛泽东的那个军要求1个月收5万^①，他们毫不费力地收上来了。

运输问题。解决运输问题靠人力。在部队中应该有从事运输的辅助人力，辅助人力也用于战斗中部队减员时，靠这一辅助人力来加以补充。

装备问题怎样解决？装备的来源当然是敌人。游击队如果打胜仗后没有缴获枪支，那就不算打胜仗。这种看法看来是对的。要是打胜仗后缴获了枪支，那才是真正的胜利。

医疗问题是十分严重的问题。没有药品。但是看来他们在解决战地医院和疗养院问题上不无成功。不错，守卫红军疗养院的问题有困难，但他们还是把这些红军疗养院建立起来了。

他们把从敌人那里缴获的装备分给农民（在这方面他们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因为考虑到农民已经起来夺取土地。我们指示用枪支武装赤卫队。他们在留够自己需要的最低数量的枪支后，把剩下的分给各村，从农民中组建队伍，教他们学会使用枪支，把装备给农民留下，一旦需要，农民就会发起暴动。

朱德部队的人数在2、3万之间，也就是说，他们即使被击溃或被迫撤退，也能留下2、3个团的骨干，但是他们占领了某一地区，就把农民群众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在取得胜利时部队的人数立即通过吸收农民而扩大。

第四军中党组织的情况如何？党的领导问题如何？很遗憾，写关于军队组织材料的同志关于党组织现状写得不很鲜明，不很明确。我不清楚这一党组织结构的详细情况，我只知道领导朱德和毛泽东身边的部队的是总前委，毛泽东是这个委员会的主席。这

^① 大概指中国的元。

个总前委由中共中央军事部任命。政工机关和党的机关是如何组建的，我不太清楚。他们的军部有政治部，但是团里有没有政治部，我不知道。有前委，有区党委，游击区有省委，省委统一领导本省的游击运动。但是这些党组织是如何活动的，没有详细的材料。由于没有详细材料，我认为这些组织还没有完全成形，我们应该向中央军事部发出相应的指示。我担心搞错了，但我觉得，政治部和支部为士兵委员会制度所取代了。士兵委员会由连队全体大会选举产生，由5到10人组成。连队全体大会选出代表参加团的会议，由这个会议选举执行委员会。军的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军的执行委员会和5到7人的主席团。士兵委员会的职能不仅是管理方面的，士兵委员会还干预指挥员的任用。这是十分严重的弱点之一。士兵委员会的任务还包括政治工作。当部队进村时，他们带了梯子、毛刷和水桶，有时还带了写好标语的纸张，更多的时候不带纸张，爬到墙上，在高处刷上口号，这样谁也擦不掉这些标语。他们要是写错了字，就会受到严重的处罚，几乎要加以处决。他们刷标语，有时画像，擦掉国民党的标语。一部分人这样做，另一部分人这时在街上鼓动，开展群众性鼓动工作和个别教育工作。的确，军部有宣传队，他们也做这项工作，但是士兵委员会的职责是进行这种群众性的鼓动宣传工作。我再说一遍，关于党对军队领导的情况，士兵委员会和党的分工，我们没有确切的直接的材料。因此我的结论是，我们在给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应特别强调指出，党应在军队中建立起严密的党组织体系，党不能消失在群众之中。应该把我们在军队中建党的经验告诉他们。值得注意的还有士兵委员会的问题。党越是迅速掌握士兵群众，士兵委员会越是尽快取消，变成普通的、起提高士兵政治水平作用的社会团体就越好。

政治委员的问题同样提得不突出、不明确，也就是说提得很不好。我不知道他们那里是否有政治委员。在毛泽东的军里有政

治委员，但其他部队有无政治委员我不清楚，因为有的地方说有，有的地方说没有。说有政治委员的地方，也感觉不出这些政治委员的作用。我们应该告诉党，政治委员是一把指向指挥员太阳穴的手枪。政治委员是党和革命政权的代表。应该特别有力地向党强调指出对政治委员作用的这种理解。政治委员制度是党为了无产阶级和穷苦农民的利益在政治上进行革命的工具之一。同志们有时以为，如果军官们站在革命一边作战，如果农民队伍起义了，那么他们的革命精神，他们对革命的忠诚就有了保证。但生活中已经出现了军官叛变、富农影响军队的例子。

我知道这样一件事：第4军一个团的营长^①在担任先头部队时带了4个步兵连和1个机枪连投敌了。诚然，后来步兵连都跑了回来，但机枪连丢掉了。还有一个例子：南京政府有一个暂编第一师。它由大家都知道的前国民军第二军的部队和军官组成。这个师驻扎在鄂西北的襄阳地区。这个师完全投到我们一边来了。投诚是通过党委和将领们达成协议进行的。将领们的方针是显而易见的：他们指望照过去的做法，同共产党取得联系后，能保证他们得到苏联提供的物质援助。同志们犯了一个错误，达成了这个协议。但他们犯了错误后应该立即控制士兵，依靠士兵在途中收拾掉高级军官。这个任务应该由政治委员和士兵委员会来完成。

共产党政治局纠正了同志们的错误，指示^②他们立即控制士兵群众，通过士兵委员会瓦解他们，以便推翻旧军官和掌握群众，把他们变成真正的正规的工农红军。如果他们完成不了这一任务，如果不撤换军官，那么这支部队就会发生动摇，背叛革命。

① 何人不详。

② 指1929年11月7日中央通告第五十六号《目前中国士兵状况与我党兵运的策略及工作路线》和《为解释中央五十六号通告而作》（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第507—529页）。

这就是我对党的组织，包括红军中的政治委员制度的看法。我们认为我们应该在将要作出的结论中也谈谈这一点。这个问题应该详尽地、仔细地加以研究，深入浅出地加以解释，以特别指示或指令或材料的形式转发给他们。我已经谈了士兵委员会及其优缺点。我不怀疑，士兵委员会作为瓦解敌军的手段是好的，但士兵委员会作为组建新红军的手段则不太好。

与农民的关系问题。基本事实不容置疑，整个游击运动，尤其是朱德和毛泽东那个军以及其他正规部队，是进行土地革命的武力表示。这支力量之所以存在，所以发展壮大，所以不可能被摧毁，是因为它依靠农民运动中奋起完成土地革命任务的广大群众。但这并不排除有必要谈谈这一运动的具体缺点和危险。正规军有时取代党，正如党往往取代农民群众团体或融化在这些群众中一样。这是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缺点。河南一度有1万人起来暴动，但我们获悉那里共产党员就有1万人。海陆丰地区的经验告诉我们，凡是有苏维埃政权的地方，凡是有党组织的地方，同志们认为就不需要任何社会团体。党试图取代群众性独立活动的机构。这种情况现在也可以看到：党试图代替农民来进行土地革命。这是一个很大的缺点，这个缺点发展起来，一有机会就会排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应该特别强调这一点，对这个问题应该作出相应的指示。

苏维埃建设的情况如何呢？具体情况如下：占领一些县城以后，首先把那里的政府机关摧毁，烧掉地契，农民开始打倒地主，分配土地。接着在村民大会上选出苏维埃及其执行委员会。应该说，现在没有发生以前1928年运动初期的那种流氓无产者的做法，那时什么都烧掉杀光，右派左派统统处决，故意把商人搞得破产，使他们变成无产者，制造出无产者的骨干。

苏维埃政权建设有的地方情况很复杂。例如在湘赣边区，本地居民和所谓的“外来人”即不久前从别省迁来的人之间斗争激

烈。

常有这样的事：苏维埃政权得到外来居民的支持，外来居民就对本地人进行报复、杀害他们。要是苏维埃政权得到本地居民的支持，那么他们就杀害外来人。还应该谈一下富农。开始时苏维埃政权使人很害怕，现在对于富农和豪绅来说并不太可怕了，因为富农和豪绅利用我们斗争和建设中的许多缺点，往往热情地欢迎苏维埃政权，欢迎红军，建设苏维埃，当然从中获取好处。富农们常常掌握主动，控制苏维埃机构甚至控制党。关于富农利用苏维埃政权的口号，富农从贫雇农手中夺取建设苏维埃的主动权的说法有很多。我们几乎在每封信中都作了这类指示。富农、士绅并不太害怕苏维埃政权，连外国报刊也谈到了这一点。他们学会了利用苏维埃政权，利用在规模如此宏大的运动中自然会出现的缺点和不足。

我从这一点中得出如下结论：对于我们向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同志们所作的指示^①应该补充一份更详尽、更全面的材料，说明在完成我们向中国共产党提出的领导土地革命的任务的时期里，什么是苏维埃政权，什么是苏维埃政府。但是应该特别明确地作出关于富农的指示。关于富农的二月来信^②应该加以发挥，指出富农是我们的敌人，决不能同他们结成联盟。对党内的富农情结应给以坚决打击。

还应该谈一谈策略问题。我在这里只非常简单地谈一下。中央委员会指示集中力量歼灭敌人，或将其分散开来以争取群众，也就是说，我们的组织应该十分灵活，用一个拳头打击敌人，必要

^① 可能指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关于组织苏维埃政权问题的决议（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第390—412页）。

^② 指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就农民问题给中共中央的信，这封信批评了中共对富农的政策。信上标明的日期是1929年6月，而不是2月（见《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集）》，第179—189页）。

时能分散开来，避免失败，分成小股部队行动，发动农民进行斗争。我担心正规军部队不会这样灵活，因为这些部队中的农民觉悟不够高，因为农民只有在对他们做了一定工作后才能分散到边缘地区去，因为农民熟悉地方，因为分散开来的农民会重新集中起来，这是有把握的。对士兵不能这么做。但当正规部队和农民队伍协同合作时，他们能取得巨大的成功。

中国同志告诉我们说，他们配合暴动部队进行活动，派暴动部队去骚扰敌人，在敌人后方作战，破坏交通线，夺取辎重，等等。只有在确信敌人已疲惫不堪，士气低落，认为确实落入包围圈时，红军才出击，消灭他们。

明智的好策略。现在谈谈防御和进攻。向同志们提供一个前国民革命军的出色例子。在1923至1927年的整个华南战争史中我只知道一个这样的例子，即黄埔军校的一个团转入防御。但这是一个例外。国民革命军受的是进攻学说的教育，不断取得胜利。进攻，进攻，再进攻，这是红军的准则。这并不是说在个别的战役中不能转入防御。当然是可以的。地方上的同志对进攻策略和防御策略争论很多，但是他们在这场争论中搞了许多烦琐哲学。

如果从塔斯社的报道来看，华北的农民运动失败了。其实它只是暂时沉寂了，随时都会重新爆发。这方面的基础很充实。

对上面我简单提到的农民运动向我们提出的问题还应补充一个问题：夺取根据地的问题。

既然大家都同意应该组建正规军，因为正规军是运动的骨干和胜利的保证，那么应该给这支正规军一个根据地。我认为，这个问题不是幻想，而是十分现实的。在中国有着成百上千的军阀（我们统计不过来），他们有自己的小根据地，这些军阀抓不完，因为有总的社会经济条件。由于农民的奋起和统治集团内部的分崩离析，我们才能向中国共产党提出根据地的问题，朱德和毛泽东的那个军在这样的根据地里可以进行训练，真正成为一支正规军，

在根据地里壮大起来，向不同方向夺取新的地域。哪里可以成为这个根据地呢？广州是过去的根据地，将来可以是海陆丰，或者汕头，或者别的地区，或者是武昌，我在这里不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我们无疑面临一个建立根据地的问题，因为没有地域，没有根据地，没有我们牢牢插上红旗的地方，我们就会到处流窜，即使今天攻城夺地，明天又会遭到失败。需要建立这个根据地。

因此，我们面临以下的任务：在游击运动地区最大限度地壮大党和无产阶级的力量；巩固苏维埃政权，明确现阶段土地革命的纲领；应该解决军队中政治机关的结构、政治委员制度、士兵委员会的问题；我们还面临大规模武装农民的问题；解除政府军武装的问题；农民运动和工人运动结合的问题。这就是我们应该向中国共产党军事部作出答复的那些任务。我认为，总的来说形势是好的：（1）统治集团发生危机，分崩离析；（2）群众贫困在加剧；（3）城乡运动更趋活跃，也就是说我们拥有列宁认为理解革命形势所需的三个主要特征^①。我认为，中国今天的革命形势接近于直接革命的形势。我认为，中国共产党只要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纳入新的轨道，使之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就一定能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一任务。

这就是我想向大家报告的一些想法。

全宗 495，目录 154，卷宗 415，第 108—134 页。

铅印稿，经过核对的速记记录，原件。

^① 见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载《列宁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26 卷，第 230 页。

222

张国焘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主席团和国际监察委员会的信

1930年4月17日于莫斯科

秘密

就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清党问题给共产国际 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和国际监察委员会的信

在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清党时，特别是在瓦日诺夫^① 同志接受清党时，有些同志断言，“参加清党的中国党代表团站在反对共产国际和中国党领导的右倾立场上，帮助与托派勾结的阿拉金和韦利霍夫^② 同志的右倾派别集团”等等。这一“批评”的根据是夸大了对中国代表团同志所犯错误的估计，指望两个领导机构对立起来，使它们卷入派别斗争。由于出现这样的情况，斯特拉霍夫^③ 和邓中夏同志当时在清党会议上讲了话。在他们讲话之前，我在中国代表团会议上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但他们在讲话中没有考虑到我的立场。我在他们讲话后立即在中国代表团的会议上指出，我的观点没有被他们考虑进去，由于我同中国代表团的多数人有分歧，我认为应该向共产国际提出声明。由于斯特拉霍夫同志在以代表团的名义提出“关于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问

① 郭妙根。

② 分别是李剑如和余笃三。

③ 麦秋白。

题”的声明^①时没有在其中说明我的观点，我认为更有必要这样做。我作出本声明的目的是想帮助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清党委员会进行总结并得出有益的结论。

至于代表团关于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问题的声明，我总的来说是赞成的。我认为声明的缺点是其中只谈了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内部的问题，而没有提到与此有关的外部问题，这些外部问题我在下面还要提到。在这方面，我认为声明中对托洛茨基主义、陈独秀主义、右倾动摇和右倾情绪以及调和主义所持的立场是正确的。

我不同意斯特拉霍夫和邓中夏同志讲话中的以下几点：

（1）关于已由共产国际在1929年5月给中国党的信^②中解决了的“与富农结盟”的问题，有些同志在共产国际作出决议之前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中国委员会中争论时采取了错误的立场。他们依据的是错误的观念，以为“中国农村中资本主义性质的阶级分化表现得还不十分明显”，这表明他们对富农和中农缺乏明确的认识，机械地理解列宁关于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与全体农民结成联盟的公式。因此他们得出了不必同富农作斗争的结论，不仅如此，他们还得出了要与富农结盟的结论。在共产国际就这一问题作出决议后，有些同志仍然试图掩饰他们所犯的错误。这不能不对许多中国学生产生影响，并确实在他们当中引起了一系列争论，迄今为止某些中国学生对富农作用的认识多少还模糊不清。依我看，斯特拉霍夫和邓中夏同志应该在他们的讲话中就这一问题本着自我批评的精神揭示这一错误观点，他们本人以前也持这

^① 中国代表团关于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声明见全宗514，目录1，卷宗599，第7—25页。

^② 原文如此。这封信的日期应为1929年6月7日（见《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集）》，第179—189页）。

样的观点，尽管后来与之划清了界限。因此，他们本可以帮助同志们认清他们在富农问题上的错误认识并采取正确的立场。

(2) 鲍罗廷同志于1929年4月在中国研究所^①成立的国际土地研究所作的《关于中国革命的前途》的报告中也主张与富农结成联盟^②。

今年1月，鲍罗廷同志在中国研究所讨论陈独秀主义时没有把共产国际在中国1925至1927年革命问题上的方针与中国党前领导人的机会主义路线（陈独秀主义）对立起来。他把所谓的“上海路线”和所谓的“广州路线”对立起来了。他在所谓的“广州路线”的掩护下试图推销他本人的机会主义错误观点^③。鲍罗廷同志并不是孤立的，还有另一些中国同志也同意他的观点。鲍罗廷同志这样做，不仅要坚持他过去的机会主义错误，而且在坚持这一错误的同时试图拉拢一批中国同志（关于对鲍罗廷同志的这个看法我多次在中国代表团中谈过）。我认为，斯特拉霍夫和邓中夏同志应该在他们的讲话中指出鲍罗廷同志的这一企图以及他的机会主义错误。如果他们这样做，那就会对一部分同志产生影响，提醒他们今后不要追随鲍罗廷同志的错误领导。

(3) 斯特拉霍夫和邓中夏同志在他们的讲话中指出，阿拉金、韦利霍夫等同志组成了一个小集团，但没有充分揭露这个小集团的活动是反对支部局的，是机会主义的观点（如在富农问题上），这个小集团中有的人毫无原则，它反映出中国无产阶级落后阶层的心理。在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校内斗争时，这个小集团被托洛茨基分子所利用，客观上助长了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

① 指中国问题研究所。

② 见全宗514，目录1，卷宗497，第1—27页。

③ 指鲍罗廷1930年1月29日在中国问题研究所讨论陈独秀主义的历史根源时的发言（见《中国问题》杂志，莫斯科1930年第3期，第209—211页）。

生中托洛茨基一翼的蔓延。此外，斯特拉霍夫和邓中夏同志在讲话中没有非常明确地号召阿拉金小集团的同志们认识和改正他们的错误。

一切无原则的集团归根到底在政治上不能不偏离党的路线，而在组织上必然要破坏党的纪律，这自然是布尔什维克党所不容许的。所有的同志都务必在思想上和实践上随时随地同这样的集团作斗争。

（4）斯特拉霍夫和邓中夏同志没有指出 1929 年 7 月^① 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生“十天大会”在由哈莫夫尼切斯基区委、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支部局和代表团领导下召开的会议的影响下作出的决议是正确的。当时阿拉金和韦利霍夫同志的错误性质并不严重。但他们在会后并没有十分积极地支持支部局贯彻执行大会的决议，而认为支部局的路线是“实践中的机会主义”路线。因此，他们使自己的错误变得更为严重，表现为搞派别活动并在客观上为托派所利用。出现这种情况的责任在很大程度上要由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校长威格尔来负，代表团成员也要负一定责任，由联共（布）中央任命的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问题调查委员会^② 揭露了某些同志所犯的反对党的路线的严重错误。

至于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整个问题以及为中国党培养干部的前途问题，我简单地谈以下一点：

（1）关于由中央任命的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调查委员会的决定和中央委员会关于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前途问题的决定（撤销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并将部分学生转至〔国际〕列宁学校）^③，我认为这些决定非常正确。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

^① 原文如此。会议于 1929 年 6 月下旬举行。

^② 见第 190 号文件。

^③ 见第 217 号文件。

清党的结果完全证明这些决定是正确的。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清党时，中国党的历史传统和目前的形势以及中国学生在莫斯科学习期间养成的传统和习惯都有十分清楚的表现。因此清党的结果不仅对在莫斯科的中国学生的布尔什维克化，而且对整个中国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化都有着重大的意义。现在的问题是，要从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清党中尽量多地吸收有益的教训，并以此为依据，探索今后为中共培养干部的途径和手段。这些结果应该用来使中国共产党今后更加布尔什维克化。每一个同志都应从这一点出发来看待和解决由此产生的问题。在某些情况下清党委员会应该考虑到这一点（例子已由中国代表团在声明中列出，我在这里不再重复）。瓦日诺夫、洛坚曼^①等同志揭发了阿拉金和韦利霍夫等人的小集团，做得很对，但他们在与这一小集团的斗争中采取了派别活动的手法，从而表明他们坚持的是同样的东西。清党委员会在鼓励他们克服自己错误的同时，也应指出他们的这些失误。

致布尔什维克的敬礼！

张彪^②

全宗 530，目录 4，卷宗 43，第 46—50 页。

打字稿，副本。

① 何人不详。

② 张国焘。

223

李立三给周恩来和瞿秋白的信

1930年4月17日于上海

苏和斯特拉霍夫同志^①

—

请你们在同共产国际讨论以下重大政治问题时要给以特别的注意。

1. 对当前革命形势的估计。近来有些同志，特别是远东局的同志，在评价当前革命形势时认为运动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工人斗争的发展落后于农村中农民的斗争。甚至怀疑革命高潮会很快到来。我们认为，这是严重的右倾观点。诚然，在总的形势下工人的罢工运动尚未汇合成全面的高潮。但阶级斗争确实异常激烈，特别是由于内战在继续和扩大，统治力量持续衰弱，广大群众进一步团结起来，他们的斗争继续在发展。在这样日益成熟的客观条件下，在我们进一步加强工作的情况下，我们〔预见到〕大规模的斗争有可能爆发，这必然促使直接革命形势更快到来。近来武汉工人斗争的巨大发展完全证明我们的估计是正确的。因此，如果我们只局限于今天表面的形势，对日益成熟的、随时能够引起大规模爆发的客观条件估计不足，那就不可避免地要在我们组织政治罢工、筹划总罢工以及加强武装暴动的准备这些主要的策略问题上发生动摇。因此我们应该更多地注意到工人阶级斗争的薄

① 分别为周恩来和瞿秋白。

弱之处，即注意到我们还没有取得巨大的发展，注意到工人阶级的斗争还是必将在更严酷更艰难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我们也因此要十倍地加强我们在城市中的工作以增强我们的主观力量。但是为了实现我们的任务，我们应该坚决反对对革命形势持右倾怀疑的态度！

2. 很清楚，在这样的客观形势下，准备首先在一省或几省取得胜利是已经提上日程的问题。我们认为，关于首先在一省或几省取得胜利的问题不能看作是脱离中国总的革命高潮的问题。必须协调全国的运动。这样我们才能在一省或几省取得胜利。因此，我们认为关于在一省或几省出现“个别高潮”的观点是错误的。从这种观点中可以得出另一个错误观点——“分割中国”，即认为可以利用一省或几省的政权来说明^① 全面的革命高潮。当然，从中也可以得出在一省或几省举行暴动的观点。这样的观点我们也应当事先预见到。

3. 特别严重的问题是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联系的问题。我们认为，中国是帝国主义列强一切矛盾集中的最鲜明最突出的焦点。因此世界革命可能首先在中国爆发。另一方面，中国革命的爆发可能引起全世界直接革命形势的到来。而中国革命将在这国际范围的生死搏斗中取得完全的胜利（它只能在这一搏斗中取胜）。这对于一省或几省夺取胜利的问题具有直接的重大意义。一省或几省取得胜利不可避免地立即会遭到世界帝国主义最猛烈的反抗。因此，在国际无产阶级中加强对中国革命的国际宣传和加强保卫中国革命的宣传，是中国共产党最重大的国际主义任务。我们认为必须在全世界范围内传播这个观点。务请你们在共产国际的各种会议上和与外国同志的谈话中以及在《国际新闻通讯》上对这一观点详细加以说明。迄今为止我们发现各兄弟党仍很少注意中

^① 原文如此。从意思看应为：“推动”。

国革命。因此我们自己应该加强在他们中的宣传工作。

4. 关于革命的转变问题。继首先在一省或几省取得胜利的问题后必然会出现革命的转变问题。我们认为，革命取得胜利的开始，建立革命政权的开始，同时也就是革命转变的开始，两者之间没有任何障碍。因此，那些认为转变的开始只有在全中国革命完全胜利后才有可能的看法，是完全错误的右倾观点。另一方面，那些认为建立起来的全国革命政权已经就是纯粹的社会主义政权的人也是错误的。

5. 我们认为，不仅需要加强宣传土地国有化的口号，而且需要指出这一口号已成为实际的纲领。全中国新的革命政权一旦建立，即使是现在的苏区，也必然要着手实现这一口号，这是完全可能的。

上述问题是现时最重大最复杂的问题。这里只作原则性的说明。湖北决议^①已包括了这些原则及相应的说明。同时在机关刊物《红旗》上也刊载了几篇说明这些问题的文章。现寄上湖北决议的草案和《红旗》上的几篇文章作为参考材料。请你们译出后交共产国际和交《国际新闻通讯》发表。

二

还有几个问题也要请你们加以注意。

1. 我们认为有必要召开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请尽快向共产国际提出这一问题并加以解决，然后立即来电告知，以便我们能及早筹备。

2. 我们认为，远东局的错误具有非常严重非常危险的右倾性

^① 指在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下由任弼时主持于1930年4月15至24日在上海举行的湖北省党组织代表会议的决议。出席代表会议的有中共中央代表，红军代表，湖南、河南、汉口党组织的代表。中共中央代表作了政治报告。代表会议通过了政治决议《中国革命高潮前的湖北党的任务》、关于工人运动的决议等（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第110页）。关于决议的内容见第225号文件。决议文本没有找到。

质，[它] 在政治上已完全不能进行领导，因此请你们坚决向共产国际提出改组远东局的问题。

3. 请共产国际尽快派同志来此组建新的远东局并派专家（特别是军事专家）来领导工作。务请派英国、法国、日本、印度、印度支那的外国同志来做外国海员的工作。但工作必须由中国共产党来领导。

4. 尽快派遣能干的中国同志回国。

5. 希望你^①、斯特拉霍夫、邓[中夏]、余飞和韦坚（阿法纳西耶娃）等能于5月底前回国。

6. 寄上的湖北政治决议只是一个草案，尚待全会讨论，请注意。

7. 共产国际关于五一的电报指示^②我们完全同意，并早已根据这一方针在筹备。

三

苏同志出国后发生的主要事件如下：

A. 关于革命斗争。

1. 南京“和记”蛋厂大罢工引起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在这次示威游行（4月3日）中死伤甚多。4月8日，上海举行示威游行抗议南京4月3日的镇压行动，在这次示威游行中军警又开了枪。死者中有刘义清同志。我们继续号召工人、学生罢工罢课以抗议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镇压。但目前尚无广泛的运动。

2. 武汉的罢工运动非常迅猛。加工厂……^③发生总罢工。发电厂也举行罢工。纱厂第三次爆发罢工。平汉路刘家^④工人举行

① 周恩来。

② 文件没有找到。

③ 删节号是原有的。

④ 原文如此，音译。

示威游行。人力车夫和码头工人现在正在斗争。主要的是一切都由我们领导或受我们影响。

3. 青岛工人再次举行大罢工，遗憾的是，我们仍无法插手^①其中。

4. 农民运动发展得越来越壮大。湖北省 69 个县中农民战争席卷 53 个县。32 个县里有苏区。8 个县城里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江西省组织起来的农民达 280 万人。闽西苏区已经发展到漳州。浙江省南部温台^②已开始局部起义，那里组建了红 14 军。江苏省南通的游击斗争日益扩大。省里军队的两个大队被缴了械。湘鄂赣边区参加 3 月 18 日示威游行的农民超过 20 万人，这一回缴了地主武装和军队的械，[缴获了] 1000 多支步枪。广东北江地区南^③阳、仁化、曲江的农民举行了大规模起义。

5. 朱德和毛泽东的红军在江西省取得了巨大胜利，解除了敌军两个团的武装，第 3、4、5 军已经合并。在联席会议上他们主动正式组建第一军区。^④选举朱德同志为总司令，毛泽东同志为总政委。在浙南组建了红军第 14 军。闽西地区的第 12 军已扩大到 5000 人。

6. 士兵暴动继续发生。但我们组织的士兵起义（李永良^⑤部队）未能取得成功。这一失败的原因是在这支部队中工作的同志没有执行中央指示，犯了严重的机会主义错误，他们讨好军官（起义前夕与旅长谈判）。损失惨重，10 多位同志牺牲。否则我们本来有很大希望赢得这一起义的胜利。起义失败后少数受我们影响的士兵进行了反抗。

① 原文如此。根据意思应为：领导这一罢工。

② 原文如此，音译。

③ 原文如此。

④ 指第一军团。

⑤ 音译——译者。

B. 关于党内状况。

1. 湖北代表会议现在正在举行。只有 22 位代表出席（[鄂] 西和 [鄂] 东北地区的代表没有来）。
2. 湖北省委又一次部分地遭到破坏。毛春芳同志（工人书记）牺牲了。这是难以估量的损失。
3. 上海党^①发展仍缓慢。在详细研究后得出的结论是：早已指出的严重组织问题至今仍几乎没有解决。这是一个重大缺点。在成立行动委员会后我们取得了较大的成绩。总之，组织问题是严重的问题和我们革命的最薄弱之处。

最后希望你们早日回国。

李 [立三]

此信与 [向] 忠发同志商量过。他完全同意。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600，第 8—12 页。

打字稿，副本。

① 指中共上海党组织。

224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 处务委员会会议第 15 号记录 (摘录)

1930 年 4 月 25 日于莫斯科

秘密

听取：1. ——关于中国大学^① 撤销后的中国问题研究所。

决定：1. 认为有必要保留中国问题研究所并将其连同研究生部一起并入共产主义科学院机关，关于此事责成米夫、特鲁巴切夫和阿布拉姆松同志立即向中央文化宣传部和共产主义科学院主席团提出这一问题。

2. 该研究所在正式并入共产主义科学院机关之前，仍留在国际列宁学校机关系统内，责成由该校校长^② 领导，总的领导仍由东方书记处负责。

3. 责成中国问题研究所组织对国际列宁学校中国部的相应服务工作。

4. 成立由拉祖莫娃、斯特拉霍夫^③、特鲁巴切夫、阿布拉姆松及国际列宁学校的代表组成的委员会，将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公共图书馆中为该研究所工作性质所必需的部分图书移交给研究所。

① 指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

② K. H. 基萨诺娃。

③ 瞿秋白

5. 中国问题研究所应继续按与东方书记处商定的计划开展活动（例如，出版《通报》、《问题》^① 等）。
6. 从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生中指定一批同志充实新一届研究生。依靠国际列宁学校的力量在夏天组织这批人学习俄语。
7. 在目前的研究生部的问题解决之前，仍保留研究生部并按有关标准用国际列宁学校的经费维持其开支。
8. 为了不延误研究生的招收，招生条件与共产主义科学院商定。
9. 在为国际列宁学校中国部补充新的工作人员时应吸收研究生从事教育工作。
10. 在分配大学的住房时应考虑到研究所对住房的需要（用于研究所、图书馆、研究生部等）。

听取：2——关于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撤销后中国出版社的前景。

决定：1. 把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出版社改组为共产国际执委会编辑出版部下属的中国支部出版社，负责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提供宣传书刊。出版社的计划应同时考虑到中国党校（国际列宁学校等）的需要。

2. 出版社以柏林现有的中国出版社^② 的名义筹划和出版书籍，中国出版社承担在国外发行出版物的一切职能。
3. 责成出版社继续定期出版《共产国际》杂志^③ 和六卷本列宁文选。

^① 指《中国问题研究所通报》（1928—1932）和《中国问题》杂志（1928—1935）。

^② 指东方出版社，1930至1931年间在柏林。

^③ 《共产国际》杂志1930至1937年在莫斯科出版。

4. 为中国出版社配备 10 名翻译和 3 到 5 名责任编辑。出版社提出的人员名单应于最短期限内与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改组委员会商定。

5. 建议出版社在业务年度结束之前不要超出 1929 至 1930 年度已拨经费的余额。明确由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总预算中转归出版社支配的金额问题。根据出版社今后的业务开展（出版列宁、马克思和恩格斯文选），草拟 1930 至 1931 年度的新预算。

6. 属于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出版社的珂罗版印刷厂移交给国际列宁学校，负责向中国部提供教学用书。

7. 保留中央出版社的中国部，以便为在苏联的中国侨民服务。

8. 向中央出版社提出关于由该社组织在苏联境内发行一切中国出版物的问题。

主席 米夫

全宗 495，目录 154，卷宗 416，第 1—2 页。

铅印稿，原件，亲笔签字。

225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 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

1930年5月1日于上海

秘密

致中国共产党政治局^①

敬爱的同志们：

远东局仔细地讨论了湖北代表会议的政治决议及其关于工人运动的决议^②。我们认为，这些文件为克服我们党内主要危险的合法主义、取消主义倾向及种种右倾思潮作出了认真的努力。你们正确地注意到群众运动的不平衡性，特别是在湖北省农民和工人阶级直接积极性之间的不相适应，这在目前形势下是对革命发展的严重危险。决议强调指出，工人阶级队伍中左倾过程越来越加快，甚至规模不大的经济罢工都可能迅速引发政治罢工的武装战斗。为使党作好准备抓住群众性自发运动带来的种种机会，决议指出：革命的发展已达到极高的水平，发展的速度在不断加快，红军在发展壮大，苏区在不断扩大，这一切都应集中为统一的全国性运动，其目的只有一个——在一省或几省夺取政权，不管在现阶段能占领几个省，等等。但是，决议中有些论点很容易产生十

① 信的俄译文（全宗514，目录1，卷宗579，第3—9页）上有批注：送斯大林、莫洛托夫、皮亚特尼茨基、曼努伊尔斯基、洛佐夫斯基、别尔津、库西宁、瓦西里耶夫、青年共产国际。

② 见第128页注①。

分危险的倾向并妨碍党克服你们正在竭力加以克服的错误和倾向。有些错误或许是由于翻译错误造成的提法不妥，但并不是所有错误都是如此。

首先谈谈由于提法不正确造成错误。在第4页第5段中说：“凡是借口组织薄弱而否定组织政治罢工可能性的人无疑都是最右倾的分子”。如果把这句话同另一句话，即“我们在武昌只有100名〔党〕员和很少的红色工会，但伟大的事件将使我们变得强大起来”联系起来看，那么这个提法可能会导致非常危险的结论。在中国目前的形势下，你们的第一个提法是完全正确的，但问题提法本身突出了右的危险而缩小了另一种危险。我们相信你们在政治上的追求是100%真诚的：我们相信你们想根除一切取消主义倾向、消极情绪和右倾，但当存在着我们所有同志在工作中遇到的主观困难的情况下，这样的提法会妨碍党的发展，导致奉行消极等待的政策，有碍于我们弥补党和群众之间的裂缝，尤其是考虑到某些老同志仍然拒绝做党的日常工作，宁肯坐等革命高潮到来的情况。

预测只有在客观上与党的日常工作相结合并用来克服消极等待“伟大事件”到来的思想时它才是正确的。革命高潮临近的速度的加快取决于我们唤醒党认识其弱点的能力，取决于能否动员所有支部和党员在一切工业中心城市里进行英勇的斗争，能否争取多数工人，领导他们的一切战斗，这些战斗应该与农民战争相结合，而且工人骨干应该被吸收去领导这些农民运动。对于湖北尤其应该强调这几点，因为尽管像武汉这样的地方占主导地位的是战斗情绪，但我们还非常弱小。

在第2页第4段中你们正确地指出，农村运动和城市工人运动发展不平衡并不意味着城市中左倾过程比农村差，一旦形势成熟，工人运动将推翻一切白色恐怖障碍，证明它与农民运动相比革命性并不差，因此只有极右分子才会沉湎于消极情绪之中。这

说得完全对，但你们的错误在于另一个笼统的论断，你们说：资产阶级“不得不先放弃农村并依靠城市”。如果这不是翻译的错误，那么我们应该向你们指出，这样笼统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中国反动派继续用他们所拥有的一切手段来压迫中国农民。

诚然，军阀集团在农村中要弱得多，他们想方设法依靠城市，但即使在苏区他们仍不断返回农村，向我们的部队开战。因此，如果我们这样来阐述问题，我们就有放松党在农村中革命警惕性的危险。还有许多说明农村居民积极性提高的因素。在农村中对共同的直接利益的认识要深刻得多，而农村贫民更直接地承受着军阀赋税的重负；农村中继续进行公开斗争的可能性也更大，等等。尽管这些客观因素都十分重要，我们应该指出，发展不平衡的最主要原因是我们在工人运动中在组织上的薄弱，我们应该把我们的力量集中在搞工人运动上，因为它应该是克服发展不平衡性的中心问题。客观上我们的任务是：提高我们的警惕性，加强我们的决心，加强我们在苏区和游击队中的阵地的同时，我们应该立即采取措施加强在工业企业中的工作，以扩大党的工人骨干和活跃工人运动，以此来消除城乡革命运动发展的不相适应并帮助工人领导积极的斗争。但是为此不能仅限于说什么“伟大事件”将摧毁白色恐怖。不，我们应该不断指出，我们通过党在工人中的组织工作来克服我们的弱点，引导工人去同反动派，特别是湖北的反动派作坚决斗争。

因此我们认为，你们必须重新修改这一段并改正这一政治错误（如果这不是译文错误的话），突出主要的一点——党在组织上薄弱——并保留关于同消极思想及其他右倾思想作斗争的正确的政治观点。

关于政治罢工问题的提法看上去也过于机械，缩小争取实际要求斗争的政治意义的倾向也同样如此。现在，我们目击了上海举行罢工的电车和公共汽车工人的顽强斗争，他们起先提出了经

济要求，后来又开展了反对白俄工贼、反对逮捕工人的激烈的政治斗争。因此你们说“经济斗争只是政治斗争的策略手段”（第6页第1段）是不对的。（这个决议——关于工人运动的决议——是不妥当的。中华全国总工会3月8日通过的关于政治形势的决议^①才是关于工人运动问题的妥当的决议的例子）。不错，我们在进行经济斗争时，要考虑到提高群众的政治积极性，但这对于我们并不仅仅是一个策略问题。为了争取工人，领导工人，我们必须组织他们进行大规模的革命斗争，为此我们从争取提高工资、增加口粮、改善企业中的劳动条件的经济斗争开始做起，引导工人投入群众性的政治罢工，最终投入夺取政权的斗争。这是我们对待群众的首要的政治态度。你们正确地指出，目前一切经济罢工都有可能转变为政治罢工，甚至转变为武装斗争。因此每一次经济罢工都包含着对于我们对待群众的政治态度来说极为重要的基本因素。策略因素首先产生在进行经济罢工中，但这一点不排除也不减少经济罢工的政治意义。如果把湖北决议中的思想推到其逻辑的极点，那么我们在做工会工作中所付出的努力就都只是策略手段，因为既然经济罢工只是导致政治罢工的策略手段，那么显然政治罢工也是导致武装暴动的策略手段。但并不是如此。上述三种斗争都是同一个共同斗争在不同阶段的一部分，这一共同斗争的发展并不是直线上升的，而不同种类的斗争有着更多的使它们统一起来的特征。把经济要求看作完全是出于策略考虑的观点是错误的。这些经济要求是阶级斗争一定发展阶段的反映，而中国尚未脱离经济要求和实际要求具有首要政治意义的时期。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党应该把经济要求减少到最低程度，因为这样的话就等于鼓励合法主义倾向，但基本的政治因素是在于，在

^① 看来是指1930年3月8日中华全国总工会通过的《目前的政治形势与工会的任务决议案》（见《中国工会历史文献》，北京1958年第2卷，第486—494页）。

提出这些经济要求时，始终要考虑到群众。如果我们提出群众认为完全实现不了的要求，那么我们就会把自己孤立于群众之外。但即使我们在群众运动中提出的要求超出资本家能够接受的程度，这也并不意味着对我们来说经济斗争只是一个策略问题。当要求提出后，我们在武装暴动之前始终应该努力设法帮助灾难深重的群众。在这样的斗争过程中，我们加强自己的影响并朝着政治罢工的方向扩大斗争的范围，政治罢工是把它转变为武装暴动和夺取政权的最后斗争的政治过程，但我们在再重复一遍，这是同一个包罗一切的斗争的一部分。认为经济斗争只是策略问题的论断可能导致放弃争取经济要求和实际要求的斗争，如提高工资、缩短工作日、争取结社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等。把经济要求看作纯策略手段的观点，其必然结果是放弃对群众的领导，因为落后的工人只听命于维护他们经济利益的人。因此，争取群众切身利益的真诚斗争有助于他们政治觉悟的提高，并引导他们走向政治罢工（反对白俄工贼的斗争、释放政治犯等，上海就有这样的情况，争取结社自由，言论自由，出版和集会自由，罢工自由等）。不持这种态度也可能会导致消极等待的态度。

但是，如果群众迅速向左转，而政治要求成为当前迫不及待的要求，那么把经济问题提到首位就十分有害了。但即使广大群众已经发动起来时，有时仍需要号召关心某些落后工人的经济利益，目的是推动他们，吸引他们投入政治斗争。虽然在这种情况下策略因素起着很大的作用，但仍不改变这种行动方式其实也就是政治方式这一事实。大家看到，不同的罢工形式密切地交织在一起，所以你们在对各种不同的斗争发展阶段采取的政治态度上应该避免任何的公式主义。否则你们就有把这些阶段置于“防水舱”从而损害我们与群众联系的危险。你们在开展工人阶级斗争时应坚持灵活的政策，适应每时每刻出现的形势，始终牢记你们与之打交道的是些什么材料。如果你们坚持这样的准则，那么我

们相信，你们一定能克服党在组织上的软弱并弥补党和群众之间存在的裂缝。大家看到，党在组织上的软弱与党对群众的政治态度有着何等密切的联系。争取在组织上领导群众的斗争是争取领导小罢工的斗争，是党极为重要的任务。这也可以作为给你们的关于经济罢工和政治罢工齐头并进问题的答复（第6页第4段）。

还应该弄清关于工厂委员会作用的问题。说工厂委员会是“苏维埃的基础”（政治决议第8页第2段）的说法未必正确。说“工厂委员会起着左右企业生产问题的作用”（工会决议第5页第1段）的说法也同样是错误的。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不久前的声明^①对工厂委员会的作用作了十分正确的表述。企业构成苏维埃的基础，但在争取苏维埃的斗争中工厂委员会起着十分巨大的作用。它们可以履行革命的职能，动员群众直接夺取企业，可以暂时领导生产，但说工厂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监督生产，那是错误的，只能导致错误的结论。

你们不应该热衷于对革命作出预言，说什么革命应该首先在中国“爆发”（第1页第2段）。我们应该振奋群众的情绪，向他们指出必须与印度、朝鲜、菲律宾、安南、台湾等地的工人和农民密切合作，印度的革命形势正在迅速成熟。你们的决议对这种密切合作的必要性却只字不提。

赤卫队的作用不应只限于笼统地说它在组建红军基层组织中的核心作用（第5页第5段）。应该更明确地突出这些组织在整个阶级斗争中的作用，它们在阶级斗争中的职能是保卫示威游行、群众集会和工会工作人员，反对工贼，执行使压迫工人的资本家走狗不再祸害工人的危险任务，等等。还应该改变以下提法（第6页第3段）：“现在武装农民是不适宜的”。这个说法不对。当然我们

^① 大概指项英在1930年3月举行的中华全国总工会代表会议上作的《黄色工会与工厂委员会问题》的讲话（见《中国工会历史文献》第2卷，第586—597页）。

不应把武器发给你们所说的那些把武器埋藏起来的农民，但你们的提法过了头：你们主张完全停止武装农民。

应该加上关于第一届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作用及其对群众斗争的态度一条。特别应该指出必须协调湖北的行动和其他苏区的行动，或者至少使两者建立切实的联系。这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应是我们近期内一切运动关注的焦点，应是提高群众思想水平和培养他们开展有组织行动的基础。

你们还应该在湖北决议中单独谈谈党和苏区的相互关系。如果你们能在单独的一条中说明党在苏维埃方面的任务、苏维埃组织和党组织之间的区别、苏维埃的作用及其任务等等，那当然非常好。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579，第 10—13 页。

英文打字稿，副本。

226

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主席团的信

1930年5月14日于上海

致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

5月和6月停拨经费实际上会使整个工作陷于瘫痪，对此请予严重注意。不保证党的机关和党的骨干的安全，中央和地方组织没有正常的联系，党和群众没有密切的关系，就无法对瞬息万变的形势作出有效的反应，为此绝对需要经费，尤其在全国白色恐怖猖獗之际更是如此。中央在尽一切可能从苏区获取经费，但由于联络困难很不可靠。请你们考虑到由于停拨经费，特别是在5月和6月中国革命这一重大历史时期，在这里可能产生的实际困难简直令人难以设想。

致革命的敬礼！

中共中央

全宗 495，目录 19，卷宗 237，第 11 页。

英文手稿。

227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 第 126 号（特字第 124 号）记录 (摘录)

1930 年 5 月 15 日于莫斯科

1930 年 5 月 15 日

64. ——关于中东铁路（政治局 1930 年 3 月 15 日会议第 120 号记录，决定：6）。

批准由政治局工作委员会提出的关于中东铁路秘密工会的工作内容和工作方式的决定草案（见附件一）。

抄送：鲁祖塔克、加拉罕、莫斯科文、佩列佩奇科、什维尔尼克同志

中央书记 斯大林

政治局会议第 126 号记录，
决定：64 附件 1
(特别文件)
绝密

关于中东铁路
(1930 年 5 月 15 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批准)

1. 中东铁路的冲突表明，参加工会组织的苏联工人在保卫苏

联利益方面负有并起着何等巨大的作用。另一方面，这一冲突还暴露了工会中混进了许多立场不坚定、思想庸俗的人乃至反苏分子，俄罗斯工人和中国工人关系疏远，工会会员甚至领导人中有挑拨离间分子，领导人没有做好在不合法条件下工作的准备，表现得极其软弱。

2. 东三省特区的工会应在吸取冲突教训的基础上适应完全不合法的条件彻底改造自己的工作。工会不应干预中东铁路苏方管理当局的工作，记住工会不是在苏联境内而是在他国领土上在完全不合法的条件下工作，工会所处的极其复杂的政治环境向它们提出了特别的任务并要求争取与在苏联完全不同的工作方式方法。

3. 为了领导工会工作必须从中央派出3到5名有地下工作经验的党员工会工作者。1人应留驻伯力，在边疆区委书记亲自领导下领导工会的工作并亲自向铁路工会中央委员会主席和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的一位书记报告自己的工作。

3人派往满洲，其中1人（或2人，第二个人作后备）在哈尔滨党组织中工作，1人派往中东铁路西线，1人派往东线。与伯力的联系通过党组织的联络渠道进行。责成组织调配部指定相应的同志。

在各地（铁路段党委和地方党委）应抽调三人小组或特派员，通过从在冲突期间证明自己立场坚定、善于在不合法条件下工作的同志中选拔出来的经过考验的积极分子来领导工会工作。

4. 工会应为自己提出如下任务：

（1）支持苏方管理当局进行节约经费、缩减非生产性开支的斗争，同时争取在削减编制的情况下保留经过考验的苏联工作人员骨干，辞退白卫分子。

（2）领导旨在改善工人物质生活和日常生活的一切措施，尤其要保证今后仍全面领导中东铁路的合作社。

(3) 利用一切合法条件来领导通过铁路员工会议、俱乐部、体育组织等提高工会会员文化水平的工作。

(4) 参加中东铁路学校的家长委员会，目的是加强苏联对这些学校的影响并与白卫分子作斗争。

(5) 协助苏方管理当局把异己分子、敌对分子从铁路部门清洗出去，揭露他们的活动，使他们受到社会的抵制。对沙文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进行不调和的斗争，无情地把他们从工会中清除出去。

(6) 瓦解中国当局在白俄分子协助下建立的警察、工会和合作社组织。

(7) 在青年工人中进行工作，要格外注意培养业务熟练的苏联干部。

5. 工会在采取这些措施和做各种工作时不应以任何形式干预中东铁路苏方管理部门的工作。

核对无误：赫里亚普金娜

全宗 17，目录 162，卷宗 8，第 151、155—156 页。

打字稿，原件，签字为真迹复制，附件为经过核对的副本。

228

瞿秋白和周恩来给共产国际执 委会议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的信^①

1930年5月15日于莫斯科

致政治委员会

鉴于中国学生和其他一些同志向国际监察委员会提出声明^②，我们建议在政治委员会5月18日会议上提出关于成立专门委员会的问题以便研究中国代表团的问题。

屈维它（斯特拉霍夫）
苏（莫斯科文）^③

全宗495，目录4，卷宗36，第35页。
手稿，原件，亲笔签字。

① 文件上有批注：赞成必须成立委员会以尽快解决中国代表团的问题。建议委员会由皮亚特尼茨基、曼努伊尔斯基、库西宁、格克尔特、安加雷蒂斯同志组成。尼·米夫 5月15日。

② 文件没有找到。

③ 分别为瞿秋白、周恩来。

229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的信

1930年5月18日于上海

秘密

敬爱的同志们：

这封信收到时乔治^①可能已经抵达。由于他将口头详细向你们通报一切，所以我们在这封信里只谈谈最必要的问题。

1. 五一行动。这次5月1日的准备工作与去年不同，组织得很及时，行动进行得要好得多、有效得多。在我们逗留中国期间见到的行动中最精彩的一次是上海的行动。4月，罢工浪潮由于党和红色工会领导力量绝对增加而急剧高涨（在群众中进行了广泛而有成效的鼓动，举行了群众集会和小规模示威游行，散发了近300万份传单，可以认为这是目前不合法状态下取得的出色成绩）。党和红色工会采取新的动员方法，召开所谓的代表会议。这样的会议开了许多次，几百名来自工厂和大学的代表参加了会议，虽然部分代表还不是由集体选出的，而是由企业中各个革命委员会任命的。看来党由于这一行动确实成功地组织了大规模的群众政治罢工运动和宏大的五一示威游行。公共汽车场职工发动的运输工人罢工是纯经济罢工，我们对这场罢工领导起的影响不大，但它与任何一次运输工人罢工一样具有巨大的政治意义。此后不久，在我们的领导下电车场职工开始罢工，他们除提出经济要求外，还

① J. 哈迪。

提出了如下要求：释放政治犯和打倒白俄工贼。在发电厂一些倾向于宣布罢工的工人中，在我们的领导下成立了罢工委员会，以便立即举行罢工。在许多纺织厂中，尤其在工业集中的沪西地区，都进行了这样的准备工作。但这时敌人开始采取一个又一个精心策划的反措施。开始大规模抓人，首先抓有罢工危险的企业中的积极分子骨干。例如，发电厂罢工委员会的全体成员均遭逮捕。我们所犯的错误使反动派易于得手。5月1日前几天，正当反动派策划的反革命行动猖獗一时之际，上海总罢工委员会召开代表会议。几百名代表（约700人）前往租界的一座大楼，但由于出现错误，来到这座大楼的只有一部分代表（约120人），他们当场全都被捕。遗憾的是，被捕者中正好有沪西38家工厂的代表。5月1日前夕上海被捕的积极分子和同情者约400人，而沪西企业中我们的积极分子有四分之三被捕。全国工人联合会^①的印刷厂被暴露，被捕者在狱中惨遭毒刑拷打。全城宣布戒严。我们力量不足，在企业中扎根不牢，不能在条件严酷、损失惨重的情况下发动工人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因此敌人得以把许多罢工扼杀在萌芽状态之中，防止了五一大规模示威游行。我们在5月1日只组织了几个规模不大的示威游行，这些游行队伍立即就被警察驱散了。这不是大规模的示威游行。但我们在街头举行了一系列人数不多的群众集会。总的来说，清醒地评价上海的五一行动，可以认为，尽管我们损失惨重，作为工人中的组织领导力量我们暴露出不少弱点，但这次行动无疑具有正面的政治意义，并有助于党的影响的扩大。我们的中心任务是使这种日益增长的影响具有牢固的组织形式。5月1日向走在前头的上海尖锐地提出的这个问题是党的基本任务，特别在农民战争飞速发展的条件下更是如此。如果我们不能以比过去更快的速度完成这一任务的话，那么城乡中出现

^① 指中华全国总工会。

的对于我们非常有利的情势就会错过。

其他工业中心城市中的五一行动。我们还没有得到来自重要工业中心城市的确切消息，但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初步印象表述如下：在这些中心城市里，这次的准备工作也要好得多，尽管其强度和广度无法与上海相比。我们在天津、青岛、北京、香港、广州、哈尔滨、武昌、南京以及唐山煤矿的骨干力量十分薄弱，无法完成他们那里面临的任务。显然，在白色恐怖猖獗、我们损失惨重的情况下，这里大规模动员工人参加五一行动确实要比上海更困难。似乎在这些城市里人们没有充分估计到敌人的力量，我们可以说是不断地把代表送到警察的手里。武汉代表会议 100 名代表均遭逮捕，北京 80 名代表被捕。天津、青岛、哈尔滨等地的情况也大致如此。据全国大致统计，光是各城市五一行动中被捕者约 1000 人，主要是积极分子。湖北省委书记^① 惨遭杀害，四川省委全体成员均遭逮捕，3 人遭处决，新组建的满洲省委也遭逮捕，据说有几名委员已被处决。福建省委被破坏。香港还没有确切消息传来，据说举行了小规模示威游行；广州没有什么消息。关于这些城市中口头和文字宣传的规模，我们还没有得到任何消息。

我们作出决定，5 月 1 日要让尽可能多的城郊农民进城。但在重要的工业中心城市，我们无力做到这一点。在湖北、湖南苏区和广西边区有近 20 万农民参加了五一庆祝活动。在广西和浙南的小城市里举行了示威游行，并同当地警察发生了冲突，等等。

2. 对五一行动总的评价。这次行动表明：(1) 工人们对斗争的准备加强了，共产党和红色工会的影响增大了；(2) 凡是党和红色工会确实继续在工人中认真做组织工作的地方，工人们已开始跟我们走；(3) 但是考虑到中国总的形势及其巨大的革命可能性，应该说，党作为工人阶级的组织力量和领导力量其发展速度

^① 中共湖北省委秘书长冯任。

还绝对不够快。原因是：（1）且不说工作条件异常复杂（白色恐怖等）并轻率地忽视了这种条件的意义，我们在主观上有以下障碍，即在实践中以种种不同形式为掩饰的机会主义。我们在上海电车工人罢工时目睹了生产支部和领导人中产生的危险的动摇。我们亲眼目睹了青岛在经多次逮捕后出现的极其悲惨的景象，汪精卫分子在那里释放了部分被捕者并在他们之中做鼓动工作。因此，在青岛的组织中对共产党政策是否正确产生了危险的怀疑；（2）严重缺乏训练有素的工人骨干和在工人运动中积累了经验的党和工会的组织者；（3）最后，最近几个月来我们越来越感觉到，连在党的上层中都不是所有人都认识到，中心任务是要在最大的工业中心城市中争取重要的工人阶层。同志们看到了农民战争的辉煌胜利，红军飞速发展，但与此同时他们却在城市中白色恐怖的疯狂迫害下呻吟。在城市中他们每次散发传单都是英雄行为，可能他们是指望红军来夺取城市，未来的伟大事件将会使一切获得新的推动力。这一消极思想在党内广泛蔓延，在一定程度上是在工厂中进行严肃革命工作的障碍。李立三本人在谈论时承认，部分老党员有这种情绪，但他们在过去是进行积极斗争的。而他本人却不断侈谈将为我们作出种种伟大事件。在争论我们在武汉工人中组织工作严重薄弱的问题时，（在武汉，我们无视工人情绪基本上是好的，只在那里吸收了不到 70 人入党），李立三回答说，一旦爆发伟大的事件，我们就会有 2000 名党员。在直隶省委最近的二月指示^①中，该省委自己承认，它的工作中的主要错误之一，是工作全都集中在农村，而不是在工人当中。青年团书记^②谈到青年团中有一些危险的倾向，尤其是在青年知识分子中有这种倾向，他们说工人没有用，他们不会读书，也不会写字。

① 文件没有找到。

② 袁炳辉。

在中国目前的形势下，有这些倾向不足为怪。明确清晰地判定这些倾向并与之作斗争，并不意味着贬低党取得的巨大成就和付出的英勇劳动。但是形势蕴含着巨大的可能性，同时也蕴含着巨大的危险性，必须依靠你们的威望全力推动党前进。

3. 上海代表会议^①的文件说，李立三在总结讲话中谈到我们的红军时完全正确地回答了问题，同时却使用了“红色军阀主义”这一说法。在中国使用这样的术语，简直就是意味着给憎恨我们的情绪提供了一个出色的由头，因为“军阀”这个概念本身在中国像瘟疫一样，人人对之深恶痛绝。不过李立三已承认，他说了蠢话。

4. 苏维埃代表大会。乔治将给你们带去关于已做的准备工作的报告。再过几天将举行预备会议^②。因为这一延期，代表大会本身也不能在5月30日举行，大约要推后1个月。政治上和技术上的准备工作做得还不充分，尤其在企业中更是如此。

5. 其他国家和关于参加红色工会国际代表大会^③的代表问题。下周我们派怀特^④去菲律宾解决代表问题及其他问题。5月底新加坡、暹罗和印度尼西亚的代表应来此间。我们派〔阮爱〕国^⑤去新加坡参加党代表会议，还责成他挑选代表。但今天我们从新加坡5月4日报纸上看到了附上的一则简讯^⑥。如果〔阮爱〕国和领导人确实被捕，那这从任何方面说都是一个非常沉重的打击。现

① 文件没有找到。可能是指湖北省党组织代表会议（见第128页注①）。

② 指苏区代表会议。1930年5月20—23日在上海举行。详见《中国苏区代表会议材料》，载《中国问题》杂志，莫斯科1930年第4—5期，第172—198页。

③ 指红色工会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1930年8月15至30日在莫斯科举行。

④ J. 多尔森。

⑤ 胡志明。

⑥ 简讯没有找到。

在我们找到一位近来在中国党内工作的日本同志^①，现在正尝试通过他同日本建立联系。是否能成功，还是一个问题。我们还往台湾派出一位同志^②。再过两三周他将与选出的代表大会代表一起返回，并将向我们报告那里的党小组、工会组织的活动情况，等等。

6. 中华全国总工会编写的4月份罢工运动统计材料已通过塔斯社记者用电报转发^③。统计材料还不充分，其中缺少关于罢工人数的资料。我们尝试弥补这一空白，并编写红色工会国际代表大会前几个月的统计材料。中华全国总工会编写的统计材料是这里所能做到的最出色的材料，但即使是这份材料也应把它看作是最起码的材料，因为必定还有许多中华全国总工会所不知道的小规模罢工。

7. 怀特从菲律宾回来后立即动身去你们那里，并将这里收集的材料带去。请抓紧把重要材料的寄送工作组织得比过去更好。例如现在这里的重要材料往往要放好几个月，因为国际联络处派不出信使，而我们又不能冒险用普通邮件寄送这样的材料。且不说从保密角度来看这样做是危险的，你们将长时间收不到这些材料，而这些材料所起作用很大，因为它们将决定你们在党的种种问题上的立场。怀特在6月中旬左右动身。与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的联系照旧。

8. 关于大学生问题。几周前我们与中国同志就此问题进行过长时间的争论。中央组织局今年拒绝派出大学生。从我们（附后的）就此问题给政治局的信^④中你们可以看到他们的理由。诚然，

① 何人不详。

② 何人不详。

③ 文件没有找到。

④ 见第214号文件。

政治局在收到我们的信后撤销了组织局的决定，但我们得到的印象是中国朋友不太热心做这件事。你们得大力督促切实派出学生。我们还请求确定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学生名额，而从其他国家（印度支那、菲律宾、台湾^①等）汇出为此目的所需的经费，因为现在我们有找到学生的一些可能性，而这个问题从为远东培养骨干的角度看是极其重要的。

9. 反帝大同盟。不久前这里有三个反帝大同盟：一个由共青团领导，另外两个——中国反帝大同盟和远东大同盟由党领导^②。远东大同盟只是一个机构，因此我们建议中国朋友予以撤销，代之以做好天津的工作。这件事现在已办妥。从现有的两个大同盟中，共青团的那个无疑办得较为出色、较受欢迎。但是这两个大同盟做的是同样的工作，有着平行的机构。因此我们建议于6月份召开的代表会议上将两个大同盟合并。共青团书记同意这一建议，但他说，青年共产国际有关于在各国建立独立的青年反帝大同盟的决定^③。我们不知道这样的决定，但以防万一我们向你们发去相应的电报查询^④，然而一如既往没有得到任何答复。

10. 我们迄今没有收到前去印度支那的法国同志^⑤的任何消息。印度支那的同志也没有找到他。他们在想方设法寻找他，但迄今没有成功。

11. 向忠发病了，十分虚弱。现在他住院了。他反对好好休养，但我们认为应送他去你们那里往上一两个月疗养院。他是我们这里为数不多的无产者领袖之一。

① 原文如此。错误地将台湾列作为一个国家——译者。

② 由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大同盟（上海各界反帝大同盟）成立于1928年8月，1932年7月为国民党当局取缔。关于共青团领导的反帝大同盟没有发现任何补充材料。

③ 文件没有找到。

④ 文件没有找到。

⑤ M. 杜克鲁。

12. **总的组织问题。**与国际联络处的关系经不起任何批评，因为它不是在促进工作，而是使本来复杂的工作变得更加困难。我们坚决请求你们就以下问题作出强硬的决定：（1）我们的电报是否发出完全取决于国际联络处代表^①的旨意。我们请求无论如何给我们一个单独的寄发电报的通讯处；（2）我们应该在远东工作。但如果我们需要经费，例如赴新加坡的旅费（200美元），却遭到拒绝。对菲律宾、台湾等的拨款同样如此。或许这不是国际联络处的过错。或许它有这方面的正式命令。但你们设想一下，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工作呢？对我们有关这些问题的电报从未作过任何原则性的答复。目前这里与中国同志和其他同志的联系形式不仅异常轻率，而且完全有碍于实际工作。我们根本无法组织许多重要的会议或组织起来很慢，因为我们在两次接头被迫取消后还需要秘密接头。但国际联络处说毫无办法。如果这些问题不能得到明确的说明，那么国际联络处和任何一个局之间都始终会发生冲突。关于其他组织问题和经费问题乔治会作口头汇报。

致最良好的祝愿！

罗〔伯特〕、维〔利〕^②

附言：在写完上面的信后，我们与共青团书记谈了话。他几周前跟我们谈了青年团内部尤其是在知识分子代表中明显存在的某些危险倾向。他们侈谈工作做得很糟，但实际上不为改进工作做任何事情。同时还暴露了对青年工人估计不足的明显倾向。“工人没有教养，不会读书，也不会写字，对他们不好办”。为了消除这一毛病，共青团中央决定开展反对此类夸夸其谈者、争取共青

① A. E. 阿尔布列赫特。

② 分别为 Г. 埃斯勒和 Г. М. 别斯帕洛夫。

团机构无产阶级化并从青年工人中吸收新团员的广泛活动。为了支持这一活动，我们以青年共产国际代表的名义发表了致共青团员的呼吁书^①。不久前共青团中央举行了讨论团内问题的会议。研究了三个问题：（1）团的状况；（2）在真正群众性革命基础上的工作；（3）共青团中央在这方面的任务。现在有团员 3.3 万名，其中只有 900 名产业工人；20% 团员是雇农、职员和手工业者，15% 是学生，60% 是农民，5% 是其他分子，其中包括上述 900 名产业工人。农民出身的共青团员主要是贫农，但领导权往往落在富裕农民手中。团员中有 2000 名女团员，主要在农村。红色工会中有 5000 名青年工人，他们不是共青团员，但受共青团的思想影响。接受我们影响的青年农民组织中有 33 万人，主要在苏区和湖北、江西、湖南、福建、浙江、广西等省。那里 14 岁以下的青年组成少先队组织，14 岁以上的组成所谓的青年近卫军。青年近卫军组织一部分纪律不好，因此许多地方的党干脆宣布将其撤销。因此这些地方的党和青年之间发生了冲突。在城市中青年团支部的〔工作〕也极糟。支部不做任何工作。支部不参加日常斗争，因为团员害怕遭解雇。支部不能独立召开会议等。在军阀部队中有 20 个青年团支部，但它们的工作也搞得不好。工人支部脱离群众。骨干全来自各级团委（郊区团委、区团委等），做不了任何扎实的工作，因为他们的工作全是四处奔波。上层机关和下层机关的联系全靠指示信，没有任何个人的接触。团员基本群众不知道青年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② 的决议（这里根本没有收到）和中国共青团第五次代表大会^③ 的决议。“团的组织状况与总的形势相比完

① 文件没有找到。

② 青年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于 1928 年 8 月 20 日—9 月 18 日在莫斯科举行。

③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五次代表大会于 1928 年 7 月 15 至 21 日在莫斯科郊举行。

全不能容忍”。上述这段话几乎一字不差地重复了共青团书记在富有自我批评精神的报告中描述形势部分的一段话。据我们判断，会上通过了总的说来是正确的关于消除缺点和不足的决议。然而，在我们看来，必须派一名富有实际工作和组织工作经验的青年代表到这里来。

附上两份材料：

1. 远东局关于派送学生的信^①。
2. 远东局关于湖北省代表会议决议的信^②。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566，第 34—38 页。

德文打字稿，副本。

① 见第 214 号文件。

② 见第 225 号文件。

230

中共中央给斯大林的信

1930 年 5 月 18 日于上海

绝密

致斯大林同志

亲爱的同志：

中共中央现在遇到如下经费困难：

1. 拨给我们的经费来得不经常不及时，近几个月来没有支付的款项数额已很大。
2. 经常支付的款项数额极小，因此无法有计划地进行分配。
3. 金价上扬，而以墨西哥元支付的经费数额不变（墨西哥元已大大跌价）。因此原定的数额已很不够。每个月与预算相比超支 30%。

这是 5 月前的事。不久前获悉，5 月和 6 月共产国际根本不给任何拨款，因此负责同志只得完全在这里设法筹款，但往往难以成功。显然工作大受影响。

中共中央从那时起设法自己解决党的经费。但党费数额太小，红色区域提供的支持往往不经常，这一切不能满足工作的迫切需要。因此，如同以前一样，非常需要国际无产阶级提供援助。我们希望您能作出指示，使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和负责这一问题的同志注意我们的经费困难，找到相应的解决办法。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信附后^①。

^① 见第 231 号文件。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受中共中央委托 向忠发

全宗 495，目录 19，卷宗 237，第 2—3 页。

德文打字稿，副本。

231

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 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信

1930年5月18日于上海

绝密

致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

亲爱的同志们：

中共中央请你们注意经费问题方面的以下事实：

1. 到4月底一直没有支付给我们6.3万墨西哥元，而5月份我们迄今尚未收到应领的半个月的经费。
2. 每次拨款都延误，而已拨给的经费中央也无法有计划地进行分配，因为这些经费大都以很小的数额一点点地拨来。
3. 共产国际批准给我们创办报刊的经费，我们迄今分文未收到。但印刷厂无法推迟创办，我们只得把作为其他用途的钱拿来办印刷厂，这自然又使其他工作处于瘫痪状态。

我们的工作因此大受影响。由于经费困难，已处于危险之中的机关搬迁，联络员出差，给各省组织的经费，救援被捕人员等等，都不能及时进行。这使工作困难重重。尽管半年来中央多方努力，这里负责经费问题的同志仍未取得任何改善。不久前获悉共产国际5月和6月根本不给经费，因此这里的同志不得不自己设法找钱^①。如果这里偶尔能找到一些办法，那根据经验来看，这只会使本来就一再延误的拨款工作变得更糟。目前革命的阶级斗

① 原文如此。

争日趋激烈，国内工作，尤其是中心城市的工作恰恰要求经费上的支持，在白色恐怖反攻的条件下用钱营救被捕者比以前更有必要，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不多的款项延迟拨付在最重要的关头也会造成巨大的政治损失！因此中共中央希望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认真关注这一问题。

同时，中共中央认为，必须更加努力实施中共自筹经费的原则。党自筹经费不仅是解决经费问题的唯一正确办法，而且也是党的组织职能之一。中央在给各级党组织的信中一再要求不仅必须定期收取按月的党费和特殊党费，而且还要苏区和红军的同志注意向中央提供经费支持。自筹经费这一原则被视为对党员进行的重要的教育工作。

党费收入很少。在秘密工作和联络困难的条件下无法预先确定苏区和红军提供经费支持的数额和时间。中央不断努力利用上述可能性，但远水救不了近火。

经常工作刻不容缓的需要仍迫切要求共产国际定期提供支持。我们建议采取以下具体措施：

1. 拨付积欠的款项和已同意支付但尚未拨付的款项。
2. 每日经费按美元牌价以墨西哥元定期拨付。
3. 通知这里的同志，每月经费在上月底付给，以便能按预算有计划地分配。经费至少应分两次付给。
4. 立即拨付5月和6月相应的经费。

我们希望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考虑到中共的整个工作，给予应有的重视，并对我们的要求作出令人满意的答复。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受中共中央委托 向忠发

附 件

2月	欠	经常性支援费	35000 墨西哥元
	欠	报刊维持费	4000 墨西哥元
	欠	印刷厂创办费	10000 墨西哥元
3月	欠	经常性支援费	11000 墨西哥元
4月	欠	经常性支援费	3000 墨西哥元
共计			63000 墨西哥元

全宗 495, 目录 19, 卷宗 237, 第 4—7 页。

德文打字稿, 副本。

232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 政治委员会会议第 64 号记录

（摘录）

1930 年 6 月 6 日于莫斯科

听取：3（739）。——安加雷蒂斯同志关于在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国际]列宁学校和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清党过程中提出的对中共代表团及其个别成员的指控的通报。参加讨论的有：斯特拉霍夫、张彪^①、曼努伊尔斯基、米夫、基萨诺娃、库西宁、莫斯科文、^②格克尔特。

决定：3。——坚决谴责中共代表团成员对待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派别斗争的行为方式，并建议中共中央更新其代表团必要数量的成员，新的任命应与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商定。

成立由米夫、莫斯科文、格克尔特、安加雷蒂斯和基萨诺娃同志组成的委员会提出论证上述决定的理由。

责成莫斯科文同志提请东方书记处审议有关学生和大学的问题。

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 格克尔特

全宗 495，目录 4，卷宗 36，第 1—2 页。

德文打字稿，原件，亲笔签字。

① 分别为瞿秋白、张国焘。

② 周恩来。

233

王稼祥给米夫的信^①

1930年6月8日于上海

我亲爱的朋友屈珀^②：

我5月26日的信^③是否已收到？我见到了我们的老朋友。

公司^④的事很顺利，尤其在农村。我和我的两个朋友——博吉先生^⑤和马克松先生^⑥——在中央办事处^⑦工作。我做外国广告^⑧，博吉先生任社会工作处^⑨秘书，而马克松先生在登记处^⑩工作。工资相当不差。

请给我提供新的日用必需品^⑪，如贵公司^⑫的产品，以及德国、法国等产品。

马克松先生特别需要公司组织方面的材料。中国市场情况^⑬

① 此信用普通邮件寄送，使用的是暗语。

② П. А. 米夫。

③ 文件没有找到。

④ 党。

⑤ 博古列洛夫——秦邦宪。

⑥ 何子述。

⑦ 中共中央机关。

⑧ 信的俄译文中此处之后有“报纸”一词。

⑨ 信的俄译文中此处之后有“鼓动宣传部”一词。

⑩ 信的俄译文中此处之后有“组织部”一词。

⑪ 情报资料。

⑫ 共产国际。

⑬ 革命运动。

十分看好，可望获取好的利润^①。但某些高级管理人员^②对此理解不够。他们对国际市场和中国经营活动^③的相互关系没有正确认识。他们认为只要外国压力^④不能通过外国人本身的竞争^⑤加以消除，中国的利润就无法保证。

我全家的健康状况现在好多了。但右肺^⑥由于医生^⑦不果断和不能干而中国又缺少好药^⑧至今仍痛。您能否寄些药来？

向我的朋友们问好！

您忠实的 康穆松^⑨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577，第 23—24 页。

英文亲笔签字。

① 革命的胜利。

② 中共领导人。

③ 中国国内外的革命运动。

④ 列强的干涉。

⑤ 帝国主义各国间的冲突、战争。

⑥ 右倾。

⑦ 可能是指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

⑧ 政治方针、行动纲领。

⑨ 王稼祥。

234

皮亚特尼茨基给莫洛托夫的信

(摘录)

1930 年 6 月 10 日于莫斯科

绝密

特急

致莫洛托夫同志

3. 托夫斯图哈同志告诉米夫同志说，在代表大会^①召开之前政治局不会研究中国问题的决议^②。这就是说，我们不得不至少再留苏^③同志在此间呆一个月，这在中国当前形势下对于中共是一个严重打击。由于从这个决议中删去关于非资本主义发展的一节，也许可以将此决议交政治局的某个委员会审读，然后在分头征询政治局委员的意见后通过，而不必等待代表大会的召开（斯大林同志和您的报告没作完，未必代表大会期间就可以研究这一问题）。

① 指 1930 年 6 月 16 日至 7 月 13 日在莫斯科举行的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

② 由米夫起草的决议第一稿于 1930 年 5 月 25 日经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会议讨论（参加的有：莫洛托夫、库西宁、洛佐夫斯基、曼努伊尔斯基）。会议建议米夫“根据交换的意见修改决议案，然后提交政治局审议”（全宗 508，目录 1，卷宗 97，第 1 页）。1930 年 7 月 18 日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核心领导小组会议再次研究了决议草案（见第 251 号文件）。1930 年 7 月 29 日批准了决议的最后定稿（见第 257 号文件）。

③ 周恩来。

皮亚特尼茨基

全宗 495，目录 19，卷宗 242，第 48 页。

打字稿，原件，亲笔签字。

235

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
政治委员会会议第 65 号记录
(摘录)

1930 年 6 月 12 日于莫斯科

听取：4 (745)。——共产国际执委会出版部关于中文出版工作的建议（见特别文件）。6 月 11 日飞行表决。

决定：4。——通过。

听取：14 (759)。——东方地区书记处给中共中央的电报草稿。

决定：14。——责成库西宁、格克尔特、曼努伊尔斯基同志修改电报稿（最迟至 6 月 16 日晨）。修改后的电报稿送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同志，征求他们的意见。

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 格克尔特

政治委员会 1930 年 6 月 12 日会议
第 65 号记录第 4 (745) 项附录

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
委员会关于中文出版工作的决定草案

1. 责成编辑出版部对前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出版社作

相应改组后将其纳入该部的工作系统。今后的工作主要是通过柏林的“东方出版社”^① 和中国当地的机构为中国自身服务。

2. 在业务年度结束之前，将划拨给国际列宁学校编辑出版部的 45000 卢布列入预算。制定 1931 年的计划和预算。

3. 将翻译和出版列宁选集和教科书作为首要工作纳入“东方出版社”的计划。

4. 在中国开办书店以便在东方发行西文和中文图书。为此拨款 1000 美元用于在当地建立机构和 2000 美元用于采购图书。我们的出版社应向书店提供不少于一年期限的贷款。

5. 在最近期间在中国开办合法的书店和中文出版社，先出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此事编辑出版部已与梁赞诺夫同志谈妥。

6. 为各国际共产主义大学的需要和为在苏联的发行，在中国采购马克思列宁主义书籍，从而促使中国出版社出版我们提供的译本。

7. 批准参加国内书店和中国出版社工作同志的人选（格尔曼和尤利安）^②。

1930 年 6 月 10 日

同意：（1）（皮亚特尼茨基）

（2）（曼努伊尔斯基）

（3）（格克尔特）

（4）（库西宁）

全宗 495，目录 4，卷宗 37，第 1、3—4、13 页。

记录为德文打字稿，原件，亲笔签字。附件为俄文打字稿，原件，皮亚特尼茨基和格克尔特为亲笔签字，库西宁的签字为真迹复制，曼努伊尔斯基无签字。

① 见第 133 页注②。

② 何人不详。

236

秦邦宪和何子述给米夫的信^①1930年6月14日于科伦坡^②我的朋友屈珀^③：

我们公司总理理事会^④指示我说，由于您，我亲爱的美国朋友，居住在苏维埃国家，所以我无权给您写信。他们认为我给您写了几封信是个大错误。

致最良好的祝愿！

博吉
马克松^⑤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577，第 26 页。

英文手稿，原件。

① 此信用普通邮件寄送，使用的是暗语。

② 原文如此。应为上海。

③ П. А. 米夫。

④ 指中共中央政治局。

⑤ 分别为秦邦宪和何子述。

237

王稼祥给米夫的信^①

1930年6月14日于上海

屈珀先生^②：

您是否已收到我的信？

李约翰先生^③跟我们谈了话。他说我们公司^④中从纽约^⑤来的人倾向于在大公司内成立小公司^⑥。如他所说，这个问题不仅是中国公司的问题，而且也是纽约总公司^⑦和中国办事处^⑧相互关系的问题。

请勿提及我给您寄上的信。

康穆松^⑨

全宗514，目录1，卷宗577，第28页。

英文亲笔信。

① 此信用普通邮件寄送，使用的是暗语。

② П. А. 米夫。

③ 李立三。

④ 党。

⑤ 莫斯科。

⑥ 派别。

⑦ 共产国际。

⑧ 中国共产党。

⑨ 王稼祥。

238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
第 128 号（特字第 126 号）记录
(摘录)

1930 年 6 月 15 日于莫斯科

1930 年 6 月 15 日

93. —— 伏罗希洛夫同志的问题。（政治局 1930 年 3 月 30 日会议第 122 号记录，决定：47—(2))。
批准政治局委员会提出的决议草案（见附录 1）。

抄送伏罗希洛夫、皮亚特尼茨基同志。

中央书记 斯大林

政治局第 128 号记录
决定：93（特别文件）附录 1

关于招收中国工人进军校学习的办法
(1930 年 6 月 15 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批准)

1. 考虑到迄今为止所实行的，实际上是从为国民党军队培养指挥员时期继承下来的在工农红军军校中为中国共产党培养军事人员的做法（学习期限长、学习课程中偏重正规军成分、主要通

过翻译教学，等等），加上学员选拔不能令人满意，这些不符合今天中共的需要，今后在苏联对中共党员进行军事培训将依据以下原则：

（1）在工农红军军校学习的中国人一律于今年毕业并转交中共安排工作。

（2）军事学习的基本任务是培养游击队的实际工作人员（指挥员、别动队员、爆破手、无线电报务员、军械员）。

（3）学习班的期限不超过 9 个月。

（4）学员人数不超过 50 人，完全是有相当党龄和革命经历的久经考验的游击队实际工作者、中共党员或团员，绝大部分是工人和农民。

（5）教学基本上应由中国人用中文进行。

（6）留下几名（4 至 5 人）经过考验和干练的人在苏联进一步从军事上进行深造，以便充任中国红军未来的指挥员或担任中共党员学员的教员。

2. 同 [驻共产国际执委会的] 中国代表团一起研究帮助在当地（在中国）主要革命起义地区开办培训游击队指挥员学校的必要性问题。

核对无误：赫里亚普金娜

全宗 17，目录 162，卷宗 8，第 160、164、167 页。

打字稿，原件，签字为真迹复制，附件是经过校对的副本。

239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 给中共中央的电报稿^①

1930年6月16日于莫斯科

绝密

电 报

上海，中共中央，东方书记处发

我们认为在目前条件下成立苏区中央（临时）革命政府为时过早，因为苏维埃政权尚未扩展到任何一个大工业中心城市和行政中心城市。但现在必须最大限度地集中并保证党对红军的领导。红军中在保持坚强的工人骨干的同时，农民应占多数。党在苏区应普遍实行平分土地，尽可能在分地上不损害中农的利益。土地国有化仍是一个中心口号，实际上只有在全国革命和工农革命民主专政取得胜利的条件下才能实现。除雇工工会外，请在苏区着手成立贫农团，贫农团应将苏维埃的一切措施用来为贫农和中农的利益服务。党应容许贸易自由，不应禁止买卖土地，不应通

① 库西宁和米夫在向斯大林和莫洛托夫送出本文件时写道：“由于迫切需要就当前革命斗争的主要问题（中国同志对这些问题如何解决没有清楚认识，例如，从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就可以看出）向中国共产党紧急作出指示，请在审议总政治决议草案（因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召开已推迟批准这个决议草案）之前同意根据附上的文本发出电报。曼努伊尔斯基和皮亚特尼茨基同志基本上同意这一电文。库西宁、米夫”（全宗514，目录1，卷宗569，第155页）。

库西宁和米夫所说的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是指苏区代表会议（见第229号文件注⑦）。

过苏维埃组织对居民的全面供应，不应对国内贸易和价格作出种种限制，由于军事需要和反投机倒把斗争所引起的特殊情况除外。党的整个活动和苏区革命机关的一切措施都应服从于农民真正群众性斗争的利益，服从于运动进一步发展、加强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工农联盟的利益，服从于进一步扩大苏区、尤其是扩大到工业中心城市的利益。以前关于加强党在组织和领导罢工运动方面的工作和在开展反帝斗争、加强苏区外农民运动方面的工作的指示仍完全有效。请强调指出，特别是以苏区名义强调指出中心口号是进行土地革命、驱逐帝国主义分子、统一全国、推翻国民党政权、支持和扩大苏维埃运动、实行八小时工作日制等。详见信。

核对无误： 海莫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569，第 155—156 页。

打字稿，经过校对的副本。

240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 给中共中央的电报

1930年6月19日于莫斯科

绝密

电 报

上海，中共中央，东方书记处发^①

我们认为，只要保证我们在苏区中央（临时）革命政府内的影响，就可以成立这样的政府。苏维埃政权要扩展到一个大工业中心城市和行政中心城市，这样的城市应成为运动进一步开展的基地，同时也是我们在政府中领导作用最可靠的保证。根据军事政治形势的发展，必须将注意力和力量集中在夺取这样一个据点上。因此，请在苏区成立有权威的中央局，采取一切措施尽可能加强红军。现在就必须最大限度地集中和保证党对红军的领导。红军在保持坚强的工人骨干的同时应实行农民化。党在苏区应普遍实行平分土地，尽可能在分地上不损害中农的利益。土地国有化仍是一个中心口号，实际上只有在全中国革命和工农革命民主专政取得胜利的条件下才能实现。除雇工工会外，请在苏区着手成立贫农团，贫农团应将苏维埃的一切措施用来为贫农和中农的利益服务。苏区的农会应逐渐融合在苏维埃之中。党应容许贸易自由，目前不应禁止买卖土地，不应通过苏维埃组织对居民的全面

^① 电报副本送莫洛托夫。档案中还有电报的初稿（见第239号文件）及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提出意见后的修改稿（见全宗514，目录1，卷宗569，第160—161页）。

供应，不应对国内贸易和价格作出种种限制，由于军事需要和反投机倒把斗争所引起的特殊情况除外。党的整个活动和苏区革命机关的一切措施都应服从于农民真正群众性斗争的利益，服从于运动进一步发展、加强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工农联盟的利益，服从于进一步扩大苏区、尤其是扩大到工业中心城市的利益。以前关于加强党在组织和领导罢工运动方面和在开展反帝斗争、加强苏区外农民运动方面的工作的指示仍完全有效。请强调指出，特别是以苏区名义强调指出中心口号是进行土地革命、驱逐帝国主义分子、统一全国、推翻国民党政权、支持和扩大苏维埃运动、实行八小时工作日制等。详见信。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569，第 151—151a 页。

打字稿，原件。

241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 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

1930年6月20日于上海

致政治局

亲爱的同志们：

在我们现阶段的讨论中，为了避免口头翻译造成长久的误解，我们认为用书面形式来表述可能引起分歧的问题是合适的。如果我们把争论激烈时说出的尖锐意见搁置一旁，那么剩下的就只是两个有争论的问题。第一，你们现在要发表你们的政治决议^①；第二，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你们决议中的一些政治问题。

1. 如果必须消除一切弱点，如果党要动员比迄今为止更多的力量，无疑认真修改党的政策和策略、组织方法和任务是很有必要和十分重要的。你们知道，现在莫斯科正在非常认真地重新审议与中国革命和中国党有关的一切问题，你们委派的代表^②也参加了这一审议。现在可能已作出决定。但你们突然作出一个总决议，尽管现有的决议在你们的代表从那边带回决议之前已足够了。你们试图尽快实行这个决议，虽然李立三向我们解释说，你们根据收到的通报对共产国际和你们的代表所作的某些决议产生了严

^① 指中共中央政治局1930年6月11日通过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决议（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第115—135页）。

^② 周恩来。

重的怀疑。你们认为这些分歧是如此重大，以致想往莫斯科发抗议电。（但由于这份电报的译文我们根本看不懂，我们从李立三的口头解释中也未能得到澄清，他收回了这份电报并说了实质上很对的一句话：“既然你们在这里都弄不清这份电报的内容，那么在莫斯科也是不会弄清楚的”。）

既然这些分歧对你们来说十分重要，你们知道将要作出或已经作出了十分重要的决议，那么为什么又试图匆匆忙忙地发表你们这一关于党的决议呢？既然你们自己也说，你们与共产国际在重大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那么你们为何要迫使全党面对这一决议，为何要迫使各个支部接受这一决议呢？如果归根到底可以推断，你们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由于我们不能设想是出于什么恶意）想在共产国际决议到来之前尽快借助〔你们的〕决议来指导全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们在制定这一决议时所使用的其他方法才是可以理解的。我们曾约定把决议草案给我们。但你们却通过了决议，友好地告诉我们说，决议已印好，要是我们不同意党发表这一决议，那我们就得停止革命工作。由于你们自己也多少觉得这种做法不妥，你们建议我们以“远东局的建议”为题把我们的修改和补充意见附在你们的决议之后。我们在这里谈到无法照这个建议办，不是考虑到秘密状态的条件不允许，而完全是由这样作政治上行不通。这个建议意味着在党内提出两个纲领。我们认为，在这种情况出现后再来谈这一建议是多余的。我们现在提出以下具体建议：（1）你们发电报给共产国际（我们已经发了^①）并要求尽快发表决议。（2）你们在电报中和专门的声明中明确阐述你们有分歧的各点。（3）你们的决议在进一步澄清之前不在党内发表。（4）如果你们不同意我们目前不发表决议的建议，那么请你们就此问题请求共产国际来解决。

^① 文件没有找到。

推迟发表决议决不会妨碍实际工作。但我们认为，如果一个负责任的政治局认为它与共产国际的决议有重大分歧的话，那么这个政治局的任务是先与共产国际讨论这一问题，然后再与党讨论，正如每一个省委书记在产生真正存在的或并不存在的分歧时应先找中央而不是找党员一样。

2. 你们决议第三部分第10段和第11段的提法即“一省与几省的首先胜利与全国革命政权的建立”^① 的政治性质引起了我们的怀疑。这种提法太笼统太抽象，因此我们非常担心，它什么也说明不了，相反会使一切机会主义分子更能对在目前形势下进行革命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产生动摇和失败主义情绪。我们根据收到的决议英译文逐字逐句引用这段话，是为了使你们能纠正所有误解，如果这种误解是译文不好造成的话。我们再逐字逐句引用两段话（黑体是我们用的）。

“（十）在产业落后的中国，一般说来，尚没有形成可以完全支配全国的产业中心和经济中心，而只有几个与帝国主义列强有关联的商业经济中心（如上海、香港、天津、武汉、大连），首先在这些中心确立了割据一方的军阀。因此全国的统治阶级，动摇与崩溃形势是一样，各省动摇崩溃的程度却有差别。在革命高潮日益接近的形势之下准备夺取一省或几省并建立全国革命政权成为目前党的策略的总方针。

（十一）一省与几省的首先胜利，是与全国革命高潮不可分离。‘没有革命高潮的条件之下，这种胜利没有可能实现’（六次大会决议案^②）。因此要夺取一省与几省的首先胜利，一定要注意全国行动的配合。没有这种配合，绝对不可能取得一省或几省的胜利。

^① 此处及以下引文引自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收到的193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议的英译文。

^② 指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的政治决议。

现在军阀战争的继续扩大与加深，无疑更便利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可是当革命已经能在一省或几省胜利的时候，反动势力的各派，各省军阀，尤其是各国帝国主义，要立即暂时抛弃他们相互的冲突，联合一致的来压迫革命。

以前第一次大革命时，革命政府可以割据广东一年来准备自己的力量。在现在苏维埃革命的阶段，是绝对不可能的。一省与几省的首先胜利，必然马上遇到反抗一切帝国主义压迫的残酷的国际战争。所以革命政府必须在全国革命高潮之下迅速的调动全国几千万以至几万万劳动者，一致坚决的与反动势力作拼死的决战，并且还要取得全世界无产阶级特别是已经胜利的苏联无产阶级的支持。所以我们能够克服反动势力，争取全国的胜利。所以一省与几省的首先胜利是全国胜利的开始，只是全国革命进到更剧烈的争斗，决不会有“割据”“偏安”的局面。任何一个省区都必须准备争取夺取一省政权的暴动，以与这一总的形势配合。所以在准备一省与几省首先胜利的时候，必须特别注意全国工作同时加紧，并且不要忘记必须与国际无产阶级斗争相联系，特别加紧中国革命在国际无产阶级中的宣传。”

虽然总的来说，这一部分决议正确地说明了由于客观和主观情况革命不能在全国一举取得胜利，因此才在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决议的这部分不仅没有对我们如何对待革命运动飞速前进省份的政策问题作出明确的回答，相反却对在某些省夺取政权与在全国夺取政权同时进行作了实际的指导。你们在你们的决议中写道，在中国目前的形势下，如果其他的中国群众不准备发动起义，在单独的省里苏维埃政权就无法存在。你们写道：“决不会有‘割据’‘偏安’的局面。”但是，同志们，怎么能这样说呢？我们现在难道不是在湖北、江西、福建等地“割据”吗？难道我们没有单独的苏区、苏维埃政府和红军吗？难道我们没有参加革命运动的千百万工农吗？但同时我们又无法夺取上海、天津、陕西、满

洲的政权。当然，没有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全国运动，没有国际无产阶级的全面援助，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但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同志们愤怒地否定这样的观点，不再继续发展这些省的革命运动，只是因为我们在上海还没有取得成绩？无疑在上海、天津、唐山及其他省同样取得进展是我们的迫切任务，但是对于我们有广泛革命运动而又掌握广阔地域的每一个省，我们的战略计划应该是怎样的呢？我们在这些省里的任务是以尽快的速度创造前提，尤其在工业中心城市更应如此，因为工业中心城市使我们更容易建立中央苏维埃政权。中央苏维埃政权无疑会遭到联合起来的反动派的进攻，这些战斗的结局以及全国取得胜利的速度取决于我们动员和引导群众斗争的能力。但这些省里的苏维埃政权依靠千百万工人和农民，将是加速在中国发展我们阶级力量的强大因素，它将是一切反对国民党、军阀集团和军阀政府的劳动群众集结的地方。如果在目前形势下，我们不给自己提出在这些走在前头的省份里创造成立中央苏维埃政府，尤其是在工人中心城市成立中央苏维埃政府的前提的具体任务，再说一遍，如果我们不去这样做，而沉湎于泛泛的学院式的议论，说什么今天难以设想在一省或几省成立中央苏维埃政权，不能“割据”，我们应该重新看待一切国际关系和其他关系，而今天我们本应作出具体的回答，决议的目的是把这种重新看待的结果向全党作出报告，那么我们简直是在逃避对十分重大的问题作出回答。这样我们在湖北、广西、福建等省仍停留在游击战的水平上，这样我们只要一直泛泛地思考问题，我们就会被打败。如果你们认为，这样含糊不清的决议有好处，那你们就错了，这样的决议只会使人糊涂，带来害处。不言而喻，严肃而具体地提出这个任务意味着动员全中国首先是全党尽可能多的群众，坚决面向大工人中心城市的工人群众。

3. 我们不想谈小的缺点、疏漏和个别的提法，我们只想指出

一点——我们认为是严重错误的疏漏。我们已经说过，依我们看如何才能改正苏区代表会议^①所犯的严重错误，具体说就是开展召开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活动。我们已经说过，必须在工厂和农村广泛宣传这次会议的全部决议，选举贯彻实施这些决议的战斗委员会，选举出席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代表。既然在这个如你们所说无疑是为党的实际活动所需要的决议中，只字不提这样重大的中心活动，那就不能不怀疑你们是否真的认为这一活动在政治上确实是重要的。党至今未能实施这一任务，既然你们自己在“关于一切问题和任务”的决议中认为没有必要谈这件事，那么我们又怎能去实施这个任务呢？

致衷心的敬礼！

受远东局委托 罗伯特斯^②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566，第 39—40 页。

德文和英文打字稿，副本。

① 见第 151 页注②。

② Г. 埃斯勒。

242

中共中央政治局给共产国际 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的信

1930年6月21日于上海

致远东局

敬爱的同志们：

来信^①收到，简单答复如下：

1. 中央的这一决议^②完全符合共产国际执委会、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的指示，符合中央关于举行湖北代表会议和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指令和一贯指示。远东局以前完全同意这一指示，现在却突然想不发表这一决议，即突然要使党中央的政治工作停顿下来。因此我们提出严肃的政治抗议。

2. 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对中国问题的意见和立场我们迄今为止没有收到任何正式的通报。上一次我们想给莫斯科去电，只是因为我们不同意莫斯科文（周恩来）同志建议中的一点。中央根据革命客观发展的要求作出的这一决议，中央委员会早已讨论过。这与我们收到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消息毫无关系。这一决议也不是为共产国际执委会讨论而写的。对这一点我们已多次作过解释，你们自己也非常清楚。为什么你们非要想方设法把这一决议

① 见第241号文件。

② 指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议《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见第177页注①）。

和共产国际的讨论联系起来呢？结果成了中国党起草这一决议是为了反对共产国际。这意味着破坏共产国际对中国党的信任。因此我们提出严肃的抗议。

3. 你们在信中谈到反对这一决议的第10段和第11段。你们完全曲解了我们的纲领。我们从未说过“只有全国群众起义，才能在一省或几省夺取政权”。我们只是说：“要争取巩固一省或几省的胜利，必须全力促成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在准备全国革命高潮之下，来争取一省或几省的胜利。”我们认为，现在已经到了准备，而且非常积极地准备争取一省或几省的胜利并在全国建立革命政权的时候了。党的任务完全不是准备夺取局部的政权。如果我们现在只准备局部夺取政权，那就是右倾方针，就是对革命形势估计不足。我们感到罗伯特斯^①同志一贯持这样的右倾方针。

4. 我们认为，目前革命形势的急剧发展要求为领导这一工作作出这样坚定不移的决议。搁置发表这一决议意味着把对革命的领导置于不顾。对革命、无产阶级和共产国际负责的中央委员会已决定立即公布这一决议，它不能接受远东局不发表这一决议的建议。至于你们关于开展有关第一次苏区代表大会的具体活动的意见，我们已纳入这一决议。

5. 罗伯特斯同志一贯执行右倾方针，他在远东局的工作确实妨碍了中国党对革命的领导工作，也束缚了中国党和远东局之间的关系。我们要求远东局解除罗伯特斯同志的工作。我们已拟好给共产国际的电报并请你们转发^②。

6. 至于我们较为详细的意见，我们决定派一位政治局委员前去你们那里，并与你们一起讨论。请你们确定会见的时间后告知。

① Г. 埃斯勒。

② 文件没有找到。

受政治局委托 向忠发

全宗 514, 目录 1, 卷宗 579, 第 44—45 页。
德文手稿, 原件。

243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 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

1930年6月22日于上海

致政治局

敬爱的同志们：

为了实施最近几个月党的极其重要的活动，即召开中华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我们根据我们口头交换的意见，提出以下具体建议：

- (1) 以筹备会议^①的名义立即发表号召书；具体通知三个月后召开中华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这一号召书的草案我们将于星期二寄给你们。
- (2) 组织召开苏区和红军的扩大代表会议，由会议选出代表。
- (3) 在企业特别是大企业中加紧开展活动，选举“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委员会”和选举代表，包括没有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农村在内。
- (4) 在报刊上加紧开展宣传活动，印发传单，组织集会和示威游行。
- (5) 每一个行动都应与这一活动的口号联系起来。

为了使这一活动真正进行好并避免近几个月来的失误和缺点，在一位政治局委员负责领导下成立从政治上和组织上开展这

^① 指苏区代表会议（见第151页注②。）

一活动的专门委员会。动员全党、青年、红色工会、反帝大同盟、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活动的政治方针仍是原定的方针，因为我们现在的任务是使群众都知道筹备会议通过的决议。

如果我们集中全力开展这一活动，我们就能纠正筹备会议所犯的错误。但我们应该比迄今为止更清楚地向全党上下说明这一活动的意义。请你们按约定的办法由组织局代表于星期五向我们提出一个确切的组织计划。如果你们能于星期二告知你们的意见，我们对此十分感激。

代表远东局 罗伯特斯^①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579，第 47 页。

德文打字稿，副本。

① Г. 埃斯勒。

244

埃斯勒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东方书记处的信

1930年6月23日至25日于上海

亲爱的同志们：

先谈一点看法。在开始叙述与〔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分歧及其发展和意义之前，必须先谈一点看法。由于政治局许多委员不在或生病，实际上代表政治局的是李立三，一切重大谈判我们只能同他进行。分歧有三点：1. 关于苏维埃代表大会的问题。2. 关于在起义省份成立中央苏维埃政府的问题。3. 已经相当明确地全面阐述的李立三关于客观条件的理论，他对党的作用估计不足以及由此产生的对党的今后发展，主要是在工人群众中的发展有害的后果。

1. 关于苏维埃代表大会的问题。

中华苏维埃代表大会筹备会议如预计的那样于5月20日在上海开始举行^①。参加会议的人数比我们预计的要少。只有40名代表出席，但据我们获悉，其中大多数是由群众推选的苏区和红军的代表。党员38人，非党员2人。这次会议无疑带来了很大好处。讨论了苏区的经验，澄清了许多问题和作出了一系列决议（工人法、土地法等），这些决议经普遍宣传后会带来很大好处。但会议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会议本应号召在一定时期（当然随着情

① 见第151页注②。

况的变化日期也可能变化）召开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这本应成为召开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有力推动。

会议开始前两天我们见了李〔立三〕。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次会议将会起非预期的作用。但会后李〔立三〕向我们通报说，他们把会议改称为苏区代表大会，这次会议等于是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他们似乎放弃了召开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想法。他举出政治上和具体技术上的理由来证明这一决定是对的。说什么在我们建议政治局召开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后政治形势有了变化，形势变得更为紧张，“我们在急速进攻，对我们在急速进攻”。这一说法的政治实质是目前的政治形势不允许召开这类代表大会。对此他还举出了具体技术上的理由。大部分苏区代表没有得到任何书面指示，只得到了口头指示。说什么苏区不懂得筹备会议的意义，“我们发现，全体代表都是被推选出席全国代表大会的”，“如果我们号召召开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那么由于政治形势这次大会根本就开不成。这将是政治上一大损失，因此我们把这次会议改了名，用它来代替代表大会”。“这也是政治上的损失，但否则损失会更大。”

同志们，我不得不承认，我们为这些事实、为他所列举的在我们看来非常荒唐的论据而感到愤怒，使我们感到愤怒的还有这样一个事实，这个决定是越过我们作出的。对于召开代表大会来说，目前的政治形势要比1月我们提出召开这次代表大会建议时合适20倍。筹备代表大会的活动、代表大会的召开、代表大会的决议本来是集中斗争和鼓动宣传、动员群众十分重要的武器。这次代表大会，主要是对于起义各省，对于在政治上、军事上和组织上集中为数众多的局部运动，对于工业中心城市的工人、起义运动尚未波及地区的农民与苏区和红军的联系都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这次代表大会应真正是一次广大群众的代表大会，应使人能感到苏维埃真正是他们的机关、劳动者的机关。而对此负责的

李〔立三〕却用只有 38 名党员参加的一次秘密的小会取代了这次代表大会。我们非常尖锐地向他指出，这绝对是向困难投降，绝对是对他整个苏维埃运动的意义不理解，他把趋于紧张的形势与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活动对立起来了，绝对是对动员群众的意义不理解，我们要求撤销已作出的决定。政治局声称，这似乎办不到。我们对此的答复是口头表述了附件中我们提出的建议。总的来说这些建议被接受了。关于如何具体实施这些建议的争论尚未结束，但我们的印象是李〔立三〕内心不同意这个想法，在发生了这些事情之后我们非常怀疑他是否理解这一想法。

请你们尽快看一下他在这次会议上的总结讲话。我只引用以下一段：“但许多同志抱怨我们的主观力量薄弱。这些想法产生了右倾。他们不懂得，革命是由客观条件而不是主观愿望造成的。只有客观条件才能创造出主观力量。例如，现有的红军是中国土地革命的产物，而并非中国土地革命是红军的产物。共产党也是由客观条件造成的，而不是由‘一小撮鼓动者和破坏一切的分子’造成的。尽管中国革命在 1927 年遭到失败，中国共产党今天已有近 7 万名党员。俄国 1905 年革命失败后共产党的人数从 5 万人减少到几百人。只要具备客观条件，中国革命即使没有共产党也将继续以太平军起义那种原始形式进行下去。共产党的职能是引导中国革命走上正确的道路。我们主观力量的职能目前仅限于此。同时，客观条件可能创造出主观力量。例如在 1925 年五卅罢工时期，我们在上海只有 300 个同志，在全国只有 800 个同志和 200 个红色工会工作者。日本棉纺厂罢工快满 14 天时已临近失败，这是 5 月 28 日，我们决定 5 月 30 日号召举行示威游行，目的是把这一经济斗争变为全国的斗争。当时我们预计参加示威游行的只有 200 名工人，连‘最爱说大话的人’也没有预计多于 400 人。结果怎么样呢？参加南京路示威游行的有近 3 万名工人。为什么？因为他们要求革命。我们把这称为客观条件。5 月 29 日我们进行的

鼓动工作是我们主观力量的行动。我们不能安心地躺在大树下等待果子掉进我们的嘴里，我们得用手去摘。在革命中主观力量也是非常重要的。”

这位党的领袖就是这么说的，而这个党在目前矛盾丛生的形势下的主要任务是把这个在工人中组织异常薄弱的党变为对中国劳动者的群众性政党。这位党的领袖在这次会议上就是这么说的，而这次会议的任务是发展中国革命的主观力量，这次会议应促使苏维埃代表大会尽快召开。请读一下这个报告——这是一位蹩脚教授抽象的胡说八道。

由于在这一问题上的争论，我们不得不非常严肃地同他讨论另一个问题。要是我们不对越过我们通过这样的决定提出严肃的抗议，那我们就得马上离开这里。在这之前两天我们见了李〔立三〕，在这两天中他的“客观条件”没有发生变化。我们对他说，这不是暗中破坏，就是在政治上绝对不理解这样一个取消活动的决定的严肃性。他的反驳可以归结为：他在会议上才发现有必要作出这样的决定，只是由于技术上的困难他未能通知我们。

这场绝对必要的争论加剧了我们和李〔立三〕之间早已出现的紧张关系，他由于不理解政治任务对我们的多次批评持敷衍搪塞的政策。李〔立三〕不能经受任何批评，特别是在涉及重大问题时，他自认为是领袖。

对政治局决议的分歧如下：在关于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问题的争论激烈进行时发生了政治局通过决议这件事，它很快就变成了严重的冲突。这里必须明确几个细节。

我们收到了政治局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电报^①。我凭记忆引用这份电报，但我认为几乎是逐字逐句地引用的：政治局确定了

^① 文件没有找到。可能是指中共中央政治局1930年6月12日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电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第136页）。

对军阀战争的失败主义的方针。政治局强烈反对关于在一些省建立苏维埃根据地的暴动思想。

我们简直不明白这份电报。这是与我们迄今为止所说的一切完全对立的。我只能将这份电报理解为绝对是译文引起的误会。我们就这份电报的意思一再问李〔立三〕。他告诉我们说，他从刚从莫斯科回来的一位中国同志^①那里获悉，共产国际执委会以及莫斯克文^②持与政治局的方针相对立的观点。但他承认电报写得确实不明确，尤其是关于苏维埃根据地的话，但连翻译也无法向我们说清楚他指的是什么。因此他收回了电报。在同一天李〔立三〕告诉我们说，政治局在起草关于总的政治形势的决议。我们对此并不很高兴，因为这又将是一份毫无新意的决议。我们并不反对，但与他们约定，这一决议先要送来批准，他们先把决议草案给我们看。在发生了目前在政治上绝对没有任何必要的电报事件和李〔立三〕对他从莫斯科获得的消息所作的含糊其词的说明后，我们开始对他持某种不信任态度，推测这一次不会是普通的决议，而是另外一个什么决议。我们得出的印象是李〔立三〕试图设法迅速通过决议，在莫斯科作出什么决议或莫斯克文从那里返回之前通过这个决议。某些表面的迹象加强了这种印象。李〔立三〕告诉我们说，违背我们的约定，决议^③已经印好，但政治局准备以“远东局的建议”为题把我们的建议和修改意见附在决议之后并发给全党。在我们看来，这个决议关于在起义省份成立中央苏维埃政府问题的主要部分，尽管写得含糊不清又十分偏激，但它意味着否认有成立这一政府的必要性。我们就这一问题进行了争论，想弄个明白；但弄清的只有一点：李〔立三〕不想就这

① 何人不详。

② 周恩来。

③ 见第 177 页注①。

一问题进行任何严肃的争论，或者他用笼统的看法和推说译文引起了误会来掩饰自己的行为。他一再反复地谈一点：“你们应该同意发表这个决议”。我们没有同意并向他作出声明，让他征求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决定。我们认为发表这个决议就有破坏国际纪律的危险。有一次开会他带来了少先队员^①同志。李〔立三〕对我们说，由于我们坚决不愿意发表这个决议已使革命工作停顿下来，他威胁我们说，政治局在这种情况下无法进行工作，不能把这个决议搁置两个星期，等收到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决定后再来定。“我们的义务是紧跟共产国际，但我们也有关务要为中国革命服务”。在这种情况下我写了附上的给政治局的信^②。过了 24 小时收到了答复。这就是给共产国际的电报，其中指责罗伯特斯^③“一贯右倾”并要求把他逐出远东局^④，以及政治局给我们的书面声明，其中继续坚持要求发表决议^⑤。

这个决议原则上毫无新意，新的只是含有一些危险的提法，只字不提关于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活动这一极为重要的中心任务，阻止发表这样的决议是否正确请你们决断。关于我们对第 10 段和第 11 段所表示的怀疑，我们在政治上是否正确也请决断。

但是我们应该坚决反对的一点是李〔立三〕恶劣的政客手腕。在他发那份电报之前 24 小时，他声称，这个决议可以发表，因为与远东局没有任何重大分歧，而由于我们坚持不发表决议，罗伯特斯则在 24 小时内表现出一贯的右倾了。这是李〔立三〕去年 12 月用过的手法。至于对我提出的具体指责，说我只赞成在中国的一部分而不是在全国进行革命，我不愿进行自我辩护。要是这样

① 关向应。

② 见第 241 号文件。

③ Г. 埃斯勒。

④ 文件没有找到。

⑤ 见第 242 号文件。

的话，那么医生们而不是政治家们就可以提供适合这一争论的场所了。

最近的事态绝对坚定了我的这种看法：只要李〔立三〕仍然是党的领袖，在党的具体组织工作中以及在党内培养工人骨干的问题上就不会发生重大转变。他对每个问题都作出抽象的哲学答复的这种手法、他对党的主导的组织作用的绝对忽视、他对做群众工作的必要性的不理解，加之他在当前所处的地位，这些都是党进一步发展的障碍。他在苏维埃代表大会问题上的指导方针使这一论断变得100%的明确。他的影响，特别是对党中央机关部分知识分子的影响极大，因此也极糟。况且他又倾向于把全部工作都抓在自己手里，控制中央的每一个部。在这方面他无疑阻碍了比迄今为止更大规模地培养和提拔广大领导骨干的工作。

我们具体提出以下建议：(1) 尽快发表你们的决定；(2) 就苏维埃代表大会问题发表专门的动员信；(3) 赞同我们停止发表决议的决定；(4) 驳斥李〔立三〕的政治手法。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罗伯特斯

附件：

- (1) 远东局给政治局的信^①。
- (2) 远东局关于开展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活动的建议^②。
- (3) 政治局的声明。^③

补充：1930年6月25日。

- (1) 这封信的前半部分写好后，与政治局的两位代表——李

① 见第241号文件。

② 见第243号文件。

③ 见第242号文件。

[立三]和少先队员同志开了会。我们声明，争议的问题提交给共产国际，我们坚持不发表决议，但我们放下就有争议问题进行的争论，现在就来解决迫切的问题。李[立三]对我们说，他们同意这个意见，但他们发表决议时加上我们附在信后的两条修改意见^①。

于是我们又重新争论起关于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问题，并请政治局作出答复。李[立三]对我们说，他原则上同意我们的建议，但政治局还没有作出决定，一切要到星期六才能办妥。我们要求在星期六以前提出具体的活动计划，因为任何拖延活动的做法都会使党涣散，使这一活动无法进行。对此李[立三]说，他同意，因为这一活动确实是党的十分重要的活动。这是他现在说的，而在这以前他竭尽全力为这个决议而斗争，他认为这个决议立即发表对于领导革命十分必要，但是这个决议却只字不提对党十分重要的这一活动。而现在就这一点对决议作的补充更证明对这一活动严重估计不足。

远东局原则上同意这些修改意见。但为了切实开展活动必须对政治局施加压力。你们对这一问题的意见很有益，即使用电报发来也好。

(2) 我们刚得到消息，说[阮爱]国^②最近将抵达上海。总之，他摆脱了警察。真是好极了。

(3) 迄今为止动身的代表有：20名中国人，3名安南人日内动身，5名菲律宾人按计划应于24日离开菲律宾。关于台湾、新加坡等地的代表问题还很不清楚。

(4) 我们决定派维利^③去，原因如下：①为通报情况，②为

① 文件没有找到。

② 胡志明。

③ Г. М. 别斯帕洛夫。

带走积存的许多材料，③为使本应动身的怀特^① 留在这里，做我们的联络场所。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罗伯特斯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566，第 57—59 页。

德文打字稿，副本。

① J. 多尔森。

245

向忠发给周恩来的信^①

1930年6月25日于上海

秘密

恩来同志：

由于路途遥远、邮递缓慢，我先给你写封短信，而10天之内将派人送上详细材料。请告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主席团将对远东局和中央之间的争执以及其他各种重要政治问题的审议推迟到中央详细报告收到后再进行。现简单谈谈目前的形势。

一、革命形势与党的路线

(1) 尽管蒋介石在陇海路和京汉路吃了败仗，华北的军事行动^②仍具有持久的性质，鉴于这种情况，对于广大工农兵和劳动群众来说，持续不断的军阀战争成了难以忍受的祸害，各地直接或间接地爆发了反战的斗争。生活用品价格普遍飞涨，主要是米价飞涨（上海23元，汉口21元），工厂和商店大批倒闭，农村破产，土地荒芜——这是全中国普遍的现象。资产阶级豪绅的国民党不仅完全不能解决这一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而且甚至表现出完全的惊慌失措和动摇不定。这一切都是预示着革命即将爆发的迹象。

(2) 革命斗争的发展惊人地迅速，与四月时期（运动之初）有

① 文件上有批注：莫洛托夫同志。

② 指蒋冯阎战争。

很大不同。

第一，罢工浪潮高涨：5月30日后上海发生了10多次罢工，参加罢工的广大工人群众表现出很大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清楚地证明了未来的爆发已经临近；青岛工人与警察的武装争斗接连不断；天津、武汉和广州——到处爆发具有明确政治斗争性质的罢工。黄色工会的破产十分明显而彻底，红色工会有一定发展（不能不承认这一发展异常缓慢，对此必须十分重视）。上海、天津、武汉、唐山、香港等地开始建立工人的武装组织。统治阶级把城市变成进行残酷迫害的场所，竭尽全力镇压工人的斗争，但看来无力对付他们。罢工运动的高涨和工人斗争的加强正在成为事实。

第二，英勇的农民暴动浪潮席卷各地。江西和湖北有三分之二的地方变成了红色区域，福建和东江正开展大规模斗争，已不再是蒋介石集团或广西集团的根据地，在其大部分农村中暴动不断，夺取县城，成立县或跨县的（包括几个县的）苏维埃政府。不久前占领了大治、石城……^① 广昌、浏阳、茶阳、新提等重要城市。目前属于苏区的有以下地区：鄂东、鄂西、鄂东北和鄂北、赣东北和赣西南、闽西和闽北、东江、琼崖（海南岛）……通海、豫东南、直隶南部……共17个地区。满洲虽然略为晚些，但也爆发了游击斗争。全中国像一个省一样都被这一自发斗争所笼罩。据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②统计，苏区农民超过2000万，其中500多万加入了武装组织。这些数字是完全可靠的。

第三，红军的发展更快：各军发展迅速，直隶南部成立了新的两个军（第十九军和第二十军），而在……成立了第二十一军，3个月中至少吸收了30万新战士。在全国红军代表会议^③后重新

① 此处和以下的删节号是文件原有的。

② 指第一次苏区代表会议（见第151页注②）。

③ 指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扩大会议，1930年5月中旬在上海举行。

研究和确定了红军的策略、战略、组织、编制、教育工作和条令（见〔关于〕红军的专门报告^①），以前有过的最危险的右倾现在已经纠正。此外，在红军地区成立了4个红军学校，学制为半年，各校分别培养1000人。这些学校对于红军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第四，军阀部队中的士兵群众直接承受着军阀战争的压迫，很容易接受我们的影响，倾向革命。各地自发地发生了士兵暴动，各地军阀阵营中的士兵纷纷投向工农和红军一边。尤其经常从前线投奔共产党。党组织在蒋介石、阎锡山和广西集团的部队中有所发展，但在冯玉祥和张学良部队中还很薄弱，不过就连在这些部队中组织士兵暴动的条件也完全成熟。

第五、城市贫民自发举事，尤其在安庆、芜湖、九江、景德镇等地这一运动规模巨大，但党的领导明显不足。

第六，反帝运动正迅速发展。

第七，党的组织（在全国）已发展到21万人，仅赣西南16个县就有好几万人。城市中也有一定的发展：5月在直隶和武汉有不少工人入党，这个月里上海党组织吸收了新党员300人。当然对这些数字不能过于乐观，因为尽管发展党组织的客观条件完全成熟，但其中隐藏着主要的危险——右倾。

（3）总的形势说明，真正的革命高潮——直接革命形势——正在临近，此外，在目前军阀战争的形势下，蕴藏着把军阀战争变为革命战争的巨大可能性，蕴藏着首先在一省或几省夺取政权的可能性。毫无疑问，党应该坚决地竭尽全力来完成这一任务。这就是中央不久前发表政治决议^②以便领导全党去执行这条路线的原因。若是在现有条件下不坚决动员全体党员去执行这条路线，若

① 文件没有找到。

② 指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议《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第115—135页）。

是发生动摇、怀疑、观望等待，那就是对革命犯下滔天大罪，那就是阻挠革命。中央因此与远东局发生严重分歧。虽然远东局竭力阻挠我们发表决议，但中央未能屈从远东局，还是发表了决议。

（4）中央制定了贯彻这一决议的具体工作计划，大致如下：

（1）在上海、武汉、天津、香港等地组织政治大罢工以抗议军阀战争。

（2）组织铁路员工和海员反对军阀战争的大罢工，着重在平汉路、陇海路、北宁路、粤汉路的铁路员工及长江的海员方面。

（3）扩大上海、武汉、天津、广州、香港等地的工人武装组织。

（4）尽可能组织地方上的暴动。

（5）坚决开展反对军阀战争的士兵运动（现在在南京、德州、武汉和平汉路这方面的可能性很大；只需选择战略上有利的时机并利用相应的借口）。应在各地领导士兵群众的斗争。

（6）扩大红军（3个月内准备扩大到50到60万人），集中组织，统一领导（已决定建立军一级组织并成立中央军事委员会驻香港和武汉的代表处）。

（7）为首先在一省或几省取得胜利应集中注意武汉及其附近地区，即特别重视这几个省的工作。在红军向全国进攻的计划中必须把武汉放在首位并在武汉本地组织配合工人武装暴动的浪潮。

（8）广泛掀起欢迎和支持全国苏维埃代表会议的运动，并确定在9月份或10月份召开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

（9）加强在外国海员和士兵中的工作（上海已有一定的组织基础：法国海员中已有群众性组织）。

（10）加强国际宣传。在鼓动宣传部下面成立国际宣传委员会，并成立中国电讯社，用英文和日文发布中国消息。预定在下个月出第1期。

(11) 加强武装暴动的技术准备和组织准备。

(5) 这样的策略方针完全符合客观的革命形势；对这一点应向共产国际执委会很好解释，请它在决议中肯定这一方针。平洲^①同志转告说，你的报告表达了“建立苏维埃根据地”的观点。我们认为，这一提法可能导致错误观点、地方割据，这是十分糟糕的。必须立即修改这一提法，代之以如下口号：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与成立中央苏维埃政府。请将政治局这个一致的意见转告共产国际执委会并在相应的决议中作出改变。平洲同志还说，共产国际执委会对我们说的“进攻武汉”非常怀疑。中央从未打算只靠红军的力量去作这一进攻，相反，中央决定坚决准备首先在武汉取得胜利，加强武汉工人暴动的工作，至于红军，当然在这时它要向武汉方向挺进以便与武汉暴动工人会师。如共产国际执委会在我们对红军进攻武汉问题作出解释后仍有怀疑，那么请转告，如果他们怀疑准备首先在武汉取得胜利的方针是正确的，那么我们持完全不同的看法，并请你在共产国际执委会面前为我们的观点进行辩护。

二、我们与远东局的分歧

(6) 在保罗^②同志赴莫斯科后，远东局只剩下罗伯特斯^③同志，他屡屡表现动摇和右倾。他对我们中央总是找出各种琐碎的技术问题来干扰中央。因此中央与该同志产生了一系列严重分歧。

第一，上海4月8日事件^④后，罗伯特同志看到没有举行大规模政治罢工和群众性示威游行，就对革命形势的估计产生动摇。

① 原文如此。何人不详。

② И. А. 雷利斯基。

③ Г. 埃斯勒。

④ 指1930年4月8日由共产党组织的学生和工人反帝反国民党的群众集会和示威游行。

他提出革命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实际上这个问题掩盖着对工人斗争飞速发展可能性的怀疑。此外，他不承认中央提出的以下观点是正确的：“虽然目前革命发展不平衡，但各地阶级斗争日趋尖锐是一样的。”

第二，在苏维埃代表大会后党组织人数大大增加了。党员人数从以前根据苏维埃代表大会统计的7万人，到目前已增至21万人，诚然，城市组织发展的速度没有这么快，因此工人的比例更小了。他根据这一点说，中国党组织不仅没有前进，而且倒退了。这种说法和取消主义观点毫无原则性区别。

第三，关于具体的总方针问题他断言，应该集中力量准备一省或几省的暴动。中央则认为，在全国革命高潮加速到来的形势下，应该首先在一省或几省取得胜利，而这意味着在加强全国工作的同时应着重注意武汉及其附近的一省或几省。这一分歧导致在政治决议问题上的重大争论。

第四，在苏维埃代表大会问题上发生了争论。根据远东局的建议，中央应准备召开全国各苏区的代表大会，这不是指召开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具有全国政权性质）。根据初步计划拟于5月1日召开预备会议，而5月30日正式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但是5月16日当代表们到达后才发现，这一拟议中的计划大部分苏区没有收到，代表们只是听说有这个计划，因此出席代表大会的代表很少，甚至没有区分预备会议和正式会议。加之这时各苏区在贯彻中央关于进攻策略的指示，正与军阀作残酷的斗争，因此不可能派出大量代表参加大会。根据这些情况，中央决定宣布预备会议为正式会议，因为否则就无法通过决议并加以贯彻。正好这时与远东局的联系出了问题，由于没有场所我们无法建立与远东局的联系。因此我们无法与远东局预先进行商量。当联系恢复后，苏维埃代表大会已经开幕；罗伯特同志认为中央取消了苏维埃代表会议，因此犯了十分严重的政治错误，他的这一意见大家都觉

得出乎意料。照他的说法，在预备会议改称正式会议后，“已无法号召群众投入建立苏维埃的斗争”。我们反驳说，相反，这以后更容易发动群众投入建立中国苏维埃的斗争，以苏区正式会议的名义这样做要比以全国苏区代表会议预备会议的名义召开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方便得多。我们还说，如果中央把具有最高政权性质的苏维埃代表大会改名，那无疑就是犯严重的政治错误；苏区代表会议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把它的预备会议改称为正式会议不是什么政治错误。但是他坚持自己原来的观点，认为中央在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问题上犯了十分严重的政治错误。我们觉得这样的批评十分奇怪，如果他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也这样来谈论我们，那就有可能在相当程度上损害了我们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眼中的形象。因此我们希望，你们向共产国际执委会说清楚我们分歧的实质，这些分歧实际上是怎么回事。

第五，现在来谈谈关于政治决议的分歧。第七十号通告^①后，高潮迭起的革命斗争使党面临许多新的重大的基本问题，中央感到有必要不仅从理论上而且从实际策略上说明如下问题，如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联系；说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原则及相应的策略方针，关于革命爆发的问题，而主要的是把军阀战争变为国内战争的具体策略。很明显，只有当正确地、按列宁的方式理解这一切问题时，才能坚决执行当前的任务和策略。这些问题在湖北代表大会^②上和苏维埃代表大会上都被提了出来，就这些问题作出了连远东局也都曾同意的正确决议。在苏维埃代表大会后革命形势的发展更快，要求中央起草一个决议来切实领导全党，动员全党并坚决贯彻这个方针。当时更加需要这样做，因为相应的决议已由湖北代表大会和苏维埃代表大会作出，中央如不通过上

① 指1930年2月26日中共中央第七十号通告（见第72页注④）。

② 指湖北省党组织代表会议（见第128页注①）。

述决议在政治上简直是荒唐，会造成全国在执行既定任务方面的不一致。换句话说，中央就会犯十分严重的政治错误。因此，政治局在三次专门召开的会议上讨论了这一决议后决定予以通过。应该指出，在这之前政治局就通知了远东局，说中央打算讨论十分重大的政治问题并建议先与远东局一起讨论。罗伯特同志回答说，政治局可以不先与远东局协商就讨论这些问题，因为不可能出现原则性的政治错误。在中央通过了这一决议后，平洲同志来了，他对我们说，你提出了“建立苏维埃根据地”的口号，此外，农民决议草案也已经写好。我们立即意识到这一提法的危险性，它容易被说成是地方割据，因此立即拟定电报，请转交共产国际执委会，在电报中表示不同意这类观点。中央的决议远东局收到了，好像同时也收到了这份电报。罗伯特同志表示坚决反对，并开始批评中央，认为中央似乎通过了决议并发表了与共产国际路线不一致的观点，似乎中央的决议就是要反对共产国际，他固执地坚持要中央不发表这一决议，直到收到共产国际执委会的答复为止。中央解释说，1. 这一决议与共产国际的路线毫无分歧，它继承了[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第七十号通告、苏维埃代表大会、湖北代表大会的方针以及远东局本身的方针。我们试图证明，既然与远东局没有原则性分歧，因此没有理由推迟发表决议。2. 这一决议完全符合客观的革命要求，为了切实领导已爆发的大规模革命斗争，党应该作出这样的决议。推迟发表这一决议会导致全国开展革命工作和执行策略中的不一致，造成一系列严重的政治错误。3. 目前中央的方针在各方面都符合这一决议的方针，推迟发表决议使中央无法再继续工作。4. 我们特别谈到，中央还没有完全收到共产国际执委会最近讨论的[结果]，这一决议与共产国际执委会的讨论没有任何关系，因此，它决不可能是反对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决议。此外，远东局一年来工作的经验可以使它明白，中国党忠于共产国际的路线，决不会写出反对它的决议。5. 如果共产

国际执委会在收到决议后发现我们的决议中有错误，中央会立即进行自我批评，完全接受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决议。如果害怕犯错误，在收到共产国际执委会的答复前不发表决议，这就意味着对革命不负责任，违背布尔塞维克党的精神。罗伯特同志在得到这些说明后仍丝毫不改变他的观点，相反发表了与决议中所表达的意见完全不同的意见，即：他认为应集中一切力量准备一省或几省的暴动，认为中央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动摇。中央在讨论后确认，中央坚定不移地坚持了在当前中国革命高潮加速到来的条件下首先在一省或几省取得胜利的观点，而罗伯特同志关于集中一切力量在一省或几省夺取政权的观点是公然的地方割据的观点，尽管这个观点貌似激进，但实际上它对客观形势估计不足，滚到了右倾机会主义理论一边去了。凡是不同意立即发表中央决议的人，就把中央置于革命的罪人的地位。但是与远东局的长时间讨论和会谈没有取得任何结果。远东局写信给中央，其中指责中央说，中央的决议反对共产国际的路线^①，虽然决议中没有“集中一切力量准备一省或几省的暴动”的说法，但其中有这样的倾向；另一方面，它又断言，“只有中央在全国发起暴动，它才能在一省或几省夺取政权”，“这会使群众斗争活跃起来”。中央再一次讨论了这封信并决定：1. 远东局把中央决议与共产国际执委会决议对立起来，指责中央发表了反对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决议，如此等等，这一切都是以破坏共产国际对中国党的信任为目的的。2. 远东局的观点丝毫没有估计到全中国革命高潮到来的速度及其可能性，否定党有必要为争取中国革命胜利而斗争。这个观点接近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因为远东局只看到一省或几省，看不到整个中国，号召在一省或几省集中力量，从而鼓吹地方割据的观点。这是极其错误的路线，不仅如此，还是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中央

^① 见第241号文件。

因此决定：1. 责成中央发表这一决议。2. 请求远东局和共产国际执委会从远东局召回罗伯特同志。给远东局写回信并给共产国际执委会发专门电报。请你就这一问题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作详细的说明，特别要他们注意，这个决议是出于领导全国正在开展的革命运动的要求，与共产国际执委会内部的讨论毫无关系，决没有反对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性质。中央至今还不知道共产国际执委会决议的内容。再次请你以政治局的名义坚决要求解除罗伯特同志在远东局的工作。

三、关于共青团的工作

目前共青团工作出现转折：旧的路线已改变，因此整个工作明显有所改进和加强。

四、其他一些小问题

1. 除了专门给你的信外，还附上以下文件：

- (1) 最近中央的政治决议草案^①（远东局翻译的这一决议的英文本有严重错误。请你要求共产国际执委会核对译文，以免发生误解）。
- (2) 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政治决议（尚未定稿）。
- (3) 苏维埃代表大会宣言。
- (4) 苏维埃代表大会劳动法。
- (5) 苏维埃代表大会土地法^②。
- (6) 最近中央的几个指示^③。

① 指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议《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第115—135页）。

② 见《共产国际》杂志，莫斯科1930年第9期第80—99页；《中国问题》，莫斯科1930年第4—5期，第172—198页。

③ 什么指示不详。

(7) 红军〔代表〕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几个报告^①，其中两个没有誊清。

你收到此信后，如认为有必要，可译出并交共产国际执委会一份。

2. 目前中国的工作极其困难。我重病缠身，甚至无法出席政治局会议。小关和徐英^②同志也病了。你接到此信及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报告后不必等讨论结束，立即回国。切勿拖延。

3. 如果〔瞿〕秋白、〔邓〕中夏、树怀^③、黄平及其他同志在工作中没有犯严重的政治错误，就让他们回国。

4. 尤其重要的是你要与共产国际执委会讨论动员各兄弟党保卫中国革命运动的具体策略。

5. 请共产国际执委会派几位外国同志，主要是英国、法国、美国、日本、印度和安南的同志来在中共领导下做外国海员的工作。

6. 与海参崴失去直接的无线电联系，必须尽快恢复，以便今后在必要时能直接联络。远东局也没有自己的无线电台。如果共产国际执委会同意提供设备和派出工作人员，我们愿意接收。

7. 已发现我们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同志业务水平很不高。必须请求派外国同志来帮助工作。

8. ……我们在学校里提出了党的问题并作出了解释，在这方面取得很大成绩。我们听说，共产国际执委会对这一问题明确表态，完全赞成这一方针。我们认为，这个问题具有重大政治意义，希望共产国际执委会就此作出专门决议。

9. 关于共青团的问题。希望不久青年共产国际派代表来，陆定一很快将回国。

① 文件没有找到。

② 原文如此。可能指关向应和徐锡根。

③ 音译，应是余飞一译者。

10. 经费问题。现在很难搞到钱。最近三个月我们未能从任何地方搞到钱，而远东局正式通知我们说，它无法提供帮助。我们派人去红色地区，但在那里也未能搞到钱。因此我们的大部分工作受到影响，上至中央下至省委的各级党机关都遇到很大困难。请把钱电汇给我们。

11. 共产国际要的材料和书籍不久寄去。

12. 目前中国革命的发展迫切要求我们与共产国际更紧密地联系。应安排好书面联系。当你谈及这个问题时，请说明做这件事的具体办法。

向忠发

又及：你回国时请不要忘记带回一份副本……中央已经没有了。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600，第 14—28 页。

打字稿，副本。

246

陈绍禹给米夫的信^①

1930年6月26日于上海

我敬爱的屈珀^②：

近来我和其他职员给您写过几封信。我们公司^③总的情况您大概已经知道。德^④等人从巴黎^⑤来后情况更糟糕、更严重。全公司全面开展运动，公司中有4名右倾分子和派别分子。此外，我今天收到一张令人奇怪的条子，其中说（我逐字逐句照抄如下）：

“在你的几次发言时老板^⑥指出了你的严重的政治错误和组织错误，要求不仅作出口头声明，而且作出书面声明，但你既没有以口头形式也没有以书面形式明确而肯定地承认你^⑦在政治上是右倾分子，组织上是派别活动分子。这意味着你对老板批评的错误承认得很不诚恳，相反，你以〔这样的〕手法掩盖自己的错误。老板近来收到报告说，你给巴黎写了信，其中说老板在政治

① 此信用普通邮件寄送，使用的是暗语。

② П. А. 米夫。

③ 党。

④ 何人不详。

⑤ 莫斯科。

⑥ 向忠发或李立三。

⑦ 原文如此。意思是：自己。

上和理论上都不行，通知马克松、博格涅尔、康穆松^①不久回国^②。这非常清楚地证明了你的派别活动。老板为了更清楚地了解事实的内容，要求你在三天内就此问题作出解释。非常重要^③！”

我亲爱的！对这样的指控，无话可说，天哪！

现在我和所谓的派别（马克松、博格涅尔、康穆松）时时刻刻都有被永远赶出公司的危险！当然我是首当其冲，因为我在许多问题上不同意老板的看法已非今日始。现在务请谈一下李〔立三〕在《布》杂志^④第4期和第5期上发表的纲领性文章和1930年6月11日中央办事处的描述^⑤。我想，你从中可以了解到我们分歧的总的情况。希望不久能弄清一切有争论的问题并指出谁对，谁的路线正确。

我敬爱的！如您所知，虽然我还年轻，但我在同反伊卡^⑥路线的种种错误倾向作坚决斗争时过去和现在都非常非常不喜欢痛哭流涕。但这一次，尤其是现在我给您写上述一切时，我不能不失声痛哭，因为问题是迟早会弄清楚的（我坚信这一点，毫不动摇），但不知道究竟到什么时候才会真正弄清。我在哪里？！或许我已经不在自己心爱的公司里了！！！唉，“怎么办”？我敬爱的！

心如刀割！〔泪水〕不断！这并不意味着我在斗争中不勇敢，

① 分别为何子述、秦邦宪和王稼祥。

② 原文如此。

③ 在抄录对陈绍禹指责的页旁有附言：“我公开承认我给您写过两封信，第一封是我在上海时写的，第二封写的时间记不清了。但两封信总的内容都是个人问候，没有谈什么重要事情”。

④ 指李立三的文章《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载《布尔塞维克》杂志1930年第4—5期，第19—23页。

⑤ 指中共中央政治局1930年6月11日的决议（见第241号文件注①）

⑥ 共产国际路线。

而是意味着我也许不久将因完全莫须有的罪名（在政治和组织〔问题〕上）被开除出与我生死攸关的公司。

我敬爱的！中央办事处^①不从组织上和政治上认真改组，生意^②即使现在也决不能取得彻底胜利的发展。盼复信，如江河盼水一样。请写封短信寄到博格〔涅尔〕处。或者向斯拉温^③要我的地址，最好通过他转告。

致热烈的兄弟般的敬礼！向大家转致深深的敬意！

你的伊万·安德烈耶维奇^④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577，第 48—52 页。

俄文亲笔信。

① 中共中央。

② 革命。

③ 李竹声。

④ 陈绍禹。

247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
政治委员会会议第 69 号记录
(摘录)

1930 年 6 月 28 于莫斯科

听取：11. (822)。——政治委员会 1930 年 6 月 6 日指定的
论证关于中国代表团的决议的委员会的建议^①。（报告人：米夫）。

决定：11. —— 原则上通过关于中国代表团在处理中国劳动者
共产主义大学小集团斗争时活动问题的决议草案。责成库西宁同
志负责定稿。^②。

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 皮亚特尼茨基

全宗 495，目录 4，卷宗 40，第 1、4 页。

德文打字稿，原件，亲笔签字。

① 见第 232 号文件。

② 见第 248 号文件。

248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
政治委员会关于中共代表团在处理
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派别斗争
时的活动问题的决议

1930年6月28日于莫斯科

秘密

关于中国代表团在处理中国劳动者
共产主义大学派别斗争时的活动问题的决议^①

1. 中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对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直接责任，是在解决为中共培养干部这一困难而又复杂的问题时向共产国际执委会和联共（布）中央提供最大的帮助。例如，这要求与学校领导共同进行反对学生中瓦解学校工作并破坏完成中大直接任务的种种倾向、派别活动和破坏分子的斗争。

但代表团不理解这一责任，而力图采取完全错误的方法把中大学生聚集在自己的周围。因此中国代表团不去帮助彻底肃清派别活动，反而实际上支持中大中国学生中的派别活动。

2. 例如，中国代表团应对阿拉金-韦利霍夫^②小集团的活动负责，该集团在中大搞无原则斗争，实际上堕落到与托派和右派结盟的地步。中国代表团中多数人（斯特拉霍夫^③、邓〔中夏〕、余

① 文件上有批注：库西宁同志最后定稿的文本。

② 分别为李剑如、余笃三。

③ 瞿秋白。

飞）领导了阿拉金-韦利霍夫小集团的活动。少数人（张彪^①）并非一开始，而只是在后来才与代表团其他成员在对待中大的派别活动上有所区别，但即使那时也没有在共产国际各机构面前采取相应的措施来反对代表团多数人的破坏活动。

3. 至于中国代表团个别成员同情托派的嫌疑，政治委员会则认为，这类嫌疑只依据托派本身的供词，并未得到证实，但无可辩驳的事实是，中国代表团没有与托洛茨基主义进行充分的思想斗争，而是采取自己的方式与托派争夺在中国学生中的优势地位，调和主义地对待阿拉金-韦利霍夫小集团在争夺对中大影响时利用托派的企图。

4. 政治委员会完全不否认学校领导和支部局对中大工作被破坏到现在这种地步负有很大责任，同时指出中国代表团对此事也有相应的责任。代表团对派别活动的实际支持、接近代表团多数人的阿拉金-韦利霍夫小集团的无原则斗争、代表团成员的某些政治错误（如在富农问题上），甚至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作出决定^②后在一系列问题上立场不够明确——这些都助长了托派扩大其在学生群众中的影响和瓦解学校的活动。

中国代表团的上述错误破坏了它在广大中国学生中的威望，给共产国际执委会和联共（布）中央有效地同中大的托派和无原则小集团作斗争增加了困难。

有鉴于此，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委员会坚决谴责中共代表团成员在处理中大内派别斗争时的行为，并建议中共中央对其代表团成员作必要的更新，新的代表团组成立应与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商定。

全宗 495，目录 4，卷宗 40，第 46—47 页。

打字稿，原件。

① 张国焘

② 指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什么决定不详。

249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 政治委员会会议第 69 号记录 (摘录)

1930 年 6 月 28 日于莫斯科

绝密

特别文件

听取：14（825）. ——远东局和中共政治局关于发生的某些分歧的来电（电报见国际联络部译电处）^①。

决定：14. ——根据交换的意见责成米夫同志起草给中共政治局的电报，电报最后稿与库西宁同志商定^②。这份电报稿连同收到的来电还必须给此间的中国同志一阅。（不解除雷利斯基同志在远东局〔的工作〕，尽管曼努伊尔斯基同志赞成解除。）

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 皮亚特尼茨基

全宗 495，目录 4，卷宗 40，第 5 页。

德文打字稿，原件，亲笔签字。

① 文件没有找到。

② 文件没有找到。杨奎松在《中间地带的革命——中国革命的策略在国际背景下的演变》中说：“……6月底共产国际复电否决了中共中央对远东局的指责。”（第 214—215 页）。

250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共中央的电报

早于 1930 年 7 月 10 日于莫斯科^①

绝密

电 报^②

我们认为，在最有生活保障的地区建立完全服从共产党的领导并能成为工农苏维埃政府支柱的真正的红军，就可以成立这样的政府。将苏维埃政权扩大到一个大工业中心城市和行政中心城市，该中心城市应成为运动进一步扩大的根据地，同时将是我们 在苏区发挥领导影响最可靠的保障。随着军事政治形势的变化，必须集中注意力和精力去夺取这样的一个工业中心城市。在组建政府机关时应尽可能认真地挑选人员，决不容许国民党旧官吏混入其中，只吸收经过考验的、绝对忠诚的人参加工作。因此，请在苏区成立有权威的中央局，采取一切措施最大限度地加强红军。现在就必须最大限度地集中和保证党对红军的领导。红军应以坚强的工人为骨干，同时应以农村贫民以至农民中一切革命分子来加以补充和扩大。党在苏区应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以及寺庙和其他大土地占有者的土地，将土地平均分给贫农和中农，尽可能不要把没收土地的原则扩大到富裕农民的身上。在苏区除雇农协会外

① 这是收信日期。见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中国革命的策略在国际背景下的演变》，第 215 页。

② 文件上有批注：最后稿；这是共产国际执委会 1930 年 7 月作的指示。B. 莫洛托夫 8 月 25 日。

请着手组织贫农团，贫农团应从贫农和中农的利益出发确定苏维埃的一切措施。在苏区，农会应逐渐与苏维埃融合。党应容许贸易自由，目前不应禁止土地买卖，不应通过苏维埃组织对居民的全部供应，不应限止国内贸易和价格，因军事需要和反投机倒把斗争引起的特殊情况例外。苏区党的全部活动和革命机构的一切措施都应服从于农民的真正群众性斗争的利益、运动的进一步发展的利益、巩固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工农联盟的利益、进一步扩大苏区特别是向工业中心城市扩大的利益。以前关于加强党组织和领导罢工运动和开展反帝斗争、加强苏区以外农民运动的指示仍然完全有效。请特别以中华苏维埃政府的名义突出强调如下中心口号：没收地主土地给农民，进行反帝斗争直至当帝国主义分子违反中国苏维埃政权法律时将他们的企业和租界收归国有，推翻国民党政权，把中国变为统一、独立的苏维埃国家，支持苏维埃运动并将其扩大到全中国，实行八小时工作日制，工人组织对生产进行监督，等等。详见信。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569，第 164—165 页。

打字稿，副本。

251

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代表团核心领导小组会议第×号^① 记录
(摘录)

1930年7月18日于莫斯科

出席：斯大林、莫洛托夫、索科利克^②、曼努伊尔斯基、库西宁、洛佐夫斯基、皮亚特尼茨基同志。

听取：(1) 审议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草案^③ (米夫同志列席)。

决定：(1) 责成米夫同志于三日内根据交换的意见，以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共中央的简短的政治指示^④ 为基础修改关于中国问题的总政治决议草案。

保留第5章《关于中国革命新高潮的前景及其任务》，根据交换的意见和共产国际的纲领进行修改。

修改后的决议分送代表团成员。

皮亚特尼茨基

全宗508，目录1，卷宗98，第3—4页。

打字稿，原件，亲笔签字。

① 原文如此，无号码。

② В. Г. 克诺林。

③ 草案没有发表（见全宗508，目录1，卷宗7，第5—21页）。

④ 见第250号文件。

252

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电报^①

1930年7月18日于上海

中国共产党为坚决将军阀战争变为国内战争，决定在南京组织士兵起义，在上海准备总罢工，在武昌举行暴动，同全国广泛的群众运动〔建立〕联系。

中共中央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1004，第 31 页。
打字稿，副本。

^① 文件的副本放在共产国际执委会 1930 年 8 月 14 日给 B. M. 莫洛托夫的一组中国来电中。

253

埃斯勒给项英的信

1930年7月18日于上海

秘密

汉 [英]^① 收

亲爱的朋友：

根据我们交换的意见，建议你对这一决议^② 作如下修改：

1. 加入专门一段谈在红军中建立党组织的必要性和专门一段谈对中心运动的领导。如果在苏维埃代表大会这方面没有专门的决议，可加入专门一段谈这次会议的筹备工作。还要将成立罢工委员会和行动委员会的一段加入到关于群众性措施的一章中去。

2. 决议完全正确地谈到党必须有铁的纪律，与封建传统、地方主义等作斗争，等等。决议正确地说明了我们在组织工作中的缺点和克服这些缺点的途径。但其中也包含了某些一再重复的提法，我们认为这些提法总的看来是不正确的，因为这些提法会带来致命的后果。这些提法是：

“现在在民主集中制中必须限制‘民主’的概念。”这意味着什么呢？党的铁一般的团结，反对任何宗派主义的斗争，每个党员积极贯彻党的决议等都是我们组织原则铁的成分。但这一切与

① 音译，应为项英一译者。

② 可能指1930年7月22日全国组织会议的决议（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第181—219页）。

各种限制毫无共同之处。显然，例如，我们在不合法的艰难条件下不能实行“民主选举领导机构”。我们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那么你们想具体限制什么呢？你们只谈到一条必须加以限制的具体措施，即“限制自我批评”。但这绝对是错误的。自我批评是党及其领导机构和某些支部发展的十分重要的手段，你们自己说，这些支部不过任何党内生活。自我批评是与党的整个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当然，当党内一些错误倾向打着自我批评的旗帜得到发展的时候，当废话连篇用争论代替工作的时候，这一切必须加以制止，但决不是制止自我批评原则本身。自我批评不应限制，而应加以发展，并由中央来加以领导。

自我批评指的是什么呢？这就是检查党的活动，揭露错误和缺点以求得克服，揭露错误倾向并加以清除。我们要问：“是否可以限制无情地总结自己活动的必要性呢？是否可以限制揭露我们的缺点和不足，例如，在组织会议上？又譬如，在罢工后难道我们不应对我们的工作作出公正的评价吗？在某一运动之后也不应作出这样的评价吗？如果我们想要让支部得到发展，难道支部不应参加其中吗？”

我们认为，你们应当修改这些提法。

3. 这一决议中应予肯定的是，你们把注意力集中在党的无产阶级化上。因此应该增添什么呢？你们应该明确指出必须耐心地对待正直的劳动者，即使他们有时犯了错误，在对正直的劳动者采取一切说服手段之前，不应对他们采取组织措施。这对于产业工人只占1%、而领导机构大都由非无产者组成的党来说尤为重要。

4. 关于工厂书记问题。组织任何一次罢工的措施都是由最积极的共产党员和非党工人领导的。党和工会往往同这些工人失去联系。例如，在上海经常发生这样的事，但这种事决不应该发生，因为这对于我们的运动来说是无法弥补的损失。我们应该小心地

同这些久经考验的工人——斗争的组织者保持紧密的接触并有步骤地吸引他们参加工作。我们应把其中最勤奋的人作为职业革命者用来开展党和工会的工作。例如，如果上海的一名勤奋的工人由于一家电气工厂的罢工而失去了工作，在别的工厂也找不到工作，我们就应该任命他为这家工厂的支部书记，也许可以委托他执行在其他一些工厂里做工作的特别任务。我们将付给他和原来工厂工资一样多的钱。我们为自己培养一个工人司令部并加紧做工厂里的工作。

致衷心的敬礼！

代表远东局 罗伯特斯^①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566，第 61—62 页。

德文打字稿，副本。

① Г. 埃斯勒。

254

陈绍禹和王稼祥给米夫的信^①

1930年7月22日于上海

亲爱的朋友屈珀：^②

我们不久前寄出的几封信是否已经收到？你身体好吗？自我感觉如何？

我们〔应〕痛心地向你报告我们的不幸。我们近来在关于国内企业与国外企业^③的关系问题上同我们公司的老板意见不合。关于对目前中国市场状况^④的评估，关于中国经济的评述，关于公司在农村的业务处理^⑤和关于我们公司在湖北和其他省分部^⑥的事务，等等。

老板们与我们和从法国^⑦来的人为敌，极少数人除外。他们认为我们是异己分子，认为我们与巴黎中央办事处^⑧有联系，因此他们甚至不愿和我们交谈。

老板们已经把这些“异己分子”从公司的重要工作职位上撤

① 此信用普通邮件寄送，使用的是暗语。

② П. А. 米夫。

③ 中国国内和国外的革命运动。

④ 革命现状。

⑤ 中国共产党的活动。

⑥ 中共省委。

⑦ 苏联。

⑧ 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执委会。

了下来，并威胁要把我们赶出公司，如果我们继续与他们意见不合的话。

老板们说，巴黎公司开除了许多职员，但它仍然失利了。

老板的这些胡作非为，都是由于他右脑有病^①。这种病需要好好治疗，而在贫困的中国很难进行这种治疗。我们希望，很快能找到良医良药，使老板痊愈，使公司状况得到改善。

向你和你夫人问候！

请常来信！再见！

伊万、康穆松^②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577，第 3—5 页。

俄文亲笔信。

① 右倾。

② 分别为陈绍禹、王稼祥。

255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给中共中央的电报^①

1930年7月23日于莫斯科

绝密

我们坚决反对在目前条件下在南京、武昌举行暴动以及在上海举行总罢工。8月1日要举行游行示威。建议根据我们最近的电报^②开展工作，特别要加强群众性工作和组建红军。通过邮局寄上补充指示^③。

全宗495，目录19，卷宗242，第60页。

打字稿，副本。

① 1930年8月7日文件副本送给了B.M.莫洛托夫。

② 或许是指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给中共中央的电报（见第240号文件）。

③ 看来是指1930年7月29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审议的关于中国问题的若干决议（见第257号文件）。

256

陈绍禹给米夫的信^①

1930年7月24日于上海

亲爱的朋友屈珀：^②

近来我与康穆松^③一起给您写过两封信^④。是否已经收到？公司^⑤目前的状况十分严重，因为部分公司老板右肩^⑥确实犯病了。

不久前公司总办事处^⑦全体职员开了会^⑧，会上讨论了公司在中国的所有主要问题。伊万^⑨就所有主要问题发了言，例如，谈了国际行情和中国市场^⑩关系的问题，对目前形势的评估问题，湖北等省公司分部的问题，中国经济的评估和概述问题，富农问题，等等。伊万在会前和通过本业务预算^⑪之前一如既往地就富农问题作了争论，具体说他几次亲自与李〔立三〕和向〔忠发〕谈了话，但他们也如同以往的争论那样一句也听不进去。但伊万仍在

① 此信用普通邮件寄送，使用的是暗语。

② П. А. 米夫。

③ 王稼祥。

④ 见第246、254号文件。

⑤ 党。

⑥ 右倾。

⑦ 中共中央机关。

⑧ 指1930年6月9日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人员会议。

⑨ 陈绍禹。

⑩ 指世界革命和中国革命。

⑪ 看来是指193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议（见第177页注①）。

会上十分谨慎地发了言。他不仅在发言中没有涉及公司主管^①，而且甚至没有涉及一个个人〔问题〕。但十分奇怪（如果好好想想，一点也不奇怪），在〔他〕发言后，李〔立三〕在总结讲话中指责伊万和那些同意他发言的人有小资产阶级向上爬的思想，犯了右倾错误和宗派主义，等等。会后老板（向〔忠发〕和项〔英〕）召见了伊万、康穆松、博格涅尔^②、马克松^③，并直截了当地提出了问题：“要么你们承认错误，无疑要同意李〔立三〕的看法，要么你们离开公司？！”但是我和其他人不得不承认自己有小资产阶级的自满情绪和自我夸大等等。但我们仍然不承认犯了右倾和宗派主义。老板很不满意。他要求我们写出书面声明，他过去和现在在每次会上都发动反对所谓“四人”的全面运动。

有意思的是，指责“四人”犯了宗派主义的根据如下：(1) 伊万给米〔夫〕本人写了信；(2) 伊万在上海时请求同外国人^④谈话；(3) 20多个来自巴黎^⑤的“法国人”得知伊万同老板意见不合；(4) “四人”的意见几乎一样。不幸的是，也有意思的是，老头子^⑥对这样一些主要问题不仅基本上一窍不通，而且甚至没有好好想过。例如他说：(1) 每家公司都应独立工作，不容许外来的任何干涉（？！）；(2) 中国是世界上最落后的国家，因此只有在中国生意^⑦才可能兴旺发达（？！）；(3) 中国公司只应注意中国，如此等等。

情况十分严重。现在我和其他人只做翻译和技术〔工作〕，此

① 看来是指向忠发。

② 秦邦宪。

③ 何子述。

④ 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代表。

⑤ 莫斯科。

⑥ 向忠发。

⑦ 革命。

外，每日每时都有被赶出我们公司的危险。我亲爱的！这是怎么回事？难道我和其他人想脱离公司吗？难道我们在这样一些主要问题上能一言不发吗？（多罗宁^① 和普……采夫^② 完全支持李〔立三〕）。

最后，我简要地向您谈谈我对目前形势的看法：如果继续由李〔立三〕领导，如果不发来更好的商品^③，公司决不可能健全起来。

请把给我的回信寄博格涅尔处，哪怕只写几句话也行。

致敬礼并请向所有尊敬的和亲爱的朋友转致问候！

再见！

你的安德烈耶维奇^④

附言：瓦连京诺夫^⑤ 及其妻子^⑥ 被土匪杀害，损失惨重。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577，第 41—47 页。

俄文亲笔信。

① 潘问友。

② 姓名字迹不清。

③ 看来是指指示。

④ 陈绍禹。

⑤ 张国庶。

⑥ 何人不详。

257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 政治委员会会议第 73 号记录 (摘录)

1930 年 7 月 29 日于莫斯科

听取：2 (882)。——东方书记处关于中国问题的各种决议草案：

(1) 关于中共中央政治局与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之间分歧的决议^① 和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与中共中央政治局之间在 1930 年 2 月 17 日至 8 月 1 日期间接连发生的分歧的决议^②。(见特别文件中的附录)

(2) 关于中国共产党近期组织任务的决议^③。

(3) 关于中国共产党在职工运动中的任务的提纲草稿^④。(见附录)

(4) 关于苏区土地和农民问题的决议^⑤。关于苏维埃政权经济政策的提纲^⑥。

① 见第 258 号文件。

② 见第 259 号文件。

③ 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6 册，第 596—607 页。

④ 同上，第 608—615 页。

⑤ 同上，第 629—638 页。

⑥ 同上，第 639—643 页

（5）关于红军建设和组织游击运动给中共中央的指示^①。

（6）中国共产党在“红枪会”、大刀会、小刀会、回民等组织中的工作^②。

（7）关于苏维埃建议的指示^③。

（8）关于中国农民问题的决议^④。

决定：2. —— （1）在第二个决议中加一句话，说罗伯特^⑤同志是贯彻远东局的方针的，他和远东局的方针基本上是正确的。接着在这个决议中必须指出，承认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方针总的来说是正确的^⑥。

如果格克尔特同志在两天内不对这一决议提出重大意见，即认为该决议最后通过。

（2）批准。（见附录）

（3）为了再次审核和修改提纲，任命由格克尔特、瓦西里耶夫（负责人）、斯莫良斯基和洛佐夫斯基组成委员会。委员会吸收张彪^⑦和沃罗夫斯基^⑧同志参加工作并与参加红色工会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⑨的中国代表团一起讨论提纲草案。

期限 10 天。

（4）将这一文件的讨论推迟两三周。

（5）转交由瓦西里耶夫（负责人）、X 和 Y^⑩同志组成的专门

① 见第 260 号文件。

② 决议草案见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570，第 1—4 页。

③ 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6 册，第 616—621 页。

④ 同上，第 622—628 页。

⑤ Г. 埃斯勒。

⑥ 见第 259 号文件。

⑦ 张国焘。

⑧ 黄平。

⑨ 红色工会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 1930 年 8 月 15 至 30 日在莫斯科举行。

⑩ 估计是 Я. К. 别尔津和 И. К. 马马耶夫。

委员会最后加工和批准。

(6) 转交由上一项指定的委员会最后润色。这一指示与关于红军建设和组织游击运动的指示合并。

(7) 责成瓦西里耶夫同志最后润色。同时要考虑格克尔特同志提出的意见。

责成索科利克^①同志阅读一下指示并把意见转告瓦西里耶夫同志。把指示作为东方地区书记处的材料寄给中共中央。期限3天。

(8) 考虑米夫同志提出的修改意见后予以批准。

听取：14 (894). ——关于中国共产党总的政治问题的决议^②
(7月23日飞行表决：库西宁、格克尔特、曼努伊尔斯基)。

决定：14. ——通过

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 格克尔特

[附录]
特别文件

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
政治委员会决议（摘录）

1930年7月29日于莫斯科

听取：5 (885). ——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地区书记处关于远东局组成人员的建议。

决定：5. ——任命米 [夫] 同志为远东局书记和成员，雷

① B. Г. 克诺林。

② 指《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见《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集》，第203—214页。书中该文件的日期错误地标为1930年6月）。

〔利斯基〕、罗〔伯特斯〕^①、斯托〔利亚尔〕、别〔斯帕洛夫〕和米林^②同志为远东局成员。责成格克尔特与德国共产党中央能否提出去中国工作的德国同志人选问题取得联系。

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 格克尔特

全宗 495，目录 4，卷宗 43，第 3—6 页。

德文打字稿，原件，亲笔签字。

① Г. 埃斯勒。

② 估计是 A. IO. 盖利斯。

258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
政治委员会关于中共中央政治局
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
之间分歧问题的决议^①

1930年7月29日于莫斯科

绝密

1. 政治委员会听取了苏和奥斯滕^②同志关于在他们离开中国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与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之间发生的分歧的报告，认为远东局的政治方针总的来说是正确的。远东局无论在总的政治问题上，还是在农民问题、我们在职工运动中的任务问题、改组派问题上都采取了正确的共产国际的立场，并一贯坚持和有步骤地解释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有关指示，竭力纠正中共中央在总的政治方针正确的同时所犯的个别错误问题上的方针。同时远东局向中国领导人在做好实际工作、加强党的秘密活动、利用合法可能性等方面提供了重大帮助。

2. 同时，政治委员会指出，远东局在实际工作和个别文件中：
(1) 一方面，有一些错误的提法，如在对帝国主义列强相互关系和政策的评估上（说英美结成联盟反对日本的论点）。诚然，这些提法与任何策略结论没有联系，也没有带来实际的负面后果。
(2) 另一方面，远东局在陈独秀问题上完全正确地要求加强同陈

① 标题是文件原有的。

② 分别为周恩来和И. А. 雷利斯基。

独秀的思想斗争，但未能在应有的程度上强调作组织结论的必要性。政治委员会指出，即使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也很快为后来事态的发展及远东局随后作的解释所消除。

3. 至于中国同志在对待游击战争的态度问题上、在评价中国资产阶级的作用问题上、在党内“左”右倾危险的作用和意义问题上对远东局提出的其他指责，政治委员会没有根据支持对远东局在这些问题上的错误方针的指责。

4. 政治委员会同时不得不指出，远东局和中共〔中央〕政治局之间令人不能满意的相互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中国同志不能完全正确地对待远东局所作的，也是对中国党领导人某些错误应该作的必要批评的结果。政治委员会在承认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路线正确的同时，希望中国领导同志能竭尽全力建立同远东局的正常关系，并保证其机关及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代表机构有效的工作。同时政治委员会认为有必要采取措施改进远东局的工作，尤其是加强其工作人员的构成。

全宗 495，目录 4，卷宗 43，第 10 页。

打字稿，原件。

259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
政治委员会“关于远东局与中共
〔中央〕政治局之间在 1930 年 2 月 17 日
至 8 月期间接连发生的分歧”的决议

1930 年 7 月 29 日于莫斯科

关于远东局与中共〔中央〕政治局之间
在 1930 年 2 月 17 日至 8 月期间
接连发生的分歧

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委员会听取了苏^① 和维^② 同志关于远东局和中共〔中央〕政治局之间的分歧的报告，认为：

(1) 中共中央总的说来执行了正确的方针，但由于把预备会议改为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从而大大降低了这次大会的政治意义和实际成果而犯了严重的错误。中央没有及时将其把预备会议改称为代表大会的意图告诉远东局，从而加重了错误。

(2) 中共中央制定的总的政治决议^③除了一系列错误提法外，其主要缺点是完全不提对苏维埃运动和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活动

① 周恩来。

② 可能是指维利——Г. М. 别斯帕洛夫。

③ 指 1930 年 6 月 11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议（见第 240 号文件注①）。

的评价以及这一运动给党提出的任务。因此，党的某些主要任务在这个决议中变得模糊不清。无视远东局的要求而发表这一决议大大加重了中共中央在这一问题上所犯的错误。

（3）中共中央使远东局面对变预备会议为代表大会的事实，表现出了对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领导的错误态度；中央无视远东局的禁令发表自己的政治决议，从而破坏了共产国际的纪律；中央错误地对待代表团留下的成员（罗〔伯特斯〕^①同志等）所作的必要批评，毫无根据地指责罗〔伯特斯〕同志一贯坚持机会主义的方针。所有这些事实证明必须尽快恢复中央和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之间的正常关系。政治委员会号召中共中央今后不要再犯上述能引起很大麻烦的错误。

（4）至于罗〔伯特斯〕同志在中国的活动，政治委员会认为，罗〔伯特斯〕同志执行了远东局的方针，总的来说他和远东局的方针是正确的，但他除了就中国同志的个别错误作了必要的正确批评外，也没有注意到中共中央工作中的某些重大的问题。例如，罗〔伯特斯〕同志在苏维埃代表大会问题上没有突出强调政府的问题，在讨论湖北决议^②及其后的决议时罗〔伯特斯〕同志没有批评在革命转变问题上的错误论断，根据最近的电报^③看，罗〔伯特斯〕同志和中国同志一起在一系列城市举行武装暴动的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

全宗 495，目录 4，卷宗 43，第 9 页。

打字稿，原件。

① Г. 埃斯勒。

② 见第 128 页注①。

③ 看来指中共中央 1930 年 7 月 18 日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电报（第 252 号文件），埃斯勒在将该电报发往莫斯科时没有附上自己的评价（见第 315 号文件）。

260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就红军建设和游击运动问题给中共中央的指示信^①

1930 年 7 月 29 日于莫斯科

一、党在革命军队建设中的作用

争取土地、争取摆脱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压迫的农民暴动如果不是由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就注定要失败。这一思想应贯穿于党在掌握武装力量方面，在向一些支队、军、方面军提出战略任务时所采取的一切步骤和措施之中。这一思想首先应体现在业已组建的正规部队的党的建设体系中。遗憾的是，中共中央送来的关于朱德和毛泽东的第四军组织情况的材料^②没有对军内党的组织结构作出清楚的说明，这就证明中共内部在这个问题上没有足够明确的认识。党支部应按以下模式建立——连设支部，由连支部大会选出由 4 至 5 人组成的支部委员会，营党员大会选出由 5 至 7 人组成的营委员会。在党组织巩固、部队稳定、转入相对长期驻扎的条件下，营可以不设组织。全团党员大会选出团委员会和由 5 人、7 人或 9 人组成主席团。个别的分队、小支

① 标题是文件原有的。文件上有批注：最后稿。

② 例如，指 1929 年 9 月 1 日《陈毅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状况的报告》（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5 册，第 749—771 页；《中国的苏维埃（资料文献集）》，第 186—192 页）。

队、辎重队、野战医院、师部、军部作为军队中的基层党组织设相当于连一级的支部。军党员大会（或代表大会，根据党员人数多少）是军一级中党的最高机构，但它不单独设委员会，也不设主席团。

应特别重视军队中入党对象的问题。红军和苏区党的建设经验表明，党内常常混进富农。除富农外，军队中党组织还混杂有流氓无产者。党并不是始终都对某一部队全体指战员的集体入党给予应有的抑制，结果党混同于群众，失去了组织的纯洁性和成为群众政治领袖的能力。这样的事例 1928 年在海南岛、海陆丰地区都发生过，现在也时有发生。苏联红军中党的建设经验表明，一个团中共产党员的比例最高为 10%，这完全可以保证党的政治领导作用。但是在不以百分比限制指战员入党人数时，应该始终牢记，只有有阶级觉悟的贫农、雇农、苦力及经过战斗和革命的社会工作考验的中农才能被吸收入党。富农不准入党，而对于从敌军投诚过来的士兵也应十分谨慎，只有经过长期考验和对他们做政治工作后才能发展他们入党。

作为党的代表的政治委员制度在军队中是与党组织平行存在并且高于这些组织之上的。连指导员，营教导员（随着营党组织的撤销，营教导员也撤销），团、师、军政治委员对于党支部和他下属的政治委员都具有上级党组织的一切权力，领导他们的党的工作，如果支部工作中出现反党倾向可以解散支部，等等。对于下属的政治委员他享有奖惩权。为了领导支部的党的工作，为了在部队和居民中进行政治教育工作，为了支持地方党组织和地方苏维埃政权机构，军、师、团的政治委员掌握开展这项工作的政治部。政治部设有政治部主任，他完全服从该部队政治委员的领导。在战斗环境中，政治委员本人要最大限度地关注作战问题；在相对和平的环境中，他要集中关心政治部的工作。设立政治委员制度应不取决于指挥员是党员还是非党员。

政治委员作为党的代表与指挥员享有同等权力，他监督指挥员，使指挥员的作战行动符合革命的利益。一旦有叛变嫌疑，政治委员有权将指挥员送交审判，如有明显的叛变行为，政治委员有权处决。指挥员的命令如无政治委员的签字和该部队加盖印章是无效的。印章由政治委员保管。政治部的主要威力应集中在师政治部，军政治部具有指导检查的性质；在部队经常分散执行作战任务时，政治工作的重心应放在团上。营和连不设政治部。营和连的工作由指导员和党支部进行。

应当认为军队中不宜设立共青团组织。中国共产党应在连支部下面设由安排选党员的同样特征所能选出来的最革命的青年成立在党支部委员会领导下的共青团促进小组。

对苏联红军建设行之有效的这一党组织模式也可以根据情况作一些改变，但有一点是不能改变的：明确的、有组织的形成以政治委员制度为领导的党的组织体系。决不容许党组织混同于士兵群众和由士兵成立的各种社会团体。党的任务不是要与群众融为一体，而是要在保持组织上的明确性和独立性的同时领导这些群众。

二、士兵委员会

与军队中党组织结构问题有密切联系的是士兵委员会的问题。如果说在苏联组建红军时士兵委员会起了瓦解沙皇旧军队的作用，从而保证了尽快向建立红军的过渡，那么在中国军阀部队中士兵委员会也将起这样的作用，在中国组建红军的情况下，士兵委员会起着政治上团结军队中普通士兵、提高他们阶级觉悟的作用。但是，由于这样的委员会与党组织平行存在，它们试图履行监督、指挥和进行政治工作的任务，所以它们隐藏着最坏意义上的“委员会至上”的因素、潜伏着士兵委员会对抗党组织的危险。这就是为什么党在开始时保留士兵委员会（如果形势需要的

话），但必须使士兵委员会接受党的影响，在政治上不起领导作用，只起在党委或其党团直接领导下提高士兵群众政治觉悟的社会团体的作用，而以后党的任务是彻底撤销士兵委员会。由于存在士兵委员会，就出现了朱德和毛泽东那个军中确立的官兵平等的问题。革命军队中官兵之间的同志关系意义巨大，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和十分明显的，特别是在中国，这种同志关系与军阀军队中的情况完全不同，因此起了巨大的革命化作用。但热衷于搞“平等”可能会影响到部队的纪律和战斗力，并为蛊惑宣传、委员会至上等等危险的和有害的现象打开大门。

所以，只有正确解决政治委员——党支部——指挥员三者关系的问题，党才有充分可能组建一支真正革命的军队。

三、红军兵员的补充

红军就其成分来说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呢？是武装农民的军队还是支持农民开展土地革命、投奔到革命方面来的士兵的军队呢？当我们看了你们的材料后，立刻产生了这样的问题。这些材料使我们有理由得出以下结论：虽然在改善军队社会成分方面取得了成效，但像朱德、贺龙、彭德怀等军的部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投奔到革命方面来的士兵组成的队伍。

目前在中国存在着两种平行的革命武装力量的组织：（1）由暴动农民组建的农民武装队伍，它们的活动限于本村，很少越出村的范围；（2）所谓正规部队中的支队、军，往往在很大程度上由士兵组成。农民不参加正规部队而宁愿建立狭隘的地方性武装队伍，这一事实说明农民及整个运动尚处在高潮的初期，运动尚未深入农民群众之中。但这一事实也包含着军队脱离群众的危险、个别部队叛变的危险、红军脱离革命群众运动的危险、代替群众革命的危险和个别部队变为富农军队的危险。军队按其社会成分尚未由雇农、苦力和贫农组成，指挥员中工人核心极小，军队中

从军阀部队投诚过来的部队不少，这一事实加大了这一危险。

正规军只能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暴动农民的军队。因此与部队扩编问题有关的问题是十分重要的。党应该坚定不移地采取由雇农、苦力以及贫农—中农组成正规部队的基本骨干，由工人特别是工人党员组成指挥员的骨干。

因此必须：

(1) 争取做到军队中决定性多数的士兵由雇农、苦力、贫农和中农组成。

(2) 把起义队伍转为正规组织，使他们的斗争成为超出保卫狭隘地方性利益的斗争。

(3) 对一切向革命投诚的政府军部队一律进行改编，把他们分别集中在各军团。

(4) 由革命觉悟高的红军战士，特别是工人组成指挥员骨干，尤其是中下级指挥员骨干。

因此，使红军现有士兵中的不稳定的、可能会叛变的流氓无产者分子农民化——这是中国共产党应立即完成的任务。

对组成指挥员骨干的问题必须给予特别重视。如果说在普通士兵方面基本任务是使士兵农民化，那么在指挥员方面一切措施都应旨在使绝大多数指挥员由工人来担任。为此目的，必须在城市里从工厂、工场和作坊中选拔最有觉悟的工人，尤其是要在失业者中选拔，派他们去游击区工作。在苏维埃政权比较稳定的地区应立即建立初级指挥员(班长)和中级指挥员(排长和连长)学校，首先用贫雇农、城市苦力和工人充实这些学校。富农要混上指挥员岗位的任何尝试都应坚决予以制止。

四、建立根据地

但是，完全掌握农民武装斗争的一切形式，尤其是直接着手组建惟一能保证我们巩固胜利的正规部队，只有在牢牢占领并保

持具有巩固和进一步扩大苏维埃政权的足够政治经济前提的根据地的条件下才有可能。我们越是迅速地具有这样的根据地，越是迅速地把武装斗争从各种独特的游击战形式变为正规军作战形式，我们就越能迅速地保证从组织上掌握农民革命运动，就越能迅速地保证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从而保证革命的胜利。

列宁在分析 1905 年年中革命形势（当时暴乱、游行示威、巷战、建立革命部队犹如汹涌的浪潮席卷整个俄国）时要求夺取根据地，以便“保证（起初哪怕是在国内一小部分地区）充分的政治自由，着手对腐朽的专制制度实行革命改造，全面发挥下层群众的革命创造精神，在和平时期，这些下层群众很少参加这种创造活动，但在革命时代他们却走上了第一线”（《革命军队和革命政府》）^①。

党应该选定地区目标，注意这一目标并随着革命运动高涨的程度、军事形势的变化、敌我力量的消灭集中全力夺取这一地区。共产国际执委会对现在就把武汉地区选为这样的根据地是否正确表示怀疑，因为夺取该地区立即会遭到来自帝国主义者的打击，党未必能长期保持这一地区。共产国际执委会且不在这儿对这一问题作出决定，只指出中央提出把工业无产阶级中心作为基地的问题是正确的。根据地问题不仅决不会取消扩大和深化土地革命以及在全国范围内土地革命而进行武装斗争的任务，相反，还要求扩大和深化土地革命。如果全中国的，或者至少是根据地邻近省份的广大的农民运动不能保证根据地的存在，那么根据地就不能起到组织的作用。拥有根据地还有一个革命作用：根据地将保证农民运动与城市的工人运动相结合，从而保证无产阶级领导更迅速更全面地遍及农民运动。这就是为什么在解决红军和游击队应向什么方向夺取根据地的问题时必须考虑到根据地中有相当工人

^① 列宁：《革命军队和革命政府》，《列宁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10 卷，第 318 页。

阶层的原因。

五、红军和苏维埃政权

党面临的严重危险之一是如何建立红军和苏维埃政权机关之间的相互关系。不少同志不考虑革命群众运动而倾向于夸大军事因素的作用，不去进行基层革命组织的建设，不去发动群众的革命高潮，不去巩固革命政权机关。在公开的国内战争时期，军事因素的巨大作用和意义是不言自明的，但军事因素并不是具有独立意义的力量，没有群众运动，军事因素就无法起到它的作用。在过高估计军事因素的独立意义作用和军队的作用上，无疑表现出国民党的影响，中国整个社会关系制度的影响。封建军阀把军事权力和民政权力控制在自己手里，把民政权力的利益从属于为扩大地盘、争夺税收权、掠夺农民权而进行的战争的利益。红军是工农武装部队，它服从于革命利益，根据最高苏维埃机关的指示进行活动。

红军个别部队为农民而革命的种种尝试、把自身置于革命政权机关控制之外的种种尝试，必然会导致这些部队堕落为保护富农利益的马赫诺匪帮或通常的封建军阀部队。

这样的危险是十分现实的，个别部队和游击队的所作所为已经呈现出马赫诺叛乱^①的特点。党应该明确认识到这一危险，并开始为消除这一危险，至少减轻它对革命的危害而进行坚决斗争。中国共产党未必能一下子彻底消除这一危险，所以应付出更大的努力来减轻和克服它。为此党应遵循以下基本指示：

（1）根据上面提出的指示用严格的党组织制度控制红军。

^① 马赫诺叛乱是指1918至1921年在乌克兰南部由H. I. 马赫诺领导的无政府农民运动。这一运动在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中提出了“不要政权的国家”和“自由苏维埃”的口号。

（2）毫不犹豫地实行政治委员制，赋予这一制度以上面所说的全部权力。

（3）为军队的主要指挥岗位——指挥员、政治委员、政治机构——都掌握在工人和农村贫雇农手中，加强指挥员中的党员成分而斗争。

（4）在严格的集中制基础上建设军队；自下而上牢牢掌握指挥人员，实现部队之间指挥员的调动、撤换、提拔和清洗出部队，等等。

对指挥员任何违反纪律的行为一律严厉惩办，直至处决。

（5）红军在其作战中应执行由党建立并指导工作的上级苏维埃机关的指示。

（6）部队决不能擅自征收赋税、没收财物、动员苦力运输军事实物资，等等。凡确有此类没收财物等需要时，此类措施一律应通过当地苏维埃政权机关进行，如当地没有这样的机关，则通过当地公开的或秘密的革命农民团体进行。

党应该牢记，红军物质保障的负担完全应由商人、地主和富农来承担，为此可以没收他们的财产或对他们征税。

（7）军队在夺取新的地区时可以并且应该依靠其政治部的力量建立革命政权机关（先成立革命委员会，然后通过选举成立苏维埃）。但这些机关成立后，地方上的一切权力全部归这些机关，军队与这些机关在军队物资保障方面协调行动。军队可以通过直接与地方苏维埃的联系或通过其在苏维埃中的代表对地方苏维埃施加影响。

（8）为了有利于作战，军队可以利用土匪部队，但应遵循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关于这一问题的决议^①。但当某一匪帮

^① 指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军事工作决议案》（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第483页）。

不服从红色指挥机关的命令，尤其是不愿接受改编或解散时，军队应坚决予以消灭。随着苏维埃日趋稳定，匪帮无疑会被肃清。

(9) 党应该研究游击队，尤其是受党影响小的游击队，采取一切措施使其接受党和苏维埃的影响，严厉惩处任何自行其事的图谋。

只有与任何置军队于革命之上、于工农革命组织之上的尝试作坚决斗争，只有以服从苏维埃政权的精神教育军队，党才能领导革命以最少的损失走向胜利。

六、敌军中的工作

在武装斗争的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在夺取和保持根据地的条件下，党越来越经常遇到军阀部队（起先是较小的，后来是较大的部队）大规模投诚的事实。党在这方面已有足够的经验。可以举出湖北暂编一师的投诚^①，然后是俞作柏^②的一些队伍、（四川）邝继勋旅^③等的投诚。这些都是瓦解反革命军队的正面因素。但这一事实也说明党面临巨大的危险。我们已在上面指出在红军中士兵居多数所带来的危险。

上述大部队的投诚隐藏着另一个危险，在第一师和俞作柏部队的事例上这一危险表现得最突出。俞作柏和第一师的指挥人员都抱着军阀的宗旨。他们认为与革命运动结盟能依靠革命保存和加强自己的实力。党决不能与军阀部队指挥人员上层进行勾结。党

① 可能是指1929年12月鄂西地区红军独立一师的成立。

② 指1929年下半年广西将军俞作柏和李明瑞的部队与中共代表接触后接受改编。从1929年9月起这一活动由邓小平领导，其结果是于1929年12月在广西建立了两个苏区和成立了红军第七军和第八军。详见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15—222页。

③ 指1929年6月底根据与中共代表商定在四川军阀第二十八军准备改编的一个旅的基础上组建中国工农红军四川第一路军。

的任务是瓦解敌军，争取敌军，争取士兵投向革命。党应全力加强这一工作。党应进行“争取军队的切实斗争”（列宁语）。这一任务的意义将随着农民斗争的扩大而扩大。尤其是在夺取和保卫革命根据地时期具有突出的性质。这就是为什么党现在就应把政府军中的秘密工作放到最高地位的原因。缺乏足够的骨干看来使党必须突出这方面的工作，即选择最危险最强大的敌军部队，在其中开展工作。首先，可以归入这类部队的是蒋介石的骨干师（模范一师、二师、三师、五师、八师等）。但这一工作决不要求与高级军官上层勾结。当以指挥官为首的大部队投诚时应迅速掌握士兵群众，而对高级指挥官或予以清除或加以处决。做驻扎在苏区邻近地区的军阀部队的工作具有重大意义。这方面必须有重点地全力开展工作。

瓦解军阀部队的工作也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以帝国主义者为首的一切反动势力在镇压革命时无疑都勾结在一起。帝国主义者参与镇压了广西的农民起义，当时法国空军轰炸了龙州；还参与镇压了长江平原的农民起义，当时美国、日本和英国的炮艇扫射了红军部队。我们在这里不详细去谈论这一工作的方法，因为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对这个问题已作了相当详细的论述。

在武装力量的建设方面党的基本任务就是如此，我们来归纳一下：立即掌握一切武装力量的党的组织体系，使红军正规部队农民化，注入尽可能多的工人，主要是提到指挥岗位和指挥政治岗位上，着手选择和掌握根据地，开展瓦解敌军的工作，加强党对军队的影响。

共产国际执委会在提出这些任务时，再一次告诫中国共产党要警惕如下危险：不理解革命军队真正的作用，试图把军队看作是独立于革命群众运动之外的因素。共产国际执委会告诫中国共产党：各社会集团将进行争取军队、争取影响军队的斗争，在目前无产阶级基础薄弱的条件下，富农必定试图控制对军队的影响，

资产阶级地主反革命势力和帝国主义干涉者必将竭尽所能瓦解革命武装力量。只有在与工人阶级和农民的群众运动相结合的条件下才能建立起武装力量来。任何脱离群众、任何替代群众进行革命的尝试都必然会导致失败。

全宗 514, 目录 1, 卷宗 480, 第 179—186 页。

打字稿, 原件。

261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 给中共中央的信

1930年8月1日于上海

秘密

远东局的建议^① 关于目前形势问题

1. 收到的情报表明：（1）农民运动，特别是长江流域各省的农民运动在迅猛高涨；（2）暴动情绪，特别是在武汉工人群众中有所发展；（3）红军及其装备在数量上有所增加；（4）红军在向长沙、南昌、九江等重要政治中心挺进时形势很好；红军距武汉50英里；（5）士兵中的暴动情绪急剧高涨；大规模暴动和开小差的事例很多；党对士兵群众的影响日益增大；派来攻打我们的部队在许多情况下向我们投诚。例如，由于派来攻打我们的部队投诚，我们能以很小的伤亡攻下长沙城。不少地方士兵要求我们领导暴动；据收到的情报称，这主要发生在南京和武汉；（6）帝国主义者和国民党集团在策划大规模反攻。

2. 形势要求组织尽可能多的力量，保证尽可能多的阵地。无疑存在如下危险：由于对群众进行有组织的领导不够，党要么落后于现实可能性，要么相反，采取准备不足的行动。例如，无疑存在这样的危险：在没有我们的领导、撇开我们的情况下爆发大规模的士兵暴动，暴动领导权会部分地落入改组派手中。此外，南京和武汉

① 文件上有批注：送斯大林、莫洛托夫、皮亚特尼茨基、库西宁、别尔津、洛佐夫斯基、盖利斯。

负责同志的某些建议表明，存在着以孤立的军事行动取代经过周密准备而采取的群众性行动的严重危险。无疑还存在胜利三小时、失败好几年的危险。

3. 鉴于事态的跳跃式发展和完全有可能在必要时避免上述两种危险，远东局向中国党中央提出如下建议：

4. 关于武汉：在企业中成立行动委员会并成立城市贫民的大米委员会。在武汉，每一个大企业都不应没有在我们领导下的此类委员会。只有在多数最重要的工人阶层都跟随我们，工人群众不仅关注我们红军的胜利，而且准备为苏维埃政权作殊死斗争，以及广大城市贫民群众在这场斗争中将支持我们的时候，武汉的暴动才会取得成功。我们应该把武汉起决定性作用的卫戍部队争取过来，我们应该争取领导运输工人，尤其是领导汉口通往其他中心城市铁路线的工人。在坚决实行土地革命的口号下，采取坚决措施最广泛地动员武汉附近的农民；迅速发展向武汉挺进的红军；红军的行动与城市的行动互相配合。只有在最周密地实行这些措施的条件下，我们才能确定武汉暴动的日期。只有在最认真地执行这些措施的情况下，我们才有可能避免落后和仓促行事。

5. 长沙问题。占领长沙具有重大意义。但我们应该善于保证并巩固这一胜利。这一点只有在如下条件下才能做到：立即成立工农苏维埃；实施我们的劳动法和有利于城市贫民的特殊措施；毫不妥协地实行土地革命；动员长沙附近的4百万农民群众；从肉体上消灭地主和资本家（如果扣押资本家以换取赎金确有其事的话——但是我们并不相信有这种事——那就必须立即纠正这个重大错误）；立即扩大红军，特别是吸收无产者参军。

如果我们能保住长沙并巩固我们的阵地，那么必须立即提出能否（根据共产国际的决议）在长沙成立苏维埃政府的问题。在中国目前形势下，这会有巨大的政治意义。必须让中央任命的由负责同志组成的特别委员会立即前往长沙。

6. 关于南京问题：在目前形势下南京举行士兵暴动可能具有重大意义。暴动将使前线士兵和卫戍部队的士气更加低落，也促使派来攻打我们的部队士气低落。但这应该是在广泛的基础上在同时十分认真地动员工人、城市贫民及相邻地区农民群众的情况下的真正的广泛的士兵暴动。成立各企业的行动委员会、城市贫民的大米委员会和农村的斗争委员会具有重大意义。任何一个大企业都不能没有我们的领导。如果我们不在这样的基础上进行准备工作，那我们就什么也办不成或者是冒险行事，但决不能利用形势前进一步。

7. 长江流域各省的事态发展要求在中国其他地区开展最广泛的群众性动员，特别是在上海、天津、广州、奉天和哈尔滨这些最大的工业中心。事态发展要求加快在运输工人和兵工厂工人中工作的速度。我们应该认识到，我们对产业工人的组织领导十分薄弱。我们应该明白，在事态发展，尤其是湖南、湖北和江西的事态发展异常迅速的情况下，这种状况可能给党带来十分严重的后果。我们正处在反革命向我们在长江流域一带的阵地发动十分猛烈进攻的前夜。我们应该明白，帝国主义者和反动派对于武汉的胜利会报以十分坚决的进攻，武汉的胜利不应只是几个小时或几天的胜利。因此，我们必须将我们的努力集中在这些城市的工人群众身上，尤其是上海的工人群众身上，我们应在那里创造总罢工的前提。上海的每一个大企业都应成立由我们领导的工人行动委员会。还必须加速成立城市贫民的大米委员会和动员上海郊区的农民群众。

8. 目前特别需要加强反帝运动。我们得出的印象是北方军队中的工作太薄弱。必须加强反对改组派的运动。还必须最广泛地宣传苏区代表会议的决议和开展争取召开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活动。

9. 必须以最通俗的形式向群众提出以下口号：保证工人有足够的工资，降低米价，给农民以土地，停止军阀间的争斗，驱逐帝国主义分子，只有工农兵代表苏维埃才能保证中国人民有和平和大米。

10. 形势的发展要求我们不仅能站在一切自发运动的前列并加

以领导，而且能有组织地开展群众运动，从而为今后的发动创造前提。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一点，那么党不是充当群众的尾巴，就是冒险行事，这将给中国革命带来极大的危害。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578，第 5—8 页。

德文打字稿，副本。

262

陈绍禹给米夫的信^①

1930年8月1日于上海

敬爱的朋友屈珀^②：

前几封信想必已收到。近况如何？李〔立三〕同志近来写了两篇文章（第一篇——所谓《第三时期与世界贸易》^③，第二篇——《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与中国贸易》^④），他在文章中可以说部分地窃取了我的看法，但基本上发挥了这一看法，看法惊人，接下来就会明白。从文章的内容看，不仅完全否定中国贸易^⑤在世界市场^⑥破产前胜利发展的可能性，而且几乎公开否定C. C.^⑦在第三时期存在的可能性。此外，他完全不理解第三时期和不平衡规律。（他的病根正是在这里。）

他在文章中根据杜撰的想法故意把许多句子放在括号里，为的是使人以为这些话是某个人的看法或说过的话，其实完全不是这样。

① 此信用普通邮件寄送，使用的是暗语。

② П. А. 米夫。

③ 指李立三的文章《第三时期与中国革命》（见《红旗》杂志（上海）1930年第122期）。

④ 指李立三的文章《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与世界革命》（见《红旗》杂志1930年第123期）。

⑤ 革命。

⑥ 世界资本主义。

⑦ 苏联。

伊万^① 真正的看法在那里连一点影子也没有。根据这些编造出来的话来指责伊万和别的人犯了机会主义，等等（同时他又不许伊万等人在任何人面前说一个字）。

此外，到处都在开展反对“以某人为首的巴黎派^②”的运动！

现在贸易的惊人发展对他来说完全是突如其来，他认为为时过早，不符合他的理论。（不错，确实不符合他的理论，因为根据他的理论这是不可能的！相反，事实证明伊万等人的看法才是正确的。）

对伊万等“巴黎人”的进攻一天比一天加强。形势太严重了。但对伊万等人的同情也逐渐多了起来，不仅“巴黎人”同情，还有别的人也同情。再见！

紧紧握手！

你的安德烈耶维奇^③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577，第 53—55 页。

俄文亲笔信。

① 陈绍禹。

② 莫斯科派。

③ 陈绍禹。

263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
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电报^①

1930年8月3日于上海

政治局坚持认为，尽管发生了反对你们的激烈争论，但仍应立即在武昌举行暴动，已派去政治局委员^②为全权代表。远东局拒绝授以全权。为了核查形势和防止作出错误决定，罗伯特^③将去汉口。信使一有可能即出发。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1004，第 31 页。

打字稿，副本。

① 文件副本放在 1930 年 8 月 14 日共产国际执委会送给 B. M. 莫洛托夫的一组中国来电中。

② 项英。

③ Г. 埃斯勒。

264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 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电报^①

1930年8月4—7日于上海^②

绝密

政治局^③指责共产国际执委会在电报^④中不理解中国这里的具体形势。莫斯科应对此负责。我们的方针如下：坚决反击对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攻击。

远东局发。李〔立三〕在政治局8月2日^⑤会议上提出建议，政治局决定在俄国红军和反帝战争的积极支援下在武昌、北京、天津、哈尔滨等地组织暴动。

李立三的意见是：把（注意力？）^⑥集中在为任何进一步的行动^⑦，特别是在武昌的行动做准备和保障上；我们根据你们的电报不对……^⑧作出任何认可。

① 文件于1930年8月8日送B. M. 莫洛托夫和O. B. 库西宁。

② 日期是根据1930年8月14日共产国际执委会送B. M. 莫洛托夫的一组中国来电确定的。这组电报中标出了上海发来的部分电报的日期（见全宗514，目录1，卷宗1004，第31页）。

③ 中共中央政治局。

④ 见第255号文件。

⑤ 原文如此。李立三提出这个计划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于1930年8月1日和3日举行。

⑥ 原文如此。

⑦ 此处和以下的删节号是文件原有的。

形势严重而危急。（运动？）在长江省^① 的发展使政治局在李立三的绝对领导下面临丢脑袋的危险，李立三十分坚持以下论断：工人反对举行罢工和示威游行，只要求举行暴动。

……〔政治局〕对共产国际执委会的路线提出了强烈抗议，该路线应根据这些决定作改变。远东局正与政治局进行斗争。必须立即给我们和政治局下达指示。必要的指示应由你们下达。决定……坚持（？）立即召李立三到莫斯科去。

全宗 495，目录 19，卷宗 242，第 62 页。

打字稿，副本。

① 原文如此。从意思上看应为：湖北省。

265

斯托利亚尔给洛佐夫斯基的信

(摘录)

1930年8月5日于上海

绝密

红色工会国际驻中国代表给 洛佐夫斯基同志的信^①

(摘录)

我认为十分重要的是，您应对政治形势和我们在上海这里工作的氛围有一个确切的了解。

您大概还记得我抵达后立即给您写的（将近一个月前）最近的一封信^②，我说我是在共产国际代表团和中国党领导人（李立三）之间发生激烈的政治的、十分重大的冲突之际来到这里的，而这一冲突具有十分激烈的形式。从那时起中国总的形势迅速发展和激化，我在我们局的会议上和在与中共政治局的多次重要会谈和争论中有可能对情况有一个比较清晰和明确的了解。我试着简单地谈一下。

在目前十分危急的时刻，存在着现时领导人和中共同共产国际决裂的很大危险。最近几天，有关的一系列电报发给了共产国际执委会^③。你们可能已经看了。李立三动员所有的负责同志和全党来反对共产国际。他公开把党和共产国际对立起来。他拒绝执行共产国

① 信的全文没有找到。

② 文件没有找到。

③ 见第263号文件。

际的决议^①，而政治局不顾并反对共产国际的坚定不移的指示。通过了十分重要的关于时局的决议，在李〔立三〕的领导下要求共产国际如李立三所希望的那样纠正路线。

您当然明白这里说的不是假设或纯粹的理论失误。这里说的也许是中国革命的直接命运。为了使您有一个简单明确的了解，我从李立三在最近两次政治局会议（8月1日和3日）上的两次讲话中摘引几段：

“共产国际执委会不理解中国的形势……^② 共产国际不仅不理解中国目前的形势，而且不理解中国革命总的倾向……周恩来应对此负责。”

“……一旦发生巨大事件，党在几天或几个星期内可以组织起千百万工人，党在最短时间里可以变为广大的群众性的党……”

“……如果只注意我们尚未组织广大群众，而不清楚了解革命的前途，不考虑巨大形势的发展和只做组织工作，那就可能犯极大错误，对革命犯罪……”

“……在中国，继总罢工之后无疑应接着举行武装暴动。中国不是西欧。西欧工人必然应经过政治总罢工时期，只有到那时他们才会明白武装暴动的必要性。但中国的情况不同。当工人还没有实行总罢工时，他们已经在等待武装暴动了……”

“……周恩来没有（向共产国际）解释这一实践（不是理论），因此共产国际仍这样来估计形势：中国党有多少工人。共产国际不可能理解中国这一真正的实践。”

“……中国有争取工人阶级的两种可能：（1）或者是资产阶级稳定下来，这样便能广泛而公开地建立工会，（2）或者是处在革命浪潮时期。周恩来同志连这一点也不向共产国际说清楚。”

① 见第255号文件。

② 此处和以下的删节号是文件原有的。

“……必须加快各企业中的组织工作，但要在‘准备武装暴动’的口号下进行。”

“……共产国际还不懂得，我们在激烈的革命形势下能否放弃领导，坐等根据地的发展。共产国际谈到自下而上的统一战线，因为它不懂得黄色工会的作用……”

“……中国革命可以吸引千百万群众投入坚决的斗争，但它必须引发世界革命，那时它才能战胜帝国主义……”

“……如果共产国际理解中国目前的形势，他就不会批评党的路线了……”

“……如果我们只看到工人的力量而不利用红军和农民，我们就是愚蠢透顶的烦琐哲学家……”

“……我们一定能战胜帝国主义，因为我们可以引发世界革命并得到苏联的支持……”

“如果我们偏离政治局的路线，那我们就只能忠于共产国际的电报^①，但我们会对中国革命犯罪……”

“……我们将不顾共产国际的电报而执行党的方针。中央不顾共产国际的电报，已经决定在南京、汉口等地开始举行暴动。还必须在北京、天津、开封等地举行暴动……”

“……在汉口应发动对华北的进攻，进行反冯〔玉祥〕战争……同时还要进行反阎锡山战争……”

“……满洲的暴动将是国际战争的序幕。这意味着日本对苏联的战争。”

“……我们的战略应是挑起国际战争……共产国际可能认为这是错误的，但我坚信这是对的……”

“……关于攻克长沙，帝国主义者发了许多电报，但共产国际对其代表没有发一份电报……这表明共产国际不重视中国革命……”

① 见第255号文件。

“……共产国际是否承认朝鲜……^① 我们应加以利用……”

“……共产国际对安南重视不够……”

“共产国际现在应转而采取进攻政策，首先是苏联。苏联应全力准备作战……”

“……蒙古应宣布自己为苏维埃中国的一部分并派军队进攻华北……”

“……应武装西伯利亚的中国人并把他们派到这里来……”

“……共产国际应改变自己的路线并转入进攻。这不是托洛茨基主义……”

“……只有转入进攻路线后，才能实施五年计划。否则共产国际就没有履行其对革命的义务……”

“……如果共产国际不同意这一方针，我们应在实践的基础上保卫我们的方针〔不受〕共产国际〔的破坏〕。”

* * *

我在这里从李立三最近在政治局会议上的两次讲话的速记记录中逐字逐句摘出了最重要的内容。

由此十分清楚的是：

1. 李〔立三〕动员全党反对共产国际。他把政治局多数委员派往各地，根据情况全权组织暴动。他无视共产国际的电报，无视我们远东局的激烈斗争和抗议。

2. 李〔立三〕认为自己是中国的列宁，更有甚者：他号召共产国际改变路线——转入进攻和尽快宣布世界革命。李〔立三〕命令俄国党准备战争并准备与日本作战，因为他认为，没有世界革命和战争五年计划是完不成的（这明显是托洛茨基主义的腔调，托洛茨基可以为有他这位新的学生而感到骄傲）。

3. 这一切都是由于攻下了长沙，当然攻下长沙意义重大（虽然

^① 删节号是文件原有的。可能是指朝鲜共产党。

今天的电讯说已撤离长沙)，也许也是由于汉口将有同样的命运。因此李立三下令立即发动世界革命（否则共产国际就背叛革命），他下令俄国党不要执行五年计划，而进行反对日本和中国的战争，把军队经蒙古开往前线，等等。

4. 党在他的领导下以骇人听闻的蛊惑手法反对共产国际，反对俄国党。党在大规模动员工人这一艰巨任务面前表现得软弱无力，尤其在工业中心城市里。李〔立三〕津津乐道地谈论他那宏伟的纯军事计划，而关于工人群众他在那次政治局会议上说：

“……党在一两个月内可以在上海召募 3000 到 5000 名工人，但如果掀起革命浪潮，我们在同一时间内可以得到 2 万到 3 万名工人。”（完全根据速记记录）。

然而，8月1日上海和其他城市的情况很糟糕。李立三推托说有恐怖行为，他还神色严峻地说：“工人们不愿意举行示威游行，而愿意举行革命暴动。”

这一切只是十分复杂问题的一个方面。这是因为问题不仅在于李立三同志的过火政策和某些错误理论。要克服这一切并不难，因为有许多办法可以勒住狂奔的马。但问题并不这样简单。你们明白，共产国际的电报发来一天后攻下了长沙，还有消息说“赤匪”占领了南昌，而汉口出现了完全可以理解的惊慌失措……毫不奇怪，李立三及政治局其他同志以最蛊惑人心的方式提出这样问题：“你们究竟想怎么办？是要我们给红军下令放弃长沙吗？”李〔立三〕又补充说：“要么我们忠于共产国际的电报，对中国革命犯罪，要么我们忠于中国革命……”远东局自然向共产国际详细报告了迅速发展的形势和十分迫切地期待共产国际新的指示。但同时远东局别无选择，只能捍卫共产国际最近一份电报中提出的明确而坚决的指示（这份电报说：“我们坚决反对在目前形势下在汉口和南京举行暴动……”）。十分清楚，存在着与政治局决裂的巨大危险。但我们至今仍试图与政治局停止争论。这意味着达成协议：政治局将在宣布汉口和南京

举行暴动之前等待共产国际新的决议，在收到新的指示前，它将和远东局共同作出事态发展要求作出的必要的重大决定。希望能成功。

全宗 534，目录 4，卷宗 320，第 23—26 页。

打字稿，副本。

266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 给中共中央的信

1930 年 8 月 6 日于上海

致中央委员会

我们向你们提出以下建议：

在所有城市和乡村，尤其是在上海、武汉和南京地区组织工人、士兵和农民最广泛的大规模示威游行，目的是表示声援攻下长沙，并组织罢工，抗议帝国主义者和国民党的行径。

主要口号是：

全力支持苏维埃长沙！

用一切手段进行反对军阀和帝国主义者对苏维埃长沙的进攻！

为在全中国建立苏维埃政权而示威！

远东局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579，第 90 页。

打字稿，副本。

267

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共产国际执行 委员会远东局联席会议记录

1930年8月6日于上海

秘密

政治局与远东局联席会议记录^①

出席：远东局四位同志和李〔立三〕、向〔忠发〕、刘^② 和共青团书记^③。

向〔忠发〕想在会议开始前向远东局提出几个问题。

（1）远东局是否认为中国党政治局还存在，还是它认为政治局已经不再存在？

罗伯特^④：政治局当然存在，因为我们没有得到关于相反情况的消息。

向〔忠发〕：（2）远东局是否认为政治局在实施对中国党和中国革命的领导？

罗伯特：是的，但政治局在领导党和革命的同时要服从共产国际的领导。政治局是否承认共产国际的存在及其领导？

向〔忠发〕：远东局是否断定中国党政治局在政治上已经破产？

① 联席会议前一天即8月5日，远东局致函中共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激烈批评李立三在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1日和3日会议上的讲话（见《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集）》，第214—218页）。

② 原文如此。可能是罗登贤。

③ 袁炳辉。

④ Г. 埃斯勒。

罗伯特：迄今为止政治局总的路线是正确的，是符合共产国际的路线并遵守其纪律的，但在最近两次政治局会议上出现了实行反对共产国际政策的危险倾向，因此我们远东局必须十分坚决、毫不动摇地说出自己的意见。政治局没有破产，但我们应大力进行斗争，务使政治局按照共产国际的决议执行自己的任务。

向〔忠发〕：多么惊人的矛盾！你们自己承认最近两年来党的路线是正确的。为什么你们又要威胁党的团结，把青年同志找去谈话并在谈话中表示反对党的路线呢？政治局坚决反对这样的做法。如果远东局认为政治局犯了严重错误，那它就应该中止政治局的工作。

罗伯特：我们有共产国际的电报^①。李立三在你们的政治局会议上说，共产国际未搞清楚中国的形势，共产国际的路线需要纠正。李〔立三〕发言反对共产国际。在革命如此严峻的时刻，他无视共产国际的坚定不移的决定，把同志们派到各省去发动暴动。远东局向中央委员会和它认为需要找的同志发出呼吁。共青团的同志有全权捍卫共产国际的路线。具有如此巨大意义的严肃决定只能同共产国际一起作出，而不能不顾共产国际的意见。要党的团结吗？不错，但也要同共产国际的团结并接受它的领导。

向〔忠发〕：政治局^②的这个答复是十分严重的政治错误。又是一个矛盾：你们承认党两年来的路线是正确的，而现在突然变成错误的了。我们赞同共产国际的路线。只是共产国际没有得到关于最近6个月来事态发展情况的消息，因此出现一些不大的分歧。远东局也未搞清楚最近半年来的事态发展。

罗伯特：我们的谴责没有矛盾。最近两年来路线可能是正确的，而现在不正确了。向〔忠发〕说“不大的策略分歧”，共产国际执委会说汉口和南京不要举行任何暴动，而政治局相反主张暴动。难道

① 见第255号文件。

② 原文如此。应为远东局。

这是不大的策略分歧吗？问题是在某个特定的时间里是否发动革命，这是不小的策略问题。你们论证说，共产国际消息不灵。这个论据太肤浅。俄罗斯报刊每天都谈到长沙，它每天收到消息和新闻。共产国际系统地收到你们的报告，那里有你们的代表——斯特拉霍夫^①和周恩来。如果在不应发动的地方发动了暴动，这就会危害党，相反，如果在应该发动的地方不发动暴动，党也会有毁灭的危险。共产国际并不是笼统地反对暴动，它只是反对目前形势下的暴动。难道你们以为共产国际真的反对在中国举行暴动吗？共产国际说，暴动还没有成熟。不能受情绪的左右——这太危险了。共产国际认为，你们超越了事态的发展，因此它才发来电报。政治局竟不害臊把共产国际消息不灵作为论据。李立三很清楚他实行的是与共产国际路线相对立的政策。他在耍外交手腕，但在政治局会议上他明确而公开地反对共产国际。难道你们以为没有共产国际和无视共产国际可以决定中国革命的命运吗？问题不在于存在分歧……^② 如果问题只是这一点，那我们会和你们用另一种方式谈话。问题在于你们在政治局里试图决定世界革命的命运。你们派汉[英]^③同志去武汉，派其他同志去其他地方发动暴动，甚至不等共产国际对你们电报^④的答复。因此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制止你们反共产国际的政策。只有两种可能：或者是你们在收到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决议前暂缓执行你们的决议——你们可以发一个更详细的电报，报告你们的计划，甚至派一位负责同志去共产国际——或者是你们听凭情绪的左右。你们自己选择吧！我们向政治局提出以下建议：

（1）政治局要执行共产国际的一切决议。

① 瞿秋白。

② 此处和以下的删节号是文件原有的。

③ 项英。

④ 大概指1930年7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的电报（见第252号文件）。

- (2) 在共产国际下达新的决议前南京和武汉的暴动暂缓。
- (3) 事态发展要求作出的一切决议由政治局与远东局共同作出。
- (4) 停止争论。
- (5) 集中党的一切力量去发动群众。

至于长沙，远东局向政治局建议如下：在南京、长沙、汉口等地组织广泛的群众性示威游行，口号是：“支援苏维埃长沙！”“打倒军阀和帝国主义者！”“为了苏维埃中国！”等等。

李立三：政治局明天将讨论这些建议。中国革命以十分迅速的速度在发展，应该注意不错过时机，应该利用一切机会。说只有两条路：不是同共产国际一起，就是反对共产国际，这个说法不对。还有第三条道路：为了中国革命并同共产国际在一起。我们应该引导中国革命前进。远东局认为，政治局犯了严重错误，这种看法不对。中国革命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问题，这是世界革命的问题。如果政治局有自己的看法，它应该让共产国际知道。政治局不反对共产国际。我们只是想让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了解和懂得形势和事态的发展。驻莫斯科的中国代表没有向共产国际说清楚中国革命发展速度有多快。顺便提一下，为什么在声明中，甚至在所有场合都只攻击李立三呢？关于武汉和南京暴动的问题，政治局应根据现时的发展速度来决定。

杰克^①：我们最仔细地研究了政治局两次会议的记录，我们应该十分开诚布公地以布尔什维克的坦诚精神告诉政治局的同志们：从李立三在政治局的讲话中和他在同我们远东局联席会议上的讲话中可以看出，政治局存在危险的倾向，试图把党和共产国际对立起来。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在十分重大的激烈而尖锐的争论中积累了十分丰富而有益的经验，我们知道，任何把某种路线与共产国际的路线对立起来的尝试，任何动员党反对共产国际、削弱共产国际威信

① C. A. 斯托利亚尔。

的尝试都会导致将这些尝试的始作俑者逐出共产国际的行列。这种事例我们见过无数次了。但在中国目前的形势下，在这样的关头，这样的尝试格外危险，因为现在正在决定中国党和中国革命的命运。应该开诚布公地说，李〔立三〕同志在政治局里采取的正是这样的路线，所作的正是这样的尝试。我们认为需要警告李〔立三〕同志并向他指出，共产国际将无情地同这样的手法作斗争。我这里有从政治局记录中确切摘出的话：李〔立三〕在政治局里 10 次说共产国际未搞清楚中国的形势，说共产国际的路线需要纠正，共产国际应采取进攻的方针。不仅如此，李立三同志在一处竟说出这样的话：“共产国际执委会不理解中国的形势……它不仅不理解目前形势的特点，而且不理解中国革命总的倾向……”这段话出于政治局一位最负责的委员之口，他还问道，为什么只攻击他，而不攻击别的同志！他说，共产国际甚至不理解中国革命总的倾向……难道中国党不是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没有受到它最积极的支持吗……

（此时向〔忠发〕同志大声喊叫，不让发言者继续发言。在翻译开始译第一部分之前，李〔立三〕同志给向〔忠发〕译了一句话，向〔忠发〕开始大声抗议并警告发言者不要继续用这样的腔调讲话。）

此后与政治局商定，次日听取政治局就远东局给它提出的建议所作的决定。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610，第 44—48 页。

打字稿，副本。

268

陈绍禹给米夫的信^①

1930年8月6日于上海

我敬爱的屈珀^②：

近况如何？你的儿子好吗？妈妈的健康如何？

前几封信^③大概都已经收到。昨天下午4时到8时老头子^④和邓〔中夏〕（不久前从巴黎^⑤来）代表老板叫伊万、康穆松、博格涅尔和马克松^⑥去参加由邓〔中夏〕主持的会议。老头子以十分气愤的神情说了以下的话^⑦：“……邓〔中夏〕等人从巴黎来后我们得知问题非常严重……现在你们——〔四个人〕——已经成了明显的反革〔命分子〕和中国贸易^⑧最有害的敌人。你们在巴黎搞宗派，你们是分裂公司^⑨的人，因为你们不同意老板的意见。你们无权〔出来〕反对李〔立三〕和多〔罗宁〕^⑩的文章和意见，因为他们的意见

① 此信用普通邮件寄送，使用的是暗语。

② П. А. 米夫。

③ 见第246、254、256号文件。

④ 向忠发。

⑤ 莫斯科。

⑥ 分别为陈绍禹、王稼祥、秦邦宪、何子述。

⑦ 此处和以下的删节号是文件原有的。

⑧ 革命。

⑨ 党。

⑩ 潘向友。

无疑就是老板的意见……如此等等。……你们应该承认^① 政〔治上〕是右倾〔分子〕，而组〔织上〕是宗派〔分子〕……。

我和其他人都抗议这类指控，坚决捍卫自己正确的政治观点，不承认任何宗派行为。最后老头子宣布组织结论：伊万“开除〔出党〕6个月，给马克松、博格涅尔和康穆松最严重警告。解除我们的一切工作。”（过一两周我们可能都会被开除。）现在到处都有这样的传闻（事实如此，并非传闻）；至少〔四个人〕无疑将被开除，哪怕他们承认政〔治上〕是右倾〔分子〕，组〔织上〕是宗派〔分子〕，即使他们出于压力被迫承认也要被开除。当然要是他们不承认，开除他们就更容易更方便些，反正他们要被赶出公司，因为老板在这件事上已下了决心。（他们不是从争论本身出发判断谁对，而完全从争夺地位出发。这是李〔立三〕等人公开说的。）我和其他人也已经意识到，因此在争论开始时我们就猜到了这个结局，尤其在某些人从巴黎来后。我们现在正十分耐心地不谈自己的看法，以避免分裂，在公司目前状况下，所有基层都不满，领导路线已破产，如果我和其他人公开宣传我们与老板的不同看法，分裂是完全有可能的。但暂时我们等待最高一级^② 的审理和处理问题。好的商品^③ 暂时不要发来，否则会被一文不值地^④ 丢在大街上了！我和其他人决定与右倾机会主义者作殊死斗争。虽然我们暂时很艰难，要作出自我牺牲，但我们仍把此事看作是自己的义务。

再见！

你的安德烈耶维奇^⑤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577，第 56—57 页。

俄文亲笔信。

① 原文如此。应为：被认为。

② 共产国际执委会。

③ 这里指指示。

④ 原文如此。按意思应为：白白地。

⑤ 陈绍禹。

269

中共中央政治局给共产国际执行 委员会远东局的信

1930年8月7日于上海

秘密

致远东局

敬爱的同志们：

今天早上我们收到你们给政治局的信^①，信中说：“中国党现在存在着危险，它不去领导革命，却搞冒险，进行反对共产国际的斗争。”在我们看来，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因此我们郑重地作如下负责的声明并提出抗议：

1. 在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最近两年来的工作中始终忠于共产国际的路线，坚决执行共产国际的路线。我们完全认识到，党只有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下才能实现自己的任务，即领导革命的任务。政治局及其委员们在自己的发言和文章中从未背离过共产国际的路线。远东局援引了李立三同志在8月1日和3日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政治局在此负责地声明，这些指责完全不符合实际情况。不是远东局歪曲这一讲话的意思，就是记录员和翻译出了大错。现将阐述李立三同志讲话真正意思的文本^②作为附件送上。同时建议你们退回这一记录的英译文和德译文。我们在对译文修改后再送回。

① 见第264页注①。

② 文件没有找到。

2. 如果记录和译文中有错误，如果远东局根据这些错误，而不是根据中国党的政治活动，不是根据政治局的精神突然作出这样重大的结论，那么这实在过于简单，过于警觉了。我们以最郑重的态度对这一做法表示抗议。远东局就政治局的组织问题找了一些在中央工作的同志，同他们谈了中央和远东局之间的分歧，要求他们进行反中央的斗争。我们认为，这不是真正布尔什维克的组织路线。如果远东局认为政治局的领导已经破产，那么它可以召开中央全会，在全会上改组政治局。这种非组织的方式可能会毁掉中国党布尔什维克的团结，客观上会为一切机会主义分子反党斗争创造机会，特别是通过这样的党内冲突会使革命工作瘫痪。这可能导致真正严重的困难，我们坚决抗议远东局的这种做法。

3. 目前革命形势的严重性，中国党困难的工作条件以及整个形势的困难都要求远东局加强它的政治领导。远东局不应以个别讲话中的几句错话及其错误译文为借口作出令人难以想像的严重结论。政治局不能再这样进行工作了。政治局完全坦诚地建议同你们一起讨论一切重大问题和整个工作。

除这一答复外，政治局还作出了一个决议，同时附上^①。

政治局 向忠发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579，第 117 页。
德文打字稿，副本。

^① 文件没有找到。

270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 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的信

1930年8月7日于上海

致东方书记处

敬爱的同志们：

党的领导人在攻克长沙、农民革命发展和国民党军队中暴动情绪滋长的影响下声称，目前形势表明宣布进行夺取全国政权的斗争是适时的。党匆匆忙忙地改组成某种军事组织，由李立三为首的行动委员会领导^①。他们甚至解散了共青团中央，把共青团与党组织合并，理由是统一行动的需要。他们把领导机关和全党的注意力集中在对暴动的组织和技术准备上，整天主要忙于与军事专家开会和讨论宏伟的计划。

与此同时，他们越来越忘记政治，越来越忘记动员群众的必要性，忘记利用群众关心的一切问题，不顾我们在工人群众中组织十分薄弱这一事实，不顾我们没有能力领导和组织广泛的大规模工人行动这一事实，运用了李立三酝酿已一年多的理论。“工人阶级中多数人在政治上是站在我们一边。罢工、大规模示威游行、我们对企业的组织影响和红色工会的力量不能算作衡量尺度，因为在中国目前形势下出现的是特殊现象，特殊性就是在目前形势下，在白色恐

^① 1930年8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决定，8月6日成立由21名委员组成的“中央行动委员会”，合并党、共青团、全国总工会的领导机关，以领导武装暴动。

怖的条件下，工人们反对罢工和示威游行，而主张暴动。”李立三经典式地把他在中国“特色”条件下的暴动理论概括如下：只要我们发动暴动，群众就会跟我们走。他们构筑计划时不是从事实出发，而是要事实来适应计划。例如在上海，法商电车公司工人罢工七个星期，异常顽强地举行示威游行，无比勇敢地与军警搏斗^①。一位红色工会领导人说，罢工组织上是由国民党进行的，而政治上受我们的影响。可是过了七个星期，我们仍然不能领导这次罢工，不能使这一重大行动有个好的结局，不能引发公共事业工人的罢工，甚至不能引发由我们领导的租界上其他电车公司工人的罢工。我们在上海许多大企业中甚至没有小的支部，而我们上海的组织比其他地方还要好些。但这并不妨碍政治局在给你们的长电中声称：“我们在每个工业中心，在每个工业企业中都有行动委员会。”^②

8月1日根本谈不上真正的动员群众。上海有一次人数极少的示威游行，南京和武汉几乎没有示威游行。这次活动是近来最不成功的活动之一，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侈谈什么大规模发动。李立三总是按他自己的方式来解释一切：不是指示下达得太晚，就是工人反对示威游行，而主张暴动。空荡荡的大街成了李立三用来说明群众决心和我们一起进行殊死斗争的极重要证据。

李立三手里拿着地图谈论南京的暴动。他声称：南京大部分卫戍部队处在我们的领导下。他谈到他的军事计划如何如何，某个团占领某个据点，如何如何……^③ 我们对他说，他的计划很出色，但群众的情况如何？他回答说，我们随时都可以在南京组织起有3到5万人参加的示威游行。这是他在8月2日说的，而1日什么也没有

① 罢工于1930年6月18日至8月13日进行，以部分满足罢工者的要求而告终。另见第289号文件。

② 看来指第273号文件。

③ 删节号是文件原有的。

发生。7月27日参加我们组织的示威游行的只有700人。在这一周里有10000名有造反情绪的士兵与其他部队一起从南京被派往前线，而在策划暴动的城里连一根手指头。尽管如此，李立三仍声称，只能在南京发起暴动。党就这样开始动摇于右派的消极等待和冒险主义之间。

这一形势孕育着严重的危险。在一个有着广大农民群众，而工作人员骨干大多又来自知识分子的党内，在一个由于处在不合法状态而与工人群众联系很差的党内，在持续不断的农民战争和在长沙取得胜利的条件下，盲动主义情绪可以找到适宜的土壤，而这种情绪又会加重对工人阶级实际上估计不足的危险，失去在如此大好形势下与无产阶级建立密切联系的机会。

还有另一种危险，应该公开指出，这就是共产国际有可能丧失领导权。最近三个星期来的事态明确地说明了这一点。

问题不仅在于政治局拒绝了你们的电报^①，而且还在乎它是如何被拒绝的。请认真读一下8月1日和3日政治局两次会议的记录（我们寄上记录的中文本，因为中国同志要求退回译文，借口是存在某些“误会”）。^②

这些会上谈了些什么呢？说什么共产国际不理解中国的形势。需要采取具体行动，首先在武汉。此外可以为改变路线同共产国际作斗争（他们指责一位刚刚归国的共青团员^③在共产国际和中央的路线之间持调和主义立场）。他们向各省派出人员组织暴动。李立三正开展反周恩来的活动，已准备将后者撤职，因为他赞同共产国际的决议。现在我们十分清楚，一个月前在冲突期间我们得出的印象，即李立三动员政治局和全党反对莫斯科的决议，是完全正确的。李立

① 见第255号文件。

② 见第269号文件。

③ 何人不详。

三比较坦率地声称，“等我们拿下武汉，我们就可以同共产国际和兄弟的俄国党谈谈，对他们说，现在是发动世界大战的时候了。苏联红军应积极进行干预。”政治局以十分严肃的中立态度讨论并决定了这一切，把白军^①派往武汉，授予他全权发动暴动。

我们坚决地作了斗争，我们不同意在武汉组织暴动。于是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李立三巧妙地以年老的向〔忠发〕作掩护，向〔忠发〕本来就疾病缠身，他大喊大叫，激动得失去了心理平衡。而与此同时政治局一个又一个地作出了决议。

我们放弃了说服他们的尝试。继续提出要遵守共产国际纪律已毫无用处。过去的每一天都在加强李立三的立场。我们不能再等待你们的指示，因此采取了如下措施：

罗伯特^②动身去武汉研究当地的形势，防止出现任何冒险行动。我们向全体中央委员和共青团发出了附在后面的激烈反对李立三的宣言^③并越过政治局开始与其他同志讨论形势。昨天晚上我们同政治局三位委员和共青团代表讨论了我们的行动方式^④。向〔忠发〕首先问我们根据什么破坏党的团结。我们告诉他，既然政治局的行动违反共产国际的决议，既然李立三不受惩罚地在政治局里开展反对共产国际的活动，那么我们应该反对政治局，保证党和共产国际的团结。

李立三开始辩解：说什么记录有误，他保持对共产国际决议的绝对忠诚，但他想让共产国际了解与共产国际观点不一致的同志们的观点。

我们表示准备在收到共产国际决议前把这场斗争局限于政治局

① 项英。

② Г. 埃斯勒。

③ 见第 264 页注①。

④ 见第 267 号文件。

范围内，但提出了如下条件：(1) 绝对服从共产国际的决议；(2) 在收到共产国际执委会对政治局建议的答复前在武汉和南京不举行任何暴动；(3) 如果事态发展速度迅猛，要求迅速作出决定，那么这样的决定应与远东局共同作出；(4) 把注意力集中在动员群众上。

李立三与向〔忠发〕总的来说同意这些建议，但在起草这封信时，政治局尚未作出肯定的决定。我们不抱任何幻想。领导人做的事会造成后果的。应该进行思想斗争。应该解除李立三的领导职务，我们越早这么做，带给我们的痛苦就越少。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代表远东局 罗伯特斯^①

附言：我们所派的信使乔尼^②同志参加了所有会议，他可以作出详细的说明。

罗〔伯特斯〕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577，第 41—43 页。

德文打字稿，原件，亲笔签字。

① Г. 埃斯勒。

② 何人不详。

271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电报

1930年8月8日于莫斯科

绝密

（1）建立一支坚强的、组织严密的、政治上坚定的、有充分供应保障的红军，是中共工作中目前的中心环节，正确而有力地完成这项任务能保证群众性的革命运动取得进一步的发展（见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政治信）。^①

（2）为此必须选择和开辟能保证组建和加强这种军队的根据地。对根据地的基本要求是：相当程度的农民运动，从容组建的可能性，获得武器的前景和保证今后能夺取一个有足够工人居民的大的行政政治中心的发展前景。目前显然赣南、闽南、粤东北地区首先能够成为这样的根据地——更详细地核实这一情况只能在当地进行。另一个后备根据地应是湘鄂川边区及其附近地区。

（3）中共在支持游击运动并促进其发展的同时，决不应放松解决当前中心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课题——先建立一支人数不太多，但组织严密的“铁的”红军。

（4）当前组建红军的组织问题是：

1. 选择最灵活的、符合形势的组织形式——大致可以是两个团建制的旅，以后作战时这两个团联合行动。

^① 指1930年7月29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见《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集）》，第203—214页。文件日期错误地标为1930年6月）。

2. 成立实行领导的中央司令部（革命军事委员会），这个司令部要有足够的权威，能合并和改编选定作为未来红军基本核心的目前的游击队。
 3. 把这些“军”改组成正规红军的体系。
 4. 在根据地后方成立培训中下级指挥员的短期训练班，首先从工人和最积极的贫农中培训，在加速重新培训高级指挥员方面也是如此。
 5. 在后方组织和加速训练技术部队和步兵部队中的相应分队（机枪分队、爆破分队、掷弹筒分队）。
 6. 把组织侦察行动作为保证正规红军部队作战和大的游击行动取得胜利的头等任务。
 7. 在保证中央（中央委员或中央代表）直接领导的情况下，组织集中的党的政治教育工作体系。
 8. 保障通讯。组织领导中心、后备基地和大部队之间的无线电通讯。同时大力利用地方的通讯手段（快马传递等）。
 9. 组建制造手榴弹的军械修理厂（手制炸弹）和两个基本上用当地材料制作的工厂^①。
- （5）保证组建红军成功的基本政治条件是靠革命的农民来充实红军并有相当数量的工人核心。应尽量少吸收从前的土匪参加红军（事先要认真对他们进行审查）。将游击队并入正规军也应十分认真地对待；应采取措施保证革命纪律和坚决根除游击习气。相应地红军和游击队相互关系的基本形式应该是在作战方面游击队从属于红军，主要利用它们从事侦察和联络工作，以及〔打前锋和〕作后卫，不要并入红军正规部队。
- （6）红军武器、弹药和军费的供应只能取之于军阀部队。应在侦察情报有保障的情况下有步骤地突袭敌军的后方、辎重和运输车

^① 原文如此。

队。为此可组织短暂地占领城市，不必坚守（尤其是有小兵工厂和军械修理厂的城市）。

（7）近期首要的重点任务是组建一支有 2.5 万至 4 万人的坚强的正规红军，这支红军是今后新编部队的核心。这种组建工作根据形势来看不可能和平地进行。革命中国的红军只能在战斗中诞生。但是任何热衷于作战行动和依靠加强军队来扩大根据地的尝试在目前来说是错误的和有害的，因此必须加以放弃。形成一个强有力的拳头才能保证在革命运动向更高阶段转变时取得进一步战斗的胜利，同时又是这一转变的前提之一。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569，第 182—182a 页。

打字稿，副本。

272

向忠发给斯大林的信

1930年8月8日于上海

绝密

斯大林同志：

中国革命的飞速发展已成为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要求有党的坚决领导。连年不断的军阀战争加速了国家经济的全面崩溃和统治阶级的相互削弱，动摇了他们的根基，使他们面对日益迫近的必然灭亡；他们使广大工农兵群众彻底破产，工农兵群众坚决要求现在推翻国民党政权，要求党的坚决领导。只有通过革命的胜利，只有通过革命暴动的胜利才能结束军阀战争。工人群众越来越响亮、越来越坚决地要求拿起武器，而这表明中国的阶级斗争极其尖锐化了。最近几年来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具有异常激烈的性质：甚至最微不足道的经济罢工也总会发展成为伴随有武装冲突的和丰富工人整个斗争经验的重大斗争。这是由于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决定的。在这场激烈的阶级斗争中，黄色工会彻底变成了国民党压迫工人的工具，它们在群众中的影响已荡然无存，打倒黄色工会的口号已成为最流行、最合群众心意的口号；党已在工人群众性组织中得到巩固，而党的政治口号已得到多数工人群众的热烈支持。此外还应补充一点：在近来广泛开展的罢工运动过程中，工人的武装斗争和秘密武装组织得到了很大发展，上海和南京斗争的教训证明，广大工人群众正在准备武装暴动的口号下动员起来和组织起来。毫无疑问，基层统一战线的策略将引起广大群众的失望，把他们从我们身边推开，提出这样的策略只能说明对中国阶级斗争的尖锐性完全

不理解，对黄色工会的力量估计过高。

农民斗争得到更大的发展，已席卷华南华北各省，成了反对国民党、军阀、地主、土豪劣绅的决死战斗。农民武装组织的队伍人数超过500万。红军的发展同样惊人，现有22个军，人数超过20万，从社会成分来看主要是农民。非常重要的是每个军的领导权都由工人积极分子掌握。党在红军中的威信非常高，领导特别强，党的一切指示和命令都无条件地得到执行。最近红军根据革命的客观要求向最主要的中心城市发起攻势。军阀军队日益土崩瓦解：从普通的士兵骚乱变成公开的反对军阀战争的暴动、与农民密切配合的暴动。士兵亲自寻找党并听凭党安排的事例很多。军阀部队中受蒙蔽的士兵在与红军作战时起来反对自己的长官，投向革命部队一边。

总的形势如此，这一方面表明统治阶级再也守不住自己的阵地，另一方面表明广大群众越来越要求推翻反动政权的坚强决心。因此，推翻国民党和军阀统治、夺取政权的任务自然应成为党当前的首要任务。因此党应该加速武装暴动的准备工作，坚决领导武装暴动，为此要找到主客观前提都已十分成熟的合适时机。目前的形势是，武汉、南京和无锡暴动的胜利可以使中国千百万人站起来并在这场与帝国主义者和国民党你死我活的搏斗中赢得千百万劳动者的支持。红军攻下长沙使军阀阵营一片混乱，使革命气氛更加炽烈。武汉和南京的工人要求立即举行暴动，他们认为暴动是唯一的出路；越来越多的人投奔赤卫队。广大农民群众起来反对军阀，坚决向武汉进攻。红军对武汉的包围圈越收越紧：第二军和第六军（？）^①攻克沙市，第八军占领大冶，第一军打下孝感和黄安。同时必须指出，军阀们无法完全指望他们在南京和武汉的军队，因为武汉多数部队处于我们的影响之下，南京的情况同样如此，那里士兵倾向我们，他们越来越响亮地提出了举行武装暴动的要求；党组织在前沿阵地异

① 原文如此。

常迅速地扩大。现时的形势无疑证明举行暴动所必需的条件业已成熟；现在的问题只是哪一天和哪一刻举行暴动。远东局的同志们对罢工运动的巨大规模表示怀疑，他们不懂得在如此激烈阶级斗争条件下的总罢工，必须使武装暴动早日爆发，甚至与武装暴动同时爆发。上海正是形成了这样危急的形势，那里的罢工浪潮异常高涨，党在各工厂中成立了工厂委员会，保证在最短期间完全能爆发总罢工。

帝国主义是中国革命的最严重问题。毫无疑问，帝国主义者为了镇压中国革命无所不用其极，武装暴动必然会遭到他们的武力抵抗，但广大中国群众对帝国主义者义愤填膺，不容置疑的是，千百万人将响应革命政府的一声号召，起来反对帝国主义者并取得彻底的胜利，特别是现在在世界革命高涨的时刻，借助于共产国际为此动员起来的国际无产阶级的帮助会更是如此。我认为，尤其在目前的第三时期^①，通过外交途径来阻止帝国主义在半殖民地中国的进攻的尝试是毫无希望的，但揭露帝国主义者的一切外交阴谋并以此来争取国际无产阶级对中国革命的同情，则是极为重要和必要的。

中央坚决反对党内在这一危急时刻出现的“左”的和右的倾向。最近半个月来，中央竭尽全力纠正各省委中的“左”倾幼稚〔病〕，及时撤销了浙江省委关于杭州暴动的决定，取消了江苏省委原定的南京士兵暴动和湖北省委原定的武汉士兵暴动。中央认为这是可能妨碍革命运动的冒动，建议立即纠正这一过火行为。另一方面，中央考虑到客观条件业已成熟，认为必须积极准备武汉和南京的暴动，

^① 指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制度总危机有三个时期的论点：第一时期（1918—1923）是“资本主义制度尖锐危机的时期、无产阶级直接革命发动的时期”；第二时期（1924—1927）是“资本主义制度逐渐形成局部稳定”和无产阶级“继续进行保卫战”的时期；第三时期（1928年起）是“生产力发展和市场萎缩之间矛盾特别激化，使各帝国主义国家间新一轮帝国主义战争、帝国主义反对苏联的战争和反对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干涉的民族解放战争和巨大阶级搏斗必然爆发”的时期（见《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第6册，第56—57页）。

尤其是组织作为决定暴动胜利前提的上海总罢工。我们曾将这一决定向共产国际作过报告，而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不同意这一决定，我理解这是因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当时对中国的实际状况了解不够详细，没有收到关于革命飞速发展的详细报告，因此共产国际执委会才给我们下达了这样的指示^①。所以，除了给共产国际执委会写了关于中国目前形势的专门一封信并请求批准中央的决定外^②，我们还请求您给予支持。这不仅对于中国革命，而且对于世界革命都是十分重要的问题，因此请尽快给予答复。

向忠发
核对无误：谢廖金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1004，第 20—25 页。

打字稿，经过核对的副本。

① 见第 255 号文件。

② 指中共中央政治局 1930 年 8 月 5 日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报告（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6 册，第 220—222 页）。

273

中共中央政治局 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电报^① (摘录)

1930年8月8—9日于上海

[一]

1930年7月^② 8—9日

政治局发。来电^③已讨论。我们要求再开会商量。目前红军已攻下长沙。长沙几百万农民正在斗争。不久将攻克九江，沙市处于危险中。

……^④ 武昌暴动没有具体条件的保证。罗伯特^⑤从汉口返回后再送上详细的通报。平汉路交通已中断。所有的红军都向武昌方向挺进。上海、武昌、天津、广州工人的罢工运动，正是^⑥在革命化，正是在铁路员工中。国民党黄色工会得不到任何信任……工人群众要求武装暴动，迅速发展……中国的工人纠察队——500万武装农民，3000万有组织的群众。全中国的农民暴动……在前线影响巨大。武装暴动的条件业已成熟。因此〔已作出〕关于南京、武昌暴动，上

① 文件全文没有找到。档案中只保存两份电报的片断。

② 原文如此。应为：8月。

③ 见第271号文件。

④ 此处和以后的删节号是文件原有的。

⑤ Г. 埃斯勒。

⑥ 原文如此。

海总罢工和苏维埃政权在全中国扩大的决定。我们在每个工业中心都有……（结尾无）^①

[二]

农民要求夺取中心城市。军阀部队严重受损。士兵起来暴动，正在寻找我们的领导。南京主要的部队处于我们的影响之下，汉口也同样如此。每个企业都有斗争委员会。因此你们不理解具体形势。请同意我们的决定。请动员各国。请保证给予最大的支持。

向〔忠发〕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1004，第 27、31 页。

打字稿，副本。

① 原文如此。应为：行动委员会。

274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 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电报^①

1930年8月8—9日于上海

……^② 远东局发。在远东局与政治局^③ 激烈斗争后，政治局基本上确认了我们的建议：

- (1) 武昌、南京暴动，上海总罢工在收到你们的决议前已暂缓进行。
- (2) 时局要求作出的一切紧急决定要与远东局共同作出。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1004，第 31 页。

打字稿，副本。

① 文件的副本放在 1930 年 8 月 14 日给 B. M. 莫洛托夫的一组中国来电中。

② 删节号是原有的。

③ 中共中央政治局。

275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 政治委员会给中共中央的电报^①

1930年8月9日莫斯科

绝密

我们建议采取以下反对帝国主义者的措施。苏维埃应宣布它们赞成无限独立，无限独立只有在彻底战胜反革命和苏维埃在全中国取得胜利后才有保证。苏维埃在组织反击武装干涉的同时，应考虑到力量的现实对比，利用每一个机会在各种具体情况下相机行事以推迟同列强的冲突，利用同帝国主义者的矛盾，赢得时间和空间来动员越来越多的群众反对武装干涉。

但是为此目的，在召回帝国主义部队、军舰的条件下，可以与列强就债务、租界、关税，保证外国人的保障^②，容许外国企业在服从苏维埃法律、承认八小时工作日制和工厂委员会的条件下暂时继续生产进行谈判。可以占领租界，不强求但要求在租界实行八小时工作日制和社会立法，同时在租界开展相应的群众运动。对于同帝国主义保持长期和平的某种可能性不要抱任何幻想。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1004，第 30 页。

打字稿，副本。

① 电报文本于8月14日送B. M. 莫洛托夫。

② 原文如此。按意思应为：保证外国人的安全。

276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
政治委员会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远东局的电报^①

1930 年 8 月 9 日于莫斯科

绝密

必须无条件执行共产国际执委会下达的指示：进一步开展群众性战斗，从组织上加强党，千方百计巩固苏区，为红军创建一个或几个据点作为进一步发展运动的必要前提，组织声援苏区的罢工，动员群众反对帝国主义者和国民党，加强在国民党军队中的工作，尽量阻止装备和部队的运送。建议中国共产党政治局直接把对形势的估计及其对共产国际执委会指示的考虑转告共产国际执委会。

今后必须使远东局在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提供情报和自己的意见的同时报告政治局的确切决定及其理由。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1004，第 30 页。

打字稿，副本。

① 电报文本于 8 月 14 日送交 B. M. 莫洛托夫。

277

别尔津和图梅利陶关于中国 军事政治形势的书面报告

不晚于 1930 年 8 月 10 日于莫斯科^①

绝密

中国的军事政治形势 (据 1930 年 8 月 5 日的材料)

一、南京集团（蒋介石）和华北集团 (阎锡山、冯玉祥等) 之间的斗争

经过很长时间（大约从今年 1 月至 4 月）形成了以阎锡山为首的所谓华北集团，并且它一直在准备与南京开战，同时南京集团也进行了作战准备，敌对双方终于于 5 月中展开了军事行动。

双方在前线的部队编组情况如下：

华北集团的部队：

(1) 阎锡山：从总计 10 个步兵军和 1 个骑兵军中派两个集群赴前线：

1. 第一集群——3 个步兵军赴东明——考城地区（开封东北和开封东部）向徐州（苏北）方向行动；

2. 第二集群——1 个步兵军和几支独立部队由傅作义指挥在德州地区（山东北部边界）向济南（山东省会）行动。

(2) 冯玉祥：从其主力部队(12 到 14 个师和 2 个骑兵师) 中派出：

^① 日期是根据 B. II. 马雷舍夫给 Г. И. 萨法罗夫的附信确定的（见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573，第 149 页）。

1. 6到7个步兵师和1个骑兵师的集群开赴郑州——开封——徐州地区（徐州位于平汉铁路上，郑州以南^①）。该军队集群计划同时在徐州（苏北）沿陇海路和湖北方向（沿平汉路）行动。

2. 3到4个师的集群开赴老河口（湖北省西北）地区沿汉水向汉口方向行动。

3. 1到2个步兵师的集群开赴南阳（河南省西南）地区，其任务显然是保持上述两个主要集群之间的作战联系。

在华北集团的部队编组中有所谓的“灰色”部队——河南省各个将领的部队，它们既不是华北集团的主力部队也不是南京的主力部队，但追随某一方面。

在蒋介石转入进攻时，“灰色”部队中站在华北集团一边的有：

1. 孙殿英部——驻扎在亳州地区（安徽省归德以南）的约2个步兵师；

2. 万选才部——驻扎在归德地区的约2个步兵师；

3. 樊钟秀部（即樊醒民部）——占领徐州地区（平汉路上，郑州以南^①）的3个步兵师；

4. 石友三部——东明地区的2个步兵师（与阎锡山部在一起）。

蒋介石部队（南京）

蒋介石部队的部署：

1. 11到12个步兵师，其中包括蒋介石的精锐师（第1、2、3师等）在徐州地区。这一集群的任务是向开封——郑州进攻，由蒋介石指挥；

2. 8个步兵师在杨山——信阳（河南）地区，任务是向郑州沿平汉路行动。这支部队中约有1到2个师留在汉口地区；

3. 陈调元约3个步兵师在济南府（山东）对付阎锡山部的德州集群。

① 原文如此——译者。

“灰色”部队站在蒋介石一边的有：

1. 韩复榘部——驻扎在济宁地区（山东西南）的 2 个步兵师；
2. 占领襄阳地区（湖北西北）和从西北方向保卫汉口的 5 个步兵师。

因此，双方在主要作战方向上的部队编组和人数是：

1. 郑州——徐州方向（沿陇海路）

华北集团——21 到 24 个步兵师——25 万人

蒋介石——14 到 16 个步兵师——20 万人

2. 德州——济南方向（沿津浦路）

华北集团——3 到 4 个师——5 万人

蒋介石——5 到 6 个师——6 万人

3. 郑州——汉口方向（沿平汉路）

华北集团——6 到 7 个师——6、7 万人

蒋介石——8 个师——8 到 10 万人

4. 老河口——汉口（沿汉水）

华北集团——3 到 4 个师——4 万人

蒋介石——5 个师——4、5 万人

从以上总的部署看，华北集团在 5 月 15 日前在郑州——徐州这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主要方向上兵力占优势。

总的来说，华北集团向前线出动约 40 到 41 万人，此外还有阎锡山的 6 个步兵军和 1 个骑兵军及冯玉祥的 1 到 2 个步兵师作预备队（在北平——张家口地区和豫西地区）。

蒋介石与华北集团相对抗的约有 39 万人，即兵力大致相当，此外，在蚌埠有 2 个模范师和（据一些情报说）在汉口有 1 个师作预备队。

作为总的战略预备队蒋介石掌握着（当然是相对的）湖南、江西、广东等省的地方部队，人数达 20 多万。这些部队已卷入与红军的斗争，要把它们用在对抗华北集团部队的前线可能性很小。此外，广东省的部队（6 个步兵师，6、7 万人）被占领了粤北和粤东、准

备对广州开战和进攻湖南的张发奎部队和桂系部队所牵制。

5月13日战斗开始，蒋介石部队沿陇海路向归德进攻。他的空军预先对开封和郑州进行了几次袭击。蒋介石击溃万选才的“灰色”部队后，于5月20日占领归德。这里应该指出，万选才部队在争夺归德的战斗中特别顽强；蒋介石不得不部分地把他的预备队投入战斗。

5月底，冯玉祥和阎锡山集结在东明——考城——郑州地区的主力部队转入对归德的进攻，同时冯玉祥的骑兵部队向亳州方向运动，即攻击占领归德地区的蒋介石部队的侧翼。据报纸上的消息说，蒋介石因此被迫放弃归德，开始向徐州后撤。冯玉祥的骑兵在这次战役中成功地袭击了蒋介石的后方。据同一消息说，6月中旬，争夺徐州的战斗打得很艰苦，双方投入了大量兵力。6月底，这一方向的战斗停止。冯玉祥和阎锡山的部队停留在归德一线，而蒋介石坚守徐州。

6月中旬，阎锡山的德州集群（傅作义）向济南（山东）运动。6月25日，由于陈调元和韩复榘部（韩复榘部向济南府集结）抵抗不力，傅作义部占领了济南。韩复榘沿胶济路向东撤退。陈调元集群向南撤退。据最新消息（报纸）称，傅作义部开始沿胶济路和津浦路往南运动。没有关于这一地区战役进程的更详细情报。

汉口方向的军事行动于今年6月开始，樊钟秀的“灰色”部队沿平汉路进攻。6月底，樊钟秀的进攻被蒋介石的“灰色”部队阻止在郾城附近。据现有消息称，樊部遭失败，据说他本人身负重伤。据6月中旬的消息说，蒋介石的“灰色”部队开始向徐州（郑州以南）进攻，并占领了以南和以东的许多据点，对徐州构成威胁。

没有这一地区作战行动进一步发展的情报。

5月中旬，在华南加入华北集团的张发奎部和广西部队开始向北运动，其任务是夺取湖南和武汉，从而配合华北集团从北边攻占湖北省的战役。6月，张发奎占领长沙。何键（湖南省政府主席）部起先不与张发奎交战，从而帮助张发奎打下长沙，这时又投向南京

方面，把张发奎逼退到湖南。据现有情报称，张发奎打算潜入江西。目前没有关于他的部队部署的情报。

最新的情报表明各条战线相对平静。敌对双方目前均未取得决定性胜利。同时，情报表明，蒋介石在6月底准备转入对河南的决定性进攻并集中大量兵力（10个师）于津浦路地区。列入这一部队编组的有从广东调来的因广西省和广州地区战事结束（张发奎退往湖南）而腾出来的几个师（第3师、第8师，据说还有第60师和第61师）。

长沙最近的事态（红军攻占长沙，有进入武汉地区的危险）看来妨碍南京目前恢复对华北集团的进攻。

二、敌对集团总的状况及其兵力和财力 “华北集团”

阎锡山是华北集团中的主要人物，因为他拥有强大的根据地和保障相对出色的部队。阎锡山继续在加强其军队，据某些材料说，目前他在北京组建预备部队。此外还在补充武器，加强炮兵和空军。太原兵工厂在扩大步枪的生产并着手生产轻炮。

加入这一集团的各派利益的冲突基本上说明了该集团的现状。这些矛盾需要加以协调和但很难消除，这一切迫使阎锡山经常同这个或那个将领进行谈判，签订临时协议，等等。

据某些情报称，阎锡山军队加上预备队和其他（守卫）部队达20万人。炮兵装备有300多门可以作战用的火炮。部队的物质保障（军费和其他给养）都还不错。

冯玉祥由于物资方面依赖阎锡山（军费、武器和弹药在相当程度上取自阎锡山）、根据地贫瘠（1929年陕西省闹饥荒，他只占领了河南省部分地区——陇海路一线），因此他在该集团中是影响较小的人物，据某些情报称，他担任河南反蒋联合部队军事领导人角色。

他的武装力量有 20 多万人，主力近 15 万。他们的战斗素质相当高，冯的部队（主力）在这方面要比“灰色”部队高出许多。

加入集团的“灰色”部队——石友三等人——是次要人物。他们动摇不定，他们今后的立场取决于华北集团同蒋介石进行武装斗争的顺利程度。这方面的失利总是会使“灰色”部队发生动摇，投向蒋介石一边，等等。

张发奎及广西部队由于部队力量弱、人数少和远离主战场，不能对华北集团的政治活动和军事活动产生重大影响。他们的根据地窄小，与华北缺少应有的联系，所以他们的军事活动只能执行次要的任务。他们的武装力量不超过 4、5 万人，而且其基本核心——张发奎部在最近的湖南战斗中大大受损，装备很差。

阎锡山为了寻求与南京作斗争的政治基础和为了进一步巩固自己军事实力的强大盟友，与所谓的改组派——国民党左翼结成同盟，目的是在华北（北京）成立政府，所以过去和现在都与奉天（张学良）进行谈判，争取张学良站到他的一边。

报纸上的最新消息指出，北京成立政府的问题已处于积极解决的前夕。暂时没有相反的情报。

北京政界把汪精卫抵达北京（6 月底）视为表明成立华北政府筹备阶段结束的事实。

阎锡山目前尚未取得与奉天谈判的积极结果。张学良采取观望和两面派的立场，一方面向阎锡山提供武器和装备（通过出售），另一方面继续与南京保持联系，也向南京提供武器。同时，张学良为防万一采取措施保证满洲与中国内地边界的 safety，加强了他驻山海关——锦州地区的部队。

报纸（7 月底）报道说，汪精卫的代表访问了奉天，以期拉他参加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代表大会和未来的国民大会。汪精卫认为，奉天如能同意这样做，将有助于他加入未来的华北政府。

外部的靠山和帝国主义者对集团的支持来自日本。日本为巩固

其在华北的地盘并与支持南京的美国相对抗，积极向阎锡山提供武器等。

蒋介石的南京集团

南京集团也是在利益上互有矛盾的各派的“联盟”。消除这些矛盾是南京最困难的任务。南京物质基础较广、美国以及部分地还有英国和日本对它的支持，是南京与华北集团相比较的优势方面。

它的武装力量总计约 70 到 80 万人，主力（约 15、16 个步兵师，35 到 40 万人）的物质保障良好，装备优于华北集团部队。德国军官的指导带来了积极成果，某些所谓的“模范”师（2、3 个师）就装备和素质而言接近于欧洲军队中同样的部队。

蒋介石的其他部队——“灰色”部队等——保障和装备都要差些。这些部队的指挥将领往往不太可靠，一旦前线失利随时都可能投向敌方（例如，何键今年 5、6 月在湖南的行为，石友三的反戈，等）。

据最新资料称，南京继续从美国、日本、德国获得大批武器、弹药、飞机等军用物资。上海兵工厂扩大了武器生产，每月生产机枪 64 挺，每天生产炮弹 300 发和子弹 30 万发。它的空军现在拥有 90 架现代化的战斗机。预计可从美国获得坦克。

目前南京由于前线一再失利（山西部队占领济南府，6 月归德失利等）及红军向长江流域一带挺进正处境困难。在宁沪地区，与南京敌对的分子正试图组织对蒋介石的武装行动。据说原沿海五省首领（1925 至 1926 年）孙传芳在上海策划起义；预定在今年 8 月行动，并在与上海的法国人士取得联系。

三、红军的作战及其对中国军事政治形势的影响

据中外报纸上的消息称，7 月底红军在湖南、江西和湖北等省加

紧展开军事行动，力求夺取这些省的中心城市武汉、长沙、南昌和九江。红军于7月27到28日打下长沙，前后占领了将近10天。8月5日在敌人优势兵力的压力下红军撤出了长沙。据最新消息称，红军正威胁武汉和南昌。南京和帝国主义者采取一切措施要消除红军对长江流域一带的威胁。南京大规模增援部队，包括它的内河兵力已派往武汉和长沙。在这些地方还集中了帝国主义的军舰。日本海军陆战队被派往汉口。武汉已宣布实行戒严。

红军的节节胜利及其军事行动直接转入长江地区，对现时中国的军事政治形势和南京与华北集团（阎锡山）武装斗争的结局可能产生重大影响。他们之间的军事行动在6月的山东省和陇海路以东一线（徐州方向）的战役之后原已停止，现在可能会重新爆发，更趋激烈。华北集团必然利用南京后方由于红军的节节胜利而造成的严重局势，并试图在华北恢复对蒋介石的进攻。

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华北集团暂不进攻，等待南京与红军开战，从而削弱在前线的部队。此后华北集团一旦作好准备就会转入坚决的作战行动以消灭南京的中央。

除了这一可能性外，不排除各派的某些部队在与中国革命运动共同作战的基础上联合起来。现有情报表明，7月初南京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向英、日、美、法通报说，他已采取步骤与阎锡山和奉天签订停战协议，以便今后共同致力于镇压共产主义运动。王正廷在通报这一情况时请求列强给南京以财政及其他方面的援助。据同一情报称，上述列强对王正廷的建议表示同情，向他保证将讨论这一问题。8月3日的情报还表明，南京有可能与华北集团达成临时协议。国民党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全会^①致电华南的桂系，要求他们派兵进攻湖南的红军。帝国主义列强无疑在这一阴谋中起着并将起

^① 指1930年7月13日至8月7日在北京举行的反对蒋介石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汪精卫、阎锡山、冯玉祥等人）的“扩大会议”。

着头等重要的作用。

最后，红军向长江流域这一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堡垒地区挺进，可能会引起帝国主义广泛的武装干涉。列强在长江中游地区集结大规模海军力量，帝国主义在中国和欧洲报刊上开展广泛宣传运动，要求共同采取措施“保护”外国臣民，这一切使我们有根据认为，帝国主义正在准备进行武装干涉，目前只是在等待合适的时机。

工农红军参谋部第四局局长 （别尔津）
三处副处长 （图梅利陶）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573，第 150—158 页。

打字稿，原件，亲笔签字。

278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 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电报^①

1930年8月12日于上海

1930年8月12日

没有发生任何大规模罢工和示威游行。工人群众中充满战斗情绪，但我们尚未加以领导。各部队和警察都相当腐败。目前形势下不可能举行暴动（待续）^②。

1930年8月12日

但形势不稳定，发展迅速（字迹不清）^②。领导同志的正确指导方针，他们说：只有暴动，才可能发生任何群众行动，反对大规模杀戮的群众行动（待续）^②。

无日期（续）。政治局^③坚持举行暴动的方针并要求你们迅速作出决定。这是与政治局决裂的唯一途径^②（以下两个词字迹不清）。^②

全宗495，目录19，卷宗242，第69页。

打字稿，副本。

① 文件的副本放在1930年8月14日共产国际执委会送给B. M. 莫洛托夫的一组中国来电中。文件上有批注：新来的电报，根据内容判断的。远东局发。

② 原文如此。

③ 中共中央政治局。

279

斯大林给莫洛托夫的电报

（摘录）

1930年8月13日于索契

绝密

中国人的倾向是荒诞的和危险的。在当前形势下，在中国举行总暴动，简直是胡闹。建立苏维埃政府就是实行暴动的方针。但不是在全中国，而是在有可能成功的地方。中国人急于攻占长沙，已经干了蠢事。现在他们想在全中国干蠢事。决不能容许这样做。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专藏文献
打字稿，副本。

280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 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

1930年8月13日于上海

秘密

致政治局

亲爱的同志们：

当你们的红军撤离长沙的时候，我们大家的心情都很沉重。我们不理解这种撤退，它与所实行的方针是相抵触的。但是，我们没有得到任何消息，我们不了解详细情况。

然而，我们却要冒险，我们不得不根据后来得到的详细消息重新审视某些观点，必须立即作出一些结论和判断。在目前的局势下必须这样做，现在我们的军队已经逼近南昌，可能再过一段时间，我们就能够像攻占长沙那样攻占南昌，我们正向九江挺进，红军正与武汉对抗。

关于长沙现在了解哪些实际情况呢？

我们的红军在长沙。城内外群众积极支援红军并与之一起战斗，该城占领军没有进行认真的抵抗，它们士气低落，完全“被瓦解”，部分向我们交出武器，部分转到我们方面。红军在该城得到了加强，我们拥有一支约有1.5万名纪律严明和装备较好的赤卫队员的部队（1.5万这个数字是我在汉口时从项英那里得到的）。

过了几天，反革命的反攻开始。据项英报告说，反革命部队约有1万人，缺乏斗志。他们的进攻得到了中国军舰和最重要的是得到了外国军舰的炮火支援。

没有发生很大的战斗，没有遭受很大的伤亡，我们很有秩序地

撤出了城市。反动派占领了城市，并屠杀了每一个被怀疑同情我们的人，据说已有3000人遭杀害。

这次撤退的原因是什么呢？

当然，在我们的斗争中退却是不可避免的，只有傻瓜才会认为，我们会取得接连不断的胜利。因此，如果由于撤退我们明天就能彻底打败反动派，那么我们决不建议采取英雄主义的愚蠢政策——战斗到最后一个人。

但是，从军事角度来说，撤出长沙确实是必要的吗？确实我们应不经过激烈的战斗就撤出这个城市吗？对此我们持怀疑态度，而且项英在汉口向我们作了汇报之后，我们的怀疑更加深了。项英向我作出了以下说明：我们撤出长沙的主要原因不是军事上的，交出该城的主要原因是采取了老的保守的游击方针。他们占领村镇、城市，在遇到较多兵力进攻的情况下，就撤离，就退却，为了以后有可能在另一个地方再发起进攻。

当然，游击战在中国夺取政权的斗争中，现在和将来都会起很大的作用。但是，如果我们的红军在面临攻占一些重要的大城市的任务时，这种游击战习气在它们那里占主导地位，那么它就可能成为致命的祸根。

例如，我们在长沙，城内外的群众同我们一起战斗。我们遭到了进攻，进攻者的力量是这样的：成功地向他们进行反击绝不是毫无希望，但我们却不进行认真的斗争就撤出该城，把群众留给刽子手。难道在这里就不会出现一种严重的危险吗？群众会说：在支援红军的事情上应该更小心谨慎些，敌人来了，他们会不战斗就撤走，把我们留给了刽子手……^① 群众看到我们不竭尽全力去击退敌人的反攻，他们就会责怪我们。

其次，在这种精神状态下，我们不可能巩固和扩展我们的阵地。

^① 删节号是原有的。

我们会夺取城市，但是可能我们也会重新丢失；我们不应抱有幻想：我们越是要攻占更重要的据点，就越是要更认真地着手组建真正的苏维埃中心和越是要更认真地反击敌人。我们应该做好充分准备，以便在权衡各种情况之后，不轻易放弃业已夺取的重要阵地，而应该扩展这些阵地。

同志们，我们再说一遍：完全有可能，由于对实际情况了解的不准确，我们对长沙事件的判断不完全正确。但是这些事情很重要，在任何情况下，甚至在有很小怀疑的情况下，都必须立即采取一定的措施。在这种时刻必须采取以下措施（我们在这里不再重复军队构成、扩大党组织等问题）：

1. 立即派负责同志到红军那里去，特别是到那些在长沙、南昌、九江和武汉周围作战的红军那里去。

2. 立即获取有关长沙斗争的一切详细情况，以便把长沙的教训尽快传达给各红军。

3. 根据你们收到的共产国际的指示^①（特别是——（1）不扫射外国商船和军舰，（2）不扫射外国租界，（3）不消灭和没收外国的财产），立即向各路红军发出关于我们对付帝国主义者的策略和手法的明确指示。

要密切注视，不要因为实行这一策略而产生误会。其次，显然有时出于斗争的需要，不能采取这种策略，但是我们应该有策略方针。可能会经常发生这样的情况：外国军舰不顾我们这些策略，向我开枪射击。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将抓获一些外国人作为人质，并向那些军舰的舰长宣布：“如果你们开枪射击，那么我们就要考虑，让这些子弹首先击中他们的人。”

请你们讨论一下这些问题，并将你们要采取的措施告诉我们。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579，第 127—128 页。

德文打字稿，副本，无签字。

^① 见第 275 号文件。

281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 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

1930年8月中旬^①于上海

秘密

致政治局
副本送共青团中央

亲爱的同志们：

在最近一次有我们参加的会议上，李立三同志代表政治局声明说，共青团中央将继续存在，直到建立行动委员会^②。就在那次会议上确定，党和共青团的基层组织，首先是支部，不应该合并，当时商定：政治局准备取消共青团中央以及党和青年团支部合并的计划将不实施，政治局将等待共产国际的决定。但是，最近我们同共青团代表们的交谈，以及业已成立的行动委员会的整个活动方式向我们表明，就这个问题所达成的协议并没有得到遵守：1. 在一些组织中青年团支部实际上已经与党支部会并。2. 共青团中央实际上已不复存在，它被行动委员会中的共青团书记取代。对共青团基层组织的指示已不是由共青团中央作出（尔后由政治局批准），而是由行动委员会本身作出。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作如下声明：

（1）我们坚决反对青年团支部与党支部合并。政治局采取的这个步骤是粗暴违反布尔什维克的组织机构原则的。毫无疑问，让党

① 日期是根据该信内容确定的。

② 指中央行动委员会（见第270号文件附录1）。

与其他组织，即便是共产主义组织合并是不正确的。虽然共青团是一个承认共产国际章程和纲领并应服从党的领导的政治性战斗组织，但是它从自己的纲领性目标和任务来看，是党的一个辅助性组织，是为广大青年工人群众设立的共产主义外围组织。共青团应该通过积极参加党的全部生活和活动，通过开展工农青年的阶级斗争和通过布尔什维克式的教育工作，把广大的工农青年阶层吸引到我们方面来，并为党培养必要的后备军。共青团的这一性质和这些任务就已经说明，它在自己的队伍中能够而且应该包容比党更广泛的群众。由此也产生了吸收党员和吸收共青团员的不同条件，以及这两个组织成员的不同义务。共青团支部与党支部合并无非意味着取消党和其他群众组织之间的界线，无非意味着削弱党的领导作用，同时这种合并还意味着实际取消共青团。正是现在，在准备最广泛的群众为夺取政权而斗争的时期，政治局实际上在取消共青团，取消一个与工会并列的群众性组织。这一步骤的危险后果可能是削弱党在青年工人，即工人阶级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个阶层中的影响。认为在为准备夺取政权而斗争的时期采取这种步骤是必要的，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共青团的存在决不会妨碍力量的集中。的确，在准备决战时期应该集中一切力量，但是不能采用这种办法，不能采用取消共青团中央和取消独立的青年团支部的办法。相反，对于中国党来说，共青团作为广大工农青年群众的一个动员和组织机关，在党的领导下开展工作，这是一个优点。如果认为（政治局中一些同志就这样认为），俄国党的优点就是没有共青团（1917年），那么这种观点是错误的。相反，恰恰是在暴动的时期共青团可以发挥重大作用。在这个时候，共青团的任务就是组织在它影响下的无产阶级青年群众听从党调遣，由他们组成武装骨干，等等。

在共青团和党本身尚未掌握广大工人群众，多半还过着脱离群众生活的时候，采取这种步骤更是特别错误的。将共青团支部与党支部合并意味着助长宗派情绪和放弃争取广大群众。政治局决定把

共青团支部融入党支部，而不是向党和共青团每一个支部提出把更多的工人争取到党和共青团里面来的任务。如果在某个企业中共青团支部和党支部的独立存在还不够强大，那么这还不是它们合并的理由。相反，两个支部的迫切任务是通过招募新成员的办法来扩大支部，使它们成为具有生命力的组织。

（2）基于同样的原因，我们坚决反对取消共青团中央。任何行动委员会都不能取代共青团中央，都不能对青年基层组织实行日常的领导和监督，也不能同企业及青年工人群众保持一切联系。我们也反对以行动委员会下面的青年部，即所谓的青年书记处来取代共青团中央，因为这意味着青年组织将丧失任何独立性和任何主动性。

因此，我们具体建议如下：

（1）等待共产国际的决定。

（2）党立即向所有组织发出指示，不许青年团支部与党支部合并。

（3）共青团中央要像行动委员会成立以前那样，即作为一个组织上独立的机关继续工作，当然要隶属于政治局。

代表远东局 青年共产国际代表^①

全宗 533，目录 8，卷宗 134，第 1—3 页。

打字稿，副本。

① Г. М. 别斯帕洛夫

282

瓦西里耶夫就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远东局的电报给莫洛托夫的信

1930年8月16日于莫斯科

绝密
亲启

致莫洛托夫同志

我们收到罗伯特^①于8月12日和13日发来的两份不完整的报告^②。从这两份报告的部分内容看，罗伯特已从汉口返回。

他报告说，在武汉驻扎着一些尚未受到我们影响的军队；那里正在大规模地屠杀党员。

党组织有200名党员，红色工会有150名。局^③正在采取措施，向莫斯科派信使，送去关于中国情况的详细材料。

瓦西里耶夫

全宗495，目录19，卷宗242，第72页。

打字稿，副本。

① Г. 埃斯勒。

② 文件没有找到。

③ 指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

283

中共中央政治局给共产国际 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电报

1930年8月16日于上海

致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

至于我们对待帝国主义的方针和策略，我们认为，必须通过外交手段揭露帝国主义的胡作非为，以此来赢得世界无产阶级的同情。但是用外交手段是不能减轻帝国主义的压迫的。因此，我们建议：第一，在有外国租界的城市里，准备暴动的时候，必须既在中国地区，同时又在外国租界地做准备，但是在暴动的时候，我们将赋予中国地区最重大的意义，而对租界则采取防御性策略；第二，在暴动胜利后和在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开始阶段，我们应该发表外交声明和提出外交照会，要求归还租界和海关，要求撤走帝国主义列强的军队和舰队，同时在中国地区和外国租界开展群众运动；第三，我们要宣布没收那些不服从苏维埃法律的企业和银行；第四，我们应该在全国积极地开展反帝运动；第五，我们应该仔细地准备以攻占租界为目标的武装暴动。为了同帝国主义进行殊死搏斗，我们在斗争过程中采取这种策略就能够积聚更强大的力量。我们认为，同帝国主义者不仅不可能保持长期的和平，而且也不可能保持比较短期甚至几天的和平。还不仅如此。由于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所以同帝国主义的残酷战争不仅在革命政权建立之后会立即爆发，而且在反对国民党的武装斗争一开始时就会爆发。因此，同帝国主义列强的军队和舰队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帝国主义不仅要用武力来

保护自己的财产和租界，而且还必定要用武力来保护国民党的统治。在大冶、岳州和长沙所取得的经验表明，不是革命先没收帝国主义的财产，而相反，是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军阀一起先镇压革命。这表明，帝国主义很清楚，工农苏维埃政权是它的死敌，它想在苏维埃政权还处在萌芽时期就给它以致命的打击，并且不让它有积聚自己力量的任何机会。所以，在准备武装暴动的时候，如果我们不下定决心与帝国主义进行殊死搏斗并推翻它的统治，那就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是对革命的破坏。因此，我们不能同意电报中所指出的原则和所建议的措施^①。特别是在电报中没有指明，为了同帝国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必须建立苏维埃政权，这个政权要就债务、海关和租界问题进行谈判。在电报中仅谈到在租界实行苏维埃法律的要求。这一方面是完全不现实的。即使帝国主义不能推翻苏维埃政权，它也不会同苏维埃政权进行任何谈判。而苏维埃政权只有在与帝国主义的残酷斗争中才能壮大起来。另一方面将会彻底动摇群众对党和苏维埃政府的信任并会使我们丧失广大群众的支持。因此，我们并不拒绝妥协策略，但是这种妥协不会给我们带来任何战略上的成功，而只会带来严重的损失，中国现在是半殖民地国家，目前是世界革命的第三时期，这个时期没有世界性的帝国主义战争，苏维埃政权还没有建立起来，这完全不同于苏联签定布列斯特和约时的历史条件。布列斯特和约具有很大成效和意义，因为当时苏维埃政权在俄国已经很巩固，并能在布列斯特实行妥协后变得更加巩固。当时德国也坚持要与苏维埃政权签定和约，以便能够集中自己的一切力量来对付协约国。我们这里还没有任何现成的革命政权，而不同帝国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就永远不可能建立革命政权。同时任何一个帝国主义大国现在都不会同中国的苏维埃政权签定任何单方面的条约，相反，它们想必都会尽一切可能来镇压中国革命。因此，在我们看来，

① 见第 275 号文件。

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的经验不适用于当今的中国。我们请求共产国际执委会重新讨论这个问题并赞成我们的声明。

中共中央政治局

全宗 495，目录 19，卷宗 237，第 17—19 页。

德文手稿。

284

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的信

1930年8月16日于上海

秘密

致远东局

你们8月13日^①和14日的来信^②收悉。现答复如下：

首先，关于长沙问题——中央完全同意你们对放弃长沙的批评。一个星期前中央给长江局发出了体现这种精神的一封指示信^③。我们将该信的副本转寄给你们。

第二，当然，必须派负责同志到各路红军去。但是由于负责人工作紧张、人手不够和繁忙，派遣专门代表很困难。因此中央给长江局发了信^④。

第三，关于如何对待帝国主义者的问题，中央不能同意你们的意见。关于帝国主义者对中国革命态度的所有事实都证明，由于战争的不可避免，这种策略不仅现在不能实行，而且将来也不能实行。因为帝国主义者决不会停止对中国革命的进攻。特别是在开始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时候，帝国主义者必定会以最野蛮的方式镇压它。如

① 见第280号文件。

② 文件没有找到。

③ 这里指中央给长江局发出的关于加速武汉暴动等问题的指示信（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第247—249页）

④ 可能是指注释③中所指的信。

果我们不满怀坚定的决心同帝国主义者作斗争，我们就不可能取得革命的胜利。第二，至于说抓获一些外国人作人质，这不仅不会起作用，而且会成为笑柄，因为中国革命是在第三时期发展的^①，因为中国是半殖民地国家，中国的现时环境完全不同于当时苏联的情况。因此，很难把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的经验^② 用于现在中国的革命策略中。因此我们对帝国主义者的策略可以采用外交手段，只是为了揭露他们对世界无产阶级犯下的罪行，其目的是发动无产阶级的反帝运动。我们决不能对和平外交的可能性抱有幻想。因为多数教堂都占有大量的土地并残酷地剥削农民，在党进行没收土地时教堂的土地也不能例外。否则党就会在广大群众中失去威信，从而遭受重大损失。如果党一旦认定，帝国主义者在中国开办的所有企业和银行违反苏维埃法律，那就将这些企业和银行无条件地予以没收。

中央就此问题曾致电共产国际^③。请你们看看这份电报。同时中央希望与你们举行会谈。请确定会谈的时间和地点。在会谈时中央将详细阐述自己的意见。

最后，至于对目前时局的宣言^④，中央本应预先和你们讨论，但由于革命形势的临近和中央行动委员会紧急决定的刻不容缓性，宣言就匆忙发表了。虽然〔李〕立三同志在和你们谈话后曾试图停止发表，但是撤消宣言已为时太晚，因为在《红旗日报》^⑤ 上已排印好

① 见第 283 页注①。

② 1918 年 3 月 3 日苏维埃俄国与德国、奥匈帝国、保加利亚和土耳其签定的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和约规定：俄国为了保卫苏维埃政权在领土、财政及其它方面向德国作出巨大让步。1918 年 11 月 13 日该和约被苏俄政府废止。

③ 见第 283 号文件。

④ 这里指的是 1930 年 8 月 14 日中共中央关于对目前时局的宣言（见《红旗日报》，1930 年 8 月 15 日，上海；《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6 册，第 250—265 页）。

⑤ 周报，1930 年 8 月至 1931 年 3 月在上海出版。

了。如果撤消宣言，那么《红旗日报》的出版就会耽搁一天。所以我们希望，你们能理解与此事有关的种种难处。

中共中央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579，第 133—134 页。

英文打字稿，副本。

285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共产国际执行 委员会远东局的电报

早于 1930 年 8 月 17 日^① 于莫斯科

这 1 万美元是用来办中国的（合法的或半合法的）报纸的。

这家报纸的开支应该通过远东局^②，而决不能绕过它。

远东局应告知我们是否收到这笔款项，并将这笔款项的支出报表寄来。

全宗 495，目录 19，卷宗 117，第 23 页。

打字稿，副本。

① 日期是根据文件上的批注“已阅。邵（H. A. 雷利斯基）8月17—30”确定的。

② 指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

286

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执行委
员会主席团的电报

1930 年 8 月 17 日于上海

致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

值此中国革命处于现时危机的局势下，完全有必要建立一座无线电台，以便及时获得你们的指示。为此我们需要 1 万（墨西哥元）。请拨给这笔款项并尽快答复我们的要求。如果你们能在德国购买一部无线电台并把它运到这里来，那就最好不过了。请电复。

中共中央 松^①

全宗 495，目录 19，卷宗 237，第 12 页。

英文手写稿。

① 原文如此。何人不详。

287

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执行委 员会主席团的电报

1930年8月17日于上海

在革命形势迅速发展的条件下，中央极需更有效地领导地方的工作。由于敌人在密切地监视我们，我们很难利用他们的通讯手段来转发指示。因此，我们需要建立一座能为全中国工作的无线电台。为此我们需要10万^①（墨西哥元）。请满足我们的请求并尽快寄款来。

中共中央 松^②

全宗495，目录19，卷宗237，第12页。

英文手写稿。

① 原文如此。在第286号文件上为1万（墨西哥元）。

② 原文如此。何人不详。

288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 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

1930 年 8 月 17 日于上海

秘密

致政治局

亲爱的同志们：

我们这里还没有你们关于如何对待帝国主义者的策略问题的文件^① 译本，但是在与向忠发同志的谈话过程中产生一种印象，你们没有正确地理解共产国际的电报^②。为了使你们正确地理解该电报中文译稿的内容，我们想简要地谈一谈关于策略问题以及这些问题在电报中是如何表述的。我们一收到文件的译稿，就建议你们同政治局^③ 进行比较认真的讨论。现简要地重复一下该电报的内容：1. 苏维埃应该向广大公众说明，只有中国革命的胜利和反革命的被镇压才能保障中国的独立。2. 必须动员一切国内的和国际的力量去同帝国主义者的武装干涉作斗争。3. 凡我们有苏维埃政府的地方，苏维埃在与帝国主义作斗争的实际活动中，主要的问题应该是力量对比问题，苏维埃在与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应采取不同的策略。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可以利用帝国主义者之间的矛盾。4. 为了赢得时间吸引更广泛的群众，为了通过扩建红军等来巩固业已占领的阵地，为

① 见第 283、284 号文件。

② 见第 275 号文件。

③ 原文如此。似应为：远东局——译者。

了夺取新的阵地并吸引千百万群众参加斗争，向帝国主义者作出某些让步并与其进行某些谈判是适宜的。例如，在帝国主义列强的军舰和军队撤走的情况下，可以在债务、外国租界、关税方面向其作出让步。5. 可以向外国人许诺提供居住权和在外国企业中工作的机会，条件是他们遵守苏维埃法律，实行八小时工作日制，建立工人苏维埃，等等。6. 完全有可能，在现有力量对比情况下，我们不能在租界立即实行这些措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提出一些要求，我们要在租界内组织最广泛的群众性行动来支持这些要求。7. 即便由于业已形成的局势和力量对比，我们要向帝国主义者作出一定的妥协，但我们一分一秒也不应忘记，与帝国主义者保持长期的和平是不可能的。

同志们：十分明显，电报决不会改变我们同帝国主义者作斗争的方针。相反，它号召我们加强反对帝国主义的运动。关于帝国主义者将同我们进行你死我活斗争的任何理论上的讨论，无疑并非没有益处，特别是在我们可能对帝国主义者采取妥协策略的时候。它之所以需要，是因为它可以把任何模糊的认识、把关于与帝国主义者似乎可以保持比较长久和平的些许幻想消灭在萌芽状态。但是这种讨论与电报无关，因为无论同政治局的同志，还是同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某些其他同志，都不需要讨论这种起码的常识。

该电报所谈到的是列举的一些巧妙灵活的手段，借助于这些手段可以防止帝国主义者对我们苏维埃阵地立即采取行动。例如：

长沙在我们手里。那里我们有苏维埃政府。这个政府立刻面临着制订对付帝国主义者的政策问题。由于那里的港口有外国的企业、领事馆和军舰，长沙的苏维埃政府就得十分清醒地考虑，对这些企业怎么办，如何对待外国人，如何对待领事馆和这些可恶的军舰？我们要建设自己的红军，等等，但是就不需要防止帝国主义者立即对我们长沙的阵地采取行动吗？或者说在失利的情况下采取一些策略措施，更有力更明确地向全世界揭露帝国主义的政策，并迅速动员

群众来反对武装干涉。

请问你们，采用电报所建议的这种策略是否可行，是否有益呢？如果例如长沙或武汉的苏维埃政府宣布：“我们允许你们的人留在这里，允许他们在工厂里工作，条件是：你们要承认苏维埃的法律，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不妨碍产业苏维埃、赤色工会等组织的建立，不组织武装干涉并撤走你们的军舰”，那么帝国主义者实行武装干涉并向本国的广大群众说明理由是更容易还是更困难呢？即使他们以开枪射击来作回答，无论在中国大众面前还是在世界无产阶级面前，舆论优势也都将在我们一边。

因为我们一刻也没有停止反对帝国主义者的斗争，所以一刻也没有削弱这种斗争。我们正在建设我们的红军，我们正在夺取一个又一个的据点，我们正在带领千百万民众去进行斗争，我们正在组织租界内外新的群众运动。根据力量对比情况，我们将联合全世界的工人阶级加强我们反对帝国主义者的军事和政治措施。我们反对帝国主义者斗争的纲领并没有改变。这些策略手段并不意味着削弱这个纲领。它们是为实现这个纲领而赢得空间和时间的一种尝试、一种手段。另举一个例子：

在“Trans-Pacific”^①这个英日军国主义杂志 8 月 7 日的一期上，展开了一场有明确目的的宣传运动，支持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共产党人进行武装干涉。当然，英国和日本帝国主义者也明白，这样的武装干涉是很不简单的事情。首先是考虑到这两个国家的公众可能有负面的反响。其次是考虑到国际帝国主义之间存在着矛盾。日本帝国主义十分清楚，它的任何擅自干涉行动都会立即引起美国对日本企图在中国占领新的领地的怀疑，所以日本帝国主义试图为其干涉意图提出理由。它是怎么做的呢？该杂志写道：“十分明显，在现时条件下，不可能同共产党人进行任何谈判。他们在长沙的行动

^① 《太平洋彼岸》周刊，1919 至 1940 年在东京出版。

清楚地表明，这是一群匪帮，任何论据对他们都不会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政府能继续奉行不干涉的政策吗？”

我们援引这段文字并不是为了作出关于同日本帝国主义进行妥协的某些实际结论。但是也不能否定，借助于一些具体情况所要求提出的某些步骤，至少可以使帝国主义者难于为它们的进攻做“道义上的”准备，而有时也可以加深国际间的分歧。

自然，全世界的帝国主义者和国民党都是革命的死敌，它们必将进行殊死的搏斗，我们的政策是与它们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对此任何人都不抱有幻想。但是这并不会改变这样一点：在我们不能进行这种斗争的地方，我们应该尝试采取在共产国际电报中所谈到的某些灵活策略。

自然，当我们试图采取机动灵活的策略的时候，党和群众应该理解，而我们也应该向他们说明在具体的形势下所采取的每一个行动，这是十分明显的，也是绝对必要的。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远东〕局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579，第 141—145 页。

德文打字稿，副本，无签字。

289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成员 与中华全国总工会代表 谈话记录

1930 年 8 月 18 日于上海

秘密

远东局与中华全国总工 会代表谈话记录

1. 问：在什么情况下中断了法租界电车工人的罢工^①？几天前顺利举行的市政工人代表会议曾决定宣布举行的计划中的声援大罢工现在情况怎样？我们的同志如何评价电车工人罢工的结果，是成功还是失败？罢工终止后，我们现在对电车工人有何影响？我们的红色电车工人工会现在发展情况如何？它是否扩大了？总的说来，它是否在发挥作用？

余^②：我们为扩大电车工人罢工规模所进行的宣传过于抽象。我们市政工人代表会议决定扩大斗争和在反对国民党和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下组织声援罢工。但是过了几天电车工人的罢工就结束了。有六名电车工人，其中两名是我们的同志，参加了谈判。我们提出了三项主要要求：（1）释放被捕工人；（2）提高工资和支付罢工期间的工资；（3）不准对罢工工人进行任何迫害。结果前两项要求得到了满足，而第三项要求遭拒绝，并且有 44 名最积极的斗士被解雇。

① 见第 274 页注①。

② 可能是余飞。

其中 20 人加入了失业者组织。在被解雇的人员中还有胡阿梅（过去是党员，在这次罢工中成了国民党的工具）。我们对群众说，胡阿梅反正很快会被国民党和企业主安置工作的。44 名被解雇的工人是罢工期间最积极的分子；其中有胡阿梅的不少支持者。在最近一次电车工人群众大会上我们选出了所谓的谈判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五名成员中有四名是我们的同志。我们认为罢工的结局是胜利了。我们同志中有几位认为是失败了。这是不对的。认为罢工完全结束了，这也是错误的。工人们现在知道，只有红色工会在保护他们的利益，这一事实对于我们来说是积极的结果。我们想带领电车工人继续进行斗争，毫无疑问，这场斗争一定会在下列口号下爆发：（1）抚恤在与警察搏斗中受伤的工人，（2）取消外国租界，（3）恢复被解雇工人的工作，（4）赶走国民党的代理人，（5）赶走企业中的俄国白卫分子。

除了 44 名工人被解雇外，还有近 80 名工人被不定期地辞退了。所以，我们要求恢复这 80 名工人工作。为了实现这些要求，我们在组织怠工。明天要举行工人的群众集会，在集会上我们将讨论罢工的教训并揭露国民党和黄色工会。已经决定：我们的同志将提出工会职员的新名单并通过这种办法努力把黄色工会变成红色工会。同志们对这个问题的意见是有分歧的。余同志不完全同意这种把黄色工会变成红色工会的策略（但是他不想在行动委员会和党内谈论分歧）。他接着补充说，现在在罢工之后，我们在电车工人当中有 22 名党员。在这 22 名党员中只有 3 名是以前的党员；以前的 20 名党员中有 17 名转到了黄色工会一边。

2. 关于租界内的电车工人。在这里我们有 40 名党员和 70 名红色工会会员。由于我们一些同志的错误策略，在这里我们对群众的影响还很薄弱。我们的同志总是提出同一种口号：“痛打反动派的走狗！”他们不善于动员群众。由于间谍很多，我们的同志不能召开支部大会。租界内电车工人有计划的斗争还没有准备好。昨天我们的

同志召开了支部大会，来参加大会的有 20 名党员。我们散发了指示，建议根据以下三项要求去动员群众：(1) 这些企业应该支付最近一次罢工期间工人的工资，因为企业主曾经答应这样做，如果其他类似的企业这样做的话，(2) 接收当时被逮捕并在关押 4 个月后刚刚释放出来的工人，(3) 为工人发放秋季工作服。

然后余同志说：“不过，正如一些同志对我们所说的，工人们不想罢工，他们只想进行武装暴动。当然，这是一种不坏的情绪，但是我们首先应该通过罢工运动和群众运动来做好准备，特别是在长沙的试验之后。我们应该带领群众前进，而不应充当群众运动的尾巴。我们应该通过广泛的群众运动打好基础。”

余接着指出，他在关于总罢工和其他一些问题上与中央行动委员会中的一些同志有分歧，但是由于这些问题都是政治性的，而他受多数人决定的约束，他不想谈论这一点。

3. 在电话工人那里我们有一个由 14 名同志组成的优秀的支部。现在提出了发大米券的要求。但是取消派在这些工人当中仍有很大影响。

在艾迪生和其他一些电厂，直到现在我们还在执行一种错误的政策；我们只在领导人员中间做招募工作，企图把他们争取到我们方面来，而不是在群众中间做招募工作。我们应该纠正这个错误。在这个企业中罢工的形势正在成熟。

在市政工人当中，我们在近 20 个不同工业部门的企业中成立了一个市政工会。

4. 关于丝织业工人。如果李立三同志说，有 4.5 万丝厂工人在罢工，那是夸大了。一开始有 4000 人罢工，后来有 8000 人。从下面这个事实中可以看出我们在丝织业工人当中的阵地是何等的弱小：其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也无法确定究竟有多少工人在罢工。在这次罢工期间，女工们斗争得很勇敢。她们进行示威游行，从一个工厂走到另一个工厂，并且停止那里的工作。她们同警察进行搏斗，

有时甚至解除了警察的武装。有两名女工受了伤，一名因伤势过重而死亡；有30多名女工被捕。

我们的同志至今都不了解所有这些事实。多数工人已回来工作。有6个工厂里还在罢工。看来，我们的同志由于对白色恐怖的恐惧，从一个工厂转到另一个工厂，也不做工作。因此，工人们无法找到领导。工人们找不到红色工会委员会。多数罢工工人不知道他们为什么罢工。罢工要求没有传达到他们那里。只有离开企业的部分工人在游行示威时听到了我们同志提出的一些要求和口号（“反对黄色工会，反对合理化，反对解雇，拥护发放大米券等等”）。一开始只提出6项或7项要求，后来要求的数目增加到15项，但是群众不知道这个情况。警察的恐怖活动增加了在丝织业女工中做工作的难度。主要街道都被堵塞，谁都无法通过。余同志本人也无法与丝织业工人工会取得联系。在一家工厂，工人们回来后捣毁了机器，有一家工厂，一名工人领导者（不是党员）无法找到我们，于是就主动地组织了一个由10人组成的小组准备罢工。我们已决定成立罢工委员会和召开群众大会。中华全国总工会给我们的同志发来了指示。根据该指示应该在丝织厂里成立我们的组织并广泛宣传我们的要求。但是余同志说，他本人还没有得到可靠消息，因为他没有参加江苏省行动委员会的工作。

5. 关于纺织工人

昨天举行了纺织工人代表会议。有40名代表代表18个企业。上海工会联合会^①在这次代表会议上作了报告。提到议事日程上的问题是关于成立红色工会、支持丝厂工人罢工和日本纱厂罢工问题。至于说最近的一次罢工，那里现在还有3000多人在罢工，但我们没有领导罢工，因为我们成立的罢工委员会不起作用，基本上是一个没有生命力的机构。这个工厂的罢工正面临着被国民党和黄色工会出

^① 指原上海总工会。

卖的危险，因为，据他了解，黄色工会的头头们正在进行关于为中断罢工他们将获得一大笔钱的谈判。他们要求 2000 美元。纺织工人代表会议决定于 8 月 21 日成立红色工会。

余同志在回答迄今为止我们在纱厂是否有红色工会问题时说：“没有，只有一个所谓的筹备委员会，共有 30 名工人。”

6. 余同志接着说，现在正在筹备成立以下工会：码头工人工会、丝厂工人工会、烟草业工人工会、运输工人工会、印刷工人工会、家庭服务人员工会，等等。

关于这个问题，余同志谈到，他有这样一种印象：虽然我们的组织在扩大，但是我们还没有充分地集中我们在群众中的力量。其次，上海总工会与工厂及基层组织之间的联系也不好。

自从成立将一切职能都集中在自己手里的江苏省行动委员会以来，与基层组织及企业的联系也差多了。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现在赤色工会并不比党的产业委员会多，它们已经丧失了任何自主性。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余说：“我回来后，批评了这种情况，可是当时许多同志骂我是右倾机会主义者。当然，如果认为我们可以把某个企业的所有工人都组织起来，那是幻想，但是我们应该努力把一部分工人，把数百名工人组织起来，那时我们就能很好地进行工作。”

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机关刊物《劳动》^① 曾经每三天出一期，现在似乎由于找不到能胜任这项工作的合适同志而不再出版了。取代这个刊物现在打算出版一个每月出三期的机关刊物，名为《红色工会》。已请求中央派一名编辑和其他力量供中华全国总工会调配。

曾计划在最近的将来召开的中华全国总工会全会被党推迟到 1931 年 1 月。理由是，在目前，工作要求集中一切力量，现在不是召开工会全会的时候。计划中的铁路员工代表会议和海员代表会议

^① 指《劳动报》（见第 288 页注②）。

也同样未能召开。

7. 问：目前是否存在中华全国总工会和上海工会联合会？它们怎样发挥作用？现在在做什么工作？

余同志回答说：“我本人有这样一种印象，中华全国总工会已成为一个僵死的机关。包括我本人在内，中华全国总工会执委会只有我们三个同志在进行积极的工作。上海工会联合会的情况也同样如此。但是上海工会联合会执委会还在发挥作用，并且每周组织群众集会。”余说，他建议中华全国总工会执委会所有三名委员都能像他本人那样做群众工作。他本人在与工厂工人建立直接联系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成绩。

在回答工会机关的这种消极性从何而来时，余说，自从成立所谓的行动委员会时起，一切职能都集中在它的手中；因此工会机关的组织联系和工作几乎都停止了。现在只存在着党的组织系统，而没有工会系统。

余同志建议中央批准他在江苏省行动委员会里工作。

他请我们与〔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关于中华全国总工会的问题。他说，中央委员会本身就曾经表示过关于工会保持独立活动必要性的意见。他确信，所谓的行动委员会不能取代工会，但是党对此回答说，行动委员会在组织和领导所有群众运动。余请求，在下一次同他谈话时能有一名政治局委员在场，并让我们向政治局说明这一点，因为我们必然要涉及政治问题，而不经政治局同意，他是不能讨论政治问题的……^① 他还请求我们：一开始能与政治局讨论组织问题，因为他本人受纪律和多数人决定的约束不能同我们谈论政治问题。

在持续很长时间的这次会议结束前，余向我们提出下面这样一个问题：在俄国革命中工会也放弃了自己的独立性，这是真的吗？

① 此处和以下的删节号是原有的。

(由于超过了时间,决定在下一次会议上再讨论所涉及到的所有问题。余再一次请求首先与政治局讨论问题……)

全宗 514, 目录 1, 卷宗 578, 第 23—26 页。

德文打字稿, 副本。

290

米夫给琼森^① 的信

1930年8月22日^② 于上海^③

亲爱的琼森先生：

我很感谢您的来信^④。我的科研工作有一点点进展。李立三博士6月11日的信^⑤刚刚转给我，我应该承认，它给我留下了抑郁不欢的印象。其论据是很有激情的，但没有说服力。我不能想像，他有什么理由如此急躁。假如他能冷静地对待事情，那么他就会明白，在我们最近写给他的信^⑥中所说的一切是完全正确的。在这一点上我的朋友们都同意我的看法。我认为，在我们写给李立三博士那封信之后，他所采取的一些重大举措，加重了他的错误。他的来信令我如此焦急不安，以致我再也写不出什么东西来，我很高兴，从您的来信判断，您好像同意我的意见。我劝您在转入新的工作之前认真

① 根据博古（秦邦宪）1930年7月20寄往莫斯科的信判断（见全宗514，目录1，卷宗577，第30—31页），琼森（琼森·王）起了收发米夫给陈绍禹、秦邦宪及其他信件的“信箱”作用。

② 在此信的俄文稿上有凡·I·沃尔克的手写批注：米夫同志于1930年8月22日通过邮局将此信的英文本寄往上海（见全宗514，目录1，卷宗566，第79页）。

③ 看来，这里说的是1930年6月26日的信（见第246号文件）。

④ 指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议《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第115—135页）。

⑤ 可能是指1930年7月23日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共中央的电报（见第255号文件）。

地对此作好准备。

得知您的小弟弟伊维^① 生病的消息，我很悲痛，希望他尽快康复。向您的妻子及孩子们致以衷心的问候。

您的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577，第 51a 页。

英文打字稿，副本。

① 原文如此。何人不详。

291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
第5号（特字第×号^①）记录
(摘录)

1930年8月25日于莫斯科

12. ——关于中国问题。（报告人：米夫、皮亚特尼茨基、莫洛托夫、曼努伊尔斯基、库西宁同志）。

(1) 原则上通过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国共产党中央的电报草稿。

(2) 责成由莫洛托夫、皮亚特尼茨基、曼努伊尔斯基和库西宁同志组成的委员会最后审定电报稿。

抄送：莫洛托夫、皮亚特尼茨基、曼努伊尔斯基、库西宁同志。

中央书记 莫洛托夫

政治局会议第5号记录

决定：12 附录^② 绝密

致中共中央

李立三同志根本不想尊重事实，在苏维埃地区还没有真正的苏

① 号码没有标明。

② 电报于1930年8月28日发出（见全宗514，目录1，卷宗569，第231页）。

维埃政府，还没有真正的红军，而在中国其它地方还没有工业中心城市无产阶级的群众性发动，在农村还没有千百万群众的强烈骚动。所有这一切只有在共产党实行正确政策的情况下才会出现，但是现在还没有出现。然而，帝国主义者目前光是在汉口一个地方就有相当于10个师的兵力，在上海也不少。

在这种情况下还没有占领大城市的重大机会。现在号召工人在汉口、上海、北京、奉天等大城市举行武装暴动（就像李立三所希望的那样）是最有害的冒险主义。

我们一再建议政治局坚决放弃这样的计划。必须一天也不迟疑地集中一切力量去组建坚强的、装备精良的、清除了富农分子的和真正置于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并在业已占领的地区为它建立哪怕一两个真正牢固的据点，而不要热衷于试图立即扩大苏维埃根据地。在我们的指示中早已指出，红军的组建不可能和平地进行，而只能在战斗过程中进行；但这完全不同于现在明显力所不及的强行占领国内设防坚固的中心城市。现在我们在切实准备全国暴动这方面的任务是要依靠真正的红军，至少在一个生活有保障的地区建立和巩固中国的苏维埃政府，而这个政府能够以其旨在保护工农利益的革命纲领和实际措施来动员农村和工业中心的群众去同反革命的国民党和帝国主义进行胜利的斗争。

不要在上海、汉口等地进行冒险主义的盲动，而必须立即动员全党和所有革命工人在以下方面开展强有力的工作：瓦解军阀军队，阻止其部队的调动和装备的调运；首先组织无产阶级群众性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罢工、示威游行等，同时在非苏维埃地区的广大工农群众中广泛宣传苏维埃政府、它的纲领和它的实际措施。

硬说工人只想进行武装暴动而不想做任何别的事情，这只不过是对自己消极性、对自己不善于围绕工人群众的日常利益和需要去动员他们进行斗争和不善于把这种斗争与中国革命任务结合起来

的一种“左”的虚伪的掩饰。目前在共产党领导下，在一些大的工业城市开展和组织经济斗争和举行罢工运动是对苏区最重要的和直接的支持，并且是为即将到来的同地主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势力的革命决战取得成功做真正的准备，然而，像攻占一些政府机关这样过早的革命行动，不会给革命带来一点儿好处。对当前时局要求的不理解也表现在苏维埃政府纲领中的一些超前的社会主义措施上和关于类似集体农庄、国营农场等等土地问题的一些错误建议上。延缓与帝国主义者的决战现在对苏维埃政府是有利的，并能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这个政府的随机应变能力。

共产国际执委会认为，以前同中共中央代表团完全一致制定的所有决议和指示仍然有效。李立三同志务必尽快到这里来。

共产国际执委会赞同其代表团^①的行动并坚决要求立即恢复党、工会和共青团的正常领导机构。将此电报和七月提纲^②以及共产国际执委会电报^③的内容传达到全体中央委员和区委会。

共产国际执委会

全宗 17，目录 162，卷宗 9，第 14—15、17—19 页。

打字稿，记录为原件，签字为真迹复制，附录为副本。

① 指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

② 见第 231 页注②。

③ 可能指 1930 年 7 月 23 日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共中央的电报（见第 255 号文件）。

292

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主席团的信^①

1930年8月25日于上海

秘密

致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

政治局详细讨论了不久前回来的伍豪^②同志所作的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定^③的报告，一致表示同意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指示并指出近两年来，特别是近半年来，中央确实是完全按照共产国际执委会的路线进行工作的，在政治路线上中央与共产国际的路线没有任何分歧。政治局在听取伍豪同志的报告和解释后，完全同意共产国际对以下问题的意见：对待帝国主义者的策略问题、武汉和南京的武装暴动问题、苏维埃运动的根据地问题、向大工业中心运动问题和苏维埃地区代表会议问题。由于没有正确解释共产国际执委会的电报^④，以前在这些问题上所存在的分歧，现在已不复存在了。政治局通过决议，要坚定不移地贯彻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一切指示，并要同一切企图把政治局或政治局某个委员的政治观点与共产国际路线对立起来的行为进行坚决的斗争。等斯特拉霍夫^⑤到达

① 文件于1930年11月6日送斯大林。

② 周恩来。1930年8月19日从莫斯科回到上海。

③ 指《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见第231页注②）。

④ 看来是指第240号或第250号文件。

⑤ 瞿秋白。1930年8月26日从莫斯科回到上海。

后和收到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决议后，中央将起草关于遵循共产国际一切指示的决议并寄给共产国际执委会，还要将它发给所有基层党组织进行讨论。由于在这段时间里需要解决当前所有的政治问题，政治局请求共产国际执委会允许李立三同志不去莫斯科。同样鉴于目前时局的特别重要性，政治局不能派出一些同志，特别是李立三同志，按照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指示^①，他们应该前往苏区和红军中进行领导工作。

中共中央 向忠发

① 文件没有找到。

293

中共中央政治局给共产国际执行 委员会的电报^①

1930 年 8 月 27 日—28 日于上海

在听取了莫斯克文^② 的报告并进行讨论后，政治局同意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决议。在政治路线上中央与共产国际执委会没有任何分歧。根据莫斯克文所作的关于军事暴动、帝国主义者、武昌和南京暴动、苏维埃根据地以及苏维埃代表大会^③ 等问题的报告，中央完全同意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意见。

由于现在可以在这里解决一切政治问题，我们请求不要把李立三召到莫斯科^④。每一位政治局委员现在在苏区和红军中都是非常需要的。

全宗 495，目录 19，卷宗 242，第 80 页。

打字稿，副本。

① 电报副本于 8 月 30 日送 B. M. 莫洛托夫。

② 周恩来。

③ 原文如此。指计划召开的苏区代表大会。

④ 见第 291 号文件。

294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 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

1930年8月29日于上海

关于士兵暴动问题 致政治局

亲爱的同志们：

现将以下关于士兵暴动问题的若干建议方案寄给你们，此方案曾在我们局里讨论过并在我们最近一次联席会议上与你们一起讨论过。这只是一个草案，只有在经过政治局讨论并考虑到你们的修改意见之后才能通过。

* * *

在各军阀部队的士兵群众中，革命运动在迅速发展，表现为在各部队的士兵中频繁发生哗变，在这种情况下，党应该遵循以下想法行事。

1. 军阀部队士兵中的任何不满情绪，每一种反抗和暴动情绪，都应该由党组织去加以组织和指导，目的在于使士兵运动与广大群众结合起来，不使哗变部队有可能落到其他军阀集团或匪徒的影响之下。
2. 党在士兵群众中提出的主要组织性和指导性口号是：（1）离开前线；（2）携带武器加入工农红军；（3）士兵的行动要与城市无产阶级和城郊贫苦农民的群众运动保持最密切的联系和协调行动（在这里我们不重复党提出的所有口号，如发放军饷等等，等等）。

3. 应尽可能巩固和扩大部队中的现有党组织，尽可能建立新的严格保密的党组织，去组织和领导士兵运动。认为因有很大危险和白色恐怖而党组织在军队中似乎不可能长期存在和进行活动的观点是不正确的，应该与其进行斗争。不言而喻，在我们的组织已经暴露和同情我们的部队有被解除武装的危险的地方（就像在武汉和南京所发生的那样），也不应消极地等待被消灭，而应该努力组织有关部队的士兵携带武器集体逃走。

4. 要努力领导任何自发的士兵风潮。当发生士兵暴动的时候不应该只是因为我们不是总有足够的力量把这种暴动同广大群众的行动结合起来就消极地袖手旁观。我们的任务是，根据力量对比和业已形成的局势，通过对士兵的认真组织，有计划地确定暴动的开始时间。但同时党组织必须预先防止那种冒险主义的没有做好充分准备和脱离工农群众的士兵暴动，这种暴动几乎总是导致我们士兵中最积极的革命分子从肉体上被消灭。

5. 特别是在那些离红军驻地不远和周围存在多少已经组织起来的游击队和农民运动的地方，我们在军阀部队中的任务是很明确的，那就是组织和领导士兵暴动，密切协调他们与工农运动的关系，号召士兵携带武器集体转到红军方面，等等。在这种情况下有两种可能：(1) 在士兵暴动成功和扩大的情况下，暴动者应该从肉体上消灭所有军官以及国民党和军阀的代理人。如果能夺取和守住城市，那就必须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和工农组织的最积极参与下成立革委会(革命委员会)。经验表明，有关的城市常常不能控制在我们的手里，面对敌人的优势兵力往往不得不很快撤退，完全有必要考虑使党和群众组织的机构转入地下，建立地下革委会，以便在被迫将城市交给反动派的情况下，我们的组织不会被消灭，工作还可以继续进行。在我们控制有关城市的时候，曾完全公开地支持我们的那些最积极的无产阶级革命分子，应和撤退的军队一起撤走。这样我们不仅可_以防止最积极的分子被从肉体上消灭，而且同时能够通过让这些积

极分子加入部队的办法以较快的速度把这样的军队变成真正的红军。

6. 在许多军营里，有上千的伤兵，他们将被重新派往前线，在这样的军营里我们要号召他们不上前线和集体逃走。集体逃走和携带武器加入红军的口号，当然在驻扎有军阀部队的地方和他们开往前线或去反对红军的地方是有作用的。他们是在驻地举行暴动和手执武器进行自卫，还是只有他们离开城市的时候举行暴动，因为在行军路上或许有更多的机会逃走和加入红军，这取决于力量的对比和具体的形势。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579，第 159—160 页。

德文打字稿，副本。

295**马马耶夫给马季亚尔的信**

1930年8月31日于莫斯科

绝密

**致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
马季亚尔同志**

今年7月15日我曾给别尔津同志送去以下报告，现奉命将其内容通报给您。

“1930年7月14日我被苏同志^①召去审查关于军事问题的决议^②的中文译稿是否正确，该决议将由〔工农红军参谋部〕第四局呈送共产国际执委会。我在与苏同志的谈话中发现，中共对两个具有重大原则性意义的问题不够清楚。这两个问题是：

1. 据苏同志说，中共六大^③以来，所有党的文件在论述中国军队时都去掉了“流氓阶级”（流氓无产阶级）这个术语。用“破产的农民”来取代。这样做的理由是，用“破产的农民”这个术语来称呼军阀部队的士兵，党就可以更容易在士兵中进行宣传鼓动工作，吸引他们到自己这边来。我想，对军阀部队不正确的阶级定性将会在党内引起一系列严重错误。在我们呈送的关于军事建设的决议草案中已经指出，红军的多数军团就其成分来说都是由士兵组成，那里

① 周恩来。

② 见第260号文件。

③ 中共六大于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莫斯科州纳罗法明地区五一村举行。

没有农民，这就有夸大军事因素的危险，有靠士兵的力量去为农民实行土地革命的危险。这一事实就连中国的同志也不否认。而这种危险来自对军阀部队阶级性质的不正确解释。如果他们是农民出身，而不是流氓无产阶级，那么可能就没有理由为红军的成分而感到担心，靠士兵补充的红军也就会成为农民的军队。

应该提请中共注意这种不正确的解释。中国的军队是处在这样一个国度里：在农村封建农奴关系居统治地位，整个国家被商业高利贷资本控制，一些军阀集团各据一方，使国家四分五裂，有一支从农业过剩人口中吸取有生力量的雇佣军，这样的军队不可能是别的，只能是雇佣的、流氓无产阶级的军队。

的确，近一两年来，中国的军阀特别注意补充兵员的问题，不断地招募“新鲜的”农民。蒋介石、张学良等人的一些部队，确实可以称之为农民军队。但这是一个策略问题，是确定在某个部队中的工作方法问题，而不是对作为雇佣的、流氓无产阶级的军队的中国军队的阶级定性问题。

2. 在我们呈送的关于军事建设的决议中，特别突出地提出了关于建立根据地的问题。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中国同志们是理解的也是承认的。

但是，据苏同志说，中共〔中央〕政治局不接受这个方针。政治局把建立根据地看作是把革命限制在固定的地区和不让革命运动向根据地以外发展。从这一点出发，从扩大革命运动地域的愿望出发，据苏同志说，政治局把一些军，特别是第3、4和5军（在赣南）调来调去，未在任何地方巩固胜利成果，未在任何地方给农民提供发挥积极性的机会。拒绝建立根据地，以不断调动军队的方针取代建立根据地的方针，以致占领一个地点后又放弃这个地点——所有这一切将导致放弃对革命运动的集中领导的巨大危险，放弃无产阶级夺取革命运动领导权的危险。应该向中共指出，建立根据地的问题不仅不排除扩大根据地的必要性，而且是扩大根据地的必要

前提。应该告诉中共，只有占领具有足够社会经济前提的根据地，才能保证党对农民运动的领导，才能保证无产阶级对运动的领导，才能保证进行土地革命的地域范围的扩大。

我认为，向共产国际执委会通报这个情况是适宜的。毫无疑问，在苏同志对这些问题的阐述中以及在我的阐述中，问题已尖锐地提出来了，但是政治局内部在这些问题上的摇摆就已经隐藏了很大的危险，应该加以预防。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马马耶夫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577，第 52—54 页。

打字稿，原件，亲笔签字。

296

陈绍禹^① 给米夫的信^②

1930年8月31日于上海

我敬爱的屈珀^③：

前几封信大概已经收到，现在公司^④的情况是这样的：开除伊万^⑤等人在目前既不合适也没有好处，因为，一方面，一些事实已经完全证明了路线的破产，另一方面，基层组织和一部分干部的愤怒情绪太明显了。不过，伊万等人已被派往各地：马克松^⑥被派往北方，科穆松^⑦被派往南方，伊万和博古涅尔^⑧留在上海无事可做。反巴黎的气氛^⑨传播得很广。现在不仅在政治上已明显地暴露出反巴黎的路线，而在组织问题上也完全不按照巴黎的方式行事。对伊万等人的攻击是同对屈珀同志以及一般巴黎人，特别是最高领导机构^⑩的攻击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① 作者是根据信的笔迹和风格特点确定的。

② 这封信是用普通邮件寄送的，使用的是暗语。

③ 米夫。

④ 党。

⑤ 陈绍禹。

⑥ 何子述。

⑦ 王稼祥。

⑧ 秦邦宪。

⑨ 反莫斯科的情绪。

⑩ 共产国际执委会。

可能在公司内部很快就会爆发严重的斗争。特别是在余[飞]^①（前不久从巴黎回来）向其他人讲述了老板决定不公布巴黎总公司^②的决议和电报之后。工作人员和职员的愤怒情绪很强烈。

我希望巴黎公司尽快采取果断措施，不仅在政治问题上，而且必须在组织问题上整顿和健全公司的局面，因为这样做比让斗争发展到极点对公司更有利。我请求并希望巴黎公司能寄来这样一封详细的信，在信中指出一切基本问题，从经济问题开始到转变问题为止，特别是关于对时局和策略路线的评价问题，否则，老板就会这样来作解释：在他和巴黎之间不存在任何原则性的分歧，而只是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一些具体的缺点。在莫斯科文^③从巴黎回来后老板已经决定这样做了。我认为，这样做很不合适，因为这会掩饰事情的实质并会交回^④关于巴黎和他之间路线分歧的真实观念，而最终情况实际上依然如故，有些变化也只是纸面上的。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公司肯定不会健全起来。

斗争日益激烈。伊万等人不仅仍面临着被开除而且还面临着对其采取其他措施的威胁。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个人并不太重要，就让个人的命运和生命在这种斗争中牺牲吧。但事业是千百万人的。生命是短暂的，事业是永恒的！

我请求尽快解决这一切。再见吧！希望能收到您的信，哪怕只有两句话。

紧紧握手

你的^⑤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577，第 70—71 页。

俄文手写稿。

① 余飞于 1930 年 7 月 19 日抵达上海。

② 共产国际。

③ 周恩来，1930 年 8 月 19 日抵达上海。

④ 原文如此。从意思看，应为“抛弃、歪曲”。

⑤ 签字辨认不清。

297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 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

1930年9月2日于上海

关于重新攻占长沙^① 的问题

目前，无论政治局还是我们都没有关于红军的直接消息。反动的报刊报道说，好像有近2万人的红军正在逼近长沙。国民党和帝国主义者在向长沙派遣增援部队。长沙的部分军队似乎军心已经完全涣散。

最近的经验表明，未必任何一个决定都能及时传达到红军那里和都将具有实际意义。因此，除了作决定外，关于通过负责同志尽快地传达该决定的组织技术问题也是非常重要的。

重新攻占长沙并把它作为我们苏维埃根据地的重要中心来坚守，这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

但是，如果在目前形势下，我们明白我们只能短时间地占领长沙并且以重大牺牲为代价，那么我们就应该放弃重新攻占长沙的打算，因为攻占长沙的目的应该是把它变成我们苏维埃根据地的中心。

如果今天缺乏这样做的前提，那就应该利用延期的时间去组织毗邻地区，更广泛地开展农民运动以及其他群众运动，整编红军，建立能保证军事和政治行动统一的坚强领导。我们还应该考虑到，再过两个月由于水位下降，帝国主义列强的军舰就不能再在长沙附近

^① 1930年7月29日红军的一些部队攻占了长沙并坚守了10天。

停泊。

政治局向长沙派出一名政治局委员的决定是正确的。向红军部队下达指示，在武汉和南昌附近实行诱敌性的机动策略，但不进攻这两个城市，以及采取旨在沿汉口——南昌铁路线开展强大的游击斗争的措施的决定，也是正确的。同时必须积极开展武汉、南昌、九江等地的群众运动，不搞暴动游戏。

既然完全有可能不受政治局任何决定的影响重新占领长沙，既然政治局不久就会面对既成事实，那就必须立即采取措施，以使红军部队在重新占领长沙时不再犯第一次占领长沙后所犯的错误。必须在长沙或离它不远的地方立即成立一个能在占领城市后马上在当地开展工作的负责的委员会。此后必须考虑到以下几点：在市内建立工人民警队伍，保证对城市实施军事警卫，以不至于再像上次那样弄得我们措手不及；组成强有力的政治领导，以便不被卷入反对帝国主义者的任何行动；苏维埃政府可以根据指示同帝国主义者进行谈判；动员在组织毗邻地区的广大人民群众。（我们在这里不再重复诸如成立苏维埃政府等等一些不言而喻的问题）。如果出现有被敌人优势兵力排挤的危险，那么我们就应该自己撤出城市。但是必须尽可能地守住城市。同时准备支援长沙的广泛运动（这里要特别注意铁路、船舰和士兵）。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579，第 41 页。

德文打字稿，副本。

298

中共中央政治局给共产国际 执行委员会的电报

不早于 1930 年 9 月 4 日^① 于上海

致莫〔斯科〕的电报

政治局在收到你们 9 月 4 日的电报^② 后，当天就决定召开第三次扩大中央全会^③，以便以进行公开的集体自我批评来纠正自己的错误；李〔立三〕也在为这一转折进行坚决的斗争。我们将在这个转折的基础上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特别要同那些反对中央及其路线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进行斗争。全会正在召开^④。共青团的独立组织已经开始恢复。也开始采取一些旨在加强红军和苏区领导的措施。关于更具体的任务还将作出一些特别的决定。

中国政治局

全宗 495，目录 19，卷宗 237，第 20 页。

手写稿。

① 日期是根据内容确定的。

② 文件没有找到。

③ 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于 1930 年 9 月 24 日至 28 日在上海举行。详见：《中国科学研究所通报》莫斯科 1931 年第 5—6 期（74—75），第 5—70 页；《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6 册，第 269—413 页。

④ 下面有一个词辨认不清。

299

雷利斯基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的电报^①

1930年9月12日于上海

绝密

使用密码

远东局发，答复第101号电^②。在事实的压力下李[立三]开始承认自己的错误。但是他这样做是采取了以下手腕：他把全党的责任都推到我们局和罗伯特^③身上。这种手腕以及他不久前的明确反共产国际的立场使他不可能继续留在政治局和中国，因为这会给纠正所犯的错误和执行决议造成极大困难。我们坚持要求政治局把他召到莫斯科来。请用相应的回电给予支持。绍^④。第99和100号。

准确无误：

全宗514，目录1，卷宗577，第74页。

打字稿，经过核对的副本。

① 瓦西里耶夫于1930年9月14日将该文件送给莫洛托夫时写道：“兹送上今天收到的远东局的一份电报。另告：昨天根据曼努伊尔斯基同志与您的谈话，我已给远东局发去电报，建议李立三立即动身。B. 瓦西里耶夫。”（见全宗514，目录1，卷宗577，第73页）。

② 文件没有找到。

③ Г. 埃斯勒。

④ И. А. 雷利斯基。

300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 周恩来和瞿秋白的信

1930年9月16日于上海

秘密

亲启

致莫斯科文和斯特朗^① 同志

亲爱的同志们：

昨天你们走后，我们局立即就着手讨论与你们即将召开的中央全会^② 有关的问题。

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我们认为还有必要对我们个人提出的那些总的政治意见再作如下补充：

1. 即将召开的这次全会打算在上次全会^③ 过去14个月之后举行。这14个月来，中国劳动群众和我们党走过了漫长的革命斗争道路。由我们领导的农民，从华南农村的一些自发性暴动转入了同帝国主义者和军阀进行的正规战争，这些军阀代表着整个中国的反革命势力。在中国反动派处于全面加剧的总危机背景下，我们党过去、现在和将来都面临着很重要的任务。中国经济政治结构的独特性、一些省份发展的不平衡性和与此相联系的革命浪潮发展的不平衡性，都要求我们党实行十分灵活的、符合实际的、明确的和始终是布尔

① 分别为周恩来和瞿秋白。

② 这里指中共六届三中全会（见第346页注③）。

③ 指中共六届二中全会（见第255页注②）。

什维克式的策略。尽管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我们党的领导总的说来完成了这些艰巨的任务，但是在最近6个月来作为你们领导机构政治首脑的李立三同志，对中国政治形势作出了错误的评价，他不仅十分坚定地、有步骤地使领导机构离开了正确的立场，而且甚至在没有遭到其他同志抵制的情况下将自己置于反对共产国际的立场上（8月1日和3日在政治局的讲话，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电报^①）

你们，即将召开的全会，除对形势作出评价和提出党目前的任务外，还应该研究这些错误，评估李立三同志所犯的这些错误对你们的工作产生了什么影响，这些错误在多大程度上妨碍了党的发展、党的活动和党的力量的增强，在多大程度上妨碍了党发挥其领导作用。这次会全是在代表大会之后的最高级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应该对党的一切缺点进行最严厉的布尔什维克式的批评。对李〔立三〕同志的错误。在全会的工作中应给予特别的位置。应该把李立三同志的错误同党的缺点分开。党不应对李〔立三〕同志的错误承担责任。只有这样你们才能从思想上克服李立三同志所犯的错误。那时你们才能与那些正在抬头的右倾机会主义倾向和派别相抗衡，这些倾向和派别想把李立三同志的错误归咎于全党，想把共产国际对李立三同志的批评变成对全党的批评。

为了使全会的工作很好地进行，为了使全党和李立三同志本人明白李〔立三〕同志错误的全部实质，为了制止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利用李立三同志的错误进行投机的倾向，全会应该保证：不掩饰李立三同志所犯的错误，全面说明他的错误，并让全党都知道他的错误。我们觉得，指定李立三同志在这次全会上作关于党的策略和任务的报告是不对的。作关于这些问题的报告的人应该是对李立三同志的错误不采取容忍态度的不久前刚从共产国际回来的同志^②。只

① 看来是指第273号文件。

② 指周恩来或瞿秋白。

有这位同志才能轻易地和正确地阐述共产国际在中国形势问题上和你们工作策略问题上的指导方针，只有这位同志才能彻底地揭露李立三同志的错误及其对党和对整个中国革命运动的危害。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托洛茨基分子和陈独秀分子在试图利用党与共产国际之间的虚假分歧进行投机时，才会受到布尔什维克式的反击。李立三同志不能做为报告人。他应该在报告人之后第一个发言。他发言的时间不应受到限制（但是不能超过一个报告人的时间）。李立三同志在发言中应该向全会和共产国际证明，他在多大程度上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和准备改正这些错误。

亲爱的同志们，这就是我们的深刻信念和政治必要性。舍此你们就不能和不会为党提供从李立三同志的错误中吸取所有教训的机会。

2. 关于其他报告人，我们建议，让共青团代表和中华全国总工会代表在报告人之后第一批发言，并给他们更多的时间为报告人作补充。

3. 关于李立三同志动身的问题，现将我们今天收到的政治书记处的电报^① 转发给你们。依据这份电报和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李立三同志动身的最后期限定在10月15日。虽然远东局没有正式决定，从10月1日起解脱李〔立三〕同志的工作，但我们认为还是有必要向你们提出这个建议。李立三同志应该有15天自由支配的时间，用来准备护照，进行个人化妆，安排个人和家里事情。现寄去你们电报的修改稿（附上）^②。请回复。请把全会决议草案寄来。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579，第 181—183 页。

打字稿，副本。

^① 可能指召李立三到莫斯科来的电报，在瓦西里耶夫写给莫洛托夫的便函中提到了这份电报（见第 347 页注①）。

^② 文件没有找到。

301 埃斯勒给中共三中全会的信

早于 1930 年 9 月 28 日^① 于上海

秘密

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
给三中全会的信
(三中全会材料第 11 号)^②

读了特生和少山同志^③ 的报告以及柏山^④ 同志的发言，我产生了以下想法：

政治局和柏山同志完全正确地说明了自己的错误。这些同志在你们全会上作了批评和自我批评，来自各地区的同志们应该在自己的发言中更加深这种批评和自我批评。当然，同志们犯了错误，这是坏事，无论如何要加以避免，但是既然你们已经犯了错误，你们就应该从这些错误中彻底地吸取教训。政治局和柏山同志的错误带有原则错误的性质，若是共产国际及其代表不及时地纠正这些错误，

① 全会闭幕的日期（见第 346 页注③）。

② 文件的原件没有找到。档案馆保存有中共中央在全会后散发的该信中文本的俄译稿。俄译稿的副本于 1931 年 1 月初送给斯大林、莫洛托夫、皮亚特尼茨基、库西宁、别尔津、洛佐夫斯基、瓦西里耶夫、萨法罗夫、马季亚尔和库丘莫夫。文件上有批注：太差劲。

③ 分别为向忠发和周恩来。见特生的《中央政治局工作报告》——《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6 册，第 351—358 页；[周]周恩来的《关于传达国际决议的报告》同上，第 358—388 页。

④ 李立三。李立三的发言，同上第 389—400 页。

那就可能给中国革命和你们党造成十分危险的局面，因为在这里事情关系到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党的作用和其他问题。如果不明确地解决这些问题，不无条件地贯彻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那就不可能领导革命，也不能使革命取得最后胜利。柏山同志在自己的自我批评中十分清楚地和正确地指出了自己的错误、错误根源和自己对这些错误应承担的责任；报告人也像柏山同志那样，谈到了党的最高机构和政治局在理论和策略上的错误。关于这一点在决议、文章和指示中也都谈到了。但是政治局和柏山同志的有些错误在党内工作中已经贯彻执行了。因此，同志们，必须让各地的工作人员不用任何外交方式竭尽全力地揭露这些错误，说明这些错误对党的工作是怎样产生影响的，怎样削弱党，削弱党、共青团和工会的活动的。同志们，如果我们不能做到这一点，那我们就不能认为自己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在全会召开前夕和在全会上大家对共产主义的叛徒，即中国的托洛茨基分子、陈独秀分子以及党内右派分子讲了很多，并指出他们正竭力利用政治局和柏山同志的错误来攻击党的整个路线，把党的路线同共产国际的路线对立起来。党内右派分子的这种手腕对我们来说决不是什么新东西。

机会主义分子在散布流言飞语，说党的路线是与共产国际的路线相对立的。这纯属谎言，是不能蒙骗任何人的；党的路线始终是与共产国际的路线一致的，从来不存在两条路线。只有偏离这条正确路线的错误的倾向，这些倾向肯定带有严重的性质。这些倾向首先是由柏山同志带给政治局的，确实是危险的，因为柏山同志和其他同志曾怀疑共产国际指示的正确性。只是在做实际工作时受到打击后，在共产国际指示的影响下，柏山同志和其他同志才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并愿意彻底消除这些错误。同志们，我们不能也不应该害怕右派分子的机会主义。我们应该像共产国际的所有支部一样以真正布尔什维克的精神去纠正这些错误。只有纠正这些错误，我们才能以纯粹的布尔什维克精神去领导中国革命，揭露党内右派和

“左派”分子，坚决地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首先必须反对右倾，因为这是最危险的倾向。

至于特生和少山同志的报告，我想说明几点并请你们讨论一下我的观点。

报告人没有谈到党组织的状况，没有谈到党所开展的所有运动。我认为，这是报告的不足之处。同志们，党决不能停止不前。尽管存在帝国主义和军阀的疯狂的白色恐怖，党在工人运动领域已经扩大了自己的政治影响。你们在二中全会后也开展了许多政治和经济运动。其中有些运动开展得很好，有些开展得不够好，有些遭到了彻底失败。关于这些问题我们本应该谈一谈。我希望，报告人的这些缺点在来自各地的同志们的发言中会得到纠正。

至于行动委员会，行动委员会本身就其思想来说决不是错误的。行动委员会是需要成立的。你们的错误决不在于你们成立了行动委员会。错误在于，行动委员会是按照政治局和柏山同志对其职责的说明进行工作的，它们在实际工作中起了什么作用呢？在工厂、城市、农村是应该成立行动委员会的，借助于这个组织，党就能比较容易地动员群众来实施当前的某个具体的政治行动。过去你们把这些行动委员会由党的辅助性组织改成了领导机构，实际上取消了党、共青团以及工会的活动，把所有职能都交给了行动委员会。这就是你们的错误所在。

关于对待富农的态度，所有发言的同志都讲得很正确。在对待富农的策略上，我们在目前的革命阶段，还不应采取像对待封建主和地主那样的政策。但这决不意味着，党和苏维埃政权应该阻止农村的阶级斗争。不；我们应该记住，在革命发展过程中，富农会越来越多地变成苏维埃政权最危险的敌人，所以我们现在就应该估计到这一点。

最后关于对待帝国主义的态度。这个问题我们应该认真地作出分析，因为如果我们不能在策略上弄清这个问题，那么我们就会遇

到工农群众的极大反抗。关于红军也可以这样说。例如，如果说，我们不能把帝国主义者赶出中国，我们应该同他们达成协议，不应该没收他们在中国掠夺的资本，这种解释当然是完全错误的。这里的问题应该是，党在自己的工作中不应该削弱自己的反帝斗争，因为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最主要的敌人，党的老纲领在这方面仍然是适用的。整个日常斗争应该有推翻帝国主义的口号。在苏区绝对不允许帝国主义军队、炮舰、船舶、司法权等等的存在，所有人都应服从苏维埃的法律。但是苏维埃政权，这是劳动群众的政权，它能够，此外也应该同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府建立外交和其它关系，以便（有一个词辨认不清——原译者注）……关系。这样就能一步一步地实现纲领。

同志们，我代表共产国际远东局向你们致以兄弟般的敬礼，并希望，你们的三中全会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下，彻底研究过去的错误，今后坚定不移地执行正确的路线，领导全中国的劳动群众去扩大苏区和为建立苏维埃中国而继续斗争。

中国共产党万岁！

中国革命万岁！

（这封信不要在报刊上发表和普遍散发，应在负责同志当中分配^①）。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606，第 157—160 页。

打字稿，副本。

① 原文如此。应为：传达。

302

中共三中全会给共产 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的电报

1930年9月28日于上海

秘密

致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①

从中国共青团驻青年共产国际代表刘明佛同志的重要报告中得知：张国焘同志认为，“李立三领导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歪曲了共产国际的路线”，中共中央三次全会^②一致声明，张国焘的论断是不符合实际的。共产国际执委会在这次纠正中央政治局的错误时认为，政治局在自己的工作中执行了共产国际的路线，同时也犯了局部的策略错误和组织错误，因此号召政治局进行布尔什维克式的自我批评，承认和纠正自己的错误，目的在于大力加强党的领导。中央政治局完全接受这些指示，中央三次全会以布尔什维克式的勇气进行了严肃的自我批评并且坚决地纠正了错误。

张国焘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是与共产国际的立场直接对立的。毫无疑问，断定中共中央政治局的路线与共产国际的路线相对立的说法是不正确的。

因此，三中全会认为有必要让张国焘同志返回中国参加实际工作，并请共产国际立即把他派回中国。

① 该文件的英文本发表在：郭华伦：《中共史论》（上），台北1968年第2册第193—194页。

② 见第345页注③。

中共三中全会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571，第 130 页。

打字稿，副本。

303

中共中央政治局给共产国际 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的电报

1930 年 10 月 3 日于上海

秘密

致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

中共三中全会决定让张国焘同志返回中国参加政治局的工作^①。

政治局派遣在三中全会上被补选进入中央委员会的黄平同志去取代他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代表。

我们希望，共产国际执委会能表示同意并通知他开始工作的时间。

中共中央政治局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571，第 129a 页。

打字稿，副本。

① 见第 302 号文件

304

中共中央政治局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电报

1930年10月5日于上海

秘密

致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

中共三中全会^①已开幕^②。全会一致接受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一切指示，并根据这些指示以真正布尔什维克的勇气对党在所报告的时期内的全部工作进行了自我批评。李立三同志也同样对自己进行了无情的批判。三中全会仔细地讨论了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党的新任务，特别是在苏区工作中的新任务的指示^③，并完全同意这些指示。全会号召全党开展既反对右倾又反对“左”倾的两条战线的斗争。全会承认了党过去的错误并吸取了教训。

全会增补了15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这样，现在中央由23名委员（其中工人14名）和17名候补委员（其中工人9名）组成。在新的政治局中有8名工人；政治局已开始工作。

黄平同志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政治局决定派他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代表，这样，他就可以不回来了。

刘少奇应该立即动身。

李立三将在10月中动身。

① 见第346页注③。

② 原文如此。从意思看应为：闭幕。

③ 见第257号文件。

中共中央政治局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571，第 129 页。

打字稿，副本。

305

瓦西里耶夫给莫洛托夫的信

1930年10月8日于莫斯科

绝密

亲启

政治局致莫洛托夫同志

我们收到今年10月7日来自中国的报告^①，说扩大的中央全会一致同意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决议，对以前的错误进行了严厉的自我批评，李立三放弃了所犯的错误。

我们发去以下答复：

“政治局^②来电收悉。为什么不答复我们关于李立三立即动身的建议？请报告你们对中央全会的评价，包括对李立三声明的评价。”

瓦西里耶夫

全宗514，目录1，卷宗577，第62页。

打字稿，原件，亲笔签字。

① 见第304号文件。

② 中共中央政治局。

306**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
关于中共内部状况给共产国际执
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的通报^①**

1930年10月9日于莫斯科

绝密

关于中共内部状况的通报

从1930年年中开始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②之间出现了严重分歧。这些分歧是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对中业国已形成的形势的评价问题上实行了错误方针的基础上发生的。政治局候补委员李立三在莫斯科文^③同志不在的时候，实际上实行了党的领导，他阐述了这样的理论，即在中国，由于红军取得节节胜利已经出现了在全国进行革命决战的有利形势。

6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认为一省或几省的胜利意味着全中国革命形势的形成，必须立即开始举行全国的武装暴动^④。尽管共产国际执委会驻华代表坚决反对，这个决议还是发表和传达下去了。紧接着这个决议之后，政治局向各省委发出了一些体现这种精神的指示信，此外，为准备暴动向各地派出了代表。与筹

① 文件上有批注：最后稿分送政治书记处成员。

② 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

③ 周恩来。

④ 指193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决议。（见第177页注①）。

备反帝国主义新战争危险相结合，暴动开始时间定在8月1日。

政治书记处得到关于这个计划的报告^①后，立即予以否决，建议中共中央政治局把注意力集中在加强红军这项最重要的任务的问题上，因为这项任务的解决将会保证苏区的进一步发展和巩固，同时建议尽力加强工业中心地区的群众工作，把这些地区无产阶级的斗争与直接援助苏区的任务结合起来。

在就这一指示^②同中共中央政治局发生的争论中，政治局断定，中国工人不愿参加示威游行和罢工，而只想通过武装暴动进行斗争，中国的农民群众要求夺取大城市。

共产国际执委会建议对帝国主义者采取灵活的策略，目的在于拖延决战的时间^③。李立三在8月初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对此作出答复说：“虽然武装干涉的危险如此严重，但这还不能使我们有丝毫的动摇，因为在中国处于革命的形势下我们有可能动员千百万革命群众以及世界上革命的无产阶级同帝国主义者进行坚决的斗争。”他还说：“最后，中国革命的最重要问题，就是帝国主义者问题。如果我们不认真地注意这个问题，那就可能犯严重错误，可能葬送革命，因为这个问题是中国革命的核心问题。帝国主义者是中国革命的最大敌人。什么是中国革命的胜利呢？这就是推翻帝国主义者的统治。要推翻军阀和国民党，就必须推翻帝国主义者。所以我们应该下定决心去同帝国主义者进行激烈的斗争……^④是否有可能战胜帝国主义者呢？我们根据上述条件可以作出肯定的回答，因为我们能够动员千百万群众进行坚决的殊死战斗。在这场斗争过程中，有可能推动世界革命的爆发……我们坚决反对那些认为帝国主义者的大炮和

① 见第252号文件。

② 看来是指第255号文件。

③ 指第275号文件。

④ 此处和以下的删节号是原有的。

飞机是个实际问题的右倾分子。他们看不到把广大群众动员起来的事实，因此他们动摇了。我们不应该有丝毫的动摇和犹豫。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准备武装暴动和领导群众的斗争。”李立三在回答能否在武汉举行暴动时为在外国租界举行武装暴动作准备的问题时说：“我个人的意见是，在中国地区和在外国租界准备武装暴动应该同时进行。在中国地区举行武装暴动的时候，应该对外国租界进行防御性的进攻。这个问题很重要，我们决不应该把租界排除在我们的总暴动计划之外，因为在暴动开始时帝国主义者不可能不进攻革命群众，并且帝国主义者和中国统治阶级之间的统一战线是不可避免的……首先要在中国地区取得胜利，而后集中力量准备进攻外国租界。指望在举行武装暴动时对帝国主义者采取外交政策来缓和他们的进攻，这是空想。但是为了在千百万世界无产阶级大众面前揭露帝国主义，采取外交手段将是有重大意义”，等等。

左强^①同志在政治局的那次会议上支持李立三同志，他说：

“在帝国主义问题上我完全同意李立三同志的观点。认为借助于某种外交手段就可以软化帝国主义，那是空想。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帝国主义的观点是与全局问题有关的问题。我也不完全同意共产国际执委会在关于中国能否战胜帝国主义问题上的观点，我还是同意李立三的观点。”

同时政治局请求共产国际执委会批准在武汉、南京、上海举行武装暴动。共产国际执委会否决了这个建议，并断然建议他们执行政治书记处决议中提出的指示^②。李立三不顾共产国际执委会这一断然指示，继续有步骤地准备在大城市举行武装暴动。在政治局的会议上李立三发起了反对远东局和共产国际的运动，借口说，向共产国际执委会通报情况的工作做得不好或不正确，共产国际执委会

① 原文如此。音译，何人不详。

② 指《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见第273页注①）。

不了解中国的局势，不希望中国发生革命，等等。

“昨天，我看了共产国际的指示，我感到，共产国际不了解中国的情况和革命高潮的到来。”

“共产国际如此过高地估价黄色工会的作用，我很惊奇……”“共产国际指出必须特别注意下层的统一战线。共产国际这样提出问题，显然是共产国际不了解黄色工会在中国的作用。”

“如果共产国际了解中国当前的形势，那么它当然不会批评我们党的路线。”

“如果我们机械地形式主义地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好像我们是忠于共产国际的，但实际上我们将错过重要的革命高潮。那时结果就会是，我们实际上对革命不忠诚。而对革命不忠诚——就是对共产国际不忠诚，因为共产国际的总路线是正确的。但是在共产国际工作的同志不了解中国当前的局势。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反对共产国际，我们应该谅解共产国际，因为他们不了解真实情况。”

顺便说一句，李立三试图这样提出问题，似乎他所代表的路线是从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指示中得出的最合乎情理的结论。

政治局的其他委员也都随声附和，完全支持李立三的讲话。特生^①同志在这次会上结束自己的发言时说：“政治局的同志们应该一致地坚决贯彻党的路线。这绝不意味着反对共产国际执委会，而是革命群众的要求。我们应该向共产国际执委会负责，同时也应该向革命负责。”

在8月初也是讨论共产国际执委会电报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李立三继续捍卫在全国组织暴动的路线。他说：“我们的战略还在于吸引国际无产阶级同帝国主义进行决定性的斗争。有些同志批评这个论点。他们说，这个论点与共产国际执委会的路线不一致。但是我认为，它从头至尾丝毫不违背共产国际执委会的路线。关于长沙

① 向忠发。

帝国主义国家给其驻华代表发来了大量的电报，但共产国际执委会直到现在都没有向其驻华代表发过一封信。从共产国际执委会方面来说，这是对变革的一种过于轻率的态度和对中国革命的不够重视。”

“如果中央机械地无条件地执行共产国际执委会的电报，那就不仅是机会主义，而且会使党成为敌人的奴隶党。”

与此同时，李立三还发起了反对莫斯科文和斯特拉霍夫^①的运动，指责他们搞机会主义、右倾、向共产国际执委会错误地通报了情况。

占领长沙之后，政治局决定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②，把中央的一切权力交给该委员会。这样一来，政治局实际上被解散了。共青团中央和革命工会的领导也遭到同样的命运。这些组织的代表也被纳入革命军事委员会。8月初远东局在一封信里报告说：“党火速地被改编成一种军事组织，为首的是李立三所领导的行动委员会。他们甚至解散了共青团中央，把共青团与党组织合并，并论证说，这样做是出于统一行动的需要。”^③

在8月初的这些会议上，李立三提出建议，要求共产国际执委会动员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军队并将其调往中国，把红军开进满洲并要求苏联对日本宣战。

他就这个问题说：“我认为，共产国际在目前形势下应该持积极进攻的路线，只有这样才会取得成功。首先苏联应该积极准备作战。”“在东方，我认为，第一，在中国暴动胜利后蒙古应该在政治上立即发表一个政治宣言，与中国苏维埃政权合并，承认蒙古是加入中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一个共和国，随后派出大量军队向北方进

① 覆秋白。

② 指中央行动委员会（见第273页注①）。

③ 文件没有找到。

攻。第二，要集中西伯利亚的千千万万中国工人，把他们紧急武装起来，加强对他们的政治训练，使他们做好同日本帝国主义作战的准备，以便使他们经过蒙古，与中国的暴动结合并向敌人发动进攻。我认为，共产国际应该立即实行进攻的路线。这决不是托洛茨基主义。社会主义建设的五年计划在这种进攻性的政策下就会更快完成。”

他在提出这个计划后说，为了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他准备对抗共产国际执委会。（后来他否认有这个说法，借口说翻译得不准确。）

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从一开始就坚决反对李立三的路线。代表团成员罗伯特斯^①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指示精神，以代表团名义同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一些成员谈了话，然后前往湖北，以便同当地的一些同志进行交谈，使他们相信，他们针对远东局的行动即罗伯特斯在政治局会议上同一些政治局委员的谈话所采取的方针是不正确的。向忠发指责罗伯特斯说：“你们把青年代表叫去并在同他的谈话中表示反对党的路线，这使党的团结受到了威胁。”

罗伯特斯同志在这次会议上解释说，同李立三的分歧不是一些“小的策略上的分歧”，而是两条不同的路线。他说：“共产国际并不是笼统地反对暴动，而只是反对目前形势下的暴动……共产国际说，暴动尚未成熟。共产国际看到，你们……超越了事态发展，因此它才发出这种指示……问题不在于存在分歧，……问题在于政治局企图决定世界革命的命运……所以除了制止你们这种旨在反对共产国际的政策之外，我们没有别的出路。只有两种可能：要么你们推迟实施你们的决议，直至接到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决定——你们可以给它发一份更详细的电报，报告你们的所有计划，甚至可以向共产国际派遣一位负责同志；要么你们仍然按照你们的想法行事。你们自己选择吧。我们向政治局提出以下建议：

1. 政治局要执行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一切决议。

^① Г. 埃斯勒。

2. 南京、武汉的暴动推迟到共产国际新决定的到来。
3. 事态发展要求作出的一切决定应由政治局与远东局共同作出。
4. 停止争论。
5. 集中党的一切力量去发动群众。

至于长沙，远东局建议政治局做以下工作：在南京、长沙、汉口等城市组织广泛的群众性示威游行，口号是：“支援苏维埃长沙，打倒军阀和帝国主义者，为了苏维埃中国，等等。”^①

随后代表团向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发了一封信，对李立三的方针作了全面的评价，要求召开政治局和代表团的联席会议。在这封信中罗伯特斯说明了政治局内的情况，他说：“中国党有陷入冒险主义泥潭的危险。它恐怕会卷入反对共产国际的斗争——这是极大的危险”，他接着说：“不执行共产国际的决议，就不能保持对中国革命的忠诚。”

“如果李立三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论战性发言中反对共产国际的指示（该指示反对在目前形势下在南京和武汉发动武装暴动），如果李立三直接了当地说：“共产国际不了解情况，在这方面莫斯科犯有机会主义倾向的错误，而我们将反其道而行之，”那么能允许对共产国际的决议采取如此轻率的态度吗？李立三很清楚，共产国际和中国代表密切注视着中国形势的发展，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代表们同斯特拉霍夫和莫斯科文一起很好地分析了中国党的状况”^②。关于李立三的军事计划、苏联对日作战等等，罗伯特斯写道：“我们毫不怀疑在现时形势下这种观点是极其错误的，然而，如果李立三对自己的责任哪怕有一星半点的认识，那么他作为中国政治局的委员应该如何做呢？他就应该说：“应该立即与共产国际和俄国兄弟党进行协

^① 见第267号文件。

^② 见第267号文件。

商，以便协调所有计划，弄清他们的意见，只有在这之后，他才应该向政治局提出建议。他决不应该一开始就提出建议，然后声明说，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了解情况不够，他们坚持不正确的路线。”

“难道李立三真的认为，现在必须在中国实行这样的政策，以使共产国际面对既成事实，即进行盲动主义的冒险？”

“同志们，我们十分坦率地对你们说，如果政治局中的领导同志认为，可以不与共产国际协商和违背它的意志作出有可能造成极其严重后果的决定，那么关于遵守共产国际纪律的一切空话都是一钱不值的。”

“三周前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国党发去关于必须在我们占领的一个地区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指示，而李立三却反对建立苏维埃政府。”

“你们能认为共产国际在三周前作出了这样指示，而在三周后会反对暴动吗？”^①

在这封信之后召开的一次政治局联席会议上，李立三继续坚持自己以前的建议。代表团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指示精神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只是后来政治局才通过决议：推迟行动直到共产国际执委会作出新的指示^②。

最近来自中国的电报（莫斯克文和斯特拉霍夫回来后）报告了关于中央发生转变的事，李立三同志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以及共产国际执委会和执委会代表团路线的正确。为使这种转变不流于形式只停留在口头上，共产国际执委会向代表团作出了指示。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566，第 111—112 页。

打字稿，有手写的修改，原件。

① 指 1930 年 8 月 5 日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给中共中央委员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信（见《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集）》，第 214—215 页）。

② 见第 267 号文件。

307

中共中央政治局给斯大林 莫洛托夫和皮亚特尼茨基的信

1930年10月12日于上海

机密

致斯大林、莫洛托夫和皮亚特尼茨基同志

中共代表苏同志^①在莫斯科逗留期间用口头方式向你们谈了党的严重财政状况。当时皮亚特尼茨基同志对苏同志说，今年共产国际驻上海全权代表^②将给中共支付一切旧债，从4月份起中共每月将领到金币。当时苏同志对履行这一许诺的可能性表示怀疑，并请求皮亚特尼茨基直接汇款到中国，以解决当前的困难。皮亚特尼茨基同志回答他说：“我负责通过新的途径把款项寄给中共，我向您保证，在你抵达之前中共将及时收到按照黄金比价折算的所有现款。如果没有办到，你可以致电莫洛托夫同志，而且我是当着奥斯坦^③同志的面说这个话的。”

皮亚特尼茨基同志是在奥斯坦同志在场的情况下说这番话的。此后，皮亚特尼茨基同志患病休假了，苏同志询问了他的副手瓦西里耶夫同志，后者也转告了这样的答复^④。最后，苏同志在动身前会见了斯大林同志并向他提起此事。斯大林同志对他说，今后你们应

① 周恩来。

② A. E. 阿尔布列赫特。

③ 即 I. A. 雷列斯基。

④ 原文如此。从意思看应为：肯定了皮亚特尼茨基的许诺。

按黄金比价收到经费。苏同志回到中国后我们得知，实际情况完全不是这样。共产国际驻上海全权代表从今年1月份起支付给共产党的经费缺额很多。具体数字如下：

月 份	应 收 到	已 收 到	少 收
二月	42000 墨西哥元 (或 15000 美元)	7000 墨西哥元	35000 墨西哥元
三月	42000 墨西哥元 (或 15000 美元)	31000 墨西哥元	11000 墨西哥元
四月	42000 墨西哥元 (或 15000 美元)	39000 墨西哥元	3000 墨西哥元
五月	52500 墨西哥元 (美元汇率提高了)	30000 墨西哥元	22500 墨西哥元
六月	54000 墨西哥元 (美元汇率又提高了)	7000 墨西哥元	47000 墨西哥元
七月	57000 墨西哥元 (美元汇率又提高了)	37000 墨西哥元	20000 墨西哥元
八月	52500 墨西哥元 (美元汇率又提高了)	47800 墨西哥元	4700 墨西哥元
九月	51000 墨西哥元 (美元汇率不变)	24500 墨西哥元	26500 墨西哥元

皮亚特尼茨基批准的专项经费 10000 墨元根本没有收到。

总计： 179700 墨元

苏同志回来后立即向驻上海的全权代表马克斯^① 报告了所有没有收到的经费情况。他答复说，经费没有给够——这是事实。“现在我这里的仓库里有价值 14 万美元的货物。但是卖不出去。因此我只能逐渐地向你们支付。”苏同志问他：你们将以什么方式支付？他答复说：“如果共产国际每个月都寄给我新的经费，即固定的月津贴，

① A. E. 阿尔布列赫特。

那么我就可以支付旧的欠款。每月我可以支付1万美元，折合成中国货币，相当于3.4万元。”

当时苏同志与其商定一起致电共产国际，报告此事。但是共产国际的全权代表^①突然（于9月）来华，并与马克斯同志谈了话，此后所有旧欠款就停止了支付。

如果我们查看一下9月份的帐目，[那么]就会发现他只支付给我们24500中国元，还不值10000美元。10月份共产国际给我们寄来2万美元，但直到今天（10月12日），他只支付给我们28500中国元，还不到1万美元。由此看得很清楚，他不仅不能支付旧的欠款，甚至还不能支付他从共产国际得到的新的经费。

最后，由于没有办法，中共党与远东局商量后，想再举行一次会议，拟定解决这一问题的新措施，但是这位同志（毫无理由地）拒绝了。国际联络部派了这样一个人来管理财务，他犯了这样大的错误，现在又拒绝同我们见面。我们不知道怎么办，因为远东局在财务问题上不承担任何责任。皮亚特尼茨基同志指定负责的那位同志在这里也没有什么作用^②。我们认为，这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据马克斯同志说，共产国际已经决定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来审查他的工作，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个委员会在哪里。至今还没有来。总之一句话，完全指望不上马克斯同志会对经费之事负责。我们对他不抱任何希望。如果国际联络部还相信他会支付这些经费，那简直是徒劳的希望。这种信任就等于反正不会付给我们钱。共产国际的所有同志都可以想到^③，由于这样的财政状况会给中国的工作带来什么样的损失，特别是在现在，需要我们加强对苏维埃地区和红军的领导，需要我们把共产国际的所有决议传达到苏维埃地区。由于经费困难，我们无法

① 何人不详。

② 原文如此。从意思上看应为：影响。

③ 原文如此。从意思上看应为：想象到。

与苏区保持联系，我们无法建立一系列联络机关^①，甚至不能派人前往这些地区。由于这个原因所有文件仍然放在中央。现在，在帝国主义者和军阀加强进攻的时候，由于经费困难，我们失去了派人到军阀部队做瓦解敌人工作的许多机会。

在许多地方，像武汉、香港，我们的组织已经遭到破坏，许多同志都牺牲了。但是由于缺少经费，我们甚至不能转移我们受到破坏威胁的组织，我们不得不把它们留在原地。中央印刷所遭到破坏后，由于缺少经费，我们把从共产国际得到的所有经费都用在其它工作上了，所以直到现在我们没有钱建立新的印刷所。这样一来，发行量为 1 万份的报纸《红旗》减少到 4000 份，变成小页传单形式，而且直到现在都没有固定的印刷所进行印刷。

由我们同志和红色工会领导的许多罢工，由于缺少经费不止一次地无法深入开展。在许多地方，由于缺少常驻的指导员，我们与党组织失掉了联系。尽管这些地方的斗争还在发展，但我们无法实施党的领导。仅根据这些事实我们就知道，在工作中出现了什么样的严重后果，这些后果将给地方工作的落后状况造成更大的困难。

中国共产党很清楚，共产国际提供的经费是有一定限度的。但我们只想得到这个限度内可以兑现的数额，以便不出现我们应该加以避免的那种严重困难。中国共产党每月的开支早已超过 1.5 万美元。最近两个月实际上我们已经支出 6 万多中国元（大约等于 2 万美元）。因此我们已经从中华全国总工会借了 22693 中国元。我们从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借了 7630 中国元。我们为日报^② 就花掉经费 25576 中国元。此外，我们还向各省委支付日常的经费 58648 中国元。这个月的状况简直无法忍受，各省委都致电致函来要求提供经费。我们都回答说，没有经费。我们非常希望，你们三位负责同志

① 原文如此，从意思上看应为：联络站。

② 指《红旗日报》（见第 312 页注⑤）。

帮助我们具体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将如何得到没有付够的经费，今后我们又将怎样得到每月的经费。

现在我们的预算相当于8万中国元，或者说相当于2.5万美元。如果每个月共产国际能以固定资助的形式付给我们1.5万美元，此外每月再付给我们1万美元（偿还旧欠款——我们没有收够的钱），这样才能与我们新的预算相符。

至于从中华全国总工会、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借来的款项，以及（我们没有支付给）各省委的款项，我们请共产国际付给我们2万美元，作为没有付够的旧款项，用于偿还这些债款。上述情况都是确凿的事实。

我们恳请共产国际立即给我们一个具体的答复，并电告我们。再说一遍，先要付给我们2万美元，作为拖欠的旧款，然后每个月再给我们补付1万美元，记在我们没有收够的经费帐目下（总共拖欠的旧款等于179700中国元，即52800美元）。

此外，我们请求每月给我们按时寄1.5万元美元，作为固定的资助。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度过我们现在所经历的最困难时期。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全宗495，目录19，卷宗237，第24—25页。

打字稿，副本，无签字。

308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 政治委员会会议第 89 号记录 (摘录)

1930 年 10 月 13 日于莫斯科

听取：4.（1063）——东方地区书记处关于苏维埃中国的土地和农民问题的决议草案以及东方地区书记处关于中国苏维埃政权的经济政策提纲。

决定：4——既然中国问题应该在共产国际执委会全会^① 上讨论，必须以一个比较详细的文件形式为全会准备在递交上来的文件中提出的问题。现有的文件经过由库西宁、瓦西里耶夫、马季亚尔和萨法罗夫组成的委员会再次审阅后作为东方地区书记处的草案送给远东局和中共中央^②。要求远东局和中共中央将他们对这些问题的意见上报共产国际执委会。

听取：5.（1064）——关于东方地区书记处就与李立三同志的

① 指 1931 年 3 月 25 日至 4 月 13 日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一次全会。

② 指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关于中国苏维埃区域土地农民问题议决草案》和《关于中国苏维埃政权的经济政策》提纲（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6 册，第 629—643 页，以及全宗 495，目录 4，卷宗 59，第 6—18 页。收到这个版本的上述文件的时间是 1930 年 11 月 15 日。）

分歧给中共中央的信^① 的草稿。

决定：5. —— 批准该信并以政治委员会名义发出。

共产国际执委会秘书 格克尔特

全宗 495，目录 4，卷宗 59，第 1—3 页。

德文打字稿，原件，亲笔签字。

① 指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给中共中央的信 [见《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集）》，第 224—233 页；《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6 册，第 644—655 页。该信的最后版本收到的时间是 1930 年 11 月 16 日]。

309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 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

1930年10月15日于上海

致政治局

亲爱的同志们：

根据我们最近的一次谈话，我们认为有必要紧急采取措施以防范对苏区和红军进行有预谋的进攻。我们建议你们采取以下措施：

1. 在“保卫苏区、保卫红军免遭国民党进攻”的口号下，开展广泛的运动。整个日常斗争、任何运动，特别是支持苏维埃代表大会的运动都应该与这个口号紧密联系起来。我们应该努力把纪念11月7日的示威游行变成真正的群众性示威游行。发表简短的号召书并将其大量散发。
2. 向党、共青团、工会和所有其他群众组织宣布总动员。安排好报纸、传单的出版，组织群众集会、示威游行，等等。
3. 在企业和农村建立统一战线委员会来支援红军和苏区，委员会的活动应该与所有日常问题联系起来。
4. 在有经验的负责同志领导下，特别精心地组织在铁路、轮船和运送部队的那些重要交通干线地带上的工作。
5. 为了阻止部队的推进，成立爆破铁路、桥梁等设施的特别小组。
6. 开展积极的游击斗争，特别是沿着部队推进的路线。
7. 采取特别措施来瓦解那些被调来进攻我们的军队。这些军队

已进行了几个月的艰苦战斗，这对我们来说是极好的机会。

8. 结合红军采取的特别措施，召开同有关同志的特别会议。

与此相联系，我们坚决要求你们加快完成以下任务：(1) 寻找机会把我们的代表送到苏区；(2) 安排好与红军的经常联系；(3) 加快建立无线电台。

请你们在下一次会议上就我们的建议谈谈你们的意见并提出实施计划。

致最良好的祝愿！

远东局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579，第 179—180 页。

德文打字稿，副本。

310

陈绍禹^① 给米夫和马耶尔^② 的信

1930年10月17日于上海

亲爱的屈珀^③ 和马耶尔：

不久前我给你们写过一封信，大概已经收到。你们生活好吗？你们的孩子们生活好吗？

关于中国市场^④ 和我们公司^⑤ 的详细情况我会很快写信告诉你们的，但是我担心，可能这封信要很久才能寄到你们那里，所以我只向你们谈谈以下几件必须谈的事情：

1. 虽然老板们的所谓第三次全会^⑥ 已经开过近三周了，但是巴黎总公司^⑦ 今年7月的一些来信〔决议〕^⑧ 至今尚未公布。干部和基层〔党组织〕都急切地等着了解这些信的内容，因为这些信能对他们现在和将来的贸易^⑨ 作出明确的答复和正确的指示。

① 作者是根据笔迹和文字风格特点确定的。

② 何人不详。通过邮局寄发的信中使用的是暗语。在信上有批注：致萨法罗夫。这是一位很好的中国同志写来的信。库〔丘莫夫〕。

③ II. A. 米夫。

④ 革命。

⑤ 党。

⑥ 指1930年7月29日中共六届三中全会（见第346页注③）。

⑦ 共产国际执委会。

⑧ 指《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见第231页注②）和1930年7月23日共产国际执委会的电报（见第255号文件）。

⑨ 革命运动。

2. 巴黎^①的来信〔决议〕在目前形势下只是“上层联合”的手段，因为不开展自我批评，不实行明确而坚强的领导，在政治理论水平如此落后的情况下，在家长制长期统治（辱骂、惩罚、撤职、警告、迫害和在有关机关监视下的相互跟踪^②及开除人员^③等等）的情况下，仅仅来自上面的决议对于改正错误和活跃公司的事业很少会有真正的和必要的帮助。现在不仅总老板，而且连驻上海的省分公司^④都没有执行巴黎决议的坚定性和愿望，但后者在某种程度上要比前者更加重要，而遗憾的是，它比前者更糟糕。

3. 在江苏省，为首的是这样一个人^⑤，他在政治理论方面是第二个李立三，在实际组织工作方面是第二个“老头子”^⑥和陈独秀。直到现在他仍然是李立三的忠实弟子。他是两条战线斗争的最有害的阻挠者。他是上海和江苏组织遭破坏和工作不力的第一个控诉人和罪人。如果他仍留在领导岗位上，那就永远别想改进江苏的工作，而首先是上海的工作。

4. 老板们（不只是一个老板）患的病过于严重。这种病具有很深的社会历史根基和来源。对这种病的治疗只局限于寄来决议和撤消有关领导人的职务（所有这一切当然是十分必要的）是远远不够的，还应该采取坚决的进一步的措施。应该根除对公司中某个人，特别是对莫斯科文（周恩来）等人的任何幻想（这样的幻想以前我和其他人或多或少都有，现在被事实完全打破了），对他们之所以有幻想，是因为他或他们能够理解和做得更好些。历史会抛弃他们。他

① 莫斯科。

② 从意思上看应为“盯梢”。

③ 原文如此。

④ 指中共江苏省委员会。

⑤ 指李维汉。

⑥ 向忠发。

们无论如何也来不及踩脏历史^①，更不要说他们能超前^②了。莫斯科文（周恩来）这一次不仅是主要老板之一，而且还是决议起草工作的唯一参加者，在上海的积极分子会议上甚至称自己是巴黎的代表，他到处发表维护李立三和抹煞老板与巴黎之间分歧的讲话，根本不想提高巴黎的威信。现在应该既从上面又从下面来医治老板们的病症。从上面医治比较容易，从下面就困难得多；困难就在于以下几点：（1）所有真正的、甚至在这方面受到怀疑的战士处境艰难，他们没有机会走向群众；（2）客观情况也不等待我们，因为在高潮不断发展的时刻，时间特别地宝贵。事态发展非常快，一个事件接一个事件；（3）物质力量——体力——在一定程度和一定数量上，由于上面多次玩弄手腕而逐渐减少和分散。所以还需要上面给予更多和更快的帮助。

5. “左”倾和右倾的理论和实践已经拥有相当的实力，不进行有力而坚决的斗争，就别想纠正这两种倾向。一些地方和一些部门的老板患“左”倾病，而另一些地方和部门的老板则患右倾病，有时有的地方既患“左”倾病，又患右倾病。谁也没有权力批评他们。制度几乎达到了恐怖的程度（请原谅我这样说）。理论和实践不少是建立在国民党作风和陈独秀主义的残余基础之上的。遗憾的是，这里没有可能来描述实际机会主义的详细情况。

6. 我和其他人（以及古多克）^③，无法真正地工作，到处都有来自领导方面的罪孽^④。过去和现在所有批评理论和实践不正确和在这方面表示怀疑的人仍处于罪人地位。领导机构直接或间接地在残酷地惩罚、迫害、监视和分派^⑤他们。

① 原文如此。从意思上看应为：跟不上历史发展。

② 原文如此。从意思上看应为：走在前面。

③ 即古多科夫—沈泽民。

④ 原文如此。从意思上看应为：责怪。

⑤ 原文如此。从意思上看应为：发配。

我认为，为了改善和挽救公司和贸易，应该在政治和组织问题上立即采取更坚决的措施。

致兄弟般的敬礼！向所有敬爱的人转达问候！

你们的^①

全宗 514，目录目，卷宗 577，第 88—91 页及背面。

俄文手写稿。

① 签字辨认不清。

311

斯托利亚尔给中华全国总工会共产党党团的信

1930年10月17日于上海

致中华全国总工会共产党党团

亲爱的同志们：

现在，在中共中央全会^①和中华全国总工会执委会全会^②开过之后，红色工会、中华全国总工会、上海工会联合会、产业联合会等组织的状况已经相当明朗，需要认真地讨论和实施第一批具体的组织措施，这些措施可以保证巩固我们的地位，克服许多严重的缺点和履行目前全总所面临的一系列十分重要的任务。

从健康的布尔什维克式的自我批评的角度和从中央全会和中华全国总工会执委会全会会议的角度来看，现在我们大家都明确承认，你们红色工会和中华全国总工会、上海工会联合会等领导机构的组织状况，令人感到严重不安。我们还未能在任何一个行业建立起深深扎根于工厂和（陆地和海上）运输部门工人群众之中的真正健康和稳定的工会，特别是现在，当反革命集中一切力量企图粉碎我们的红军和具有决定意义的苏维埃根据地的时候情况更是如此。红色工会的工作是做得很不够的，可见他们本身太软弱。妇女和青年工

① 指中共中央六届三中全会。

② 指中华全国总工会执委会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1930年10月6—8日在上海召开。

作被完全忽视了；组织农业工人工作一点儿也没有做；对失业者的工作也根本没有着手去做。所有这些缺点和失误明显地影响了最近上海和其他中心城市进行的斗争。我们也未能协调一些行业（上海纺织工人、铁路员工和海员）的分散斗争。我们的红色工会和行业联合会的组织状况很糟糕，下面这个事实是最好的说明：新选出的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机构得出结论，认为有必要“取消”一些只在文件上存在而不做任何工作的联合会。

但是光起草一些漂亮的决议是不够的，尽管这些决议含有健康的自我批评。决议是应该执行的。负责同志中谁都不否认红色工会的极端软弱和过去的错误。但是现在必须采取一些最初的组织步骤来改变这种状况。

因此，我们建议中华全国总工会新的临时委员会和上海工会联合会，在制订近期工作的具体计划时讨论和考虑到下列情况：

1. 必须立即向苏维埃地区派出至少三至四名有经验的和负责的工会组织者。确实，同志们在专心制订往那里派遣 50 或 75 名工作人员的计划，但是我们坚持要求立即派出哪怕三至四名工作人员。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是在苏区建立强大的农业工人、手工业者、运输工人等等的工会。我们不准备详细论述这项任务的重要意义，因为它是不言自明的，而且这个问题曾经与你们讨论过并且写进了决议。我们只想指出一点，必须十分认真地选择被派遣的同志。他们不仅应该是可靠的工作人员，而且应该是有才干的组织者，应该清楚了解自己的任务。中华全国总工会应该给他们以详细的指示。我们还坚持要求，在他们出发前我们能有机会同他们谈一谈。

2. 由于反革命势力对我们红军和苏区进攻的危险性在增长（蒋介石已经为此目的调动了几个师），红色工会在交通运输部门的活动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不能失去时机，而必须尽快在铁路上和在海上和内河运输部门，特别是在那些运送国民党军队及其装备所要经过的地区，加强我们的组织工作和宣传鼓动工作，加强真正群众性

战斗的准备工作。应该在最重要的铁路枢纽、修理厂、军火库、码头等场所极其认真地做好怠工和罢工的准备工作。必须刻不容缓地向每一个重要的交通运输中心派出三四名专门的组织指导员。要给这些组织指导员下达关于他们如何着手进行他们所承担的工作任务以及如何完成任务的明确而详细的指示。但是应该注意到，这些指导员不应仅仅局限于做一般性的宣传工作；他们应该成为真正的组织者并进行真正的组织工作，帮助当地的同志和红色工会建立工厂委员会和舰船委员会以及真正起作用的红色工会。这些指导员应派出一定的时期（在此期间他们应该定期向总工会汇报工作），期满后应返回中心执行其他任务。要采取措施，不使这些指导员“失踪”和像以前所发生的那样不回来了。他们首先是工会的组织者并且是总工会和各联合会常设机构的组成人员。在做必要的准备工作后，应该在最重要的中心城市召开铁路员工、海员、运输工人和军火库工人的代表会议（这也是被派往各地的组织者们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这将是召开铁路员工和海员的广泛代表会议的基础，总工会已经计划和决定召开这样的代表会议。

3. 活跃和改组上海工会联合会的措施：

不要丧失一分钟，应该立即着手活跃和改组上海工会联合会，必须使它成为一个活跃的和发挥作用的机构。必须定期召开执委会会议，建立地方工会组织和联合会的定期报告制度；要抽调一定数量的工会工作人员去执行某个部门或行业的某些任务；必须尽快在上海最重要的行业中开展工作培养组织干部，要请求党抽调一些具有组织才干和尽可能具有工会工作经验（做过工会系统的实际工作）的可靠同志。这些组织者应该与最重要的工厂保持最密切的联系，并向上海工会联合会汇报自己的工作（每周不少于两次）。应该特别关注女工部和青年工作部（即具体关注纺织工业部门的工作）。要准备而且要尽可能认真地准备召开三四次代表会议，首先是在棉纺和丝织工业系统，然后在交通运输等系统。这些代表会议的筹备工作需

要几周时间。已被破坏的与工厂的一切联系（最近两三个月内没有保持的）都应该恢复。要保证最重要的企业有真正由工人们自己选出的代表出席这些代表会议。会后也要与这些代表保持联系。还要利用他们来改善同工人们的联系和红色工会的工作。在这些代表会议上应该讨论核心的组织问题：在本工厂建立真正起作用的红色工会和在红色工会领导下准备开展群众性的斗争（提出在工人中流行的某些具体要求）。在准备过程中就应该把这些代表会议和斗争与准备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和保卫苏维埃地区的运动结合起来。

我们认为，现在就可以着手制订在近几周内召开三四次这种代表会议的计划，而且还可以大体上确定日期。请把有关这些计划的详细情况告诉我们。应该根据为每一个行业所认真制订的简单而明确的要求大纲开始筹备这些代表会议，而且必须让筹备工作家喻户晓并通过这种方式动员群众。

4. 中华全国总工会：这里也必须尽快使机构活跃起来。除了给新的执委会每个委员划分固定的主管部门外，还应该使总工会成为全国红色工会运动的真正领导和组织中心。为此应该挑选至少四五名常任的组织指导员。应该尽快做好这项工作，因为，很可能需要让这些组织指导员学习一段时间（不超过一两周时间）。这些组织指导员应该被派往最重要的省份和工业中心城市，时间为四至六周，并且应该作为总工会各省分会的顾问和组织员在当地发挥作用。在他们出发之前，应该向他们布置一些具体的组织任务（筹备和举行代表会议，准备和进行一些罢工斗争以及一定要在最重要的行业和企业做好建立和组织红色工会和罢工委员会的工作）。经过四至六周（不要超过两个月）他们应该回来并向总工会执委会作汇报，同时要给他们布置新任务。要向满洲派去这样一名工作人员，另一名派往广州或香港，第三名派往厦门，第四名派往武汉。（注：这些指导员不同于在第二条中所说的那些指导员）。他们在各地工作期间，当然应该定期寄来报告，说明我们组织的具体活动情况和罢工斗争情

况。

5. 作为红色工会屏障的合法和半合法组织：关于这一点写过不少文章，也有过许多议论，但是做得太少。据我们所知，上海只有两个这样的组织：电车工人俱乐部和丝厂工人学校。我们建议上海工会联合会不要再拖延了，应该具体讨论一下关于建立至少三四个俱乐部、协会或学校的问题，这些组织应该成为我们红色工会工作的基地。这既是可能的又是绝对需要的，首先对于纺织工人（妇女和青年）和人力车工人来说是如此。这些俱乐部、学校或协会应该设在大企业附近，使当地工人到这里来比较方便。被派往各省的指导员应得到关于这个问题的指示和指导。

6. 报刊：总工会如此长时间没有中央机关刊物，这是完全不能容许的。我们坚持要求你们要不顾一切困难（物质上的和由于白色恐怖造成的，等等），着手出版哪怕篇幅不大的普及性周刊或双周刊和较常出版的报纸。如果你们没有可能通过印刷厂来印刷，那就用腊纸或某种其他原始方法进行复制，但一定要让它出版！我们把红色工会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的提纲^①寄给你们，请尽快以小册子的形式出版。我们一旦收到材料，也要出版红色工会国际代表大会最重要的组织决议和其他重要材料（特别关系到中国的报告和决议等）。铁路员工和海员工会都应该特别关注通俗的群众报刊、传单、小册子和定期出版的报纸的出版发行工作。上海工会联合会应该监督纺织工人报纸的定期出版，因为这样的报纸是重要的，可以说是非常宝贵的组织手段。

7. 11月7日的示威游行：应该考虑到，7月和8日的示威游行，至少在上海是不成功的，因为没有足够广泛的工人群众参加。当时正在举行大规模的罢工，我们还是未能发动哪怕一部分罢工者（纺织工人、电车工人等等）去参加游行。为了使11月7日的示威游行

① 见第328页注④。

比较顺利进行，红色工会应该百倍地加强和扩展自己在企业中的工作，把这一运动同日常的战斗和要求紧密地结合起来，动员妇女和青年并保证用护卫队保护游行者的安全。

注：请讨论这封信并报告你们的决定。

杰克^①

全宗 534，目录 6，卷宗 94，第 44—50 页。

打字稿，副本。

① C. A. 斯托利亚尔。

312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

1930年10月20日于上海

亲爱的同志们：

最近三个月在中国党发展史上无疑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不久前召开的全会^① 克服了政治上的惊慌失措和冒险主义的空谈，这种空谈使党在8月的日子里走到了冒险主义的边缘，毫无疑问，这既给党本身又给党与群众的关系和党所面临的任务带来了损害。下面我们想说一说我们最后一位信使^② 于8月份〔动身〕之后的事态发展。

八月政策的结果

在全国暴动的口号下，党在非苏维埃地区实际上处于完全无所作为的状态。在实际动员群众方面的一些光辉创举，例如在5月1日和30日的运动期间，在企业里成立行动委员会和组织企业代表会议的工作现在都已经停止。对于最近迅猛发展的罢工浪潮，作出的反应是发表一些关于举行暴动的决心和关于工人阶级愿意举行暴动的宣言，然而党本身能够给予这个运动真正有组织的影响比任何时候都要小。它在口头上、政治上每前进一公里，在组织上就会落后一公里。因此，党在组织方面无论在工人中间，还是在红色工会当中，

① 指中共六届三中全会。

② 何人不详。

都没有得到多少加强，也未能在试图把一些表明工人阶级有坚强斗争意志而斗争分散的发动变成群众性发动方面取得什么成绩。党不明白，应该在最初的时刻就抓住那些直接关系到广大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在反动派的猛烈进攻最嚣张的时候也没有采取反击行动。为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而开展的运动只停留在档案文件上，党近几个月所组织的示威游行，特别是为纪念8月1日和国际青年节^①所组织的示威游行，准备得如此不好和如此没有效果，是最近两年来从未有过的。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这样一种形势下，当时完全可以确有把握地说，共产主义在各大城市的影响正在扩大。

企业中的支部完全是消极的，与其中的许多支部失去了联系，实施领导的党委会和群众组织的机构遭到破坏。一切都要经过行动委员会，行动委员会承担了履行所有青年组织、党和工会的职能，作出了长远的决定并通过“军事”方式传达下去。但是党员群众与高层党委会的联系从来没有如此糟糕。工会工作、青年组织遭彻底破坏。最能说明这种情况的是红色工会一位领导人向^②向我们提出这样一个完全绝望的问题：“布尔什维克在革命成功之后就取消了工会，这是真的吗？”在城市里开始建立红色战线，以及脱离工厂工人群众生活和斗争的工人营，这种工人营本来应该是未来的红军。

原 因

所有这些措施都是为了“使党军事化”而采取的，这种军事化是举行全国暴动所必需的，似乎全国暴动的时刻已经到来。

在李立三直接领导下的政治局为此承担了全部政治责任。他和党在政治方面和组织方面所做的一切，是最近他特别强烈表现出来的错误倾向发展的结果。他实际上不理解进行群众工作的必要性，他

① 9月1日。

② 何人不详。

对党在广大群众中的组织作用完全估计不足，他常常喜欢用世界革命的虚假理论来回答每一个具体问题，所有这一切在最近一个时期越来越强烈地体现在每一次代表会议上、每一个文件中和每一次谈话中。所有这些倾向在 7 月 11 日^①的决议中有十分清楚和系统的体现。他的政治体系越来越变成了路特·费舍的词语和纯粹托洛茨基式的说教的中文版大杂烩。

正是李立三早在一年半以前就提出了一个企业只能有一个工会的理论。这在实践中导致取消了红色工会。最近他借助全国暴动的理论，搞乱了红色工会的组建工作。他在 8 月提出关于爆发世界大战的时刻已经到来，即必须“发动世界大战”和苏俄红军积极干涉中国的时刻已经到来的理论时，他在与占领中东铁路有关的斗争结束后，就在党内散发了一个可能成为发动世界大战最简单借口的通告^②。与湖北的决议^③相联系，我们还应该反对他完全忽视甚至是轻视经济斗争的态度。在 8 月的日子里，他已经完全公开地说：工人们只想暴动，他们不想举行任何罢工、任何游行示威、任何局部行动——这是特殊的中国问题，只有中国革命者才能理解。他在论述当前中国革命时反对建立苏维埃根据地并且取消了苏维埃代表大会。

但是，用李立三一个人的错误当然不能解释这一切。不清楚怎么会出现在这种结果：他的冒险主义的词语竟然被所有领导人接受了，青年团中央^④和工会毫无抵制地自行取消了，政治局^⑤公开反对共产国际，对于你们用电报发来的每一项建议，例如，关于对待帝国

^① 原文如此，应为 6 月 11 日。指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议《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

^② 看来是指 1929 年 12 月 8 日中共中央关于执行实施武装保卫苏联和策略的第 60 号通告。

^③ 见第 128 页注①和第 225 号文件。

^④ 指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

^⑤ 中共中央政治局。

主义者的策略问题^①，它都或多或少地准备公开进行谴责，指责你们搞机会主义和不了解中国情况。

在我们这里常常出现分歧，有时分歧还很尖锐，但是在 8 月的日子里政治局给我们留下了同志们完全发疯了的印象。

以前处于萌芽状态的这种倾向在 8 月具有如此巨大的规模——这一事实说明中国党内情况具有特殊性。一方面是中国革命发展不平衡的特殊状况，农民战争的迅猛发展，广阔苏区和红军的存在，另一方面是城市斗争的相对薄弱，落后的产业干部，在白色恐怖的残酷条件下进行工作；这种情况自然对于拥有较弱无产阶级干部队伍的党产生了极坏的影响，因为党的干部队伍基本上由知识分子构成，他们缺乏组织工人阶级斗争的经验，理论修养不够，在白色恐怖条件下与工人阶级的直接联系很薄弱。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干部就容易以虚假的理论和投机的行为来取代经验和直接交往的不足。

在这种情况下，各种意见和观点的尖锐矛盾影响和吸引了所有领导人。一方面红军占领长沙，逼近九江和南昌，红军的先头部队接近汉口，而另一方面，白天在城市里不能在街上行走。我们对于政治局和李立三的错误谈过多次，提出过很多指责，但是应该承认，以李立三为首的整个政治局和这期间我们会见的每一个同志，都满怀着革命激情，十分真诚地相信，全国革命的时刻已经来到，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是叛徒。他们通过斗争歪曲事实和提出错误的理论拒绝我们的所有反对意见。他们不是在中国范围内来评价长沙事件，而是长沙范围内来评价中国形势。

李立三后来在辩论的时候有一次自己很好地阐述了这些错误：“在 8 月 1 日前夕，我们根据南京士兵中间形成的局面，曾打算举行有组织的士兵暴动。（在作了一些修改后我们同意了这个决议，而不

^① 见第 275 号文件。

是同意政治局电告你们的关于^① 在南京、汉口等地举行暴动的决议。——罗伯特斯^②）。在红军节节胜利的影响下，我们确信，这还不够。必须在汉口举行暴动，但是这也还不够。还需要在天津、哈尔滨等地举行暴动。占领长沙已是解决了的问题。”

这样，就形成了一种局面，在这种局面下党的领导成了事态发展的尾巴，而不是去引导事态的发展。在这种复杂的形势下，党的领导没有站在应有的高度来正确估计事态并采取必要的措施。

这里还需要补充一点：在红军部队坚守长沙的时候，几乎不可能与政治局平心静气地交换意见。任何论据、任何援引国际纪律的话语对他们都没有留下实质性的印象。你们的任何电报也都没有用。应该十分坦率地说，我们很怀疑，如果不是长沙很快失守，提供了痛苦的教训和促使他们头脑清醒，是否能够阻止党不去进行毁灭性的冒险和在全国范围内组织暴动。

党实际上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坚守已经占领的长沙。攻占长沙的军队领导者同政治局完全一样，对局势和所面临的任务都没有明确的估价。第五军^③军长彭德怀以勇敢的战士著称，是一位绝对忠诚和在政治上很成熟的同志。然而，从他那里来的一位同志讲述的情况证明，领导者对于长沙的行动也缺乏明确的认识。该同志说：“当彭德怀出人意料地迅速击溃敌军并占领城市后，他实际上并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他只想着一件事：如果我们能坚守住长沙哪怕几天，那么全国革命就会爆发。”因此，军队驻扎在城市里，没有采取任何重要的政治和军事措施，等待着全国革命的爆发。湖南省委未在城里组织任何活动。那里没有党的任何组织。

① 见第 273 号文件。

② Г. 埃斯勒。

③ 原文如此。应为第三军团。

纠 正 错 误

纠正错误，自然不无内部斗争和阻力。在莫斯克文和斯特拉霍夫^①回来后，李立三立即企图通过外交手腕来阻止对错误的纠正。主要是在向忠发的支持下，他企图把一切都说成是误会，指责我们粗暴地歪曲事实并作出不怀好意的结论。请读一读李立三早在8月26日写给长江局的那封信^②吧。

莫斯克文和斯特拉霍夫在回来后行动很谨慎。毫无疑问他们想纠正错误，认真地着手执行莫斯科通过的决议，但是他们又不想给李立三和向忠发带来痛苦，他们想尽可能避免任何斗争。

当然，我们不能去干这种事。我们十分坦诚地同政治局谈过并且特别详细地同莫斯克文及斯特拉霍夫谈过。莫斯克文作为一个最聪明和最讲究实际的人，一下就明白了，在你们的电报^③发来时，党内出现了何等不成体统的现象。经过长时间的辩论，政治局开始明白，任务不在于挽救，而在于必须采取认真的步骤来纠正错误。人们开始承认和分析错误了。最重要的一点是，不是从纪律方面考虑，而是因为开始真正认识和理解错误了。

讨论全会决议草案已是在务实和有效的基础上进行的。但是在关于李立三动身和在全会上公开批评李立三的问题上还存在着困难。一些人论证说，对李〔立三〕的批评可能会被右派利用。但是不采取这个步骤党的政策就不会彻底转变。李立三对领导机构的很大一部分人是有影响的，这些人直到今天还在继续重复他的言论。（请读一读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书记^④的电报。）关于这个问题在全

① 分别为周恩来和瞿秋白。

② 文件没有找到。

③ 见第240、255、271、291号文件。

④ 戴晓云。文件没有找到。

会召开前不久还发生过相当激烈的争论。我们要求政治局在全会上公开说明李立三的非同一般的错误，让李立三不是作为政治局的报告人讲话，而是在全会上自己公开承认政治性错误和在对待共产国际态度方面的错误。为了彻底澄清事实，奥斯藤^① 和罗伯特斯出席了讨论这些问题的政治局全体会议。然后李立三在政治局就自己的错误发表了长篇讲话。这篇讲话给我们留下了完全真诚和真正悔过的印象。他没有宽恕自己，也不想掩饰什么。

在涉及决议、对李立三的批评和纠正错误问题的全会所有问题上与政治局达成了全面的谅解。奥斯藤同志作为远东局代表在中央全会上发表了讲话^②，听取了李立三的发言，并向我们报告说，李立三的发言完全符合已达成的协议，给大家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莫斯克文也就莫斯科通过的决议作了很出色的发言并毫不留情地批评了李立三所犯的错误。所有决议都一致通过。决议和记录连同这封信一起寄给你们^③。在全会闭幕后召开了负责军事工作同志的军事会议^④，托姆^⑤同志参加了这次会议。莫斯克文在讲话中提出了关于苏维埃根据地和红军改编问题。给人的印象是，同志们完全理解这些问题。中央会议之后，为了改组工会还召开了红色工会领导的扩大会^⑥，红色工会国际的代表^⑦受远东局委托参加了这次全会。我们把这两位同志的特别报告^⑧寄给你们。最近还要召开青年

① И. А. 雷利斯基。

② 文件没有找到。

③ 文件没有找到。

④ 指 1930 年 9 月 30 日召开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扩大会议。

⑤ А. Ио. 盖利斯。

⑥ 指中华全国总工会执委会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

⑦ С. А. 斯托利亚尔。

⑧ 见第 316、317 号文件。

团中央全会^①。

迫 切 任 务

我们与政治局一起制订了一个大规模动员运动的计划，以防备敌人对最重要的苏区和红军发动总攻。有条不紊地把军队从前线调往湖北、湖南和江西等省最重要的战略据点周围。敌人进攻的规模还不清楚。这将取决于同北方进行的新战争的发展速度。但是毫无疑问，现在我们面对一个很大的危险地带，迫使我们动员我们的所有人力和物力。同时，我们这里也有很好的条件。被调来进攻我们的军队会碰到艰苦的（按照中国的标准）战斗，他们现在进入了被农民暴动“感染的”地区。

以前同国民党进行的整个斗争经验表明，国民党军队怕同红军在被农民暴动所震撼的地区作战。在附给政治局的信^②中提出了我们的措施，这封信他们已经收到。

在这种形势下就更加迫切需要建立苏维埃根据地、同苏区建立经常联系和组建局^③。可是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建立经常性联系。例如，在8月底我们与政治局作出决定，红军目前不应该再去攻占长沙^④。决定已经发出去了，但是没有收到任何实际效果。又发动了两次进攻。第二次进攻失败后，朱德和彭德怀在下一步行动问题上出现了分歧。彭德怀主张继续进攻，而朱德则反对，他主张撤退到苏区，以便加强军队。但直到今天我们还没有得到关于这些分歧的详细情况。许多同志前往事件发生地点，但是他们要在途中走几周或几个月。要在行进的路上建立联络站和设立无线电通讯缺少资金，这

① 指中国共青团五届三中全会，1930年12月下旬在上海召开。

② 见第309号文件。

③ 指中共中央苏区局。

④ 文件没有找到。

是尽快解决这些问题的巨大障碍。

关于在苏区建立中央局的问题我们与政治局一起预先作出了以下决定：该局应该由项英、少先队员^①、毛泽东、工会和青年代表组成，再加上几位外国同志。但是至今还没有找到出路，哪怕有 10% 的把握把几位非中国同志送到那里去。

莫斯克文在政治局提出自己前往苏区的建议。我们都反对。目前他在政治局里简直是改进党的工作和改造党不可替代的人物。

支持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的运动现在真正认真地开展起来了。它能否像计划的那样于 12 月 11 日举行还是个问题。会期可能推迟一点。这将取决于群众对代表大会的准备程度。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将选出临时政府。为了避免重犯以前在土地问题和经济政策方面的错误，现在正为代表大会制定一些法律。我们还想以代表大会的名义通过一部大众化的中国人民的民族和社会解放大纲。

最后的意见

党面临着很多任务。但是我们认为，尽管存在各种困难，党在最近几个月已开始吸取许多有益的教训，这些教训将有助于党在实践上和理论上正确地解决一切任务。

受远东局委托 罗伯特斯

全宗 495，目录 19，卷宗 117，第 42—48 页。

德文打字稿，副本。

① 关向应。

313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小委员会的信

1930年10月20日于上海

致小委员会

这里的国际联络处，即可以说它的名义上的主任马〔克斯〕^①同志和远东局之间的关系从来就不好。不知道为什么形成了这种局面：在实际工作和生活中，马克斯把自己看得超人一等，他对什么都不感兴趣，而且从来都是如此。不知为什么无论是整体公司的利益，还是中国朋友的需求，无论是健康的理智，还是健全人的逻辑，对他都没有触动。

我们的代表毕格曼^②不久前在你们那里逗留时向皮亚特尼茨基同志报告了许多情况，这些情况证明：马克斯同志的行为对我们的活动和我们中国朋友的工作产生了消极影响。比如，就拿资金问题来说吧。必须最坚决地谴责马克斯同志的财政政策，这种政策已经造成最悲惨的后果。最近几个月来，他根本不支付应付的款项，这就使我们中国朋友的工作频率降低了一半。无论谈到什么问题，无论向中国朋友们提出什么建议，你总是得到他的同一种回答：“我们没有钱，我们已经债台高筑，你们提建议倒容易，可是我们却失去最优秀的人才，住宅被捣毁，因为我们连一分钱都没有。”马克斯同志完全不负责任地

① A. E. 阿尔布列赫特。

② И. А. 雷利斯基。

给中国朋友和我们以空头承诺：他一会儿许诺“明天给”，一会儿说“情况会好转”，等等。他也给你们发去各种宽慰的电报。

如果可以认定不久前马克斯同志的行为和他对工作的态度是对影响这里本来就不很好的生存条件和工作的妨碍和干扰，那么他目前的行为简直就是对我们和中〔国〕朋友们的工作的直接危害。马克斯同志陷入走头无路的境地后，表现出自己是再也无可丧失的人了。他觉得，整个世界都在危害他的生命和安宁，因此他自然要同全世界和所有人作对。不过，从这种错误的前提出发和与看不见的敌人作斗争，马克斯同志企图把自己的愤怒发泄到他所遇到的所有人身上。为了进行斗争，他反对一切，反对所有人。

马克斯同志作为这里国际联络处的正式领导人，以疯人般的狂热在做着这一切，好像只是为了危害别人。但是这种为了原则的恶毒性已经具有罪恶的形式并给工作带来了危害。

马克斯同志最近处理的两件事是不能也不应该使他不受惩罚。我们向你们报告最近所发生的这两件事情，同时也向你们提出与马〔克斯〕有关的一项建议。

第一件事：由于资金问题与我们长期发生争吵之后，一位中国朋友，而且是一位最负责的朋友要求会见马克斯同志，还要求有我们的一位代表参加。马克斯同志断然拒绝接见中国朋友，他通过自己的工作人员告诉这位中国朋友，对他没有什么可谈的，因为我们和中国人就这些问题（资金问题）曾经给你们发过电报^①。根据不要干涉别人事情的原则而拒绝接见我们的代表，这一点也不使我们感到奇怪，但是拒绝接见我们的朋友，这就意味着进一步激化本来已经紧张的气氛，这就意味着破坏你们机构的威信，这是对运动的直接危害。

第二件事：几个星期来，这里一直议论派一位同志携带材料去你们那里，即派一个所谓的“信使”。几次确定了行期，由于各种原

① 见第 307 号文件。

因又都改变了，人选也一再改变。最后，决定派一个人去，通过他你们将收到这封信。这位熟人在动身去你们那里之前，受我们的委托要到一个邻国去，从该国回来后再去你们那里。他回来之后，马克斯同志给我们一周时间准备材料。老朋友们的全会^①刚刚结束，年轻朋友们的全会^②于18日开幕。举行了几次（重要）会议。有关这些会议的材料还没有准备好。中国朋友们和我们都请求马克斯同志把“信使”出发的时间推迟几天（3到7天）。可是他对此无动于衷，说：“21日前必须准备好一切——我再不想知道什么。”任何理由对他都不起作用：无论是我们来不及准备好一切材料的情况，也无论是你们期待的得到关于直至最近这里所发生一切情况的确切报告。马克斯同志说：“这不关我的事。信使不是远东局的，而是我的。我什么时候想派他去就什么时候派他去。不能推迟。”于是我们只好服从这位丧失理智者的毫无道理的要求，不然我们怎么办呢？所有这一切又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呢？我们不能仔细地为你们准备好一切材料。中国朋友们也不能把一切都转送给你们。所以，你们显然不会收到详尽的情况报告。

远东局提请小委员会讨论以下建议：鉴于马克斯同志经常妨碍远东局的工作，这种妨碍最近已经带有直接危害运动的性质，我们建议撤消马克斯同志的国际联络部驻远东领导人的职务并任命亨^③同志接替他的职位。

致同志式的敬礼！

远东局

全宗495，目录19，卷宗117，第38—39页。

打字稿，副本。

① 指中共六届三中全会（见第346页注③）。

② 指中国共青团五届三中全会（见第395注①）。

③ 可能指亨里——R. M. 鲁德尼克。

314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 给皮亚特尼茨基的信

1930年10月20日于上海

皮亚特尼茨基同志：

所有政治性通报已经在远东局另一封信中作出^①。我只想谈谈与我在动身前与几位同志所进行的谈话有关的几个问题。

首先应该是资金问题。从我们和中国朋友们的电报^②中您已详细地了解了极其严重的财政状况。在这里我只想补充说，如果对这种状况负有责任的同志不受惩罚，那么这简直就是共产国际历史上前所未闻的事件。问题已经具有这样的性质，财政混乱在很大程度上已经造成了党、共青团、甚至工会整个工作的混乱：中国的政治局，由于不能按期收到经费，也不知道明天是否会收到和能收到多少，就到处奔波，开始向私人借债，最后为了党的需要经常花工会的钱。政治局一些优秀的委员不去做政治工作，却花费整天整天的时间咒骂我们并为了党的某种需要而到处找门路去弄几个美元。我们认为，在这里向您重复中国同志的一切理由是多余的，我们只向您提出请求：为了中国运动的利益请解决资金问题。马克斯^③是不会支付的。也不要指望从他那里挤出钱来。请派一个工作小组来，它

① 见第312号文件。

② 见第307号文件。

③ A. E. 阿尔布列赫特。

会向您讲述马克斯那里的真实情况。他的确陷入了绝境。不是因为他喜欢这种局面，也不是因为他乱花钱。不是的。但是，由于他不具备相应的素质，也不是生来就是慷慨大方的人，他被卷入某种我们不清楚的商贸业务，他不仅不能解脱，而且会使事业造成很悲惨的结局。您越是尽快来解决这个问题，您挽救他的可能性就越大，或许甚至可以避免意外的灾难。决不要再往马克斯那里寄钱了，因为由于他同银行的依附关系他已经不能从银行按期收到钱款了，因此出现了各种困难和误会。

除了拨给中国的经费问题外，还有援助其他国家例如朝鲜的财政问题。你们拨给朝鲜的预算已经确定（关于此事米夫和其他同志曾对我讲过）。这里来了一个人做这项工作^①。的确，他带来了自己三个月的薪俸，但没有为开展工作带来一分钱。用于吃饭的钱他是有的。但是要知道，他到这里来不是为了花掉自己的薪俸，他没有钱用来开展朝鲜的工作，就连国际联络处也没有从您那里得到任何消息，说明有这个开支项目。请尽快电告国际联络处，应该付给朝鲜多少钱款，否则工作会陷入停滞状态。

其次是印度支那问题：那里正在开展的运动要求尽快研究这个问题。几个月前远东局已经在那建立了经常的联系。我们正在为召开代表会议作准备。这就需要路费等等方面的开支。国际联络处没有得到您那里的消息，它是否应该支付，支付多少，等等。为了每一个美元不得不进行长时间的争论。国际联络处暂时提供了资金，但不是用于印度支那，而是列入远东局的支出报告。现在我们提出以前我们曾经不止一次地提过的建议，请您决定：按几个月前远东局建议的款额为印度支那确定预算。请电告国际联络处：它应该为印度支那支付多少钱和从哪项基金中支付。

还请拨给菲律宾一笔钱，哪怕临时性的或作为一次性的补助。

^① 何人不详。

其实您比所有人都更清楚，有多少时间和精力耗费在这些事情上。请解决这些问题，以使我们知道，不是由于我们的恐惧和凭良心，而是经过您同意才进行这些开支的。

远东局本身的状况

财政困难也影响到远东局的工作。中国同志们这些不断的其实也是正确的“请给经费”的要求和远东局在这方面的无能为力，造成了过分沉重的气氛并在很大程度上使我们的工作处于瘫痪状态。前几天莫斯克文^①同志——一位很平和和深明事理的人，就所有急待解决的问题讲了一番话，这番话的意思可以归结如下：“你们在这里自作聪明地说：请出版报纸、呼吁书，请派人到苏区去，请组织苏维埃代表大会等等，可是我们却没有一分钱，用来招待来上海办事的人。我们失去了许多人（如汉口的军事工作者^②），只是因为没有钱租用住宅。”你们应该明白，在提出这样的论据之后，我们只能对莫斯克文同志讲话的不合适语调作出反应，但这只是一种形式，在政治上我们是完全无能为力的。我们只能做出一种回答：“我们能做什么呢？我们已经发了电报。”莫斯克文同志责怪我本人说，我同他一起在您那里谈到资金问题时，我未能清楚地提出问题，因此我甚至使他陷入迷途，并劝他，既然皮亚特尼茨基同志说，钱会汇来的，所以就没有必要再回过头来谈这个问题了。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一切具体建议都停留在纸上。我们没有足够的理由向中国朋友们施加压力，更不要说财政问题不作通盘解决，就会使我们在其他国家的工作陷入瘫痪，使我们难于寻找住所等等。

① 周恩来。

② 刘云。

大家都感到高兴的是，有三位同志^① 到这里来执行特殊工作任务。虽然他们到达指定地点的行程很困难，并且很难说什么时候他们才能到达，但是他们在这里就会有很大好处。中国同志们感到很缺少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员。在这里可以组织各种问题的短期培训班，这在不久前是不可能的，而现在这项工作可以启动了，因这几位同志都是这些问题的专家。也不排除有可能利用这几位同志做其他工作。当然，这样的工作不会使这几位同志感到满意。他们很想立即到达他们要去的地方。可是，正如我们已经提到的，他们到那里去的行程是很成问题的。中国同志还没有可靠的路线，或者哪怕大体可靠的路线。暂时有的只是一些方案。此外，这几位同志也没有关于他们在某个公司工作的证件，这就更增加了行程的困难。这与我们大家都有关系。

我在与他们的谈话中特别强调了在这里建立合法存在形式的必要性。为此，一方面需要资金，另一方面需要某个或某些公司的证件。我们当中谁都没有这类证件。在东方没有无一定目的而旅游的人。每个人都应该有某种“生意”，哪怕是最平常的生意。而在当地的 9 个人中谁都没有任何生意。没有这类证件，我们就不能离开当地，而这自然会给我们的整个工作带来危害。此外，由于警察方面不断增加的刁难，工作也难以开展，总之，当可能出现危险时，就不得不停止工作。必须让这些同志中的某一个人考虑这个问题，并创造出在东方逗留的更现代的方式和条件；必须尽快地实行相应的建议。

最后，直至前不久，您都向国际联络处和我们通报来这里的每一个同志的情况。这一次不知为什么只告诉来这里的人中的一位

^① 指以 A. I.O. 盖利斯为首的苏联军事工作人员小组，该小组于 1930 年 9 月底抵达上海。详见第 336 号文件。

（远东）局委员^①，而关于其他人则只字未提。突然到来是不受欢迎的，因为这会造成住处、接待等等方面的困难。

这里附上中国同志提出的印刷所设备预算。上海印刷所和“Печатане”^②的全套设备最近遭破坏，无疑需要大量新的投资。很难说，您是否应该拨给他们所要求的款项。但是由于不是因为中国同志的过错而存在的财政混乱（少支付 16 万墨西哥元），从正常的预算拨款中为他们购置新设备开支是不可能的。因此，只剩下一个来源——您。也只有这种方案可行。如果您没有可以从中拨给中国同志用于印刷所的款项，那么您现在就寄钱补偿他们最近少收到的数额。如果他们收到 16 万墨西哥元，那么很清楚，即使没有您的专款支援印刷所，也是可以过得去的。

印刷所遭破坏是一个印刷工人^③的奸细行为所致，而且是很典型的奸细行为。这个同志曾长期在这里工作，从来没有被逮捕过，与国民党没有联系。可是有一天早晨他通过邮局给国民党的公安局写了一封信，提供了印刷所的地址，但是他隐瞒了自己的姓名。他只是报告说，当警察来逮捕所有工作人员的时候，为使警察知道，是谁向警察报告了地址，在写信人面前将放着一些标志报纸名称的标记（字母）^④。工人（共有 17 人）中是谁干了这件事，还不得而知，因为所有人都还在监狱里。

关于党的组织状况说几句。我们还没有收集到关于最近党组织状况提高或下降情况的比较详细的材料。暂时我们只能向您报告我们对中央机关的看法。中央机关的生活和工作依然如故。庞大的机

① 可能指 A. K. 盖利斯。

② 《红旗》（德文 Rote Fahne）俄文拼音，指《红旗日报》（见第 312 页注⑤）。

③ 何人不详。

④ Characters—（英语）印刷符号。

关（因为有100人），大家都在上海转来转去（中国同志们解释说，没有钱到各地去）。学生占多数，机关与工厂和支部联系很少，不是在组织方面，而是在政治方面，因此存在着抽象的说教、夸夸其谈的风气。莫斯科文和斯特拉霍夫^①同志回来后，政治局本身的工作有改进。两个月来召开了中央全会^②、军事会议^③、工会全会^④，正在召开共青团中央全会^⑤。前三个全体会议开得很好。这说明，虽然李立三同志的政策引起了混乱，但是党内的保密工作和纪律并没有削弱。在这几次全会上中央领导补充了新的人员，关于这些情况中国同志将向您报告，我们就不再重复了，贯彻落实这些全会决议的情况比较差。直到今天决议还没有传达到党员群众中去（或许上海在这里是例外）。不容怀疑的是，资金缺乏有相当大的影响，但决不能用这个实际情况来解释一切，就像中国同志所做的那样。在这里有与工作制度本身不太顺的东西。究竟是什么，还很难说。或许是过于庞大的机关、大量的工作人员、在政治局和支部之间有众多的部门和层次。除政治领导之外，这个问题是最重要的问题，我们远东局也应该帮助解决。

政治局和远东局之间的关系很好。这种关系能持续多久，取决于许多因素，首先是您对经费问题的解决。

以“亲爱的同志”为标题的信是由我们第五位新朋友^⑥写的。

受代表团^⑦委托 邵^⑧

① 麦秋白。

② 指中共六届三中全会。

③ 指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扩大会议。

④ 指中华全国总工会执委会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

⑤ 指中国共青团五届三中全会。

⑥ A. IO. 盖利斯。

⑦ 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

⑧ И. A. 雷利斯基。

[附录]

[中共中央政治局给共产国际
和执行委员会的信]
致皮亚特尼茨基同志 印刷所和报纸

我们总共只收到 1 万美元即 3.3 万墨西哥元用于此目的。不过，如果把对报刊 6 个月的资助算在内，加上印刷所设备和安装的费用，总计为 12.15 万元。这些报纸的收入，把报酬和捐助算在内，不会超过 500 中国元。所以，除了已收到的 1 万美元，还需要约 2.7 万美元。兹将总预算附后。各种项目的详细预算在远东局那里。

中共〔中央〕政治局

预 算

1. 印刷所设备和安装的一次性开支

1. 上海新印刷所	13000 元
2. 旧印刷所的设备	4000 元
(出于大量秘密工作的需要)	
3. 香港或武汉的新印刷所	6500 元
4. 天津印刷所的新设备	500 元
5. 香港或武汉的玻璃板印刷所	500 元
6. 新满洲印刷所	4000 元

28500 元

2. 经常性（每月）开支

1. 上海的（中央的）报纸、日报 ^① 、日刊 ^② 和月刊（已经出版） ^③	7500 元
日报按 10000 份需支出	800 元
2. 天津的报纸	1600 元
3. 满洲的报纸	1600 元
4. 武汉的报纸 ^④	2000 元
5. 香港的报纸 ^⑤	2000 元
<hr/>	
	15500 元

全宗 495，目录 19，卷宗 117，第 35—37a 页。
打字稿，原件。

① 《红旗》，指《红旗日报》。

② 看来指《实话报》。自 1930 年 10 月起每五日出一期。在中国找到的最后一期为 1931 年 3 月 5 日。

③ 指《布尔塞维克》杂志。

④ 该报的名称不详。

⑤ 指《香港小日报》（见第 285 页注①）。

315

埃斯勒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①

1930年10月20日于上海

致共产国际执委会

亲爱的同志们：

今年6月在你们关于远东局与政治局^②冲突的决议中说，我们在这里犯了一个严重错误，投票赞成政治局在南京和汉口举行暴动的决定^③。

我完全接受你们在该决议其他各项中提出的批评，同时请你们重新审议这项指责。无论我还是整个远东局，在这个时期从来没有支持过南京和汉口的暴动。当我们得知可能发生汪精卫支持者想领导的自发士兵暴动时（见8月1日局的决议）^④，我们是同意了的，虽然附有一些保留条件。这是同意在南京组织士兵暴动。

我的错误在于，我给政治局发了一份未加特别说明的电报^⑤，根据这份电报形成了你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但是我声明，在这个问题上我连一分钟都没有动摇过，并且竭尽全力贯彻你们的决议，从一开始我就反对任何冒险主义的企图。

① 文件上有批注：送皮亚特尼茨基同志阅。

② 中共中央政治局。

③ 见第259号文件。

④ 见第261号文件。

⑤ 可能指第252号文件。

罗伯特斯^①

全宗 495，目录 19，卷宗 117，第 29 页。

德文打字稿，原件。

① Г. 埃斯勒。

316

盖利斯给别尔津的信

1930年10月20日于上海

亲爱的老头子^①：

罗伯特斯^②同志写的关于党内状况的信也随这个邮班寄走。我同意他写的信。你会从共产国际那里得到这封信的副本。我不想重複罗伯特斯已经写过的内容。我只就一些问题作些补充。

1. 在国内最重要的工业中心和生活中心的工人当中党的影响是非常小的。例如在上海，根据中国同志的资料，总共只有大约2500名红色工会会员。实际上，可能还要比这个数目少。汉口、广州及其他中心的情况也是这样。其原因有两个：第一，在最近一个时期，党实际上根本没有做工会的工作。此外，由于中央在李立三领导下捍卫和贯彻全国总暴动的“理论”，包括北方诸省在内，那么实际上它就毁掉了已有的工会。现在应该重新开始做这方面的工作。

第二，国民党的恐怖活动严重地妨碍组织工会的工作。现在，即在目前形势下，组建强大的红色工会，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党对工人影响薄弱的标志是7月和8月在上海组织的示威游行以及纺织工人和人力车工人的罢工。在这些游行行列里几乎没有工人，罢工的规模也很小。党未能发动起来多少群众。

① Я. К. 别尔津。

② Г. 埃斯勒（参见第312号文件）。

现在，在李立三认识到自己愚蠢作法的那次中央全会^①后和中华全国总工会全会^②后，以及由于我们局在这个问题上向中央施加了强大的压力，可以指望，党将开始研究工会运动的问题。

2. 在一些地区，党员数量太少。在上海大约有1200人，在汉口有150人，在广州也约有这个数目。此外，由于遭到挫折几乎每天都有一些人离开党的队伍。他们不经过任何程序就被杀害。不仅屠杀党员，而且对于一般被怀疑的人也格杀不论。我在这里的时候，有17名工人的党的印刷所遭到破坏，在汉口有6人的通讯机关也遭到破坏（9人被枪毙），在四川有53人被处决，等等。这只是我们从报纸上了解到的情况。实际上遭到破坏的组织和被屠杀的人数还要多得多。所有这一切严重地影响党员数量的增加。工人在党内只占2%（中国人说占6%）。

3. 关于苏区问题，根据共产国际的路线准备了一些报告。这些报告提供了关于苏区工作情况的某种印象。报告都是根据报纸上的报道写的。在这里谁也不能详细地讲述那里的情况，因为党没有直接从我们的人那里得到通报。没有一个苏区的代表出席中央全会、工会全会、军事人员会议^③。中央有时也收到零零星星的一些消息，但是很少。这无论如何不能提供关于那里情况的比较充分的印象。党对苏区了解的程度，同资产阶级报纸差不多，因为对他们来说，几乎唯一的消息来源就是报纸。

一些人陆续被派往苏区，但是他们离开上海后就再也不知道他们的情况了。一个半月前，中央派出一位委员（少先队员^④同志）去那里。目前他回来了，因为他无法找到我们的部队。今天我将和他

① 指中共六届三中全会。

② 指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常委会扩大会议。

③ 指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扩大会议。

④ 关向应。

在一起，在和他交谈后我要在单独一封信里讲一讲我们和中央局去苏区的问题。直到现在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进展。由于这种情况，由于缺少与苏区比较经常的联系，我不敢对那些根据报纸上的消息写成的报告作什么评述，这些报告你会在到共产国际执委会那里去的邮班中找到。苏区对于我以及对于这里的任何人来说，都是很少能感觉得到的地方。这些报告中比较正确的部分，就是一些军的驻地和人数。这些材料是在数月中积累的和从偶然由那里来的人那儿以及报纸上得到的。对于在各次战役中表现出来的一些军的状况可以得出一些印象。无疑，朱德和毛泽东的军以及处在他们影响下的两个军（第3军和第12军）是最好的。彭德怀的军以及在他影响下的两个军（第8军和第16军），与它们差别不大。

如果报纸对我们部队在第二次进攻长沙^①期间在该城及其郊区的行动的报道是可靠的（我认为，基本上是可靠的），那么这说明我们部队的党组织和指挥人员在政治上和军事策略上简直是空前的无能，比方说，在彭德怀的部队占领长沙之后，他们就立即开始烧毁所有外国人的住房和各种国家机关和商贸机构的办公大楼。四天当中竟没有建立政权。彭德怀不是去追击被击溃的部队^②（政府的部队），而是呆在城里等待全国的暴动。事情竟发展到这样的地步，到第十天他突然遭到敌军攻击并被赶出城市。

从报告中可以看出，许多红军部队参加了第二次进攻。但是长沙城市已经加强了防御（在那里有一个德国军官出谋划策），四周架起了电网。因为不知道怎样突破电网，我们的人就把近1000头公牛点燃尾巴冲向电网。自然，这种做法毫无结果。

对军事行动没有统一的领导，应该认为这对失败也有影响。在这方面事情竟然如此糟糕，以致两个军（第4军和第3军）与第5军

① 指1930年8月末9月上旬红军对长沙的进攻。

② 指何键的部队。

和第8军互相对打了一整夜。现在我们的部队驻扎在南昌及长沙以东的地区——三角地带。目前我们尚不清楚，他们为巩固自己的队伍在那里采取了哪些具体措施。

4. 苏区目前的形势是这样的：我们的部队掌握着斗争的主动权。政府军处于防御状态。力量对比曾经是这样：他们没有能力提出消灭红军部队的任务。现在形势发生了一些变化。进攻长沙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转折点。当然，现在敌人还没有掌握斗争的主动权。但是我们部队的情况也发生了变化。他们现在不再发动更多的战役。其实，这是正确的，因为长沙暴露了我们在组织上、政治上和战术上整体的无能。现在主要的问题是尽可能从组织上和政治上加强我们的部队。

我们在长沙遭到失败正是在北方形势发生变化的时候。正如我已用电报报告的那样^①，在北方，南京和奉天之间的战争可以说以暂时的妥协而告结束。当然，目前的状态不会持续很久。北方和南京之间的战争绝对不可避免。但是现在南京和奉天在各种会议上就山东问题、天津问题、陇海铁路问题等发生了纷争。这要用去一段时间。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就能加强对苏区的武装斗争。关于“赤祸”的喧嚣大大加强。社会舆论准备在比较认真地进行。蒋介石已经从前线撤下一个师并将其调往汉口。还有两个师被撤下来了，暂时驻扎在浦口。为了与红军作战不排除还会撤回一些部队。在湖南和湖北正在组建新的部队，以便同苏维埃作斗争。这一切都说明，反动派现在企图同我们进行一番认真的较量。

我个人无意过高地估价这一切。问题在于，何键的部队没有多大战斗力，他们已四分五裂，不大适宜同我们作战，至少在苏维埃政权已存在很长时期的那些地区是这样。下面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当我们的部队从长沙撤退时，何键都未能组织追击。部队不愿意进

^① 原文如此。

攻。苏区的农民对白军非常仇视。这就像德国人占领时期的乌克兰那样。至于那些从前线撤下来的部队，他们的情况也并不妙。未必能够指望他们会有多大积极性。由于与北方人作战他们已经相当疲惫了。还遭到了分化瓦解。可以说明这一点的是蒋介石第3师的一个团举行暴动的事实，该师被认为是最有战斗力的师之一。

但是不管怎样，现在应该考虑到敌人在加强对我们的斗争。我们已就此问题同政治局谈过，并且提出了旨在加强苏区防御能力的一系列建议。这些建议可归结如下：

- (1) 11月7日在全国各地组织示威游行，口号是保卫苏区；
- (2) 加紧筹备苏维埃代表大会；
- (3) 加快中央局前往苏区的行程，也要尽快安排我们去那里；
- (4) 采取一系列瓦解和组织破坏行动的措施；
- (5) 派工作人员到军队中去，招募工人并将他们也派到军队中去；
- (6) 组织与苏区的固定交通联络路线。

中央已同意这些建议，但是由于党组织工作薄弱，不能指望所有这些措施都能得到必要的贯彻执行。

5. 昨天我与中央委员“少先队员”同志谈了话，他曾被派往苏区，但是未到达就返回了。虽然他本人没有看到军队，但是他从当地党员那里听到许多情况，并且有机会观察到在战斗期间长沙地区农民的情绪，等等。他的报告的实质是：

(1) 他没有到达是由于下列原因：在存在警察、军阀、富农和豪绅的道道搜查情况下，他无法穿越斗争地带。他说，在搜查时我们的许多同志被逮捕了，凡是不能对警察或当地农村资产阶级卫队提出的到哪里去和去干什么等问题作出令他们满意的回答的人，统统枪毙。他们枪毙人可以说是为了以防万一。据他说，在靠近前线的地带笼罩着最野蛮的恐怖气氛。

(2) 农民的情绪很好。他们都拥护红军，帮助红军，在白匪到

来时拒绝服劳役，等等。他们分化瓦解白匪部队。用1000头水牛冲击长沙的电网，对农民产生了不好的影响。水牛倒在了机枪火力下，大量水牛留在了战场。农民失去能干活的牲畜。白匪在反对我们的宣传鼓动中成功地利用了这一点。

(3) 有些地方的苏维埃政权是选举产生的，有些地方是由党来掌握政权（党和政权是一回事）。毛泽东和其他人对这个问题（建立政权）还重视得不够，说什么，在战争期间不必做这件事。

(4) 军队穿上了制服，武装起来了。已经有一些大炮，但是没有发挥作用，因为谁都不会使用。

(5) 他不知道，在进攻长沙（第二次）期间谁在进行总的领导，因为他没有从当地的工作人员那里得到任何说明。但是参加进攻的各个军的行动协调工作做得很糟糕。参加第二次进攻的有第3、4、5、8军。何键的一个师被击溃。据说，如果没有擅自撤到后方的第8军一个师长的叛变（师长后来被枪毙，政委被撤职）^①，如果总的领导稍微好一些的话，那么长沙就可以攻占。应该同意这种看法。从资产阶级报纸的报道中也可以得出这种结论。

6. 据长江局^②（汉口）的来信说，党在湖北的东北部地区执行一种从肉体上消灭农村一切社会敌对分子的政策。这就造成这样一种局面：中农对我们政策的正确性失去了信心。党员们自己也感到惊慌失措。信中指出，那里的苏区在逐渐缩小。据周恩来说，在其他一些地区也在执行这种政策。

7. 中央军事部制定了红军的编制和组织序列表。军事会议批准了。我和中国人一起认真地审查了整个这项工作。我作了许多修改，当地的工作人员都同意我的修改意见。他们弄出了许多错误。我并不认为，我们修正了这些序列表之后，就大功告成了。可能那里还

^① 何人不详。

^② 指中共长江局。文件没有找到。

有不少不清楚和不协调的地方，等等。并且实践还会做出许多修正，至少各部队都要有一个组织序列表。当然，实现这个序列表需要很长时间。部队在一个半到两个月之后才能收到它。如果今天晚上我能从中国人那里得到这个图表，那你就在这批邮件中找到它^①。采用的是三三制组织形式：每个班为 10 人，5 个班组成 1 个排，3 个排组成 1 个连，3 个连组成 1 个营，3 个营组成 1 个团。1 个团大约有 1500 人。3 个团组成 1 个师。政治指挥员的权利和职责，也像党组织和社会组织的地位一样做了正确的说明。

8. 我参加的那次军事会议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约有 24 人参加，他们是中央的军事工作人员，而主要是各省委书记负责军事问题的书记。

会议讨论了苏区的任务和红军的组织序列表、瓦解〔敌军〕的问题、游击队中的工作、工人自卫队的组建，等等。决议是正确的，只存在贯彻执行的问题。

9. 我已经发出密码电报，请求寄给我 1 万美元^②，理由是：

(1) 需要 4000 美元用于建立通往苏区的固定路线、向苏区派遣人员、寄发指示等。在这方面迄今为止都以手工作业方式进行工作。人员派去了，但是在他们出发后，谁都不了解他们的情况。

他们中一部分人失踪了，一部分人在路上耽搁好几个月，而到达的人员也无法报告什么。在与护送站没有建立固定的路线之前，军队的工人化、指导人员的派遣等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只能停留在纸面上。中央没有钱。周恩来特别请求我向你（他不认识你）提出这个问题并给他们以帮助。我们局认为有必要帮助他们，因为中国人的经费状况的确不好。他们不能经常收到从共产国际方面寄来的钱，而开支却很大。举例说吧，印刷所被捣毁了，要建立一个新的印刷

① 文件没有找到。

② 文件没有找到。

所需要 1 万墨西哥元 (3000 美元)。刘云牺牲了，主要是他没有钱租用住宅。失去了一位很好的工作人员 (我已发去关于他的情况的密码电报^①，应该帮助他的妻子^②，她在莫斯科)，工会工作现在需要大量的开支，等等。我请求寄这 4000 美元来。

(2) 应该在这里组织报务员培训班。这是比较省钱，也比较好的办法。条件是有的，有一位无线电工程师、党员 (中国人)，他和另一位同志可以办这件事^③。现在和将来对报务员的需求都会是很大的。有一个在上海组建学校的方案，每期 5 个月，培训 20 人。需要 1500 美元。等待从莫斯科派来的 5 个人满足不了需要，应该考虑到可能的失败和重新培训。

(3) 我编制的用于无线电台及其它运输的预算很小。无线电台要比我所指出的价格贵得多。这是因为应该为每一部电台配备马达和发电机，因为当地没有给蓄电池充电和一般工作用的电能。这种马达和发电机很贵。结果是，一部电台需要 700 到 750 美元。而一部用于向海参崴发报的 100 瓦的大型电台需要 1200 美元，现在我已经为自己预订了一部 100 瓦的电台、为上海预订了一部 50 瓦的电台和为各军预订了两部 15 瓦的电台。我所有的钱都用在这上面了。100 瓦的电台过三周就能做好，50 瓦的也一样，而两部 15 瓦的电台要经过两个月才能准备好，这些电台都是从美国订购的，因为这里买不到 (没有马达和发电机)。价格是很贵的，但便宜的又买不到，在这一点上我们的报务员和中国的报务员都是赞成的。现在再订购 5 到 6 部 15 瓦的电台，需要将近 3000 美元。这种电台很适用，我们已经试用过了，并且很轻便。

(4) 为了向苏区输送人员，需要在上海组建一所军事政治学校

① 文件没有找到。

② 何人不详。

③ 何人不详。

（学习期限为三周）。这样的学校费用不高，但是中国人连办此事也没有钱。一开始起码需要有 500 美元。暂时我在这里可以领导这所学校，然后我培养出了干部，中国人自己就可以工作了，这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请用电报答复我。钱可以从德国汇到某一家日本或美国银行我的名下。

10. 我们去苏区的问题——这是我们局以及我们同中国人的会议的议事日程上不断提出的一个问题。关于中央局去苏区的问题也是如此。可是，直到现在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考虑过各种可能的方案，但毫无结果。一个外国人现在进入苏区要比中国人更困难。我向中国人提供 1000 美元作为这项工作的费用，并指出，我们准备步行几百俄里，不要求任何舒适的条件，还提出了各种方案，等等，即使只有 20—30% 的成功机会也准备行动。但毫无结果。这个问题使我感到极为不安，其他同志也是这样。现在中国人已派侦察人员去探听进入苏区的可能性，但是这需要时间。正在采取某些措施，组织通过汉口和厦门的路线。可是这样做是否会有结果，我不知道。如果有 4000 到 5000 美元花在旅途上，那么经过一两个月可能会有结果。此外，我们当中谁都不掌握旅行用的英语。总之一句话，事情很糟糕。这个问题简直使我绝望了，因为大家都感到，我现在不能履行责成我去完成的指示（去苏区）。此外，那里极其需要领导。我觉得，在那里只要有稍微正确一点的军事领导，就可以有所作为。苏区在很大程度上需要有财经政策和执行土地政策等方面的政治领导。即使中央局和我在那里，也需要有一些熟悉这些问题的人。如果在弄清楚前往苏区可能性的问题之后，共产国际执委会决定再往那里派去一位在政治上经过很好培训的同志，那就最好不过了。可以从我们局^① 派一个人去。

① 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

11. 我现在很忙，工作够多的了。其他两位同志忙碌的程度小一些。如果开办无线电学校和军事政治学校，对他们来说工作也就够多了。

我想强调指出恶劣的工作环境。由于政权当局的恐怖活动，只能在晚上会见中国人。白天领导同志不能在大街上露面。他们都是出了名的人，警察正在寻找他们。我和马〔雷舍夫〕的境遇也是这样恶劣。他已经在街上碰见过五个在莫斯科时的熟人，有一个已经脱离了党。而曾经在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和军事学校学习过、尔后脱离了党的这类废物，即认识我们的人，还真不少。

非常多的精力和时间要花在保密上，也就是要创造一些合适的工作条件。对于那些长期在这里工作的人来说则不同，他们已经习惯了这种环境。对于我们这些离开红军工作的人来说，简直难以忍受。这也是人们责备我们在前往指定地点的问题上等得不耐烦的一个原因。

好象就这些。这封信非常不连贯，不过这也是环境所迫。是的，现在马〔雷舍夫〕好像倒挺好。他不喝酒而且表现也很不错。关于另一位^① 没有什么可说的，他是个好小伙子。

致同志式的敬礼！

托〔姆〕^②

关于军事、政治、组织以及其他问题的材料已送共产国际执委会。已责成 M^③ 同志接受这些材料的副本。这些材料提供了这里所发生的一切事件的某些情况。

① A. C. 费尔德曼。

② A. Ю. 盖利斯。

③ 可能这里是指 H. K. 马马耶夫。

我想随下一次邮班作出更详细的通报。现在情况是这样：第一，不会再寄邮件，也没有准备好，第二，我还没有来得及认真地思考所有的问题。不懂英语有点碍事，但是我会很快解决这个问题的，一旦掌握了英语，在阅读报纸方面就会好一些。

弗雷利赫^①

全宗 495，目录 19，卷宗 117，第 31—34 页。

打字稿，副本。

① A. IO. 盖利斯。

317

斯托利亚尔给洛佐夫斯基的信

(摘录)

1930 年 10 月 20 日于上海

秘密

亲爱的亚历山大^① 同志：

我们已经在最近一封信里（大约 10 周前）^② 比较详细地讲述了党在这里所经历的非常困难的时期，以及党的领导人的政治错误对党整个工作的影响，特别是对红色工会活动和组织状况的影响。从那以后发生了许多事件，并且弄清楚了许多情况，所以现在我们可以断定，3 个月前凭预见和直觉作出的指示^③，现在完全得到了证实（请您看一看随这次邮班给共产国际寄去的政治性信件）^④。

只有紧密联系党在最近 3、4 个月间的政策和策略，才能理解我们这里工会的目前状况。否则就会把我们对红色工会活动和组织状况的现实主义描述错误地说成是出于绝望的悲观主义报告。其实这里根本没有悲观主义，更不要说绝望了。

我认为，在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的全部实践中很少能找到

① C. A. 洛佐夫斯基。

② 可能指 1930 年 8 月 5 日斯托利亚尔给洛佐夫斯基的信（见第 265 号文件）。

③ 可能指《中国共产党在职工运动中的任务》提纲草案（见第 257 号文件）。全文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6 册，第 608—615 页。

④ 见第 312 号文件。

类似的情况，即党的错误政策的有害后果如此明显地、迅速地和直接影响到红色工会的活动和组织状况。可是最近3、4个月来我们能够在这里可以说亲眼目睹这种情况。

目前时期和现时状况的总的情况是这样：

以前的党的领导人错误地估计中国的客观形势和革命浪潮发展的速度。他们不懂得，革命形势在中国各个不同地区发展是不平衡的。由于农民地区（湖南、湖北、江西）革命进程的迅速发展，以及红军发动的一些战役，他们简直忘乎所以了。全党确定了在全中国立即举行武装暴动（从上海开始，包括天津、哈尔滨及其他城市）的方针，这种毫无准备的暴动必须在24小时内举行。一开始根据上级的命令举行暴动或者更确切说发动暴动，然后就会看到做什么。（一天晚上，政治局的三位领导同志对我们这样说：“南京、武汉和上海的暴动不能等到把工业中心的群众都组织起来的时候和为协调一致的行为创造了前提的时候；^①今天夜里动身去汉口，在那里全权发动暴动。”）从党的中央领导那里发出并在到处传播一个荒谬的论点，这个论点在所有文件、呼吁书、报告中都可以看到，认为似乎“工人们不希望举行罢工和示威游行，而想现在就举行武装暴动”（原话如此）。或者例如李立三对我们局^②说，党在任何时刻都能在南京组织有4万人参加的示威游行，这就意味着武装暴动，因此我们应该批准立即举行武装暴动。

在此基础上产生了一个完整的“政治体系”，一条完整的路线，直到承认有必要发动世界大战，使红军经过蒙古进行远征，发动世界革命等等。由此产生了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相对抗的很大很严重的危险。

如果我们在工会工作和工会组织方面遇到相应的偏差、组织涣

① 可能指少先队员——关向应。

② 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

散和混乱，那是毫不奇怪的。（对青年组织也是这样。）因为所有这一切都是党的错误政策所导致的合乎逻辑的后果。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红色工会实际上已经被取消。如果还在三个月以前，这样的论断会在内部把我们吓坏了，那么现在就完全不必怀疑它的准确性了。现在党和工会运动的领导同志都在议论这件事并且都承认这一点。我不能比中华全国总工会的一位领导同志更好地说明业已形成的局势，该同志向我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在俄国革命过程中工会也被取消过，是这样吗？”我不可能比这位同志的提问更好地说明业已形成的局势。因为整个方针都定在立即举行武装暴动上，所以成立了无所不能和无所不包的行动委员会^①，这个委员会实际上取代了红色工会、中华全国总工会和上海工会联合会，而且承担了工会的全部职能。因此，工会就降到了党的一个不明确的附属物的地位。更谈不上工会组织的独立性了。红色工会与下层机构和企业的联系完全被破坏（这在上海纱厂、丝厂和造船厂工人战斗期间清楚地暴露出来了，当时我们工会与群众没有任何联系，他们根本不知道，有多少工人和在什么情况下举行罢工）。行动委员会（实际上这是“革委会”）的所有呼吁书和文件（命令）中只有两个口号：“总罢工”和“武装暴动”。只字不提企业中工会的组织活动、日常斗争的准备和实施。少数敢于在这种气氛中说出哪怕一句怀疑或批评的话的同志，就被扣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和被堵住嘴巴。中华全国总工会的领导同志被禁止同我们谈论“政治和政治组织问题”，因此，几个星期来我们和同志们的会议完全陷入了瘫痪状态并且毫无结果。每当我们谈到行动委员会问题和中华全国总工会或上海工会联合会的组织措施问题时，我们就会听到这样的回答：“我们不能，也无权同你们谈这个问题。”每当我们哪怕只有一句话涉及到具体的组织任

^① 见第273页注①。

务，每当我们想谈谈工人的日常经济斗争（纺织工人、丝厂工人等等当前的罢工在我们面前展现出很大的可能性）时，我们就会被看作是日常经济斗争的狭隘支持者，说我们看不到也不理解武装暴动的广阔道路（难道李和政治局其他成员就不是断定和不止一次地写信说共产国际不理解中国当前的形势和对它作出了错误的估计吗？）

最近3、4个月的罢工和战斗向我们揭示了红色工会组织的软弱性和真实情况。这里包括：法租界电车工人的罢工，喜和纱厂的罢工^①，丝厂女工和码头工人的罢工，最近上海人力车夫的罢工。为了不重复和避免冗长的叙述，我请您看一看随这次邮班寄去的信，这封信是我们当时就这些斗争写给中华全国总工会和上海工会联合会的^②。现在我们明白了，红色工会在这些斗争中和在整个这个时期都处于软弱无力的状态。轻视组织工作，轻视企业中的日常活动，轻视招募工作和对罢工运动的准备，在当时关于形势进一步发展的观念居统治地位的情况下是不可避免的。（李立三同志对我们说过并写过：“暴动之后我们就能在最短的期限内组织起数万或数十万工人！！”）

8月我们在写给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和政治局^③的一封焦急不安的信中谈到了业已形成的局势和立即纠正错误的必要性。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讨论了我们的信并认为它是正确的，而与此同时政治局在给我们的回信中却坚决否定了我们所论述的一切（附上我们信的副本、对它的答复和其他文件）^④。

这里还需要明确指出，一些所谓的联合会，多数只是存在于纸面上（也许海员和铁路员工联合会以及上海市政员工联合会除外）。

① 原文如此。

② 文件没有发表。

③ 见第281号文件。

④ 见第284号文件。

妇女和青年工作完全被忽视了（由于没有准备好和缺少与企业的联系，几周前打算在上海召开的青年代表会议也未能举行）。组织农业工人工作还没有开始。与苏维埃地区还没有建立任何联系，而关于海关工会的工作也没有任何确切的消息。我们的红色工会迄今为止还未能在任何一个工业部门把分散的局部战斗协调起来。几个月来一直叫喊“总罢工，总罢工！”但只在个别地方有微弱的回声（这个口号在远离中心的外地的报告和呼吁书中还可以看到），完全是消极而无力的回声。

但是这期间发生了一些重要的事件：一些负责同志从莫斯科回来了^①，为纠正错误，共产国际通过了决议并进行了强有力的干预，长沙的失败^②使人们清醒了——大大清醒了。看来，整个党的领导真诚地认识到了受到谴责的政治路线的错误性和危害性，召开了中央全会^③、中华全国总工会全会^④。

党中央全会和中华全国总工会全会结束了第一个狂热的时期，揭开了一个整顿和改组工作的时期。在这两次以自我批评为主的会议上，人们承认了所犯的严重错误并表达了纠正这些错误和消除其后果的愿望。

出席中华全国总工会（大约两周前召开的）全会的，除了全总的众多代表外，有16名正式代表（4名海员、2名铁路员工、1名抚顺的矿工、1名奉天兵工厂的工人、1名奉天火柴厂的工人、2名来自上海和汉口的纺织女工、1名上海的市政工人、1名码头工人、1名印刷工人、2名职员）。由于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全会是在紧随党的全会之后召开的，所以多数代表来自党的全会（这在白色恐怖的环

① 这里指是周恩来和瞿秋白。

② 指1930年9月上旬红军第二次进攻长沙的失败。

③ 指中共六届三中全会。

④ 指中华全国总工会执委会常委会扩大会议。

境中和匆忙召开工会全会的情况下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很难确切地说，全总的全体会议真正具有多少代表性。但是，同志们使我们相信，这 16 名代表的确是工会工作人员。全会开了两天。日程、报告和决议都是直接同我们一起讨论和修订的（见附上的建议和我们所作的修改^①）。

我有机会参加这次全会并且作了一个报告。当然，我没有局限于以红色工会国际和太平洋书记处的名义参加会议，我的两个小时的报告讲了两个中心问题：关于扩大和巩固作为企业中真正战斗组织的红色工会的问题和关于为了日常直接的经济要求而不断地准备组织和进行日常的群众性斗争（要善于把经济要求与政治要求的斗争结合起来）的问题。在与同志们事先（在全会之前）的交谈中我曾强调指出，这次会全，除了要进行最深刻的和公开的自我批评外，实际上应该开成一个以组织和重新组织为标志的全会。代表们应该毫无掩饰地提供红色工会的真实状况，提供我们在一些最重要工业部门和一些最重要企业中的地位的真实情况，以便全会根据这些材料提出具体的组织计划。（不久的将来我们会知道这些情况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实的。）有趣的是，尽管我出自十分明显的考虑预先同那位将在工会全会上作政治报告的政治局代表（项）^②进行了交谈，并且提前告诉他，我将在自己的报告中特别强调上述的中心点，可是他后来却向政治局抱怨说，我过分突出了组织方面和组织经济斗争的问题，面对重大的政治任务和目标却讲得太少。但是，无论政治局还是我们局都不认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以便围绕它展开辩论（要知道，这位同志本人曾密切配合李立三执行过以前的路线）。

现在气氛已经清新并在为在工会中开始进行认真的组织工作创造了前提。上海工会联合会开始集中最近三个月来被遣散的干部，它

① 文件没有找到。

② 可能指项英。

不得不一切重新开始，因为它与基层组织和企业的所有（或几乎所有）联系都被破坏了。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情况也是如此或许更甚。我们与同志们一起在为建立真正有工作能力的机关制订具体计划。这里附上1930年10月17日我们寄给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的一封关于组织工作的信^①。这不是一天的任务，也不是一周的任务。首先，我们要把注意力集中在建立真正起作用的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机构上（在代表大会上选出的老执委会实际上已经解体，那里只剩下三名党团成员，多少能经常做些工会工作；党几次抽调领导人员去从事党的这样或那样的工作，不过在“立即举行武装暴动”的时代这是可以理解的）。特别是在现在，当反动派集中一切力量企图消灭苏区和红军的时候（蒋介石已经把几个师从北方前线调往南方来对付我们的军队），我们应该集中自己的所有精力去做运输部门（铁路员工和海员）的工作和兵工厂工人工作（组织怠工、罢工等等，以阻止调运军队和武器来对付我们）。同时急需向苏区那里派遣起码4、5名工会指导员和组织者（此事现在会遇到极大的困难）和着手组织农业工人（在工会全会上一位代表向我提出问题：“当苏区进行土地革命时为什么要在那里组织雇农？”）——所有这一切是我们在我国这里的一个中心问题。此外，关于刊物问题：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机关刊物仍然没有出版！^②。显然，这里有诸如白色恐怖等等的客观原因，但是这里也掩盖着某种别的东西（三个月前动员时期的遗毒）。我要向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同志们明确地提出关于应该出版报纸的问题，你们是否会批准印刷所的预算？同时我要强调指出，红色工会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的提纲和一些最重要的决议^③等着发表。

但是，我请您，亚历山大同志，尽快地答复从事职工运动的同

① 见第311号文件。

② 原文如此。

③ 见第328页注①。

志们提出的关于增加预算和关于印刷所（要 1000 金美元的问题）。否则，这里的许多工作将会停顿下来。

此外，这里的同志们坚持要求参加第五次代表大会的所有代表以及所有常驻代表……^① 尽快回来，因为我们这里需要干部。他们建议，李锋同志（海员）^② 留在你们那里作为新代表，其余的所有人赶快回来 [……]^③

亲爱的亚历山大同志和格列尔同志！

请你们回答我在这封信以及前几封信和报告中提出的问题。我知道，我很快就会不得不习惯于沉默，但这样终归是不行的。如果我们认真地对待自己的任务，那么就有需要讨论和需要回答的一些重要而紧迫的问题。

期待着很快答复这里提出的问题。

列昂^④

全宗 534，目录 4，卷宗 320，第 41—46、53 页。

打字稿，副本

① 删节号是原有的。

② 原文如此。何人不详。

③ 以下删去该信的部分内容：关于红色工会国际太平洋书记处在菲律宾、澳大利亚、印度支那、马来西亚、日本、朝鲜的工作。

④ C. A. 斯托利亚尔。

318

阿尔布列赫特给皮亚特 尼茨基的信

1930年10月21日于上海

亲爱的朋友：

今天，在过了很长时间之后，我终于有机会给您写信。约翰尼^①走的时候，借口有特别重要的原因，走得非常仓促，我没有任何机会让他带信。我得知这个消息是在他动身前一天，而且没有告诉我他哪一天动身，显然是“出于保密的考虑”。从那时起发生了许多事情，我应该告诉您许多情况。不过我猜测，我在这里的逗留很快就会结束。还有，今天我收到一份施奈德^②发来的电报，说他打算于26日起程。这个消息使我感到，写一封详细的信是多余的了，所以我只报告一些最重要的情况。

第一，从1930年3月起我只收到您一封信^③。您在信中坚决要求我答复会计处的信。我猜想这指的是梅[济斯]的信^④，此信附在您的信里。我现在答复如下：(1) 我走的时候，已经决定，我应该把银票兑换成墨西哥元。但是临时确定了最高的汇率，以便一旦出现错误不至对我不利。

① 何人不详。

② 卜·K·费尔格德。

③ ④文件没有找到。

（2）有人指责我，似乎还在埃莉维拉^① 动身之前我就把款额增加到5万金美元。第一，我指出的是大概的数字，而不是最后的款额，所以即便觉得我说的数字过大，那也不是什么欺骗和在这方面企图捞点什么，而只是一个错误。另一方面，说什么在把金美元兑换成墨西哥元的时候一直保持高汇率——这是不真实的。

（3）我不能同意报告所有款项的要求（莱文盖姆断定，好像是他汇给了我这些钱款），因为我没有任何印象，他汇来过多少钱。我有自己的帐本并坚持认为，我只对为他订购的商品和从他那里得到的款项负责。至于说他和我要为同一款项负责，这就要凭会计处的良心了。

（4）我记录了古斯塔夫^② 拨给我们的一切款项。我从来都没收到过他的财务报告，所以我要把向他作出报告的要求称之为可笑的怀疑。

我认为，我这样解释是满足了答复会计处的要求的。

现在我回头来谈一谈您的直接指责。按照您的说法，第一，我自作主张地将钱投入了企业，第二，支付给中国人的是墨西哥元，而不是金美元，第三，不遵守诺言，什么事情也没有做。作为所有这些指责的后果，可能是我被解除职务（因为我对自7月份以来对我的态度不能作出别的评价）。我认为，不仅对我进行这种指责，而且，据奥斯藤和乔^③ 告诉我，还要正式公布此事，这样做是不公正的。我认为，如果这种指责是真实的，那就不会让我留在这里近三年之久。至少，可以用下述情况来解释这种局面：您对各种问题都没有作出指示，我认为这是您对我的工作的赞同。但是就在这种情况下，也存在着许多可以证明相反看法的事实。公司三个月的预算是您赞同的。您知道，这些款项都用来购买商品了，因为这些款项大部分都是以商品的形式运到这里的。恰恰是我请求派一名会计来帮助我进行认真的核算。就

① 3. X. 阿布拉莫维奇。

② 可能指古斯塔夫·弗里克。

③ 分别为 И. А. 雷利斯基和（可能是）П. А. 米夫。

算这是我一个人的过错。那么为什么因为我一个人就应该对整个工作提出疑义呢？那里发表的声明使这里的人相信，是我窃取了这些款项。（很可能，这些人只有一个概念：钱放着就是为了让人偷的。）结果是由于我而使整个联络系统的声誉受到损害。是谁需要这样做呢？无论如何，正如奥斯藤断定的，不仅在这里，而且在那里都在纷纷议论这个问题。我感到惊奇的是，为什么要把我留在这里达数月之久，而且始终不改变这种局面。您想进行早在一年前我就请求过进行的那种检查吗？但这种检查又在哪里呢？为什么要拖延呢？我在莫斯科时就曾经对您说过，有人想消灭我。我知道，等待我的是什么。这一点我是完全清楚的。但不管怎样，如果命运注定，那我准备承受最严厉的惩罚。只有这个案子移交法庭的时候，我才会感到满意。

现在我来谈谈自己的职责。尽管有世界性危机，尽管有极大的压力，我还是可能晚了一点履行自己的承诺的。到目前为止，为支付酬金，公司汇来18万金美元。还有一些钱应该从公司汇来。但是超出我所能，我就无能为力了。假如我今天就能支付这些款项，那我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但是我无法做到。这超出了我的能力。我不能克服世界性危机。我准备尽我所能去弄到这些可恶的款项，但是办不到啊。这件事只能逐渐地完成，毫无疑问是会完成的，对此我毫不怀疑。我离开时，曾达成协议，我将每月支付1万金美元并把整个数额压缩到10万金美元。但是我一到这里，就发来了取消一切汇款的命令。我无法如此迅速地做出调整，除一切其它情况外，还需要考虑到资产阶级世界的意见。我现在毫不犹豫地在采取行动。这是否明智，则是另外一个问题。我认为，有希望建成一个巩固的基地。今年1月您也有过这样的意见。不管在怎样的情况下我都不想留在这里，但我断定，建立基地——这是唯一正确的道路。我们诞生的日子已经过去，但我们可以指望有稳固的存在。然而，如果远东局和政治局^①每

^① 指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和中共中央政治局。

天都从公司抽调款项，那么可以预料公司很快就会完蛋。我只能说这一点。问题不在于是好公司还是坏公司，而在于我们这里和您的指示之间从来就不存在密切的联系和明确的相互协调。现在我成了这种命中注定的局面的牺牲品。我只想回去，如果命该如此，我就承受惩罚。今天寄去6月1日至10月20日的结算报告^①。为了不使事情复杂化，我已把现金柜交给了别兰德^②。不能有两个分开放置的现金柜。我想，我是按照您来信的精神做的。从我的结算报告中您会看到，我总是尽力支付不只是您寄来的款项，而且总是多支付一些（遗憾的是，不像我希望的那么多）。我个人没有向任何人发过钱。我把一切都支付给亨利，而他经我同意后分发给您的客户。

遗憾的是，所支付的款额是不够的。从共产党的结算报告中您会看到，截止到11月1日的这一年，为您少支付约5万金美元，即每月约5万^③。但是，如果考虑到从3月起您只寄来40000，那么所支付的钱数还是够的。对其他人都按比例支付的。关于这方面的情况亨利将会写出详细报告。

我已经完全不和人们交往了。除别兰德外，我不会见任何人。但是这也被看作是一种罪过。从今天的邮件中您将收到对我的指控^④。我认为我没有必要就这些卑鄙行为为自己作辩护。就这样吧，我等待着你们的工作组和我的接班人。

您的布德罗^④

全宗495，目录19，卷宗111，第49—51页背面。

德文打字稿，原件。

① 文件没有找到。

② 何人不详。

③ 见第314号文件。

④ A. E. 阿尔布列赫特。

319

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局的信

1930年10月23日于莫斯科

秘密

致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局

亲爱的同志们：

为了阐述通过一般线路发去的答复你们8月9日来信^①的电报指示，我们认为有必要更详细地说明我们对你们所提出的问题的看法。因为所涉及的不是在评价时局和理解策略任务方面的某些次要分歧，而是“在中国革命的重要关头有两条根本不同的政治路线相互对立”（摘自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来信）^②，所以就更有这个必要。

一个是某些领导同志所支持的李立三路线，一个是共产国际执委会的路线。看了你们的来信后，青年共产国际不得不指出，不管在任何情况下，你们同意关于成立行动委员会^③和暂时取消共青团的错误决议，都是出于中央局多数人对李立三在评价时局和力量配置方面提出的总方针的支持。掩饰这一点是有害的和危险的。相反，共青团中央局应该以布尔什维克的精神承认和谴责李立三的方针和自己的错误，加强解释和贯彻共产国际执委会路线的工作。共产国际执委会就李立三的错误路线寄去一封详细的信，必须认真研究它

① 文件没有找到。

② 指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给中共中央的信。

③ 见第273页注①。

（信），这对于团的领导干部，对于保证在中国反帝革命和土地革命的进一步发展进程中帮助党将具有巨大的教育和组织意义。

简单地谈一谈你们来信的实质。信中断定：“党在政治上赢得了工人阶级大多数的支持，”“在斗争的这个紧急关头党和团这两个组织系统的合并直接领导着斗争……”^① 等等，并指出，关于行动委员会的决定是出自一部分同志对李立三总方针的支持。他的方针在于：“李立三不是从分析客观形势、分析斗争力量对比出发的，而这种分析对于每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来说都是必须作出的，因此他不仅是犯了一些错误，而且造出了一个完整的错误观点体系，制订了反马克思主义、反列宁主义的方针。由于脱离具体的实际，脱离群众，放弃对群众的组织和动员，这个方针不能不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导致盲动主义、冒险主义的策略。这个方针以虚假的‘左的’词句掩盖着消极性，其实也是机会主义的，例如就像托洛茨基主义一样。从这种非马克思主义、非列宁主义的方针中得出一种理论，认为在中国已经有全国范围内的成熟的革命形势，这样的革命形势在全世界范围内也已经成熟”（摘自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信^②）。

这种方针的错误性、危险性、危害性和论据不足表现在哪里呢？李立三没有考虑到：（1）国内革命运动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特点，一下子就抹杀了“共产国际执委会和中国共产党所查明的一切事实：中国封建军阀割据、国家被帝国主义者瓜分、经济发展不平衡、革命运动发展不平衡等等”（摘自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信^③）；（2）工人运动的发展落后于农民运动；（3）帝国主义者的力量；（4）苏维埃政权还没有变成巩固的区域性革命根据地；（5）在巩固、教育和组建工

① 删节号是原有的。

② 指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给中共中央的信（参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90年版第6册，第645页，此处译文与原译文稍有出入，一译者）。

③ 见《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集）》，第226页。

农红军方面还必须做大量的工作。

对这些最重要因素的不理解、对形势和前景的错误估计，导致犯了许多重大的失误，类似下列论点：工人们只想举行暴动，而不想举行示威游行和罢工，其实，这是在掩盖虚假的“左的”词藻和机会主义的消极性。党和共青团不是对工人阶级经济斗争进行必要的经常的领导，而是减少了对经济斗争的注意力。没有认真地准备和实行政治罢工。党支部和共青团支部的合并使工作陷入混乱，把注意力都放在准备暴动上了。即便是在中国已经出现直接革命形势的情况下，取消共青团，行动委员会与党合并也是一个极大的错误。列宁在1917年10月8日写道：“要挑选最坚决的分子（我们的‘突击队员’、青年工人和优秀水兵）组成一些不大的队伍，派他们去占领一切最重要的据点，并参加各处一切重要的战役”（《局外人的意见》，第14卷^①）。这表明，列宁同志认为青年工人在武装起义中有何等重大的意义。这就是说，必须大量地聚集力量，首先是共青团的力量，去动员最广泛的青年阶层直接参加武装斗争。对直接斗争的集中领导为什么要以暂时取消共青团为前提呢？当然，在这种时刻，十分需要有最紧密的联系，十分需要共青团的任务及活动完全服从于党的总任务，但是这决不意味着取消共青团。

否定中国革命的巨大成绩，否定共产党和共青团的成绩，这是有害的，在政治上也是完全不能允许的。已经采取武装暴动的方针（这是完全正确的），这个事实就说明，党和共青团的工作已经取得了一些巨大成绩。但是不考虑到、看不到和忘记出现在李立三面前的那些因素，就意味着在实施他的计划时把中国无产阶级的精华置于帝国主义者的直接打击之下，使一些决定性的工业中心的工人阶级变得一蹶不振，使红军变得一蹶不振，我们的运动就会倒退。李立三的路线不是列宁主义的路线，它会导致消极和失败。

^① 原文如此。应为第21卷（见《列宁全集》俄文第五版第21卷第320页）。

青年共产国际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已经取消了它以前的决定并赞同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决议^①。我们不怀疑，中国共青团中央局将会同心协力地纠正自己的错误，最坚决地贯彻共产国际在给中共的最近一封信^②中所表述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的路线，动员整个共青团实现真正革命的实际任务，在党的领导下摧毁作为主要危险的右倾和“左”的假革命空谈以及那种不接受任何人领导的空想。

考虑到在8月份已经给你们寄去一封关于具体任务的、现在仍然有效的详细信件^③，我们认为有必要建议你们与我们的代表^④一起在阐明共产国际执委会的路线和我们的信件过程中立即制定一些实际措施，首先是在这样一些问题上：（1）最积极地帮助党在一个或几个苏区实现建立地区革命根据地的任务，（2）组建真正的工农红军，（3）立即转到加强对青年工人的经济斗争和工会工作的日常领导方面来，（4）动员青年工人、苦力、雇农、贫农加入共青团。这方面的成绩还不能完全令人满意，（5）在暂时还不是苏区的地方开展农民运动，开展游击斗争等等，（6）特别要研究在运输、铁路、兵工厂的青年中间开展工作的问题。

1月份将要召开青年共产国际执委会全会^⑤，在全会上有你们的报告。必须最认真地作好准备，立即开始研究组织状况方面的一些问题。

我们期待着你们在报告中将广泛地阐述团的状况和为贯彻青年共产国际的路线和决议而开展的工作。

我们要提醒你们注意的是，至今我们还不了解你们在中共〔中

① 见第298号文件。

② 指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给中共中央的信。

③ 指青年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国共青团中央的信（1930年8月）。见《青年共产国际与中国青年运动》，第388—400页。

④ Г. М. 别斯帕洛夫。

⑤ 青年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全会直到1932年12月才召开。

央] 政治局通过决议^① 后的态度。

全宗 533, 目录 3, 卷宗 204, 第 139—142 页。

打字稿, 副本。

① 见第 298 号文件。

320

陈绍禹^① 给米夫的信^②

1930年10月23日于上海

亲爱的屈珀^③：

时间过得如此之快，上海已经开始冷了。很快就会下雪。来自国外的客人冬天都很思念自己的故乡。你生活怎么样？老母亲、女儿生活怎么样？敬爱的普拉加怎样^④？

昨天我收到了第三次全会^⑤的部分材料，（巴黎总公司的决议^⑥、第三次全会的决议、老头子^⑦的报告、斯特拉霍夫（瞿秋白的总结讲话）。由于时间的限制，我只是匆匆浏览了一遍。在我看来，巴黎公司的决议完全正确地考虑和估计了中国市场的行情^⑧，并为开展贸易^⑨作出了完全正确的指示。第三次全会的决议贴近巴黎的决议，并承认和考虑到自己过去的错误、缺点和愚蠢做法，当然，还有部

① 作者是根据笔迹和文字风格特点确定的。

② 这封信是用普通邮件寄送的，使用的是暗语。

③ П. А. 米夫。

④ 即 П. И. 普拉格尔（米夫的妻子）。

⑤ 指中共六届三中全会。

⑥ 指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及1930年7月29日共产国际执委会通过的其他文件（见第257号文件）。

⑦ 向忠发。

⑧ 革命运动的当前时局。

⑨ 革命。

分不很清楚、不很准确、不很肯定和不很令人信服的地方。但是问题的提法和道路的确定已经比今年6月11日的决议^①好得多和正确得多了。如果自上而下能够根据该决议认真地做好实际工作，那么公司^②在近期内可能就会恢复到相应的程度。它将获得很大的利益：它会比以前发展得更快和更有成效。现在最主要的恰恰在于，尽可能更好和更切实地使这些决议得到实际执行。不认真地开展自我批评，不向公司的广大群众详细地、耐心地说明事情真相，就别想保证真正贯彻巴黎和第三次全会的决议，因为不仅地方组织和一般^③同志不具备足够的理论和政治素质来独立分析主要的复杂问题，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还在一定程度保留着从理论上和政治上对问题的不正确提法和不正确的实际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不在理论、政治和实际工作方面彻底转变，地方分部就不能按照新的方式很好地贯彻执行决议。但是在这方面，特别是在领导开展自我批评和教育工作方面，老板们做得很不够，并且同志们在这种事情上经验很少，也不太习惯。为了使公司尽快地健全起来，希望这一次能敞开自我批评的大门。

近10年间，贸易和公司已经为健全公司创造了相应的物质基础。客观条件也特别有利于这项事业。每个人都在加强自己的工作，贸易将会得到迅速发展。

致热烈的兄弟般的敬礼！

你的^④

全宗514，目录1，卷宗577，第92—93页及背面。

俄文手写稿。

① 指193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议《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

② 党。

③ 从意思上看应为：普通。

④ 签字辨认不清。

321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给中共中央的电报

1930年10月24日于莫斯科

致中共中央

东方部^① 请你们告知：你们是否能收到用中文出版的《共产国际》杂志^②，你们发行多少期，可以发行多少。杂志的内容是否令人满意，在你们看来，应该如何改进。如果我们保证为印刷提供准备好的译稿、原稿，你们那里是否有可能印制大量发行的杂志或小册子。

东方部

全宗514，目录1，卷宗569，318页。

打字稿，副本。

① 中文如此。应为：东方书记处。

② 《共产国际》杂志1930年至1937年在莫斯科出版。

322

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执行委 员会远东局的信

1930年10月25日于上海

秘密

致远东局(附上满洲省委寄来的一封信,请审阅)^①。

对这封信里提出的问题我们在下面阐述我们的意见,请讨论并给予指示。

1. 我们认为,受苏联委派在满洲工作的中国同志,应该务必在中国党的领导下进行工作,因为只有这样实际上才能在整个工作领域取得更大的发展和成就,特别是在策略工作形式方面会得到更明确的指示。

2. 委派在满洲的工作人员应该取得组织上的允许和党的同意,因为根据过去和现在的事实可以说,苏联一般不了解中国党内的组织关系及其工作能力,因此苏联常常委派一些已经被中国党开除的人甚至是叛徒或者犯过极严重错误的党员作为重要的负责工作人员。很明显,这不仅不能给工作的开展提供可能性,而且还会导致党组织的破坏和授敌人以破坏的工具。来自满洲的这封信以及过去的教训就是无法辩驳的事实。因此我们认为,今后委派人做工作应该在组织方面与中国党协商。

3. 为了理顺和密切在满洲存在的工作关系,以及为了达到一致

^① 文件没有找到。

工作的目的,我们认为有必要在最短的期限内建立起兄弟般的关系。同时举行两个兄弟党代表的联席会议。在联席会议上应该讨论今后工作中的关系。统一进行工作的总方针,以及审查各种组织问题。我们认为,满洲省委每次都应指定一位负责人参与作出决定,中央也要每次指定一个人与会。

4. 为了更有效地举行联席会议,这个问题是否应该立即进行讨论?

这就是我们的意见。请你们连同满洲来信中提出的问题一并予以讨论,并尽快答复我们。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全宗 514, 目录 1, 卷宗 579, 第 172—173 页。

打字稿, 副本。

323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 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①

1930年10月30日于上海

秘密

致中共中央政治局

亲爱的同志们：

1. 根据你们的通报和共青团中央的通报，由毛泽东和朱德指挥的我们的军团在准备进攻南昌，目的是占领它。另一方面，彭德怀的军和受他影响的部队好像也在向长沙进发^②。
2. 这种游击习气和分散我们在长沙失败^③之后还没有得到足够加强的兵力去攻占像南昌和长沙这样两个由敌军加强设防的较大中心城市的做法，连起码的战役战术要求都不符合。指挥红军的这种战术，除再次遭到失败外，不会有任何别的结果。看来，长沙的教训我们地方的同志没有记取。

3. 但是，除了这种游击习气外，我们认为在政治方面对我们各军的指挥也是绝对错误的和绝对有害的。例如，在江西，我们在30个县拥有苏维埃政权，而只有10个县城在我们手里。在其余的20个

① 文件上有批注：送斯大林、皮亚特尼茨基、库西宁、曼努伊尔斯基、洛佐夫斯基、别尔津、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以及库丘莫夫、马季亚尔、拉祖莫娃。

② 这里说的是毛泽东和朱德指挥的军队于1930年10月中旬开始向南昌进攻和中共中央关于第三次进攻长沙的命令。

③ 指1930年9月初以失败而告结束的第二次向长沙的进攻。

县城，政权掌握在有产阶级的手里。我们的领导同志不去夺取这些县城和建立连成一片的苏区，而是热衷于攻占大城市。我们认为，在这方面军事指挥犯了重大的政治错误。在后方不巩固的情况下热衷于“攻占”大城市来建立根据地——这是冒进，是超越当前的某些现实任务。另一方面，这也证明，中央的指示，根据最近一次全会的决定^①还没有传达到地方（或者传达到了，地方工作人员也没有贯彻执行）。

4. 不占领大城市而要建立巩固的和持久的苏维埃根据地自然是不可能的。舍此也不可能有苏维埃政权在中国领土上的扩大。这是清楚的。但是在给自己提出攻占大城市任务之前，必须为此创造相应的前提条件。在反动派业已加强并且还在继续加强反对苏区斗争的现在，这样做特别有必要。我们认为，目前这样的前提条件就是：

（1）通过武装斗争清除苏区内分散的居民点（例如，上面提到的 20 个县城）中的敌人。

（2）建立革命政权机关（革命委员会，而在有可能的地方建立苏维埃）和彻底贯彻党和政府的口号（土地问题等）。

（3）从军事和政治领导的政治团结、纪律、军事训练、供给等方面大力加强红军。

（4）通过我们的据点，即共产党支部、共青团支部和革命士兵小组，尽可能最大限度地加强对军阀武装力量的瓦解工作；组织双方士兵的友好活动和争取对方士兵转到我们方面来，组织士兵暴动，进行破坏站^②让我们的部队和农民游击队对敌人后方和一些部队不断进行骚扰，以使敌人精疲力竭，等等。

（5）大力加强非苏维埃地区（大城市所在地区）的农民运动并

① 指中共六届三中全会。

② 原文如此。应为：行动。

在那里建立农民武装力量。

(6) 城市（这里指南昌和长沙）里的党组织和共青团组织要积极进行活动，为红军准备无产阶级群众。

只有在充分实现这些任务的情况下，红军才能胜利地进攻大的中心城市（南昌、长沙等）。实现这些任务是完全可能的，我们苏区已拥有足够强大的力量来这样做。需要的只是正确的领导。

5. 我们认为政治局根据我们这封信的精神向有关同志和地方党组织发出紧急指示是很必要的。

6. 毛泽东、朱德和彭德怀的行动再一次有力地说明，在上海和苏区之间尽快建立通讯联络机构和在苏区建立坚强的军事政治领导是必要的。

致同志般的敬礼！

远东局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579，第 176—177 页。

打字稿，副本。

324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 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

1930年10月30日于上海

绝密

亲爱的朋友们：

现寄给你们两条建议，我们想在星期一前，即最近一次会议前，知道你们对这两条建议的意见。

1. 关于俘获的传教士问题。近来，在帝国主义的报刊上出现两条消息，其真实性我们当然不能相信。似乎在福建有两名女传教士被红军或农民赤卫队处死，而在江西不久前似乎有一批不同民族的传教士被红军部队俘虏，其中一人已被送往上海，目的在于进行赎金谈判。我们不知道，虚伪的反动报刊所报道的这些消息是否真实，不过如果确有其事，那么我们认为像处决和要求赎金这种策略都是不合适的。采用这种策略，我们就会给帝国主义者提供在其他国家落后工人阶层中进行鼓动宣传的材料，这是毫无必要（和目的）的，至于说中国，在这里也采取收取赎金的策略，这种行为在政治上是没有道理的。

我们向你们提出以下建议并请你们把它作为指示传达下去：如果有传教士俘获，那么红军或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人可以向南京、天津、上海等地的帝国主义当局和中国当局大致提出以下要求：我们在这样的条件下释放传教士，例如，从上海、南京等地监狱中释放100名中国革命者。这些革命者应该在可靠的保护下被送往苏维埃地区，并在那里交换传教士或其他这类被俘人员（其他外国人、某

些中国反动分子等等)。如果, 比方说经过三个月我们得不到答复, 那么我们就要把被俘人员关押在如同你们在中国监狱里关押我们被俘人员的那种环境中。

我们认为, 如果你们采取这样的策略, 那么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其他国家, 这都会给我们提供一个进行鼓动宣传的好机会, 而且甚至可能取得实际的成果, 即无产阶级革命者获得释放。

2. 附上告德国劳动者书的草稿。如果你们同意, 我们立即把它发往德国^①。此致

敬礼

全宗 514, 目录 1, 卷宗 579, 第 175 页。

① 文件没有找到。

325

周恩来给莫洛托夫和共产国际 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的电报

1930年11月4日^① 于上海

致莫洛托夫同志
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

在莫斯科，皮亚特尼茨基同志曾负责任地对我说，中国党将会收到它所需要的经费（美元）。我回来后得知，已经拖欠我们17万墨西哥元。9月份我们只收到5900美元。我们听说，10月份的数额（1.5万美元）将会寄来。但是用下一次的付款又怎能抵销以前的欠款呢？党的许多机构已遭破坏，许多负责的工作人员遭逮捕。我们没有钱营救他们。我们没有钱寄给各省的组织，也没有钱建立与红军和苏区的通讯联络。这将给工作造成巨大的损失。国际联络处在这里推销不掉自己的货物。我们请共产国际执委会根据预算尽快给我们寄钱来和还清以前的欠款。因为在这里不可能还清我们的旧的欠款。我受政治局^②委托给你发这份电报并请答复。

莫斯科文^③

全宗495，目录19，卷宗241，第1页。

德文手写稿。

① 这是收到的日期。

② 中共中央政治局。

③ 周恩来。

326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处务委员会会议第33号记录 (摘录)

1930年11月10日于莫斯科

秘密

出席：萨法罗夫、马季亚尔、马祖特、库丘莫夫、拉祖莫夫、沃尔克、瓦格涅尔、费奥多罗夫、福京、安德里安诺夫、张彪^①、黄平、克雷莫夫^②同志。

听取：1——关于中文版六卷本列宁文选编辑委员会的组成人员。

决定：1. 批准编辑委员会组成人员如下：

黄平（负责）、奥尔林斯基^③和伊思美洛夫^④同志。

翻译工作由丘贡诺夫、纳利曼诺夫、格里申、博罗金^⑤、伊思美洛夫和奥尔林斯基同志承担。

请列宁研究院列出六卷本的目录。

听取：2——中共中央关于召回张彪同志和任命黄平同志为中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的报告^⑥。

① 张国焘。

② 高尚德。

③ 董亦湘。

④ 张闻天。

⑤ 分别为：周达文、俞秀松、谢江民、沈关兰。

⑥ 见第302号和303号文件。

决定：2——同意中共中央关于召回张彪同志和任命黄平同志为中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的决定。

通知中共中央，东方书记处不同意中共中央关于召回张彪同志原因的表述，这种表述是与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决议^① 相矛盾的。

请中共中央迅速向共产国际报告，他们为阐述我们关于李立三路线的那封信^② 做了什么工作。

通知中共中央，我们已经收到中共三中全会的决议并于最近提出我们的意见。

主席 萨法罗夫

全宗 495，目录 154，卷宗 416，第 324 页。

打字稿，原件，亲笔签字。

① 可能指第 275 号文件。

② 见第 375 页注①。

327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 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

1930年11月10日于上海

秘密

亲爱的同志们：

在汤姆和克利亚因^①同志与江西边区苏维埃副主席^②的谈话中发现几个问题，我们想提请你们注意。

1. 地方的同志不知怎么把地主阶级看得非同一般的特殊。地主被划分成“好的”和“坏的”。“坏的”是那些积极同我们作斗争的地主。他们没有得到土地。“好的”是不同我们直接进行积极斗争的那些地主，他们同劳动者一样得到了土地。分给“好”地主的土地不是荒芜，长满了草，因为地主不想自己耕种，就是被地主出租。

在土地革命和任何革命运动的最凶恶的敌人——地主阶级对土地或苏维埃政权部分地保留自己的特权的时候，论证这种做法的荒唐性是多余的。应该没收地主的所有土地以及他们的建筑物和财产。

对“善良”地主的这种不彻底的政策表明，地方的同志不清楚土地革命的任务，贯彻执行不够。

2. 该同志动身来上海（9月29日）之前，我们红军的指挥人员（毛泽东、彭德怀）与政府没有任何联系。政府是一回事，军队是另一回事。毛泽东对政府工作几乎不感兴趣。

① 分别为：A. Ю. 盖利斯和 B. П. 马雷舍夫。

② 胡海。

显然，这种状况是不行的。应该使毛泽东不仅对军队的状况和行动负有责任，而且还要让他参加政府并对政府的工作负有部分责任。应该任命他为政府委员（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关于这样安排的实际好处就不必说了，这是显而易见的。

3. 在我们看来，红军力量的发展还不够。应该这样来安排工作：在最近一个时期，除了使现有的部队从数量上不断得到加强外，还要使我们驻扎在江西和湘西的部队人数起码翻一番。这样做的条件是有利的。武器不足不能成为不增加军队人数的理由。应该由“青年先锋队”和“赤卫队”组建新的团和师。武器应该并且也能够在斗争过程中取得。暂时他们可以用当地现有的原始武器武装起来。

4. 必须把到这里来的同志们再派回苏区去。必须认真地帮助他们学习几天，使他们成为中央路线在当地的真正贯彻执行者。像梅耶尔^①所说的那样，派他们去参加短期培训班是不合适的。第一次被派往苏区的工人们，即不了解当地情况的人才需要进短期培训班。应该采取另外的办法给地方上来的负责工作人员充电加油。

5. 这位同志来上海参加苏维埃代表大会^②，以及中央最近的指示^③地方上在7月（至少在9月）9月28日前^④才收到，江苏的同志还在根据老的不完全正确的指示工作，这种状况确实说明存在着上海对地方领导的不正常情况。

在目前条件下，通讯和建立通讯的问题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无论如何都应该建议与地方的通讯联系。财政困难不应成为不解决这个极其重要的问题的理由。

6. 我们认为，必须通过派出一些受过良好指导的同志就1—4

① 何人不详。

② 1930年夏天曾打算在1930年11月7日召开苏区代表大会。

③ 不清楚这里指的是什么指示。

④ 原文如此。

点向地方传达指示。

致同志式的敬礼！

远东局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579，第 179—180 页。

打字稿，副本。

328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处务委员会会议第 34 号记录
(摘录)

1930 年 11 月 15 日于莫斯科

秘密

听取：3——日常事务。

(1) 关于沃罗夫斯基^① 问题。

决定：3——日常事务。

(1) 批准沃罗夫斯基为中共驻东方书记处代表。

萨发罗夫

全宗 495，目录 154，卷宗 416，第 319 页。

打字稿，原件，亲笔签字。

① 黄平。

329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

1930年11月18日于上海

秘密

出席：少〔山〕、特〔生〕、〔一〕天^①、〔温〕裕〔成〕、〔窦〕宾^②〔徐〕锡根同志。

日 程

1. 讨论共产国际来信^③。

特〔生〕：不久前收到共产国际一封来信。这封信的意义十分重要，我们应该详细地讨论一下，现在先来谈一谈这封信（念信）。现在转入讨论。

〔一〕天：我们应该十分重视共产国际的这封信，因为现在一方面三中全会^④的材料正在下发，但是还没有完全发到支部，而另一方面，已经出现错误解释这些文件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国际的来信自然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这封信谈了三个问题：

1. 这封信中最重要的就是指出了李立三的错误，并且没有说中央的整个路线是错误的。

2. 信中根据一些材料和8月1日和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

① 分别为：周恩来、向忠发、瞿秋白。

② 原文如此。何人不详。

③ 指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立三路线给中共中央的信。

④ 指中共六届三中全会。

议所通过的工作决议^① 指出了李立三的错误。

6月11日的政治局决议^② 和8月15日的宣言^③ 没有偏离正确的路线，然而，“左”倾和右倾的错误解释与中央和党的正确路线不一致。我们只是在三中全会前和会议期间没有明确而深刻地予以揭露，但也没有表现出调和主义倾向。

3. 来信的某些部分与事实不符，必须予以纠正。但是这涉及的是一些很次要的和不重要的问题。

对共产国际的来信我们应该有一个统一的和正确的理解，以便接受共产国际的指示，同时让全党都能理解这些指示，此外，我们应该发电报答复共产国际。

我们应该重视共产国际来信中所指出的：“现在来讨论所有这些问题，会停滞党的工作，而使党的力量离开革命的决定胜负的任务，然而必须……^④ 而团结党员在布尔塞维克路线的周围。”^⑤ 我们应该根据这一指示的精神确定对这个问题的具体措施。

我建议政治局和远东局在近日内召开联席会议并尽快讨论这封来信。

[窦]宾：我认为，现在的讨论应该是很认真的和有目的的，只有这样在领导方面才会更明确。

我还认为，在三中全会期间对“左”倾有调和主义倾向。

为了更清楚地理解过去的错误，我认为，最好由政治局中某一位同志作一个关于过去事件的系统报告。这将为我们充分讨论和理解错误提供更大的可能性。

少[山]：共产国际的来信我读了两遍。对于这封信我有以下看

① 见第265号文件。

② 指中共中央政治局决议《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

③ 指1930年8月14日中国共产党对目前时局的宣言。

④ 删节号是原有的。

⑤ 见《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集）》，第232页。

法：

第一：

1. 共产国际来信中所包含的批评，十分深刻地指出了过去在路线上的摇摆不定。我们虽然也说过，李立三的这种理论会发展成为特殊的路线，但是我们没有这样明确而深刻地指出这一点。

2. 对于系统化的，或者可能成为系统化的思想体系，我们应该坚决地和毫不妥协地进行斗争，决不应该有任何动摇。过去我们虽然也意识到这一点，但是并没有像共产国际所指出的那样深刻（在我与李立三谈话的时候，这些错误已经形成为一定的理论体系，但是并没有公开地和深刻地予以揭露）。

如果我们明白这种情况，我们就会抨击现在这种右的消极性，同时会深刻理解左倾路线。窦宾同志已经注意到这一点。完全可以肯定，如果我们不能深刻地指出错误，指出任何倾向，揭露其根源，那么这就会导致各级领导机构不能正确理解这些错误和倾向。

过去，关于革命高潮和革命形势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已撰写和发表了 不少文章，其中含有一些很大的错误。但是，这些错误决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很深远的根源。例如，关于不平衡性问题就可以追溯到中央第 70 号通告^①（例如，那里谈到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并指出革命已经走上了平衡发展的道路）。因此，出发点就已经错了。其次在革命高潮问题上的错误也具有深远的根源。在江苏代表会议^② 上我与李立三同志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了分歧。但是虽然我与他有分歧，而最后我还是妥协了。这样一来，李立三把革命高潮与直接革命形势等同起来并且从根本上错误地提出问题。这两个错误理论，无疑对策略方面有影响。在共产国际来信中对这两个问题所作的指示，是很正确的和很全面的。无疑，这个问题过去与远东局进

① 指 1930 年 2 月 26 日中共中央第 70 号通告《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中心策略》。

② 指江苏省第二次党组织代表会议。

行过讨论，虽然远东局也指出过这一点，但是我们没有很重视。因此这对策略方面有很大影响。

我同意窦宾同志的意见。负责同志应该取得理解的一致，因为否则就会引起不好的结果并会使他们不能认清形势（例如，何子述在中央工作期间，在关于中国和世界革命的看法上并没有表现出^①错误，但是到北方局和与负责同志谈话后，他声明他的观点是错误的），此外，可能还更会造就这样一种局面，搞宗派和反党的右派分子将利用这一点来攻击党。我们可以召开临时政治局会议^②来专门研究和讨论错误。同时指出，陈绍禹观点的正确性和错误性在哪里。

第二：

关于共产国际来信的传达，我认为应该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办：不允许进行广泛的辩论，因为这种辩论会造成工作停顿。所以这封信只能在领导干部中间传达，附上中央简短的说明。同时应该在全党的报刊上阐明过去发表的文章和文件中所含有的错误，以便作出思想上的修正和策略上的说明。

第三：

应该召集那些已经知道共产国际来信的同志们（例如，从莫斯科回来的同志）开一个会，并号召他们站在巩固党和帮助中央领导的立场上开展自己的工作。不允许他们不经组织同意采取分裂党的方式。因此中央在对待^③：

1. 在对待何孟雄问题上，可以说在这里有超出组织范围的机会主义。我认为，同他进行斗争是完全正确的。

2. 关于陈绍禹及其他人的问题（以及关于沈泽民同志的问题，昨天他在中央宣传部会议上发言，背离了三中全会决议）。需要召集

^① 原文如此。从意思上看是：没有犯。

^② 指中共中央政治局非常会议。

^③ 原文如此。

这些同志开一个会，向他们指出，他们既然在党的组织内就应该帮助党而不应该破坏党。

关于〔何〕孟雄的问题，需要紧急作出答复，而且这个答复应该是总的答复。他所提出的正确思想，我们应该承认是正确的，但是他攻击党的活动是以破坏党为出发点的。党应该彻底调查，他在支部工作中是如何进行活动的，并应该在一些支部中同他的破坏活动进行斗争。

〔陈〕绍禹的错误应该指出。党还应该召集所有受到〔陈〕绍禹等人影响的同志进行个别谈话，例如，（辨认不清）^①李立三和8名回到祖国的共青团的人^②。但是不应该弄得同志们都不敢讲话。我们应该通过进行思想斗争来关心领导。

我们应该与远东局进行讨论并争取远东局同意：不进行广泛的讨论，因为这样做会造成工作停顿。远东局过去曾经同意不扩大对李立三同志问题的讨论范围。

这里我们应该注意右倾机会主义的危险和它对已形成的局势的利用。我们应该抨击那些在实践中不把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放在首位的人。因此更有必要加强两条战线的斗争，因为不这样做，右派分子就会开始解释^③原则性问题。

在讨论和起草决议之后，应该立即先给共产国际发去一份电报并表明我们所采取的明确立场。

〔窦〕宾：在三中全会期间我十分清楚地感觉到自己理论上的薄弱。例如，在李立三发言时我尖锐地批评他的发言毫无意义，但是我的思想也不深刻，所以我认为，负责的领导同志应该有深刻的理解，只有这样，对各种问题才不会出现模糊的认识。

① 原文如此。

② 其中有：夏曦、何克全、陈昌浩。

③ 原文如此。从意思上看应为：歪曲、自行解释。

三中全会产生的文件完全是本着共产国际正确路线的精神起草的。我们应该抓住所有问题中最核心的东西，在实际工作和组织工作方面实现转变，同时，加强两条战线的斗争，在坚决同右倾机会主义进行斗争的同时也不放松反对左倾的斗争。只有这样才能从思想上得到纠正，另一方面，在两条战线的斗争上才能更有效地进行反对右倾的斗争。这项工作不仅要求加强党在组织方面的领导，而且还要求组织上的巩固。只有这样才能揭露何孟雄等反党人物对党的进攻，揭示妨碍组织工作的种种障碍。在上海的工作中特别需要这样做。所以真正贯彻执行共产国际指示和三中全会决议，是巩固党和加强同右倾现象作斗争的强有力保证。我完全同意少山同志的观点。

〔徐〕锡根：听了几位同志的意见，我得出以下看法：

1. 看了共产国际的来信后，我感到，共产国际的指示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思想上都给我们作出了十分正确的解释。在全会期间，无疑我们讨论过这些指示，但是我们应该更深刻地加以理解。假如在三中全会前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了，那么我认为，我们过去就不会犯那么多的错误。我们在三中全会上进行的讨论，正如共产国际来信中指出的，还是不够的。特别是在最近进行的实际工作中，我认为，由于我们自己没有深刻理解，所以纠正下级党委会的错误就导致了它们中间右倾现象的增多。所以我同意少山和窦宾同志的意见，必须召开专门会议来讨论这个问题。

2. 在收到共产国际来信前我就听说，一些同志已经知道关于收到共产国际来信的事，这证明，党内肯定存在许多怪现象。不过，许多怪现象的存在是因为党内存在许多利用时局向党进攻的分子，所以党就更应该向下传达共产国际的来信。毫无疑问，应该根据共产国际来信中指出的办法进行传达。

3. 党内存在着许多小资产阶级分子，当他们有机会谈论中央的错误时，他们就感到非常兴奋。似乎中央的工作最好让他们来做。对

这种捣乱的观念我们应该根据正确的指示予以纠正。所以我同意少山同志关于对〔何〕孟雄、〔陈〕绍禹等人采取某些措施的建议，此外，我认为，这些措施应该尽快定下来。

4. 同意在最近召开会议讨论所有过去的问题。

〔温〕裕成：在我看到共产国际来信之前，我们已经收到了青年共产国际的来信^①。当时我还不知道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后来接到共产国际来信，我一连看了四遍，感觉到共产国际来信很明确和很深刻。同时我更加弄明白了青年共产国际来信的内容，因为青年共产国际的来信更简短一些。

一些同志从青年共产国际学校回到祖国后，他们说，萨法罗夫同志召集他们进行谈话，他讲到：“在中国党内有盲动主义错误，以及〔李〕立三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这条路线是很严重的，你们回到祖国后应该同它进行斗争。”现在基层有许多奇怪的情绪，无疑是因为这些人散布了上述谈话。此外，他们还说，已经看过〔何〕孟雄的声明^② 并认为他的声明是正确的，而中央的声明^③ 是错误的（不知道，〔何〕孟雄是否在他们中间进行过鼓动）。因此右派分子更加利用他们同党作斗争。（少山：如果只是因为他们看了〔何〕孟雄的声明并声称他是正确的，那么这还不是问题，问题在于他们不了解〔何〕孟雄从头到尾的整个历史。）

我认为，共产国际的来信是完全正确的。现在问题在于，正像一些同志明确地指出的，在弄清楚这么多问题时要在理论方面和实践方面取得一致的理解。

① 指1930年10月23日青年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国共青团中央局的信（见第319号文件）。

② 指1930年9月8日何孟雄给中央行动委员会和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见《何孟雄文集》，北京1986年版第175—186页）。

③ 可能指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决议，其中包括：三中全会告同志书（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第401—413页）。

我认为，越是快一点讨论具体问题就越好。我认为，在星期五召开会议太迟了。第二，会议结束后应该立即公布。第三，最好青年团中央局^①能出席这次会议参加讨论。

过去对于取消青年团的问题只是作了组织方面的解释。我认为，在政治方面也应该指出，这是取消主义。

[一] 天：将要召开的这次会议应该作出系统的理论分析并作出具体的决定，会议还是应该在星期五召开。

我们应该十分清楚地说明，三中全会的决议是正确的，但是不深刻。同时要指出右倾现象的严重性，它们是撕去左倾面具后露出的真面目。

[窦] 宾：如果有人向我们提出问题，是否收到了共产国际的来信，那么我们不仅应该回答说收到了，而且还应该说明，政治局在作出今天这个决定时采取了什么样的立场。

[一] 天：我们可以说，现在有三条路线：一条是共产国际和中央的路线，一条是右倾的路线，一条是左倾的路线。

少 [山]：党的总路线与共产国际的路线是完全一致的，但是左倾路线干扰了中央的路线。

特 [生]：(结束语)共产国际的来信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件，它对中国革命具有重要意义，必须专门进行讨论。

决定：(1) 责成 [一] 天收集材料，起草报告提纲。于星期五召开会议。

(2) 建议青年团中央局全体成员和余飞参加这次会议。

(3) 星期五同远东局进行讨论。

(4) 责成窦宾同志负责收集关于 [何] 孟雄问题的材料，建议少山同志作结论。

(5) 在星期五召开青年团 8 名委员参加的会议，少山应该在会

^① 指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局。

上讲话。

(6) 在下星期日召集〔陈〕绍禹、殷祥^①、李立^①、沈泽民、〔陈〕原道开会；一天应向他们讲话。

(7) 在下星期二召开党中央、青年团和省委会联席会议，少山同志应该在会上发表讲话。

(8) 在下星期五召开党和青年团全体会议；特生同志应在会上发表讲话。

(9) 在下星期四召开（一个词分辨不清——原译者注）^②会议，特生同志应在会上发表讲话。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610，第 55—64 页。

打字稿，副本。

① 原文如此。何人不详。

② 原文如此。

330

陈原道给米夫的信^①

1930年11月21日于上海

屈珀^②同志：

不久前就我们公司^③的争论问题曾经给您写过一封短信。这场争论还在发展。原因很简单。主要是，公司中央管理委员会^④根本不接受下层职员和工作人员的正确批评和意见，其中包括我、库特科夫^⑤和戈卢别夫^⑥以及那些不久前到达这里的同志和其他人的批评和意见。不仅如此。公司管理部门就像打击异己分子、反对派[分子]和反革[命分子]那样打击我们。我们怎么对待他们呢？我们仍像以前一样，在努力加强和发展我们的公司。例如，公司三次全会^⑦实际上没有执行您的正确路线，没有指出与您的路线相对立

① 这封信是用普通邮件寄送的，使用的是暗语。在给库丘莫夫的附信中说：“随信寄去涅夫斯基同志（中国同志——被派回中国工作的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学员）写给米夫同志的信，供参考，在这封信中涅夫斯基同志描述了中共领导在全会后同那些捍卫共产国际执委会路线不惜被开除出党的同志进行的斗争。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见全宗514，目录1，卷宗577，第96页）。

② П. А. 米夫。

③ 党。

④ 中共中央。

⑤ 原文如此。应为：古德科夫——沈泽民。

⑥ 陈绍禹。

⑦ 指中共六届三中全会。

的李〔立三〕反伊基路线^①，事实很多，全会没有接受您的意见，但却说是一致的^②。

在最近一次全会的决议中，没有指明我们革命对待国际〔革命的〕正确态度，没有分析我们中国革命的不平衡性。苏区无产阶级领导的问题，我们革命的策略和前途，都没有具体指明，甚至什么都没有指出^③。难道这是伊基路线吗？

关于这个问题和河南争论^④的声明已送交公司中央委员会，请您重新审查并加以解决。也许，您很快就会寄些什么和派什么人来。

我和其他一些人一样，受到留公司察看三个月的处分！

再见，敬礼！

涅夫斯基

（陈原道）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577，第 9—98 页。

俄文手写稿。

① 反共产国际的路线。

② 原文如此。从意思上看应为：在中共三中全会上表达了这样一个思想：共产国际执委会的路线和李立三的方针是一致的。

③ 原文如此。从意思上看应为：或者根本没有涉及。

④ 指陈原道在中共河南省委会议上批判李立三路线的讲话和陈原道就此问题向中共中央发表的声明。

331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决议

1930年11月23日于上海

一、远东局完全同意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李立三路线的来信^①。

二、远东局认为，虽然在它给中共三中全会的建议中对李立三同志路线的表述没有像共产国际执委会来信那样在政治上如此尖锐（如说它是与共产国际执委会路线相对立的半托洛茨基主义路线），但是远东局在自己的全部活动中恰恰是从这种立场出发的。

三、远东局认为有必要采取一切措施，在党内彻底消除对在中共三中全会决议中体现的“左”的错误所采取的调和主义态度。

四、远东局接受政治局的临时决议案^②并把它看作是对三中全会决议的补充。

五、远东局同意关于不宜就此问题在党的队伍中进行公开辩论的决定。

六、远东局责成维利^③根据本决议和青年共产国际最近一封来信^④，通过中国共青团中央局向青年团中央全会^⑤提出补充决议。

七、远东局承认，它没有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使中国领导同志实

① 见第308号文件注③。

② 指1930年11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最近国际来信的决议（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第500—502页）。

③ Г. М. 别斯帕洛夫。

④ 见第319号文件。

⑤ 指中国共青团五届三中全会。

际接受远东局对中央全会政治决议的修正案，也没有及时审查三中全会的决议。

考虑到中国领导同志尽管与远东局协商过，但是并没有按照商定的方式把对政治局活动的评价写进三中全会决议，还考虑会有这样一种可能，即中国同志对其他问题实际上可能提出不同于与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商定的提法，因此远东局认为，有必要在对三中全会决议文本作出分析之后再对这些决议作出评价。

远东局责成奥斯藤、罗伯特^① 和维利同志在最短时间内审查与三中全会有关的所有文件，并向局报告自己的意见。

八、通知中共中央，未经与远东局事先协商，不应把党的负责工作人员，特别是由于政治原因而开除出党。

九、鉴于古德科夫、戈卢别夫、博古列洛夫^② 等人提出的声明，责成奥斯藤同志审查所有材料并向局阐述自己的意见。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578，第 31 页。

德文打字稿，副本。

① 分别为：И. А. 雷利斯基、Г. 埃斯勒。

② 分别为：沈泽民、陈原道、秦邦宪。

332

临时小组的决定^①

1930年11月27日于上海

秘密

我们在讨论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②、[中共]三中全会决议、11月16日共产国际来信^③和25日中央政治局决议^④之后，一致通过以下决议：

1. 共产国际的正确路线是唯一布尔什维克的路线。小组完全同意这一路线。
2. 过去在李立三领导下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是反共产国际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和反列宁主义的路线。三中全会没有对它进行布尔什维克式的无情打击。相反，三中全会怯懦地采取了机会主义的、“市侩式的”和妥协的方针，而且还支持这种路线。把共产国际路线和李立三路线混为一谈，并认为李立三路线是协同一致的——这就明显证明，三中全会是在口头上有条件地接受共产国际路线，同时它在继续坚持李立三路线。三中全会本身还以种种借口从原则上和策略上以及许多重要问题（如对国际形势的估计、世界革命与中

① 文件标题是原有的。

② 指共产国际执委会1930年7月29日通过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见第257号文件，以及《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第271、583—628页）。

③ 指1930年11月16日在中国收到的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给中共中央的信（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第500—502页）。

④ 指1930年11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最近国际来信的决议（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第500—502页）。

国革命的相互关系、革命的不平衡性、关于土地革命、关于中国革命的前景等问题)上歪曲共产国际的路线,并且继续坚持中央过去在李立三领导下执行的路线。

3. 三中全会后,政治局在对帝国主义者和国民党进攻红军问题的分析上,又重复了“吉德”(?)^①式的分析。在实践中没有带来任何变化。李立三路线在领导机关中仍然很有势力。

政治局11月25日决议只是要外交手腕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还在试图使人们的注意力离开关于路线问题的原则性分歧。这表明,他们仍不愿意放弃李立三路线,不愿意坚决按照共产国际的路线进行工作。

4. 因此,我们认为,党中央领导已经垮台,他们不能保证执行共产国际的路线。为了贯彻执行共产国际的路线,我们应该做好以下工作:

(1) 我们应该把那些坚决支持李立三路线的不肯悔改的机会主义分子驱逐出(中央、各局、省委)领导机关。

(2) 我们应该在党的报刊上向中央过去的路线(李立三路线)开火。在秘密工作环境允许的范围内,我们应该站在共产国际的路线上开展广泛的自我批评和加强两条战线的斗争。

(3) 我们应该把那些在与李立三路线和其他错误倾向的斗争中表现坚定的同志推举和吸收到领导机关来。

(4) 我们认为,中央不重视同志们的政治理性意见,不答复我们的声明,这是不能容忍的。本小组对这种态度表示抗议。

(5) 至于一般政治理性意见和其他问题,我们将向中央和共产国际递交另一个声明。

临时小组:

① 原文如此。

签字：陈原道

陈绍禹

秦邦宪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625，第 21—22 页。

打字稿，副本。

333

斯托利亚尔给洛佐夫斯基的信

(摘录)

1930 年 11 月 28 日于上海

秘密

亲爱的亚历山大^① 同志：

这里的工会工作还不能说出现了某种真正的转变。特别是最近几周来，一些负责同志告诉我们，在那些迄今为止一直表现得很积极的干部中间普遍存在着一种非常可怕的消极情绪。消极、失望和临阵脱逃——这些自然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以前“立即举行武装暴动”的错误政策所致。失望和消极是对这种政策的一种反应。当然，这是以前就已经存在的那种消极性，不过现在表现得更突出了，因为再也不能用左的词句来掩饰了。在整个这一过程中值得肯定的方面是清醒了。不仅我们，而且同志们都开始逐渐比较清醒地考虑我们究竟有什么东西，究竟缺少什么东西，在组织上有哪些重大的失误，等等。但是至今要让同志们采取具体的实际组织措施还是很困难的。我们和他们一起制订了所谓的组织计划（我在上一封信里已经提到）^②。这个计划规定了最简单最起码的东西，例如派出三四名指导人员去北方和南方（而不是根据同志们的庞大计划派几十人），立即向苏区派一两个同志（直到现在还没有派），筹备一些很必要召开的丝厂女工、纺织工人、无产阶级青年的代表会议，等等。

① C. A. 洛佐夫斯基。

② 见第 317 号文件。

在试图落实这些最简单的措施的时候，我们组织的弱点第一次赤裸裸地显露了出来。我们工会干部的状况糟糕透了。每当我们询问什么时候能派出哪怕一个同志去北方时，他们总是回答我们说：“我们这里没有这样一个合适的同志，缺了他我们也能应付这里的工作。”我们坚持要求，立即不讲任何条件地成立一个不大的小组（或培训班），比方说，为 10 至 15 名优秀的积极的男女工人成立一个小组，经过两周或三周的短期培训，他们就能发挥组织者、指导者等的作用。我们的朋友们还是反对这样做，但我们将断然坚持自己的意见。

何况形势对我们非常有利。光是上海就有无数次自发的小型罢工和发动，这些罢工和发动是旨在反对减少工资、取消大米配给、解雇工人等等。在多数情况下，我们的工会都不在这些罢工场合出席。这说明我们的红色工会在企业中还没有巩固的基层机构，因此当某个企业爆发罢工的时候，总是由工会派一些同志（工作人员和工人）到这个企业里去。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在其他企业中的工作就立刻停顿下来。丝厂工人运动，就是我们组织薄弱的一个明显例子。当 90% 的丝厂不仅由于总的经济危机，而且也是为了抗议南京政府发的强制债券、实行的税收政策等等停产时，丝绸行业有 6 万多名工人被抛上街头（遭解雇的多数是妇女）。在工资降低 10—20% 的条件下许多丝厂又重新开工了，这时，很自然就在女工中间开始爆发工潮。据说，我们的工会只有 60 名会员，至今在这个工业部门既不能组织发动，也不能领导任何运动。最近几天有 8、9 名最积极的同志被捕，这就使我们变得更加软弱无力了（我们在一家工厂的宿舍里召开一次群众集会，500 名工人中只来了 30 人）。

上海联合会^①报告说，在上海只剩下 1600 名会员，就连它自己对这个数字的准确性都表示怀疑。11 月 7 日活动的完全失败给我们所有人，其中也包括中国同志，留下了沉痛的印象。这一天暴露了

^① 上海工会联合会。

党和工会内部的真实情况（令人可怕的消极情绪和组织涣散）。应该承认，尽管在许多地方工人们都在期待着我们的领导，可是我们连一个企业都未能很好地发动起来，更不要说群众性示威游行或一般的什么游行了。最近还有一个插曲：本月16日上海联合会召开一次代表会议。本来应有42名代表到会，但只来了20人。根据这些同志自己的评价，这次代表会议收效甚微，因为在会上感到有一种低沉的消极情绪和悲观主义。新干部没有参加会议（因为没有铁路员工和丝厂工人的代表！）。此外，工会工作人员同志告诉我们，前几天召开的江苏省委代表会议流露出对工会问题十分冷漠的态度。一些同志还在那里发表左的言论，反对日常的经济斗争（已答应把这些讲话记录给我们）。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现在由我们的海员工会准备的海员罢工。我们专门研究了这个问题，与海员工会书记^①进行了专门的交谈并了解了他们的计划。在远洋轮船上工作的海员正在掀起强大的工潮，海员们在与监视员和班长制度进行斗争。这种监视员（班长、工长）拥有雇佣和辞退海员的权力。他们简直榨尽了雇佣工人的脂膏，从他们身上收取大量的贡品，这才允许他们在船上工作。中国远洋轮船海员的工资只有外国海员工资的1/6左右。十分明显，不在外国海员当中开展广泛的运动，斗争是不会成功的。五个月前，香港海员进行斗争的尝试完全令人信服地说明了这一点，香港的船主随便地雇用一些新的船员，轮船就可以继续远航。同样需要把海员运动同港口工人和码头工人运动紧密结合起来。我们的海员工会是与群众有联系的、为数不多的比较积极的工会之一。海员工会有这样的基础，自然是有历史原因的。每当海员的报纸出版（印数为3000份）时，确实就在海员中间广为散发，海员报与香港和上海的船员们保持着经常性联系。

① 可能是陈云。

我们首先采取了以下步骤：我们印制了告外国海员书（你们将从这次邮件中收到几份^①），现在用三种语言在主要港湾的轮船上散发；同时我们向我们在澳大利亚、菲律宾、美国、加拿大和英国的同志以及我们的海员国际^②发去了信函，建议海员国际开展声援运动；海员工会的一些负责同志被派往香港和北方，以便在那里打基础。遗憾的是，我们在码头工人和水运工人（内河航运）中的阵地还很薄弱，特别是我们在汉口、南京和九江（以及汕头）的党组织和工会组织被破坏后，我们的阵地就更薄弱了。这种运动的一个很有意思的初步成果，就是《弗利德》号轮船上的德国革命海员与中国同志在上海召开了一次小型会议。现附上在这次会议上起草的并由德国同志们签名的致我们海员国际的一封信^③。

我们还不知道这一运动的进一步发展情况。有一个请求：请转告乔治^④同志（我曾通过德国给他写过信，谈到此事），对于国际来说这里有非常好的条件在远东建立巩固的基地和同其他国家海员进行联系。我甚至想过，可否建议向上海或香港派一名专门的组织者和工作人员去同海员国际进行联系。这样的同志可以给中国同志提供很大的帮助（例如，他们很难渗透到外国轮船上去，等等）。当然，这是一个实际可能性的问题。

在这封信里我想比较详细地谈一谈另一个问题，即苏区工会问题。

不久前，有四位同志从赣西南和赣东北苏区来到这里。他们的到来第一次给我们提供了了解苏区工会情况的机会。

我认为，最好是从这些同志的报告中给您摘录一段话：

① 文件没有找到。

② 海员和港口工人国际是红色工会国际内部的一个行业联合会（1930—1934）。

③ 文件没有发表。

④ j. 哈迪。

“……^①降低(!)工资是这些地区的普遍现象。只有在永新一个地方(赣西南地区)职员的工资从32个铜板增加到40个铜板,这还是根据苏维埃政府的命令办的……^②百分之八十(80%)的工会领袖和工会工作人员是企业主。在许多情况下,他们都是由党的机关直接任命的,因为这些人要比普遍无产者更识字,更会写会说……根据这个理由,一个工长就成了赣西南苏维埃政府的副主席……据这些同志说,这并不是个别的现象,而是普遍的规律。8小时工作日,尽管由法令颁布施行,但实际上没有执行。根本就不进行任何斗争,这也毫不奇怪。除了个别一些场合,苏维埃政府直接命令进行罢工外,不举行任何罢工……谈不上存在真正的工会……在许多地方召开群众大会,所有参加者都宣布自己是工会会员,这就完了,此后也就见不到工会活动的影子……赣东北的情况比赣西南的情况还要糟糕。在赣东北,根本没有工会,只有一些筹备委员会。农业工人工会直到现在哪儿都没有……在苏区同志当中反工会情绪占上风。他们这样议论说:‘工会向红军提供战士、粮食等等,但是工会根本没有用处。建立工会干什么!’……党完全忽略工会工作……罢工只是根据苏维埃政府的命令举行的……地方工会的全部活动常常只是把公报或什么通知张贴在苏维埃政府机关的门上”。

(这是从口头报告中摘录的一段话;他们还答应给我们书面报告,但是上面所引的材料也足以使我们对当地情况有一个概念了。)

我们与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同志详细地讨论了这个问题。他们试图在与苏维埃代表会谈前就工会问题给苏区起草一个指示草案。我们讨论了这个草案(见邮件)并否定了它,因为它不符合工会的使命并且有多处错误。在听了来自苏区的同志作了令人震惊的报告后,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同志们完全同意我们的意见,应该以最认真的态

① 此处和以下的删节号是原有的

②③ 文件没有发表。

度从最基本的情况开始，弄清工会的问题并要从根本上对苏区工会进行改组（或者更确切地说重新成立工会）。我们给他们写了一封信，特别谈了这个问题，同时作出了指示，供他们作为寄往苏区的训令的基础。（这封信也附在这次邮件中。）^① 您大概还记得我给您写过，在上月召开的工会全会上一位代表是怎么说的（我在会上作了一个报告），他说：“何必要在苏区把农业工人组织起来呢——要知道，我们那里在进行土地革命！”……看来，这完全不是偶然的呼声。许多负责同志过去坚持过这种观点，看来现在还在继续坚持这种观点。这种思想显然还会传播到苏区工会。从上面的引文中您可以看到，有这样一种理论看来已广泛流传：在红军攻占某个城市、某个乡村，或者占领一个完整的地区后，阶级斗争一般就停止了……

无论如何，我请您一定看一看我们就此问题写的信并给我们寄来可行的建议和您的补充意见。不仅苏区农业工人工会问题，而且整个中国（当然，特别是苏区）农业工人工会问题都需要进行专门的讨论，如果我们能收到关于最简单的组织问题的材料，那就好了，这样就可以让中国同志了解这些材料。我们打算在最近就这个专门问题给中国同志们发去一封专函和一些专门指示。

最后，中华全国总工会的纸报^②又开始出版了！已出了几期。我们应该尽快认真地分析这家报纸和其他机关刊物的内容和性质，[但是] 由于技术原因和其他原因，直到现在，在这方面我们还什么事情也没有做。此外，同志们答应尽快发表第五次代表大会^③ 决议（为答复他们的电报请求，我们给他们追加了用于此事的 1000 元）。

对于工会来说，财政问题比简单的款项问题要重大得多，而且

① 文件没有发表。

② 《劳动报》，1929 至 1930 年间在上海出版。

③ 指红色工会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见第 181 号文件注④）。

具有直接的政治组织性质。对此我想说说以下情况：我们得知，所有人也都承认，近五六个月来，党从工会的经费中毫不客气地拿走了2.3万多元（!!!）。很明显，当通过这种办法把工会的经费截留50%之后，中华全国总工会及其分会的组织活动必然受到严重的损害。不必感到惊奇的是，我在几天前收到中华全国总工会一封信，要求支付100墨西哥元为一名工作人员制做棉衣……（这笔钱我已支付）。不必感到惊奇的是，每当提起往北方派遣一名指导员或组织员的问题时，我们得到的回答都是：“没有钱。”这里最有趣的是，从中华全国总工会的财务报告中什么也发现不了，这就说明这种财务政策是有问题的。在财务平衡表中一切都完全符合……现在该结束这种做法了。我已经向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同志们指出，今后他们绝对不要这样来糟蹋自己了。让党尝试通过我们局^①去办理这种业务。（但是很清楚，目前党缺少必要的资金，未必能避免这种做法）。

请您注意！从随信寄去的资金平衡表中您会看到，我们现金库的状况快要达到紧张的极限了，因此很快就得考虑许多事情了……我还要请您给我一些指示：我是否应该付给从您那里回来的各国代表从这里返回的路费，如果应该，那么怎么办？

现在我来谈谈关于技术人员的这个老问题但又总是新的问题。我给您发去整整5份电报和同样多的信，请求从美国或英国给我派一名女速记打字员来，因为没有这种技术力量就不可能出版通讯。毫无疑问，恰恰现在这种通讯可能具有巨大的价值。正是现在我们开始与印度支那、马来亚诸国等建立初步接触。目前，这些国家的同志们正需要最基本的东西，而我们可以通过英文通讯向他们阐明这种东西。昨天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同志还问我，什么时候才能重新出版《远东通讯》^②。这种通讯可以给菲律宾的同志们以极大的帮助。然

① 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

② “Far Eastern Bulletin”即《远东通讯》，1929至1930年和1932年在上海出版。

而……直到现在我都没有得到哪怕一个肯定的答复，您已经收到了我关于这个问题的电报和信函。

关于这个问题，我有一个具体的建议。由于在我动身时您曾告诉我，您原则上是同意的，问题只是什么时候和从哪里找到一个技术人员，而直到现在，看来这个问题没有得到任何答复，所以我请求允许我聘请一位好的可靠的助手，这位同志正准备从澳大利亚来这里工作^①。我为她承担政治责任。您只要批准我这一举措并拨给必要的经费（需要 70—75 英磅用于路费，然后当然要付给她像其他技术人员所得到的正常工资）。如果您同意，请电告我 [……]^②

我以下列充满天真希望的表述来结束这封信，我想我最终会得到对一些问题的答复的。请不要滥用我的天真……

致衷心的问候！

列昂^③

随邮件给您寄去下列附件：

1. 关于苏区工会的信；
2. 一份菲律宾指南；
3. 致海员国际的信；
4. 我的第 5 号和第 6 号财务报告（截止到 29 日）；
5. 一些文件和澳大利亚的答复。

此外，还有各种材料、报告、记录等等^④。

全宗 534，目录 4，卷宗 320，第 84—91、95 页。

打字稿，副本。

① 何人不详。

② 以下删去该信关于菲律宾和澳大利亚工会工作的部分。

③ C. A. 斯托利亚尔。

④ 文件没有发表。

334

盖利斯给别尔津的信

1930 年 11 月 28 日于上海

绝密

亲启

亲爱的老头子^①：

党的财政状况非常严峻。他们从莫斯科得到的预算不能保证完成现有任务。党在群众中的影响不够大，难于依靠自己的力量，在开展群众运动的基础上找到必要的资金来采取重大措施，组织对敌人首先对苏区的总围剿的反击。在苏区的各军中都有些值钱的贵重物品（例如第 10 军，据由那里来的一位同志报告说，它积攒有价值 10 万墨西哥元的贵重物品。这位同志原来想带一部分贵重物品给俱乐部^②，但是由于担心遇到不测未能带来）。贵重物品在其他部队也有，但是在目前的通讯联络条件下，很难指望上海能从那里得到什么。地方上（苏区）不缺钱，但是直到现在他们都无法帮助上海。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钱。如果党不掌握一定数量的资金，培训人员和派遣他们去苏区是绝对办不到的。在党现有资金的情况下，只能偶尔派遣个别一些工作人员，根本谈不上派遣大批工人。派遣一名工作人员平均需要花费 200 到 240 墨西哥元，用于购买食品、车票等花销。

如果党在相当多的工人阶层中有影响，如果我们有工会和其他群众组织，那么经费问题就会是另一种状况。但是这种条件没有，而

① Я. K. 别尔津。

② 原文如此。指中共中央。

在那些多少存在这种条件的地方，工会组织在一些企业中如此软弱无力，根本就别想它们能在资金方面给党以帮助。罢工失败不仅是因为缺少坚强的领导，而且也是因为饥饿迫使工人接受企业主提出的条件回来复工。极其秘密的工作条件也需要比在其他条件下，例如在西方，花费更多的经费。为了会见、集会等等，党必须有房屋，有专用住宅，为此要花费大量资金，而一旦暴露或者有暴露的可能——这一切就会化为泡影。由于没有经费租房，曾多次发生过同志们遭到不幸的事件，如刘〔云〕的牺牲。党员们从自己的薪金中拿不出钱来捐给党，他们的工资微不足道，还不够吃饭；工作人员，其中包括俱乐部人员^①，每月才拿 20 墨西哥元。

党每月从莫斯科收到 1.5 万美元，它要用这笔款项支付自己机关费用，要开展工作，往苏区派遣人员，租用住房，出版报纸、杂志、传单等出版物。显然，这笔钱是不够用的，难怪每一次会见周恩来的时候，他都提出经费问题。有时我们提出某些新任务，他就用自己的回答让我们明白，似乎我们只会提出任务，但很少考虑贯彻执行这些任务的可能性，不在经费方面给他以帮助。当然，我们也常指出，党应该去寻求经费，……^② 不能完全给予保证，而且这在政治上也是不对的，等等。然而我们认为，如果有这个可能的话，那么正是现在，当一切势力为了消灭我们而动员起来围剿党和苏区的时候，应该通过发放一次性补助金的办法去帮助中国人。这就是我拍发密电，要求给我汇来 1 万美元的原因。威廉^③ 到来后我们讨论过这个问题，并且拍发了密电，应该给我们汇来 10 万美元，作为一次性补助金^④。

① 指中共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

② 删节号是原有的，可能指共产国际。

③ H. A. 米夫。

④ 文件没有找到。

这笔钱的主要用途是加强苏区的防御能力。按照下列基本用途开支：

- (1) 瓦解军阀部队。这方面的工作进行得相当顺利。如果有资金，我们就会把这项工作做得更好。
- (2) 与苏区建立固定的路线和联系。要有固定的联系和向导。
- (3) 往苏区派遣指导人员。在上海、汉口、香港及其他中心城市为工人举办短期培训班并派他们去苏区。
- (4) 派遣指导人员，在那些可以开展游击运动的地方，特别是在军阀部队活动的地区及其调动的路途上，组织游击运动。
- (5) 组织破坏行动。
- (6) 为各军创办新的修理厂（5、6个）。开办技师学校。这笔钱用于整个冬季和春季的工作。当然，如果不拨给这笔钱，那么，上述列举的各项工作将会以迄今为止的速度继续下去，也就是说是很不够的。形势和我们苏区的前景给我们提供了请求拨给这笔款项的理由，因为一切都说明，在对总围剿进行相应反击的情况下，我们不仅能够打退敌人，而且还可以扩大我们的运动。

致同志式的敬礼！

弗雷利希^①

全宗 495，目录 19，卷宗 116，第 1—1 页背面。

打字稿，副本

① A. IO. 盖利斯。

335

瞿秋白给共产国际 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的信

1930年11月29日于上海

秘密

我们关于中国苏区农民土地 问题和经济政策的补充意见

斯特拉霍夫^① 给共产国际
执委会东方部^② 的信

中共三中全会已经批准苏区的工作计划^③。这个计划还包括土地分配和经济政策问题。不久前我们从共产国际东方部收到了关于这个问题的决议案原件^④，此外，我们还了解到许多新材料。因此我们写了以下补充意见，供共产国际执委会讨论中国问题时审议。我们的主要意见在得到政治委员会批准的苏区工作计划中几乎已作了全面的叙述（这个材料已寄给共产国际执委会）。

① 瞿秋白。

② 原文如此。应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

③ 该文件于1930年10月24日由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第428—464页）。

④ 指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关于苏区农民土地问题的决议案（见同上书第622—638页；亦见第308号文件）。

一、农民土地问题

1. 我们同志在今年7月收到的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①中有下面一段话：“必须没收全部地主土地，没收属于大型不动产类的所有教会、氏族等的土地。要根据平均分配原则把这些土地分给贫农和中农。”这个方针就反对地主战线问题向农民作了许多说明，在这个口号下可以使全中国农民行动起来。但是在地主土地已经被没收的苏区，如果重新分配土地，我们就一定要支持贫农、苦力和雇农关于彻底平均分配所有土地的观点。（在共产国际不久前的来信中说：“只有被没收的地主土地，才实行平均分配——这是不对的。”^②我们在这里作出的解释对不对呢？）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在其决议草案中提出的关于这一办法的建议是完全正确的。如果不把全部土地实行平均分配，那么独立富农^③（与租地富农相对而言——B. B.^④）将会占便宜，而有地的贫农不会得到任何好处。这对于佃中农则更不利。如果佃农仍要重新分配已被没收的地主土地（大部分是佃农耕种的土地），那么佃中农必然会遭受很大损失。因此在所有苏区平分土地的口号变成了贫农、雇农和苦力的普遍要求。中农反对平分土地的情况我们了解得很少（只收到鄂西苏区一个报告，报告中说，监利县的中农反对平均分配土地，但是报告中所说的中农，看来也包括富农）。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寄来的草案对中

① 指1930年7月29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中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已经了解这个决议。该文件于1930年9月中旬到达中国。由于该决议是从中文转译的，其第6项的这段引文不准确〔见《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集）》，第205页；亦见第257号文件注⑦〕。

② 指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立三路线给中共中央的信。引文出自该信的第4点（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第649页。）

③ 指拥有自己土地的富农。

④ 显然是B. B. 维什尼亞科娃。

农利益所作的解释是很恰当的。

2. 在分配土地原则方面，我们同意东方部草案中提出的原则，我们认为，根据劳力和人口数量分配土地的混合原则是比较合适的。目前在许多苏区是按人口数量分配土地，富农最占便宜，因为他们都是大家庭。事情弄到这样的地步，富农偷偷把地主的孩子抱到自己家或为自己的儿子招童养媳，目的在于扩大自己的家庭，按人口数量分得更多的土地。在富农路线最盛行的地方，甚至有人提出：也应给地主家庭分配土地。他们提出的理由是：要么是彻底消灭地主家庭，要么是应给他们分土地，使他们不致饿死。这种错误观点在江西苏区很流行。只按劳力分配土地的原则，从江西省的经验看也有缺点。老人、残疾人、孤儿和寡妇就分不到土地。有很多人口的中农家庭也是一样，从中占不到便宜。在机械地实行这一原则的一些地方，有人提出：应该把红军家属的土地收回来，因为这些家庭没有劳力耕种土地。

3. 在分了土地的苏区，甚至手工业者和苏维埃所有职员也分到了土地。实行的是每个人都分得一小块土地的办法。结果是许多土地荒芜，无人耕种。苏维埃徒劳地采用了类似于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种种名称，而实际上甚至都没有把红军战士家庭的土地合在一起并帮助它们雇人耕种。结果红军战士家庭由于妇女体力弱自己不能耕种，分得土地后连一个雇工也雇不起，因此不能从土地革命中得到什么好处。

4. 在收到共产国际执委会决议之前，未在任何地方组织贫农团。成立雇工工会的地方同样也很少。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农民协会消失了，而其它社会组织也没有建立起来，甚至对阶级组织——雇工工会也表现得漫不经心。因此农村群众是一盘散沙，这就便于富农在暗中搞垄断和欺骗以夺取领导权。富农还制造了这样的理论：平分土地后，雇农分了土地，现在还能说有什么雇农吗？

5. 苏区五月代表会议^①后，在各地开始宣传把土地收归国有^(?)^②，禁止买卖和出租土地。但是却宣布，不禁止雇用劳力。这个指令打乱了现在我们要采取的各种实际措施，一方面，给实现今天的迫切要求带来了巨大危害，另一方面，是过去左倾影响的表现。

二、经济政策

1.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目前中国苏维埃地区还没有经济政策。所有经济措施都不是以阶级观点作为自己的出发点，因此红军占领城市后，一方面，张贴关于“保护中小商人”的布告，甚至彭德怀在长沙给商会写信说，“贵组织同情革命”，希望它能集资支持红军。另一方面，红军采取了强迫降价的办法，试图降低苏区最低生活标准。确实，借助于这种强制性的办法，在赣东北苏区，大米价格降到一担 40 分钱，不到南昌米价的 20%。但是经济开始停滞不前。在苏区内（由于苏维埃政府实行限制）无法弄清大米的储存数量。大众消费品不能进入苏区。这种情况在江西省西部和福建省可以看到。说到“剪刀差”时，他们制造了这样的理论：不能给工人提高工资，因为由于米价降低他们的实际工资已经提高了。此外，农民也会反对给工人提高工资，因为如果提高工资，那么商人就会提高商品价格，这就打击了农民。这种机会主义理论是与强制降低价格和自我封锁的经济政策有紧密联系的。

2. 因此，苏区工人阶级反对资本主义剥削的斗争不仅没有得到发展，而且要举行罢工还得取得政府的允许。在一些地区，甚至在城市里，都没有成立工会，说：“我们只理解农民的暴动，我们不善于在工会中做工作。”这种机会主义与农民心理的结合是目前在中国苏区加强无产阶级领导作用的极大障碍。毫无疑问，在农民的这种

① 指苏区代表会议（见第 151 注②）。

② 原文如此。

心理中，富农路线占据主导地位。

3. 苏区的财政政策很混乱。一些苏区发行纸币，但这些纸币是用很糟糕的纸张印制的，很快就不能用了。这些纸币是采用油彩石印术印制的。此外，发行量也没有限制。最近鄂西工农银行开始发行用石板印刷术印制的纸币，而且限制印制数量。财务部门的开支都不列入预算。一些苏区有比较集中的财政政策，另一些苏区则各行其是：红军、政府、党组织自己征收钱款，根本不实行建立在阶级立场之上的税收政策。这在某些情况下必然会损害贫农的利益。

4. 关于对放高利贷的钱庄的政策，在苏区工作计划中提出了完全没收的意见。现在我们觉得，东方部草案中指出的方法更合适些，但要作补充，这就是对所有钱庄必须限制或禁止放高利贷，也必须取消他们发放期票的权利。钱庄老板一旦违犯法律或参与反革命组织，就要对其进行罚款，直至没收全部财产。

5. 合作社运动。必须在群众中宣传合作社制，特别是为贫农和中农办的供销合作社和为城市工人办的消费合作社，这对于同富农竞争和同商人垄断进行斗争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鉴于通信员马上要走，这封信我署我个人名字，不提交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

斯特拉霍夫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599，第 26—32 页。

打字稿，副本。

336

盖利斯给别尔津的信

1930年11月30日于上海

绝密

亲爱的老头子^①！

由于我们至今还未能执行前往苏区的指示，而从我们到达上海之日起已经过去两个多月了，我想向你报告一下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与朋友们的第一次会见时，我们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进入苏维埃地区，以便做好那里的工作。朋友们许诺采取一切措施组织好这件事。我不知道由于什么原因，以前向苏区派遣人员，不是经过东方（汕头、厦门、广州），而是取道汉口和长沙。起初以为，我们也可以通过这条路线进入苏区。但是，在少先队员^②未能经过长沙进入苏区而返回（见我过去的报告）^③，并且那里有几位同志遭遇不幸后，我们开始认真地研究路线从哪里……（遗漏）^④。顺便说一下，不久前也是经过汉口被派去的一位共青团中央委员现在正在返回上海途中^⑤。另一方面，最近经白亚^⑥和汕头从苏区来了几位同志。这说明，这条路线可以利用。的确，到这里来要比到那里去容易些。但是在作出相应安排情况下，这条路线要比

① A. K. 别尔津。

② 关向应。

③ 见第316号文件。

④ 原文如此。

⑤ 何人不详。

以前的路线更有利，经过……（被删掉）。

一个月前，中央就派人到汕头和厦门去安排路线。一段时间好象一切都就绪了，但突然汕头和厦门的党组织遭破坏。政治局委员贡^①的行程也被推迟，现在他滞留在香港。现在那里的情况又有好转。昨天从中国人那里得到的消息说，贡已经过去了。过10天，将运送修理厂设备，随后就护送我们。很难说所有这一切会拖延多久。关于起程的时间也很难说，因为目前中国人还没有提出任何具体的计划。作为商人去那里不方便，中国人建议作为传教士，他们可以准备一些证件。但问题不在于终归可以到那里去，问题在于要有熟悉路线的人。

还有一种可能性。这就是借助于拉姆扎伊^②的帮助。他说，他有安排这次远征的一些条件。他可以从自己的领事那里弄到一些证件，还准备从浙江省省长^③那里搞到一封保护信。我想，指示他安排这件事还是值得的。他自己也愿意。我们在当地可以从政治方面利用他。何况在那里除了我们再不会有任何人，我们将主要忙于军事问题。即便中国人能成功地安排这次行程，拉姆扎伊还是能给我们提供较大帮助的。请发来指示。

关于行程可以报告的情况主要就是这些。我想，最终我们是能够到达那里的，无论如何我们要试一试各种可能性。尽管在上海我和克拉因斯^④都十分忙于军事（卡尔^⑤不太忙），然而这项工作并不使我们感到满意，更何况在领导苏区军事工作方面，我们在这里能

① 原文如此。看来指项英。

② P. 佐尔格。

③ 张难先。

④ B. II. 马雷舍夫。

⑤ A. C. 费尔德曼。

做的事情很少。可能错过了一些机会，以前没有与奥斯藤^①（东方？^②）着手建立路线。至少从那里来的同志们说，他们没有遭到搜查，也没有人阻拦他们。当然，一个外国人去那里是困难的，这只要求做更精细的组织工作。关于不可能的事情，目前我们还没有做实际尝试，也根本谈不上。至于苏区的领导，那是非常软弱的。只是最近，即（空白）^③以后，在李立三路线被认为是冒险主义路线之后，中央才开始认真地对待这个问题。在李立三领导时期没有去过苏区，当时需要向全国各地派遣政治委员、特派员等去组织全国暴动。人员被派往各地，也派往修理厂，如派往汉口、香港，而没有派往苏区。关于与苏区建立固定联系的问题根本没有考虑。现在这个疯狂的冒险主义对苏区和对各个方面都有极其严重的影响，最后对我们的行程也有影响。

致同志式的敬礼！

弗雷利希^④

全宗 495，目录 19，卷宗 116，第 8 页。

打字稿，副本。

① И. А. 雷利斯基。

② 原文如此。

③ 原文如此。

④ А. Ю. 盖利斯。

337

盖利斯给别尔津的书面报告

1930年11月30日于上海

对中国红军部队的总的评述

（截止1930年11月15日）

作为对寄给您的关于一些军的情况的简要报告^①的补充，现我们对中国红军部队作出评述。

1. 朱德和毛泽东的第1军团^②由第3、4、12、20和22军及一个陆军指挥学校组成。约有16500人，20200枝步枪，34挺机枪（各种型号），2门山炮（没有炮弹）。所有军都是3个团建制（第24军^③除外，该军有5个团）。团的建制为3个营。各军的社会成分：平均80%是农民（第3军除外，该军40%为安源矿工），其余是原当兵的人和土匪。指挥人员——多数是忠于革命的党员。士兵和各级指挥人员的战术训练水平很低。射击训练也很差：他们不太会使用机枪（第20军有10挺机枪，但都已运往后方）。整个军团的弹药供应全部靠缴获，没有自己的修理厂。供给机关是集中的。

党组织是健全的，也是相当强有力的（光是在第4军中党员和团员加在一起就有1500人）。所有连队都设有党支部，排里有

① 文件没有找到。

② 指军级集团。

③ 原文如些。应为第22军。

党小组。在第3、4和12军中全都配有政治委员和指导员，在其他军中没有全部配备。政治委员的职责以前不够明确，现在好多了。共青团小组刚刚在组建。

在第3、4和12军中设有○○^①。

指挥人员和红军士兵的相互关系是好的，都有革命的、高度自觉的纪律。

结论：朱德和毛泽东的军团是团结的和完全有战斗力的。

2. 闽粤军团由第20^②、21、11军组成。现在缩编成一个新的军团。总人数——8000人，有4200名战士，3挺机枪。战术和射击训练较差。指挥人员都是党员。政治委员和指导员不是到处都设有，因为缺少这类人。党组织较弱，政治水平不高。供给机关只在团的范围内是集中的。军团在作战方面听从朱德的指挥。

结论：这个军团在训练和战斗顽强性方面不如第1军团，但是由于该地区敌人不很活跃，这个军团还能顺利地守住该地区。

3. 贺龙的第2军团由第2军、第4军和1所陆军指挥学校组成。人数为8500人，有5200名战士，4挺机枪，5门迫击炮。社会成分：第2军——50%是过去的土匪，其余是农民和工人。在第4军中60%是农民，其余是原当兵的人和土匪。各军的战术训练水平不高。各军的弹药补充靠缴获。供给机关是集中的。多数指挥人员是党员。党组织是健全的，但是政治素质不高。政治委员和指导员不是到处都设有（缺少这类工作人员）。红军战士与指挥人员的相互关系是健康的、同志式的。

结论：贺龙军团是很有战斗力的。各军在战斗中表现得很坚定，也很顽强。

4. 彭德怀的第3军团由第5、8、15和26军组成。人数约有

① 原文如此，看来是：特务处。

② 军在不同的军团和其他兵团中可能有相同的番号。

1.7万，1300支步枪，17挺机枪，6门迫击炮。社会成分：70—80%是农民，其余是原当兵的人和工人。战术训练水平属于中下等。政治素质不错。党组织健全。政治委员和指导员普遍都有。供给是集中的。纪律以及红军战士与指挥人员的相互关系是很不错的。多数指挥人员是党员。

结论：第3军团是有战斗力的，并能顶住敌人较大的压力。

5. 没有列入军团编制的红军各军：

(1) 第1军是3个师建制，每个师有2个团。人数为6000人，有5000支步枪，12挺机枪。战术和射击训练水平低下。弹药补充靠缴获。多数指挥人员是党员。党组织软弱，政治质量很差。社会成分：50%是过去的土匪，其余是农民和原当兵的人。各师的供给是集中的。

结论：第1军具有中等战斗力。

(2) 第9军表面上是存在的。人数——400名战士。已采取措施加以扩充。

结论：该军没有战斗力。

(3) 第10军是3个师建制。人数——5000人，有4000支步枪，2门迫击炮。社会成分：多数是农民。战术和射击水平低下。党组织软弱，政治水平低。

结论：该军具有中等战斗力。

* * *

红军部队总人数及其火力可以用下列数字比较准确地表示出来：

(1) 人数	(2) 步枪	(3) 机枪	(4) 迫击炮	(5) 火炮
54000*	305000	70 (各种型号)	13	2 (山炮)

※人数中包括抬担架的人员（苦力）。

最后，我们认为有必要指出以下几点：

1. (1) 关于红军各军的数字材料是我们从不同时期由各苏区来上海的指挥人员、政工人员和党务工作者的谈话中收集到的。

(2) 材料属总攻击^①之前时期。

(3) 武器部件状况不清楚，估计处于被废弃状态，其质量标准低下。

(4) 所有部队都感到弹药不足。部队没有制造子弹和炮弹的修理厂，弹药靠偶尔缴获的战利品来补充。

(5) 部队的粮食和物资供给很不错，在一些军中甚至比敌军还好。

2. 红军交出吉安城，随后向赣南撤退，其原因是缺少通讯联系、部队极其分散（第1、3军团的战线长达600多公里）和缺少集中的指挥。

4. 现在红军部队的位置和敌人的位置都标在附图^②上。

5. 现在我们和中国人一起制订了红军未来行动的指令。指令草案附上^③。

全宗514，目录1，卷宗566，第191—195页。

打字稿，副本。

① 指国民党军队对中国苏区的第一次围剿（1930年10月至1931年1月）。

② 地图没有找到。

③ 文件没有找到。

338

雷利斯基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

1930年12月1日于上海

秘密

致共产国际执委会

关于1930年11月23日远东局就李立三路线^①问题作出的决议，我应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作出以下报告：

总的说来我赞成这个决议，但我反对决议的第二点，那里说：“远东局认为，虽然在它给中共三中全会的建议中对李立三同志的路线的表述，没有像共产国际执委会来信^②中那样在政治上十分尖锐地说李立三同志的路线是与共产国际执委会路线相对立的半托洛茨基主义路线，但是远东局在自己的全部活动中恰恰是从这一立场出发的。”我不能赞成决议的这一点，因为我认为，我作为远东局成员以及整个远东局，在与李立三主义作斗争时的活动都是正确的，并且总是在该局所作出的书面和口头表述中有清楚而完整的体现。

远东局在这个问题上始终都是在遵循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指示并根据中国的政治形势和党内状况同李立三主义进行思想斗争的。8月，李立三同志在中共政治局的几次会议上都讲了话，当时他以革命纪律来对抗共产国际的纪律，并说“共产国际不了解情

① 见第331号文件。

② 指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李立三路线给中共中央的信。

况”^①。远东局明确地提出问题，并说，李立三同志背离了共产国际的路线，因此也背离了中国革命的路线。当时的政治局领导试图把李立三同志的讲话说成是不谨慎，或者推托说由于中文翻译不好而曲解了原意，这时远东局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这是对李立三同志半托洛茨基式的讲话^②采取调和主义态度的证明。在莫斯克文同志和斯特拉霍夫同志^③到来之前，远东局和政治局之间没有达到互相谅解，因为李立三同志对抗共产国际，不能与远东局协调一致。只是在上述两位同志到来之后和收到共产国际执委会八月来电^④之后，政治局才开始转变。但转变是缓慢的。李立三同志企图把自己的讲话说成是偶然的局部的错误，或者是由于中文翻译不好而造成的误会。所有中国同志都感到同李立三作斗争很困难，所以有不使问题尖锐化的倾向。远东局坚决反对这种倾向，要求整个政治局，首先是莫斯克文和斯特朗^⑤同志明确地谴责这种路线。为便于同李立三路线作斗争，远东局认为有必要让共产国际执委会把李〔立三〕同志调走。当莫斯克文和斯特朗同志在政治局未能谴责李立三路线是反共产国际路线的时候，我们要求召开政治局与远东局的联席会议。在这次联席会议上，远东局代表——罗伯特^⑥同志和我——向政治局和李〔立三〕同志说明，问题不是局部的偶然性错误，不是不恰当的表述，而实际上是有两条相对立的路线：远东局执行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的路线和中国政治局部分人支持的李立三同志的路线。当然，说服

① 这里说的是1930年8月1日和3日李立三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见第265号文件）。

② 见第269、270号文件。

③ 分别为：周恩来和瞿秋白。

④ 见第291号文件。

⑤ 瞿秋白。

⑥ Г. 埃斯勒。

中国同志相信这一点是不容易的。中国同志提出这样一个理由：把李立三同志的路线说成是反共产国际的和半托洛茨基主义的路线，会带来必然的后果是，政治局中曾经支持过李立三的那部分同志要离开党的领导岗位，而这是不合适的，因为李立三同志及其支持者已经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最后，我们一致同意，决定采用以下提法：“从中共二中全会（1929年6月）到1930年7月，中央的路线总的说来是正确的。但是从1930年7月到8月，李立三同志领导的政治局背离了这条正确的路线，并开始走上半托洛茨基主义的、反共产国际的路线。李立三同志和支持他的同志们已经承认自己的错误，这一事实已证明，政治局是能够执行共产国际执委会的路线和领导中国革命的。”虽然也可以用别的话来表述，但是这种提法也表达了今年11月我们所收到的政治委员会来信所表达的同样意思。共产国际执委会8月来电和最近的来信都肯定了我们的工作——这个事实证明，在与李立三主义的斗争中共产国际执委会的观点和远东局的活动之间没有任何矛盾。

迫使远东局多数成员投票赞成由约瑟夫^①同志提出的远东局决议的第二点的理由，可以归结如下：“三中全会在其决议中没有对李立三同志的错误作出像共产国际执委会来信中所作出的那种评价，政治局又不得不对该问题作出补充决议——这两个情况也迫使远东局为此承担责任。”我认为这个理由是站不住脚的。根据远东局和个人的全部活动，并引证我们与政治局中的中国同志一起对李立三同志的路线作出的决议，我不能同意说我“忽略了”同李立三主义作斗争的说法，你们可以根据你们所掌握的文件对此作出判断。中国同志对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机构采取了不老实的态度，他们利用远东局中谁都不能审阅中文表述这一情况，

① П. А. 米夫。

歪曲了与他们商定的建议，对此中国同志们要承担全部责任。中国同志在全会上没有提出他们与远东局商定的那种表述，关于这一情况他们甚至都没有预先告诉远东局——这是事实，斯特朗同志本人在与约瑟夫同志谈话时证实了这一点。我不能也不想为别人的罪过而进行忏悔。

请共产国际执委会根据实际情况评价远东局的工作，也就是说，远东局的工作是正确的，是符合共产国际执委会路线的。对我个人来说，对托洛茨基主义采取调和主义态度的污点是不能接受的，哪怕这是用最温和的方式提出来的。

致同志式的敬礼！

奥斯卡^①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566，第 164—165 页。

打字稿，原件，亲笔签字。

① И. А. 雷利斯基。

339

米夫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

（摘录）

1930年12月2日于上海

秘密

亲爱的朋友们：

我将作个简短的报告。第一是因为你们将收到大量邮件和有关我们工作各个方面的专门信件，第二是因为我认为自己对政治问题了解得不够，我想在下次去信中再谈。

1. 在反动派阵营里。表面上南京与北方的战争以盛大的仪式宣告结束，南京在所有高级外交官出席情况下于11月中旬庆祝了“自己”对北方集团的胜利。但是中国确实是一个独特的国家，无论南京如何自吹自擂，实际上它在这场战争中遭到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大的失败。在北方集团中只有一些将领作了变动。张学良把指挥棒抓在自己手里，他打着同北方人作战的幌子，实际上联合了所有力量来反对南京。蒋介石只好吞食苦果，表示同意对他很不利的瓜分中国方案：张学良取得对长江以北整个地区的统治权，而留给南京的是到处都有共产党人活动的南方。北方人未经任何战斗就放进了张学良的军队，他们保存实力，很有秩序地撤退了；张学良正如他声明的那样，准备“用和平方式”结束与北方人的争端，暂时让他们的所有将军留在原来的职位上；张学良企图麻痹南京的警惕性，去会见蒋介石并大谈国内和平的必要性——所有这些情况都说明，又一场新的、更加具有破坏性的大搏斗正在准备之中。前面已经提到的南京与北方的战争和随之而来的经济崩溃，致

使北方各省的农民运动活跃起来。南方特有的那种农民运动和游击活动,现在也已波及和蔓延到北方。报纸上纷纷刊登关于山西、陕西和直隶开展游击活动的各种报道。的确,北方的农民运动是自发的,我们的影响小得可怜,这种运动不能与南方的运动相比,也不能与其相提并论,但不管怎么说,大搏斗的必然结果是存在的。

行将爆发的军阀战争将会更加推动北方各省农民群众掀起的这场激烈运动的发展。不能说南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处境。起初,南京试图通过加剧同苏联的紧张关系来削弱张学良的威胁,企图把他的兵力引向苏联边界。但是张学良没有走上这条挑衅性的道路,暂时他更愿意利用自己的力量去进行对自己更为有利的对中国馅饼的瓜分。另一方面,苏维埃运动的扩大、“共产主义”威胁的增长越来越明显。与此同时,中国“社会各界”——地主、资产阶级、商人和帝国主义列强对南京的压力也加强了,他们一致要求消灭中国南方的苏维埃运动。南京在剥削阶级眼中的威望和帝国主义者的最后通牒式的要求,迫使南京同张学良签订对自己很不利的协议,这只不过是为了获得某些喘息机会,以便与苏维埃运动进行斗争。帝国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向南京施加了很大的压力——这是可以理解的。对他们来说,镇压中国的苏维埃运动不仅是为剥削这个国家扫清道路,而且也是对苏联进行武装干涉的必要预备阶段。

国民党四中全会^①的目的恰恰是要解决对苏维埃地区进行总围剿的问题。四中全会强调指出,这项任务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确实,在关于这个问题的一些决议中,存在着国民党所特有的一些不一致之处。例如,为了外部和平,根据外交部长报告作出的决议,为镇压苏维埃运动确定了三天的期限。关于这个问题的一个专门决议提出了三个月的期限,而在通过的宣言中却说是6个月

^① 国民党中央执委会第四次全会于1930年11月12日至18日在南京举行。

的期限。与苏维埃运动作斗争是四中全会的主要议题。除此之外也就其它问题通过一些决议，这些决议其实没有提供什么东西，只带有宣言性质。例如，重新提出了厘金问题^①。决定彻底取消厘税。从全会结束两天后发表的以下报道中可以看出，能为这个决议赋予的意义是如何之少：“据中国报社电，财政部长在取消厘税后将实行三种新税，这就是“Special tax”、“goods leaving factory tax”、“business tax”^②，前两种纳入政府收入，而第三种进入地方收入（“The Shanghai Times”^③ 1930年11月28日）。

还作出了关于召开国民会议的决定。这个决定的缺点就是不具体。南京人总是局限于一般的议论。根本没有说由什么人和如何来选举出席这次国民会议的代表。关于召开日期只在一处指出，国民会议不能在政府消灭军阀和共产党人之前召开，因为在他们统治下的一些地区不能保证在民主的气氛中进行选举。还指出，这次会议可能在5月5日召开，因为截止这个日期国民党有望消灭军阀和共产主义。很清楚，这一切都是蛊惑宣传，但是对我们来说，并非没有必要揭露国民党的这种把戏。

总之，对我们来说，四中全会决议中实质性的东西，就是准备对苏区进行总围剿。现在我来谈这样一个问题，由于这种围剿，我们会有怎样的前景。

2. 国民党并非毫无根据地把我们视作一支重要力量，并十分认真地准备同我们进行斗争。蒋介石担任总指挥。南京的多数军队与50名德国顾问一起在调往湖南和江西，这些顾问正在制定整个战役的计划。虽然小规模的交火已经开始，但是还应认为主要的重大战役要过一个月，甚至两个月后才会开始，那时南京将会

① 厘金是地方政权在省乃至县的边境征收的内部关税。

② 分别是：特种税、企业商品出口税和企业经营税（英文）。

③ 《上海时报》，日报，1931至1938年在上海出版。

调整好自己的兵力并结束一切备战措施。各种迹象表明，斗争将是激烈的，会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我们不能不考虑到，反对我们的敌人，拥有强大的武装力量、良好的（就中国的条件而言）技术装备、集中的指挥等等条件。但我们还是认为我们的处境并不是没有希望的。一方面，南京、广州、湖南的将领已经发生的争吵无疑会分散他们的一部分力量。第二，南京不会从张学良的前线撤走自己的所有军队，相反，在最近一个时期，显然还不得不在这个边境上集结自己的兵力。第三，同样毫无疑问的是，南京的军队在与红军的接触过程中必将会被瓦解，而在他们攻占苏区时游击活动将会把他们击溃，或至少搅得他们疲惫不堪。对我们来说主要的是，尽可能协调我们有相当多的兵力和有作战能力的一些军的行动和保证群众的最大支援。遗憾的是，由于在苏区采取了一系列愚蠢的作法，我们的处境恶化了（关于这一点下面再讲）。我们在从各个方面把党动员起来，反击总围剿。就城市中的群众工作、加强敌军中的工作、纠正苏区的错误等等发出了指示。我们采取了把赣南变成以吉安为中心的连成一片的苏区的方针。在这个地区的四周要开展游击活动。它四周的要冲应由我们各个军守卫。当然，也不排除这样的可能，即在敌人优势兵力的压力下，我们将暂时撤离这个地区。如果要问：是保卫苏区直到最后一个红军战士，还是挽救红军？那么，比较合适的作法，当然是后者。同时很清楚，我们应该根据自己现有的兵力来进行斗争，但是我们还应做最好打算，要考虑到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撤退到什么地方为好，在这种情况下，选择什么样的地区作为新的根据地，并继续解决组建红军的问题。

如果你们能和熟悉情况的同志一起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并与我们交换意见，那就好了。老的地区位于三省交界处，朱德和毛泽东已在那里坚持了两年多，这个地区未必合适。量变到质变。以前朱德和毛泽东率领一支不大的队伍能够在这个山区作战，而现

在，当谈到要形成一个有力的红军拳头的时候，该地区以前的优势就会成为完成这项任务的障碍。另一方面，远离发达的群众运动的地区也是不合适的。所以只好保卫这个开阔的地区。至少，我们要尽一切努力不撤离这个地区。我们要集中党的一切力量去完成这项任务。

3. **李立三主义和党的状况。**李立三主义比最初给人的印象有更深的党内根源。它的主要土壤是实践中的机会主义。李立三从理论上粉饰那种现在还在广大党员积极分子中流行的机会主义消极情绪，并给它披上了“左的”漂亮话的外衣。几乎所有积极分子都接受了他的“理论”，他们在这种“左的”漂亮话中找到了为自己的机会主义消极性作辩护的理由。这种机会主义消极性是表现在对群众进行真正的革命鼓动和组织工作上。现在，当李立三理论的假左遮盖物被揭掉之后，其机会主义的内在实质赤裸裸地暴露出来了。现在从各个方面可以听到对曾经束缚过我们某些组织的机会主义消极性的抱怨，这种消极性在李立三路线被粉碎后的最初日子里甚至还有所加强，因为又增加一些失望情绪，这种情绪曾控制了相当多的党员，他们指望世界革命很快爆发，但却没有等到。实际情况是：我们在工会工作方面没有任何重大成绩可值得吹嘘的。甚至形成这样一种印象：在加强我们工会工作方面，从完成组织和领导罢工运动等任务的角度说，我们比今年最初几个月做的还差。李立三路线给我们的实际工作带来了非同寻常的损害。同志们举不出我们在黄色工会中工作的一个实例，也举不出在俱乐部、周日工人学校或工人夜校等方面利用合法条件的一个实例。在苏维埃运动方面，也是这种情况。曾发出夺取大城市的指示，在经济政策和土地政策方面采取了最激进的措施；建议完全停止发展游击运动，借口是，那已是过去的阶段，等等。而且，显然是为了准备上海的起义，李立三把最近派来的一多半学员（41个同志）留在上海，没有把他们派往苏区。我不准备历数

这一切。李立三企图把我们的所有组织都纳入军事轨道，而实际上所有这些组织，首先是党，都被他瓦解了。我们应该尽快消除李立三的这种遗患。由于党内及其领导层中存在着对李立三主义的调和主义态度，所以这项任务变得复杂化了。在这方面很说明问题的是以下事实。莫斯科文和斯特拉霍夫^①到来之后，遇到了组织严密的李立三集团，他们开始有些动摇，因而采取了调和主义态度（莫斯科文更甚些）。在三中全会上，他们事先不与远东局^②打招呼，就决定不把与远东局商定的表述写入政治决议（老的中国花招），从而把那个决议变成了一个模棱两可的文件。与此同时，一些党员（戈卢别夫、古德科夫、波戈列洛夫^③等人）开始在会议上发言，向中央递交声明，批判李立三路线和三中全会。另一方面，中共中央收到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来信^④，信中把李立三路线说成是与共产国际路线完全对立的路线。党的领导人焦急不安起来。他们来找我们商量。这是我与他们第一次会见的议题。顺便说一下，在这次交谈中弄清，他们根本没有把与远东局商定的修改意见写入决议。此前远东局甚至都没有料到这种可能性，对此一无所知。我们商定了政治局对三中全会的补充决议。在谈话之后我们起草了这个决议，他们通过政治局对其作了一些不大的修改^⑤。（决议文本转寄给你们。政治局所作的修改是用墨水写的）^⑥。由于有这些情况，我们局不得不通过专门决议（决议文本你们也已收到）^⑦。现在中国领导同志好像对以前分歧的实质和共

① 分别为周恩来和瞿秋白。

② 指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

③ 分别为：陈绍禹、沈泽民、秦邦宪。

④ 指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李立三路线给中共中央的信。

⑤ 见第 468 页注④。

⑥ 文件没有找到。

⑦ 指 1930 年 11 月 23 日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的决议（见第 331 号文件）。

产国际的路线更加重视了，因此我们相信工作会更有成效。在对所有决议进行逐句逐字审查之后，我们还要回过头来再谈一谈三中全会决议。现在通过我们对政治决议和声明的了解，可以说，他们试图把共产国际要求中共对路线所作的那些修改之处搞得含糊不清。远东局未能及时审查决议也是由于技术方面的原因。在邮件送走的那天才收到决议译文。同志们决定不延误邮件发送，所以失去了再一次审查实际上已经通过的文本的机会。关于共青团的有关工作我就不谈了，因为你们将收到年轻人的信^①。在结束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请求尽快让张彪^②和蔡和森到这里来，这里的工作非常需要他们，他们在这里会改善局面。我已同中国的三人小组^③达成共识。以前的那些理由都是通报不准确造成的。问题已得到解决。他们在政治局里的工作将会得到保证。现在政治局由五位同志组成，其中真正工作的只有两位。在他们到来之后可能会遇到斯特拉霍夫或另一位政治局委员去苏区的问题。目前项英已到那里去了。显然这是不够的。我还请求满足中央在电报中提出的关于派遣可靠的学生来做过会、宣传和政治军事工作的要求^④。在那里确实很明显地感受到需要干部，特别是在组织遭到破坏和实际工作遭到李立三主义所造成的损失的情况下，就更显得需要。简单地谈一谈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的问题^⑤。在地方上已经开过三次地区性代表大会。在赣南成立了中央政府。计划在1月召开的苏维埃代表大会延期了。鉴于总的形势和在选举代表的运动中缺乏群众性，召开日期暂时还没有确定。在上海，目前已选出了12名代表。参加会议的人数不多。主要部门的选举还没有开

① Г. М. 别斯帕洛夫。文件没有找到。

② 张国焘

③ 看来指向忠发、瞿秋白和周恩来。

④ 文件没有找到。

⑤ 指中国苏维埃地区第一次代表大会（见第151页注②）。

始。

4. 关于土地政策和经济政策决议草案^①。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与中国同志交谈过，请他们把这个问题提交政治局并把他们的意见转告我们（他们的修改稿现转给你们）^②。这个问题也在远东局讨论过。我来讲讲我们的意见。至于经济政策草案，我们认为它是可行的。如果不考虑措词方面的小意见，那么应该更加予以说明的唯一问题——是“剪刀差”问题。实践提出了这个十分迫切的问题。例如，来自赣南的报告说，在苏区，由于商业活动的某种停顿，工业产品价格急剧上涨，大米价格大大降低。那里一担大米值1美元40美分（以前是7美元），在中心城市这种大米大约卖10美元，而在上海一担值14到15美元。火柴的价格（现在每盒不是两个铜板，而是7个）和煤油、盐等的价格都上涨了两三倍。当然，这是军事行动、封锁和其他因素造成的必然结果，而这种困难不是那么容易克服的。不过形势的恶化在很大程度上还是由于苏维埃机关的错误做法造成的，它们以税收、强制性价格等形式给自由贸易设置了种种障碍，以恐布手段威胁商人并为更大规模的投机倒把活动准备了土壤。当然，应该同蓄意的投机倒把行为作斗争，但同时也应该让自由贸易不只是停留在口头上。苏区的工业很少。如果不考虑土地问题，那么在经济政策方面商业问题实际上就成了主要问题。在这方面我们现在有很多困难，将来还会有很多困难，尽管不是主要困难。我们对商业资本家采取的态度，应不同于对被消灭的地主的态度。过分的征收捐税和赔款的做法以及实际上没收商人财产的做法未必是合适的（当然，对待反革分子另当别论）。现在我们对他们应该忍让，或许甚至应该

^① 指《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关于苏维埃地区土地农民问题决议草案》和《关于苏维埃政权经济政策》提纲（见第374页注②）。

^② 见第335号文件。

在征税方面给予一定的优惠。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们应该更坚定而具体地提出合作社的问题。在普遍实行半军事化的情况下，合作社既不能组织向非苏区销售苏区的大米，也不能为苏区居民的需要采购工业品。不过合作社现在已能成为苏区居民和个体商人之间的中间环节。如果个体商人不是与个别买主和卖主打交道，而是与组成合作社的居民打交道，他们在采购大米和销售工业品时搞投机倒把活动就会有困难。遗憾的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现在提不出什么更具体的东西，但是这个问题值得十分重视。顺便我要指出，除了由于存在“剪刀差”农民的不满情绪在增长外，在有这种“剪刀差”的情况下苏区的名义工资也在降低，其借口是，由于大米价格下跌实际工资大大提高了。这是关于经济政策草案的一条主要意见。请考虑一下中国同志对当地银行的补充意见。

现在来谈谈土地草案。大家知道，在7月决议^①中，而在此前，在6月电报^②中，我们的领导同志亲手把普遍平均分配土地的表述改成了另外一种表述，即中共所要求的“没收所有地主、寺院和其他大私有者的土地，并把这些土地按照平均原则分给贫农和中农，不把没收的原则扩大到富裕农民”。但是在关于李立三路线的来信中已经就这个最重要的问题作出了另外的指示，虽然不是以直截了当的形式。在这封信里党受到了批评，因为“平均分配土地——这个土地革命的最重要任务——只有在极个别的情况下才能实施”。而下面一句话则对7月来信中所确定的东西直接提出了异议。“只平均分配被没收的地主土地是不正确的”。^③结果，进行得很不顺利。共产国际执委会一开始提出一种说法，而过了

① 指1930年7月29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

② 可能指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给中共中央的电报（见第240号文件）。

③ 见《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集）》，第228页。

两个月，又批评这种说法，不知为什么又要让中国共产党对此负责。在土地草案中，在那个谈到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问题上的错误、动摇和倾向的地方，也把“散布只平分被没收的地主土地的原则，不运用平分一切土地，包括农民的土地、农民的财产的原则”列入其中。在草案中还谈到为实行普遍分配而进行不妥协斗争的必要性，并认为这个问题已经解决。^①我谈这个问题不仅仅是为了说明我们自己在这个最重要问题上给中国同志的思想造成的混乱，而且还因为实际上我们认为写进新的土地草案中的决定是不正确的。关于这个问题我再讲几句。应该清楚地意识到，我们不能也不应该把普遍平均分配土地的做法强加给农民。用平均分配土地来取代没收地主土地的表述，这是从彻底解决土地问题的必要性出发的。至于说到中国的实际、中国革命运动的具体进程，那么这种做法就不完全正确了，因为这里的革命不会紧跟着工业中心之后立即席卷全国。在这里，革命是在个别一些发源地成熟起来，逐渐地向其他地区扩展。当苏维埃运动没有在决定性的地区取得胜利和没有消灭帝国主义者和中国统治阶级政权的时候，决不能制造和散布关于在个别孤立的苏区可以彻底解决土地问题的幻想。目前在我们苏区，我们的任务是消灭地主和进一步扩大运动，唤起最广大的群众参加斗争。当我们用平分土地的口号取代没收地主土地的口号时，我们实际上就把刚刚开始的斗争转到了另一个方面：不去反对地主所有制，而是去反对一般土地所有制。何况还应该考虑到经济成分的多样性（至少应该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在中部和北方，农民私有者要比南方多得多）和我们的口号以及我们在苏区的实际做法在基本上以农民为主体的非苏维埃的中国所引起的反响。我们不应该强制实行普遍分配土地的做法，因为这在许多地方会损害我们与中农的联盟。在中国，情况是这样

^① 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第630页。

的，在平分所有土地和只平分被没收的地主土地的情况下，中农的利益会被触动。在第一种情况下，中农在财产和租佃方面会受到打击，而在第二种情况下，中农作为地主土地的承租者只会部分地受到损害。如果我们平分中农的土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不能不担心，中农是否会在降低税收等方面获得补偿，因为在苏区的具体条件下情况有所不同。比如，拿“剪刀差”来说就是这样。我们应该从这种具体条件出发。很清楚。如果我们把不实行普遍平分土地的原则看作是一种倾向，如果我们从上面强制地实行，那么不仅中农不会与我们一起同地主作斗争，而且我们甚至都不能保证中农的中立。而实践已经说明，我们与中农的关系并不融洽。我请你们注意邓中夏（贺龙的政委）10月15日的来信^①。在这封信中，邓中夏写到，在一些地方农民已转到反动派一边。他谈到存在白党农民游击队、一些红色村庄转到白党方面、这些农民给予军阀部队以实际帮助、硬社会的成立、在一次群众集会上农民突然反水，结果有30名共产党员和40名苏维埃工作人员被杀等情况。邓中夏详细说明了这些新现象。他写道：“最错误的是土地连中农亦不分与，将中农亦当富农看待，党的出版物公开的指出富农和中农均是反革命。以监利来说，中农确占农民之绝大多数，据说占百分之八十。中农群众由怀疑动摇而跟富农走了。我们没有和他们结成同盟”。应该直截了当地说，党在中农的问题上是非常不谨慎的。关于中农的任何轻率主张都会造成可悲的后果。而土地决议草案的缺点恰恰就在于此。这种情况，也反映在关于红军构成的条款中，那里讲到“吸收可靠的中农”。按照我们的意见，应该采用近似7月决议^②的表述，这就是：“党应该没收所有地主、半地主、寺院和其他大私有者的土地并把这些土

① 《邓中夏文集》，北京1983年版，第640—644页。

② 指1930年7月29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

地按照平均的原则分给贫农和少地的中农，没收的原则不运用于中农，其中包括富裕中农。党无论如何不应该从上面强制推行普遍平均分配土地的原则，只有当绝大多数农民群众自己要求实行这个原则并且在不威胁与中农断绝关系的时候，才能支持这种做法。”接着关于国有化的问题，就像在通过的决议中表述的一样^①。

在结束信的这一部分的时候，我还应该指出，很遗憾，对于苏区的实际情况、对于阶级的变化过程和那里开展的斗争，我们还了解得太少，要作出最后的重要决定我们掌握的情况还太少。在远东局里我们决定要求中央派三名指导员前往苏区，我们预先向他们说明要求，以便他们能向我们提供更全面的苏区情况。不过这一切当然不会很快做到。而现在不得不以我们所掌握的情况为基础 [……]^②

现在谈一谈远东局。在远东局内部我们分了工，第一，按国家；第二，按照中国的工作部门。在可能的范围内我们逐渐地落实计划。军事三人小组直到现在还呆在这里，因为没有任何机会把他们派出去。现在中国人正在建（联络）站，所以可能要过两周或三周他们才能动身。

技术人员问题对我们来说很严重。卡^③从早到晚地工作，但是她还是来不及翻译和打印所有对我们有用的大批材料。需要与红色工会国际商谈薪水问题，并且需要向这里派三名翻译人员，没有翻译人员我们这里就会遇到很大困难。

请原谅打字错误，是我自己打印的。

① 还请考虑，在任何地方都不存在贫农团和雇农协会（原文注释）

② 以下删去该信关于菲律宾、印度支那、日本和朝鲜工作的第5部分。

③ Δ. Γ. 沃伦斯卡娅。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威 廉^①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566，第 177a—181 页。

打字稿，原件。

① II. A. 米夫。

340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 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第 104 号记录

(摘录)

1930 年 12 月 3 日于莫斯科

听取：3. (1253) ——关于中共三中全会^① 的通报。报告人：库丘莫夫。参加讨论的人：萨法罗夫、皮亚特尼茨基、曼努伊尔斯基、洛佐夫斯基。

决定：3 ——用电报通知远东局，政治委员会对中共三中全会的工作是不满意的，因为在这次全会上对李立三同志的路线揭露得不够^②。

责成远东局关心一下，以便落实我们以前下达的关于加强红军、加强苏区和开展无产阶级局部斗争的指示。

责成东方地区书记处起草关于中共三中全会的信，信中不要只批评政治局，还要对个别一些同志的发言，包括对斯特拉霍夫^③同志的发言进行批评。

在 12 月 15 日前举行主席团会议，会上听取李立三同志关于三中全会^④ 的报告和提交东方地区书记处的信函草案。在主席团

① 见第 346 页注③。

② 文件没有找到。

③ 瞿秋白。

④ 见第 344 号、345 号文件。

会议召开之前东方地区书记处应该根据现有材料准备简短的书面报告^①。

责成远东局关照一下，使现在离开这里前往中国的两位同志^② 和已在中国的〔国际〕列宁学校以前的学员们能够真正参加党的工作。

通知远东局，最好由远东局方面向中央推荐几名人选，中央可以从中选择一人，代表中共中央在共产国际执委会全会^③ 上作关于中国问题的报告。

指示远东局，最好在苏维埃代表大会前举行由各苏区党组织代表参加的党代表会议，会上认真讨论苏区的所有问题，以及通过吸收苏区几位工人和〔国际〕列宁学校优秀学员的办法来加强和扩大党的领导机关。

发给远东局的电报应由东方地区书记处起草，由政治委员会委员审定。

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

皮亚特尼茨基

全宗 495，目录 4，卷宗 72，第 1—3 页。

德文打字稿，原件，亲笔签字

① 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关于中共三中全会的信见《布尔塞维克》杂志 1931 年第 4 卷第 3 号，第 66—75 页。

② 看来指张国焘和蔡和森。

③ 指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一次全会（见第 374 页注①）。

341

盖利斯给别尔津的信

1930年12月3日于上海

亲爱的老头子：^①

随这次邮件带去我们同志的许多材料、便函和信件。通过对它们的仔细研究和系统分析，你们会对这里的情况有个概念。然而，我还是想在这封信里详细谈一谈中国局势的一些问题并从自己方面提出某些想法，这些想法对你们评价中国总的形势可能会有用处。

我当然不可能对形势作出全面的和有根有据的评价。为此我缺少必要的条件——没有时间，英文掌握得很不够和缺少材料。

1. 南京的情况。国民党集团在四中全会^②上又谈起国家经济和政治建设的宏伟规划。说什么与北方叛乱分子（冯玉祥、阎锡山）的战争以彻底打败后者而告结束，奉天许诺服从南京，所以国家已经统一，现在真的到了实现已故孙〔逸仙〕遗嘱的时候了。只剩下消灭共产主义、苏维埃运动，这样从事和平建设工作的一切必要前提都已经具备。在全会上什么都谈到了。会上还定于1931年5月5日召开国民代表会议（有点类似立宪会议）^③，改组

① A. K. 别尔津。

② 见第339号文件注①

③ 指1931年5月5日至17日在南京举行的国民会议。详细情况见：《中国科学研究所通报》，1931年莫斯科第718（76—77）期，第101—131页

国家的行政区域划分（建立 70 个省代替现在的 18 个省），改编军队，发展工业，修筑道路，疏浚航道，建设新的铁路和修完尚未竣工的铁路；这里还提到消灭饥饿，缓解失业现象（甚至还谈到国家救助失业人员），等等，等等。一句话，会上拟定了为使国家走上迅速发展经济的道路所需要做的一切。

蒋介石被美化成民族英雄、绥靖者和中国领土的统一者。无须证明，所有这些虚幻的计划和提出的任务，具有与以往所有计划和任务同样的价值。

所有这些叫嚷都是为了蒙骗中国的庸夫俗子们，为其制造关于国民党希望和能够使国家摆脱贫穷和持续不断的饥饿状况的新幻想，以阻止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革命化的进程，以便在帝国主义眼里把自己装扮成中国的代表。南京没有资金来在某种程度上实现拟定的计划。与北方打仗需要巨额资金，现在压缩了开支，但是供养军队的花费非常高。军队没有减少，也不会减少，因为尽管叫嚷持久和平，但是每个人都清楚，与冯玉祥和阎锡山的战事并没有结束，奉天对南京的服从也是表面上的，这里所说的是周期性的中国政治阻塞，为了更好地准备新的战争，无论奉天还是南京都在为自己招募同盟者。为此目的在德国雇佣军官的帮助下南京正在改组自己的军队（见拉姆扎伊的报告^①）。南京准备接受外国人的资金。现在美国使团正在全中国旅游，研究美国投资的可能性。为了获得 50 万美元的贷款，蒋介石向美国人百般献媚。为此他准备作出任何让步，例如，准备在长江水域给予美国人很大优惠。他准备在南京为外国租借地划出专门一个区域，以此来“迫使”外国代表机构从北京迁往南京，在公众的眼里制造南京具有全中国意义的错觉。至于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地位，那么他已经大大地加强了自己的地盘。他已经狠狠地打击了反对派领袖胡

^① P. 佐尔格。文件没有找到。

汉民。当然，这并不等于说，蒋介石的地位完全巩固了，新的反对派不会再有了。但是在目前他的地位已经巩固——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

南京现在需要和平，国民党的头头们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和平之所以需要，是为了在经济方面多少有所作为，以便向外国人，主要是向美国人显示，他在中国的地位是巩固的，以便能够全面地准备新的战争，改组军队，补充储备和消灭苏维埃运动，并以此为自己建立巩固的后方，以应付未来与北方军阀的冲突。德国军官们指出，大约在一年期间蒋介石会竭尽全力维持和平。为了把所有师都改造成所谓的模范师，这段时间是足够的了。我认为，无论爆发新战争（与张学良或与其他人，如冯玉祥，或者由于南京集团内部发生分裂）的前景是多么临近，我们还是应该考虑到会有一些喘息的时间。至少，冬天将会在无战争的情况下度过。不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大规模战争的爆发可能会再往后拖延一些时间。对于这种前景，无论如何我们都应该做好准备。在这个喘息时间内，不管它持续多久，对我们的压力都会越来越大。打击的矛头首先会指向红军和苏区。在全会上十分严肃地提出了这个问题。这是可以理解的。南京打算在6个月内（开始时说3个月）消灭苏区。对他们来说，主要任务是消灭我们的有生力量，分割、切断我们的部队并将其消灭。钱都花在这上面了。一些省的地方政府（湖北和湖南）为了同我们作战也在组建新的部队。蒋介石已经把7个师调往苏区边境。所有这些部队还没有投入战斗，但是他们可能会调来反对我们。对红军的进攻实际上已经开始并在江西省取得了一些成绩（迫使红军放弃吉安等）。蒋介石可能上前线亲自指挥作战。尽管政府军虚弱不堪，农民运动十分发展，但还是要考虑到红军的行动，缺少总的指挥、指挥员在战术上的无知、党在执行土地和经济政策过程中在一些地方所犯的错误（而地主和富农千方百计利用了这些错误），已经开始的总围剿对我们

来说构成了严重的威胁，这就要求上海的领导，特别是地方上的领导，应该动员一切力量来打退这种围剿。如果各地真正放弃错误的李立三方针并贯彻执行现在从上海发去的那些指示，打退围剿是可能的。

2. 苏区和红军的情况。

红军部队的作战态势标在随这批邮件寄去的略图上，从我们与不同时期来自苏区的中国同志的谈话记录^① 中可以看到部队的状况。红军的任务在附去的中央指示^② 中已作说明。我在这里不谈这些问题。必须强调指出的主要一点是，苏区真正是一支拥有广阔地域和数千万人口的巨大力量。苏区的弱点就在于它的分散性，目前还没有一个连成片的苏区。这种地域的分散性本身又造成了红军部队的分散性和统一指挥的困难。这种状况是由发生农民争取建立苏维埃的斗争时的历史条件造成的，大大便于反动派同我们作斗争。不仅如此，以前李立三的方针虽然在上海这里正在被根除并在很大程度上已被根除，但仍在那裡度着自己的蜜月，这会对我们的事业造成极其严重的危害。这一点在毛泽东于今年10月14日即我们的军队放弃吉安之后所写的一封信^③ 中有很明显的反映（您现在还不能收到这封信的译文，因为来不及翻译）。我们攻占吉安后，毛泽东曾认为，这是国民党统治的完结^④。毛今后的行动计划是：进攻南昌、九江，渡过长江和攻占南京，以使我们在湖北的军队容易攻占汉口。这就是毛泽东在今年10月14

① 文件没有找到。

② 中共中央给红军的指示，在中国文件集中标明的日期为1930年12月10日，说的是反击第一次围剿。

③ 见《毛泽东取得政权之路（1912—1949）》第三卷，第552—556页。

④ 此处转述不确切。毛泽东的原信说：“吉安暴动的胜利，无疑是赣西南豪绅、军阀、国民党统治的最后消灭”（《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第318页）——译者。

日信中所阐述的行动计划。正是如此。他写这封信时，已有两个军调往北方，他说在最近几天内，其余各军都将调往北方，第 20 军和第 22 军除外，他决定把这两个军留在吉安。同时，很说明问题的是，他在这封信中谈到了江西党组织的危机，秘密的反革命半恐怖主义组织“AB”团^① 成员不仅钻进了基层组织，而且还钻进了党的领导机关，党组织处在富农、地主和豪绅的影响之下，依靠地方力量来改善党组织是极其困难的，应该从上海派人去。情况是这样：一方面是存在着党的危机和反革命的策源地（有许多县城我们没有占领），在后方，有产阶级疯狂反对革命；另一方面是国民党统治结束和向南京、汉口等地进军。这并不奇怪。他指出，6月以来他没有接到中央的指示。最近一个指示是李立三的指示，是在 6 月份收到的。党的会议和领导人讨论后认为它是正确的。既然李立三的指示是正确的，那么占领南京和汉口也就是当时最迫切的任务了。李立三路线的这种策略连同部队在攻打南昌时的极端分散性（战线长达 600 公里）就是我们在江西的部队最近遭到失败的原因。李立三路线在其他问题上也起了不好的作用。例如，中央发去一个指示，谴责农民的游击运动，并要求坚决收缴农民手中的所有武器，并将它集中交给红军部队。说什么农民游击运动的必要性已经过时，现在我们已经拥有正规的红军，因此要打倒游击主义^②。结果造成了这样一种局面，当红军部队变换驻地而这些地区被白军占领时，农民手中没有武器，失去了自卫能力。有过这样的情况，农民因此放弃了与军阀们的积极斗争，消极地等待着红军回来。根据来自地方的工作人员的报告和讲述判

① 指 Anti-Bolshevik League (反布尔什维克联盟，缩写为 AB 联盟，中文称为 AB 团)，这是 1927 年在江西省由国民党右派成立的一个秘密反共组织，30 年代初被粉碎。

② 看来是指 1930 年 2 月 26 日中共中央第 70 号通告《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中心策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6 册，第 25—35 页，亦见第 72 页注④）。

断，苏区的阶级斗争采取了极其尖锐的形式。地主和富农死死抓住以前的特权不放，并采取一切手段使土地革命陷入瘫痪和缩小它的规模。在一些地方他们开展的这种斗争相当成功。例如在江西有相当一部分党组织，用毛泽东的话说，受到了地主宣传的影响。下面这种情况也可以说明这一点：善良的地主在分配土地时也可以分得自己的一份。好地都给了富农，而坏地分给了贫农和雇农。有些地方雇农的境况相当凄惨，他们分得了土地，但没有农具。我不知道，所有这一切带有多大的普遍性，但即使不是普遍现象，这种情况也还隐藏着很大的危险。至于说给善良的地主分地的问题，那么几乎所有苏区都有这方面的材料。另一方面，也出现了一些不照顾中农利益的左的倾向。这种情况发生在贺龙军团所在的地区。地主们千方百计地利用这种情况，有些地方事情甚至闹到这种地步，农民拿起武器反对我们（见邓中夏的来信）^①。关于中农和正确对待中农的问题，无疑在目前是关键性的问题，特别是在湖北、江西北部和湖南，即在中农构成重要社会阶层和中心人物的地方，更是如此。我认为，在共产国际最近的一些指示中，对这个问题（中农问题）并没有提出很好的解决办法。例如，在谈到补充军队兵员时说，应该按阶级原则来进行，军队应该接收工人、贫农、雇农和民族^② 中农。此处需要作修改。不仅仅应接收分得土地的中农，而应是接收贫农、雇农和中农。已有建立集体农庄的倾向（在江西）。好在这种倾向只体现在个别同志身上。在经济政策方面，主要的困难是存在“剪刀差”。大米的价格下跌了几成，太便宜了，与此同时，火柴、煤油及其他物品价格猛涨。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苏区与国家的其他地区没有经济交流和贸易往来。在目前条件下很难设想出消除“剪刀差”的办法。可

① 《邓中夏文集》，第 640—651 页。

② 原文如此。

用来缓解尖锐程度的唯一措施，就是不限制自由贸易，注意成立合作社，但是当现有的储备用完时，从哪里获得工业品呢，情况不太好，我不准备详细描述苏区各方面的情况。我只想强调指出主要的一点。

现在对中央来说主要的问题是尽快向那里派出人员和发出指示。不这样做，就可能发生不可思议的突发事件。农民的组织程度，例如在江西是非常高的。据来到这里的江西省政府副主席^①的报告说，那里已有近400万人被编入少年先锋队、赤卫队、工会、党和共青团的队伍。雇农协会只是最近才组建起来，暂时还很弱。工会也比较弱。少年先锋队（10岁到18岁的少年）在军事方面也是一支巨大的力量。他们有军事组织（连、营、团）。据毛泽东报告说，少年先锋队和赤卫队有10万之众参加了攻占吉安的作战行动。但这里也有一些不健康的现象：例如，少年先锋队过分热衷于把寺院和教堂改装成社会机关。在写有宗教匾额的地方常常被换上“列宁”、“马克思”的字样。因为农民对列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很有限，少年先锋队自己也不能向他们作详细解释，所以农民就像崇拜新神一样崇拜他们。这不是笑话，这样的事情发生过。不管怎样，这两个组织（少年先锋队和赤卫队）迄今为止都在帮助红军和在同苏区反革命势力作斗争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他们只是需要有正确的领导。

我不准备详细论述苏区以外的党的状况及其对工农群众的影响。关于这个问题可参阅其他工作人员的报告。我只想用两句话指出，由于党组织遭到破坏，现在党在组织方面是非常薄弱的。在汉口、广州、长沙、厦门、汕头等地，每个城市的党员人数只有几十人（最近一个时期，在汉口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已超过200人，但是由于组织被破坏有60多人遭逮捕和枪杀）。最强大的是

① 胡海。

上海的组织。党对工人群众的影响，可想而知，在这种情况下是很弱的。11月7日本来打算组织一次示威游行，但是没有搞成。举行了一些小型会议和集会。没有罢工。一些小规模的罢工在多数情况下都没有党的领导。在这种情况下，在非苏区组织反击对苏区的总围剿的工作就做得比较差。其标志之一就是对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做得很不够。

反革命势力的疯狂恐怖活动以及不仅从肉体上消灭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而且消灭一切多少具有革命精神的工人的做法，对党的工作和工人阶级的革命化都有影响。这种情况加上李立三路线(其后果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深刻地感觉到了)是运动的主要障碍。

致同志式的敬礼

弗赖利赫^①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566，第 184—191a 页
打字稿，副本。

① A. IO 盖利斯。

342

张国焘向共产国际执行 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提出的声明

1930 年 12 月 4 日于莫斯科

秘 密

向共产国际执委会 政治书记处提出的声明

关于我过去的机会主义错误我声明如下：

1. 在 1925 至 1927 年的中国大革命时期，由陈独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领导机构的机会主义政治是陈独秀主义，就其性质而言是孟什维克主义的翻版。陈独秀主义的性质可以从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决议和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决议中弄清楚。所有当时参加领导机构工作和没有进行系统的反对陈独秀主义的根本斗争的同志，在客观上都是陈独秀主义的组织成份。虽然我和其他一些同志在当时曾不断地进行过反对明显的陈独秀机会主义的斗争，因此我和这些同志后来较容易认识到我们自己的错误和转到共产国际路线方面来，但是决不能因此就抹掉这些同志，特别是我在这个时期所犯的极为严重的机会主义错误。

8 月 7 日的会议^①对于中国党来说是一个转折点，当时党被从机会主义泥坑中挽救出来，走上了革命的康庄大道。同时，这次会议对于我和其他一些同志来说也是一个转折点，因为我们和陈独秀机会主义分道扬镳了。在这个转折的时刻，我的错误在于未

^① 指 1927 年 8 月 7 日中共中央的紧急会议。

能彻底摆脱机会主义，机会主义残余在后来的一些事件中又显露出来了。

2. 1927年南昌起义^①时出现的错误（这些错误的性质在中共六大决议中已经指出），是过去机会主义的继续，我是应对这些错误承担重要责任的人。我应对土地革命方面的犹豫不决（例如，一开始我提出“没收拥有200亩以上土地的地主的土地”的口号）和对国民党左翼（张发奎）抱有的幻想承担特别重要的责任。

3. 中共六大期间，我对南昌起义时的机会主义错误认识不够，没有划清自己的立场同当时机会主义者的立场之间的界限，也没有再进行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这是我的极其严重的错误。这些错误的实质是对右倾机会主义采取了调和主义态度。

4. 讨论共产国际1929年2月给中共中央的来信^②时，我的错误是，我又重弹“不可避免的革命高潮的到来（直接革命形势）有可能相应放慢”的老调，同时没有充分认识到，右倾危险特别有所增强。尽管我那时放弃了这种错误观点，没有特别坚持，但是这些观点毕竟是对右倾的调和主义态度。

5. 中共代表团应对中山大学^③的工作遭到完全破坏承担重要责任。关于这一点已有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决议^④。在这个决议的一个部分中谈到：

“中国代表团应该对李剑如和余笃三小集团的活动负部分责任，该集团在中大搞无原则斗争，走上了与托派和右派实际结盟的道路。中国代表团中多数人（瞿秋白、邓中夏、余飞）领导了

① 见第9号文件。

② 指1929年2月8日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共中央的信（见《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集）》，第162—247页）。

③ 指以孙中山命名的中国劳动者大学。

④ 见第248号文件。

李剑如和余笃三小集团的活动；代表团的少数人（张彪）^①，虽然并非一开始，而是在最后才表示不赞成代表团其他成员对中山大学派别斗争的意见，但是即使那时也没有在共产国际机构内采取相应的措施，来制止代表团多数人的这种破坏活动。”我承认，我的这些错误和代表团的错误决不是偶然的，而是政治上不成熟和不坚定的又一表现，这种不成熟和不坚定与小资产阶级的无原则性相差无几。

6. 我很久不能以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批评精神来公开地指出自己过去所犯的错误并同这些错误进行坚决的斗争——这也是我的一个政治错误。最后，我认为，中共一些领导同志在中共三中全会^②期间所作的评价是完全错误的，他们认为，我同李立三同志的冒险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路线的斗争是右倾机会主义的态度^③。我认为我有责任作出郑重声明：现在我要站在共产国际的路线上坚决进行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反对“左”倾和特别要反对右倾危险。对于过去的机会主义错误，无论是我犯的还是其他同志犯的，我都将坚决进行斗争，我尤其要反对粉饰或重犯这种错误的企图。

为了实现共产党所面临巨大任务和为了加速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每一个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具有政治上的明确性、纯洁性和坚定性。也就是必须更明确地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进行反对“左”倾的斗争，特别要站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的路线上反对最严重的右的[危险]；对于右倾和“左”倾以及小资产阶级的无原则性，要进行反对两面派行为、调和主义态度的斗争。只有在共产党内开展

① 张国焘。

② 见第 302 号文件。

③ 显然指瞿秋白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见第 351 号文件）。

两条战线的不调和斗争，才能彻底战胜陈独秀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集团，也才能消除对他们的调和主义态度。

张 虹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564，第 14—17 页。

打字稿，副本。

343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 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

1930年12月10日于上海

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

亲爱的同志们：

李立三同志的反共产国际路线给党带来了极大的损失。无法历数由于实际贯彻李〔立三〕同志冒险主义方针而造成的种种严重后果。我们只指出最主要的。党的影响和与群众的联系削弱了。党的动员能力明显降低了。所有群众组织的活动减弱了。我们的工会运动倒退了。我们在掌握领导和组织罢工运动的事业中不但没有前进，反而大大倒退了。另一方面，李立三同志对捍卫共产国际路线的同志们实行的迫害手段，使党内生活处于不正常状态。党的状况的普遍恶化和削弱促使托洛茨基分子和陈独秀分子活跃起来。最后，由李立三同志的方针造成的最严重的错误也蔓延到了苏区。这对于红军今后的加强和发展产生了消极的影响。这些错误使我们与中农的联盟受到了威胁，使绝大多数农民群众参加苏维埃运动的积极性受到了威胁。李立三同志完全忽视了建立巩固的苏维埃根据地的任务，在目前军阀进攻苏区的情况下，大大地削弱了我们的阵地。

共产国际要求党彻底揭露李立三同志的“理论”并在实践上彻底消除他的所有反共产国际方针，没有必要来证明共产国际的正确性。中国目前的局势、敌人对苏区的总围剿，使得党更有必

要从李立三同志的半托洛茨基主义路线坚决转到共产国际决议和指示的轨道上来。应该从这个角度来评价中共三中全会。三中全会是否完成了这项主要任务呢？它是否使党发生了必要的转变呢？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不得不作出否定的回答。

在了解了三中全会实际通过的政治决议文本和一些与三中全会有关的文件之后，我们确信了这一点。我们先从政治决议^①说起。（1）它用很缓和的语气只指出了李立三同志的一些个别错误。在决议中甚至没有提到与共产国际的路线根本对立的完全错误的路线。（2）接着，在这个决议中对实际上起到反共产国际纲领作用的6月11日的有名文件^②作出了肯定的评价。（3）还对6至8月间政治局的政治路线和活动作出了肯定的评价，而在这期间李立三同志的半托洛茨基主义路线在政治局的活动中实际上已经占居主导地位。（4）很明显，从这个对李立三路线持调和主义态度的错误方针中得出了一系列包含在三中全会政治决议个别条款中的具体错误。

三中全会通过的政治决议已经证明，中国党的领导人当时还没有认识到李立三方针的整个错误及其与唯一正确的共产国际路线的根本对立。当然，这个决议也未能为坚决转变党的整个方针准备好必要的前提条件，它也不能成为揭露李立三“理论”并在实践中彻底消除这种“理论”的基础。

与三中全会有关的其他文件还带有更大的虚伪性的烙印，并在更大程度上掩盖了共产国际要求中共对党的路线所作的修改。

① 指《关于政治状况和党的总任务决议案》（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第274—303页；《中国科学研究所通报》，莫斯科1931年第5—6期，第5—30页）。

② 指193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议《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

例如：1. 三中全会告党员书^①把政治决议的表述变得更加缓和了，致使党员完全不能理解共产国际执委会的路线与李〔立三〕半托洛茨基主义路线的区别。2. 和三中全会决议一起发表的斯特拉霍夫^②同志在三中全会后写的那篇文章，只字不提李立三同志的错误，更不提他的冒险主义路线。3. 三中全会后中央的通告^③和报告人的提纲^④不但不去揭露李立三同志的路线，而且还提出了把他的路线解释成正确的、与共产国际的决议相一致的理由。

我们所分析的文件的性质决定了我们对三中全会的评价。同时我们还应该指出中共领导对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机构所表现出来的不能容忍的不老实态度，这表现在，政治局委员和远东局预先商定的对政治决议所作的修改和表述（其中包括对李立三同志的路线和政治局6至8月间的活动的评价），不顾已达成的协议，竟然没有写进政治决议，而且也没有将所有这一切事先向共产国际代表机构报告；因此后者不可能及时地对政治局中存在的对李立三路线的调和主义倾向作出反应。

根据：1. 在党的队伍内彻底清除李立三同志的路线的特别重要性，2. 三中全会没有在党内造成必要的转机，在党组织的工作实践中也看不到这种转变的迹象，3. 11月25日的补充决议^⑤在不重新审查三中全会的最重要决议的情况下也不能实现这种转变，

① 可能指1930年10月17日中共三中全会給党内同志的信（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第401—413页）。

② 瞿秋白。指《中共中央全会的意义》一文（见《实话》——上海1930年第1期，第1页）。

③ 指1930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第91号通告《三全扩大会的总结与精神》（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第414—427页）。

④ 文件没有找到。

⑤ 指1930年11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李立三路线来信的决议案。

远东局得出结论：紧急召开为期一天的党代表会议（应遵守一切必要的保密规划）是适宜的，参加人员为在上海的中央委员、各省委代表和共青团中央局成员。

远东局认为，这次代表会议应该通过一个包含下列内容的简短决议：

- (1) 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来信的精神对李立三同志的路线作出评价。
- (2) 对政治局在6至8月间的活动作出相应评价。
- (3) 对6月11日决议作出评价，将其视为反共产国际的文件。
- (4) 提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彻底克服李立三同志的路线以及对其采取的调和主义态度的任务。
- (5) 提出在党的全部工作中实现坚决转变、同实践上的机会主义、消极情绪和为反党倾向营造土壤的悲观失望分子进行斗争的任务。
- (6) 提出恢复被破坏的党和共青团组织及改善群众组织中的工作，首先是工会工作的任务。
- (7) 提出把新干部，首先是工人积极分子提拔到领导岗位上的任务。
- (8) 提出党动员各个方面力量来反击对苏区的总围剿问题，将此作为最主要的任务。
- (9) 指出共产国际执委会在纠正中共中央错误中所发挥的作用和李立三同志及其支持者对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指示和警告采取的蔑视态度所造成的严重后果。
- (10) 指出中共领导对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机构所采取的不老实态度。
- (11) 责成政治局根据这个决议（代替三中全会的决议）为党组织起草指示和确定实际任务。（当然，不能因此取消三中全会所通过的一些正确的具体决议。）

这就是我们对党代表会议及其决议性质的一些简要的想法。作为补充意见，远东局认为，让李立三同志退出政治局是适宜的，为作出此项决定应提出相应的理由。

请告你们对这封信的看法。如果没有原则性的反对意见，你们现在就可以着手为代表会议的召开做准备工作，还请你们及时将决议草案交给我们，以便我们有可能及早讨论，如果需要的话，并对它作些修改。

受远东局委托 约瑟夫^①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579，第 193—193 页背面。

打字稿，原件。

① П·А·米夫。

344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 扩大会议第 29 号记录

（摘录）

1930 年 12 月 12 日于莫斯科

听取：2（77）——李立三同志关于 1930 年 6 至 9 月间中共领导的政策和关于中共三中全会的报告。^①

决定：2——把报告的继续和对它的讨论推迟到非常会议上，非常会议召开日期要由政治委员会确定^②。

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 皮亚特尼茨基

全宗 495，目录 2，卷宗 136a，第 1 页。

德文打字稿，原件，亲笔签字。

① 见第 346 页注③。

② 见第 345 号文件。

345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 扩大会议第 30 号记录

(摘录)

1930 年 12 月 15 日于莫斯科

听取：1 (78) —— 李立三同志继续作关于 1930 年 6 至 9 月间中共领导的政策和关于中共三中全会的报告。^①。

讨论参加者：柳比莫夫、亭^②、库丘莫夫、马季亚尔、张彪^③、萨法罗夫、阿尔诺特、曼努伊尔斯基、贝拉、库恩、库西宁、沃罗夫斯基^④、皮亚特尼茨基、贾科波。

决定：1 —— (1) 将东方地区书记处提交的给中共中央的电报稿^⑤ 作为基础，并将其交给政治委员会作最后审定。

(2) 责成政治委员会就各种组织问题采取相应的措施。

(3) 为即将召开的党代表会议起草一封政治性信件 (分析三中全会的工作)。

(4) 将李立三同志关于他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提交一份关于中共内部派别情况的详细报告的声明备案待查。

① 见第 344 号文件

② 原文如此。何人不详。

③ 张国焘。

④ 黄平。

⑤ 文件没有找到。

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 皮亚特尼茨基

全宗 495, 目录 2, 卷宗 137, 第 1 页。

德文打字稿, 原件, 亲笔签字。

346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 给中共中央的信

1930 年 12 月 15 日于上海

远东局关于江苏党组织工作 的结论和建议

根据政治局委员们和省委书记^① 关于江苏省，而首先是上海党组织工作的报告，远东局认为，最近一个时期党组织总的状况大大恶化了：

1. 该省和上海的党组织，尽管有良好的客观条件、有工人群众的革命热情和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传统，但是没有扎根于广大劳动群众之中，在最近一段时间里甚至削弱了与他们的联系。直到现在党组织还没有成为较大规模的群众性组织。在多数工厂没有我们的支部，而在有支部的地方，人数很少，力量也很弱。例如在上海，那里有 80 万工人，其中产业工人 50 万，我们的组织只有 160 个支部，1054 名党员；工厂支部总共有 93 个，其中有 580 人。这对于像上海这样一个工业中心来说，显然是不够的。在一些大企业里情况也不好，例如，在申新纱厂，最好的时候我们的支部只有 28 名党员；在商务印书馆有 3500 名工人，而我们的支部只有 13 名同志。在电车工人中我们有 20 人，而在拥有 3000 工人的兵工厂只有由两名同志组成的一个支部。我们在铁路员工中的影响微乎其微。

① 李维汉。

2. 党组织不带领群众，也不领导他们的斗争。而工人和农民都在进行斗争。在上海几乎每天都发生工人罢工：抗议关闭工厂、反对降低工资和延长工作时间。还常有这种情况，工人们自己转入进攻，要求提高工资、实行休息日等等，也时常发生这样的罢工，在罢工中多半提出这样一些政治性口号：反对逮捕革命工人、红色工会会员，反对解雇工人积极分子，要求撤换不受欢迎的厂长、工段长等等。大多数这种罢工几乎都是在没有我们人参加的情况下进行的。我们共产党人不仅不是这些罢工的倡导者，不仅不去组织群众性的罢工斗争，而且甚至不能在罢工期间学会领导斗争，或者哪怕参与斗争。

3. 党组织几乎不做领导群众性组织的工作，结果是：（1）群众性组织人数很少，例如，红色工会共有 1500 名会员，反帝同盟^①有 1101 名盟员。这样，工会和反帝同盟所拥有的成员要比党和共青团加在一起还少（2350）；（2）现有的群众性组织工作很差。在拥有 1500 名红色工会会员的上海，不做任何工作；（3）在这些群众性组织中，党团没有建立起来，或者根本不做工作；（4）不做任何旨在瓦解黄色工会、防止他们进行破坏和捣乱的工作，特别是在罢工期间。如果再加上我们的同志不善于对工人采取正确的态度，而使用命令式的方法，把每一个暂时不同意我们观点的工人称为国民党分子，那么所有这一切都十分清楚地证明，工人们正在作出或准备作出极大的牺牲，他们对党是信任的，党对他们的政治影响也是巨大的，但是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却不善于利用这一点，不会进行工作，来加强党在群众中的影响，扩大党在组织上的联系。整个党不善于掌握群众的革命情绪，以便把他们的斗争从争取日常的局部要求提高到更高的水平，把这种斗争与党的基本口号和任务联系起来。

^① 指上海的反帝同盟。

4. 党的干部，首先是积极分子的战斗力和动员能力大大地减弱了，诸如悲观主义、绝望情绪甚至逃避工作这样一些不健康的现象在党员队伍中蔓延开来。

5. 党组织直到现在对陈独秀派、改组派和托派的积极活动反应迟钝，他们利用我们基层工作的弱点，试图渗透到工人群众中去，与他们建立组织上的联系。

6. 在党的工作中还没有出现向中央和共产国际执委会所号召的方面，即向实际任务、向群众工作、向工农的真正革命斗争组织的转折和转变。革命的空谈、抽象的争论在党组织的工作中还继续存在，取代了布尔什维克式的坚持不懈和顽强地争取和组织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工作。

上面指出的党组织工作中的缺点是由以下因素造成的：(1)直到〔中共〕三中全会前一直执行李立三同志的半托洛茨基主义路线，这条路线对上海组织产生了特别坏的影响；(2)在三中全会后的一个时期里省委领导对李立三同志的路线采取了调和主义态度，不去动员全体党员群众和积极分子在思想上和实践上同李立三路线进行坚决的无条件的斗争；(3)以及省委没有贯彻执行中央和共产国际执委会决议所谈到的关于实际群众工作的指示。

为了清除上面指出的党组织内部存在的所有不健康现象，提高它的战斗力，在一切实际工作中真正实现坚决的转折和转变，实现思想上坚如磐石般的团结，远东局认为有必要采取以下措施。

1. 同李立三主义进行思想斗争，这场斗争要求开展广泛而深入的解释运动来揭露他的个别错误及其整个错误体系。为此必须：(1) 现在就让全党了解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全部信函和指示、三中全会的决议和11月25日政治局的补充决议^①；(2) 在近期召开党

^① 指1930年11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李立三路线来信的决议案。

的积极分子会议，会上在批评李立三错误的同时还应该提出关于上海和该省党内状况及党组织任务问题。不言而喻，只有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即同“左”的又同右的机会主义作斗争，才能消除党内的反共产国际的李立三主义。虽然李立三同志的半托洛茨基主义“左”倾方针造成了很大危害，但是目前最主要的危险还是右的危险；（3）在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上提出这些问题后应该把对李立三错误的批评传达到所有党组织，首先传达到工厂支部；（4）对就这些问题作报告的人应预先进行指导；（5）区委和省委应该认真考虑开展这场活动的结果并就党内群众情绪和党支部的动员能力作出相应的结论。

2. 在开展这场批评的同时，党的一切力量都应该注意加强和扩大已经存在的党组织，首先是产业支部，注意在所有最重要的企业建立新的支部。为此必须认真地审查支部和区一级党组织的领导成员，从他们在实际工作中实现必要转变的战斗能力的角度和从有能力的积极的工人党员中吸收新鲜力量的角度来审查他们。

3. 在加强支部和区一级党组织的领导组成人员的同时，还必须着手系统地培训新的支部干部，为此区委要在省委的领导下和在中央的有力支持下立即着手组建短期党务培训班。只有企业里的男女工人党员才能成为这种培训班的学员，而且他们无论如何也不应该离开工作岗位，但是在学习期间应该解脱他们的党务工作负担。这种培训班的教学大纲应该编写得尽可能简单一些，只包含支部积极分子实际工作所绝对必要的基本知识。教学大纲的重心应该集中在对支部的群众性党务教育工作的组织问题上。

4. 上述任务可以在党的工作方式方法迅速改变的情况下贯彻落实。必须用生动的直接指导的方式来代替通告式的领导党组织的方法。因此必须采取以下措施：（1）区委应该为每一个最重要的工厂支部指定自己的代表，其职责是监督支部的工作。区委

可以通过这些代表给支部的工作以直接的帮助，并经常得到关于工厂里发生的事情、工人的情绪、企业里的群众组织工作等的可靠情报，还可以直接帮助企业中党和群众组织领导工人群众的革命斗争；（2）为了总结和交流各支部的工作经验，确定它们的具体工作方式和方法，制订具体的措施，必须召开产业支部的代表会议。应该分区或者甚至分组召开这种代表会议，以适应秘密工作的环境。在区委的会议上必须定期听取一些支部，首先是那些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企业支部的工作报告；（3）为了改善对区委员会的实际领导，必须指定省委委员负责区委会的工作。这些代表由于经常出席区委会的会议，能引导区委会的工作走上正确的道路，并把党支部和工人们提出的问题带到省委会议上讨论；（4）省委员会应该定期召集一些产业部门的工厂支部书记或大企业的支部书记开会。这样的会议应该有助于扩大和改进全省范围内的支部工作。

5. 必须着手出版省委的党的机关报。在出版铅印机关报存在技术困难的情况下，应该出版打印的或者甚至手写的机关报。这种报纸应该只报道党内生活和党的当前任务。为了使每个工人党员都能利用该报，它应该办得短小精悍。社论应该论述党组织的当前任务，在一些专稿中应该对所开展的政治运动进行总结，报道关于国际工人运动、中国工农斗争的简短消息，还应该有揭露国民党及其他反革命组织（改组派、托派、陈独秀派）阴谋的文章。这个机关报应当由工人通讯员网来供稿。

6. 所有大工厂和大企业的支部都应该出版自己的墙报，墙报上应该登载关于一些车间和班组工人生活的消息，例如：在某个车间，某个工长或工程师殴打了工人，该车间的工人们工作多少小时，工资是多少，等等。不言而喻，在这些墙报上还应该登载关于其他工厂和城市中所发生事件的通讯报道。

考虑到可怕的恐怖会给在工人群众中散发党的报刊书籍造成

困难以及多数工人很少识字的情况，党应该着手出版只写一句口号的短小传单，如：“江南制造厂的工人们！‘申新’工厂的工人们正在罢工。请你们快去帮助他们！”，“男女工人们！资本家要关闭工厂。你们要被抛上街头。为了同资本家进行胜利的斗争请加入红色工会！”“工厂的工人们！你们想知道苏区正在发生的事情吗？想参加争取自己权力的斗争吗？请选举出席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代表吧！”等等，等等。篇幅小的传单便于印制百万份，容易散发和使识字不多的工人们看懂。

7. 必须认真研究经常吸收工人入党的问题。应该向所有支部提出这个问题。应该根据环境和秘密工作的可能来制订吸收党员的方法。与此同时，党组织应该经常研究工人退党的原因，以便相应地改进我们的工作和减少工人退党的现象。

8. 必须详细研究除现有的红色工会和反帝同盟以外的其他半合法的或合法的革命群众组织问题。尽管存在着疯狂的恐怖活动和中国缺少合法和半合法的群众性组织，党还是具有某种可能性越过障碍建立这种群众性组织的。只是需要详细研究这样的问题：根据条件建立什么样的半合法和合法组织，如何建立这种组织和如何领导这些组织。除了红色工会、反帝同盟和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外，还可以在一些工厂或一个区建立合作社和俱乐部、各种娱乐之家、扫除文盲班、工人妻女裁剪缝纫班、青年工人体育小组、茶馆等等。这样的组织应该由工人们自己合法地建立起来。我们的同志或党组织只应该成为组建这种组织的发起者。党必须接触群众，因为党只有在与群众的这种联系中才能领导群众的革命斗争，而群众才能在党身上找到自己的领袖。

此外必须加强和扩大已有的群众性组织（工会、反帝同盟、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农民协会）的工作。这项工作应该集中在这些组织的党团内，为此必须在那些还没有共产党党团的地方着手组建党团，并加强对他们的领导。在对共产党党团的领导方面也

可以采用生动的直接指导的方法：召开共产党党团代表会议，交待具体的工作任务和检查执行情况。

9. 在最近召开的省委会会议上要认真研究江苏省党组织的组织机构问题。必须精简各区委和省委的党的机关，以便使工作重心转移到基层群众工作上，把这些机关的绝大多数领导人派到支部中。

10. 还必须使各区委和省委的宣传鼓动部门在出版墙报、传单、开展政治运动和在党员中进行政治教育工作方面给予支部以直接的帮助。

11. 省委的宣传鼓动部应该制订对党员，特别是对新入党的党员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的措施。

12. 必须采取措施把工人积极分子坚决提拔到党的领导工作岗位上来。

13. 必须同对待共青团的不正确态度、迄今为止还存在的李立三一派把党支部和共青团支部工作合并在一起和取消共青团组织独立性的倾向作坚决的斗争。必须进行监督，以便把两种支部真正分开。责成党支部在没有共青团支部的企业中建立团支部。通过对共青团组织的工作进行经常性监督来加强党对共青团的领导。

14. 远东局向中共中央和省委通报自己的以下决定：考虑到给予党组织实际帮助的必要性，远东局责成列昂同志^①与上海组织的领导人（首先是与书记、组织部长和宣传鼓动部长）保持经常性联系，以便落实这种实际帮助。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579，第 215—218 页背面。

打字稿，原件。

① A. 斯托利亚尔。

347

陈绍禹给萨发罗夫、米夫、 马季亚尔、马耶尔的信^①

1930年12月17日于上海

亲爱的萨发罗夫、科佩尔^②、马季亚尔、马耶尔^③等：

不久前给你们写过一封信，信中谈到关于公司^④总的情况和公司内部爆发的一场极其严重的斗争。你们是否收到了这封信？^⑤

现在情况十分严重。领导人正经受着最深刻和最严重的危机，因此在全公司也出现了危机。开始出现消极情绪，走头无路，绝望，各种各样的人逃离公司。工作到处还是老样子。领导完全陷入了泥潭并且已经绝望了。到处呈现出不满情绪。组织和个人递送的声明、决定、决议一天天多起来。斗争不仅在上海，而且在其他地区，如北方和苏区，也已经开始。执委^⑥的决议和来信在各处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但是领导不仅陷入了系统的实用主义路

① 在通过邮局寄发的这封信中使用的是暗语。

② П. А. 米夫

③ 何人不详。

④ 党。

⑤ 见第310号文件。

⑥ 共产国际执委会。

线，而且还对利波夫路线^①采取了继承人的立场^②。在执委干部^③和强硬实践家的强大压力下，现在领导者圆滑而灵活地承认了一些东西。但是与其说他们认识和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还不如说他们在公开地或半公开地捍卫和粉饰利波夫路线。遗憾的是，直到现在我们与多布罗夫^④还没有直接的联系，因此他不了解也不可能了解全面情况。所以他甚至承认三次全会^⑤的路线总的说来是正确的。当然，我和其他人决不能同意他的看法。昨天我们与老板^⑥进行了交谈，结果他认为三次全会及以后的所有文件都是不正确的，是调和主义的，是偏离执委路线的产物，并且同意我们关于取消所有上述文件的主张。

机关几乎还完全处于“利波夫人”^⑦或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的人”的手中。斗争进行得很艰难。不过我们还是赢得了相当不少的先进分子，斗争还在继续并且以很快的速度在发展。当然，一切都要靠斗争的力量和群众来解决，但是来自上面的压力具有重大影响。我们希望得到巴黎^⑧的帮助。不对所有领导机构进行认真的改组，贯彻执委路线^⑨是不可想象的^⑩。请尽快派几位可靠的和熟练的工程师来柏林^⑪。

再见

① 李立三路线。

② 原文如此。从意思看应为：继承的立场。

③ 共产国际代表。

④ 可能指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

⑤ 指中共六届三中全会（见第298号文件注③）。

⑥ 可能是向忠发。

⑦ 李立三路线的支持者们。

⑧ 莫斯科。

⑨ 共产国际路线。

⑩ 原文如此，从意思看应为：不可思议的。

⑪ 中国。

敬礼

你们的 I. 安德烈奇^①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577，第 121—123 页。

俄文手稿

① 陈绍禹。

348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的电报草稿^①

不早于 1930 年 12 月 18 日^②

绝密

上海，远东局

我们认为，即将召开的全会^③ 的任务是：

- (1) 无条件地执行共产国际执委会在电报和信函中提出的路线；
- (2) 修改和批判三中全会的决议^④，制止斯特拉霍夫^⑤ 的两面派行为和消除宗派主义；
- (3) 团结全党去执行共产国际执委会的路线。

必须对李立三半托洛茨基主义的路线和三中全会的错误，其中包括斯特拉霍夫的错误，进行最广泛的和最全面的说明，在党的组织中不搞可能会削弱党组织的辩论。应该取消三中全会进行的把李立三的支持者拉进中央的补选，鉴于斯特拉霍夫的调和主义和两面派行为，应该把他赶出政治局，用新的力量补充中央委员会，达到新老干部的团结并坚决消除他们之间发生冲突的可能

① 文件上有批注：送政治委员会委员和曼努伊尔斯基。

② 日期是根据送交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的时间确定的。

③ 指 1931 年 1 月 7 日在上海举行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

④ 见第 346 页注③。

⑤ 麦秋白。

性。如果为了使四中全会能够顺利召开，避免政治局部分成员再次粉饰分歧，需要把全会推迟一段时间的话，我们将不反对。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566，第 225 页。

打字稿，副本

349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 给中共江苏省委的信

1930年12月20日于上海

致江苏省委，抄送中共中央

亲爱的同志们：

我们曾就江苏党组织的政治组织问题向你们提出过建议^①，现就军事方面的工作把我们的建议再单独寄给你们。

1. 我们在国民党军队中的工作过去是现在也还是党的迫切任务之一。但是现在，在反革命向苏区进行总围剿的情况下，党在国民党军队中的工作就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此时此刻江苏党组织再没有比在军队中的工作更重要的任务了。

江苏省委军事部正在国民党军队中进行工作。但是这项工作的规模还不适应当前的任务。应该加强这项工作，把它提高到更高的水平。这不仅仅是军事部的任务。这是整个党组织的任务。军事部是党组织的一个组织技术性工作机关。要全力帮助它和领导它。

无需证明，如果我们能很令人满意地瓦解驻扎在上海、南京和其他地区部队中的哪怕一支部队，赢得士兵群众在政治上的同情，组织哪怕一次士兵暴动，那么这将是对在前线为保卫苏区作战的红军部队的一次很大的直接支援。

① 见第346号文件。

然而，根据中央和江苏省委军事工作人员的报告来看，这项任务还没有提出来。根据业已提出的任务，部队中现有的党支部（上海、南京）和同情我们的士兵小组，应只限于招募新成员来扩充自己。这当然是对的，但是还不够。我们部队中的整个组织和政治工作都应该朝着这样的方向努力，即在政治上争取士兵群众并在对我们有利的时机组织士兵暴动，以便在我们的领导下派遣暴动部队去反对国民党反动派。

在这个问题上李立三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之间的区别就在于，按照李立三同志的方针，部队的暴动（没有充分准备的暴动）应该引发该暴动部队所在城市的总暴动。李立三同志想通过部队暴动迫使工业中心的工人们举行暴动，而不顾工人群众是否为此做好了准备。在反动派疯狂进攻苏区情况下，我们的任务是，要认真仔细地准备和组织部队，以便以此来支援红军。当工人在政治上还没有做好准备的时候，我们不一定要把工人暴动的必要性与士兵暴动联系起来。

我们并不是说，在上海、南京和其他组织中，现在已经具备条件组织士兵暴动。这样的条件暂时还不具备。但是我们强调这样一点，我们在这些部队中进行工作的客观条件是相当有利的，我们可以顺利开展工作，实现最终的暴动任务^①。

在这方面我们的具体建议如下：

（1）通过在部队内招募新兵的办法加强现有的党支部、共青团支部和同情我们的士兵小组。在为争取实现诸如及时发放军饷、增加军饷、取消体罚和处决、实行休假、改善伙食、改进军服等等局部要求的斗争中，通过军事部来加强对他们的领导。经常向这些支部和士兵群众通报关于红军和党的政治任务、苏区的生活、

^① 原文如此。

红军战士及其那里的^①家庭情况，等等。为此目的必须经常向支部提供在士兵中间散发的传单。对各支部实行符合实际的领导（当然要考虑到秘密工作的环境）。

（2）巩固现有支部并通过向部队派遣开小差士兵（不是向原部队，而是向别的部队）的办法组建新的支部。中央军事部曾开办过一些开小差士兵培训班并把他们派到部队中去，这方面的试验应予以全力支持和加以发展。还必须提出关于向部队派遣成批工人和单个工人的问题，预先要向他们说明任务。

所有这些任务都是完全切实可行的和可以实现的。坚决完成这些任务和在士兵中建立有威信的支部，我们就可以提出士兵暴动问题作为当前的具体任务。

2. 必须着手在驻扎在铁路、机场等地的部队中开展远东局成员与中央军事工作人员所谈到的^②那些方面的工作。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我们在信中就不谈这些任务了。

3. 要给自己提出一项最主要的任务，即在上海兵工厂建立共产党支部和红色工会。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不想详细展开来谈。这项任务的意义是清楚的。我们认为，直到现在我们在兵工厂里（3000工人）只有两名共产党员，这是一个大的错误。

4. 共青团组织应该积极参加部队中的工作。迄今为止，共青团组织几乎都没有参与这项工作。共青团江苏省委甚至没有指定专门一位同志来负责这项工作，其他委员会中的情况也是如此。在共青团中央全会^③上，关于部队中的工作问题提的相当尖锐，尽管全会已经过去两个多月了，可是情况还是这样。要让共青团认真地做这项工作。要让省委军事部对共青团的这项工作实行毫不

① 原文如此。

② 看来指盖利斯与中共中央军事工作人员的谈话。

③ 指共青团五届三中全会。

放松的监督和领导。

5. 对于五人战斗队的工作我们没有新的建议。我们认为，军事部所实行的工作方针是正确的。

致同志式的敬礼！

远东局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579，第 102 页及背面。

打字稿，原件。

350

马季亚尔给皮亚特尼茨基的信

1930 年 12 月 21 日于莫斯科

秘密

根据我的“侦探机构”的情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给我们代表团的电报^①还没有发出。关于中共四中全会的指示已经发出。^② 我们担心，主席团的电报会晚到，在这种情况下可能要召开五中全会来纠正四中全会的错误。为不使这份电报成为马后炮，我恳请尽快发来此电报。

马季亚尔

全宗 495，目录 19，卷宗 427，第 3 页。

手稿。

① 文件没有找到。

② 见第 348 号文件。

351

库丘莫夫关于瞿秋白 和周恩来错误的记录

不晚于 1930 年 12 月 22 日于莫斯科^①

关于瞿秋白和周恩来同志在中共三中全会上的错误

瞿秋白和周恩来同志在中共三中全会上对李立三同志的半托洛茨基主义路线采取了调和主义立场，至少是不忠实于共产国际（对共产国际要两面派手腕）的立场，因为他们都了解共产国际的决议，而且在莫斯科时，声明完全同意共产国际的决议。

确实，在政治局 1930 年 8 月 26 日给长江局^② 的指示^③ 中就可以发现，周恩来同志歪曲共产国际的指导方针，试图在党中央和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团之间充当首席仲裁员。

“少山（周恩来）同志刚刚回国。中央在同他进行两次谈话和举行两次政治局会议后明白，共产国际路线和中共路线没有差别。

接下来，说到你们和远东局之间的争论。罗伯特^④ 同志注意到，我们应该动员群众举行示威游行来反对长沙的白色恐怖，这是对的，但是他没有注意到接受准备暴动口号的广大群众的政治觉悟，这是错误的，他不同意把示威游行和总罢工同准备武装暴

① 日期是根据文件上的批注标明的。

② 指中共中央长江局。

③ 文件没有找到。

④ F. 艾斯勒。

动结合起来，这也是错误的”。

我们有瞿秋白同志在中共三中全会上发言的速记记录^①。如果我们不知道三中全会有名的政治决议^②还是他本人起草的，那么仅是对他在三中全会上的发言的分析，就足以确定他对全会所犯的错误负有多大责任了。

瞿秋白同志是这样解释共产国际的路线的：

“中共中央始终坚持共产国际的路线，也就是说它完全同意这样的方针：中国革命高潮不可避免地要到来。在这个立场上，它正确地分配了自己的工作：它没有去组织争取召开立宪会议的长期运动，即在黄色工会等组织中的革命反对派运动，而是积极准备进行武装暴动”。

很有趣的是，在这段引文中可以发现，瞿秋白同志竟把在黄色工会中的工作任务与托洛茨基派争取召开立宪会议的口号相提并论，而共产国际的整个路线被解释为“中国革命高潮不可避免地要到来”的方针。

与这一点相适应，瞿秋白同志也分析了李立三同志的错误：

“这些错误是由于过高估计了中国革命的发展速度才发生的”。还说：“中央政治局近三个月作出的估计是不慎重的，因此在分配工作方面和在策略方面出现了某些偏差。一句话，我不能同意特生^③同志的意见，认为“过高估计”一词不适合对当前形势的评价。李立三同志在发言中，虽然很强调，甚至过于强调在中国革命发展速度方面的错误，但是也注意到了在估计目前革命

① 档案文件没有找到。见《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篇）》第7卷，北京1991年版，第1—34页。

② 指《关于政治状况和党的总任务议决案》，见《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篇）》第7卷第35—62页；《中国科研所通报》，莫斯科1931年第5—6（74—75）期，第5—30页。

③ 向忠发。

力量方面的错误”。

这就是瞿秋白同志在发言中关于政治局和李立三同志的错误所说的话。很自然，从他们“不慎重”和“出现某些偏差”的角度对他们作出的评价，与共产国际的评价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在对目前党所面临的基本任务的分析上，瞿秋白同志也是在两个互相排斥的路线之间左右逢迎，试图通过作出一些口头声明来把两者合在一起。例如，瞿秋白同志在口头上承认，有必要为建立革命的地区的苏维埃根据地和红军而进行坚决的斗争，但同时他又宣称，占领长沙意味着革命运动的“新阶段”，在长沙城下的战斗是革命战争的开端，是红军和国民党军队之间正式战争的开端。根据这一点，确定了以下基本方针：“目前我们应该坚定不移地前进，应该更强有力地为争取群众，准备在一些大城市举行武装起义而进行斗争”。我们正经历“从工农运动的局部进攻向总的革命进攻过渡的时期”。

在发展土地革命问题上，瞿秋白同志既没有把党在农民运动中的路线同李立三同志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同富农联合）分开，也没有将其同李立三同志的半托洛茨基主义方针分开。相反，他在发言中重复了两个方面的错误。实际上，瞿秋白同志不去谴责李立三的富农口号，而是宣称：“因此，中国共产党应该同一切非党广大工农群众，甚至同最落后的群众组成统一战线”。这个主张是瞿秋白同志在研究富农是否参加北方反征税斗争问题时提出的。对这种提法党必然会理解为建议建立直至包括富农在内的统一战线。除此之外，瞿秋白同志还完全按托洛茨基的做法把民主革命时期的任务同党的列宁主义政策对立起来了，同时还按孟什维克的做法辱骂农民平分土地的革命要求。实际上，瞿秋白同志说：“在苏区政策方面，不仅需要注意现在民主革命时期的任务，而且也需要注意一些列宁主义政策问题。”还说：“我认为，没收富农土地、禁止买卖土地、禁止出租土地（资本主义的租赁），这

些都是关于普遍平等和消灭剥削的小资产阶级乌托邦观念”。

在工人运动问题上也是一样，瞿秋白不能回避共产国际关于开展工人阶级局部斗争的建议，但他在口头上承认这个指示的同时，却用李立三路线的精神对其加以解释。瞿秋白同志不去谴责多次规定举行没有准备好的总政治罢工的做法，而是宣称：“这并不是说，以前给政治罢工赋予了太大的意义，给总罢工和武装暴动赋予了太多的注意力，而现在这些问题要往后放一放。但我们在努力准备举行政治罢工的同时，应该把政治斗争口号同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的口号结合起来。在职工运动中，瞿秋白同志继续实行自己老的错误路线，他宣称：“职工运动中的错误是：反对黄色工会，不抛弃在黄色工会中的工作”。因此，瞿秋白同志呼吁党放弃黄色工会工作，同时在其整个长篇发言中没有谴责李立三同志取消红色工会的做法，没有提请党注意巩固红色职工运动的必要性。

瞿秋白同志没有谴责李立三同志的半托洛茨基主义方针，同时也并没有动员党去反对农民运动中和工人运动中的现实的右的危险、右的做法。作为右的倾向仅有的代表，瞿秋白同志在发言中提到何孟雄和张国焘同志。他只是根据传说了解到这种倾向的立场的。他说：“最近中共中央犯了一些错误，但这并不意味着它的总的政治路线是错误的。可是右倾机会主义者却利用这些错误来同党作斗争。我认为，何孟雄同志的立场很清楚就是这样的。至于张国焘同志的立场，最近他也说中共中央的路线不对（他的立场离这儿有两万里，我还不了解），我还不能确定它是否真的与右倾机会主义者的立场相一致。但是在这方面可以肯定，张国焘同志没有搞清楚共产国际和中共的路线是否一致的问题”。

在这段引文中，引人注目的是瞿秋白同志的一个特别新奇的特点，瞿秋白认为，他可以诋毁这样一个同志（指责他右倾），他的立场，如瞿秋白本人所说，在两万里之外，而瞿秋白本人并不

了解。

所有上述引文明显说明了瞿秋白同志对三中全会对李立三半托洛茨基主义路线所采取的调和主义立场应负的责任，以及对未揭示在组织方面所采取的右倾机会主义做法应负的责任。这些文件也说明了瞿秋白同志在不忠实于共产国际指示（对共产国际指示要两面派手法）问题上的个人责任，而瞿秋白同志是比任何其他人都更了解共产国际指示的。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564，第 110—115 页。

打字稿，副本。

352

斯卡洛夫给共产国际执行委
员会组织部和东方书记处的
书面报告

不晚于 1930 年 12 月 28 日于莫斯科

秘密

致组织部瓦西里耶夫同志
东方书记处

关于组建红军对于中国革命今后发展的极端重要性问题是相当清楚的，所以在本报告中应加以阐述或捍卫。早在今年 7 月斯大林同志就十分肯定地强调指出了它的意义^①。当时在 7 月就曾建议给予中共以组织上的帮助，以便尽快地和更好地切实解决这个问题。

从那时起已经过去 5 个多月了。在中国建立正规军的坚强核心和巩固的苏维埃根据地方面却没有做任何严肃认真的、经过深思熟虑的工作，实际上只是提出了问题，但在组织管理方面实际上是由一些军和支队的游击战放任自流了。尽管斯大林同志有过指示，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对中共的帮助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明显不够的和无积极作用的。

然而，中国革命的发展及其武装力量的成长以及军阀部队在

① 此处及以下可能指 1930 年 7 月 21 日斯大林与周恩来谈话时所阐述的观点。
[见克里姆林宫斯大林办公室的访问者，第一总书记接见人员的登记簿 (1924—1953)，
《历史档案》，1994 年第 6 期，第 22 页]

帝国主义者的公开军事支援下所施加的军事压力的加强，更加强烈地要求努力解决一些重要而迫切的军事建设问题。

所谓的正规红军的数量在增加，一些军和支队的人数也在增加。工作实践（特别是长沙城下的战斗和蒋介石最近讨伐^①时与他的部队发生的冲突）表明，这支军队的许多部队是相当坚强的、有战斗力的和与农民群众有密切联系的革命部队。但是与此同时还必须十分明确地强调指出以下一些在目前妨碍中国革命武装力量进一步发展的主要的、基本的缺点。

1. 许多军和支队的社会成分是很不令人满意的。在一些情况下，过去被俘的或自愿转过来的军阀部队的士兵过多，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失去任何阶级属性，怀着雇佣的心态，与农民没有多少联系，并且几乎没有受到足够的政治改造。在另一些情况下，有相当大的富农阶层，对一些支队的士兵群众有很大的影响，特别是在老兵人数很多的支队中更是如此。甚至还有一些明显的富农队伍，恰恰是这些队伍由于不赞成正规部队的土地政策而脱离了正规部队。在第三种情况下，一些军中的农民群众，很大部分是由仍然保留着自己组织的各种秘密社团（“红枪会”等）的成员组成的。在许多部队中，特别是在不大的部队中，职业土匪占很大比例，他们一起加入军队并在自己的头目领导之下。最后，许多军里都有从军阀部队转过来的或者投降过来的整个部队，没有进行任何改编，甚至保留了原来的军事指挥人员。不言而喻，这些部队经常哗变和又投奔军阀。

在红军一些部队，有时是主力部队的社会成分如此纷杂的基础上，红军队伍中发生盗匪活动的危险性在增强，一些指挥人员，特别是那些曾经在军阀部队中供过职的指挥人员，进行军阀冒险活动的危险性在增强，一些部队中的军阀主义倾向也在增强。这

① 指国民党对中国红军的第一次围剿（1930年11月至1931年1月）。

些因素会造成政治后果是十分清楚的。

如果不有意识地克服这些缺点并坚定地执行依靠贫农和中农中优秀分子来扩充军队和加强无产阶级和雇农军政指挥骨干的政策，那么随着红军数量的增加和在进行土地革命的地区作战的军阀部队的瓦解，所有这些缺点就会变得更加严重并可能造成很大的困难。

2. 在斗争的前几个阶段，由于一些独立的规模不大的农民暴动处于孤立状态和有大量的规模较小的游击运动，游击军不可能有统一的具体目标和统一的作战计划。现在，作为红军基本单位并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已经增强的各军是以广大地区深入开展的农民运动为依托，在这种情况下，制定这样的统一作战计划和共同的作战目标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无论从政治角度还是从纯军事角度来看都是必要的。它们的目标应该是占领某一个幅员辽阔的、连成一片的政治军事基地，这个基地也会是苏维埃政府的主要根据地（关于这个问题下面再详细谈）。然而，到目前为止，除了李立三的立即攻占长沙和武汉的极端危险的冒险主义计划外，红军还没有这种经过周密考虑的、有步骤地和坚持不懈地实行的计划。继续执行李立三的计划就意味着对革命的基本武装力量的彻底摧毁。然而，迄今为止中国红军还没有别的作战计划。

3. 不管以建立苏维埃根据地为目标的统一作战计划问题解决得如何，还必须强调指出，在许多情况下，甚至在作战的各军之间都缺少必要的和可能的相互协调行动。至少军阀反攻时在长沙城下进行的战斗可以十分清楚地说明这一点，当时红军各军不仅缺少统一的指挥，而且还缺少统一的计划和相互支援，各军指挥员之间在为谁起军事主导作用争论不休。

然而，来自军阀部队方面的压力的加强（蒋介石的讨伐）迫切要求红军各主力部队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做到行动的相互协调和相互配合。附带说一下，必须强调指出，这决不意味着把红军

各部队握成一个拳头——这样的计划是最危险的和最无效果的。

4. 在一些军和大的游击队的行动中，直到现在还没有任何计划。他们自己的报告十分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尽管一些军和支队具有所谓的地域性质，与某些苏维埃化的地区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是另一些军和支队却沿着无法理解的、迂回曲折的和往来穿越的弯曲路线四处游荡，这种游荡没有任何固定的计划和目的。他们在两三天或三五天内把一个地区“苏维埃化”，尔后又迁移到另一个地区，第三个地区，当然在组织上是来不及巩固这种“苏维埃化”的。如果说在某些情况下，这些游荡是出自军事需要（敌人的压力）或者出于对粮食的考虑，那么在许多情况下，他们的游荡是因为对明天的军事政治行动内容缺乏明确的概念。

5. 在许多情况下，不仅作战行动缺乏相互配合，而且甚至在各省武装力量之间也缺乏起码的最简单的联系。例如，最近几个月来，山东游击队在与其他省毫无联系的情况下，孤立地在进行紧张的和不断强化的斗争。例如，在河南南部一些红军在与邻近的湖北北部的支队毫无联系的情况下孤立地进行作战。然而，就是从日常斗争的角度来看，山东、河南和安徽游击队积极性的加强也能够起重大的作用，在蒋介石进剿江西时可以把他的相当多的兵力吸引过来。从发展中国北方和黄河流域一带的农民运动的角度和吸引新的地区和千百万农民群众参加土地革命的角度来看，山东和河南的这种游击运动具有更重大的意义。四川对于中国革命未来斗争的整个战略将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但是直到现在对那里的农民运动的发展和游击队的建立关心很少，很不够。

各地区的运动，甚至邻近省份相邻地区的运动都不注意利用自己邻居的斗争经验。重新出现的土地革命和游击战争的根据地都任其自然发展和仍为局部的暴动，而在许多情况下它们本来是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的。在许多情况下，武装斗争还带有本省农民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本来是可以而且应该予以克服的。

6. 一些军在作战中即使取得一些胜利，但是由于它们战术笨拙、犹豫不决、不善于寻找敌人的薄弱环节并予以打击、对失败过份恐惧。这种恐惧束缚作战的积极性和勇气，有时也遭到失败。例如，对军阀部队后方的作战行动极其少见，当时他们无疑有采取这种作战行动的能力并会收到很好的效果。

还可以指出战术上的一系列极其严重的缺点和组织战役上的无能，而这些缺点关系到许多方面。例如，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是侦察工作的薄弱，而有时甚至根本不进行侦察，不善于组织和利用侦察机构，不详细制订作战计划并且一般都不能在时间上进行协调，等等。

7. 在组织方面，红军部队和支队在运动的最初阶段有各种各样的成分是完全不可避免的，并且常常是极端复杂和极端混乱的，而在一些主力部队中这种状况已是继续发展的障碍，并在降低他们的机动性和作战能力。

8. 在所有红军部队中几乎都缺少对军政干部的培训。对军政干部的培养只能通过积累实际作战经验来进行。在这方面只有第4军尝试做了一点工作，但是在那也未能按照要求来进行，实际上几乎没有取得什么效果。虽然在当前的斗争环境中培训工作有很多困难，但是军政干部缺少系统的训练，一方面，会影响部队的战斗力，另一方面，会加强过去军阀部队旧军官在红军中的战术优势，因为这些旧军官曾多少受到过一些军事训练。

改善指挥人员的社会成分问题，其中特别重要的不是加强而是建立其无产阶级骨干的问题，直到现在仍停留在决议的纸面上。（只有贺龙最近在这个问题上突然表现出实际的主动性。）

9. 部队本身的军事训练几乎没有进行，只是有时在战斗中，有时在行军中，有时在从事某些地区苏维埃化的工作时，有时在休整时进行一点；在有时搞训练的地方，这种训练在战术内容方面也必然与军阀军队的训练很少有区别。

10. 不是在所有军里，而只是在有些军里做政治工作（无须强调它的重要意义）。政治工作进行得没有计划，也不经常，缺少为从事这项工作而多少受过一点训练的干部。

尽管红军在居民中做工作有特殊的意义，但是这工作做得还很不够。它的政治内容，如关于土地的基本问题，大大走了样，在这里，军队也反映了中共各级组织没有很明确地提出土地问题，反映了组成军队的农民的不同社会群体的直接利益。

红军的党组织和政治组织无论在吸收工人参军（在萍乡和大冶）方面，还是在做工人群众工作和对他们的组织工作方面（特别是在长沙），都犯有极其严重的粗暴性质的错误。

11. 对于在我国学校里受过军事训练的中国同志的使用极不合理，也无计划，不是把他们的主要部分用于从事组织和建立正规军核心的工作，而是把他们分散到各个部队和地区去，也不总是让他们去做军事工作，这样就大大地降低了他们从事有益的军事工作的效果。

12. 尽管红军武器弹药补充的基本来源在当前斗争阶段是军阀部队（战利品），但是有步骤有计划地夺取军事运输工具和用其他手段来获取武器弹药的工作都十分薄弱，而且常常根本不去做。然而，只有在有足够物质保障的情况下，红军进行较大一点的积极战役才会取得胜利。

13. 军队的粮食和服装供给问题直到现在还都十分混乱。到目前为止这个问题在最好的部队里基本上是通过向城市资产阶级征收服装料、缝制费和资金及征用地主、豪绅和高利贷者财产的办法来解决的。在其他部队，特别是在较小的部队和支队里，这个问题的解决就放任自流了，因此，苛捐杂税在农村就成为必然的现象。

随着红军数量的增加和在固定的地区建立根据地，这个问题就要求有新的解决办法（显然需要某种征税方法），同时它将成为

军队和苏区农民相互关系中的一个越来越重要的问题。

直到现在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的任何方案。

14. 帝国主义者的内河舰队积极参与反对中国红军的斗争已经众所周知，可以预见，在最近的斗争阶段，帝国主义军队从军舰上进行炮火支援和实施一些短距离的登陆作战，将是帝国主义者对中国革命进行直接武装干涉的主要形式（对中国反动派进行物质和财政支援除外）。

因此，对中国红军来说，关于与内河舰队作斗争的问题具有特殊的意义。现代技术可以向红军提供进行这种斗争的许多手段，但是进行这种斗争要求有相当长时间的预先准备。

然而，尽管这个问题具有极重要的意义，因为很明显，随着争夺华中最重要地区和最重要行政据点（例如，将来争夺武汉）的斗争的加剧，武装干涉将会加强，但是在中国，没有在这方面做任何工作。

在破坏性行动方面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例如，对军火库、铁路等），而这种破坏性行动在当前和将来的斗争中都是必要的。

中国革命的武装力量，在组织和行动方面的基本的、最主要的缺点就是这些。对于这些缺点，直到现在不仅没有去努力克服，而且甚至都没有去认真着手做这项工作，这种状况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极大不安。

为了克服上述缺点和使武装斗争进入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现在必须采取以下主要措施：

（1）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实际上使中共及其中央机关坚决面向军事建设问题（“中共应该”像斯大林同志所说的，“明白”这些问题，等等）^①，保证这些问题的解决不采用突击的方式，而是采用有步骤地、坚持不懈地做工作的方式。在这方面，为了保

^① 见第555页注①。

证这项工作的进行必须在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下面设共产国际执委会常设军事指导组。

（2）建立中国红军的军事领导中心（革命军事委员会），该中心要全力以赴坚持不懈地开展工作，把一些独立的军和支队纳入彼此相联系的红军体系。这项工作在短期内是无法完成的，要在今后的革命和军事斗争过程中加以解决，但是现在就必须开始和有力地推进这项工作。

（3）在坚持对分散活动的各军和支队做政治和组织联合工作的同时，必须在最短期限内使它们在以下方面的作战行动保持统一：占领一个较广阔的地区作为主要的苏区和苏维埃政府的根据地，在这个地区要保证真正进行土地革命，使这个地区能够成为开展以后的与攻占哪怕华中一个最重要的政治行政和工业中心的行动有联系的斗争的主要战略基地。

在中国革命发展的目前条件下，在江西、福建、广东和湖南诸省交界的山区，随着斗争的进行，已经形成了这个主要的苏区，其发展前景是进一步扩展，首先向北方，向长江和武汉扩展。

第二个苏维埃根据地应该建立在湖北、四川和湖南的交界处，其发展前景是首先向四川扩展。必须考虑到，攻占四川是解决以武汉为中心的长江中游地区的进一步苏维埃化问题的重要战略决策之一。

（4）在为开辟上面所说的主要苏维埃地区而进行政治、组织和军事方面工作的时候，在军事工作方面要特别强调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建立正规军基本核心的必要性（人数大体上如斯大林同志所说的）。只有建立这种核心才能为军队的革命军事委员会提供开展组织和作战活动的巩固基地，才能为将来组建部队提供干部，并能加强苏维埃政府的政治军事地位。

（5）军队这种核心的建立、它在组织上和作战能力上的形成，不可能在农民运动活跃的地区之外。同时，整个这项工作只有在

取得暂时作战喘息机会，哪怕是断断续续间歇的情况下，才能很快完成。因此，在主要苏区继续开展紧张斗争的时候，必须同时或者直接在这些地区，或者由于敌人的军事压力不能创造暂时作战喘息机会而在与其毗邻的地区，立即着手建立两三个训练和建立军队这种核心部队的基地。在后一种情况下，可以（也可能）利用湖南、广西、贵州三省的边界地区，在那里，军阀的压力必然会较小并且具有发动农民运动的许多前提条件。这个地区之所以重要，还因为它能使中国红军与中国西南部（其中包括四川南部）被压迫少数民族建立直接的联系。

关于作为首要任务组建正规军的核心和培训军政干部的更详细情况，请见我早在8月初递交共产国际执委会组织部的报告^①，那个报告是别尔津同志赞同的并就其基本论点预先同米夫同志进行过协商。

(6) 要派出最低需要且足够数量的指导人员——约有20到25人的指导组才能保证上述工作的进行，因为中国军事工作人员不具备相应的理论和军事技术素质，他们必然把改组和整编军队的独立工作拖延很长时间，而不能进行相应的军事培训工作。（关于指导组的人员组成，请见上面提到的我的报告。）

我要强调指出，在严肃地提出这项任务而不是置之不理的情况下，只派两位同志，且不是由于他们自己的过错而滞留在去红军那里的路上，这决不能完成此项任务，中共政治局对待军事问题的组织方面的消极态度，事先就排除了令人满意地和迅速地解决此项任务的任何可能性。

(7) 必须扩大在我们这里培训中国军事干部的工作，其中一方面，要注意加快对狭窄专业人员（如报务员、爆破手和手榴弹工厂的工作人员）的培训，另一方面，要保证对作战方面的工作

① 文件没有找到。

人员进行基本的培训，使他们具备相当于中国红军旅长一级所必需的视野。

（8）个别任务——保证筹备、出版和发行中国红军所必需的，特别是培训和轮训军政干部所必需的军事书籍。这套书籍的出版计划是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编辑出版部的倡议，由我和一些同志制订的，与库丘莫夫同志协商过并曾报送编辑出版部转呈政治书记处审定^①。

签字：共产国际执委会指导员

西纳尼^②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575，第 29—40 页。

打字稿，原件，亲笔签字。

① 文件没有找到。

② Г. Б. Скалов.

353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成员 与何孟雄和温裕成的谈话记录

1930年12月29日于上海

与何孟雄和温裕成同志的谈话记录

何〔孟雄〕：中央没有任何威信，因为中央犯了许多错误。计划召开的〔中共〕四中全会^①不会纠正三中全会^②的错误，也不会采取同李立三主义作斗争的决定性步骤。这种情况将同三中全会一样。出席四中全会的将是一些旧中央委员，他们不了解群众在做什么，党内群众在想什么。

问：您是如何理解“党内群众”这个词的？在产业支部中是否讨论过对中央的信任问题，有什么结果？或许，〔您〕所说的党内群众，是指中央机关和省委^③的工作人员？

答：昨天召开了五个区的积极分子会议。在沪中区莫斯克文同志^④代表政治局讲了话。会议决定，必须撤消莫斯克文同志的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职务。还提出了把他开除出党的要求。主要理由是：莫斯克文同志在共产国际时，赞成一切决议，而回到中国后背叛了共产国际。

① 见第543页注③。

② 见第346页注③。

③ 指中共江苏省委员会。

④ 周恩来。

斯特朗同志^①出席了闸北区的会议。会议也决定撤消他的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职务，并把他开除出党。理由是：他在莫斯科呆了两年，而回到中国后背叛了共产国际。向忠发同志出席了沪东区会议。会议决定撤消他的总书记职务。少先队员^②同志出席了法租界的会议，同样也决定撤消他少先队员的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职务。徐锡根同志出席了沪西区会议并发表了反对政治局的讲话。全体与会人员都赞成他的意见，并且欢迎他站出来反对政治局中的李立三分子。电话局支部作出决定，要求撤消所有容忍三中全会犯错误^③的人的政治局委员职务。我们不知道其他支部的决定。苏州、浦口和蚌埠县委作出决定，反对向李立三主义作出妥协的分子。

迄今为止，政治局不允许发言反对李立三同志及其路线，而另一方面，又与共产国际耍外交手腕^④。我们不相信，政治局能够认识自己的错误并加以纠正。

温〔裕成〕：早在共产国际第一份电报^⑤发来的时候，我就曾尝试反对李立三同志。李立三同志带着这份电报到举动委员会^⑥来。但在我发言后，他就冲着我大喊起来，然后开始劝我，说没有任何分歧，一切过错都在远东局，远东局不敢作出答复，而是把一切都送给共产国际，现在共产国际还没有答复政治局的第二份电报^⑦，我也就受到中央纪律的约束，此后不敢发表意见，以为李立三同志讲的是实话。原来，他只不过是在和我要滑头。

① 瞿秋白。

② 关向应。

③ 原文如此。

④ 原文如此。从意思上看应为：玩外交游戏。

⑤ 大概指第255号文件。

⑥ 行动委员会。

⑦ 可能指第252号文件。

何〔孟雄〕：现在不仅在政治局里存在着危机，而且在全党也存在着危机。政治局无法使党摆脱危机的局面。

在回答是否存在陈独秀阵营中的取消派和有托派利用党内这种形势的危险时，何孟雄同志回答说，不存在这种危险，因为共产国际的来信^① 和指示已经武装了全党。

除了同志们不相信政治局外，在同志们和政治局之间是否还有其他区别^②，在回答这个问题时何孟雄同志说，有的。他还说，尽管政治局也写信说，它接受共产国际的所有指示，但实际上它并不理解这些指示。例如，斯特朗同志在一份报告中谈到在苏区成立中央苏维埃政府时指出，必须首先召开各地苏区的代表会议，会上选举出席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代表，并只能在这个代表大会上选举产生苏维埃政府^③。何〔孟雄〕同志认为，这是不正确的，他说，苏维埃政府现在就应该成立，不要等到各地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召开。

在回答需要撤消哪些人的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职务时，何〔孟雄〕同志回答说：莫斯科文、斯特朗、向、少先队员、项英和刘^④。撤消罗迈^⑤ 和贺昌的中央委员职务。

在回答对各位领导同志持什么态度的问题时，何〔孟雄〕同志说：“我们已经有两年没见过张国焘了，不知道他持什么立场。布雷尔斯基^⑥ ——是个缺乏实际锻炼的大学生。所谓的青年派 —— 戈卢别夫^⑦ 等人——只会写点东西，而且常常写一些连他们

① 指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李立三路线给中共中央的信（见第308号文件注③）。

② 原文如此。

③ 文件没有找到。

④ 何人不详。

⑤ 李维汉。

⑥ 原文如此。应为：布林斯基——任弼时。

⑦ 陈绍禹。

自己也不明白的东西。不过，这一派人对政治局采取妥协的政策。例如今天，戈卢别夫在一次会议上说，与政治局的斗争应该结束了。罗章龙——是位好同志。”

在回答同志们会建议什么人进入政治局以取代他们建议开除的那些政治局委员时，何〔孟雄〕同志说：“只会建议来自实际工作中的工人积极分子。我们从共产国际的来信中获得了理论和路线，并且在这里还有共产国际的代表机构。只需要好人来贯彻执行正确的路线。”

* * *

谈话主持人注释：温〔裕成〕同志——是一位有经验的纺织工人，是个年轻人。在全会前他曾领导上海市政工人红色工会。在〔三中〕全会上被增补为中央委员。在全会上他没有发表批评意见。现在他领导上海工会联合会。他是江苏省委副书记。在政治上很软弱，似乎完全处于何〔孟雄〕同志的影响之下。

何〔孟雄〕同志——是1922年入党的党员。他带领北方的一群知识分子来到我们这里。他本人是知识分子。最近一个时期在上海担任区委书记。在政治局文件中说他是与陈独秀有联系的右派分子。他是个精力充沛型的人，政治上受过良好的教育，是位明白事理的人。但是他给我留下一个狡猾的印象，他善于利用工人与政治局作斗争，他自己想当领袖。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578，第 33—34 页。

打字稿，原件。

354

埃斯勒同徐锡根谈话记录

1930年12月30日于上海

关于与（政治局委员和中华全国总工会领导人）什埃^①谈话的报告

下面我来转述什埃同志关于党内形势的最重要意见：

什埃说：目前在党内，特别是在上海，形成了非常危急的形势。基层党组织反对中央并要求坚决进行改组。我的意见以及工人同志的意见是：应该解决政治局和中央改组的问题。一切错误都是中央犯的。在第五次代表大会^②前夕他们犯了机会主义错误。在第五次代表大会上中央承认了自己的错误。然后中央犯了盲动主义错误。在非常代表会议^③上中央又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在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又重新承认了错误。但是在这之后中央委员们又根据李立三路线的精神犯了错误。自然，现在他们又在承认错误。但是我们的情绪是一种，认为这个中央是没有希望的。基层党组织不信任这个中央。对回来的大学生^④也一点儿不信任，在基层党组织中对他们存在着强烈的反感情绪。当然，他们会写，但是

① 徐锡根。

② 指中共第五次代表大会。

③ 指1927年8月7日召开的中共中央非常代表会议。

④ 这里说的是1929至1930年间返回中国的、曾在苏联学习过的中共和中国共青团工作人员。

他们没有任何实践经验。戈卢别夫^① 曾经在上海工作过，但是他进行过无原则的斗争。当然，形势很严峻，应该仔细而坚决地进行全面改组。政治局的工作方法完全是国民党式官僚主义的。对工人只使用，而不进行教育。当然，政治局中有工人——向(忠发)、项[英]，但是他们用这种错误的工作方法又能学到什么呢？李立三的话是决定性的。我们只是举举手而已，例如，在李立三与共产国际及远东局的斗争中就是这样。要我们同政治局保持一致。我知道，让人利用我们这不好，但也要理解我们的处境。我感到，在李立三及其一伙人领导下，我们不会继续前进。我们没有做任何重要的实际工作，但是我们不敢说。我们之中有人只是表示了一点点的怀疑，他就成了取消派的间谍。在我们上海的党组织中笼罩着这样的情绪：在党外是白色恐怖，而在党内则是对我们工作人员的红色恐怖。这样的政治局怎么能教育工人，怎么能在实际工作中有所前进呢？与共产国际和远东局的冲突经常被掩盖起来。当然，我不否认，党就是在这样的领导下也做出了一些成绩，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所有这一切正确的建议都来自共产国际，并且总是一开始必须纠正政治局的错误政策。即便由于政治局和中央进行重大改组，政治局在理论方面水平还不会很高，但由于吸收了工人，至少实际工作会完成得好些，共产国际和远东局在这个问题上应该支持党。这不仅是我的意见，这也是在工会和基层党组织中工作的所有党员的心情。

当然，什埃赞同这样的看法：存在着右派分子企图利用工人积极分子这种愤懑情绪的危险性，但是，据说他们已注意到这种危险性，并且懂得进行两条战线斗争的必要性。

问：您与何孟雄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

答：中华全国总工会的许多同志对他怀有好感，他曾支持我

① 陈绍禹。

们全总反对中央的决议。当他担任上海沪中区书记时，他工作得很出色，我也认为，他执行的是正确的路线。

为什么我们主张召开代表会议，而不主张召开全会呢？因为我们主张，不让那些犯过某些错误的同志参加代表会议，而让那些以自己的实际工作保证了与李立三路线作斗争的真正的同志参加会议。如果远东局主张召开全会，那么它应该保证有足够的我们工人的代表参加。我们无法进行任何实际工作，因为同志们总是争论不休，而不是去解决实际问题。因此，请你们尽快作出决定。

问：关于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的组成你有什么建议？

答：我们在自己内部曾讨论过多次，我这里有一份完整的名单。当然，我知道，需要很认真地进行思考。关于上海的党组织问题，请不要以为布林斯基^①能够领导上海的组织，他没有足够的实际工作经验。

关于政治局的问题。从政治局的组成人员中应该撤消的有：李立三、项、少先队员^②罗〔登贤〕、罗明^③、温〔裕成〕、斯特朗^④、莫斯克文^⑤、（也应该撤消他们的中央委员职务）。关于是否让周〔恩来〕离开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的问题，他本人还没有明确的意见。如果让周〔恩来〕和斯特拉霍夫^⑥从事实际工作，他们还能在许多方面帮助党。

他列举了下列同志，按照他的意见，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应该由这些同志组成：

政治局：陈郁——海员，海员工会领导人；张国焘，罗章龙，

① 任弼时。

② 关向应。

③ 罗迈即李维汉。

④ 瞿秋白。

⑤ 周恩来。

卢福坦（至今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中央委员会：李庆强^①——矿工，唐山工会领导人（已被捕）；徐炳根——工人，上海工会组织部领导人；韩连会——铁路工人，青岛工会书记；沈先定——上海印刷工会主席；徐畏三——上海纺织工会主席；杨立安^①——也是工人，上海总工会青年工作负责人（曾出席工会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宁迪卿——农民，湖南省委书记；汪第万^①——农民，赣西南特委书记；周逸群——红军政策；刘林元——云南铁路工人，第五次代表大会参加者；刘达潮——香港海员总工会主席；陈郁——海员工会主席，曾山——赣西南苏维埃政府主席；滕代远——知识分子，第三军团政委；王首道——农民，湘赣边区特委书记；刘希奇^②——知识分子，因反对李立三而受处罚；李财舍^①——知识分子，因反对李立三而受处罚，以前他和刘希奇都是鄂东负责人；林育南——知识分子，以前是中华全国总工会常委会委员，反对过李立三，受处罚，现任赣东北特委书记；刘子载——以前是上海总工会事务书记，曾反动过李立三，受处罚，现被派往苏区；何孟雄——知识分子；萧明——1922年的党员，中华全国总工会事务书记，工人；陈云——知识分子，江苏农民领导人；李震瀛——知识分子，武汉总工会，自1922年起参加工会运动，现被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局派往苏区；李富春——知识分子，广东省委委员；徐阿梅——工人，租界电车工人党支部书记；孟坚——知识分子，哈尔滨市委书记，他对李立三很反感。

问：这个名单你是怎么拟定的？何孟雄是否也知道这个名单？

答：我们在中华全国总工会讨论过这个名单，它是讨论的结果。我没有对何孟雄谈过这个名单。

① 即欧阳立安。

② 原文如此，何人不详。

罗伯特斯^①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566，第 252—253 页。

德文打字稿，副本。

① Г. 埃斯勒。

355

李立三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 会政治书记处提出的声明

1931年1月1日于莫斯科

秘密

致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

看了从中国寄来的新材料后，我深深感到，我犯了一个极大的政治错误。直到今天，中央政治局不仅没有接受共产国际关于坚决纠正过去一切错误的指示，而且在各个方面都在经受着最严重的危机。

1. 由于害怕丧失威信，中央政治局千方百计掩饰错误。一开始政治局简单地承认，它在李立三的影响下犯了局部的策略错误，从而掩饰了两条路线的对立。现在，在严厉批判的影响下，政治局不得不指出李立三的错误路线，但同时又企图把李立三路线与中央的路线区别开来，并认为，政治局的路线在过去与共产国际执委会的路线是一致的。它减轻了李立三路线的错误，说什么李立三的错误仅仅是8月1日和3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和他的工作计划。这表明，政治局没有决心接受共产国际的路线和纠正过去的错误。这表明，它千方百计在掩盖这些错误，并采取外交手腕蒙骗共产国际和党员群众。政治局的这种立场不可能彻底纠正过去的错误和执行共产国际的路线。恰恰相反，它在加深党内的危机、

2. 显然，李立三路线现在还在继续发展，并造成了许多危险的现象，例如，邓中夏同志在湖北省北部执行的是百分之百的富

农路线；红军第1军和第3军收缴了农民手中的武器；在上海和其他城市，党内的消极情绪在增长。当反革命向革命进攻的时候，这些现象特别危险并会帮助敌人消灭我们党。如果现在我们不能尽快地彻底揭露李立三的错误路线和在群众中积极解释共产国际的路线，在一切工作中加以贯彻，并用这种方法动员广大群众去反击反革命的进攻，那么革命就会遭到重大失败。

3. 斯特拉霍夫^①同志的派别斗争继续在发展，现在甚至渗入到政治局。目前政治局认为，那些捍卫共产国际路线和反对李立三路线的同志以及批评党的三中全会持调和主义态度的积极分子是宗派分子，并且认为，他们也有自己的派别，他们反对中央的斗争也是派别斗争。政治局不仅不接受他们的批评，而且还严厉地惩罚他们。而对那些实际上还在继续执行李立三路线的同志，只是进行形式上的模棱两可的批评。显然，政治局是坚持派别的观点，在进行反对共产国际路线的斗争。这种立场无疑是在损害党，分裂党并在造成党内的严重危机

4. 在党犯了如此严重错误的时候，在党经受严重危机的时候，每个共产党员为了挽救党和挽救革命，都应该坚决拥护共产国际的路线并采取一切手段为之而斗争，特别是我，作为这种危机的主要制造者，在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之后，应该比大家更加勇敢地起来反对自己的错误，反对继续犯这种错误和为反对共产国际路线而进行派别斗争的人。只有这样，我才能减轻自己的罪过，尽到一个布尔什维克的义务。我想，如果我能够本着这种精神向党员群众说明自己的错误和揭露两面派态度，那么这就会有助于更加迅速地贯彻共产国际的路线和实现党的工作转变。我想，只有这样，我才能真正改正自己的错误。因此，我请求共产国际允许我现在就返回中国去进行这项工作，因为在莫斯科我不能在这

① 瞿秋白。

方面有效地和迅速地进行这项工作。

5. 共产国际已经不止一次有过与一些同志打交道的经验，这些同志在这里完全赞成共产国际的路线，而在他们的祖国则另搞一套。这种把戏——两面派行为，斯特拉霍夫同志现在表现得特别突出。我作为一个布尔什维克，应该真诚而严肃地声明如下：首先，我在党的整个历史上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派别，也从来没有搞过宗派活动，其次，我以自己的政治生命向共产国际担保说^①，我将真诚地执行共产国际的路线。此外，我深信，只有在实际工作中和在斗争中我才能证明我的忠诚和消除同志们对我的怀疑，自然，这种怀疑也是应该有的。

6. 我认为，我犯严重错误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缺少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从党的利益来看，我留在这里学习，这对我是有重大意义的。因为现在党和革命正处在危机时刻，因为我是这场危机的罪魁祸首，我想，我的工作会带来很大益处的，所以我想，如果我现在就前往中国并在那里工作，这对党将会更有益处，所以我决定写这份声明。请共产国际允许我现在就回去工作。我希望，共产国际能对此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并给予我答复。此外，我还希望，共产国际能给我提供一个亲自阐述我对此问题的看法的机会。

李立三

全宗 495，目录 4，卷宗 77，第 67—69 页。

打字稿，副本。

① 原文如此。

356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对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电报稿的解释信

1931年1月2日于莫斯科

绝密

对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电报稿的解释信^①

共产国际执委会10月13日信批评了李立三、政治局和党中央所犯的错误^②，这封信在中共中央政治局1930年12月18日^③会议上进行了讨论。政治局内初步形成了两条路线：一条路线的支持者们指出，李立三和中央的路线是与共产国际执委会的路线相对立的（这种意见以莫斯克文^④为代表），另一条路线是斯特拉霍夫^⑤的路线，他认为，共产国际执委会的路线与中央的路线是一致的；斯特拉霍夫对两个文件（政治局6月11日决议^⑥和中央7月15日号召书^⑦）作了这样的评价，而共产国际执委会谴责这两

① 1931年1月3日皮亚特尼茨基将该文件送给莫洛托夫。电报稿没有找到。

② 指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李立三路线给中共中央的信。

③ 原文如此。应为1930年11月18日（见第329号文件）。

④ 周恩来。

⑤ 瞿秋白。

⑥ 指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议《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

⑦ 原文如此。看来指1930年8月14日中共中央对目前时局宣言，发表在1930年8月15日《红旗日报》上。

个文件，认为它们反映了李立三的全面冒险主义、半托洛茨基主义纲领。下面是斯特拉霍夫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关于这个问题的讲话内容：

1. “共产国际执委会来信主要指出了李立三路线的错误，并没有指出中央的错误。”

“我们应该指出，三中全会^①的路线是正确的，但是不够深刻的。”

“我们现在有三条路线：一条是共产国际和党中央的路线，第二条是右派的路线，第三条是“左”派的路线。”

2. “共产国际执委会10月13日来信指出了李立三的错误，这些错误体现在8月1日和3日政治局两次会议上的讲话中和他的实际工作中。政治局6月11日决议和7月15日号召书没有偏离正确的路线，只是右派和‘左’派歪曲了这条路线，他们偏离了共产国际执委会和党的路线。”

斯特拉霍夫同志在11月又重复了他在三中全会上讲的话。三中全会的基本方针是在于，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即使在李立三路线时期，也是与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政治路线一致的。这个方针体现在三中全会的政治决议中，决议中说：

三中全会承认，“中央政治局的路线是正确的，是和共产国际的路线一致的”。^②

斯特拉霍夫同志对李立三同志作了这样的评价：“伯山同志（即李立三）的发言，尤其能够用布尔什维克的精神来批评检查自己和政治局过去的错误。”他甚至认为，李立三同志批评自己的错

① 指中共六届三中全会（见第346页注③）。

② 中共三中全会（1930年9月）决议：《关于政治状况和党的总任务》。中国科学研究所通报，莫斯科1931年第5—6期（总第74—75期），第12页；《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第282页。

误过分了。他说：“伯山（李立三）同志自己的发言之中虽然很着重的——太着重了——说明估量发展速度的错误，可是也注意到了对于现时革命力量估计的错误。”^①

但是，斯特拉霍夫同志却集中火力攻击何孟雄同志和张国焘同志，前者基本上正确地批评了李立三的错误，而后者根本没有提出什么特别的主张，相反在这里只表示赞成共产国际执委会的路线。

在三中全会上，斯特拉霍夫同志不承认李立三路线与共产国际执委会的路线存在分歧。相反，他始终强调指出，李立三同志只是犯了一些局部性的策略和组织方面的错误。顺便说一句，他声明：“中共中央最近有一点错误，决不是总的政治路线不正确，而右派机会主义的分子却利用来反党。”他认为，政治局只是做了几件不正确的事，他说：“但是最近几月，中央政治局对于目前形势的估量，有不正确的地方，这是必须指出的。中央政治局已经承认了这一点^②。”

斯特拉霍夫同志还在莫斯科的时候就得到过指示：不要急于去攻占长沙，红军没有能力攻占大的中心城市，可是他对于攻占长沙的错误不仅不给予批评，相反还说：“我们的进攻方向是完全正确的，错误仅仅在于，我们的进攻方式是不对的。”^③

共产国际执委会把忽视在非苏区进行经济斗争看作是李立三同志领导下的政治局所犯的最重大错误之一。斯特拉霍夫同志在自己的讲话中关于这一点讲得很多。可是在最后，他把整个问题归结为：我们应该“坚决地准备政治罢工，把政治斗争口号与经

① 见《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篇）》第7卷，第1、6—7页。

② 同上，第6页。

③ 同上，第10页。

济斗争口号结合起来”^①。

由于对李立三的观点和三中全会的决议进行了批判，党内形成了一个反对派，这个反对派是以毕业于青年共产国际学校和国际列宁学校的同志，以及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以前的学生和上海及共青团中央一些负责的工作人员等为代表的。对待这批人，斯特拉霍夫不是吸收他们参加党的领导工作，把他们团结在共产国际执委会正确指示的周围，而是讲了下面一番话：“他们在批评中不是像我们那样从最主要的问题出发，而是谈论一些有关土地问题、工会问题、经济政策（看来是指苏维埃经济政策）、工人农民问题等的琐事，并利用这些琐事来进攻党中央。这不是在帮助中央，而是在攻击中央，这种攻击是无原则斗争表现的残余^②。”

中央在红军的进攻策略问题上继续在犯以前的错误。一方面，军队不去做政治工作，不去加强自己的力量和巩固已占领的地区，而是重新进行争论：是需要先攻占长沙，然后攻占武汉呢，还是先攻占南昌，然后攻占武汉、长沙等等，而当时军阀和帝国主义者的联合力量正从四面八方向红军逼近，企图把红军赶出它所占领的地区；另一方面，中央继续坚持这样一种理论：必须动用全部兵力向城市和农村的敌人进攻。（引自中央委员会 10 月 29 日给第 1 和第 3 集团军前委的信。）^③

“如果你们现在由于争论而分散我们的兵力并把进攻策略变成防御策略——这将是个严重的错误。你们应该知道，红军现在已经开始消灭军阀战争，红军的中心任务是组织大规模的国内战

① 见《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篇）》第 7 卷，第 12 页。

② 出处不详。

③ 指 1930 年 10 月 29 日中共中央关于对付敌人“围剿”的策略问题给一、三两集团军前委的指示。（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6 册，第 477—482 页）。

争。采用这种办法我们就能取得胜利，所以红军的基本策略就是进攻。中心问题不在于攻占长沙或进攻南昌。当然，如果我们能够攻下长沙或南昌，那很好。我们应该消灭敌人的兵力，并根据这个原则坚决地进攻，迫使敌人由进攻转入防御。”（引自中央 10 月 28 日给红军第 10 集团军前委的信。）^①

“为了走上主要道路，向一些中心城市挺进，为了迫使敌人退却，为了使我们转入进攻，我们应该集中兵力，转而采取进攻的策略。”^②

李立三本人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上完全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和三中全会所犯的错误^③。李立三本人说，“三中全会没有理解我的观点的错误——这从斯特拉霍夫同志的报告中可以看出，他没有理解这个问题”。

接着他说：“三中全会对李立三路线——半托洛茨基主义采取了调和主义的态度。斯特拉霍夫同志以调和主义的态度对待我的错误。在斯特拉霍夫同志的领导下，不可能真正以布尔什维主义的精神纠正这些错误，因为在斯特拉霍夫同志身上也有盲动主义的残余，他也弄不清楚中国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因此他不可能对李立三路线进行坚决的斗争”^④。

最后应该指出，在苏区党的工作、工会运动和红军中都还没有出现转变。

尽管斯特拉霍夫同志的态度不正确，政治局还是推举他在即

① 文件没有找到。

② 引自何处不详。

③ 关于李立三的错误问题在 1930 年 12 月 12 日和 15 日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上进行了讨论。（见第 344、345 号文件）。

④ 引自李立三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 1930 年 12 月 1 日扩大会议上的最后发言（见全宗 495，目录 154，卷宗 417，第 260 页）。

将召开的中共四中全会^① 上作为主要问题的报告人。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654，第 2—5 页。

打字稿，原件。

① 见第 543 页注④。

357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第109号记录 (摘录)

1931年1月3日于莫斯科

绝密

特别文件

听取：7（1356）——马季亚尔同志关于中国情况的通报。

决定：7——责成东方书记处再研究一下中共中央关于召开党代表大会的建议。政治委员会认为，现在举行党的代表大会是不适宜的，但是它不反对召开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会议。

至于李立三同志返回中国的请求，应该征询远东局的意见。政治委员会认为，李立三同志暂时应该留在莫斯科；东方书记处应该建议李立三同志在〔国际〕列宁学校参加一期短训班。

如果张彪^①同志同意，东方书记处应再和他谈一次话，但不要向他透露将来要下达的指示。建议远东局承担对中国共产党活动的实际领导工作，与中国共产党领导机关建立密切联系并按照不同方向分配远东局一些成员的工作。这些想法应该以东方书记处建议的形式转告远东局。

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 皮亚特尼茨基

① 张国焘。

[附]

[马季亚尔给皮亚特尼茨基和库西宁的便函]^①

皮亚特尼茨基和库西宁同志：

在最近一批邮件中我们收到了从中国寄来的许多极其重要的材料，这些材料阐述了苏区、红军和中共领导层的情况。

东方书记处请求在政治委员会上听取关于中国情况的简短通报（10 到 15 分钟）。

东方书记处同时准备一份关于中国情况的简短备忘录^②。

马季亚尔 1930 年 12 月 30 日

全宗 495，目录 4，卷宗 77，第 4—5、66 页。

记录为德文打字稿，原件；附录为打字稿，原件，亲笔签字。

① 文件上有皮亚特尼茨基的批示：“海默同志！可以提出。”

② 见第 356 号文件。

358

埃斯勒与徐锡根、陈郁和 王克全的谈话记录

1931 年 1 月 3 日于上海

与徐锡根（中华全国总工会）、
陈郁（海员工会领导人）和
王克全（上海工会联合会领导人）的谈话

徐 [锡根]：关于全会^①上自行加聘委员工作的性质存在着争论。我应该承认，在那些与李立三进行过斗争的人们中间有一些最负责的同志将要参加全会的工作。但是还应该有更多的同志出席全会。有些同志建议增加两名政治局委员。应该进入政治局的还有罗章龙和卢福坦。王昌^② 和沈^③ 也应该成为政治局委员。扩大政治局的组成人员是合适的，因为有必要把政治局中的几位同志派到苏区去。

陈 [郁]：从 96 号通告^④ 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中央在反对李立三路线的斗争中还没有正确的态度。还不理解在对待资本家的猛烈进攻方面所面临的任务。同志们不可能相信中央会解决所有这些问题。对李立三路线不仅可以，而且需要在思想上和组织

① 指中共六届四中全会。

② 原文如此。可能是王克全。

③ 原文如此。可能是陈郁。

④ 指 1930 年 12 月 23 日中共中央第 96 号紧急通告《为坚决执行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与调和主义号召全党》（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6 册，第 546—552 页）。

上进行十分尖锐的斗争。我不能同意四中全会的人员组成，我认为，曾经支持过李立三的中央委员应该退出中央委员会。

王克全：基层党组织的同志不可能相信中央。中央经常犯错误。即使纠正了，那也是口头上纠正。四中全会的大多数应该由与李立三进行过斗争的人员组成。他们应该拥有表决权。我们反对周恩来，他对南京起义^①负有责任。向忠发所犯的错误太多，他不应该留在总书记职位上。必须改组所有领导机构。是的，他赞成，必须同李立三路线进行斗争，不是在一些团体中，而是在全党范围内。他完全赞成，必须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认为右派分子利用了这种局面，这种看法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一些人断定，统治阶级在加强自己的阵地。公开的取消派也在积极活动，他们要求恢复党籍。陈独秀声称，他也同李立三进行过斗争^②。第七次党代表会议^③将具有很重要的意义，但是它不应本着李立三路线的精神进行筹备。江苏党组织非常积极地与李立三路线作斗争，各区和支部通过许多决议，但是都不给发表，而与李立三路线进行斗争的同志们被指责在搞右派集团。中共鄂东委员会书记瓦日诺夫^④，看了第96号通告后说，现在没有什么希望了，应该退党。我同他谈过话，向他指出，他的观点很错误，于是他开始积极地同李立三路线作斗争。但是省委的一些领导同志却把他当作右派来批判，后来他被撤了职。

徐〔锡根〕：他完全同意罗伯特斯^⑤同志的意见，应该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罗伯特斯同志似乎误解了他，以为他们似乎是反

① 见第252、255、261、265号文件。

② 文件没有找到。

③ 原文如此。应为：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

④ 郭妙根。

⑤ Г. 埃斯勒。

对戈卢别夫^①同志和其他同志进入党的领导机关。他只是想报告一下关于这些同志的情况，说明他们在与李立三路线斗争中表现出来的真实态度。当这些同志看了 6 月 11 日决议^②后，他们只是在一个问题上批评李立三，即批评他对国际形势的评价，认为他的立场是右的。他们是同意举行武汉暴动和总罢工^③的。当李立三对他们进行了严厉批评后，他们写了说明信，信中承认自己的错误^④。共产国际来信^⑤送来时，他们还是没有进行斗争。只是在 8 个大学生^⑥回来后，向他们通报了共产国际非常坚定地反对李立三的消息，他们才开始同他作斗争。他们在斗争中只是涉及一些枝节问题，例如批评中华全国总工会有组织小团体的倾向，批评远东局的一些同志对我们不信任。如果辩论时有些同志使用了不恰当的提法，他们就立即被说成是右派，而不是在实际工作中纠正右的错误。我们现在知道了，共产国际和远东局同李立三路线进行着非常尖锐的斗争，我们相信，在你们的领导下全会将会取得成功。但是，对于一些组织方面的问题，我们是不同意的。当然，这并不是一些小问题。如果我们只在政治上和思想上进行斗争，而在组织上进行斗争，那么纠正一些同志的错误只是一句空话。他们口头上赞成，而实际上并不赞成。如果只在组织上进行斗争，那就容易犯右的错误。

王克全：我想回答罗伯特斯的问题，我们同意支持远东局，从该局那里我们得知，不会有任何妥协。我们也将支持召开四中全

① 陈绍禹。

② 指中共中央政治决议《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见第 241 号文件注①）。

③ 见第 254、256 号文件。

④ 看来指 1930 年 7 月 10 日陈绍禹给中共中央的信。

⑤ 指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李立三路线给中共中央的信（见第 308 号文件注③）。

⑥ 其中有：夏曦、何克全、陈昌浩。

会。但是我们请你们考虑我们的建议。

陈郁：在全会上将会有许多衷心拥护李立三的积极分子。在许多地区反对李立三路线的斗争还没有开展。

徐〔锡根〕：当然，必须对各省的组织进行监督，应该在各支部进行讨论，共产国际的决议还没有传达到党员群众。我们在组织方面提出的建议是群众的建议，我们建议中的大部分都被政治局拒绝了。我们认为，这些建议对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来说是合适的。既然远东局已经作出决定，我们愿意支持全会。全会好像同意罗伯特斯的建议：在全会上应该同共产国际代表团建立密切的联系。

罗伯特斯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660，第 1—2 页。

德文打字稿，原件。

359

瞿秋白给米夫的信

1931年1月4日^① 于上海

致约瑟夫^② 同志

抄送远东局

现给您寄去同远东局协商过的〔中共〕三中全会关于政治局报告的决议的最后稿^③。这个稿子证明当时我们在什么问题上（即在对政治局在一定时期的错误的评价问题上）同远东局达成了一致意见。这个稿子，即用俄文给远东局的抄送稿，已经没有“反共产国际斗争”的说法。我记得在远东局对政治决议提出的修改意见中（我们当即同意了这些意见），也没有政治局的“反共产国际斗争”的说法。（修改意见稿是用德文写的，我们没有保留）。

但就像那次我和莫斯克文^④ 对您所说的，我现在重申：

（1）对调和主义的做法，远东局没有责任，我们要负责，特别是斯特朗^⑤ 要负责，因为我们当时不止一次地反对把反共产国际斗争“加到”李立三同志和当时的政治局头上，而远东局坚持要揭露这个事实。

（2）由于我们不同意，当时的远东局最后（在修改稿中）已

① 在文件中错误地写成：1930年1月4日。

② П. А. 米夫。

③ 见《中国科研所通报》，莫斯科1931年第5—6（74—75）期，第31—32页。

④ 周恩来。

⑤ 瞿秋白。

经不提这个提法^①。

所说的这些只是为了确认事实的存在，没有任何减轻我们的责任，特别是我的责任的意思。一句话，对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机构及其意见，确曾有过不能允许的不忠实态度，我当时对待李立三路线的腐朽的、机会主义的调和主义态度，更加说明了这一点。而像中共四中全会决议草案^②中所说的“协商一致”和“协调一致”则未曾有过。

在政治局讨论草案时，我和莫斯克文都未提到这个问题，因为我认为，这会成为对原远东局领导人的攻击。这个问题可以在您那里解决。

请答复我怎么办：是否需要对决议草案稿作相应的修改。顺便说一句，对这一点的修改，如果是这样改的话，丝毫不会改变事情的实质，即对“不忠实行为”的严厉谴责。此致

敬礼

斯特朗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579，第 2Г、2Д 页。

亲笔签字。

① 对“政治局同共产国际执委会的路线一致”的提法也是这样。

② 文件没有找到。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第九卷

作者=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

页数=590

SS号=11039434

出版日期=2002年05月第1版

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封面页

书名页

版权页

前言页

目录页

第三部分：1930年莫斯科的对华政策和“李立三路线”

198. 中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1930年1月10日)

199. 刘少奇给黄平的信(1930年1月11日)

200. 中共满洲省委给联共(布)远东边疆区委员会的信(1930年1月11日)

201.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第35号记录(摘录)(1930年1月13日)

202. 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飞行表决结果作的第24号记录(1930年1月18日)

203.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第37号记录(摘录)(1930年1月23日)

204.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15号记录(摘录)(1930年1月25日)

205.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的信(1930年1月30日)

206. 雷利斯基给米夫的信(1930年2月1日)

207. 米夫给瞿秋白的信(1930年2月9日)

208.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17号记录(摘录)(1930年2月15日)

209.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1930年2月)

210.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1930年3月3日)

211. 瞿秋白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的信(1930年3月19日)

212. 雷利斯基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的信
(1930年3月20日)
213.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
第47号记录(摘录)(1930年3月23日)
214.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
信(1930年3月27日)
215. 陆定一、刘明佛和瞿秋白给希塔罗夫和共产国际
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的信(1930年4月2日)
216. 皮亚特尼茨基给佩列佩奇科的信(1930年4月4日)
217.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22号记录(摘录)(
1930年4月5日)
218.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22号(特字第120号
)记录(摘录)(1930年4月5日)
219. 马马耶夫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处务
委员会会议提交的报告提纲(1930年4月14日)
220.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处务委员会扩大
会议第14号记录(摘录)(1930年4月15日)
221. 马马耶夫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处务
委员会扩大会议上的报告(1930年4月15日)
222. 张国焘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和国际监察
委员会的信(1930年4月17日)
223. 李立三给周恩来和瞿秋白的信(1930年4月17日)
224.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处务委员会会议
第15号记录(摘录)(1930年4月25日)
225.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
信(1930年5月1日)
226. 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信(
1930年5月14日)
227.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26号(特字第124号
)记录(摘录)(1930年5月15日)
228. 瞿秋白和周恩来给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

治委员会的信(1930年5月15日)

229.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的信(1930年5月18日)

230. 中共中央给斯大林的信(1930年5月18日)

231. 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信(1930年5月18日)

232.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第64号记录(摘录)(1930年6月6日)

233. 王稼祥给米夫的信(1930年6月8日)

234. 皮亚特尼茨基给莫洛托夫的信(摘录)(1930年6月10日)

235. 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第65号记录(摘录)(1930年6月12日)

236. 秦邦宪和何子述给米夫的信(1930年6月14日)

237. 王稼祥给米夫的信(1930年6月14日)

238.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28号(特字第126号)记录(摘录)(1930年6月15日)

239.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给中共中央的电报稿(1930年6月16日)

240.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30年6月19日)

241.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1930年6月20日)

242. 中共中央政治局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的信(1930年6月21日)

243.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1930年6月22日)

244. 埃斯勒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的信(1930年6月23—25日)

245. 向忠发给周恩来的信(1930年6月25日)

246. 陈绍禹给米夫的信(1930年6月26日)

247.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第69号记录(摘录)(1930年6月28日)
248.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关于中共代表团在处理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派别斗争时的活动问题的决议(1930年6月28日)
249.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第69号记录(摘录)(1930年6月28日)
250.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共中央的电报(早于1930年7月10日)
251. 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核心小组会议第X号记录(摘录)(1930年7月18日)
252. 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电报(1930年7月18日)
253. 埃斯勒给项英的信(1930年7月18日)
254. 陈绍禹和王稼祥给米夫的信(1930年7月22日)
255.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30年7月23日)
256. 陈绍禹给米夫的信(1930年7月24日)
257.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第73号记录(摘录)(1930年7月29日)
258.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关于中共中央政治局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之间分歧问题的决议(1930年7月29日)
259.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关于远东局与中共[中央]政治局之间在1930年2月17日至8月期间接连发生的分歧”的决议(1930年7月29日)
250.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就红军建设和游击运动问题给中共中央的指示信(1930年7月29日)
261.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中共中央的信(1930年8月1日)
262. 陈绍禹给米夫的信(1930年8月1日)

263.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电报(1930年8月3日)
264.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电报(1930年8月4—7日)
265. 斯托利亚尔给洛佐夫斯基的信(摘录)(1930年8月5日)
266.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中共中央的信(1930年8月6日)
267. 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联席会议记录(1930年8月6日)
268. 陈绍禹给米夫的信(1930年8月6日)
269. 中共中央政治局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的信(1930年8月7日)
270.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的信(1930年8月7日)
271.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电报(1930年8月8日)
272. 向忠发给斯大林的信(1930年8月8日)
273. 中共中央政治局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电报(摘录)(1930年8月8—9日)
274.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电报(1930年8月8—9日)
275.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30年8月9日)
276.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的电报(1930年8月9日)
277. 别尔津和图梅利陶关于中国军事政治形势的书面报告(不晚于1930年8月10日)
278.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电报(1930年8月12日)
279. 斯大林给莫洛托夫的电报(摘录)(1930年8月13日)

)

280 .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1930年8月13日)

281 .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1930年8月中旬)

282 . 瓦西里耶夫就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的电报给莫洛托夫的信(1930年8月16日)

283 . 中共中央政治局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电报(1930年8月16日)

284 . 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的信(1930年8月16日)

285 .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的电报(早于1930年8月17日)

286 . 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电报(1930年8月17日)

287 . 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电报(1930年8月17日)

288 .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1930年8月17日)

289 .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成员与中华全国总工会代表谈话记录(1930年8月18日)

290 . 米夫给琼森的信(1930年8月22日)

291 .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5号(特字第X号)记录(摘录)(1930年8月25日)

292 . 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信(1930年8月25日)

293 . 中共中央政治局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电报(1930年8月27—28日)

294 .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1930年8月29日)

295 . 马马耶夫给马季亚尔的信(1930年8月31日)

- 296 . 陈绍禹给米夫的信(1930年8月31日)
- 297 .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1930年9月2日)
- 298 . 中共中央政治局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电报(不早于1930年9月4日)
- 299 . 雷利斯基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电报(1930年9月12日)
- 300 .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周恩来和瞿秋白的信(1930年9月16日)
- 301 . 埃斯勒给中共三中全会的信(1930年9月28日)
- 302 . 中共三中全会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的电报(1930年9月28日)
- 303 . 中共中央政治局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的电报(1930年10月3日)
- 304 . 中共中央政治局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电报(1930年10月5日)
- 305 . 瓦西里耶夫给莫洛托夫的信(1930年10月8日)
- 306 .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关于中共内部状况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的通报(1930年10月9日)
- 307 . 中共中央政治局给斯大林、莫洛托夫和皮亚特尼茨基的信(1930年10月12日)
- 308 .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第89号记录(摘录)(1930年10月13日)
- 309 .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1930年10月15日)
- 310 . 陈绍禹给米夫和马耶尔的信(1930年10月17日)
- 311 . 斯托利亚尔给中华全国总工会共产党党团的信(1930年10月17日)
- 312 .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1930年10月20日)

313.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小委员会的信(1930年10月20日)
314.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皮亚特尼茨基的信(1930年10月20日)
315. 埃斯勒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1930年10月20日)
316. 盖利斯给别尔津的信(1930年10月20日)
317. 斯托利亚尔给洛佐夫斯基的信(1930年10月20日)
318. 阿尔布列赫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信(1930年10月21日)
319. 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局的信(1930年10月23日)
320. 陈绍禹给米夫的信(1930年10月23日)
321.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30年10月24日)
322. 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的信(1930年10月25日)
323.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1930年10月30日)
324.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1930年10月30日)
325. 周恩来给莫洛托夫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的电报(1930年11月4日)
326.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处务委员会会议第33号记录(摘录)(1930年11月10日)
327.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1930年11月10日)
328.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处务委员会会议第34号(记录)(1930年11月15日)
329.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30年11月18日)
330. 陈原道给米夫的信(1930年11月21日)

331.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决议(1930年11月23日)
332. 临时小组的决定(1930年11月27日)
333. 斯托利亚尔给洛佐夫斯基的信(摘录)(1930年11月28日)
334. 盖利斯给别尔津的信(1930年11月28日)
335. 瞿秋白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的信(1930年11月29日)
336. 盖利斯给别尔津的信(1930年11月30日)
337. 盖利斯给别尔津的书面报告(1930年11月30日)
338. 雷利斯基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1930年12月1日)
339. 米夫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摘录)(1930年12月2日)
340.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第104号记录(摘录)(1930年12月3日)
341. 盖利斯给别尔津的信(1930年12月3日)
342. 张国焘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提出的声明(1930年12月4日)
343.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1930年12月10日)
344.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扩大会议第29号记录(摘录)(1930年12月12日)
345.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扩大会议第30号记录(摘录)(1930年12月15日)
346.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中共中央的信(1930年12月15日)
347. 陈绍禹给萨发罗夫、米夫、马季亚尔、马耶尔的信(1930年12月17日)
348.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的电报草稿(不早于1930年12月

18日)

349.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中共江苏省委的信
(1930年12月20日)

350. 马季亚尔给皮亚特尼茨基的信(1930年12月21日)

351. 库丘莫夫关于瞿秋白和周恩来错误的记录(不晚
于1930年12月22日)

352. 斯卡洛夫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组织部和东方书
记处的书面报告(不晚于1930年12月28日)

353.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成员与何孟雄和温裕
成的谈话记录(1930年12月29日)

354. 埃斯勒同徐锡根谈话记录(1930年12月30日)

355. 李立三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提出的
声明 (1931年1月1日)

356.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对共产国际执行
委员会主席团电报稿的解释信(1931年1月2日)

357.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
第109号记录(摘录)(1931年1月3日)

358. 埃斯勒与徐锡根、陈郁和王克全的谈话记录(1931年1月3日)

359. 瞿秋白给米夫的信(1931年1月4日)

附录页